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6月(下)
总第200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路径探索与经验总结
叶子楠

社区家政服务站嵌入医养结合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以江苏盐城为例
陈 敏 * 周梅香

基于公益实践的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提升路径探究
沙炜娟

“枫桥经验”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
魏明宇

精准理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杨正才

社区议事治理法治化构建研究
谢青辰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2026 年 6 月下
总第 200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6 月 28 日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眸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林平光 /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万沣毅 / 马贵荣 / 马强 / 王守红 / 王红 / 王坚松 / 王国权 / 王政 / 王保峰 / 王哲 / 王德立 / 王德兵 / 邓富友 / 石恒平 / 布宏雷 / 布朋印 / 卢莎 / 田野 / 田瑞建 / 白浩扬 / 冯军伟 / 朱红艳 / 任璐 / 刘长鹏 /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漩 / 闫新勇 / 孙明 / 苏芬芬 / 李卫华 / 李永华 / 李军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梓英 / 李斌 / 杨扬 / 杨同喜 / 杨会民 / 杨雨 / 杨威 / 杨航 / 杨高磊 / 肖玲 / 吴春华 / 吴雪燕 / 何书一 / 何宗尉 / 谷学亮 / 辛福 / 张冬 / 张汉英 / 张兴亮 / 张金霞 / 张鼎 / 张燕蕊 / 陈炎松 / 陈承 / 陈勇 / 邵佳 / 范娱艳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赵建苹 / 赵容榴 / 赵燕成 / 胡刚 / 侯军旺 / 侯俊勇 / 秦一杰 / 耿庆山 / 柴宏 / 徐志昌 / 高云辉 / 高蕾 / 郭保生 / 郭晓利 / 黄玉海 / 黄洪松 / 曹耀文 / 联凡 / 蒋红超 / 惠熙玲 / 鲁兵库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臧忠燕 / 裴旭峰 / 裴凯峰 / 廖俊军 /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王熙元 /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 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 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 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CONTENTS

2026 年 6 月 下
总 第 200 期

基层党建

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构建研究——基于“三全育人”的分析框架……魏奕斌 01
“七个有力”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实践研究……秦文征 孙佳怡 04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管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张 娟 07
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研究……孙菁阳 白冬梅 10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路径探索与经验总结……叶子楠 13
党建引领视域下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研究——以花都炭步镇与新会三江镇的实践为例……黄 雪 周满如 陈龚熇 16
党建引领下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的思政维度与实践方略……肖 彤 19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潘 莉 22
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突破路径研究……信 莹 李丙文 王 怀 刘 伟 刘 璐 25
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的实践路径探究……杜 旭 28
基于党建融合的多元回访模式在出院患者回访中的应用……刘晓燕 林秀梅 * 苏中英 何碧姣 彭子婉 31
国企基层党建与基层组织效能提升探析……铁晓蓓 34
党建与专业深度融合视域下高校服务型学生党支部建设路径探析……路 艺 37
“党建 +”赋能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成长实践路径研究 ……陈夏囡 40
党建引领构建社区骨质疏松防控“全链条”健康促进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费巨波 张叶枫 叶变良 何康莉 顾叶 43

案例分享

社区家政服务站嵌入医养结合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江苏盐城为例……陈 敏 * 周梅香 46
高职院校党建宣传提质增效的实践探索——以海报宣传为例……何乐为 金 典 49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县域模式构建研究——以 DZ 市为例 ……谷劲松 姜华 陈甜妹 52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职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困境与对策——以四川省某医学高职院校为例……莫洁雲 何 淼 赵杰灵 55
高校教工党支部培育双创英才的实践探索——以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电系党支部为例……韩建超 焦少妮 郝惠敏 张旭飞 马晓宝 58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高职廉洁教育的本土化图景——以温州地域文化为例……李 航 61

破解“换届僵局”：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驱动业委会换届的治理创新——以北京市T社区的实践为例……王裕瑞 64
《法治宣传教育法》实施背景下大学生参与乡村普法的路径探索——基于团中央“法治中国青春行”立项团队“法之声反诈护乡实践队”的个案分析……刘恪兵 67
TIE架构下的残障儿童康复模式探索——以上海市J街道残障儿童综融介护项目为例 ……周 蔚 徐千越 70
社会群体依恋的内涵与当代价值——以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为视角……马靖怡 王 浩 73
乡村振兴下依托高校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模式探析——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例……谢伟芳 秦品珠 段 英 杨 丹 陈涛涛 7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践研究——以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为例……齐庆国 黄 欣 79

百家争鸣

陕西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调查现状及对策研究……王 丹 王国成 82
以活动聚人心：新时代高校工会凝聚教职工力量的实践与启示……孙曙光 85
基于意义疗法的中职生生命意义感缺失成因与培育对策……路月萌 88
新时代劳模精神传承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许卓君 91
银发经济背景下家政职业教育发展创新研究……刘世杰 94
人工智能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路径研究……夏 颖 刘静雯 * 97
基于公益实践的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提升路径探究……沙炜娟 100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解 男 103
高校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在离退休工作中的作用研究……刘亚辉 106
政策工具视角下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文本量化研究……雷宇晨子 李建娜 109
从“我”到“我们”：文化团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机制研究……马 霞 112
红色文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程雅淇 116
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购买服务创新管理的路径选择……焦亚转 王 萍 120
甘肃省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研究……郭 婷 陈 尧 123

教学研究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实现与实践创新研究……程 芳 126
马理学科研究生“教 + 研 + 调 + 宣”融合育人模式的逻辑内涵与优化路径……曾 蓉 129
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探索……南 冰 13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欧阳日平 13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研究……施秋瑜 138
智能建造背景下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教学改革探究——以职业本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为例……郑述芳　陈祥花　陆燕青 141
“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研究……杜　燕 144
中华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路径探索……李慧明　赵静雯　魏　来 147
AI 赋能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型本科生教学体系重构研究——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李朝晖　李晓娟　康露　魏明强　张国明 150
文化自信背景下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的思政教育策略研究……方　骞 153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三重向度……马　丽 156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优化与实施策略……杨　怡　周晶玲　张　获　王树培 159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机遇、价值与创新路径研究……周长萍 162

社会治理

社区议事治理法治化构建研究……谢青辰 165
乡村振兴视域下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质量提升路径探析……杨　玲 168
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张锦玉 171
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融合路径研究……李文静 174
洛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研究……刘亚莉　白蒙蒙 177
侗族文化赋能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探析……王　莹 180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的路径……王翔宇 183
精准理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杨正才 186
国际友好社区治理模式构建——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机制研究……汤雪梅 189
数字治理视域下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研究……浦颖娟 192
“看不见”的脚本：算法推荐的价值嵌入与治理路径……张宁远 195

思政论坛

“航空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陈　巍　朱明玉 198
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四个课堂”联动路径研究……李　昀　申晓善　刘本伟 201

课程思政在药理学的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聂金兰 * 刘桢宇 黄华奎 陈露英 204
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薛依沙 何 菲 * 207
“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形成探索……李 钦 210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策略……林映麟 213
“躺平”“内卷”的思政应对策略与博物馆教育创新的育人效能比较研究……王 振 张梦迪 216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的评价机制探析……赵羽涵 李光衿 219
大思政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研究……吴 萍 222
基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谈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与作用……张 琪 张秀梅 张 栋 杨兴廷 * 225
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化叙事能力提升策略探析……李 莉 李新萍 228
大思政视域下应用型高校的就业育人模式探究……夏翠云 龙 腾 * 231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国有企业思政工作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研究……马 硕 234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晋曼钰 237
“枫桥经验”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魏明宇 240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的研究……关思宁 243

学海探骊

朋辈心理辅导体系为“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育人赋能……焦小茹 246
筑牢生命防线：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教育的现状与路径探索……丛中流 祁艳波 葛 杰 贾月辉 马淑丽 249
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促进教育家精神培育的有效路径研究……唐 娜 252
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高等数学建模应用创新路径探析……彭 昂 255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创新研究……蒋晓燕 韩滢滢 蒋晓斌 王 玥 詹 彬 258
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育人模式实践探索……刘佳婧 261
基于大数据的新质生产力驱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路径构建研究……何 雷 于 楠 264
最优停止理论在大学生学业规划中的适用性研究……王钦正 石海英 * 267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的精神意蕴、问题及策略研究……刘 勇 赵龙娟 * 邹山丹 270
核心素养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有效性研究……潘柏权 273
基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开发研究……陈锐敏 276
五育融合理念下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构建……石佳禾 张小楠 * 279
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执行困境与纾解路径……姜晓慧 282

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构建研究
——基于“三全育人”的分析框架

魏奕斌

摘要：“三全育人”理念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而党建育人是落实这一理念的核心引领与关键路径。当前，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在主体联动、过程衔接、效能评价等方面仍存在现实困境，制约了其系统性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基于协同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三全育人”与党建育人的内在逻辑契合，系统梳理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面临的主体碎片化、过程片段化、评价形式化、内容供给滞后等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强化顶层设计、健全评价激励、深化组织协同、贯穿成长周期、融合思政教育为核心的协同机制优化路径，旨在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全程全域覆盖的高校党建育人格局，为提升立德树人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高校；“三全育人”；党建育人；协同机制

一、引言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这一重要论述，标志着“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从一种教育理念上升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纲领与行动指南。随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三全育人”从理念倡导向体系化、制度化构建的纵深发展。

高校党建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育人。党建育人，即通过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师生进行政治引领、思想塑造、价值引导和能力培养，是确保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在“三全育人”视域下，党建育人绝非党组织系统内部的“自循环”，更非仅限于发展党员、开展组织生活的狭义党务，而是一项必须整合校内外多元育人力量、贯穿学生成长全周期、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它要求党建工作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惯性思维，主动融入“大思政”格局，成为牵引“三全育人”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枢纽和引擎。

然而，审视当前高校实践，党建育人与“三全育人”的协同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理论研究上，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对“三全育人”内涵的阐释或对党建单项功能的探讨，对二者如何实现深度耦合、机制化协同的系统研究尚显不足；另一方面，实践操作中，“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协同主体分散、育人过程割裂、评价激励虚化、内容形式陈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党建育人整体效能的释放。因此，如何从协同理论的视角出发，诊断当前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的现实梗阻，并构建一套科学、有效、可操作的协同机制，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

本文立足于这一背景，旨在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进一步厘清“三全育人”与党建育人在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上的深度契合；二是精准诊断当前协同机制运行中的核心困境与深层原因；三是提出一套兼具系统性与操作性的协同机制构建与优化路径，以期为高校思政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推动党建育人工作实现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质变。

二、理论契合：“三全育人”与党建育人的内在逻辑与协同基础

“三全育人”与党建育人并非彼此完全独立的两个体系，而是在价值旨归、实践主体和作用场域上高度同构、深度互补的有机统一体。这种内在的逻辑契合，构成了二者协同机制构建的坚实理论基础。

（一）价值目标的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三全育人”还是党建育人，其终极目标都统一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全育人”通过拓展育人的广度、深度，致力于构建一个覆盖所有人员、贯穿所有环节、渗透所有领域的立体化育人网络，确保育人目标的全面实现。党建育人则侧重于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夯实思想根基、严明组织纪律，确保育人方向的正确性和育人过程的纯洁性。二者“一广一深”“一博一专”，共同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实践主体的高度交叉性

“全员育人”要求打破育人仅是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责的狭隘观念，动员党政干部、专业课教师、管理服务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乃至校友、家庭、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高校党组织凭借其严密的组织体系（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师生党支部）和强大的政治动员、组织动员能力，天然具备整合这些分散育人主体的优势[2]。党组织可以将育人要求通过组织渠道下达至每一个支部、传达给每一位党员，并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例如，通过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让学术骨干同时成为党建和育人的带头人，有效链接专业教师队伍这一关键育人力量。因此，党建育人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育人优势，成为凝聚“育人共同体”的核心纽带。

（三）作用场域的高度融合性

“全过程育人”强调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全方位育人”强调空间维度上的广泛性。党建育人可以通过其丰富的组织生活形态（如“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实践活动载体（如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网络平台阵地，灵活而有力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学生从入学教育到毕业离校的整个学业生涯，融入课堂教学、科研训练、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网络空间、心理健康、管理服务等各个场域。例如，学生党支部可以将组织生活与专业学习研讨相结合，将志愿服务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党组织可以指导学生会、社团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实现“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相结合。这种嵌入与融合，使得党建育人能够有效弥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线上与线下、校内与校外的缝隙，实现育人资源的整合与育人环节的无缝衔接。

基于协同理论，当两个或多个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能够产生超越各自独立功能总和的整体效应时，即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党建育人与“三全育人”的上述契合点，正是产生协同效应的潜在基础。构建有效的协同机制，要设计一系列制度、平台和路径，促使这些交叉的主体在融合的场域中，围绕共同的目标，发生积极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党建育人真正成为驱动“三全育人”整体系统高效、有序运转的核心动力源[3]。

三、现实困境：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的主要梗阻与深层剖析

尽管理论上的契合清晰可见，但在具体办学治校和育人实践中，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的构建与运行仍面临多重梗阻，使得协同效应未能充分显现。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一）协同主体碎片化，“全员”合力凝聚不足

当前，许多高校的党建育人工作在实践中仍被不自觉地划定为组织部门、学生工作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传统思政口”的专属职责，“责任田”思维犹存。专业教师群体普遍存在“重科研教学、轻思想引导”的倾向，认为育人是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的事；行政教辅、后勤服务人员则更多将自身定位为“管理者”或“服务者”，育人意识淡薄，“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理念未能真正落地。即便在党组织内部，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之间、党务部门与教学科研单位之间，也常是各自为营，所谓的“结对共建”有时流于形式化的几次联合活动，缺乏常态化、实质性的内容交融与资源共享。这种主体间的壁垒，导致育人力量分散化、孤立化，未能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目标一致的“育人共同体”，全员育人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二）育人过程片段化，“全过程”衔接存在断点

党建育人活动容易陷入“运动式”或“节点化”的窠臼，往往围绕重大节日、纪念日或上级检查集中开展，看似轰轰烈烈，但与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认知规律、发展需求和现实困惑衔接不够紧密。例如，对大一新生的入党启蒙教育可能较为集中，但对大二、大三学生如何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在专业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的引导可能减弱；对毕业生党员的离校教育可能是一次性党课，但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跟踪和持续的精神支持往往缺位。党建育人未能完全贴合学生“入学适应—专业认同—生涯规划—社会融入”的成长链条设计出一套环环相扣、循序渐进、针对性强的培养方案，导致育人过程出现断点或盲区，影响了育人的连续性和累积效应。

（三）评价激励形式化，导向效能未能彰显

现有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考核指标多侧重于会议次数、活动场数、党员发展名额等，而对于这些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价值判断能力、社会责任感等育人“软指标”，缺乏科学、有效、可操作的评估工具和方法。同时，激励机制的缺失或错位也削弱了协同的内生动力。专业课教师参与党建育人、担任“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其党建育人工作在职称评定、绩效分配、评优评先中往往难以得到与其付出相匹配的认可；辅导员、党务干部的育人成效也缺乏显性化的激励通道。这导致部分参与主体将党建育人工作视为“额外负担”或“软任务”，投入的积极性、

创造性不足，工作容易停留在完成规定动作层面。

（四）内容供给滞后，“全方位”渗透力不足

部分党建育人的内容与形式未能紧跟时代发展和青年特点，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理论宣讲照本宣科，缺乏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度解读和生动转化；实践活动“走马观花”，未能深入触动学生心灵；话语体系转换不足，依然习惯于使用文件语言、会议语言，难以契合“网生代”大学生个性化、圈层化、视觉化的认知习惯与接受心理，导致价值传导的穿透力和亲和力不足。此外，在“全方位育人”所涵盖的网络育人、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新兴或交叉领域，党建工作的主动融入和机制化引领还不够深入。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党建育人，如何将心理疏导与思想引导相结合，如何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体现人文关怀和价值导向，都是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四、路径构建：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的优化策略

为摆脱上述困境，必须从系统治理和机制创新的角度，构建一个多维联动、环环相扣的协同机制体系。以下从五个关键维度提出优化策略。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领导机制，增强协同凝聚力

高校党委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构建党建育人协同机制作为战略性工程纳入学校整体规划。建议成立由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负责的“党建育人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及二级党组织，制定权责清单与协同路线图，通过定期联席会议解决重大问题，从顶层破解“各自为政”的难题。

（二）健全科学评价与激励机制，激发协同内驱力

改革重过程、轻结果的评价模式，构建以育人效能为核心、过程与结果并重、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多元综合评价体系。引入学生满意度调查、成长轨迹追踪、典型案例分析等质性评价方法，结合必要的量化指标。加强结果运用，将党建育人实效明确纳入二级单位考核、学科评估、教师职称评聘、干部选拔任用以及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设立“党建育人优秀成果奖”等专项激励[4]。通过制度设计，让参与育人的各方主体有获得感、成就感，激发育人主体内生动力。

（三）深化组织联动与共建机制，锻造育人共同体

推动组织形态创新，鼓励围绕重大科研项目、社会服务课题等组建师生联合党支部或党小组，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拓展校地、校企党建联建，共建实践育人基地，将党课开在基层一线。例如，上海某高校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共建，联合开发“行走的党课”，由学生党员担任志愿讲解员，在服务中深化了学生对党史的理解与认同。

（四）构建贯穿成长周期的培养机制，实现协同“全过程”

遵循学生成长规律，设计进阶式、差异化的党建育人方案。针对新生，重点开展入党启蒙和适应性教育；针对中高年级学生，结合专业学习深化理论教育，并通过科研训练、竞赛活动强化实践能力；针对毕业生，加强职业观教育和就业指导，鼓励他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5]。利用智慧党建平台，为每位学生党员建立成长电子档案，实现从广泛启蒙到重点培养，再到持续跟踪的全周期精准育人，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个性化资源推送与精准引导，确保育人不断线、有侧重。

（五）创新内容载体与融合机制，拓展协同辐射面

深耕“党建 + 课程思政”融合，发挥教师党支部特别是“双带头人”党支部作用，系统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党建资源。革新组织生活形式，运用情景模拟、案例研讨、VR 体验等沉浸式方法，培养“学生讲师团”[6]，用青年话语传播理论。加强网络阵地建设，生产高品质、易传播的网络文化产品，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五、结论与展望

在“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的构建是一项关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成效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不能依靠零敲碎打的修补，而必须从系统治理的视角出发，进行整体性、重构性的机制创新。

展望未来，本研究领域仍有广阔空间有待探索：一是协同效能的动态评估模型需要进一步开发与验证，如何更科学地量化党建育人的长期价值贡献；二是数字技术赋能党建育人的深度模式，如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思想引导、大数据在舆情研判与精准干预中的应用；三是不同类型高校（如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高校、高职院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的差异化构建路径研究。唯有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并在实践中不断调试优化，方能真正建立起一套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师生需求同频、与育人规律同向的高校党建育人协同机制，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石。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刘云山讲话 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EB/OL].(2016-12-08)[2026-03-27].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612/t20161208_291306.html.

[2] 肖建国，李永贤. 研究生“三全”育人模式及其实践路径优化研究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06):42-47.

[3] 侯伟达. 高校“三全育人”背景下党建育人的定位与实践 [J]. 内蒙古电大学刊，2023(03):79-82.

[4] 孙思芳. 以教工支部党建引领“三全育人”长效机制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3,22(06):285-286.

[5] 刘杰，吴倩倩，王东红.“三全育人” （下转 04 页）

“七个有力”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实践研究

秦文征　孙佳怡

摘要：本文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新时代高校党支部建设“七个有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形式深入了解高校研究生党支部在管理机制、党员教育培养、作用发挥等方面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情况，征求意见建议，征集典型案例和好经验好做法。并结合工作实际，以“七个有力”为抓手，对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提出一些可行性思考和建议，进行凝练总结，旨在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卓越研究生教育，奋力培育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七个有力”；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

新时代对高校党建工作、铸魂育人工作提出新要求。研究生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快车道”，研究生规模持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7 月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1]。“七个有力”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实践研究是优化研究生党建的内在需要，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

一、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现状分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在学研究生总数为 430.0 万人，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部分高校研究生党员比例超过 40%。作为顶尖科研人才，他们正逐步成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对于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变迁，研究生综合素质高、思想多元等特点日趋显现，这对研究生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通过查阅资料及对辽宁省内几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发现各高校研究生党支部党建育人工作成效显著，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支部管理上，多数高校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推行党建项目化清单管理，实现党建与研究生培养、科研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部分高校结合研究生科研特点，创新支部设置，打破按年级、专业划分的局限，将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实验室上，发挥组织优势，凝聚科研合力，引导党员在攻关中互帮互助，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推动党建融入科研日常。

在党员教育培养方面，各高校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构建“集中学习 + 特色载体 + 实践感悟”的学习体系，推动理论学习与学术、实践深度融合。通过组织红色研学、先进典型宣讲等活动，让党员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搭建联学共建平台，与兄弟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交流，拓宽党员视野。同时，各高校重视党员骨干培育，选拔政治素质高、科研能力强的研究生担任党支部书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上接 03 页）

视域下学生党建推动学生管理工作路径探析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8(08):108-111.

[6] 黎振生 , 陈国涛 .“三全育人”视角下的学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 [J]. 大学 ,2025(09):185-18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州南方学院 2025 年校级党建研究课题重点课题“高校基层党组织思政引领力建设研究”（2025XDJ02）。

（作者系广州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带动研究生向党组织靠拢。

在作用发挥上，研究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凸显。在科研领域，很多支部组建党员攻关小组，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痛点刻苦钻研，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推动成果转化；在社会服务领域，党员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志愿服务、科普宣讲等活动，结合专业提供“造血式”智力支持，打破“输血式”服务局限。此外，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研究生党员冲锋在前、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彰显新时代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充分体现了党建育人的显著成效。

二、“七个有力”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2] 为落实“七个有力”重点任务，探索切实可行的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实践路径，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卓越研究生教育，奋力培育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新人，为高校党建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建议，力争起到一定范围内的交流推广作用。

（一）以政治教育为基础，锤炼党性，培根铸魂，实现教育党员有力

党支部在工作中要严格遵循“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采取“集中领学、自主研读、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而深入地推进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与贯彻。作为研究生党支部，要主动契合所在学科发展需求，优化组织架构设计，为党建工作与学科建设的深度融合打通关键堵点、搭建核心桥梁。常态化开展 VR 研学、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学习等活动，推动理论学习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践行”转变，以坚定的政治信念扛起国防科研的时代重任。面对研究生科研任务繁重、学习时间零散的现实困境，可以创新探索新的学习方法。例如手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漂流瓶”特色活动，活动以“个人手抄悟初心、小组研讨凝共识、全员分享促提升”的模式开展，通过逐字逐句的手抄和心得批注，党员们摆脱了以往“走马观花”式的学习模式，对《条例》的核心要义、具体要求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解。活动后，支部党员在科研工作中更加注重学术诚信，在生活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党性修养得到显著提升。

（二）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精准分责，与时俱进，实现管理党员有力

高校要根据高等教育和高校发展需要，做好制度的内涵发展和建设 [3]，不断健全完善党员管理体系，精准界定关键工作的流程节点与责任分工，构建起“任务清单化、流程规范化、责任明晰化”的支部建设长效机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自查—整改—复盘—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定期对党员发展、组织生活、党费收缴等重点工作开展“全面体检”，及时发现问题、精准整改提升，推动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稳步攀升。在党员发展工作中，要严守“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黄金准则，严把“入口关”“培养关”“考察关”，确保每一名新党员都经得起考验。在日常管理中，可以强化党建引领的数字化赋能，构建起涵盖组织生活参与、科研成果产出、志愿服务贡献等多维度的党员考核量化评价体系，以科学考核激发党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看得见、摸得着、可检验，让党支部建设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三）以义务履行为职责，遵规守纪，以身作则，实现监督党员有力

党支部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引导党员提高政治站位、遵守职业道德、践行学术规范、严守纪律底线，将日常考评和年度考核相结合 [4]。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要求，推进党支部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监督研究生党员严格履行党员义务，以身作则。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兵器科学与技术硕博研究生党支部针对部分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时存在迟到、早退或忘记请假等问题，摒弃“简单说教、硬性批评”的传统模式，创新开展“守时践诺”特色活动，采用“才艺展示”的柔性激励方式，引导相关党员通过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才艺表演表达改进决心。这一充满温度的创新举措，既为党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巧妙破解了党员参会积极性不足的难题，让纪律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深植人心，有效强化了党员的责任意识，赢得支部党员的广泛赞誉与积极响应。此外，党支部定期组织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党员发现自身不足、明确改进方向。通过组织警示教育大会、观看警示教育片、拍摄廉洁系列短视频等方式，引导党员心存戒惧、坚守底线，让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成为党支部发展的坚实保障。

（四）以协同育人为目标，多级联动，争先创优，实现组织师生有力

为构建更为完善的协同育人体系，应将多级联动机制构建与争先创优机制落地作为核心抓手，切实提升师生组织工作的实施效能。通过深化与兄弟院校研究生党支部的共建合作，联合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学术研讨等多元化实践载体建设，逐步培育兼具示范效应与辐射影响力的党建育人特色品牌。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强化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号召力，更能为研究生党员搭建起专业竞赛历练、科研创新探索、社会服务实践的多维成长平台，进而构建起覆盖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全方位育人格局。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党支部要始终牢记“学术科研服务国家”的初心使命，如果党支部由导师、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可以构建“教师党员领航、博士

党员攻坚、硕士党员赋能”的传帮带机制，充分发挥教师党员的学术引领优势、博士党员的科研攻坚能力和硕士党员的青春活力，组建“党员科研攻坚突击队”，锚定学科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潜心钻研、协同作战，形成“党建引领科研、科研锤炼党性”的良性循环，让党员在学习钻研、科研创新、学术交流、团队建设等方面争当先锋、做好表率，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师生投身科研事业，让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在科研攻坚中不断升华，用青春热血践行“铸剑报国”的庄严承诺。

（五）以榜样引领为指引，激励先进，树立典型，做到宣传师生有力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5]。高校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精心搭建全媒体传播矩阵，以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宣传，讲好支部故事、传递党员正能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学院、学校官方网站等校内宣传阵地，及时捕捉党支部活动动态、科研成果突破、党员先进事迹等鲜活素材，全方位展现党支部的精神风貌与建设成效；主动对接主流媒体，有效扩大影响力与辐射力，不仅能够生动展现党员胸怀家国、潜心科研、勇于担当的时代风采，更能够凝聚起广大师生的理想信念，激励大家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国防事业发展，让“铸剑报国”的精神旗帜高高飘扬。

（六）以思想引领为抓手，激发活力，强筋健骨，做到凝聚师生有力

在校园内部，党支部应主动承担起课程思政建设“引路者”的角色，为学校构建课程思政的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提供专业咨询，协助各院系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并主动参与相关领域的课题研究与课程设计工作。在校外，党支部应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充分汇聚社会资源，致力于构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组织党员担任“红色故事宣讲员”，以此拓宽实践育人渠道，充分发挥其实践教育功能。党支部要始终坚持以师生为中心，精准对接师生需求，搭建多元化交流服务平台，通过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丰富载体，不断增强师生的集体归属感与向心力，让党组织的温暖直抵人心。

（七）以平台建设为途径，阵地创新，互帮互助，做到服务师生有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数字资源的广泛应用，移动端平台正逐渐成为开展思想教育、价值塑造、舆论导向、文化弘扬与人才培养等活动的重要阵地。将“互联网+”理念融入基层党建实践[6]，为新时代党建育人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传播速度、平台构建、信息容量和操作便捷性等方面的特点，支持并引导研究生党支部结合专业特长，开发具有特色且便于使用的在线学习资源与活动、云端参访等轻应用，借助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全方位还原重要历史场景。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双向云平台，既可以实现学习资源的即时共享，也能拓宽师生间的交流渠道与对话空间，推动育人工作从“线下面对面”延伸至“线上屏对屏”，从“表层交互”深化至“内心共鸣”，从而引领青年学子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将报效国家的崇高志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融入思想与行动之中。

三、结语

新时代赋予高校党建育人新的使命与担当，“七个有力”作为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核心遵循，为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根本遵循。“七个有力”各维度既相互独立、各有侧重，又有机融合、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研究生党建育人的完整闭环——教育党员有力筑牢思想根基，管理党员有力规范运行机制，监督党员有力守住纪律底线，组织师生有力凝聚育人合力，宣传师生有力树立先锋标杆，凝聚师生有力厚植育人氛围，服务师生有力彰显初心使命，最终实现党建工作与研究生培养的同频共振、互促共赢，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输送更多栋梁之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高校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李克强作出批示 [N]. 中国青年报 ,2020-07-30(01).

[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3] 姜玉原 . 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建设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9(19):23-25.

[4] 文道群 . 坚持“七个有力”推进样板党支部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J]. 科学咨询 ,2025(19):22.

[5] 举旗帜、立标杆、树榜样、引方向、育新人，全力推进研究生党建工作质量提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负责人就第二批研究生党建“双创”工作开展情况答记者问 [J]. 中国研究生 ,2021(11):10-13.

[6] 张英 , 郭靖茹 , 王兵 , 等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J]. 陕西教育 (高教),2025(10):70-7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七个有力’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建育人模式创新实践研究”（2025GXDJ-YB018）。

（作者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管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张　娟

摘要：公立医院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关键阵地，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载体。坚持党建引领是新时代公立医院落实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坚守公益属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立足公立医院治理现代化视角，阐释党建引领医院管理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剖析当前部分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合不深、引领效能不足等现实问题，从强化政治引领、夯实组织根基、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健全党建考核评价机制、厚植廉洁文化生态五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研究旨在为公立医院完善内部治理、提升管理效能、坚守公益底色、优化医疗服务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助力公立医院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医院管理；医建融合；高质量发展

党建工作是公立医院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破解管理瓶颈、凝聚发展合力、校准发展方向等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统领性作用。新时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公立医院面临治理升级、服务提质、学科增效、作风创优的多重任务。当前，部分公立医院仍存在党建工作虚化、党建与业务浅表化、引领赋能作用弱化等问题，制约了医院治理效能提升与长远发展。基于此，深入探究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管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对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强化公益属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管理的重要价值

（一）保证医院坚守公益属性

公立医院是党领导下的重要公益性事业单位，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公立医院区别于其他医疗机构的主要特征之一。通过落实好党建引领工作，可以将党部署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全面系统地融入医院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能够引导医院坚决杜绝逐利倾向，始终聚焦“治病救人、守护健康”这一核心职责，同时贯彻落实分级诊疗以及公益服务等一系列政策要求，从而保证医院能够一直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切实守好公益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提供可靠的医疗服务[1]。

（二）提升医院治理能力

从内部治理角度看，党建引领可以促进公立医院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这对医院治理能力的提升大有助益。例如，党建引领可以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以及“促改革”“保落实”等一系列核心作用，并且理顺党委与公立医院行政、临床以及医技等各个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能够破解公立医院以往存在的治理流程不顺畅或者是决策执行不到位等各类难题，构建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以及监管有力的高效治理格局，能够进一步增强医院管理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三）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党建引领可以推动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借助党建引领能够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以及服务意识，持续提升医德修养，这样可以引导广大医务人员更好地坚守职业操守，切实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精简就医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以及幸福感，这对公立医院实现长远健康发展大有助益[2]。

二、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管理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政治建设

政治建设是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医院治理不偏航、发展不走样的根本支撑。需通过常态化理论武装、规范化决策机制、刚性化责任落实，将党的领导贯穿医院管理全过程。

1. 推动理论武装常态化。公立医院应该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等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三会一课”以及广大职工政治学习的重点内容，并同步打造出常态化的学习机制，借助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或者是线上学习等形式，促使理论学习真正做到入脑入心，从而引导全院职工更加深刻地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做到“两个维护”，使思想和行动能够统一到医院高质量长远发展部署工作中。此外，应创新学习形式，引入“微党课 + 业务研讨”相结合的模式，促使政治学习能够和临床实践、管理工作等深度融合，防止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脱节。

2. 健全党委科学决策机制。应该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直接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医院章程的核心内容，确定党委在医院各项重大决策制定中的核心地位，并且编制党委前置研究清单，将医院的学科建设、资源配置、人事任免以及绩效考核等各类事项纳入前置研究范围，同时严格落实集体决策制度，完善党委会议以及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打造书记、院长定期沟通机制，形成“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相结合的闭环管理体系，从而保证各项决策科学民主、执行高效有力以及监督到位有效，进而提高医院管理实效。

3. 压实层级政治责任。要确定好党委主体责任、医院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以及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切实将政治建设要求全面系统地融入各部门、各科室的相关管理职责体系，签订党建工作责任书，构建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以及“各部门协同推进”“全体职工共同参与”的高质量工作格局。此外，还应该定期组织实施政治建设专项督查工作，针对落实政治责任不力或者偏离公益方向的行为应该及时督促整改，以此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在医院真正落地生根 [3]。

（二）夯实组织基础

基层党组织是党建引领医院管理的前沿阵地和重要纽带，是连接党建工作与临床业务的关键纽带。需通过优化组织设置、建强骨干队伍、规范组织生活，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与引领力。

1. 优化基层组织全覆盖布局。应该遵循“支部建在科室上”这一基本原则，做到医院临床、医技、行政以及后勤等一系列科室党支部全覆盖，结合科室规模、业务特点科学设定党小组，以此保证党的组织以及工作能够全面覆盖无死角。此外，应该引导党支部职能从以往的单一政治核心逐渐向“政治引领”“方向把关”“人才服务”以及“学科促进”相结合的核心转变，要确定好党支部在科室管理活动中的具体职责，保证党支部可以有效参与科室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实现党建工作与科室管理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2. 建强双带头骨干队伍。开展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作，重点选拔那些政治素质高以及业务能力强的相应科室负责人或者业务骨干担任党支部书记，构建党建、业务“双精通”的高质量基层带头人队伍。此外应该完善“双培养”机制，努力将医疗业务骨干培养成优秀党员，同时将党员培养成专业能力较强的业务骨干，从而充分发挥党员在临床诊疗、管理服务以及应急处置等一系列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3. 规范常态化组织生活。公立医院应落实好“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以及民主评议党员等一系列组织生活制度，同时还应合理创新组织生活形式，聚焦医院工作实际情况，开展“党建 + 公益服务”“党建 + 技能竞赛”“党建 + 隐患排查”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以提升组织生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还应建立组织生活考核评价机制，对组织生活开展不规范或流于形式的党支部应该及时督促整改，以保证公立医院基层党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党建水平和引领能力 [4]。

（三）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管理的关键点，通过党建引领管理、以管理促进党建，进一步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公立医院发展效能。

1. 党建赋能学科建设提质。公立医院应组建党员科研攻坚小组，围绕临床难点和科研重点问题进行集中攻关，推动临床问题向科研课题转化，提升医院自身科研创新能力。此外，应完善党委班子成员联系学科建设制度，坚持定期前往一线督导学科建设和党支部工作，合理配置资源构建优势专科集群，引导中西医协同发展，进一步强化医教研协同，打造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平台，从而推动学科建设持续提质升级。

2. 党建引领医疗服务优化。公立医院应围绕人民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健全党员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制度，推动党员在挂号收费、诊疗服务、康复护理等环节发挥示范作用，结合工作实际优化就医流程，减少患者等待时间。此外，还应该以党建引领公立医院数字化转型，实现诊疗流程数字化、电子病历及相关档案资料数字化互通、医疗服务智慧化等，以此持续增强医疗服务的高效性。还应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持续扩大服务范围，定期开展健康科普、公益义诊、对口帮扶等活动，引导健康服务从院内延伸至家庭和社会。

3. 党建助力管理模式创新。创新建立“党建查房”制度，可以由党委委员负责带队实施联合查房，围绕业务融合、管理难点和群众诉求等问题，做到现场解难题、促落实，坚持事后跟踪问效，构建管理闭环。引入数字党建模式，尝试开发“党建 AI 助手”，实现

组织生活智能提醒以及党员管理数字化目标，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党建与管理工作之间的协同效率[5]。

（四）健全党建考核评价机制

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是推动党建工作落地见效、实现医建同频共振的重要保障。需构建量化可测、权责清晰、奖惩分明的综合考核体系，以考核倒逼落实、以评价赋能提升。

1. 完善多维考核指标体系。公立医院应建立“党建 + 管理”考核机制，将党建工作指标与医院管理、医疗质量、服务满意度、学科建设等关键指标整合，合理设置考核权重，避免党建考核与医院管理考核脱节。还应细化考核指标，明确具体考核标准，将党支部建设、党员表现、融合成效等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制定具体可量化的考核细则，以提升考核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应建立“党建效能转化率”评估模型，将患者满意度、科研产出等纳入考核，以提升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2. 强化考核结果刚性运用。应将党建考核结果与医院各个科室评优评先、职工绩效分配、干部选拔任用等挂钩，对党建工作成效突出、管理效果明显的科室和个人及时表彰奖励；反之，对党建工作落实不力、医院管理存在短板的科室和个人，应及时约谈督促整改，以倒逼党建工作与医院管理深度融合。还应加强考核结果反馈，针对考核期间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有关科室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考核发挥应有效用[6]。

（五）厚植廉洁文化

廉洁行医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清廉文化建设是党建引领医院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以党建引领党风廉政建设，全方位筑牢医务人员廉洁自律防线，营造清正廉洁、崇德向善的行医氛围。

1. 推进廉洁教育常态化。医院应该将廉洁教育设定为党员干部以及医务人员教育培训工作的核心内容，定期组织实施党纪法规、医德医风以及廉洁行医等一系列专题培训，借助播放警示教育片、廉政谈话或者旁听庭审案例等多种形式，加大警示教育力度，从而引导医务人员坚守底线，能够自觉抵制医药购销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规避各类违规违纪行为。

2. 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公立医院应该打造“党委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以及“职工日常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同步确定好具体的监督责任，并且细化制定监督措施，强化监督实效。此外，针对医药购销、设备采购以及人事任免等一系列重点领域或者关键环节应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并同步打造重点领域监督台账，委派专人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做到销号处理。完善与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包括举报电话、网上留言模块以及举报邮箱等，从而广泛接受患者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针对举报线索应该及时开展核查处理，构建完善的监督闭环。

3. 培育特色清廉医院文化。医院党委及政工人员还应该将廉洁文化有效地与医院文化、医者精神等进行有机结合，构建出“清廉医院”品牌，营造出“清正党风、清朗院风”的优质氛围。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及党员开展廉洁文化主题活动，包括廉洁演讲、廉洁征文以及廉洁家风建设等，从而引导全体医务人员积极主动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更好地坚守廉洁行医底线。另外，还应该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主动地在各领域带头践行廉洁行医要求，以此带动全院职工自觉践行廉洁自律以及爱岗敬业的良好行风[7]。

三、结语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公立医院完善治理体系、坚守公益属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与核心动力。公立医院需始终坚持党建统领全局，以政治引领校准发展方向，以组织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医建融合激活发展动能，以考核机制压实发展责任，以清廉文化涵养发展生态，全方位破解党建与业务脱节、管理效能不足、服务质量不均等发展难题。未来，公立医院需持续深化党建工作创新，动态优化党建引领管理的实践路径，持续推动党建优势系统性转化为治理效能、服务效能与发展效能，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与水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实施提供坚实的医疗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新，周鹏，侯军，等. 循证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基于党建引领的公立医院医务社会工作模式构建与研究实践[J]. 办公室业务，2025(20):163-165.

[2] 王爱珍. 党建引领下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探讨[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21(16):187-190.

[3] 孙福宁，肖丽娜，陈秋兰. 党建引领下医院6S环境管理改善项目的实践与探索[J]. 现代医院，2025,25(12):1850-1853,1857.

[4] 黄子俊，吕雅杰，罗雪琼，等. 党建引领大部制改革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J]. 现代医院，2024,24(01):3-6.

[5] 姚敏，孙燕楠，耿丽丽，等.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背景下医院运营管理的研究[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4,15(04):81-84.

[6] 王倩，左妍.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下的医院督查体系的构建[J]. 继续医学教育，2024,38(03):180-184.

[7] 韦苗. 科室管理小组在医院管理中的实践与体会[J]. 中国医学人文，2024,10(12):22-25.

（作者系长沙市第三医院政工师）

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孙菁阳　白冬梅

摘要：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两条重要途径，二者在目标、内容、形式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为了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效果，文章以党建引领为研究视角，系统阐述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深入分析党建工作在推动二者融合中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重点探讨了以党建为引领建立统合联动机制、打造协调衔接机制、完善制度保障机制的具体路径，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党建引领；大学生社会实践；思政教育；融合发展；育人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国情、服务社会、增长才干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存在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二者未能形成有效协同。党建工作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政治引领和根本保证，具有统合资源、协调力量、凝聚人心的独特优势。探索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对于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提升立德树人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内涵要义

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是指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基于二者在育人目标、教育内容、实施方式上的内在统一性，通过系统规划和协同推进，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会实践全过程，同时以社会实践为载体深化思政理论教育，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从育人目标看，二者均指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思政教育重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社会实践则重在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增长才干，在服务人民中锤炼品格、彰显价值。二者的目标指向高度一致，都是要引导学生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最终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1]。

从教育内容看，二者构成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政教育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社会实践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武器，使学生能够运用科学理论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实践则为思政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现实素材和生动的体验场域，使抽象的理论原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实践，使书本上的道理变成学生内心认同的信念。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到的改革发展成就、基层创新实践、先进人物事迹，都是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思想困惑，又成为深化理论学习的动力源泉。

从实施方式看，二者均强调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要求“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思政教育既注重系统的理论灌输，也注重在实践中的思想引领；社会实践既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也强调思想认识的提升。二者都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反对流于形式的花架子，都主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在育人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二、党建引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新时代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思政教育作为育人体系的两大关键内容，一直以来在机制执行上存在一定割裂情况，如何使二者协同融合，实现协同育人的效果，成为高校育人体系中的重点研究课题。在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阶段，党建引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党建工作全面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办学使命必须具备的要求，也是提升育人效果的操作方式。

（一）党建引领是促进两者融合的根本保障

大学生实践教学与思政课程实现融合，最根本的难题是路径规划问题，社会实践要求学生走出校园大门融入社会生活，如果没有科学的价值导向，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就缺乏准确的判断力。虽然思政教育肩负着理论武装的使命，但如果与现实脱离开来，很容易变成形式主义[2]。而党的建设工作刚好可以在二者之间搭建连接桥梁，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度体系，为思政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社会实践明确了抓住社会动向的基本立场和实现方法。依靠党建发挥驱动作用，可以把党的思想优势转变为有利于育人的优势。党支部开展社会实践时，也引导学生借助党的创新理论熟悉国情和解答疑惑，凭借亲身体会加强对课堂理论的认识。这种以党建为发力点的理念指引，可以让社会实践方向正、思政教育效果得到保证，两者结合可以始终与政治方向保持一致。

（二）党建引领是整合育人力量的关键抓手

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由团委与学工部门组织实施，而思政教育的核心领域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把控，两套系统分别做独立的规划安排，合作空间较窄，导致教育实践资源分散难以整合。例如：有些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对内涵的挖掘不够到位；个别思政实践教学团队的人力配置情况比较薄弱，难以覆盖全体在校学生。而党建工作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机构和高效的动员机制，可以有效改变这种困境。高校党委要对全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整体管理，采用对党建资源进行统筹的方式，促使团委、学工、教务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板块形成一股劲[3]。例如：由党委引领规划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主题和内容，将思政课教学内容整合到实践当中；还可以让党支部直接主导实践团队的搭建，让党员教师出任带队的导师，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基于党建引领来开展联动模式，就能避免各单位分散使劲，促进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

三、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策略

（一）以党建为引领建立统合联动机制

党建引领下的融合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统合联动机制，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部门分割、资源分散的问题。高校党委应切实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将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纳入学校党建工作总体布局和事业发展总体规划。一是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的协调机构。成立由学校党委书记或分管副书记任组长，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二级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重大问题，统筹调配师资、经费、场地等育人资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归属于党委宣传部或者团委，承担日常协调事务并推进工作的开展[4]。二是完善校院两级的联动机制，就学校层面而言，拟定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年度实施规划，明确融合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从学院这一维度，发挥二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影响力，按照学科专业的特色以及学生的思想实际，制定详细的实施办法，助力融合举措落地实施并见成效。三是创建由党组织把控的协同育人网络，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构建思政课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团支部和班委会协同合作的工作机制，把思政教育要求融入社会实践项目从设计、组织实施到总结评比的整个流程，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中创建临时党支部或者党小组，由党员骨干担任负责人，在实践前沿阵地开展理论学习、思想交流与党性锻炼，做到“支部建在团队上，党建融入实践中”。

（二）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协调衔接机制

党建引领的融合式发展，核心是打破各育人环节之间的壁垒，实现实践内容与思政主题、实践载体与教育资源、实践过程与育人目标的有效契合。一是助力实践主题与思政内容有效衔接，各级党组织需紧密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关键时间节点与重大政治活动，统一规划实践活动主题。围绕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学生开展“追寻红色足迹”“口述党史”等主题实践活动；依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科技兴农”等实践活动；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见证新时代”“基层治理调研”等实践项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组织牵头，组织思政课老师对社会实践主题进行政治审核与理论提炼，让实践主题彰显鲜明的价值导向，使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党的理论的认识与认可[5]。二是推动实践载体与教育资源有效衔接，利用党组织整合资源的长处，将校内及校外的实践育人资源统筹安排。在学校内部空间，带动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创新创业教育基地、专业实习实训基

地的资源共同分享，搭建“一站式”学生社区实践载体，把思政教育元素融入宿舍文化、社团活动、志愿服务中。在学校之外，依靠党建工作联建共建机制，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共同建设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及党性教育基地，组织二级学院党组织与地方基层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形成长期稳固的实践合作格局；依靠校友资源和企业党建资源，建立产教相融合的实践基地，为学生搭建起专业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平台。三是促进指导力量与育人需求有机衔接。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党建导师”“实践导师”“思政导师”三位一体的指导队伍。由思政课党员教师担任理论导师，负责实践项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导；由专业课程党员教师担任专业导师，负责实践过程中的专业技能指导；由辅导员和党务工作者担任组织导师，负责实践团队的日常管理和思想引领。建立党员教师联系社会实践团队制度，要求党员教师在实践出发前开展行前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参与重要活动，实践结束后指导总结提炼，形成全程育人闭环。

（三）以党建为引领完善制度保障机制

党建引领下的融合发展，需要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确保融合发展行稳致远、取得实效。一是完善组织保障制度。将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考核二级党组织书记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党组织书记抓融合发展述职评议制度，每年开展专项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干部任用挂钩[6]。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中，将组织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作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的重要体现，设立党员社会实践先锋岗，激励党员在社会实践一线亮身份、作表率。二是完善经费保障制度。在年度党建经费预算中单列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专项经费，保障实践活动组织、指导教师补贴、学生交通食宿等必要支出。积极拓宽经费渠道，通过党费支持、校友捐赠、校企合作等方式筹措资金，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经费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有条件的高校可设立党建育人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社会实践项目。三是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构建以育人为导向的融合发展评价体系，将社会实践中的思想政治表现，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团员评议、入党考察的重要参考依据。制定社会实践成果思政价值认定标准，对具有较高思想理论水平的实践报告、调研论文，可认定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成果并给予相应学分。建立指导教师工作量认定和绩效激励制度，将教师指导社会实践纳入岗位考核和职称评聘指标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党员教师予以表彰奖励。

四、结语

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的重要途径。通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统合联动、协调衔接、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融合机制，能够有效破解实践与思政“两张皮”的难题，形成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实践、实践强思政的良性循环。高校应当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深化对融合发展规律的认识，持续完善党建引领下的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锤炼高尚品格，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赵敏丽 .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效能的特点及提升对策 [J]. 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24(06):77-83.

[2] 陈俊 .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探究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5,41(06):94-102.

[3] 冯涛 .“大思政课”视域下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育人工作的破困路径 [J].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5(11):73-75.

[4] 柯金凤 .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路径探索 [J]. 求贤 ,2025(09):42-43.

[5] 陈甜 . 思政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对大学生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J]. 就业与保障 ,2025(07):160-162.

[6] 刘洋 .“大思政课”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模式探究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5(07):13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大连财经学院党建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研究”（2025dlcjsz02）；2023 年大连财经学院资助项目“大连财经学院数字化语言文化与服务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KY040202305）；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5 年度青年课题“数智赋能与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文化创意共同体建构路径与实践研究”（CANQN250733）。

（作者：孙菁阳，大连财经学院文法学院；白冬梅，大连财经学院会计学院）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路径探索与经验总结

叶子楠

摘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其培育与发展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政治保障。本文立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时代要求，系统剖析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梳理党建在政治方向把控、组织资源整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引领作用路径，提炼党建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共性经验，针对当前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协同不足、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以党建赋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党的建设；科技创新；实践路径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突破，正在推动生产力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新质生产力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而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科技事业各领域各环节。

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溯源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核心要义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目标，推动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核心内涵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高质量、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生产力。

从理论溯源来看，新质生产力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2]，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新质生产力并非脱离既有生产力理论框架而独立形成，而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集中体现为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升级与结构性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由传统体力型、技能型主体逐步向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转变；劳动资料从传统机械装备迭代升级为智能化设备、数字化平台等新型技术载体；劳动对象则在原有物质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数据、新能源等新兴要素，并借助技术创新大幅提升了传统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与配置水平。此外，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内在呼应。

二、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理论依据

党建引领是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行稳致远的核心支撑与根本遵循，其内在逻辑根植于党的领导优势、党建与科技创新的价值契合，以及党组织的组织效能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根本政治方向与制度保障，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在凝聚力量、服务国家发展的目标上高度统一，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则为二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提供了坚实载体，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框架。

（一）党的领导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我国科技事业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攻克“两弹一星”技术难关，筑牢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党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发展；新时代，党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3]。这种领导优势体现在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攻克重大科技难题，避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分散性。

（二）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具有内在统一性

党建与科技创新在价值目标与实践导向层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协同性。一方面，党建工作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明确的价值引领与方向指引，确保科技创新始

终沿着符合国家与人民需求的方向稳步推进。党建工作能够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服务国家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为党建工作提供全新的思路、高效的管理和精准的服务，是推动新时代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这种协同发力的良性互动，既是党建工作引领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创新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现实需要，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和科技支撑。

（三）组织优势是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支撑

科技创新特别是尖端技术的攻关，往往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需要党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打破行政壁垒和部门界限。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是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支撑，党组织通过科学统筹与系统协调，有效统筹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凝聚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同时，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了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决策部署能够层层落实到基层。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实践路径

将党的领导优势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党建与科技创新的同频共振、双驱并进。为了构建方向正确、治理优化的实践路径，党建引领科技创新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创新、人才培育、技术创新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科技创新全过程各方面。

（一）政治引领路径：把准政治方向，锚定科技目标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政治引领的根本前提。政治引领能确保科技创新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锚定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党组织要深化理论武装，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研讨等常态化学习机制，引导科技工作者深刻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自觉将科研攻关与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紧密结合。此外，还需强化价值引领，弘扬创新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守爱国奉献、求真务实的科研初心[4]。

（二）组织创新路径：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协同创新主体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随着科技创新的复杂性、系统性不断提升，创新活动可能涉及不同的创新主体，党组织依托组织优势，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激发人才的创新意识和担当精神，深度协同创新主体，联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构建多元协同的创新工作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人才培育路径：筑牢创新人才根基，激发内生动力

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其队伍建设水平将直接决定科技创新成效，党组织通过构建“四位一体”的人才工作体系，筑牢创新人才根基，激发创新内生动力，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智力支撑[5]。人才培育要把好人才引进关、人才培养关、考核评价关和涵养创新氛围。在选人上重点引进能够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努力培养一支能挑大梁、当主角的科技创新队伍，完善创新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考核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和产业贡献，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发内生动力，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矩阵。

（四）技术创新路径：强化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成果转化

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抓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推动核心技术突破与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6]。由党组织牵头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是当前技术创新工作的核心任务。实践中，可通过集中优势力量开展靶向性技术攻关，在聚焦核心技术突破的同时，积极探索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新业态与新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在技术攻关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破解技术瓶颈，推动相关产业实现转型升级，进而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四、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经验总结

坚持党建引领是我国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宝贵实践经验。长期以来，我们党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科技创新全过程、各方面，总结经验，既是对党的科技工作历史实践的系统梳理，更是推动新时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为今后进一步以党建赋能科技创新提供重要遵循与行动指引。

（一）锚定政治方向、夯实组织根基

坚持政治引领是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根本方向，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才能确保科技创新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与人民需求，避免偏离正确方向。必须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科技创新各环节，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科技创新的政治属性与价值导向，确保科技创新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人民根本利益。强化组织建设，是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支撑，而严密的组织体系，正是党组织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基础。通过多样

化的组织形式，推动党的组织与工作在各类创新领域实现全覆盖，能够有效打破资源分散的壁垒，整合各类创新要素与资源，进而凝聚起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二）聚焦人才培育、深化融合实践

聚焦人才队伍建设，则是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抓手。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其重要性无需多言，培育一支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创新人才队伍，不仅是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撑，也是党建引领作用在人才领域的具体体现[7]。通过强化党建引领下的人才引育、激励与保障机制，将思想政治建设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坚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与创造潜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持久智力支撑。此外，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更是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有效实践路径。唯有打破党建与科技创新“两张皮”的困境，让党建优势真正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才能实现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互促共进，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保障。

五、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优化策略

（一）深化党建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破解“两张皮”问题

破解党建与科技创新“两张皮”问题，关键在于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构建一体化发展格局，让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发展。将党建工作纳入科技创新总体规划，明确党组织在科技创新中的职责定位，避免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脱节，让党组织全程参与科技创新决策，及时了解创新需求、解决创新难题，让党建活动服务于创新需求，实现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的无缝衔接。

（二）优化人才培育与激励体系，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优化人才培育与激励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激励与服务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与主动性，打造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彻底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传统评价模式[8]，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切实解决人才在创新创业、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六、结论与展望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也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破解科技创新难题的重要路径。党建通过政治引领、组织整合、人才支撑、制度保障四大作用路径，为科技创新提供精准方向指引、坚实组织保障、强大智力支撑与良好环境支撑，二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凝聚创新动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提供坚实支撑与强劲动力。同时，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实际，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发展特点，探索差异化的路径与模式，避免“一刀切”，确保党建引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此外，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守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人民需求的初心，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融合路径、破解突出问题，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科技革命的持续演进，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面临更多新机遇、新挑战，也需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化研究、探索创新。从实践层面来看，未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需更加注重精准化、协同化、数字化、长效化。综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党建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不断强化党建引领效能、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必将为我国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科技根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5:25.

[2] 魏立娟，施乐 . 深刻领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与甘肃实践 [N]. 城市经济导报 ,2025-12-26(09).

[3] 彭训文，田雨轩 .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12-16(10).

[4] 李春成 . 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的内涵特征、建设框架及路径 [J]. 创新科技 ,2023,23(09):1-12.

[5] 温慧玲，何文浩，孙玮琳，等 . 党建领航聚合力，人才强基筑安全——党建引领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报告 [C]// 展望“十五五”，谋划新发展——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选编 . 惠州：南方电网广东惠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 ,2025:118-126.

[6] 杜俊华，刘方舟 . 发轫·内核·旨归：大历史观视域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维探赜 [J/OL].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1[2026-03-19].https://link.cnki.net/urlid/51.1641.C.20260318.1629.004.

[7]白太辉.新质生产力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OL].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2026-03-19].https://doi.org/10.16229/j.cnki.issn1000-5102.20260317.001.

[8] 徐政 .“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特征、战略优势与攻坚方向 [J/OL].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2026-03-19].https://link.cnki.net/urlid/51.1719.C.20260317.1049.002.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党建引领视域下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研究

——以花都炭步镇与新会三江镇的实践为例

黄　雪　周满如　陈龚熇

摘要：随着产业变革发展，高校人才培养面临新挑战。学生资助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对提升人才质量、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须集聚新质人才，但城乡差异导致部分农村学生面临资源匮乏与发展受限等问题。本文从党建引领视角，以花都区炭步镇与新会区三江镇为例，基于“驱动—赋能—演进”逻辑，探索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路径。构建发展型资助体系，推进产教融合，完善“扶志＋扶智”协同，实现人才质量、就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三维优化”，以形成人才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良性循环，为区域均衡与产业升级提供参考范例。

关键词：发展型资助育人；人才提升；党建引领；新质生产力

一、引言

在全球科技信息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的席卷之下，市场人才需求特征日益清晰，且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出紧密关联的态势。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枢纽，其资助育人机制在促进人才全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建引领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教育公平。”[1]

本研究选取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花都、江门新会为样本，探讨党建引领下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路径，为落实发展型资助育人，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人才体系提供参考。

二、我国发展型资助育人现状分析

（一）资助育人体系的结构性优化需求

当前我国已形成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维度较为完善的资助育人体系，但仍存在育人功能缺位问题，经济帮扶占比达 78.6%，而综合素质发展支持不足 15%[2]。区域发展差异导致资助政策执行呈梯度落差，2023 年我国东部重点高校生均资助强度较西部同类院校高出 32.4%，政策精准度偏差率 ±18.7%[3]。资助育人准确性和对学生的思想价值引领均有待提升，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矛盾也从单一的学生受教育需求与家庭经济拮据矛盾，转变为多元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资助治理水平未及时跟进之间的矛盾[4]。亟须构建“经济保障—能力发展—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

（二）广东区域发展不均衡，高素质人才缺口扩大

随着产业升级，新质人才缺口问题日益凸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新质产业人才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 24.3%[5]。部分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结构性矛盾，专业设置调整周期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周期[6]，贫困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7]。面对产业转型、人口基数、劳动力外流等多重压力，区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提供支撑。

（三）党建引领的数字赋能育人机制构建

党建工作在资助育人工作中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通过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资助育人的各个环节，能够有效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校资助工作需要坚持党建引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资助育人全过程。通过党建与资助育人的深度融合，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纾困解难，助力其健康成长，能够充分彰显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8]。从“大思政”的视角出发，构建党建引领的数字赋能育人机制能够为资助育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有助于确保资助政策精准实施，实现“资助—发展—反哺”良性循环。

三、深化资助育人的人才提升成效与新质生产力实证案例对比研究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建设，区域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人才供需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亟须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素质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共进。研究选取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城边村类型）与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传统农村类型）作为对照样本。针对学生、家长等不同社会身份抽取样本，共发放 3166 份问卷。

（一）经济结构差异

花都区处在广州空港枢纽的位置，目前正积极构建以临空产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2024 年上半年 GDP 达到 834.62 亿元，其中临空产业增加值在整体中占比 21.4%，技术密集型岗位的年均增幅达到 18.7%，工作岗位有所增加，但人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部分航空领域岗位空缺率超 20%[9]。

新会区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三水交汇之处，借助自身独特的区位以及水土资源优势，构建起种植、加工、文旅三产融合的生态体系。2023 年，新会区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 180 亿元，并且带动了 6.8 万人实现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的产业支撑。但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校企合作的协同程度较低，实训基地的覆盖率仅为 39.7%，产教融合课程所占比例为 28.4%，此种状况难以满足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专业技术及实操人才的需求[10]。

（二）教育水平与资源分布不均

花都区炭步镇人口约为 5.4 万，其虽处于广州且教育资源较为丰富，但是贫困家庭的学子仍然面临经济与学业的双重压力。新会区三江镇约有 3.75 万人，受到技能人才供给匮乏以及居民教育投资意愿不高这双重因素的制约，高等教育入学率未能达到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三）经济困难认知与客观现实的非对称性

调研样本中，农村户籍家庭的占比高达 80.52%，其中，自评经济困难的学生占比为 33.6%，而自评经济困难的家长仅占 17.43%，众多家庭对“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理解较为模糊，其一体现出当前资助政策宣传在基层的渗透不够充分；其二也凸显出在“面子文化”影响下，家长群体因心理防御机制致使信息被遮蔽的情形。

（四）资助政策传播效能的空间分异

在调研样本中，超过 30% 的学生对于资助政策处于“不完全了解”的状态，其中炭步镇“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占比达到 33.82%，这远远高于三江镇的 9.26%，由此可见资助政策的宣传效果亟须强化，并且存在区域上的分化情况，而现有的传统宣传渠道已经很难契合新时代人们的现实需求。

（五）资助效能与生产力演进的结构性矛盾

调研数据显示，当前资助体系在功能定位与执行效能上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其一，受助学生费用支出中生存性支出占比高达 87.3%，发展性投资严重匮乏，资助工作仍停留在“兜底保障”的初级阶段，未能有效回应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素质提升的战略需求，造成保障功能与发展目标的脱节。其二，政府、高校、企业、社区等多元主体之间联动不足，尚未构建起“党建 + 产教融合”的协同生态，导致资源分散、合力缺失。其三，广州与江门在户籍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布局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现行资助政策缺乏差异化施策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加剧了资源配置与区域实际需求之间的适配性失衡。

（六）党建引领视角下的核心问题提炼

1. 代际认知壁垒：政策传播效能与数字治理需求脱节

学生对资助政策“完全不了解”的比例偏高，这种对政策认知的盲区不仅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渐下降，造成经济援助和学业支持出现双重缺位，还会使教育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益递减，最终导致“政策知晓—资源获取—发展赋能”的传导链条断裂。

2. 治理末梢失灵：多元协同机制与基层执行效能衰减

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末梢衰减”的现象，由于缺少基层党组织的深度参与，出现了政策信息不对称与资源分配效率较低的问题。炭步镇地处高等教育集中区，但也存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有 23.6% 的毕业生面临技能错配引发的失业情况。而三江镇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较薄弱的区域，容易陷入“人才洼地”与“产业空心化”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两地均面临资源整合的难题，“教育—产业”之间的资源适配性失衡。

3. 供需结构失衡：保障型资助与发展型支持系统断裂

现行资助体系以经济援助为主，对学生的发展性支持不足。调研数据显示，61.7% 的受助学生对个人未来职业发展缺乏清晰的规划路径，对困难学生的针对性职业规划指导帮扶与政校协同机制相对滞后。

四、党建引领的人才提升成效与新质生产力协同路径构建

本研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依照“驱动—赋能—演进”的逻辑框架，通过靶向培养、精准资助、产业适配等实施途径，从高校、地区、社会等多维度探究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的可行办法，为化解人才供给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构建教育与经济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一）党建引领驱动：构建“双轨协同”动力机制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构建“双轨协同”的动力机制，将各方面的资源汇聚起来，进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的目标。

1. 搭建党建联盟平台，构建区域人才数据库

建立“高校—政府—企业”三方的基层党建联盟，整合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技等资源系统的信息数据，共同搭建区域人才数据平台，实现人才供需的动态匹配与精准对接。

2. 强化党组织结对帮扶，推动教育资源共享

推动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实现区域间教育资源互通共享。通过组织跨区域师资交流、课程共建及联合培养等多种举措，缩小教育差距，以达到共建共享

的效果，同时形成“一区一策”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使区域人才的流动与配置更为合理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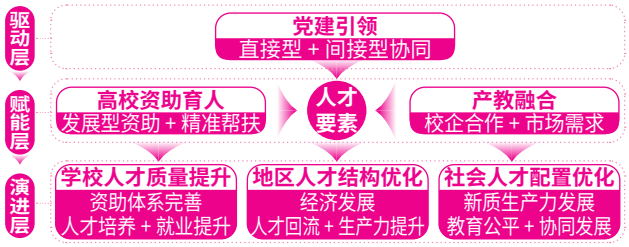


图 1 “驱动—赋能—演进”逻辑框架

3. 构建三级党建联动机制，融入人才发展考核体系

构建“党委—支部—党员”的三级党建联动架构，党委统筹总体战略规划，党支部负责人才培育任务的落地实施，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而形成上下贯通、齐心共管的工作态势。

（二）系统赋能升级：打造“双轮驱动”支持体系

将专业实训与实践相融合，打造“双轮驱动”的支撑架构，通过创新宣传方式、完善认定标准等具体举措，实现精准资助与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进而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多方面的支撑与保障。

1. 创新“党建 + 资助”宣传模式，构建全链条赋能系统

通过引入数字化平台精准推送信息，借助大数据分析了解学生的需求与关注所在，有针对性地传播资助政策及相关信息，以此提升政策知晓率并扩大覆盖范围，构建全链条赋能体系并提前谋划政策宣传，依据学生成长阶段以及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提供分年龄段的个性化帮扶，同时辅以学业指导、职业规划、心理辅导等配套服务。

2. 高校层面创新认定模型，推行复合资助模式

运用“大数据画像与基层走访”构成的双核认定模型，整合消费行为分析以及心理测评等二十项指标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以此保障资助能够精准地给予真正有需求的学生。在资助方式方面，推行“1+N”成长套餐，将传统的经济援助转变为“基础保障、数字技能强化以及创新创业孵化”相结合的复合模式。

3. 产教融合层面建立协同机制，打造生产性实训基地

大力推进共享型产教园区的构建，扎实构建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协同共建。在产教融合的深度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

（三）价值演进跃迁：构建“三维优化”发展格局

根据产业链的真实需求优化专业设置，积极推动“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学历提升 + 技能认证”双轨运行的发展模式，落实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有关配套，借助“扶志 + 扶智”的协同资助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就业竞争力及综合素质。

1. 产业链驱动的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由企业技术骨干与党员教师共同构建导师团队，促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动态契合。企业导师凭借自身的实践经验及行业前沿知识开展实践操作，党员教师依靠自身拥有的理论素养与教学能力作为理论支撑，二者共同制定学生培养方案，构建课程资源，联合进行指导，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 双轨融通的职业发展支撑体系

构建学历提升与技能认证双轨模式，使其与党建引领下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相互配合，让学生创业项目直接契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提供场地、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促进地方产业与人才培养的双向成长。

3. 发展型资助赋能人才成长生态

将经济资助与能力建设相整合，构建“扶志 + 扶智”协同资助机制，注重加强学生的志向培育以及感恩意识，推动资助工作从“扶困”向“扶智”和“扶志”方向拓展转变，构建“基础保障—发展赋能—价值引领”的分层资助模式，借助大数据分析来动态适配资助方案，为学生建立个性化发展档案，进而形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

五、结语

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定位，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农村地区江门新会三江镇以及城边村广州花都炭步镇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党建引领下人才发展水平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具体实践路径。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驱动力，构建起“双轨协同”驱动机制、“双轮驱动”赋能体系及“三维优化”演进格局。从精神赋能与能力建构两个关键维度切入，从高校、地区、社会等多个层面综合考量，为破解农村地区人才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资助育人路径探索不仅关乎教育公平，更是助力国家资助政策有效落实，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人才提升的重要实践。“党建引领—教育赋能—产业协同”生态系统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切实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339.

[2] 奚增军 . 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路径现状——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知识窗 ,2025(01):28-30.

[3]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3年)[EB/OL].(2024-09-12)[2026-03-23].https://www.xszz.edu.cn/n85/n171/c11841/content.html.

[4] 张永 .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11):154-159.

[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2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6] 林夕宝 , 余景波 , 宋燕 . 高职院校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探究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45
（下转 19 页）

党建引领下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的思政维度与实践方略

肖　彤

摘要：本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探讨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政建设，从思政核心维度、内在逻辑、实践方略三方面展开。研究厘清政治引领、文化浸润、价值统合三大思政核心维度，阐释其与治理效能、内涵、目标之间的协同关系，并构建以融合机制、文化载体、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实践路径。结合抗疫科研、药材保护、文化传播等案例，分析思政建设在提升治理执行力、厚植文化自信、整合科研伦理与社会价值中的作用，为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党建引领；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思政维度；实践方略

中医药科研院所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其治理现代化水平影响着中医药事业的长远发展和核心竞争力。党建是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思政建设能够凝聚科研人员力量、明确发展方向、激发内在动力。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将思政建设融入中医药科研院所的管理、科研和文化建设各个环节，既是落实党建工作要求的必要举措，也是解决治理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探讨党建引领下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的思政建设问题，旨在明确核心维度、阐释内在逻辑、提出实践方略，以期帮助中医药科研院所提升治理效能和发展质量。

一、党建引领下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的思政核心维度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握科研治理方向

政治引领是思政建设的首要维度，中医药科研院所承担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使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院所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科研规划、项目攻关、学科建设等关键工作中，让科研工作紧密贴合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和公共卫生的实际需求。部分院所设立了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在抗疫方剂研发、道地药材保护等重点任务中发挥带头作用[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由国家级中医药科研院所组建党员科研突击队，快速攻关形成诊疗处方，并组织党员专家深入一线提供指导，充分体现了政治引领的聚力作用。院所通过常态化的政治理论学习，强化科研人员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为中医药科研治理现代化筑牢政治根基。

（二）以文化浸润厚植科研精神根基

文化浸润是滋养科研精神的重要维度，中医药文化为思政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中医药在千年传承中形成了以医德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与院所的思政建设高度契合。院所应深入挖掘古籍中的医德思想和历代医家的治学精神，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培育科研人员的文化自信和职业操

（上接 18 页）

(09):15-23.

[7] 徐超超，冯凯强．共同富裕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调查研究——以浙江台州为例 [J]. 活力, 2024, 42(01):190-192.

[8] 王永刚，洪惠敏．高校党建融入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的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19):131-133.

[9] 广州市统计局．广州统计年鉴 202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5.

[10] 江门市统计局．江门统计年鉴 202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党建研究课题“党建引领视域下人才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研究”;2025 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工智能视域下志愿服务实践提升高职学生就业能力路径研究”(2025WQNCX169);2026 年度校级党建研究课题“智慧党建引领下提升高职公共管理类学生就业软实力的路径研究”(2026DJKT05)。

（作者单位：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守。某省级中医药研究院定期举办文化主题讲座，打造文化展示长廊，还组织科研人员参与古籍整理和阐释工作，让科研人员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对中医药精髓的理解。院所依托中医药文化开展思想引导，有助于帮助科研人员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增强对中医药事业的认同感，为中医药科研治理现代化注入精神动力。

（三）通过价值统合规范科研伦理导向

文化浸润为科研人员筑牢了精神根基，价值统合则能规范科研行为、明确责任边界，是思政建设的关键维度。中医药科研直接关系到民生领域，科研诚信和伦理规范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思政建设的核心作用就是引导科研人员坚守学术底线、践行医者初心。多家院所建立了科研诚信档案，把伦理审查、数据核查纳入思政考核范围；还有院所制定了科研伦理行为规范，通过专业培训和案例警示，强化科研人员的伦理意识。院所将服务人民健康的价值追求融入科研工作的全过程，统一科研创新、学术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导向，让治理工作始终聚焦民生福祉，为中医药科研治理现代化校准伦理坐标。

二、思政维度赋能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引领与治理效能协同提升

政治引领是思政建设的首要部分，它和治理效能是同向发力的关系，也是思政治理实现现代化的核心支撑。党的政治方向能为治理工作定下规矩、指明方向，思政建设则通过强化大家的政治认同，凝聚科研人员的思想共识，减少治理过程中的内耗，让各项治理决策能高效落地，从而提升整体治理效能[2]。某国家级中医药科研机构，凭借党建引领整合了跨学科研究团队，打破了学科和部门之间的隔阂，顺利完成了多项国家级中医药创新专项，这正体现了政治引领能提升治理效能。中医药科研院所的治理涉及资源调配、项目推进、团队协作等复杂事务，统一的政治认知能让科研人员在面对发展选择、利益分配等问题时形成合力，避免因思想不一致导致治理效率低。政治引领还能保证院所的治理决策始终围绕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展开，让治理的每一步都贴合行业发展方向，实现政治导向和治理效能一起提升。

（二）文化浸润与治理内涵深度融合

政治引领能提高治理的执行效率，而文化浸润能丰富治理的内涵层次，二者是深度共生的关系，让治理工作既有制度约束，又有文化温度。中医药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能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养分，思政建设依托文化传承，将人文关怀、责任担当这些理念融入治理细节中。中医药文化讲究大医精诚、厚德载物，这种文化特质和中医药科研院所的治理需求很契合，将文化浸润融入治理过程，制度管理就不再是单纯的硬约束，而是成为科研人员自愿遵守的准则。某中医药科研院所利用馆藏古籍资源打造文化长廊，将文化传承和团队管理结合起来，营造出了和谐互助的科研氛围。该院在人才培养时，推行文化和能力并重的模式，把中医药文化素养纳入人才考核指标，还组织青年科研人员参与文化宣讲、科普创作等活动，在文化实践中增强团队凝聚力。中医药文化倡导的协作精神、钻研精神渗透到科研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合作等各个环节，能推动形成和谐互助的科研氛围，文化传承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会让科研人员更认同院所的治理理念，让治理现代化不只是完善制度，更是厚植文化氛围。

（三）价值统合与治理目标同频共振

文化浸润能丰富治理内涵，而价值统合能锚定治理方向，它和治理目标是协同赋能的关系，也是思政维度保障治理方向的关键。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让科研创新、人才发展、服务民生三者结合起来，思政建设通过整合大家的多元价值诉求，引导治理工作聚焦核心目标，避免偏离发展主线。中医药科研人员的价值追求包括学术成就、个人发展、社会贡献等多个方面，思政建设把这些想法整合到发展中医药事业、守护人民健康的共同价值之下，让科研创新不再只是追求个人成果，而是和社会责任绑在一起。多地的中医药科研院所都把惠民科普、基层义诊纳入科研人员的考核内容，实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某省级中医药科研院所建立了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结合的评价体系，把科研人员参与社区健康服务、乡村中医药振兴等工作纳入考核，引导科研人员主动服务民生[3]。这种价值统合能让院所的治理目标更清晰，在人才培养、科研布局等治理工作中，始终守住学术诚信、伦理规范的底线，推动治理工作兼顾创新活力和责任担当，实现治理目标和价值追求同频共振。

三、党建引领下中医药科研院所治理现代化的思政实践方略

（一）构建党建与科研融合机制夯实思政根基

1. 优化组织架构实现党建科研同频共振

要推动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夯实思政引领作用，需从优化组织架构、强化协同推进两方面入手，让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同步推进。院所党组织要深度参与科研管理的关键环节，在科研项目立项、学科建设规划、科研人才选拔等工作中做好政治把关，同时将思想政治表现纳入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部分院所将党支部建立在科研课题组，让党建工作直接对接科研一线，确保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覆盖所有科研团队，实现党建与科研工作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

2. 健全协同机制打通党建科研融合堵点

院所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党建与科研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科研人员的思想动态，研究解决科研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细化为具体的管理规则。同时组建党员科研攻关小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题；建立

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对重大科研项目的党建工作进行全程跟踪，及时化解党建与科研融合过程中的问题，保障二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

（二）创新文化传播载体激活思政实践活力

1. 打造线下文化阵地深化思政教育

院所依托自身资源建设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系统陈列历代古籍文献、珍稀药材标本、特色诊疗器具和重大科研成果，打造集展示、体验、教育于一体的线下文化阵地[4]。院所定期举办中医药文化节、经典研读会、名医讲堂等主题活动，邀请行业资深专家和老学者分享治学经验与行医感悟，让科研人员在参与中感受中医药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院所将文化阵地建设与日常思政教育相结合，把中医药文化精髓转化为思政教育素材，让科研人员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职业认同，自觉将文化传承融入科研工作全过程。

2. 构建线上传播矩阵拓宽思政路径

院所借助新媒体平台打造线上文化传播矩阵，围绕中医药文化内涵、科研进展、医德故事等内容，制作科普短视频、文化微课、图文解读等多样化内容，持续传播中医药文化与思政理念。院所依托官网、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开展云端讲座、线上知识竞赛、文化打卡等活动，打破时空限制，扩大文化传播覆盖面。线上传播贴近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价值导向，让思政教育更具吸引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文化传播格局。

3. 开展公益实践实现文化与思政融合

院所组织科研人员常态化参与社区义诊、校园科普、乡村中医药振兴服务等公益实践活动，推动文化传播与思政教育深度结合。科研人员通过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直观感受中医药的民生价值，深化对中医药文化精髓的理解，强化责任担当与服务意识。院所鼓励科研人员参与中医药文化宣讲、科普创作、非遗传承等社会实践，让科研人员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提升，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思政育人有机统一，让思政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增强思政建设的实际效果。

（三）健全思政保障体系提升治理支撑能力

1. 打造复合型思政工作专业队伍

院所应优先选拔政治立场坚定、熟悉中医药行业规律、兼具科研背景与思政工作经验的人员充实思政队伍，定期开展中医药政策解读、思政工作方法创新、科研伦理规范等专题培训，提升队伍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院所推行党建导师与科研导师双导师培育模式，由资深党员干部和科研骨干结对指导青年人才，帮助青年骨干同步提升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同时建立思政工作队伍定期研讨交流机制，促进经验共享和能力互补，打造懂党建、懂科研、懂文化的复合型思政工作团队。

2. 强化资源投入与制度保障支撑

院所设立思政工作专项经费，明确经费使用范围，重点保障中医药文化阵地打造、思政主题活动开展、队伍能力培训、实践育人项目推进等工作，确保经费专款专用、高效利用。院所把思政工作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制定思政工作实施细则、文化建设管理办法、科研伦理规范等配套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同时统筹整合科研、行政、党群等院内资源，搭建跨部门协同工作平台，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思政育人提供坚实的物质和制度支撑[5]。

3.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激发思政活力

院所建立科学全面的思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将思政学习参与情况、中医药文化实践贡献、科研诚信与伦理表现、服务民生成效等纳入全员绩效考核，细化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院所将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项目申报、人才选拔直接挂钩，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效力，同时完善正向激励机制，设立思政工作先进集体、优秀思政工作者、中医药文化传承先锋等专项表彰奖项，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营造全员重视、全员参与思政工作的良好氛围，持续激发思政育人的内生动力和工作活力。

四、结语

党建引领下的思政建设，是中医药科研院所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其核心维度划定了思政工作的内涵边界，内在逻辑厘清了思政与治理的联动关系，实践方略则为落地执行提供了清晰路径。中医药科研院所应始终坚守党建引领的根本方向，立足中医药行业传承创新的特色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持续深化思政建设，推动思政工作深度融入科研管理、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治理全流程，通过凝聚科研共识、规范科研行为、厚植文化根基，不断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核心竞争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的思想与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林伊利，陈天杭．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党支部“党建促学风带科研”创新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J]. 中医药管理杂志，2025,33(19):229-230.

[2] 黄志峰，李南，任雪怡．党建引领＋新质生产力助力制剂中心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J]. 现代医学，2025,53(S1):1-5.

[3] 李玉婷，别江玉，张炜杰．探索高职教育中党建引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与路径优化 [N]. 新乡日报，2025-12-09(04).

[4] 王连生．“党建＋科研”双螺旋育人模式的价值内涵、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J]. 经济师，2025(12):186-187.

[5] 深耕教育科研 赋能教学创新——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核心价值展示·党建篇 [J]. 青海教育，2025(Z3):2.

（作者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高级政工师）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潘　莉

摘要：作为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主力军，公立医院不仅承担着医疗救治、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更肩负着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政治责任，因此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党建引领。本文介绍了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依托医院党建与国家医疗中心建设深度融合，医院党委强化“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职能，通过抓好举旗定向、守正创新、组织强基、党业同频、正风肃纪、文化聚力六个方面的系统建设，引领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导向，不断完善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实现跨越发展的实践路径，为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双融双促、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实施路径

公立医院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民生福祉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19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4 部门联合印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正式启动。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面向“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是推进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目前，全国已建设 125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并已初见成效。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满足医疗资源相对落后地区群众健康需求的重大决策部署 [1]。

一、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一）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党的二十大将医院增列为党的基层组织类型，并充实了基本任务内容，为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路径 [2]。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强调医院的公益属性，通过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赋能，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 [3]。

（二）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要求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守正创新为理念，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将基于人的经验管理与基于制度和标准的循证管理相结合，强化体系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进一步提升医院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公立医院注重内涵发展、能力水平发展、服务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三）推动公立医院科学发展的要求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将党建工作深度嵌入医院发展全过程，通过“目标双向嵌入、责任双向绑定、成果双向转化”，实现党建与业务同心同向。坚持政治方向引领，确保公立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公益性定位，避免发展偏离民生导向。夯实组织力量支撑，将党的领导贯穿医院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以党建为纽带，推动人才、技术、资源等要素优化配置，强化内部协同与凝聚力，最终达成“党建强则业务优、业务优则发展好”的良性循环 [4]。

二、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某医院党委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契机，以

“服务患者、服务职工，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为核心，依托党委—党支部—先进队伍工作体系为支撑，通过抓好六个方面的系统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有效破解“两张皮”难题，形成特色实践路径。

（一）举旗定向，校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航船舵”

1. 统筹医院战略发展。医院在相关章程中明确了“以患者为中心，办人民满意、党和政府放心医院”的办院理念。2007 年确定肿瘤专科医院发展方向，在肿瘤诊疗领域不断深耕，逐步培育特色专科和医疗人员梯队，成为一家省级肿瘤专科医院。但随着医疗行业竞争的加剧，医疗模式的转变，医院在医疗服务、学科建设、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硬件设施方面高水平供给不足，不能满足肿瘤患者高质量诊疗需求，发展面临瓶颈。医院党委管大局、作决策，通过积极争取，于 2022 年 5 月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项目输出医院为北京市知名三甲肿瘤专科医院，医院发展迎来新契机。

2. 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要以制度建设为依托 [5]。医院党委组织修订章程，明确党组织在医院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落实依法治院，同时按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要求和医院实际，修订党委会议事规则、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规范完善医教研及各类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以来完善新建制度近 200 项。明确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的议事路径和职能，落实重大事项事前论证，以临床科室的需求为出发点，发挥医院各专业委员会在决策中的科学论证作用，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职代会常设委员会民主管理作用，保证科学、民主决策，防范医院重大事项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化解重大决策风险，保障医院依法依规科学发展 [6]。

（二）守正创新，凝聚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引领力”

1. 强化政治引领。医院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纳入医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不断锻造干事创业的班子集体。落实党支部“三会一课”、党员教育培训核心内容，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史学习教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等主题教育开展活动，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教育，引导全院职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公立医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使命。

2. 深化思想引领。医务人员、全体职工是推动医院发展的原动力，是保证患者满意度的重要保证和前提。医院党委落实现代医院管理理念，通过实施全员定岗定编、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为职工明晰勾画出职业发展路径；深化绩效制度改革，推行向临床、医技以及急难险重岗位倾斜的分配原则，临床、医技人员绩效水平人均提高 40%，职工满意度明显提高。建立院领导接待日制度，畅通职工反馈和解决问题的渠道。通过上述措施，有效激发了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保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三）组织强基，锻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驱动力”

1.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持续加强班子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党委会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事关医院发展、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点工作，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及时进行事先研究部署。建立院长书记沟通制度，形成党政沟通交流、酝酿协商的议事形式和协作落实机制，不断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确保议定事项落实到位。

2.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构建党委、支部、党员三级一贯到底的基层党建“主轴”。优化组织设置，党支部由原来的 22 个调整至 29 个，有效推行“支部建在学科上”，将党支部与医院重点学科、临床科室对应设置，成立跨学科联合党支部、分设党小组，打破科室壁垒，强化学科协同，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以坚强堡垒“模范”党支部创建为着力点，认真落实党的组织制度，构建“党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医院发展”三维联动理论模型，将党支部所辖科室医疗、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国考指标、医德医风等纳入党支部目标量化指标同部署、同考核，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得分，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实现临床医技科室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占比 100%。推进党支部深入参与科室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着力形成党建业务齐抓共管的良性发展机制。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近三年，发展中青年骨干党员、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至 15%，为医院发展储备了力量。

（四）党业同频，锻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1. 夯实干部队伍管理机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根据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制，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派驻人员和本院骨干力量中，选拔有胜任力的优秀人才共同担任医院临床、医技、综合管理科室科级干部，促进相互学习提高。履新后，新任科级干部平均年龄较以往降低 4 岁，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干部占比提高 47%，进一步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增强了医院发展活力。

2. 建强人才和学科梯队。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医院锚定未来发展目标，一方面紧紧依托输出医院的优质人才资源，发挥好输出医院派驻的百余名医疗、医技专家，40 余名管理骨干的作用，实现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的同质化提升。另一方面，医院根据自身学科发展层级划分和现实条件，制定细化肿瘤亚专业设置，形成优势学科，发展弱势学科、制定肿瘤相关综合学科的中长期规划。落实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积极吸纳与临床薄弱学科相匹配的高端人才，促进学科人才梯队进一步完善。

3.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科学运营效能。落实“大质控”理念，完善院、科、质控小组三级网络体系，每月召开质控会议、全院环节干部月度会议，围绕医疗安全、医疗质量、医疗指标、国考指标、医保控费等重要指标和关键环节每月复盘，找出短板，针对性提升。推进多学科诊疗、日间手术“预住院”、责任制整体护理、延续护理等服务模式创新，开设日间化疗病房、安宁疗护病房，方便患者。开展国内领先的分子诊断服务，在精准医疗领域积极向前迈进。获批临床研究型病房，积极开展药物临床试验，为肿瘤患者提供前沿治疗。医院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引进肿瘤诊疗高精尖设备，规划建设质子中心，推动医院在肿瘤放疗精准定位、精确计划和精确放疗方面迈入新阶段。

（五）正风肃纪：强化监督问责，筑牢发展“防火墙”

1. 压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落实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落实各专业委员会、院长办公会、党委会科学论证、集体研究、民主决策程序，从源头上防范因决策失误或程序不规范可能引发的廉政风险。定期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警示教育会议，开展廉政谈话、风险排查，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不断筑牢广大党员干部思想防线。

2. 创新监督方式。纪委落实监督责任，聚焦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形成“1234”教育监督模式，建立健全环节干部（重点岗位）廉政档案、廉洁风险防控动态监督管理台账，运用大数据监督手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问责”的全链条监督体系。

3. 加强作风建设。成立行风（信访）办公室，修订完善《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方案及细则》等工作制度，建立完善医德医风档案，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培训，规范职业行为。注重榜样引领，设立“党员示范岗”，选树“医德榜样”“天使榜样”等先进典型，强化示范引领，弘扬医学职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廉洁行医、诚信服务，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六）文化聚力：内外协同发力，提升发展“软实力”

融合建党精神内核与医院文化，提炼出“崇诚尚善 循本求新”的院训精神，将其融入医疗中心建设各环节，增强员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创建医院党建品牌“北疆医火行”，锚定“服务北疆肿瘤患者”核心信念，各支部发挥专业特色，组建形成“蓝马甲志愿服务队”“医务社会工作部”门诊“一站式”服务等医疗志愿服务团队，形成“镜下求真·红心向党”“北疆岁月·留声机”“冬青聚力 红帆领航”等党建品牌和党建项目 15 个，开展健康义诊、患者健康延伸服务、职工心理健康咨询、科普宣传等活动近 90 次，签订医联体成员单位 39 家，累计惠及患者群众 3 万人次，形成党建与业务工作双融双促、协调发展的态势。

三、结语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 4 个方面。一是坚持政治引领是根本，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医疗中心建设全过程，明确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建设方向符合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二是深化融合机制是关键，通过制度建设、组织设置、考核评价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党建与业务目标同向、责任同担、成果同享，破解“两张皮”难题。三是聚焦人才支撑是核心，实施党管人才战略，优化人才引育用留机制，打造高素质骨干队伍，为医疗中心建设提供不竭动力。四是强化考核评估保障，建立科学的量化评估体系，将党建成效与医疗中心建设指标挂钩，以考核推动工作落实，提升党建引领效能。

参考文献

[1] 关于印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EB/OL].(2019-10-23)[2025-12-17].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6571.

[2] 袁永庆，姜洁，郭佳，等.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22,38(08):566-569.

[3] 赵锐，付强. 均衡发展视角下我国构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价值内涵和推进路径 [J]. 中国医院管理，2023,43(10):1-4.

[4] 赵锐，付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进展和典型案例分析 [J]. 中国医院管理，2023,43(10):5-8,16.

[5] 杨更亮. 以党建工作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J]. 党史博采，2022(04):42-43.

[6] 关利群，谭忠婕，纪智礼，等.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关键路径实践探索 [J]. 中国医院，2022,26(01):54-56.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突破路径研究

信　莹　李丙文　王　怀　刘　伟　刘　璐

摘要：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深化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革新进程，当前，学生党支部的组织效能已逐步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关键支撑，对于高校育人工作而言也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学生党支部作为高校党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将组织力提升理念融入日常建设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学生党支部的组织力不仅在于对党员的管理能力，而且是一种带动大家共同进步、思想交流互动、自我教育和协同育人的关键性力量。本文从增强学生党支部组织力的角度出发开展了相关探索，讨论了提高党支部活力的主要措施，提出量化评价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途径。从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本领、联动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力求形成一套有效、长效的组织力提升机制。但是目前在组织力提升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开展组织力提升工作之前，应该对这些情况进行详细剖析，坚持问题导向，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从而真正把组织力建设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关键词：学生党支部；组织力；高校党建；思政教育

随着高校党建工作的持续深化，学生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实现组织力提升成为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任务。由于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高标准要求，实现组织力提升进一步强化了高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而言，由于学生党支部在育人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搭建系统化的组织力提升机制能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同时组织力的提升，使学生党支部能更好地发挥思想引领作用，这保障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健康发展，使高校育人工作获得坚实支撑。

一、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意义及作用

（一）提升政治引领能力

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将传统组织建设经验与现代党建理念有机融合，利用创新工作方法和科学管理机制，将组织力提升理念融入学生党支部日常建设实践。从整体的角度来说，组织力提升的实现能够强化学生党支部的政治功能，还能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在新时代高校党建背景下，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已经形成系统化的工作模式，确保高校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能力能够有效实现组织力提升目标。学生党支部政治引领能力的提升需要强化理论学习，对党员的思想认知和党性修养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学生党员培养工作来说，在组织力提升过程中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实践锻炼和示范引领，同时会面临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脱节的问题。在系统化组织力提升机制支持下，将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有机结合，通过常态化学习机制进行理论深化，进而有效提升学生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提升思想教育实效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学生党支部的思想教育实效需要针对性提升，因此组织力提升成为必然选择。而在应用组织力提升机制的过程中，只需要明确工作重点，其余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由系统机制自动运行，这能够有效避免思想教育与实践脱节现象，进而有效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学生党支部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方式，其中的思想引领作用是提高学生政治素养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将组织力提升与思政教育融合，就是将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依靠科学管理机制，在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示范引领的同时，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组织力提升既是提高思政教育实效的前提，同时也是育人成效的体现。实践表明，良好的组织力，能够有效保障思政教育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三）有助于实现育人目标

目前，组织力提升已经成为高校党建工作的必然趋势，将组织力提升理念引入学生党支部的建设，能

有效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通过系统化机制支持学生党支部工作实现育人目标，保障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党建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的升华，也是学生党员培养质量的体现。在实际工作中，注重组织力提升与思政教育的融合，通过创新工作方法和优化工作机制，从而实现思想引领、价值塑造以及能力培养的目标，切实提升育人成效。

（四）能够实现组织协同

组织力提升通过机制建设、制度完善来优化学生党支部的内部运行机制，做好组织效能控制，从而有效提升组织工作的整体效率。在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背景下，学生党支部由传统的单一组织模式转变为多元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组织形态，这能够发挥组织力提升的积极作用，进而有效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在高校党建工作中明确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战略作用，转变过去重形式轻实效的观念，引导组织工作重心向实效性转变，实现思想引领、组织建设和服务育人等目标，这是增强高校党建和思政教育实效的重要途径。

二、提升学生党支部组织力的方法

（一）激发学生党支部活力的关键举措

党支部生命力指的是党支部自身的活力程度，决定了党支部对学生活动的影响力。提高党支部生命力的核心是如何把党员个体力量凝聚成组织力量，并使得该组织具有生机与活力。对于一个学生支部而言，首先要打破传统的管理形式，鼓励自由表达以及民主决议。只有让学生党员切实参与党组织工作，让他们有更多的责任担当意识，才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及机动灵活的形式学习讨论，提供全方位的平台，让每个学生党员都能看到党组织的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也能为党支部带来新鲜血液。

（二）组织力提升的路径与策略设计

增强党支部的组织力，涉及诸多结构性的设计以及路径的选择，目前学生党支部建设仅仅局限于开展活动、组织学习，这些活动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应该从整体上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认识，提高组织的整体能力。在路径方面，首先应着眼于目标的设置，将支委工作从碎片化的状态转变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增强支委成员的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深化党内外资源融合、加强规范化管理等，形成一整套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运行机制及考核指标体系，既能确保组织活动的实效性，又能实现各项工作开展的长效性。总之，我们要着力培育创新型党员干部队伍，把党支部建设成为服务型党组织。

（三）基于数据的评估与监测机制

如何就党支部组织力建设的效果进行量化和测评也是一个难题。以往的测评方法多凭感觉，少有数据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党支部组织力建设成效的把控。而大数据下的考评和监督则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通过对党支部各项活动出勤率、党支部工作完成情况、党员思想汇报等内容的数据化处理，建立一个动态反馈调节系统。这样既有利于发现不足并加以整改，又可以根据数据反馈来完善举措，提高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数据化管理助力党支部长效机制建设，使得组织力的不断提升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是以实打实的数据和成效为保障[1]。

三、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改进策略

（一）强化组织力提升的顶层设计

在组织力提升过程中，学生党支部通过系统化建设，实现了组织力的稳步提升。组织力提升需要得到高校党委的大力支持，要以高校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为基础，从学生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力提升方案。在实际工作中，学生党支部要深入学生党员的思想实际，明确组织力提升的目标定位，形成目标明确、措施具体的工作方案，在此基础上实现组织力提升的精准施策，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党支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组织力提升方案一定要根据学生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实际需求[2]。例如：某高校学生党支部对组织力提升存在认识不足在于对自身建设的规划不够充分，对组织力提升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因此，该党支部在进行组织力提升工作时，一定要制定科学的组织力提升策略，客观分析学生党员的思想状况、能力需求、实践需求，做好组织力提升与思政教育的衔接，明确组织力提升的具体需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保障组织力提升工作与学生党支部自身建设需求相匹配。在落实组织力提升工作时，一定要科学规划，同时要结合学生特点，这样才能确保提升效果，充分满足学生党员的发展需求。

（二）提升组织力建设专业能力

学生党支部组织力建设的专业能力需要提升，各环节之间协同配合，即便遇到困难，也要系统化推进。组织力提升和工作评估需要定期开展，做好过程监控及问题反馈，最大限度避免出现工作失误。如果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调整[3]。组织力提升还应该加强学习和实践，定期开展培训，及时发现工作短板，尽可能完善工作措施，也要做好预防性工作，避免工作失误，及时总结经验，也要尽快解决问题，确保提升效果。例如：学生党支部要注重组织力提升，不仅注重理论学习，还应该注重实践锻炼，同时做好工作评估，如果发现组织力提升效果不佳或学生党员参与度低，则

及时调整策略，各环节应该协同一致进行改进。组织力提升能力决定着学生党支部的工作水平，保障组织力提升效果是组织力提升工作的核心。目前，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正处于系统化建设阶段，组织力提升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党支部要抓好组织力提升的落实工作，切实增强组织效能，提高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

（三）在协同育人中推进组织力提升

在协同育人理念影响下，组织力提升工作的实施路径日益清晰，有助于构建系统化的育人体系，有效利用学生党支部的组织优势。组织力提升的实践进一步彰显了思政教育的价值，学生党支部借助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示范引领，能有效推动思政教育工作创新，保证思政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更好地开展学生党员的培养工作[4]。例如：学生党支部的组织力提升工作需要科学规划、系统调研和科学分析。对于学生党员来说，在组织力提升过程中实现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的结合，可提升思想引领效果。在系统化支持下，将组织力提升理念融入学生党员培养全过程，通过创新工作机制进行组织力提升，理论联系实际，最终实现组织力提升的长效性、协同性和实效性。

（四）提高组织力提升的系统性

无论是在高校党建还是其他育人领域，组织力提升始终是关键所在，高校应该加强引导，为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提供支持，并对组织力提升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评估。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持续推动，才能取得实效。学生党支部要强化系统思维，通过科学规划推动组织力提升的可持续发展，做好组织力提升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二者互相支持，通过组织力提升对思政教育工作进行优化，保障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5]。例如：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一定要立足实际，在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示范引领等环节加大投入、科学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党支部也要做好组织力提升的评估工作，加快工作步伐，进一步提升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

（五）建立组织力提升的长效机制

对于高校学生党支部而言，应该建立组织力提升的长效机制，在系统化建设之后，再去落实组织力提升的具体工作，保障组织力提升工作的规范性，更好地开展学生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工作，保障学生党员培养的系统性，这不仅需要科学规划，也需要持续改进。学生党支部要保障组织力提升工作的科学性，加强与高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的沟通和联系，进而加快组织力提升工作步伐。例如：在系统化建设下，学生党支部制定组织力提升计划，通过调研分析、方案制定、实施评估等步骤，形成组织力提升的闭环管理，基于科学规划，达到组织力提升的预期成效。同时，组织力提升工作也需要持续改进，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学生党支部的组织效能[6]。

四、结语

学生党支部想要实现组织力提升，需要高校党委的大力支持。组织力提升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随着高校党建工作的持续深化，学生党支部一定要做好组织力提升的系统规划，逐渐提升组织力的科学化水平，尽可能避免工作中的问题，助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学生党支部应通过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制度完善等方式，为组织力提升提供支持。学生党支部组织力的提升，能有效强化学生党支部的政治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力的育人价值，保障高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进而提升高校党建和思政教育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1] 汤珍珍 . 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 ,2025(01):145-148.

[2] 张洋 . 高校学生“样板支部”创建路径研究——基于组织力提升视角 [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13(07):14-21.

[3] 马志红 . 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实践探索 [J]. 广东教育(职教),2024(08):46-48.

[4] 熊伟 . 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路径 [J]. 新丝路 ,2025(16):174-176.

[5] 白凤麟 , 高芳芳 , 李云玲 . 活动理论视域下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探究 [J]. 长治学院学报 ,2024,41(03):104-110.

[6] 胡艾娜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育人工作探析——以吉利学院商学院为例 [J]. 新丝路(上旬),2023(02):196-19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2025GXDJ-YB030）。

（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的实践路径探究

杜　旭

摘要：新时代下，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是事业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彰显公益属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以事业单位党建思政工作为核心，界定了党建思政工作、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及企业文化与党建思政契合性的核心概念，剖析了二者融合的核心价值与现实困境，从理念、机制、载体、队伍、考核五方面探索党建思政引领双融双促的实践路径，并构建组织、文化、技术、资源全方位的实践保障体系，旨在破解党建思政与业务“两张皮”难题，为事业单位以党建思政赋能业务协同提质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事业单位；党建思政；双融双促；业务发展；实践路径

党建工作是事业单位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思政教育是凝聚职工力量、校准履职方向的重要抓手，业务工作则是事业单位践行公益使命、服务社会发展的核心依托[1]。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纵深推进、事业单位深化改革提质的新时代背景下，党建思政与业务“两张皮”仍是制约单位发展的突出问题[2]，重业务轻党建、思政工作与业务实践脱节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党建的政治与组织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业务发展动力。尽管各地各单位已积极探索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模式，但尚未形成系统化、可复制的实践体系[3]。基于此，本文以党建思政为引领，探究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通过构建科学的融合与保障体系，推动二者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助力事业单位更好地履行公益职能，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中展现新担当。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事业单位党建思政工作

以党组织建设为依托，将思政教育融入履职全流程[4]，紧扣公益属性，以党的创新理论融合党建要求与思政教育，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职工思想、规范履职的关键抓手。核心任务为政治引领与思想铸魂，推动政策落地、强化思想认同、开展思想引导，以党建思政筑牢作风与廉政防线。新时代呈现政治性与公益性融合、系统性与实践性结合、创新性与时代性凸显、常态化与长效化深化四大特征。

（二）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

打破党建思政与业务壁垒，推动二者在部署、实践、考核各环节渗透协同，把党建思政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动力，以业务成效检验党建思政质量，实现党建思政引领、业务反哺的良性循环。融合体现为理念上融入业务顶层设计，建立“四同”工作机制，实践上嵌入业务各场景并以多元形式落地。核心目标是破解“两张皮”，以党建思政把准业务方向、提升质效，以业务丰富党建思政载体、避免形式化，实现二者协同提质。

（三）企业文化与党建思政的契合性

企业文化是单位凝聚内部力量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5]，党建思政工作塑造职工价值认知与职业操守，二者在价值引领、精神凝聚上高度统一。党建思政为企业文化定方向、立遵循，企业文化将党建思政要求具象化；党建思政强化职工担当，企业文化增强职工归属感，二者同向凝聚合力。企业文化丰富党建思政形式，党建思政为企业文化注入政治灵魂，契合事业单位公益属性与党的领导要求。

二、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的价值逻辑与发展方向

（一）双融双促的核心价值

党建思政与业务的双融双促蕴含着多元且重要的核心价值：通过党建思政工作的思想引领与政治铸魂作用，能够为事业单位的业务发展标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让各项业务开展始终紧扣国家发展战略、严格遵

循政策要求；以党建思政为核心引领单位文化培育建设，营造积极向上、实干担当的内部文化氛围，有效凝聚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持续强化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与战斗力；依托思政教育的引导作用还能帮助单位培养科学的决策思维，推动业务决策过程既契合政策规范又贴合单位发展实际，大幅提升业务决策的合规性、科学性与实操可行性；把思政教育全面融入干部队伍建设各环节，才能在强化职工政治素养的同时提升其专业业务能力，打造出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为业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根基；借助党建思政工作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开展，不断强化合规教育与廉政思想引导，帮助职工养成底线思维和规矩意识，从而为事业单位各项业务的平稳开展构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

（二）融合发展优化方向

新时代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与业务深度融合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整体呈现规范有序、稳步提升的良好发展格局。为进一步推动融合工作提质增效、向纵深发展，更好实现党建思政引领与业务发展同频共振，可在多个关键维度持续优化升级：不断强化全员融合理念与思想认同，筑牢党建思政赋能业务发展的思想根基；健全常态化、系统化协同制度机制，保障党建思政与业务在谋划、推进、落实各环节高效贯通；创新贴合业务实际的实践载体，推动思政工作与项目攻坚、公益服务、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精准衔接，提升政策传导效率与落地成效；加快培育党建思政与业务兼备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高质量融合提供强劲人才支撑；完善科学量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结果运用与正向激励，持续激发事业单位双融双促的内生动力。

三、党建思政引领双融双促的实践路径

（一）筑牢融合思想根基

通过理念重塑，夯实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的思想根基[6]。首先，要强化全员政治引领意识，将“两个维护”深度融入业务开展全流程，确保事业单位各项履职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其次，要树立党建思政与单位文化深度融合的理念，以党建思政引领单位文化建设，培育全体职工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凝聚思想发展共识；最后，还需强化全员参与的融合发展理念，彻底破除“思政工作是党务部门专属责任”的认知误区，推动各部门、各岗位主动参与到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工作中，形成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融合发展氛围。

（二）搭建融合制度框架

通过系统化的机制构建，搭建起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的制度框架。建立并落实党建思政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的“四同”工作机制，推动二者在工作推进各环节实现深度协同；健全分层责任机制，清晰划定党委的主体责任、书记的第一责任人责任以及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将融合发展责任层层压实、落实到人；完善流程嵌入机制，把党建思政的各项要求细化拆解，转化为业务流程、岗位职责、操作规范中的硬性约束，让思政要求融入业务实操各环节；建立健全资源保障机制，设立党建思政工作专项投入资金，制定科学的资源配置制度，为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

（三）丰富融合实践形式

聚焦载体创新，不断丰富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的实践形式。在文化传播载体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的党建思政宣贯体系，组建专业思政宣讲团，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层级职工开发差异化的培训课程与文化产品，同时运用新媒体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学习平台，打造云端党课、文化沙龙、情景宣讲等多元学习形式，还可建设专属文化阵地，融入 VR/AR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提升思政教育的传播效果。在业务融合载体方面，推动党建思政与履职工作深度绑定，打造“思政 + 项目攻坚”模式，组建党员先锋队、设立融合实践基地，以思政引领破解项目难题；打造“思政 + 公益服务”模式，将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融入公益服务全流程，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与效能；打造“思政 + 风险防控”模式，常态化开展合规教育与警示教育，强化职工底线思维与风险防范意识。在品牌创建载体方面，着力打造“党建思政 + 业务”融合特色品牌，结合单位业务特点培育特色子品牌，形成主次分明、各有侧重的融合品牌体系，同时深入挖掘融合发展中的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身边榜样”宣讲活动，以典型示范引领带动融合工作走深走实。

（四）夯实融合人才支撑

通过专业化的队伍建设，夯实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的人才支撑。加强对党务思政工作者的专业化培养，定期开展融合发展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其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的创新实践能力；建立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双向交流机制，推动两类干部跨岗位、跨部门轮岗锻炼，在实践中培育兼具党建思政能力与业务专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注重思政工作队伍的梯队建设，搭建老中青结合的工作队伍，充分发挥老员工的经验优势与年轻员工的创新优势，强化思政工作的传承与创新；全方位提升思政工作者的综合能力，通过系统培训与实践锻炼，不断强化其政治素养、业务认知能力与文化建设能力，让思政工作者能够更好地适应融合发展的工作需求。

（五）强化融合导向引领

通过完善考核激励体系，强化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的导向引领作用。科学构建融合成效考核体系，兼

顾量化与质性指标，将思政工作成效、业务发展质效、二者融合深度等内容全面纳入考核范围，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考核评价标准；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将融合成效考核结果与职工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绩效分配等直接挂钩，树立鲜明的融合发展考核导向；建立融合成效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诊断，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有针对性地优化融合工作策略；注重正向激励引导，对融合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创新案例、先进个人与优秀集体予以及时表彰，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发全员参与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双融双促的实践保障体系

（一）组织保障

组织保障是推动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的根本前提，需持续强化党委对融合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发展工作纳入党委年度重点工作部署和议事日程，统筹规划整体发展方向、制定推进举措。进一步细化明确各职能部门在融合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工作边界和任务要求，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打破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壁垒，推动形成党委牵头抓总、党务部门统筹协调、业务部门主抓落实、全体干部职工主动参与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确保融合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和具体举措落地落细、执行到位。

（二）文化保障

文化保障是推动双融双促工作走深走实的精神支撑，需以单位文化建设为重要抓手，重点培育和打造以“党建引领、思政铸魂、实干争先”为核心内涵的特色单位文化，将党建思政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单位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渗透到干部职工的日常工作和行为准则中。通过常态化的文化浸润、理念传导和氛围营造，让融合理念真正深入人心，逐步凝聚起全体干部职工对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发展的高度价值共识，推动党建引领业务、思政赋能履职成为干部职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积极向上、务实奋进的单位文化为双融双促工作注入持久且强劲的精神动力。

（三）技术保障

技术保障是适配新时代发展要求、提升融合工作效率的重要支撑，需紧跟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集学习、实践、考核、管理于一体的智慧思政综合工作平台。该平台全面整合各类党建思政学习资源、融合实践典型案例、业务推进数据信息、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等内容，实现党建思政学习的线上化、便捷化，融合实践推进的可视化、动态化，以及成效考核评价的智能化、系统化，通过技术创新打破时空限制、优化工作流程、提升管理效能，以数字化赋能推动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工作提质增效。

（四）资源保障

资源保障是确保双融双促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基本前提，需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大对党建思政及融合发展工作的专项投入力度，科学统筹、合理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在人力保障上，配齐配强专职党务思政工作力量，注重选拔培养兼具党建思政能力和业务专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为融合工作提供专业人才支撑；在物力与财力保障上，持续完善党建思政学习阵地、融合实践基地、文化宣传阵地等硬件设施建设，配齐配足各类学习、实践、宣传所需的物资设备，保障专项工作经费的足额拨付和规范使用，为党建思政教育活动开展、党建思政与业务融合实践推进提供充足且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费支撑。

五、结语

本文围绕事业单位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展开研究，明确核心概念，厘清融合价值与现实困境，从五个维度提出实践路径，构建四位一体保障体系，形成全链条融合模式。党建思政与业务双融双促是系统性长期工作，核心是将党建思政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动力，关键是打破壁垒实现全方位融合。事业单位推进工作需坚持党建思政引领、立足公益，贴合业务实际创新载体，推动部门协同凝聚合力。本研究为双融双促提供系统化思路，各单位需结合实际细化路径。未来可开展行业差异化研究，剖析典型案例，完善融合考核评价体系，以党建思政赋能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助力其履行公益使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中共靖远县委组织部 . 甘肃省靖远县：党建业务深融合互促共进谋发展 [N]. 中国城市报 ,2026-01-19(B15).

[2] 傅华 . 全面提高所属事业单位党建质量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J]. 机关党建研究 ,2025(12):16-18.

[3] 张严 . 探究卫生事业单位的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 [J]. 社会与公益 ,2025(24):16-18.

[4] 孙悦 . 推动事业单位党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N]. 企业家日报 ,2025-11-23(03).

[5] 魏晓雪 . 关于推进煤田地质勘探事业单位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的思考 [J]. 办公室业务 ,2025(15):134-136.

[6] 易芳琴 .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J]. 四川劳动保障 ,2024(11):94-95.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质院）

基于党建融合的多元回访模式在出院患者回访中的应用

刘晓燕　林秀梅 *　苏中英　何碧姣　彭子婉

摘要：目的：探讨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在出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为党建引领护理服务创新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 2022 年 1 月—2023 年 6 月接受传统电话回访的 600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接受党建融合多元回访的 6000 例患者作为研究组。新模式通过党委统筹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研发智能化回访管理系统，并由党员骨干对回访护士进行专科培训与指导。比较两组回访满意度、复诊率及门诊预约率。结果：研究组回访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复诊率与门诊预约率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能有效提升出院患者满意度、复诊率与门诊预约率，是党建与护理业务深度融合的有益实践，可为公立医院服务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关键词：党建融合；出院患者回访；多元回访模式；满意度；复诊率

患者出院回访是延续性医疗护理服务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与就医体验。目前，我国已将出院患者回访纳入医院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要求回访率须达到 80% 以上 [1]。但目前由病区护士兼职开展的传统电话回访模式，普遍存在回访不系统、内容同质化、记录不规范、缺乏多学科协作等问题，制约了回访质量的持续提升 [2]。为此，本研究探索构建“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以提升回访工作的系统化与专业化水平。该模式通过党组织统筹整合资源，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并依托信息化平台优化流程，建立了涵盖跨部门协作、信息系统支撑与专科培训的出院患者管理体系 [3]，旨在提升回访效率与服务内涵，为医疗服务质量改进及党建与业务融合提供实践参考。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22 年 1 月—2023 年 6 月采用传统电话回访的 6000 例出院患者为对照组，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采取党建融合下多元回访模式回访的 6000 例出院患者为研究组，纳入标准：①回访对象年龄 18~65 周岁，有正常的认知能力，性别不限；②入选对象或家属自愿配合回访；③入选对象或家属在回访时完成满意度问卷调查。排除标准：①认知功能障碍；②严重躯体障碍或原发疾病不稳定；③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全程配合回访的对象。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对照组 (n=6000)	研究组 (n=6000)	统计量值	P 值
年龄（岁）	47.25 ± 17.50	47.50 ± 17.30	t=0.487	0.626
性别				
男	2860(47.67%)	2820(47.00%)	χ^2=0.535	0.465
女	3140(52.33%)	3180(53.00%)		
出院科室分布				
内科	2712(45.20%)	2670(44.50%)	χ^2=3.215	0.359
外科	2213(36.88%)	2190(36.50%)		
妇产科	733(12.22%)	780(13.00%)		
其他科	342(5.70%)	360(6.00%)		

（二）方法

1. 对照组：传统回访模式

随访护士在患者出院后的 1 周至 2 周内，会对患者进行常规电话回访。回访内容大体上包含询问患者康复状况、用药情况，给予简单健康指导，并口头记录患者反馈。回访过程与结果的记录分散，没有统一的信息化管理，也缺乏深度分析。

2. 研究组：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

患者在常规护理组的基础上，接受了由本科室各专科护士组成的多维度小组，以结构化、多维度的方

式实施的护理干预。

3. 构建组织架构与多学科协作平台

成立“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专项管理小组”，该小组由护理部党支部具体负责，成员包括护理部、信息科、医务科、门诊部以及临床科室的党员骨干。该小组主要承担以下核心职责：（1）进行顶层设计并作出决策，负责构建模式规划并制定相关制度（如《多元回访工作规范》），协调资源、予以政策支持，保证党建工作目标与回访业务目标朝着同一方向聚合。（2）多学科协作机制运行，构建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护理部负责管理及与患者沟通。信息科承担着技术开发与数据对接的工作。医务科给予临床诊疗路径与复诊标准方面的指导。门诊部需协同相关部门对预约流程予以优化。经由众多学科的共同协作，一起解决回访时遇到的复杂临床问题、系统流程方面的障碍以及服务衔接障碍，构建起管理闭环。

4. 开发并应用智能化回访管理信息系统

专项小组主导，协同信息科研发“出院患者回访管理系统”这一平台，其核心功能与整合路径如下：（1）系统对接与数据自动化提取，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HIS）以及电子病历系统（EHR）进行安全接口对接，自动、定时抓取出院患者基本信息、主要诊断、治疗方案、出院带药、主管医生等信息，生成初始回访名单，保证信息准确、及时，减少人工录入误差。（2）标准化回访工具中集成《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该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医疗技术、服务态度、就医环境、就医流程、护理质量、总体评价等多个方面展开，以此实现满意度的量化评估。对《出院患者回访记录表》进行结构化设计：设定回访的必填项目与个性化填写区域，涵盖康复进展、药物服用依从性、并发症或不适症状、复诊状况、患者满意度、健康指导关键点以及意见建议等方面，以确保回访记录的规范性和内容完整性。（3）多元通信与自动化提醒功能，智能短信平台可批量发送，且支持个性化发送。系统能够依据患者病种、出院时间等特征，自动或半自动地编辑并推送三类核心信息：①健康知识教育内容（涵盖疾病康复关键要点及生活方式指引）；②复诊提醒（依据预设的复诊时间窗自动触发）③预约回访提醒（提前告知回访大致时间，提高电话接通率）；（4）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系统后台会自动对出院病人数、回访覆盖率、满意度等进行汇总分析，以图表形式可视化展示，为质量的持续改进与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5. 实施以党员为核心的专业化培训与质控体系

由护理部党支部主导，建立一支“党员先锋培训指导队”（由 10 名沟通能力佳、服务意识强、临床经验丰富的在职党员组成），对全院回访护士进行系统性赋能。（1）分层分专科知识培训：根据回访护士所属科室，按内科、外科、妇产科、其他综合科四大专业板块，组织专科化培训。培训内容超越基础沟通技巧，包括：各专科常见疾病出院后康复关键点、药物不良反应识别、专科并发症预警指征、特殊患者（如老年、肿瘤、术后）心理支持技巧等。培训师资为对应专业的党员临床专家或资深护士长。（2）情景模拟与现场跟听指导：设计典型回访案例进行情景模拟演练。“党员先锋指导队”成员深入各病区，通过现场旁听回访过程，实地考察回访护士的沟通技巧、问题解决能力及系统使用熟练度，并提供即时、一对一的反馈与辅导。（3）质量闭环控制：党员指导员定期抽查记录，评估回访质量，发现问题后不仅指导个人，更将共性问题反馈至专项管理小组，用于优化培训内容或系统流程，形成“培训—实践—督导—反馈—改进”的持续质量提升闭环。

6. 干预实施流程

研究组患者出院后，即通过“出院患者回访管理系统”纳入管理池。系统依据预设规则（如病种、手术情况）自动推荐回访时间与优先级。回访护士（经上述培训后）主要采取以下方式执行：（1）主动电话回访：参照结构化记录表进行深度沟通，完成满意度调查。（2）自动化辅助短信回访：在电话回访间隙，利用系统短信功能，执行健康知识推送、复诊提醒等辅助性、普及性联络，形成“个性化电话沟通”与“普适性短信覆盖”相结合的多元回访网络。

7. 评价指标

（1）出院患者回访满意度（通过系统调查表评分计算）

采用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进行量化评估。该量表基于 Likert 5 级评分法，涵盖医疗技术、服务态度、就医环境、就医流程、护理质量、总体评价 6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 1~5 分，总分 10~50 分，并转换为百分制进行统计分析。转换公式为：百分制满意度 =（实际总分 -10)/40×100。量表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信度（Cronbach's α=0.912）。满意度数据于每次回访即时采集。对于对照组，在传统电话回访结束时，由护士进行简短的口头满意度询问（需在研究中明确定义询问的标准化问题，以便于量化），或通过后续电话 / 短信补发调查。

（2）复诊率

①评估周期：统计患者出院后一段固定时间内的复诊行为。根据常见疾病随访周期，建议设定为出院后 3 个月内。也可根据主要病种特点，增加“出院后 1 个月内”的短期复诊率作为辅助分析。②操作方法：通过医院 HIS 系统，追踪两组患者在出院后第 3 个月末（或第 1 个月末）之前，是否在本院任何门诊或急诊有就诊记录。“复诊”需明确定义（如：因同一疾病或相关并发症的再次就医）。

（3）门诊预约率

①评估周期：与复诊率观察周期保持一致，建议统计出院后 3 个月内的预约行为。②操作方法：通过

医院预约挂号系统，统计两组患者在观察期内通过任何渠道成功预约门诊号源的比例。这部分数据可与复诊率交叉验证。

8.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所有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两组患者回访满意度、复诊率、门诊预约率相比，研究组的回访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复诊率较对照组提升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门诊预约率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回访效果的主要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回访满意度（分，x ± s）	复诊率 [n(%)]	门诊预约率 [n(%)]
对照组	6000	92.3 ± 2.2	4710(78.5%)	3726(62.1%)
研究组	6000	98.6 ± 2.5	5112(85.2%)	4248(70.8%)
统计量		t=146.51	χ^2=87.36	χ^2=108.42
P 值		<0.001	<0.001	<0.001

三、讨论

（一）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的优势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党建融合多元回访模式，把组织架构、技术应用和人才支撑这三个方面有效地整合起来。党组织经跨部门协调，把回访工作从护理部门的单个职责提升为全院参与的系统工程，打破行政壁垒，达成资源统筹，为工作推进打下组织基础。信息化建设对提升服务质量而言是关键所在。回访管理系统做到了流程标准化和数据结构化，这不但能让工作效率得以提高，还能借由短信推送、复诊提醒等功能把服务链条延伸出去，让患者互动增加，增强黏性，为满意度提升带来技术保障 [4]。党员在其中发挥专业引领及人文引导作用。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培训团队，经过专科化培训与现场指导，回访护士的专业能力与服务意识得以强化，沟通更贴心，指导更精准，服务温度和患者体验也显著提升。这一模式以党建引领、技术赋能和人文融入的方式，构建起系统、高效且有温度的回访服务体系，为出院患者延续性护理提供了实践路径，也为党建与业务融合带来了有益经验 [5]。

（二）对复诊率与门诊预约率提升的机制探讨

在本研究模式里，复诊率和门诊预约率都有了明显提升，这表明服务模式对患者继续就医的行为很有效。多元且持续的专业互动，构建起稳固的医患信任纽带，患者出院后仍能感受到医院的系统关注与支持，就医选择更有归属感。基于个性化推送的康复指导与健康提醒服务，为患者构建了明确且可操作的自我管理方案。系统性支持措施提高了治疗依从性，使患者从被动遵循医嘱转变为主动进行健康管理，进而使复诊成为患者康复过程中的自觉行为。与此同时，嵌入式的一键预约与智能提醒功能，着实降低了患者再次就医的操作门槛。从获取建议到完成预约的路径大幅缩短，回访里的医疗指导能快速转变成实际就诊行动，实现从专业支持到行为落实的无缝衔接。这个模式靠构建持续的信任、提供管理工具和简化就诊流程，将患者从离院到返诊的完整过程系统地重构，构建出“专业支持—自我管理—便捷返诊”的良性循环机制 [6]。

（三）党建与护理工作深度融合的机制探索

该研究构建了“党建 + 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样本。融合机制体现在顶层设计方面，党委把提升患者满意度和服务质量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方向，让回访创新有了战略指引与政策保障。在组织落实方面，党支部主要负责项目的推进工作，党员则主要承担培训指导、技术攻关等关键岗位的工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业务效能。党员群体在文化培养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及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得以广泛传播，进而逐渐形成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强凝聚力的团队文化 [7]。这一模式把目标、组织和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让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做到实质性融合、相互促进。

（四）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当前研究尚存若干局限。作为一项回顾性研究，虽已对基线资料加以匹配，但也许会有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并且，单中心设计对结论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中的推广性有所限制。另外，该模式对再入院率以及患者长期健康结局的作用，还需更长时间的追踪来验证。在未来发展策略上，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推进：利用回访系统所积累的健康数据，进行健康风险预测，并对服务需求进行画像，以此推动干预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演变，将党建融合机制拓展至慢病管理、居家护理等更广泛的持续性护理场景中 [8]。构建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包含成本效益、员工获得感以及党建量化指标。探索引入 AI 来辅助完成初筛与常规提醒，这样专业人员就能更专注于复杂个案和深度沟通了，进而提升服务内涵 [9]。

四、结语

综上所述，按照党建融合的多元回访模式，党组织统筹引领并进行信息化平台的技术赋能，党员队伍起到专业示范的引领作用，这样就构建起系统、人性化的出院患者管理体系。实践结果显示，该模式可明显提高患者回访满意度，增强医疗服务黏性，具体体现为复诊率及门诊预约率均有所提升。这一探索为公立医院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服务流程优化、改善患者体验提供了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路径。

（下转 34 页）

国企基层党建与基层组织效能提升探析

铁晓蓓

摘要：国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依靠。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本文围绕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从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的概述入手，分析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详细的优化策略，通过顶层设计、组织优化、干部队伍建设、评价优化、数字赋能等，充分发挥党建优势，提升国企基层组织效能，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基层党建；基层组织效能；国企改革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科技迭代的速度不断提升，国企面临着多种挑战和诱惑，对基层组织的执行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如何加强和提升基层党建水平，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成为提升国企基层组织效能、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因此，深入分析和探索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之间的关系，合理推进二者系统发展，对于促进党建质量提升和企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层党建

基层党建是企业在基层组织开展的党建工作，是企业开展和从事全部经济活动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在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过程中，应将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和任务，充分、全面落实到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改革发展以及日常管理工作中[1]，以保证企业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向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在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员工幸福感的同时，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二、基层组织效能

基层组织效能是指在一定的资源配置条件下，企业各项经营活动及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各基层组织，如

（上接 33 页）

参考文献

[1] 张敏，李娟，王磊．我国出院患者随访工作现状与问题分析 [J]. 中国医院管理 ,2020,40(05):67-69.

[2] 梁艺琼，朱新青，曾雪玲，等．出院患者回访预约一体化闭环管理模式构建与应用 [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23,30(09):58-62.

[3] 吴红梅，赵素平，刘红梅，等．医护一体化回访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 [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18,25(04):81-84.

[4] 陈婷，袁毅敏，沈颖清，等．复诊患者一体化管理平台构建与应用 [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22,29(08):77-79,87.

[5] 李明霞，刘华云．人文关怀在护理随访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J]. 护理研究 ,2021,35(14):2568-2571.

[6] 王琳，赵静．医患关系对慢性病患者复诊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 [J]. 医学与社会 ,2019,32(11):68-71.

[7] 郑千千，牛倩，吴红娟．医护一体化延续服务在髋关节置换患者出院后的应用效果观察 [J]. 护理研究 ,2018,32(17):2769-2771.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17):14-18.

[9] 孙雪，周亮．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J]. 中国医院 ,2022,26(06):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梧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课题“基于党建融合的多元回访模式在出院患者回访中的应用”（WZWS-G20230011）。

（作者：刘晓燕，梧州市工人医院副主任护师、感染性疾病科副护士长；通信作者林秀梅，梧州市工人医院副主任护师、门诊部护士长；苏中英，梧州市工人医院主任护师、护理部主任；何碧姣，梧州市工人医院副主任护师、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彭子婉，梧州市工人医院护师、门诊服务中心护士）

车间、班组等，为了实现企业为自身发展所设定的战略目标而表现的各项综合能力和实际效果。在国企运营管理中[2]，基层组织效能不仅关注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还要关注实际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安全风险、人员队伍是否稳定、职工是否对当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满意，保证企业的运营安全，以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及幸福感，提升企业的内部凝聚力，进而保证企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在良好的内部环境下，进一步促使企业员工积极地开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完成企业战略目标的同时，促进企业良性、稳定地发展。

三、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的关系

（一）基层党建是基层组织效能提升的根本保障

在日常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企业员工和基层工作者参加党组织培训、组织各项党建活动和基层监督等方式，将党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融合到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中。党组织可以将党支部设置在企业的项目、班组等一线，在国有企业内部渗透基层党组织，在企业的重要发展时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国企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正确的决策，帮助企业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的发展战略，同时，共同参与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3]，如动员、指挥、协调等，基层党组织应深入基层和企业一线，团结企业基层员工，将企业的个体力量融合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力量，提升企业的战略执行力和应急组织能力，提升企业战略执行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基层组织效能。党组织制度和企业的各项制度可以融合，进一步规范企业的各项决策和工作流程，明确各部门、各人员的职责，避免因随意决策等导致的低效情况，避免形式主义。在党组织人员选择时，基层党组织应重点关注待选人员的政治品质，在企业的一线和基层培养和用好党员干部，通过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突击队等，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引导企业员工养成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的意识，提升企业战略目标的落实水平和质量。

（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对基层党建的反哺

在国企党建工作中，基层组织效能指标，如安全水平、任务完成情况、员工的满意度等，通过对基层党组织效能指标进行全面、细致的验证与考察，可以对党建工作质量进行验证和衡量，也可以促进党建工作向重视实际开展效果的方向转化[4]。同时，对基层组织效能提升过程中所发现和展现的协调、执行以及队伍稳定性等问题，应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在分析原因不断对组织能效调整和改进的过程中，可以促使基层党组织不断对组织方法进行优化，如建立项目党支部、联合党支部等，合理划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党员各项具体的责任区和各项目的重难点攻坚人员，使基层党建工作更加精准地落实到企业的一线，融合企业的各项业务及经济活动。通过提升组织效能，提升企业的实际业绩、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使得企业的人员队伍更加稳定，提升企业员工对企业和党组织的信任和认同感，促进党组织发展、干部选拔和活动开展，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效果和质量。结合基层党组织效能问题进行分析，基层党组织可以进一步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项薄弱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质量，不断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优化。

（三）二者协同发展的动态平衡机制

在目标方面，国有企业的基层党建工作应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巩固为基础，基层组织效能提升的重点是对企业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质量进行提升，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二者之间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企业的发展战略、资产保值、员工福祉服务。在过程方面，国企的发展战略目标在分解、落实、风险防控和绩效管理时，基层党建应深入到企业各项生产经营一线和企业发展的全过程中，将党建工作和党的思想平行推入转为平行融合，促进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战略之间的融合；同时，基层党组织效能提升全面考量国有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的政治执行力、人员的队伍状态、组织氛围等重要的党建因素，将党建效能切实落实到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中。在评价方面，基层党建考核和效能考核工作应在实践中不断融合和联系，通过对效能结果反馈对党建工作开展的质量进行验证，避免基层党建工作低效，通过党建效果进行人员选择、资源配置，避免在评价和考核过程中唯业绩论，提升组织效能。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在国有企业中不断地总结、优化，进而可以形成不断循环、改进、向上的新发展格局。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制度建立、流程制定和信息系统建立时，可以深入融合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的具体要求，通过协同可以使得企业的运营与党建工作更加紧密，实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发展。

四、以党建引领基层组织效能提升的优化策略

（一）强化政治引领和顶层设计

在基层党建和基层党组织效能提升方面，要以党建为引领。首先，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还要重视企业发展的整体谋划。强调基层党建工作的政治属性[5]，将党的思想和方式融入国企的各项活动章程，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治理结构优化、制度落实过程中要重视党建工作，基层党组织应深入企业的基层和一线，参与企业的各项重大决策、人事、项目和资金配置，将基层党建工作落实到企业的各项战略活动中，守住企业发展的安全底线。其次，在顶层设计时，应将党建和组织效能提升统一整合，在基层党建工作中，

深入融合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划、年度目标责任、绩效考核，确定党建、效能提升的重要指标体系，以促进党建和组织效能提升实现同步发展。最后，详细地制定党建、业务、项目、安全等各个部门、活动相互协同发展方案，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紧扣国企各项业务活动目标，防止基层党建工作分散、片面，在制定和实施各项经济活动路径上，与组织效能的提升紧密联系。

（二）基层组织体系和资源配置优化

促进基层党建和业务的协同发展，应促进各项具体组织形态和资源配置的优化。首先，结合国企各项改革工作、业务活动布局、具体项目优化等，对基层党组织结构进行优化，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可以全面覆盖国有企业发展业务流程，防止国有企业出现业务在前、党建工作停滞等问题。针对企业各项目、矩阵、区域等制度形态，可以设置项目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和产业链党建联盟等不同形式的基层党组织，将基层党建工作与国有企业的业务流程、责任体系结合起来，帮助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次，对国有企业的各个党群、行政、人力、纪检、工会等基层组织进行全面整合，促进国有企业的各阵地、各组织共同建设、信息共享等，减少在实际活动中出现重复组织、重复安排等情况，避免存在重复考核等情况，减轻基层反复填表、组织活动等负担。最后，调整资源配置，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对资源配置进行动态调整，将资源配置的方向转化为能力建设、制度重建、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优化，在企业重大节点，如决策、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时，给予支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三）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能力

政治素质过硬、专业能力强的基层干部队伍，是基层组织效能提升的重要支撑，基层干部队伍的能力直接关系着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的提升效果，因此，应重视基层干部队伍能力的提升和培养。首先，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基层党组织应在提升党务干部政治理论、业务素养的基础上，强化基层干部对企业战略理解、经营管理、项目运行、风险管理、群众工作以及数据的分析和整合能力，提升基层干部的专业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使得基层干部不仅懂党建，还懂企业管理。其次，提升基层管理和业务骨干队伍的党建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在干部选拔时，基层党组织应将党建能力和政治标准作为重要的选拔条件，使得党务干部重视通过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实践工作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将党建工作、队伍建设与生产经营相结合。最后，促进企业业务干部和党务干部之间的融合发展，通过企业业务干部和党务干部的能力互补，提升基层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四）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效能评价体系

基层党建和基层党组织效能提升，应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提升企业员工的幸福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提升企业凝聚力。首先，指标体系优化，如产能、质量、成本、进度等指标体系中加入企业员工满意度、团队凝聚力等指标，将评价体系与党建效能紧密联系，在评价体系中深入渗入党建效能提升指标，引导基层党组织积极、主动解答员工问题。其次，在评价过程中，应将调查问卷、访谈、民主评议、第三方评估等作为评价方式，通过动态、多维的方式对企业员工对党组织的服务、企业领导作风、企业环境、发展空间等进行分析，避免出现形式主义评价，提升评价的质量和水平。最后，重视评价反馈，在企业评优、选拔和资源配置时，应以群众满意度和组织效能为依据，对提升效能、民意评价较好的党组织和人员给予奖励，进而突出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的重要性。

（五）运用数字化手段促进基层党建和组织效能提升融合

数字化技术可以促进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之间的融合，要重视在基层党建和组织效能提升中数字化手段的应用。首先，引入数字化手段，在基层党组织中建立智慧党建系统，在党建系统中录入基层信息，将党员管理、组织生活和国企生产经营、绩效管理、安全风险防控、人员配置融合，通过数据分析、共享，基层党组织可以掌握企业基层效能和人员队伍情况。其次，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基层党组织可以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队伍稳定性等进行动态管理和优化。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可以及时发现党建和组织效能融合存在的问题，进而可以促进党组织针对性地对各项情况进行改进，提升融合的水平和效果。最后，通过线上方式，基层党组织可以将党支部会议、云课堂、移动学习等内容上传至平台，通过线上学习的形式，基层党员可以随时学习党的先进思想和方法，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参与性。同时，通过线上工单、协同平台等方式，对实践工作中的各项监督进行反馈，及时加快各项问题的处理速度，将基层党组织服务工作深入到国企的各个部门和流程，将各项党建工作转化为数据驱动，进而促进基层党建工作和基层党组织效能提升之间的深入协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企运营管理中，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效能提升是目标一致、过程同步的。通过顶层设计、组织优化、干部队伍建设、评价优化、数字赋能等，可以充分发挥党建优势，提升国企基层组织效能，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卢文刚，谭喆．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研究——以广东省“红色物业”为例 [J].（下转 37 页）

党建与专业深度融合视域下高校服务型学生党支部建设路径探析

路　艺

摘要：在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下，学生党支部的建设面临着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的任务。推动高校基层党支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是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本文以遵义医科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为例，围绕打造服务型党支部的目标，结合“七个有力”工作要求，从具体做法、制度创新和品牌塑造等方面展开探索，有效破解了党建工作与专业学习“两张皮”的问题，显著提升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关键词：党建引领；高校学生党支部；专业优势

高校学生党支部是党在高校基层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建育人的重要载体。如何更好地引领学生成长成才、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是基层党支部在工作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随着青年学生思想行为的不断变化，传统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要求[1]。遵义医科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在创建校级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模式，依托生物工程学院珠海校区的地理优势，结合生物工程专业特色，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明确了以“党建+生物医药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服务型党支部建设目标，摒弃“就党建抓党建”的封闭循环模式，探索出以“服务、学习、创新”为核心逻辑的工作体系。经过探索，党支部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上取得成效，在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党建与专业深度融合方面积累了经验，荣获校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一、理念先导与目标定位：在“复合身份”中寻找坐标

一个基层党组织在工作发展上都有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在党支部发展过程中，要从思想理念上进行转变，积极推动党组织的功能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向“服务”延伸，强化引领与服务，将生物工程专业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紧密结合。

（一）专业坐标：“生物工程”凸显的“强大基因”

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的支委构成中，包括了学院的专任教师和思政辅导员[2]。其组织功能方面包含了专业的知识传授，从职业发展导向上给予帮助等多个层面。生物工程专业作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学科，连接着现代产业的发展，在疾病诊断、药品研发、质量检测等关乎人类健康发展的领域中有着重要作用。

支部在建设过程中意识到，如果党建工作脱离了专业，很容易变成“空中楼阁”。在工作管理中，党支部书记是学院的专职辅导员，在与学生的相处过程中，

（上接36页）

中国行政管理,2024,40(06):156-160.

[2] 韦勋,邹新.智能技术赋能基层党建的优势、问题与计策[J].新乡学院学报,2023,40(02):1-5.

[3] 朱亚鹏,易敏,崔雨鑫.党建引领如何破解中国基层治理的三重困境?——基于广州市南沙区的实践[J].治理研究,2024,40(03):61-78.

[4] 魏来,徐锦杰,涂一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机制与组织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3(01):105-115.

[5] 穆军全,张芸嘉.农村基层党建引领治理的“优势—效能”转化困境与出路[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3(01):51-58.

（作者系葛洲坝易普力广西威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政工师）

了解学生最关注的问题：包括科研、实验和就业等问题。因此，党支部明确了“党建＋生物医药人才培养”的建设目标。在实施路径上，在政治引领、思想教育、组织活动等方面，都要与生物医药人才的培养过程紧密结合。

（二）地理坐标：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舞台”

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在生物工程学院，而学院设立在珠海校区。珠海校区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学校周边就聚集了珠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生物医药企业。对于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珠海又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地理位置的绝对优势为党支部开展工作、拓展功能提供了独特的舞台。基于以上的地理优势，党支部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将“校企合作”作为工作重点。学院已经在广东省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建立了实习基地、劳动教育基地等，并建立了稳定的共建合作关系，为学生的职业规划、实习和就业搭建了更稳定的“舞台”。

珠海本地也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如“红色三杰”（从珠海走出的早期革命先驱：苏兆征、杨匏安、林伟民）的革命事迹。这种文化背景为支部工作提供了学习的创新性，使学生并不只是学习书本中的内容，而是能够亲身感受革命传统教育与现实改革开放精神的融合。

支部将生物工程的专业优势用于服务社会公众。支部创建了“守胃健康，告别 HP”幽门螺杆菌知识科普活动，将科普知识精准对接社会健康需求。科普活动走进过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金山湖公园、珠海市中小学及多个社区等。已开展科普活动二十余场，服务群众上千人，让更多人重视胃部健康，知晓幽门螺杆菌可以引起胃病的严重性，科普活动已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

（三）组织坐标：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的功能再“定义”

在高校组织框架中，学生党支部是一个特殊的“单元”，由辅导员、少数教师党员及学生党员组成，处于学校党委、学院党总支和广大学生群体之间。传统上，其功能侧重于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但在实践中，将服务型支部功能落到实处，使支部从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向兼具“成长服务平台”“专业实践枢纽”和“社会链接窗口”的复合型组织延伸[3]。支部不仅要管好党员，还要通过党员带动更多学生；不仅要组织党员学习，还要为学生的学业发展、职业规划对接资源；不仅要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还要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功能再“定义”，使支部的工作边界更加清晰，价值感更强。

二、构建服务型功能的三大支柱

建设服务型学生党支部并不是简单地起一个名称，而是要通过具体的工作来体现的。支部在探索实践中构建了三大工作核心：多层次关系建构服务型网络、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的“螺旋双链”相融发展和内与外的双生态链接。这三大工作核心的建立，如三大支柱托起了服务型学生党支部的框架。

（一）支柱一：多层次关系建构的“服务型网络”

党支部通过一系列工作，建构了一个多层次的“服务型网络”。

内部层：支部建立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结对“帮帮带”制度，为积极分子配备了一名党员作为“同行益友”。对积极分子而言，是一种激励；对党员而言，更体现了一种责任。这种构建使支部更加有温度。

中间层：党支部设立党员先锋岗；组织考研分享会，英语四、六级考试分享会等；联合教工党支部开展困难学生就业帮扶等工作。学院院长也会定期开展“院长面对面”专业宣讲活动，帮助学生解决专业迷茫问题。党支部不再只是发布通知的机构，而是成为为大家“办实事”的枢纽。

外部层：“守胃健康，告别 HP”的科普活动是与珠海市人民医院第二十一党支部共同开展的。从专业角度上看，科普内容更加规范，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支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成立的科普宣传小队，深入校园、社区和基层。这一过程，使支部与社区、医院、学校建立了以健康促进为目标的共同协作关系。

（二）支柱二：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的“螺旋双链”相融发展

服务是需要能力支撑的。对学生党员而言，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是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支部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了“螺旋双链”的提升模式。支部工作凝练出“学讲赛研”式学习体系：

“学”：党支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学习最新理论和精神。但学习不只是念文件，而是结合专业背景深入地理解深刻的内涵。“讲”：党支部建立了“一周一学，一人一讲”的微党课制度，要求每位党员轮流担任讲师，分享时事主题或红色内容。准备讲稿的过程是深度学习，讲述过程既锻炼了表达能力，又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其效果远胜于被动地听讲。“赛”：党支部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如创新创业大赛等。这些竞赛推动他们将所学知识更好地应用于实践。同时，党支部将竞赛获奖作为评优的条件之一。“研”：党支部鼓励党员人人参与科研项目、撰写论文，这是能力转化的阶段。支部党员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屡获佳绩。

（三）支柱三：内与外的双生态链接

一个基层党组织如果只做规定的工作，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打破高校学生支部常见的“围墙”，是构建开放协同的外部生态的重要路径[4]。

内部链接：党支部与本学院教工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纵向共建。其共建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将资源更好地互补。教工党支部能够给学生提供学术指导、

科研机会和行业资源，而学生支部则充满活力和实践、就业意愿。多元化共建既丰富了“党建带团建”的内涵，同时又达成了师生联动、形成育人合力的效果。

外部链接：支部充分利用珠海的地域优势，与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建立合作共建关系实现“产教融合”。企业通过学生见习和实习情况能够了解所需要的人才，同时学生也会获得实践机会。支部拓展了工作方式和载体，增强了服务学生职业发展的能力。这种与外部的链接，让党建工作实实在在地成为人才培养的关键。“守胃健康”的科普项目也是支部响应社会健康需求，既履行了社会责任，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

三、制度、品牌与主题党日的创新

构建三大支柱，为支部工作搭建了架构，而让这种架构能够持续充满活力，则需要加入驱动系统内容。支部主要通过制度化、品牌化和常态化创新来带动整个体系。

（一）制度化——将有效做法“固化”

支部工作，如果只凭借个人的热情和举办一些零散的活动是很难持久的。因此，党支部将有效做法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工作规范。在支部内部，建立《支部管理制度》，明确“帮帮带”的责任清单和积极分子推优的考核点；针对校企合作，草拟《校企共建合作协议书》；针对“守胃健康”科普活动，从志愿者科普到反馈评估，形成标准化流程；针对日常学习，制定《年度党建学习计划》，规范主题党日活动，确保“三会一课”不流于形式。

（二）品牌化——将工作特色“亮化”

支部将工作特色“亮化”，促进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品牌。“校企共育”创建了产教融合的育人模式，是“联”的品牌体现。同时，这种工作内容也延伸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作为连接学生与学校、社会企业的桥梁，发挥着资源整合的作用。在学校创立了“三连音”辅导员工作室，工作室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三全育人”理念，提高学生的专业知晓率、就业率和留珠率，最终实现一体化目标。

品牌化不仅为了宣传，更在于价值凝聚和支部形象的树立。一个响亮的品牌能将复杂的长期工作浓缩为简单符号，对内增强归属感和自豪感，对外快速建立认知、吸引资源。品牌化是将服务型工作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进行符号化呈现的关键一步。

（三）常态化创新——将固定动作“量化”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的工作容易陷入模式化。支部的优势在基本的工作中注入了持续的创新“变量”，即“四个 +”主题党日模式[5]。

“红色资源 +”让学习从教室走向红色现场，有了历史氛围。“精细服务 +”让活动从理论走向实践，有了现实温度。“安全宣传 +”让教育从泛泛而谈走向具体内容，如实验室安全、健康知识宣传，有了专业精度。“专业融合 +”让内容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如企业参观、技能比赛，有了学科深度。所以“四个 +”模式是在保证主题党日基本政治属性的前提下，根据当期重点、专业阶段、社会热点灵活加入不同内容，保持支部活动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这种常态化创新是维持支部内部活力、防止工作倦怠的重要机制。

制度、品牌、创新，如三个齿轮相互咬合。制度为品牌建设和活动创新提供框架和保障；品牌是制度和创新成果的升华与对外展示；创新则不断为制度注入新内容、为品牌增添新内涵。三者共同构成了服务型支部持续运转的动力系统。

四、成效、挑战与启示

经过上述实践，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党员在学业、竞赛、科研中表现突出；“守胃健康”科普项目受到社会好评；学生就业率和留珠意愿得到提升。这些都证明了服务型党支部建设路径的有效性。同时支部也面临着工作挑战：一是如何使品牌化项目保持持久力，避免活动只流于形式；二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与生物医药企业合作，拓展更多资源。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后续工作中不断研究和解决。

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的实践，为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带来了一些启示：一是党建工作必须与专业特色深度融合；二是要善于利用地域资源优势，拓展支部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三是要注重品牌塑造，将工作成效转化为显著的成果。这些经验对于推动高校学生党支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洁 . 党建“双创”视角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21):126-128.

[2] 胡涵 .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N]. 延安日报 ,2026-02-25(04).

[3] 赵辉 .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创建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0,33(22):75-76.

[4] 牛磊磊 .“样板支部”创建视角的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创新 [J]. 南方论刊 ,2024(01):60-62.

[5] 朱航漪 .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模式创新探索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24(19):269-27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17 年度遵义医科大学“五个一批”工程评选“党建示范点”样板党支部创建单位“珠海校区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402017）；2024 年度遵义医科大学第三批辅导员工作室立项“‘三连音’辅导员工作室”（2024FDY-18）。

（作者单位：遵义医科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党建 +”赋能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成长实践路径研究

陈夏囡

摘要：本文聚焦“党建 +”视域下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层党组织引领青年思政教师成长的现实命题，针对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在成长中面临的多维提升需求，提出构建“党建 + 理论武装”“党建 + 教学锤炼”“党建 + 科研培育”“党建 + 人文关怀”的四维协同动力系统。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组织赋能，探索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破解教学实践瓶颈、补齐科研短板、强化职业认同的实践路径，为破解民办职业本科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难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回应新时代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要求。

关键词：“党建 +”；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层党组织；青年思政教师

一、问题提出：党建赋能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发展体系构建

2024 年 12 月，第二十八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指出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其中，高校党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建立协同机制，实现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关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1]同时，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建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支点。近年来，针对党的建设如何赋能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发展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研究主题集中于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课程的深度整合、在党建引领下创新思想政治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等，均有提及党建工作对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促进作用，但对该问题的探究仍多停留在客体性推进层面，对思政教师主体性意识建设等本质问题的关注尚显不足。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重要论断，赋予职业本科院校思政教师为技术技能人才铸魂育人的时代使命。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直接关乎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与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然而，事实上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面临多维结构性困境[2]90——该群体普遍存在职业认同需进一步加强的问题，个人成长路径不顺畅、不稳定；在专业发展层面，理论积淀系统性不足制约政治素养提升，科研能力更因资源匮乏与学术指导缺位而亟待提高；此外，碎片化培养机制与量化主导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削弱了育人实效[3]。这些困境与民办院校“重技能轻思政”的传统倾向相互交织，形成制约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深层梗阻。

针对民办职业本科院校的特殊性，本研究立足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与组织赋能的双重功能，创新性地提出“党建 +”系统引领范式。其核心在于构建四维协同的动力机制：通过“党建 + 理论武装”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借力“党建 + 教学锤炼”搭建基于党支部的跨教研室协同备课机制、实施“党建 + 科研培育”构建“学科带头人 + 青年党员”科研共同体、强化“党建 + 人文关怀”缓解职业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这一体系化路径既回应了新时代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要求，也为民办职业本科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二、现实审思：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成长的提升需求

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的成长困境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制度约束、资源配置与职业特性交织形成的综合性问题，事实上深刻制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与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一）政治素养与理论根基的“提升之需”

这一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民办高校青年思政教师理论内化不足与现实应对能力欠缺的双重矛盾。部分青

年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停留在文本表层，不能深入把握其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内在逻辑，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使得课堂教学难以形成透彻的学理阐释[4]。同时，民办院校部分理论学习机制与党建机制仍有完善空间，使得教师在面对多元社会思潮时，需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站位与批判辨析能力。

此外，这一问题更深层的矛盾也在于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困境：职业院校更侧重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专业构成上来看多开设理工科或应用型专业，且学生通常具有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和技术技能培养要求。而由于缺乏对行业发展、专业特性的深入了解，教师难以从职业场景中提炼思政元素，导致“大国工匠”“劳动精神”等育人主题的呈现需更加具象化。

换言之，从实践层面来看，民办高校青年思政教师受制于自身理论深度不足与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技术理性导向的客观影响，理论话语转化能力在课堂实践中亟待提升：民办职业本科思政课堂同时面临着学生漠不关心和听不明白两重压力——一方面，若教师不能将意识形态建设和技术技能培养有机融合，容易出现“理讲不透”的情况，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当学生提出带有意识形态迷惑性的尖锐问题时，部分教师因理论储备不足而回应乏力，这既不利于思政课引导力的充分发挥，也给教师自身职业信仰的深化带来了一定挑战。

（二）职业认同与发展路径的“成长之痛”

民办高校思政教师发展受限与院校发展定位及评价体系的演变也存在关联。从实际情况来看，民办职业本科院校的思政教师在知识结构、培养模式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思政课教师并无实质性差别，这种同质性使得他们较难精准把握职业本科学生的成长需求与认知特点。从学历结构来看，大部分民办职业本科院校的青年思政教师在学术积淀上相对薄弱，高学历人才占比与其他类型院校存在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科研竞争力的提升。近年来，职称评审标准中科研指标的权重持续上升，对于思政学科这类难以通过横向课题积累成果的专业而言，形成了显著的评价压力[2]91。教学任务的繁重与科研要求的日益提升形成双重挤压：教师既要承担大量课时以保障教学基本盘，又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高水准的科研产出，使得民办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面临职业发展的压力，不少青年教师对职业前景产生迷茫，进而影响了职业认同的深度构建。

（三）科研能力与学术产出的“短板之虑”

民办职业本科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往往处于边缘位置，缺乏稳定的科研平台与有组织的学术团队[5]。青年教师被迫处于“单打独斗”的科研状态，既难以获得高级别课题的申报机会，也缺乏学术成果转化的渠道。学术交流平台的有限性进一步制约了视野拓展，教师较难参与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与合作，导致研究方法与学术视野相对固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部分职业本科院校的学科布局中，尚未形成与职业教育特色相适配的科研方向，导致研究选题与职业教育的需求存在脱节。在科研支持体系上，大部分民办职业本科院校既缺乏针对思政教师的课题培育机制，也鲜见专项科研资源，使得青年思政教师在科研起步阶段就面临较高门槛。这种科研环境的优化需求，不仅使得学术产出难以满足评价要求，更制约了教师将职业教育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的可能性，造成“实践丰富但理论薄弱”的尴尬局面，更切断了“理论创新—教学升级”的正向循环，使教学内容逐渐失去学术支撑而陷入同质化困境。

上述三重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相互强化的闭环：理论根基薄弱制约教学改革的深度，职业认同缺失削弱科研创新的动力，科研能力不足又反过来固化教学与政治素养的短板。

三、“党建 +”引领：构建青年思政教师成长发展的四维动力系统

针对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成长面临的多重困境，“党建 +”模式的构建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功能，将党建工作与教师成长需求深度融合，对教师发展所需的政治引领、专业支撑、资源配置与情感维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为摆脱青年思政教师发展困境提供具有组织保障的解决方案。

（一）动力引擎：“党建 + 理论武装”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

“党建 + 理论武装”作为动力系统的核心引擎，其作用不仅在于打牢青年教师理论基础，更在于通过组织化学习机制实现政治信仰的内化生成[6]。一方面，将党支部“三会一课”与理论学习相融合，突破传统读文件、念报纸的形式局限，由党支部书记或党支部中的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结合职业教育发展实际设计专题领学内容，如“新发展格局下的工匠精神培育”等具有职业教育特质的研讨主题，使理论学习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思考。另一方面，可依托主题党日活动组建“青年教师理论宣讲团”，深入社区结合社区居民关心的内政外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党的理论和政策；走进中小学，通过生动的案例和互动环节，向学生们传递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文化；前往党史馆，在实地参观学习中，结合党史故事进行现场宣讲，让听众更直观地感受党的奋斗历程；深入企业单位，尤其是与学校有合作的相关企业，围绕企业发展中的党建工作、劳动者权益保障、工匠精神等内容开展宣讲，既回应企业和员工的关切，又让青年教师在结合职业教育实际的宣讲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二）引导机制：“党建＋教学锤炼”破解教学能力提升难题

将基层党支部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教学改革的推动力，在党支部中形成“结对师徒”，以多种引导维度实现青年思政教师教学能力的有效提升：在教学维度，师徒共同开发融入职业场景的思政案例；在竞赛维度，以省级思政课教学比赛为目标，导师全程参与青年教师的教学设计打磨；在科研维度，围绕教学中的真问题共同申报教研课题等。同时，借助党支部的平台打破集体备课的教研室壁垒，由党支部牵头聚焦职业本科思政课的特殊性议题，通过跨教研室协作形成针对性解决方案。

（三）关键环节：“党建＋科研培育”补齐科研水平优化短板

构建以党支部为核心枢纽的科研孵化体系，将组织生活制度转化为科研生产力。通过“三会一课”的政治把关功能，建立从科研选题到督促进展的“政治体检”机制——在党支部会议上专题审议青年教师的科研立项方向，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校准研究坐标，确保选题既扎根职业教育实践又符合国家战略需求；赋予主题党日活动科研攻坚属性，围绕职业本科思政课中的现实问题，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调查研究，由党支部牵头梳理共性问题形成研究课题，匹配党员骨干教师组成攻关小组；定期在组织生活会上汇报支部党员教师科研教研进展情况，使“批评—改进—提升”的民主评议机制真正契合教师的工作实际。此外，还可以通过在党支部中组建“党员科研攻关小组”，由党员学术骨干担任组长，集体攻关各级各类党建与思政研究专项课题，通过老党员的示范带动弥补青年教师单兵作战的短板。

（四）认同重塑：“党建＋人文关怀”强化职业认同的情感根基

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教师成长的心理支撑，通过创新组织生活形式，灵活运用主题党日活动、常态化谈心机制等方式，打造“政治引领＋情感联结”的双重纽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青年教师与老党员共同回溯从教历程、分享经验，在代际对话中强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认同；建立“政治生日”纪念制度，通过赠送理论书籍、重温入党誓词、支部书记寄语等仪式化环节，将组织关怀转化为身份认同的精神滋养；建立常态化谈话机制，新入职时谈职业发展规划，教学受挫时谈信心重建，生活困难时谈帮扶措施，谈话记录由党支部建立成长档案，从而针对性培养每一位青年教师。

综上所述，四维动力系统的搭建形成协同效应——理论武装为教学科研锚定方向，其转化成效最终要在教学实践中检验；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反过来驱动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与科研创新，而科研成果的学术厚度又提升了教学内容的思想深度；人文关怀则通过增强组织凝聚力，为前述所有环节提供情感支撑与可持续动力。

四、结语

综上，本文基于民办职业本科院校青年思政教师成长的结构性矛盾，以“党建＋”模式构建四维协同动力系统，既回应了新时代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命题，亦为破解职业教育领域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实践层面上，“党建＋”模式赋能青年思政教师成长作为民办本科院校党建工作发展的重要一环，能够直接有效地破除民办院校“重技能轻思政”的传统桎梏，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业本科教育场域中实现功能重塑提供了可操作范式。该体系核心优势在于突破传统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局限[7]，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转化为教师成长的内生动力，形成了政治引领与专业发展的生态闭环，从而为思政教师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1] 坚持立德树人 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第二十八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发言摘登 [N]. 光明日报 ,2024-12-21(06).

[2] 周文渊 . 当前民办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存在问题及解决之道 [C]//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5 年高等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25:90-91.

[3] 张赛玉 . 高质量党建助力高校思政课教学内涵式发展的路径研究 [J]. 决策与信息 ,2025(07):80-84.

[4] 李甜，祖金玉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赜 [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5,37(02):78-84.

[5] 李丽萍，曾学龙 . 新时代职业本科思政课“师资创优”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0,39(08):88-92.

[6] 马伟，李杰，刘敏 . 高校马院基层党建引领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11):102-104.

[7] 同 [1].

（作者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讲师）

党建引领构建社区骨质疏松防控“全链条”健康促进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费巨波　张叶枫　叶变良　何康莉　顾　叶

摘要：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慢性疾病，主要特征包括高发病率、高隐匿性和高致残率，主要对中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干扰。总结基层防控中出现的突出性问题，包括基层防控分散化、疾病筛查时机延迟、管理方式粗放以及患者依从性欠佳等，本次研究主要以党组织核心引领为切入点，系统性探索社区骨质疏松规范化防治的创新路径。本次研究以上海市奉贤区金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7 年以来的防控实践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统筹区域医疗资源，构建出全流程闭环式的服务体系，一体化体系包含骨质疏松症的筛查、诊断、治疗、康复与随访管理。骨质疏松防控“全链条”健康促进新模式具体举措包括：推动业务与党建的深度融合需要搭建三级防治网络，建设“5+X”家庭医生团队，赋能升级，实现数字化赋能升级，并且强化人文关怀的内涵，由此为社区骨质疏松防治工作塑造出“金骨棒”特色健康服务品牌。该项管理模式突破了疾病无症状患者的筛查盲区，在实施应用期间，可以借助 AI 智能筛选技术，能够准确识别超过 30% 的隐匿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与此同时，依据患者的诊疗需求，对个体化诊疗与康复方案进行持续优化，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骨密度水平。总结该模式在社区的应用效果，截至目前，专病门诊累计为 3000 人次提供服务，在册规范管理的患者达到了 510 名，疾病患者的病情状况控制效果稳定，患者的健康素养和满意度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区卫生服务；骨质疏松；全链条管理；慢性病治理

一、引言

骨质疏松症作为一种全身性骨骼病变，核心表现为骨量流失、骨微结构受损，其发病初期无明显症状，一旦确诊往往伴随较高的患病率与致残率，已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的关键公共卫生挑战[1]。《“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部署，要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大力推进疾病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守护居民健康的前沿阵地，在骨质疏松症防治工作中承担着基础性职责，但当前多数社区普遍存在专病筛查诊疗能力不足、服务流程零散、居民防控依从性较差等实际难题。上海市奉贤区金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 2017 年起，紧紧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时代要求，以骨质疏松症防控工作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将其转化为基层健康服务创新的强大动力，逐步构建起“全链条覆盖、精细化管理、有温度服务”的健康促进新模式，打造了“金骨棒”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特色品牌。本文对该中心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及实施成效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为党建引领下基层慢性病管理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样本。

二、实践路径

金海实践始终以党建工作为根本引领，依托党组织特有优势赋能民生健康发展。当地围绕骨质疏松防治重点工作，搭建组织技术网络和管理文化相融的综合健康服务管理体系。

（一）深化党建业务融合，锻造专业化服务硬核

执行骨质疏松防控工作，中心始终以党建为引领，将防控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入党建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党建与业务脱节的相关问题，凭借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凝聚作用，确保防控工作执行有动力，推动党建转化为实际的防控服务能力[2]。中心党支部承担起相关责任，牵头组织骨质疏松防控工作，党支部书记负责相关业务，挑选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党员骨干成员。组建相关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将骨质疏松防治工作纳入重点，与日常业务工作同部署同安排，有效实现同步推进和同步验收，进一步明确小组成员内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将防控工作细化为关键的时间节

点和具体的要求，需要逐步建立起支部统筹，党员带头和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的骨质疏松防控工作模式。

优化骨质疏松防控专业水平，要以党建为抓手，通过培养相关的人才，执行“红色头雁”培养计划，要选取业务能力突出、政治素养较高的党员医护人员，作为该项工作执行的带头人，牵头开展业务培训和技术研究。定期输送党员业务骨干到三甲医院进修学习，获得先进的防控管理经验。邀请行业专家开展专题讲座，重点围绕 AI 筛查技术应用、骨密度检测规范以及个性化诊疗方案制定等开展培训。积极为相关人员搭建专科交流学习平台，显着提高了相关医护人员的防控能力。

在医院内设立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域，引导党员在各一线岗位主动亮明身份，并且践行各项服务承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承担起相关的重点工作，包括高危人群筛查，疑难病例诊治，积极破解相关的实际问题，包括群众认知不足、筛查效率不高。建立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考评机制，将骨质疏松防控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中，并建立完善与约束并行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构建起专业的防控队伍。

（二）构建三级防治网络，打造“金骨棒”特色服务品牌

中心以党建为纽带，联动区域医疗资源，构建“社区初筛—专病门诊初诊—三甲医院专家会诊”三级防治网络，形成标准化服务内涵：（1）“1 人 1 档”：建立含骨密度、生化指标、骨折风险、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电子健康档案，开展精准评估与动态管理；（2）“2 轨服务”：构建“线上 + 线下”双轨协同服务。线下提供面对面的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健康处方；线上建立“金骨棒”微信服务群，由专病医护团队实时答疑解惑，推送科普知识，实现 7×24 小时健康支持；（3）“3”维提升：聚焦“居民认知度、服务便民度、患者满意度”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同伴教育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提升了防治意识；就诊流程的不断改进完善，推动了更加规范的 1+1 ＞ 2 的医护协作模式；定期的满意度调查与反馈，让中心“以病人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三）创新“5+X”家庭医生团队模式，夯实社区健康促进根基

将骨质疏松防控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造以骨质疏松、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慢阻肺等社区核心慢性病为重点的 5 个特色家医团队，形成“5+X”模式。“5”个特色团队：每个团队由全科医生、护士、公卫、康复、药剂等组成，具备针对各核心慢性病较丰富的健康教育和综合管理经验。“X”项拓展内涵：以家庭医生为核心，整合多种资源与服务 [3]。

（四）强化区域协同宣教，营造全民防控支持氛围

中心积极履行健康促进医院职能，将骨质疏松防控纳入整体健康促进规划。一是强化区域协同。作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质疏松防治临床基地，积极参与健联体内的双向转诊、标准协同与人才培养。专病护士负责上转病人的全程随访跟踪，形成管理闭环。二是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中心党支部持续依托“行走的健康吧”“医心向党送健康”党建服务项目，充分发挥“健康‘嘉’园”科普阵地，结合主题宣传日、志愿服务等，以健康讲座、科普直播、新媒体推文等形式，大力倡导均衡营养、科学运动、充足日晒等科学生活方式，全面引导提升居民预防骨质疏松等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素养与自我管理能力。

（五）深化数智赋能，健全医防融合运行机制

依托智慧健康驿站、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等数字化平台，为签约居民提供“一站式”健康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生成个性化健康服务清单，引导家庭医生开展分层分类的主动干预。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为家庭医生提供了真实、动态的居民健康数据支持，显著提升了健康管理的精准度与效率，使“医防融合”不断从理念走向实践。

三、创新亮点与实施成效

（一）模式创新亮点

1.AI 技术破解筛查难题。面对无症状骨质疏松“看不见、摸不着”的筛查困境，智能评估系统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诊疗目标予以实现。对无症状高危人群的高效、精准筛查，填补了传统依赖症状就诊的盲区。

2.“全 + 专结合”丰富服务内涵。门诊医护团队把骨质疏松日常管控，和血压血脂体重等代谢指标监测、心理疏导、康复锻炼结合起来。依托多学科协作开展体重管控，搭配诊疗、膳食指导、运动干预与情绪关怀综合服务。打破科室分工局限，聚焦全民健康养护，也体现党组织引领便民医疗服务优化升级。

3.“线上 + 线下”构建服务闭环。构建专属的交流社区，能够为医患沟通搭建便捷通道，促进病友之间相互帮扶。弥补了线下复诊存在的短板，帮助大家坚持实施规范治疗，优化自我养护工作，还能够拉近护患之间的联系亲密度，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完整服务模式。

（二）实践实施成效

1. 居民健康结局显著改善。执行个体化综合调理方案之后，研究显示多数人群骨密度数值出现了稳步上升的趋势，并且周身酸痛不适的感觉明显减轻，患者的身心状态、日常起居也得到了大幅度优化。

2. 服务规模与满意度双提升。开设骨质疏松特色专科门诊以来，接诊服务群众超 3800 人次；专属病友交流群长期跟进 156 名重点患者，建档随访的 500 多名病患，病情均实现平稳管控。当地居民对该病的了解程度与配合诊疗的积极性显著提升，送去了多封感谢信、多面致谢锦旗，真切认可一线诊疗服务，也夯实了群众对党组织的信赖，让医患连心、党群温情在健康帮扶中愈发浓厚。

3. 品牌效应与机构能力同步跃升：依托党建引领打造的本地骨质疏松特色管控样板，就是大家熟知的金骨棒服务模式，现已成型并具备全域复制推广价值，成为基层慢性病防控的优质标杆。这套机制打通三级诊疗联动链路，让就医转诊、健康管理高效落地。基层医疗机构借此夯实专科功底，精进科研思维，凝聚团队力量，同步完善人才梯队建设。党建深耕业务发展，抓实人才培育、队伍建设与文化深耕，真正做到党建业务相融共进、双向赋能提质。

四、经验总结与讨论

（一）基层慢性病治理的根本保障是党建引领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引导能力，以此更好地解决服务供给动力不足、医疗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以及治理机制衔接不流畅等问题。通过党组织实现统筹调度，进行资源整合与责任压实，构建具有凝聚力量的医疗队伍，联合社会多方力量，促使党建工作深入慢性疾病管理的全链条。

（二）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服务模式提高治理效能

凭借智能筛查技术，进行早期精准判断，与此同时，结合一人一档的专项档案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辅助开展线上线下管护相结合的服务模式，能够直击现实痛点，包括治疗依从性较低、健康认知薄弱问题。这一路径符合现代医学向着健康与预防管理方向转型，依据居民真实需求，实现深耕服务细节，能够以党组织领导筑牢制度根基。

（三）多方协同联动，确保体系运行通畅

确保体系运行通畅的基础，需要依托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实现下沉式帮扶，实现专业技术的支撑。依托基层家庭医生团队，能够实现扎根社区，承担了居民健康常态化管理的职责。联合制定的多元化服务力量，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健康管理闭环。多方协同联动，应该由党组织牵头，实现统筹协调，统一服务项目开展的标准，有效增强基层综合健康服务的能力。

（四）推动治理创新的关键动能是数字赋能

在系统构建应用期间，利用智能化、数字化的工具，显著提高了各个环节的实施效率和精准程度。在基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依托党组织，实现制度规范、统筹协调和优化流程，立足基层健康需求，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工具落地，真正实现数字赋能健康治理。

（五）健康服务中人文关怀不可或缺

需要基于规范化诊疗，通过暖心化服务和常态化沟通以及同伴互助的形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效增强患者在就诊期间的信心和治疗依从性。党员医护人员应该主动承担温情服务职责，在基层一线让党建为民、医疗惠民生根发芽。

五、结论与展望

党建引领执行的慢性病健康促进，其核心内容不只是对疾病的简单健康管控，更是持续全面增强全体群众健康素养和意识的深入优化 [4]。结合“金骨棒”项目的实践探索，逐步明确了党建在慢性病管理工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当然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停留在零散开展活动以及表面点缀的方面，应该深入制度化建设以及管理体系完善，推动常态化管理。未来的制度建设和系统性完善，需要聚焦痛点，实现精准发力，推动各项工作流程落地，发挥作用。

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心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健康治理体系的完善构建。在体系完善建立期间，需要强化政治引导，夯实治理的根基。慢性病防控工作将纳入基层党组织议事决策的核心内容，在党建工作整体规划布局中，要纳入健康相关工作 [5]。执行期间，依托党建联建共建以及主题党日等载体，组织乡镇、社区、机关单位、企业和各类社会群体整合优质资源，实现多方合力，共同构建大健康治理的新格局，为慢性病健康工作优化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俊，王晓雯，李红．党建引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管理中的实践与探索 [J]. 中国全科医学，2023,26(13):1557-1561.

[2] 刘惠琳，张含之，王丽萍，等．基于“医院 - 社区 - 家庭”三级联动的骨质疏松症管理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J].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22,16(05):314-319.

[3] 姜综敏，魏晓敏，丁园．健康促进医院评价指标体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用研究 [J]. 上海预防医学，2021,33(08):677-681,686.

[4] 桑晓璇，米峰庆．筑牢红色堡垒护航百姓健康——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 [J]. 健康中国观察，2025(11):65-67.

[5] 周美红，朱月莲，董丽娟．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建设的思考 [J]. 党政论坛，2023(03):56-58.

（作者单位：上海市奉贤区金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家政服务站嵌入医养结合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以江苏盐城为例

陈　敏*　周梅香

摘要：从社区公共养老服务供给视角出发，对江苏盐城医养结合与家政服务相关政策文本、公开的统计数据及信息进行梳理分析，呈现家政服务站嵌入社区医养结合的运行状况与主要瓶颈。集中呈现为服务供给仍以生活照料为主，医疗护理、康复支持与慢病随访等连续照护环节衔接不足；复合型照护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薄弱，家政队伍专业化与基层医疗协同不畅；平台化调度提升触达效率，但跨主体数据标准与共享规则不完善、责任边界不清，制约风险预警、质量追踪与监管闭环。现从空间嵌入、人员协作与技术互操作三维度提出相应治理要点，并配套政策协同、人才培育、绩效治理与资源配置等保障安排。

关键词：家政服务站；医养结合；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养老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 亿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超 15%，较上一年均有所增长 [1]。作为江苏省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盐城市的养老压力尤为突出，截至 2024 年末，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52.92 万，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30.12%[2]。在此背景下，国家层面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加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协同增效”提出了更明确的政策指向 [3]。

在地方实践层面，社区端承接居家照护需求的压力上升，能够连接家庭与社区资源，并具备上门服务组织能力的末梢单元日益关键；以家政服务站为载体的“家政 + 医养”因此成为推进社区医养结合的重要路径之一。然而，当前研究与实践仍存在显著缺口。一方面，家政服务与医疗资源的衔接机制尚未健全，服务内容多停留在生活照料层面，缺乏专业化的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医疗支持；另一方面，行业面临职业化水平低、人才结构失衡（如养老护理员工资水平低、职业歧视严重）、信用体系缺失等系统性问题，制约了服务质量的提升 [4]。

在上述人口结构压力与政策导向叠加的情形下，盐城家政服务站在医养结合推进过程中暴露出三类结构性短板：一是服务供需错配，基础生活照料相对充足而医疗护理、康复与慢病管理等专业服务供给不足，连续照护链条难以形成；二是人才与资源瓶颈，照护队伍以低技能劳动为主、职业激励与分层培养不足，叠加基层医护下沉受限，专业支撑力量薄弱；三是技术支撑不足，平台功能偏向派单与登记，跨主体数据互通与过程监管链条不完整，影响风险预警与质量追踪。针对上述问题，构建“空间—人员—技术”三维整合的实施策略框架：空间维度回应“服务在哪里与如何触达”，人员维度回应“由谁提供与如何形成连续照护能力”，技术维度回应“如何协同与如何监管”，并在此基础上配置相应保障机制以提升可持续性（见图 1）。

图 1 “空间—人员—技术”三维服务模式

一、基于“空间—人员—技术”的整合路径

（一）嵌入式空间与分级网络：破解“可达性不足与连续照护断裂”

空间载体的适配性是医养服务下沉社区的基础。盐城家政服务站可采用“小规模、多功能”的嵌入式空间模式，在老旧小区内改造闲置公共空间（如社区活动室、底层商铺），设置包含日间照料、临时托养、

基础医疗咨询功能的服务单元。这种设计的核心优势在于占地面积小、改造成本低，能快速嵌入高密度老旧小区，解决传统养老机构“选址难、建设周期长”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需构建“街巷级照料中心—区域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的多层次空间网络。盐城可在每个街道设置 1 个区域服务中心（配备全科医生诊室、康复理疗室），在 3~5 个相邻小区联合设立 1 个照料中心（提供 20 张临时托养床位）。这种网络化布局既能满足日常照料的便捷性，又能通过区域中心实现医疗资源的集中调配，提升服务专业性。

（二）跨专业队伍与能力链条：应对“复合人才不足与医护下沉受限”

盐城市在推动医养结合服务过程中，应将高校资源与行业实际紧密结合，着力构建跨专业团队，既解决人才来源不足的问题，又提升现有队伍的整体素质。一方面，可以与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盐城工学院等本地高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护理学、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健康管理等学科中开设医养结合方向的课程或特色班级，形成“学历教育 + 岗位实训”的一体化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实习基地建设与定向委培，培养具备医学护理、康复指导、心理疏导等复合能力的“医养双能”人才，为盐城市医养结合服务提供稳定的人才输入。

另一方面，应注重在岗人员的能力提升，针对当前盐城市养老护理员普遍以生活照料为主、专业化水平不足的现状，鼓励家政服务站、养老机构与本地高校开展联合培训。通过“订单式”进修班、夜校课程、线上学习平台等形式，为在岗人员提供系统化、层级化的继续教育，重点补齐失智照护、慢病管理和情绪关怀等短板。高校教师与临床医生可直接参与培训与考核，既提高培训质量，也增强从业者的专业认同感和职业自信。这样既能为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也能推动现有人员由“生活照料型”向“专业照护型”转型，逐步提升盐城市基层医养结合团队的整体水平。

（三）数字互操作与过程监管：补齐“平台单一与数据孤岛”短板

技术赋能是提升服务效率的关键路径。构建盐城家政服务站智慧管理平台，实现“需求感知—资源调配—服务交付—效果监测”的全流程线上化。平台核心模块设计具体分为三个模块。一是一键呼叫模块：配备带定位功能的智能手环，支持方言语音交互并达到可用的识别准确度（以满足紧急呼叫与高频指令识别为目标），呼叫信息自动同步至区域服务中心调度系统 [5]。二是 AI 智能派单系统：基于位置、技能标签与服务评价的规则 / 模型联合派单机制。三是健康监测模块：对接智能床垫（监测心率、呼吸）、远程血糖仪等设备，实时上传数据至平台，异常值自动触发家庭医生预警，系统自动推送提醒至家庭医生手机端，实现风险早发现。

此外，引入需求识别与标签化工具（将模糊需求转化为可执行服务项），解决老年人需求表达模糊的问题，将“打扫一下”“身体不舒服”等模糊表述转化为具体服务标签，如“厨房重油污清洁 + 卧室浮尘擦拭”“头晕症状 + 血压测量需求”，提升服务匹配精准度。平台还需整合“家政信用查”App 功能，实现服务人员背景审查、服务记录可追溯，增强用户信任度。

二、保障机制

家政服务站医养结合要稳定运行，关键在于把公共服务供给目标落到可执行的制度与过程管理上。针对供需错配、复合人才不足、信息协同与监管闭环薄弱等短板，保障机制应同时覆盖：跨部门协同与规则供给、人才职业化与能力补齐、质量监管与绩效约束，并以资源配置和数字支撑提升服务可达性与连续性。基于盐城市家政服务与养老服务的现实需求，结合国内先进经验与学术研究成果，从政策协同、人才培育、绩效评估三大核心维度展开，补充资源配置与技术支撑体系，形成闭环式实施框架 [6]。

（一）政策协同：跨部门协作机制与规则体系

政策协同是公益性医养服务持续供给的基础。盐城市可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治理架构，推动民政、卫健、商务、人社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统筹社区养老与家政资源，并将医养结合相关任务纳入民生规划与财政支持范围。围绕平台建设、人员培训、示范点建设等环节，可采取专项支持与项目化投入，增强政策落地的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应强化规则体系与标准化供给，形成可操作的责任边界与监管依据。可推动地方层面的服务项目清单、服务流程与记录规范建设，完善服务规范与岗位能力要求，使服务供给、转介衔接与质量抽检具备可量化的依据。对供给方式，可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服务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明确服务对象、支付方式、绩效约束与风险分担条款；社会力量参与可采取委托运营、合作服务等方式稳步推进，原则上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市场化补充为辅，避免因责任不清或绩效约束不足影响公益性目标的实现 [7]。通过“政策引领—规则固化—协同执行”的路径，提升跨部门协作的稳定性与可追溯性。

（二）人才培育：分层分类培养与产教融合

人才是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提升的核心变量。针对盐城市家政服务人才结构单一、专业化不足的现实问题，应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家政服务人员先取得基础职业资格证书，再通过培训获得医养结合相关专项能力证书，如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心理疏导、智能设备操作等，通过“多证融合”，推动从业人员由技能型向复合型转变。

在此基础上，构建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政府可牵头，联合地方高校、职业院校及家政企业共建“医养结合实训基地”，实现课程标准与岗位需求的对接。建立“学分互认”与“实岗考核”制度，将医养技能培训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鼓励高校设立医养结合方向课程群，形成从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到岗位实践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此路径，不仅提升从业者职业吸引力，也为行业持续发展注入高质量人力资本。

（三）绩效评估：建立“双指标＋三维管控”评价体系

绩效评估是保障家政服务站医养结合模式高质量运行的重要抓手。盐城市可构建以“服务质量与社会效益”为核心的“双指标”评价体系，将量化数据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形成全过程动态监管机制。服务质量侧重响应时效、老年人满意度、医疗协同与平台使用等过程指标；社会效益则侧重就业带动、社区互助、健康改善及补贴使用效率等综合效果。

在管理机制上，盐城市可建立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为主体的“三维管控”模式。政府依托信息化平台开展全过程可视化监管与绩效考核；行业组织与企业建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和服务质量分级，推动优质优价；引入第三方评估与公众参与，将用户体验纳入考核，提升结果客观性与公信力。通过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的管控模式，能够实现从“事后评估”向“过程监控”的转变，推动家政服务站医养结合模式在制度化、标准化与科学化方向上持续优化，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绩效管理经验，为地方医养融合治理提供范本。

（四）资源配置与技术支撑：动态调度、互联互通与合规治理

家政服务站医养结合模式的落地实施离不开科学的资源配置与技术支撑。在资源配置方面，可建立以需求台账与服务记录为基础的动态调度机制，综合辖区老年人口分布、健康状况与服务需求变化，对人力、物资与专业支持资源进行相对精准的配置与响应，提升供给弹性与服务连续性。在技术支撑方面，则以“可用、可控、可监管”为原则。盐城市可推动以市级平台为枢纽的业务协同，优先完善派单调度、服务记录、回访评价、风险提示与质量追踪等核心功能；跨主体共享以统一数据字典、接口标准与授权规则为前提，循序推进必要的信息互通，减少重复登记，避免信息滞后。对智能派单、需求识别、风险预警等功能，可在示范点先行探索；同步落实最小必要数据、分级权限、授权使用与责任留痕等要求，守住隐私与安全底线，逐步提升监管可视化与服务精细化水平。

三、总结与展望

盐城案例表明，家政服务站作为社区末梢供给单元，在居家照护场景中具备较强的触达与组织优势，但其医养结合成效取决于连续照护链条能否在社区端实现制度化衔接。现阶段的主要约束集中体现为三类结构性短板：服务供给结构偏向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支持与慢病随访等专业环节承接不足；复合型照护人才供给与激励机制薄弱，家政队伍专业化与基层医疗协同存在瓶颈；数据标准、共享规则与责任边界不清，使风险预警、质量追踪与监管闭环难以稳定运行。上述发现说明，社区端医养结合的关键难点不在于“是否叠加服务项目”，而在于“能否形成可运行、可追溯的协作结构”。

围绕上述约束，本文提出了以“空间嵌入—人员协作—技术互操作”为主线的整合路径：空间维度强调站点嵌入与分级网络，为服务可达性与转介承接提供组织载体；人员维度强调跨专业队伍与能力链条，支撑从需求评估到随访管理的连续服务；技术维度强调互联互通与过程监管，使服务记录留痕、风险识别与质量改进具备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政策协同、人才培育、绩效治理与资源配置等保障安排共同指向公益性供给目标的落实，即在公平可及性与质量安全性的前提下提升社区医养服务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后续研究与实践可从三方面深化：第一，进一步细化家政服务站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协作边界与转介规则，推动服务从“碎片化供给”向“连续性照护”转型；第二，围绕分层分类培养与职业化激励，完善复合型照护人才的“培养—认证—使用—留用”闭环；第三，稳步推进平台功能由派单登记向记录留痕、风险预警与质量追踪扩展，形成可监管、可评估的过程治理体系。本研究主要依托政策文本与公开资料进行机制梳理，尚难对服务绩效、成本效果与个体健康结局作出严格识别，未来可在获得更充分的一手数据基础上开展跨地区比较与效果评估，以增强结论的可验证性与外推性。

参考文献

[1] 王萍萍.2025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40489 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EB/OL].(2026-01-19)[2026-02-28].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2] 吴启飞.“盐城家政”助推康养产业提质扩容 [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25(04):20-21.

[3] 聚焦“十五五”规划建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 [EB/OL].(2025-11-30)[2026-02-28].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1/content_7049923.htm?utm_source=chatgpt.com.

[4] 马福云.我国城市社区医养结合的创新实践与优化策略 [J].人民论坛,2025(10):52-57.

[5] 周露,吴少龙.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思考 [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5(10):178-180.

[6] 赵浩华,郭磊.我国社区养老资源配置何以有效 [J].税务与经济,2025(05):96-103.

（下转 49 页）

高职院校党建宣传提质增效的实践探索
——以海报宣传为例

何乐为　金　典

摘要：在智慧党建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党建宣传工作面临着任务频繁、时效性强与人员专业化不足的现实挑战。党建海报作为基层党建宣传的重要载体，其制作效率与传播效果直接影响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本文基于高职院校党建宣传工作实践，以党建海报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与问卷调研，系统梳理当前党建宣传中存在的制作效率不高、传播吸引力不足、审核压力较大等主要问题，重点探讨通过流程优化、工具整合与机制完善实现党建宣传提质增效的可行路径。研究表明，通过重构宣传工作流程、引入模板化与数字化工具、健全内容审核与协同机制，可显著提升党建海报制作效率与视觉传播效果，同时有效保障政治规范性与内容准确性。本文的研究为高职院校基层党建宣传工作的优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党建宣传；海报设计；提质增效；智慧党建

一、引言

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指引下，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不断向信息化、规范化和精准化方向发展。党建宣传作为凝聚思想共识、强化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其内容呈现方式和传播效率直接关系到党建工作的吸引力与实效性。相关研究指出，基层党建宣传在方式创新与实际效果之间仍存在一定落差，需要通过机制与路径优化加以破解[1]145。随着学生群体媒介使用习惯和审美取向的变化，传统以人工制作为主的党建海报逐渐暴露出制作周期长、视觉形式单一、传播效果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高频次、多场景的党建宣传需求[2]。

在智慧党建理念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探索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党建宣传方式[3]。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载体创新和方式创新，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4]。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平台建设或总体路径分析，对基层党建宣传具体工作流程、操作机制和实践成效的系统研究仍相对不足[5]73。基于此，本文立足高职院校党建宣传一线实践，以党建海报制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如何在确保政治规范和内容准确的前提下提升宣传效率与传播效果”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力求为基层党建宣传工作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实践路径。

二、高职院校党建海报宣传的实践基础与提升方向

（一）宣传任务集中多元，制作流程需进一步协同

高职院校党建宣传任务具有时间节点集中、主题类型多样的特点，如重要节日纪念、主题教育、党员实践活动等，往往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宣传物料设计。为更好地适应基层党建宣传工作的实际需求，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宣传素材统筹、设计流程协同与模板资源建设，提升党建海报制作的响应速度和整体效率。

（二）视觉表达形式需优化，传播吸引力有待提升

党建海报不仅承担信息传达功能，也承担价值引领和文化浸润功能。面向青年学生党员群体，宣传设计应更加注重版式构成、色彩搭配、图形语言与校园文化的融合表达，增强视觉辨识度和内容感染力，使党建宣传内容更加贴近青年学生的审美习惯和接受方式，提升传播效果。

（三）内容规范要求明确，审核机制需更加高效

党建宣传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对政策表述、标

（上接 48 页）

[7] 王明吉，孙星 .PPP 模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选择 [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9,28(17):76-81.

（作者：通信作者陈敏，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盐城市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智库〉专任教师兼办公室干事、助教；周梅香，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盐城市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智库〉宣传部部长兼学院院长、教授）

识使用、内容导向和价值传递均有较高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应进一步强化内容生成、设计制作与审核把关之间的衔接，建立更加规范的审核流程、素材标准和校对机制，在保障政治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的基础上，提高党建宣传工作的整体效率。

三、党建海报宣传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

围绕高职院校党建宣传工作中暴露出的现实问题，结合基层党建工作的运行特点与实际条件，需要从整体上对党建海报宣传的工作流程、工具支撑与运行机制进行系统优化。实践表明，单一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流程再造、工具整合和机制完善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才能实现党建宣传工作的提质增效。

（一）重构党建海报宣传工作流程

在传统党建宣传实践中，海报制作往往呈现出“临时布置—被动应付”的工作状态，前期需求不清晰、后期修改频繁，导致整体效率偏低。相关研究指出，通过流程再造和职责清晰化，有助于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整体运行效率[1]146。因此，有必要对党建海报宣传流程进行系统梳理和优化。

结合高职院校党建工作实际，可将党建海报宣传流程优化为“需求明确—内容制作—审核发布”三个阶段。在需求明确阶段，由党支部或相关职能部门提前明确宣传主题、目标受众和使用场景，对宣传重点和基本呈现形式达成初步共识，避免在制作过程中频繁调整方向。在内容制作阶段，围绕既定主题进行版式设计与信息整合，通过标准化模板和模块化内容结构，提高制作效率并保持整体风格统一。在审核发布阶段，依托分级审核机制，对宣传内容的政治导向、文字表述和视觉规范进行把关，确保宣传成品既符合规范要求，又具备较好的传播效果。

（二）引入模板化与数字化制作工具

在确保党建宣传政治属性和价值导向不变的前提下，合理引入模板化和数字化制作工具，是提升党建海报制作效率的重要途径。实践表明，模板化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设计工作的技术门槛，使基层党建工作人员在缺乏专业设计背景的情况下，也能较快完成规范、美观的宣传作品。

具体而言，可围绕党建宣传的常见主题类型，如重要节日纪念、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实践活动等，提前设计并整理一批版式规范、风格统一的基础模板。在实际应用中，党建工作人员只需根据具体活动内容对文字信息和局部元素进行调整，即可快速完成海报制作。这种方式既避免了完全依赖个人经验进行设计带来的不稳定性，也有助于保持党建宣传整体形象的一致性和规范性。

（三）健全协同与审核运行机制

党建宣传内容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规范性要求，任何表述不当或元素使用错误，都可能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在追求宣传效率提升的同时，必须同步强化内容审核和运行保障机制。中央和高校层面均明确强调，要严格把好党建宣传的政治方向和内容导向关[5]72。

在实践中，可建立由“制作人员—支部负责人—党委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审核机制。制作人员负责初步内容整理和形式呈现，支部负责人重点审核内容是否准确反映活动主题和实际情况，党委职能部门则从整体政治导向和规范要求角度进行把关。通过明确各环节职责边界，既能有效防范宣传风险，又能避免因层层审批导致工作效率下降，从而实现规范性与效率性的有机统一。

四、实践案例分析

为更直观地呈现党建海报宣传提质增效路径的实际成效，本文选取某高职院校党员实践活动宣传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该校党员实践活动具有参与主体多、宣传节点密集、传播对象以青年学生为主等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案例背景与宣传需求分析

该校党员实践活动通常围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和主题教育展开，活动周期相对集中，前期需要完成动员宣传，中期需要展示活动进展，后期还需对成果进行集中呈现。以往在宣传实践中，受制于人员配置和工作方式，党建海报制作多以临时安排为主，缺乏整体规划，往往出现宣传启动较晚、内容呈现仓促等情况，影响了活动的整体传播效果。

从受众角度看，参与和关注该类活动的主体以青年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为主，其信息获取主要依赖线上平台，对视觉呈现和信息清晰度要求较高。如果宣传内容形式单一、版式陈旧，容易被忽视，难以发挥应有的动员和引导作用。因此，提升党建海报的制作效率和传播效果，成为该校党员实践活动宣传中的现实需求。

（二）具体实施过程与做法

在总结以往宣传经验的基础上，该校在本次党员实践活动中，对党建海报宣传工作进行了系统调整。首先，在活动启动前即同步部署宣传方案，由党支部牵头明确宣传主题、时间节点和基本呈现要求，将宣传工作前移，避免活动开始后再集中制作宣传物料。

其次，在海报制作过程中，统一采用标准化模板和模块化内容结构。模板中提前设置好标题区、正文区、图片区和落款区等基本模块，党建工作人员只需根据具体活动内容进行信息填充和局部调整，即可完成海报制作。这一做法有效减少了反复修改版式所耗费的时间，也保证了不同批次宣传海报在整体风格上的一致性。

最后，在审核环节中，实行分工明确的协同机制。制作完成后的海报先由支部负责人进行初审，重点核对活动信息和文字表述是否准确；随后提交党委相关职能部门复核，重点审查政治导向、标识使用和整体

规范性。通过前后衔接、职责清晰的审核流程，既保证了内容安全，又避免了多头审核造成的效率下降。

（三）宣传成效与实践效果评估

从实际效果看，本次党员实践活动宣传在整体效率和传播效果上均较以往有明显改善。在效率方面，党建海报的平均制作周期显著缩短，能够在活动关键节点前及时发布，有效增强了宣传工作的计划性和前瞻性。

在传播效果方面，优化后的党建海报在版式设计和信息呈现上更加清晰直观，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对活动信息的关注度明显提升。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后，相关宣传内容的阅读量和互动反馈均有所增加，部分学生在反馈中表示，海报内容“重点突出、信息清楚”，有助于快速了解活动安排。

（四）与以往宣传方式的对比分析

与以往依赖个人经验进行零散设计的宣传方式相比，本次实践更加注重整体流程和规范化操作。一方面，模板化和流程化的宣传模式降低了对个别工作人员能力的依赖，使党建宣传工作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提前规划和统一标准，也减少了因临时调整带来的重复劳动，有效缓解了基层党建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综合来看，该案例表明，在不改变党建宣传政治属性和价值导向的前提下，通过流程优化和规范化运作，可以显著提升党建海报宣传的实际成效，为高职院校类似党建活动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成效评估与问题反思

在党建海报宣传实践路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对相关成效进行系统评估，并对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进行理性反思。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梳理和基层党建工作人员的反馈分析，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党建宣传提质增效的现实意义与改进方向。

（一）对党建工作规范化运行的促进作用

通过流程重构和模板化运作，党建海报宣传逐步由以往依赖个人经验的零散操作，转向相对规范、可复制的工作模式。这种转变有助于推动党建宣传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运行。一方面，明确的流程分工使党建宣传各环节职责更加清晰，减少了因责任不明导致的推诿或重复劳动；另一方面，统一的版式规范和内容结构，有助于在不同党支部、不同活动之间保持宣传风格的一致性，增强党建工作的整体形象。

在实践中，规范化运作还有效降低了宣传失误的发生概率。通过设置必要的审核环节和标准要求，党建海报在文字表述、标识使用和内容导向等方面更加严谨，有利于维护党建宣传应有的政治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不仅提升了宣传质量，也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对党建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

（二）对基层党建队伍能力建设的积极影响

党建海报宣传方式的优化，对基层党建队伍能力建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往，部分党建工作人员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主要原因在于设计能力不足、制作流程复杂。通过引入规范化流程和易操作的制作方式，党建工作人员能够更加从容地完成宣传任务，从而提升参与党建宣传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党建工作人员逐步积累了宣传策划、信息整合和内容审核等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推动其从单纯的事务执行者向综合型党建工作者转变。这种能力提升不仅体现在具体宣传任务中，也对党建活动的整体组织和管理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

（三）实践中的局限与改进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党建海报宣传提质增效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在实际操作中，模板化运作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形式相对固化的问题，若缺乏适当调整，容易削弱宣传内容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此外，不同党支部在人员结构和工作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宣传路径的推广应用仍需结合具体情况加以灵活调整。

因此，后续实践中应在坚持规范化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优化流程，使党建海报宣传更好地服务于党建工作整体目标。

六、结论

党建宣传提质增效并非单纯依赖某一具体技术，而是一个涵盖工作流程、工具应用与治理机制的系统工程。高职院校在党建海报宣传实践中，通过流程优化、模板化工具引入与审核机制完善，可以在确保政治规范和内容准确的前提下，有效提升宣传效率与传播效果。本文的实践表明，立足基层实际、注重方法整合，是推动高职院校党建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李峰英 .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创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37(18):145-146.

[2] 徐凯歌 . 新时代高校党建宣传工作的创新路径探析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06):98-102.

[3]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 搭建智慧平台，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效能 [EB/OL].(2025-10-14)[2026-01-13].https://www.zyshgzb.gov.cn/n1/2025/1014/c461088-40581889.html.

[4] 中共中央组织部 .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EB/OL].(2021-04-22)[2026-01-13].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104/t20210422_527716.html.

[5] 王朝歌 . 高校党建宣传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09):72-76.

（作者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大学）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县域模式构建研究
——以 DZ 市为例

谷劲松　姜　华　陈甜妹

摘要：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背景，以 DZ 市为调研对象，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探究县域家庭教育指导“顶层设计—基层落实”模式。通过两次实地调研发现，DZ 市已构建“家校社企政”协同框架，但存在家长认知不足、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研究提出，高校可通过微观个案服务、中观工作室建设、宏观政策倡导三维赋能，完善县域家庭教育支持体系。该探索为摆脱家庭教育结构性困境、推动基层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县域模式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家教家风建设。2015 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论述，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县域作为国家政策落地的重要基层单元，其在家教家风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能为家庭教育领域研究提供最直接、最丰富的案例支撑。基于此，课题组以 DZ 市为调研样本，对该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开展了系统调研，旨在研究高校在家庭教育指导县域支持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为其科学构建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案例。

二、我国目前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

自古以来，家庭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就占据相当的比重。历史上，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孔子的《论语》、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北宋司马光的《家范》等均被视为家庭教育的经典。据此，我国古代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到了近代，人们所熟知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著作也证明了家庭教育在塑造人格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步加深，但作为支撑教育体系一角的家庭教育却面临着发展的困境。众多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丛晓波、刘鑫文（2019）[1] 指出，一是结构性难题。“结构性”指的是家庭及家庭教育之于个人与社会系统中的关系互动性。二是文化性冲突。基于“中国问题”的我国社会转型期开始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三是经验性贫困。即教育总是以教育者对教育者的影响及受教育者的改变为基本特征和过程而进行的生命传递。曾守锤、章兰根（2008）[2] 总结实践层面面临的四大困境：一是家庭教育资源匮乏，包括教育信息普及程度亟待改善、专业指导服务体系没有形成；二是教育期望两极分化，部分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导致孩子面临身心压力，另一部分家长则缺乏教育意识而对孩子教育方面的关注不足；三是家长教育能力不足，导致许多家长面对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内容以及心理需求时，缺乏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法与沟通技巧；四是家校沟通主动性欠缺，国家层面虽提出了相关建议，但未能及时落实。在家庭教育困境的归因研究中，周怡廷、刘永贤（2015）[3] 总结了家庭教育方式、家庭教育内容、家庭教育环境三个层面的问题。教育方式上，家长强加自己意愿于孩子，部分家长教育孩子仍靠打骂而非有效沟通。教育内容上，重智育轻德育，一味强调分数但忽视人格培养。教育环境上，政府倡导与实践层面脱节，落实教育公平仍有完善空间。

基于以上问题，结合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探讨自上而下即“顶层设计—基层落实”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势在必行。

三、调研地点介绍

DZ 市，河北省辖县级市，位于河北省中部，2013 年 6 月被确定为第一批省直管县（市）体制改革试点县。同时，作为京津冀经济区重要节点城市，该市也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此外，该市在教育方面也有着较为深厚的积淀。中国近现代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于 20 世纪 20 年代积极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6 年在如今的该市乡村开始平民教育实验，因其倡导的方式适合农民特点，使得当时的该市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无文盲县。其时，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他遂提出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个方面结合并举的农村教育改造方案。其中，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为青少年，传授他们所需的基本知识；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为群众及团体，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向其传播知识；家庭教育是指将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横向联系起来进行的教育。这种教育形式与当前国家家庭教育指导政策中倡导的“家校社”协同教育模式相得益彰，可以被视为当前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参考之一。

四、调研情况

围绕家庭教育相关研究主题，课题组分两个阶段开展了调研工作。

第一次调研聚焦情况摸底与需求了解，重点推进了两项任务：一是实地探访当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同时了解该地区家庭家教家风落实情况；二是走访 DZ 市妇联，学习妇联基层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经验并召开座谈会，了解流动留守儿童家庭尤其是困境家庭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实际需求。

在第二次调研工作中，团队聚焦家庭教育需求，深入 DZ 市 C 村开展实地探访。团队对参与活动的家庭进行了家庭教育需求调研，之后以专业社会工作形式开展活动，帮助家长树立起与孩子平等沟通、有效倾听的正确观念，旨在提升家长的科学家庭教育意识，帮助家长熟悉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沟通技巧与教育方法。

五、县域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该理论强调了环境的动态性和个体在环境中的主动性，并将个人所处的脉络划分为四个层次的系统：最核心的一层称为微系统，是与个体具有最直接关系的人、事、物，如家庭；第二层是中间系统，是与个体有着密切关系的微系统间所形成的系统，如家庭和学校间的关系；第三层是外部系统，是能影响到个体或家庭生活但联系却并不紧密的系统，如社区；第四层是宏观系统，包括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各个系统之间是开放的 [4]。

（二）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源于“社会病原学”，最早强调的是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之后该理论被广泛运用在不同的研究领域。目前，我国社会中社会支持的主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由政府主导或者正式组织主导；二是由社会专业人士或者民间组织提供；三是由社区主导；四是个人网络提供 [5]。

六、基于上述两个理论的 DZ 市家庭教育指导政策的基层落实情况

（一）宏观系统：政府与制度的支持

DZ 市妇联积极贯彻党和国家有关家教家风建设的文件精神，编制了《DZ 市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 年）》，持续开展“家庭教育进万家”社区专场系列活动。同时，为引导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妇联与该市法院联动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在少年审判专门合议庭启用“少审法官 + 妇联干部 +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家庭教育指导新模式，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全方位的家庭教育指导。

（二）外部系统：各级各类倡导家庭家教家风组织的建立

在家庭教育指导的基层落实过程中，DZ 市还注重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通过打造阵地，用“1+11+N”构建立体式家教指导体系，积极推进家长学校建设，形成了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家庭教育服务网络。这使得家庭教育指导得以深入基层、贴近群众。

值得一提的是，在 DZ 市妇联的指导下，该市“新时代幸福家庭共建促进会”于 2019 年成立。促进会成员既包括熟悉家庭教育政策的人士，也有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专业人士，同时还包括可以提供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该组织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担了许多市、镇妇联的有关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家教家风建设的项目，对该市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的建立起到了一定支持作用。

此外，在市委宣传部、市妇联、下属镇党委、镇政府的指导下，2020 年，DZ 市“家教家风传承馆”落成。该馆的创始人为当地闻名的企业家，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弘扬家教家风对品格养成的重要性。

以上各类组织可被视为社会支持里面提到的“由社会专业人士或者民间组织提供”的支持。此类组织面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使人民群众最直观地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方向，同样也能够搜集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感受以及诉求，从而推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调整。

（三）中间系统：学校

DZ 市教育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多措并举推动家庭教育工作良性发展。通过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文件，对学校实施家庭教育工作进行全面说明和指导，提升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这种顶层设计的明确举措，为家庭教育指导的基层落实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四）微系统：家庭

DZ 市还注重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性。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展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等方式，增强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

七、高校在县域家庭教育指导层面的作用

基于对DZ市现有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调研分析，课题组计划与DZ市相关部门及乡镇深化合作，将“家校社企政”协同体系中的“校”升级拓展至高校层面，依托高校专业资源与人才优势，构建更具专业性、系统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

（一）高校的优势

课题组成员的学科背景以管理学和社会工作为主，服务过的人群包括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等，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此次调研中，团队成员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找出了参与活动家庭的共性需求，提出了工作方案；之后运用个案方法为家庭教育需求强烈的家庭制定并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同时，运用相关理论，让每个家庭看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为后期有针对性地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做铺垫。同时，面对留守妈妈群体，课题组与在场的乡镇领导一起探讨了链接相关资源的方式。

（二）高校的作用

1. 微观层面：针对个人提供个案和小组服务

家庭内部的互动失衡、教育观念分歧等，均可能导致家庭教育模式产生偏差。对此，高校社工专业教师与学生团队可运用个案工作技巧，通过家庭治疗、沟通训练等专业方法，调整成员间的互动模式，为建立良好的家庭教育模式奠定基础。针对存在同类教育困扰的家庭，可开展小组工作，组织成员围绕“亲子沟通技巧”“情绪管理”等议题分享经验、互助成长，在群体支持中营造积极的家庭教育氛围。

2. 中观层面：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

社区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场所，与儿童、青少年及家长的联系最为紧密，蕴含丰富的可挖掘资源。高校可牵头依托社区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将其打造为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资源对接的核心阵地：一方面整合社区资源，满足社区家庭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融入社区指导服务，定期开展家庭教育讲座、亲职教育沙龙等活动，提升家长的科学教养能力。此外，高校可以联合妇联、相关教育部门等共同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专家资源库，为社区提供稳定的人力支持，形成“需求—资源—服务”的闭环体系，全面提升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水平。

3. 宏观层面：加强政策宣传倡导和落实

社会工作者兼具“政策倡导者”角色，针对当前家庭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高校社工专业可发挥研究优势，为家庭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推动政策落地实施；同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指导，积极整合协调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的相关工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乃至减少家庭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可从两方面推进：

（1）完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

实践表明，高效、适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因此，可以考虑根据国家相关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建设，如依托社区资源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借鉴全国各地的相关经验。

（2）设立家庭—社区—学校联动模式

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深度融合：在“家校合作”维度，促进家庭与学校常态化沟通，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形成教育共识；在“家社协同”维度，充分激活社区在家庭教育中的支持作用，通过社区活动延伸家庭教育场景；在“社校联动”维度，实现资源共享共赢——学校可为社区提供教育资源与活动策划支持，社区则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同时丰富社区建设内涵。

八、结语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国家近年来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其在县域层面的落实成效直接关系到相关政策的落地质量与民生改善程度。经调研，DZ市实施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为县域家庭教育指导实践做出了有益尝试。然而，该模式落地过程中仍面临资源整合不足、专业力量薄弱、服务覆盖不广等现实挑战。对此，高校凭借其在专业人才储备、跨学科研究能力及实践服务经验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成为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力量，为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向基层深度延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丛晓波，刘鑫文．转型期我国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139-144.

[2] 曾守锤，章兰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若干特点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启示意义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04):31-35.

[3] 周怡廷，刘永贤．从《虎妈猫爸》看我国家庭教育问题及启示 [J]. 人才资源开发，2015(12):228-229.

[4] 杨慧勤，赵列．缺失与弥补：欠发达农村失母儿童的教育困境与出路——基于贵州省F县的个案分析 [J]. 宜宾学院学报，2019,19(09):9-18.

[5] 卞小莉．高校心理育人家校社协同机制的困境与应对——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 [J]. 教育探索，2025(09):39-4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中华女子学院2024年校级课题“社区治理视域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研究——以北京市某街道为例”（ZKY204020210）。

（作者：谷劲松，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姜华，民政职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讲师；陈甜妹，北京互联社会组织资源中心中级社会工作师）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职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困境与对策

——以四川省某医学高职院校为例

莫洁雲　何　淼　赵杰灵

摘要：在“健康中国”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基层健康服务体系急需大量专业化、本土化的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阵地，在人才培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其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面临规模不大、课程脱节、师资力量薄弱等系统性困境。本文以四川省某医学高职院校为案例，通过分析其人才培养的必要性、现状与具体困境，从构建“校—地—医—产”协同平台、重塑“理论—实践”课程体系、打造“双向赋能”师资队伍三个维度，提出可操作性的培养模式与优化路径，以期为高职健康社会工作人才的高质量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健康中国”；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高职院校；

“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使健康服务从以疾病治疗为核心的传统医疗模式，向覆盖生理、心理、社会、精神四大维度的全人健康服务体系转变。健康社会工作作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延伸与升级及整合医疗资源与社会支持的专业力量，在实现全人群、全周期健康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64。

高职教育以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核心使命，其培养的人才是弥补基层健康服务短板、推动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关键支撑。然而，其在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四川省某医学高职院校为例，通过分析健康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人才培养现状与困境，探索适应地方需求的高职院校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

一、健康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健康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是落实国家健康战略的刚性要求，也是回应全人群健康需求、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与专业化的必然选择。

（一）政策驱动：国家战略与制度保障的刚性要求

健康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与国家顶层设计保持同频共振。自《“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印发并实施以来，健康社会工作被逐步纳入国家健康治理体系。《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将“医务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制度”列为医疗机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三级医院设立社工部门并配备专职人员。《“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及各地相关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职业院校在医务社工培养中的作用，形成“政策引导—考核约束—人才支撑”的完整支持链条，凸显健康社会工作在国家健康战略中的地位与发展必然性。

（二）需求回应：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的现实诉求

全人群健康需求的多元化与复杂性，使得健康社会工作的刚性需求持续增长。从人群维度看，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老年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需求激增，按“每 300~500 张医院床位配 1 名社工”标准，我国三级医院需要至少 7400 名医务社工，加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机构的需求，全国专业人才缺口超 5 万人，健康社会工作人才缺口显著[2]14；从生命周期维度看，健康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已广泛覆盖生命全过程，每个阶段都存在专业服务需求[3]78。此外，需求与供给也存在地域不均，如四川省泸州市老龄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作为川南多民族聚居地，存在独特的健康沟通与健康公平需求。健康社会工作通过下沉服务、资源对接，能够有效回应此类本土化、多样性的健康公平诉求。

（三）专业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的内在逻辑

健康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从本土化角度看，谭卫华等（2025）指出，健康社会工作聚焦本土健康需求，能推动社会工作与本土医疗体系、文化传统深度融合，是实现专业本土

化的重要路径[2]14-15。从专业化角度看，杨柠溪等（2023）提到，健康社会工作的跨学科特性推动社会工作突破传统服务边界，拓展服务领域，催生“社工+健康科技”“社工+公共卫生”等新兴方向，提升了专业竞争力与社会认同[3]78-79；王丽等（2020）也认为，优质的医联体健康社会模式能较大程度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4]。

二、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现状

尽管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已逐步受到重视，但高职院校在该领域的实践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院校开设：规模有限且类型集中，高职院校占比偏低

从院校数量与类型看，截至2025年，全国开设健康社会工作相关专业（含方向）的院校仅19所，其中本科院校12所（占比63.2%）、高职院校7所（占比36.8%），以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占比较低。从培养规模看，全国毕业生不足2000人，远不能满足基层社区、县域医院等场景的人才需求[2]14。从地域分布看，院校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仅四川、湖南等3省有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与基层健康服务需求的地域分布不匹配。此外，院校培养方向趋同，极少院校开设老年健康社工、儿童医务社工等细分方向，多数院校仍以“通用社工”培养为主，缺乏对本土健康需求的适配性[1]65。

（二）课程设置：体系与实务脱节，协同性不足且跨学科融合弱

一是课程内容滞后于健康服务实践发展，未能及时融入互联网医疗、智慧健康等新兴业态的知识与技能，导致学生缺乏线上医保办理、远程个案管理等实务操作能力[5]。二是课程之间缺乏系统性整合，理论教学与实务训练割裂，使学生较难形成系统性的服务能力。三是跨学科课程实施流于形式，相关医学类课程多由本专业教师承担，缺乏临床一线人员参与，教学内容局限于基础概念，未能深入涵盖医疗资源认知、医患沟通等实务知识。此外，课程考核仍偏重理论测试，实务评价占比偏低，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健康服务实践水平。

（三）教师队伍：师资力量薄弱，实践质效欠佳且带教能力不足

一是高职院校专职教师中具备一线健康社工经验者较少。二是“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缺失，教师赴机构实践机会少、时间短，实务能力提升有限[2]16-17。三是校外导师带教“碎片化”，虽有院校聘请医院医务社工担任导师，但未制定带教大纲，导师仅在学生实习时偶尔指导，未能全程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6]。此外，高职院校社工专业教师数量普遍不足，且同时承担理论教学、实训指导、行政工作等事务，不利于提升教学质量[2]16。

综上所述，健康社会工作人才特别是技能型和应用型的高职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具有紧迫性。

三、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一）搭建“校—地—医—产”平台，推动多方共建合作

协同育人平台的构建是破解高职院校资源单一、实践场域匮乏困境的关键。高职院校主动整合区域资源，构建“校—地—医—产”四维联动平台，有助于将人才培养纳入地方健康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整体布局。

1. 挂牌成立区域性协同育人平台

学校可与属地政府部门联合，挂牌成立“校地共建社会工作学院”育人平台。设立联合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实践基地资源、课题研究、联合课程开发、人才共育标准制定等核心事宜。例如，四川省某医学高职院校与属地政府联合挂牌成立实体化校地共建社会工作学院，作为组织保障和资源对接中枢，设立由政府主导、高校承办、健康行业代表深度参与的联合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将松散的合作伙伴关系转化为制度化的协同育人实体。

2. 深入挖掘对接多方合作需求

平台建立常态化的需求调研与对接机制。面向地方政府对接基层治理现代化、重点人群服务等政策需求；面向医疗机构对接患者人文关怀、医患关系调适等实务需求；面向健康产业对接康养机构运营、健康管理服务等市场与岗位需求；面向社工机构对接专业服务标准、行业发展趋势与人才能力要求。通过需求对接，共同设计“订单班”“定向培养计划”或模块化培训项目，实现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的精准匹配。

3. 共建共享实践教学资源网络

以平台为纽带，形成地域性学生社会实践网络，即与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型康养企业、社工服务机构等，批量签约建立“健康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基地群”，形成覆盖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社区健康、机构养老等多场景的实践网络。基地不仅承担学生认知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任务，提供就业岗位，还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实践课程开发与“双导师”教学。

（二）构建“理论—实践”整合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医文融合是健康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探索构建医文融通凸显健康特色、强化实务能力的高职社会工作教学课程体系。

1. 搭建“基础通用+健康特色+技能拓展”理论课程体系

一是基础通识课程设置。第一学年集中开设社会工作导论、社会学基础、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工作伦理等专业通识基础课，完成从普通学生到“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认知转换。

二是健康特色课程融入。将“健康”作为特色发展方向进行系统化融入，第一，融入医学基础知识，

开设“基础医学概论”“常见疾病认知”等课程，侧重疾病的社会心理影响、医患沟通技巧、医疗资源认知等。第二，深化健康社工专精课程，开设医务社会工作、老年健康社会工作等方面的课程，融入智慧医疗、互联网 + 健康等新业态元素。第三，注重教学内容的区域适配与本土化转化，如四川省某医学高职院校依据川南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征，联合开发《川南多民族健康沟通实务》教学资料，讲解少数民族健康习俗与禁忌、双语健康宣教技巧等。

三是技能实务课程建设。遵循“从通用到专精、从方法到实务”的递进逻辑。第二学年，“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构成教学主轴，通过情境模拟与项目实操，培养学生的核心方法与技术能力。第三学年，转向“社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等专业拓展课程，聚焦具体服务领域与复杂现实问题，完成综合性服务方案的设计与执行。

2. 推行“三层递进、理实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

建立“三阶段递进实践”与“三层递进课程理念”，设计贯穿三年的进阶式实践教学路径。

第一学年以专业认知建立与基础服务体验为核心。其一是在学习基础通识课程过程中同步组织学生深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等进行实地参观，直观感知职业场景与服务流程。在此基础上，推行“社区师傅”引领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学生在真实的基层情境中运用初步专业知识体验助人过程，增强专业认同感。其二是在虚拟实训平台上练习，与“路由杯”VR 虚拟实训平台合作，沉浸式演练医务社会工作、老年健康社会工作等多元场景项目，提升学生实务操作规范性与应急处理能力。其三是参与项目化实训大赛，常态化开展校级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赛事题目聚焦基层健康服务高频场景，选拔优秀学生团队参加市级、省级、国家级等各类技能竞赛，增强实务能力。

第二学年推动学生从认知体验向实务参与深化。在学习专业核心课程基础上同步参与社工工作，依托校外实践基地，系统开展“项目嵌入式”实践，以见习生身份进入社区、医院、健康企业等基层服务场景，在校外督导与校内教师的“双导师”协同指导下，全程参与真实服务项目的需求调研、方案设计、活动执行。定期组织实践案例研讨会，引导学生对实务经历进行结构化梳理与理论反刍，促进专业知识与实操能力的有机融合。

第三学年以“顶岗实习”为核心载体。学生进入医院社工部、养老机构等单位，开展不少于 6 个月的全职岗位实践。在“双导师”指导下，逐步承担复杂个案跟进、社区健康项目组织、服务流程优化等独立或主导性工作任务。实习强调“综合任务驱动”，要求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整合政策分析、项目管理、伦理决策等多维知识。考核要求学生提交《典型案例深度分析报告》作为重要评分标准。建立“实习成长档案”，增强职业认同感与心理韧性，提升投身基层健康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岗位胜任力。

（三）打造“双向赋能、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1. 实施校内教师“实务赋能”计划

实施“教师本土实务驻点计划”，要求校内社工教师每学年到合作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企业或社工机构进行累计不少于 3 个月的驻点实践，深度参与临床服务、基层健康项目、产业服务等实务工作，将实践成果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组织教师每学年参与不少于 3 次健康社会工作相关学术研讨会议；考取“社会工作师 + 健康管理师”双资质。

2. 构建“结构化、全过程”的校外导师库

构建体系化导师库，改变校外导师“碎片化”参与的状态。依托平台资源遴选高级医务社工、健康机构管理者等，组建“校外实践导师库”，签订系统化带教协议，明确导师参与课程设计、实务教学、实训指导、考核评价等全流程教学任务；推行“师徒制”，为每名学生配备稳定的校外导师；为校外导师提供教学能力培训，发放带教津贴，建立导师带教质量评价机制，确保带教实效。

3. 建立“协同督导与教研”机制

建立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定期联合教研、协同督导的制度。共同研讨教学案例、开发实训项目、指导学生竞赛与实训。定期举办“健康社工实务沙龙”，促进理论界与实务界知识对话与融合创新，提升整体师资队伍的跨学科教学与指导能力。

四、结语

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基层健康服务水平的关键环节。高职院校应立足地方需求，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课程体系重构、实践教学强化与师资能力提升，逐步探索破解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规模不大、内容脱节、支撑力量薄弱等困境。本研究提出的“平台—课程—师资”三维模式，其核心在于推动形成一种“需求驱动、多元协同、动态调整”的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只有将人才培养深度融入地方健康服务体系与产业发展之中，才能培养出“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健康社会工作人才，为实现“健康中国”的愿景贡献职教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柠溪，姜欣，刘智博，等. 我国高等教育中健康社会工作教育现状及发展路径 [J]. 医学与哲学，2022,43(21):64-67.

[2] 谭卫华，郑立羽，许丽英，等. 多元协同、双向赋能的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02):13-20.

[3] 杨柠溪，刘春雨，何佳伟，等. 国外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现状及启示 [J]. 医学与哲学，（下转 58 页）

高校教工党支部培育双创英才的实践探索
——以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电系党支部为例

韩建超　焦少妮　郝惠敏　张旭飞　马晓宝

摘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背景下，高校对创新创业（以下简称“双创”）人才的培养需求愈发紧迫。在此背景下，高校教工党支部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的政治引领、组织保障、资源统筹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以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电系党支部为例，系统梳理其围绕双创人才培养的实践做法与经验成效。从政治领航、组织攻坚、产教融合、师生共育四个维度，探讨党支部如何发挥思想引领、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优势，有效提升教师科研创新能力与学生创新创业素养，总结党建工作与双创教育双向赋能、互促共进的实践价值，为高校党支部引领双创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双创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高校教工党支部；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党建引领；双向赋能

一、理论基础与时代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建设对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1]”。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关键节点，双创教育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环节。

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2]。高校党组织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党的建设与高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为高校双创教育提供根本遵循、方向指引与实践路径。当前，国家“双创”战略持续深化，高校双创教育正从政策引导向体系化、规范化、长效化建设转型。但部分高校仍存在思想认识偏差、育人模式单一、实践环节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致使双创教育流于形式、实效不足，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3-4]。《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意见》[5]明确要求，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强调高校党组织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教师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教师党员不仅是教学与科研工作骨干，更是双创教育的直接引导者，对学生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因此，高校教工党支部应重视双创教育，不仅要通过政治引领强化育人方向，更需要通过科研实践推动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提升。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电系于2017年成立，赓续百年机械学科优良传统，紧扣国家制造强国和智能制造战略需求，致力于培养创新精神突出、工程能力扎实、家国情怀深厚的复合型技术人才。近年来，机电系

（上接57页）

2023,44(13):77-81.

[4] 王丽，王志中，杜婷. 医联体背景下健康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构建研究 .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0,37(09):718-720.

[5] 李旭，刘春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研究 [J]. 中国卫生产业 ,2019,16(23):179-181.

[6] 江丰霞 .“五位一体”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以湖南省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实践为例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5(09):181-18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度健康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课题“高职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JD-SG2511）；2025年度泸州医疗器械职业学院一般课题“高职健康社会工作专业‘校内融合+校外联动’一体化培养体系研究——以泸州医疗器械职业学院为例”。

（作者单位：泸州医疗器械职业学院）

依托先进金属复合材料成形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支撑。机电系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科研、科研服务国家、育人铸就英才”的工作理念，切实将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动力，成立至今已形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党员教师为引领、以科研项目为载体、以学生创新实践为主线的育人链条，实现党建工作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二、具体做法与实际成效

机电系党支部围绕政治引领、组织攻坚、产教融合、师生共育四个方面，切实强化双创人才培养，并在长期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成效。

（一）政治引领，把准科研育人“定盘星”

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理论学习为科研“定向仪”，确保双创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支部坚持每月至少一次集中学习，第一时间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强国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先进成形与智能装备发展趋势，研讨如何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科研攻关的目标和方案。二是创新“三会一课”。在“三会一课”基础上，增设“科技创新先锋讲堂”。通过邀请获得国家奖、省部级奖项的党员教师及优秀博士生分享科研经验，党支部将理论学习与科研实践案例有机结合，使年轻党员深刻理解技术突破不仅是学术追求，更是政治担当的重要体现。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党员教师的科研动力，也激发了研究生在学术攻关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三是厚植家国情怀。定期组织党员赴晋华、太钢、太重、潞安化工等企业一线调研，通过直面“卡脖子”技术瓶颈，党员们切身体悟到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将使命感化为科技攻关的自觉行动。

（二）组织攻坚，筑牢双创育人“主阵地”

党支部坚持“支部建在学科上、建在团队上、建在项目上”，把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首先，“揭榜挂帅”成立“党员攻关突击队”。接到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开出的“高品质金属层状复合板绿色高效制备新工艺”产业命题后，党支部迅速响应，立即抽调 8 名党员教师和 10 名党员研究生骨干组成攻关突击队。团队分工明确，各组负责人均为党员骨干，签订攻关“军令状”，形成责任到人、节点明确的“作战图”。这种模式不仅明确了科研任务分工，也强化了党员在技术攻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了高效执行力与团队协作能力的双重保障。其次，高效协同，快速突破关键瓶颈。突击队成员围绕“异种金属协同变形”和“界面性能调控”等核心技术难题，开展“白 + 黑”连续攻关模式。党员教师带头冲锋，通过高度组织化和战斗化的协作，原本预计需要半年的实验验证和方案优化，仅用一个月就取得关键突破。再次，实现“两高一绿”技术目标。通过持续攻关，团队成功研发出兼顾绿色化、高效率、高性能的金属复合板解决方案，并研发出复合板轧制原理样机，实现钛 / 不锈钢、镁 / 铝等双层或多层复合材料的成功试制。这些产品在强度、板形质量及应用性能方面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不仅满足命题企业技术需求，还可拓展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国家重点领域。通过党员教师引领和团队高效协作，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技术解决方案，形成了“党建引领—科研攻坚—成果转化”的闭环模式。

（三）产教融合，搭建协同育人“快车道”

党支部坚持开门搞党建、开放育人才，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校企所协同、产学研用融合的育人共同体。首先，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无缝对接。党支部主动联系企业，组织多轮技术交流和方案评审，将科研方案直接嵌入企业装备改造与升级计划，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其次，校企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建立技术合作意向后，党支部推动签订联合研发协议，计划在企业生产线上设立“党员先锋试验区”，由党员科研骨干驻点指导设备改造和调试，不仅提升了科研成果的可应用性，也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参与感，使“双创”教育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四）师生共育，激活创新成长“内生力”

党支部坚持以生为本、师生协同、教学相长，构建“教师引领、学生主体、双向互动”的育人机制。党支部坚持以科研育人、以赛事促教、以传承聚力，实现了师生教学相长、能力提升和人才梯队建设的有效结合。支部将先进成形与智能装备、液压控制技术等科研攻关任务纳入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鼓励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所有国家级课题 100% 向学生开放，形成了攻关一个技术、培养一批人才、孵化一个项目的良性循环，实现科研与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同时，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支部积极组织和支持学生参加“互联网 +”等高水平创新创业赛事，将比赛作为检验科研成果、培养项目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市场分析与路演表达能力的综合平台。通过参赛，学生不仅掌握了科研技能，也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创业素质。支部建立党员老教师与青年博士的“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在专业知识传授、科研方法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及工匠精神培养等方面全面覆盖，实现了“老带新、新促老”的双向促进。通过这些举措，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科研骨干，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获得系统训练，形成良好的人才梯队，为双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自 2021 年以来，“党建 + 双创”模式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科研创新与教育育人的驱动力，取得了显著的创新成果。在创新创业赛事中，党支部带领的师生团队自 2021 年起连续四年在中国国际“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斩获佳绩，累计获得山西省总冠军 1 项，国赛金奖 8 项和银奖 6 项，充分体现了党支部在激发教师和学生创新创业动力方面的核心作用。此外，党支部以科研反哺教学，通过企业实习、成果展示等提升学生科研能力和创业意识。

依托“党建 +”创新实践，党支部完成了从科研创新到职业成长的不断探索。近三年来，党支部共培养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70 余名，其中多人获得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省级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部分青年才俊在国家级大赛中崭露头角，快速成长为科研骨干和行业新锐，形成了良好的人才梯队。

三、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

党支部的实践不仅为双创教育提供了生动经验，也为全国高校探索党建赋能双创人才的培养教育提供了理论启示和实践参考。

（一）政治定向，党建引领是关键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方向，首先依赖于政治引领的稳定支撑。机电工系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科研、教育与管理全过程，实现了理论学习与科研实践、人才培养的全方位对接。通过政治引领，党员教师在科研攻关中率先垂范，将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与科研创新紧密结合，成为学生创新创业道路上的榜样和引路人。学生党员在项目实践中勇挑重担，将理论知识与技术攻关结合，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创促德”的良性循环。党建引领将育人导向与价值塑造嵌入双创教育，通过发挥其政治与组织优势，为青年人才提供了发展基础和稳定的成长支持。因此，高校双创教育若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党建作为方向之基，使创新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二）人才培养，支部建设是保障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基础在支部，关键在支部，支部建设尤为重要。机电系党支部坚持将基层党组织建在学科、建在团队、建在科研项目上，基本实现了其政治组织和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支部通过建体系、促双升、强联动，以项目攻关锤炼党性、提升能力，有效激发了师生创新热情，推动了科研产出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与良性发展。这种组织模式不仅保障了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也使学生在真实科研情境中锻炼能力。实践证明，基层党支部是高校双创教育中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保障。通过支部引领和支部建设，能够进一步落实双创人才培养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三）双创培育，协同育人是核心

党支部整合校内外资源，建立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一方面，通过联合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构建实践基地与联合实验室，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创新创业环境；另一方面，党支部将思政教育融入创新创业项目全过程，引导学生在解决技术难题、服务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厚植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使创新创业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和比赛，而成为贯穿科研、实践与思想教育的综合平台。党员教师通过传帮带，不仅传授技术经验，也引导学生形成科研伦理、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终极价值。

（四）持续发展，文化价值是纽带

任何教育模式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文化价值。机电系党支部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红色引领、创新担当、知行合一、服务国家”的红创文化，其核心在于价值认同与精神激励。党员教师和学生群体在文化熏陶中形成强烈的荣誉感、使命感与集体认同感，创新创业不再是功利性的技术追求，而成为实现自我价值、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氛围已成为支撑机电系双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使党建赋能双创的模式不仅在制度层面得以运行，也在价值观层面扎根生长。

四、结语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系党支部以政治引领定向、组织建设强基、产教融合赋能、师生共育提质，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双创育人的有效路径。实践充分证明，高校教工党支部在双创教育中不仅能发挥政治引领、组织保障、资源统筹作用，更能在价值塑造、精神引领、人才培育方面展现独特优势。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教工党支部应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持续深化党建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不断完善育人体系、创新育人模式、提升育人质量，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具备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成龙，李永伟 . 高校为何要实施“党建 +”引领工程 [J]. 人民论坛，2019(08):86-87.

[2] 张成龙 . 以“党建 +”理念增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内生动力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01):96-99.

[3] 刘正安 .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J]. 科技创业月刊 ,2017,30(03):71-73.

[4] 王平 . 高职院校就业创业指导师资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36):56-59,77.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2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7.

[6] 孙保营 .“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局及破解 [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7,08(01):24-30.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高职廉洁教育的本土化图景
——以温州地域文化为例

李　航

摘要：温州地域文化中明初名臣刘基的民本法治思想、南宋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既是浙东学术脉络中的独特基因，也是以文化重塑新时代高职廉洁教育的重要样板。在推进“教育强国”与产教融合纵深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立足于“第二个结合”视域，深入挖掘、甄别、萃取温州本土文化中的廉洁教育资源，对其进行现代化阐释与职教化改造，进而构建、涵养一套契合高职师生认知的立体化育人图景，将刘基“诚意正心、重典治乱”的修身法治观与永嘉学派“义利并举、道不离器”的事功哲学转化为提升高职院校治理能力与学生职业素养的内生动力，为新时代高职廉洁教育守正创新、本土赋能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高职廉洁教育；本土化；温州地域文化；永嘉学派；“第二个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统筹部署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协同建设。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早已跳出校园反腐单一维度，成为衡量现代高校综合治理能力、立德树人成效的核心指标。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育主阵地，肩负着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时代使命，其廉洁建设具备鲜明类型教育特征：不仅关乎师生的个人道德修为，更直接影响行业从业规范、职业伦理底线与产业生态健康。立足“第二个结合”视域，深挖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内核，推动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破解当前高职廉洁教育同质化、形式化困境的重要路径。

一、高职廉洁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温籍地域文化适配逻辑

有研究指出，高职院校的廉洁教育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创新性不足、未形成长效机制”等问题。客观上来看，现今的高职廉洁教育内容普遍缺乏针对性与时代性。诸多院校惯性沿袭本科的宏大叙事，过度依赖文件宣读，却忽视了高职学生“形象思维突出、实践导向鲜明、逻辑偏弱”的认知特质。这使得常规的廉洁教育流于形式，难以激起学生的价值共鸣[1]。与此同时，廉洁教育普遍与高职院校当前所重视的产教融合工作联动不足也成为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下，面对职业场景中具体的廉洁风险，现有教育模式往往将“立德”与“树匠”割裂。思政课堂讲清廉，实训车间只讲技能，这种“两张皮”现象导致廉洁要素未能有效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无法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2]。

作为百工之乡、历史文化名城的温州，自古以来就蕴含着极为丰富且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资源，其中明初名臣刘基的思想中所提倡的修身法治观与南宋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恰好能够为重塑高职师生廉洁认知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本文尝试挖掘这两种本土文化基因，探索具有在地性与职业性的高职廉洁文化建设新路径，推动廉洁教育实现从“填鸭式教育”向“文化自觉”式转化。

二、刘基“民本法治”思想与教师权力伦理的重塑

（一）以“诚意正心”修身，破除学术指标主义桎梏

当前，在“双高”建设与创建职业本科的压力下，部分高职院校难免会陷入“指标主义”的泥淖。一些教师在职称评审、课题申报中，容易滑入“为了数据而拼凑、为了指标而包装”的功利陷阱。这种“重材料轻实效”的倾向，不仅是刘基笔下“卖柑者言”在学术领域的现代翻版，也极易重演刘基在《工之侨献琴》中所描

述的评价体系只重“外饰”而轻“实绩”的悲剧，必将诱导教师追逐虚浮的“伪包装”，而使真正潜心育人的真良工、好老师遭到淘汰。

对此，重塑教师伦理的首要任务，在于借鉴刘基“诚意正心”思想，回归教育本真。既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警惕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更要通过文化浸润，让教师深刻认清形式主义对学术生态的腐蚀性，坚决打破“不包装就被淘汰”的怪圈，从而破除唯数据、唯材料的评价顽疾，涵养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

（二）以“重典治乱”立规，筑牢权力防腐制度防线

“浙学”学者张宏敏指出，挖掘、梳理、总结历史上浙江籍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事迹与廉政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现实启迪[3]。如其所言，挖掘刘基文化中的廉政基因，能够为构建“三不腐”机制提供重要的本土化参照。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科研经费管理与产教融合环节已然成为许多教职人员进行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部分“双肩挑”干部的落马更是令人警醒。

面对治理难题，刘基的法治精神，就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史载，刘基任御史中丞时，丞相李善长的亲信李彬因贪纵不法被按律当斩。尽管李善长倚仗权势多次说情阻挠，甚至借口“祈雨”要求缓刑，但刘基坚守“法不阿贵”的原则，先斩后奏，力排众议将李彬正法。“斩李彬”的经典案例，生动诠释了刘基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刚毅品格，也印证了法治在遏制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可以说，对法治权威的绝对维护，恰恰是当前高职院校构建“三不腐”机制、破除人情关系网与利益输送链所急需的制度刚性。

三、永嘉学派“事功”哲学与高职学生职业诚信的生成逻辑

（一）义利并举：消解学生伦理焦虑

针对宋代学坛空疏不实的学风，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必兢省以御物欲；必弥纶以通世变”的修身主张[4]。这一论断与盛行的朱子学派不同，将“御物欲”（即道德自律）与“通世变”（即经世致用）这两个部分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深刻论证了“德”与“技”的辩证关系。如果将其置于新时代高职教育语境下去审视，那么叶适的这一思想无疑可以为化解当今高职学生对就业选择和人生方向的“伦理焦虑”，提供一剂标本兼治的良方。

当下，高职廉洁教育常因陷入“道德高地”的宏大叙事，而被视为脱离实际的“水课”。原因就在于教育者或教育本身内容上都往往单纯强调奉献与牺牲、努力与奋斗，却忽视了高职学生面临的生存与就业压力。尝试引入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去解释，那便意味着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学生追求职业收益（利）的正当性。通过阐释“兢省以御物欲”与“弥纶以通世变”的辩证关系，向学生揭示廉洁之“义”绝非外在束缚，恰恰是获取长远之“利”的根本逻辑。而类似于违背工艺标准、伪造数据的“取巧”，则看似获取了短期红利，实则抽空了职业生存的根本。这一阐释，成功将对高职学生的廉洁教育从单纯的“防腐”维度拉回到了“生存技能”的现实维度，从而激发学生去主动践行职业诚信。

（二）道不离器：摒弃从业投机侥幸心理

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转化。叶适在《水心别集》中提出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不仅为职业诚信确立了本体论支撑，更在高职教育语境下具有极强的现实隐喻。它向学生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道”（廉洁诚信）并非悬浮的道德教条，而是内化于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零件与每一行代码之中。换言之，诚信不是为了取悦他人的“外饰”，而是确证产品价值的“内核”。若无“器”之精良，则无“道”之存焉，这一认知能够有效引导学生摒弃投机心理，在具体的职业行动中构筑起坚实的道德防线。

永嘉学派的“义利观”深刻塑造了“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精神和温商文化[5]，然而，1987 年的“武林门烧鞋”事件，却是其在现代商业史上的一个惨痛注脚。那场因“重利轻义”引发的信任危机，以“一把火”的极端方式，倒逼出温州制造“质量立市”的集体觉醒。俗语云：“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在现今看来，与前文刘基“斩李彬”的典故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关联。如果说李彬的覆灭是因为骄纵触犯了法治，那么温州劣质鞋的焚毁则是因为投机背离了诚信。这两个案例殊途同归，共同印证了“投机取巧必自毙”的辩证逻辑。它深刻警示后来者，在现代职业体系中，任何试图脱离质量去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也终将导致职业生命的昙花一现。

因此，通过将永嘉学派的“道不离器”哲学观与温州商人的“武林门烧鞋”历史痛感相结合，便能够构建起一套反对浮华、崇尚实干的职业伦理防线，从而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时刻保持对“技艺”与“信誉”的敬畏之心。

四、温州地域文化赋能高职廉洁教育的本土化立体化图景

（一）知行合一：打造本土文化行走思政课堂

就目前而言，传统廉洁教育之所以陷入课上“抬头率低”、课下“无人在意”的窘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教育局限在了物理教室的四堵墙之内。改变传统廉洁教育照本宣科、被学生视为“枯燥说教”的被动局面，在于充分挖掘和运用好温州本土丰富的文化资源，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要善用“社会大课堂”，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温州拥有刘基故里、文林却金亭、永嘉学派馆、世界温

州人博物馆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开展廉洁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尝试突破传统课堂的空间局限，开发“瓯越清风”研学路线，走进这些文化地标，让文化遗产成为教育资源，通过现场教学，让师生在刘基“民本法治”的历史遗存中，在温商“诚信立业”的奋斗足迹里，直观感受先贤的廉洁风骨与诚信精神。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能够把抽象的廉洁理论转化为学生可感可触的鲜活体验，从而有效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实现“入耳入脑更入心”。

（二）融合赋能：实施课程思政的精准滴灌模式

破解业务教育与思想育人“两张皮”的关键，在于将廉洁教育深度嵌入高职教育的“职业性”逻辑之中。高职院校应充分认识到廉洁教育不仅仅是思政课的任务，更是专业课的底色，应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主渠道作用，将温州本土的廉洁案例转化为专业教学的生动素材。

在具体实施上，应拒绝统一故事统一讲解的“大水漫灌”，转向专业课程与专业教育的“精准滴灌”。例如，在财经商贸类专业，可以引入“刘基《贾人渡河》与助学金失信”的寓言新解，通过剖析“失信者”的代价，让学生明白失去信用可能在一瞬间就会对人生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在课程思政中融入廉政教育的精髓在于，它不再将廉洁教育视为外在于专业学习的“额外负担”，而是将其确立为职业规范的“必修课”，让学生在习得专业技能的同时，同步完成职业诚信的内化。

（三）文化浸润：构建家校协同廉洁育人生态

如今的思政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推进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绝非简单地挂横幅、贴标语，这往往会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事实证明，单纯的“视觉轰炸”很难真正入心入脑，真正的廉洁文化建设，应致力于构建一套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体系。

一方面，要活化“刘基文化”的校园表达。依托温州市刘基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平台，我们不应止步于理论研究，而应深度挖掘刘基文化中的廉政基因。鼓励师生通过学术沙龙、情景剧展演、微电影创作等多元形式，让刘基“公私分明”的廉政观从静止的古籍中走出来，成为师生可感、可亲的校园文化符号。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往往比生硬的说教更具渗透力。

另一方面，要疏通家教家风这一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家风正，则民风淳，可以汲取如《项氏家训》《王氏族约》等温州家风家训中的“寒士清风”资源，这些是抵御拜金主义侵蚀的天然屏障。同时，我们应注重结合永嘉学派中“义利并举”的传统与温州家训中“寒士之风”的特质，在师生中广泛开展“致敬先贤”家训诵读等活动。通过优良家风的代际传承，不仅能唤醒师生内心深处的道德自觉，更能构筑起一道抵御腐败的家庭防线，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同频共振。

（四）制度兜底：建立刚柔相济的治理模式

如果说文化是滋养心灵的“软实力”，那么制度就是规范行为的“硬约束”。解决廉洁教育“一阵风”的根本出路，在于紧扣“教师权力伦理”风险，将刘基“重典治乱”的法治思想转化为现代职业院校的治理效能。

借鉴刘基对规则的敬畏，以制度刚性划定权力边界。高职院校应在校企合作中推行“双向廉洁协议”与严格的“利益冲突申报”机制。针对“双师型”教师在技术服务、设备采购等环节的隐蔽风险，实施透明化的“微权力”流程管理，从源头上堵死“靠校吃校、靠企吃企”的漏洞。必须明确的是，一旦发现教师利用兼职身份进行“权力寻租”或“资源套利”，应立即启动“一票否决”程序，确立不敢腐的震慑。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根脉与底色，“第二个结合”为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根本方法论指引。温州地域文化中刘基法治廉政思想、永嘉学派事功诚信哲学，是适配高职类型教育、贴合技能人才培育的优质本土资源。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构建立体化廉洁育人图景，能够有效破解当前高职廉洁教育同质化、形式化、浅层化困境，推动院校治理提质、师生素养进阶、育人体系完善。

文化赋能廉洁教育非一日之功，本土文化融合产教融合仍存在实践难点。未来应持续扎根温州本土文脉，深化“第二个结合”在高职廉洁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不断优化文化转化机制、完善长效育人体系，让廉洁文化扎根职教沃土、浸润匠人心魂，为培育德技并修、清正自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筑牢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1] 许陈颖 . 新时代高校廉洁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实践路径 [J]. 廉政文化研究 ,2023,14(02):83-89.

[2] 於晶晶 . 廉洁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3(02):181-183.

[3] 张宏敏 . 清廉浙江建设的“浙学”渊源 [J]. 观察与思考 ,2018(05):95-103.

[4] 葛晓娇 . 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学校廉洁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8(03):141-145.

[5] 谷峰 . 永嘉学派的先驱者——郑氏兄弟 [J]. 文化交流 ,2021(10):38-4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度廉洁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明代温州廉洁人物、符号与事件的‘故事化’及其高校思政教育转化路径研究”（LZ202501）。

（作者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破解“换届僵局”：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驱动业委会换届的治理创新

——以北京市T社区的实践为例

王裕瑞

摘要：本文以北京市T社区业委会换届实践为例，探讨了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理论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面对业主参与意愿低、区外业主多、线上操作难等障碍，T社区在所属街道指导下，以制度、团体、技术赋权为抓手，在宏观层面以党建引领重塑居民间信任并构建有效的制度和执行体系，在中观层面着手修复与再生产特定社会资本缺损，编织有效的社区社会网络，在微观层面引入各类技术工具激活居民参与度。T社区以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理论为指导，开展工作实践，实现了业委会换届从“被动组织”到“业主主导”的转变，为社区长效治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业委会；社区治理

一、破解基层治理“关键一公里”：系统赋权激活业委会换届新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背景下，业委会是实现社区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治理”的关键枢纽。但现实中许多业委会普遍面临“成立难、运作难、换届难”[1]的困境。尤其某一届业委会因动力耗散、成员更迭而终结时，社区极易陷入自治倒退。如何破解换届难题，已成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必须闯过的“关键一公里”。

北京市T社区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自2019年起，T社区内约三分之二未转商的房屋因产权问题被限制交易，造成居民不满。社区精英以“解决产权”作为动员纲领，推动成立了第一届业委会。但业委会在实际协调产权问题时阻力较大，核心诉求受挫，工作重心被迫转向常规物业监督，但成效不大。业委会积极性受挫，组织功能失效。随着核心成员离职，任期届满前全体成员均表示不再连任，这标志着第一届业委会工作的终结。T社区的案例揭示：业委会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为何而立”，更在于“何以为继”。

针对上述难点，T社区尝试从赋权视角重新审视“社区动员”问题，引入“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的解释框架，其核心由宏观制度赋权、中观团体赋权、微观技术赋权组成，各层次相互作用，推动动员机制从“为他换届”（依赖外部或少数精英）到“由我主导”（广大业主发挥主动性）的根本性转变。

本文将以T社区第二届业委会换届实践为例，系统呈现其在“系统赋权式动员”理论框架下的行动。本研究也为面临类似挑战的社区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业委会换届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范本。

二、破解换届困局：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的实践

（一）宏观层面：制度赋权，以党建引领重建信任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的核心在于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按照总书记的要求，T社区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规范议事流程、搭建协商平台等举措，以制度赋权提高换届工作的合规性与公信力，减少业主因沟通不畅、决策不透明而产生的失望和质疑，进而走出了自治失灵引发参与热情下降的困境。

1. 破解启动难题：以协商合作重建信任基础

面对业主参与意愿非常低的现实，T社区的上级单位H街道以“共商共议”为原则，组织首届业委会成员、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及业主代表召开了换届筹备会，向各方明确了工作时间节点与责任分工，为业委会换届搭建了一个有组织、可监督的公共平台，各方对自我角色有了明确认知，进而激发了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互信度。

2. 确保程序合规：以规章制度确保行动规范

制度赋权需要刚性程序做保障。H街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作了业委会换届的标准操作手册，确保关

键环节的执行有规可循；推动成立了由社区基层党组织牵头的换届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小组），党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直接嵌入换届工作的决策核心，确保换届全过程合法合规。

3. 构建闭环系统：以持续反馈实现动态调控

制度赋权需要持续跟踪调适。H 街道与小组建立了动态反馈和调控机制，确保“组织始终在场”。街道部门与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工作指导与结果反馈顺畅衔接；小组每日报送进展与困难，街道实时指导、协调资源，保障换届有序推进；小组每周开展小结和计划，形成“PDCA”闭环。比如，小组发现区外业主参与率低的“堵点”时，借助行政系统的数据提取联系方式再进行精准“入户”。街道扮演了“资源协调者”与“难题清障机”的角色，确保了微观阻力被宏观力量化解。

4. 理论价值：超越“形式在场”，实现“效能在场”

T 社区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在场”是“形式在场”向“效能在场”的跃升。它有效破解了基层自治中常见的“赋权悖论”[2]46，单纯宣布赋权反而可能因秩序缺失而失效，需要通过提供稳定的规则框架、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必要的资源背书，为重启“业主自治”扫清障碍、铺设轨道，为新一届业委会的平稳过渡与合法权威打好基础。因此，党建引领下的制度赋权可提供稳定、可信、能为的“赋能架构”，激活自下而上的参与积极性[3]。这也正是“系统赋权式动员”框架中，宏观制度赋权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

（二）中观层面：团体赋权——多元参与重建“疏离业主”社会网络

T 社区业委会换届还面临“物理不在场”（业主常住外区）与“心理不在场”（因信任危机而漠然）的双重困境，业主之间缺乏有效互动节点、稳定关系渠道，导致社区社会联结的结构性缺失。对此，T 社区采取“团体赋权”策略，有意识地创建并赋能多种形式的团队组织，系统性重塑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再生维系社区自治所必需的社会资本[4]。

1. 行政网络的社区赋权：重塑初级信任的楼栋节点

面对社区交流困境，T 社区对行政末梢“楼栋网格长”赋权，将其功能从信息传递升维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实践中，小组给予网格长建立并管理楼栋微信群的权力，要求网格长逐户对接业主、推送投票链接、进行电话提醒，附带“我是 X 号楼的网格长 XX，本次换届采用线上投票，流程公正透明，咱们楼已经有不少邻居参与，您若有疑问可以随时联系我”的说明，用熟人关系为线上程序注入温度。网格长从“政策传声筒”转变为“信任构建者”，将原本“物理上不在场”的业主组织为具有初步认同的“虚拟楼栋共同体”。

2. 趣缘网络的嵌入赋权：激活“结构资本”的传播效能

对区内业主，T 社区采取“嵌入式赋权”，激活社区内现有的高信任、高活跃度的趣缘组织。小组对其开展动员和培训，将公共议题嵌入其日常活动中。比如，舞蹈队在排练间隙以“闲聊”方式传递候选人信息；志愿服务队协助小组向居民答疑。这使换届信息沿着趣缘关系网络自然高效流转。嵌入式赋权重在激活既有社会网络的公共功能，使私人兴趣空间转化为公共议题传播场域，提升其社区嵌入性[5]。

3. 跨界制度的联结赋权：构建协同治理的责任网络

对区外业主，T 社区采取“跨界制度性联结赋权”，通过“组织对组织”的协同，利用业主单位权威资源和职场人际信任，构建跨物理区域的“治理共同体”。一方面，小组主动联络业主集中的单位，赋予其“协同治理伙伴”身份，单位利用内部通知渠道向员工推送换届信息，形成社区与单位协同共治的联动。另一方面，小组联络单位中的党员骨干、意见领袖，赋予其“单位内倡议人”的角色，他们带头参与、集中答疑，凭借自身影响力，将社区议题转化为同事间的“准公共事务”，有效提升了在职业主的参与度，实现了业主“职业身份”与“社区身份”的有效融合。此举通过组织嵌套与资源互补[2]52，建立了“社区—单位”间基于法定职责与公共责任的协作治理机制。

4. 前瞻性赋能“候选人”：预付制度信任的治理资本

针对业主对候选人不了解、不信任的问题，小组聚焦“前瞻性系统赋能”策略。首先，小组对候选人开展社区治理政策、居民沟通技巧、公共议题协商方法、信息化工具使用等系统化培训，提升其履职能力。其次，小组通过公开答辩、入户走访等方式，带领候选人面对面倾听业主诉求，增强候选人理性表达和建设性对话能力，使候选人从纸面名字转变为能倾听和回应业主心声的邻里。该实践本质是“制度信任的预生产”，前瞻性地投资于候选人的公共形象、社区关系、履职能力，降低权威构建成本，为其可持续履职储备关键的初始社会资本，为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奠定深层的社会资本[6]。

5. 理论升华：作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系统的团队赋权

T 社区的实践表明，中观层面的“团体赋权”是以对外区业主、在住业主、候选人等开展精准修复与再生产特定社会资本缺损为核心的系统工程。它将因空间分隔和信任危机而“原子化”的业主重新编织进一个多层次、跨领域、有温度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团体赋权在“系统赋权式动员”框架中扮演着关键的建设者角色，它重建并提升社区认同感，使宏观制度框架与微观技术工具落地。

（三）微观层面：技术赋权“三位一体”工具箱激活个体参与

T 社区业委会换届在技术上也存在困境，大部分业主已卸载官方线上平台，老年业主操作困难，严重制约了线上投票覆盖范围，存在达不到法定比例的风险。对此，T 社区系统性运用数字、协商、话语技术[7]，构建

了一套“三位一体”的技术赋权工具箱，提高业主参与度。

1. 数字技术：执行“信任重建”的可验证流程

为重建数字信任，小组创建了一套系统化数字流程。首先，加强身份准入审核，网格员严格核验每一位进群成员的业主身份，在源头确保信息权威性。其次，做好信息推送确认，所有通知、文件均实名发布，关键信息通过“接龙”精准识别未读人群，开展一对一精确动员。再次，保障决策永久透明，小组将全部会议材料上传到官方平台“北京业主”App与“京通”小程序，形成“数字档案”。最后，小组设立线下协助点与咨询电话，降低操作不便人群的参与门槛。T社区以数字技术构建了权威、透明、可追溯的“流程环境”，成为社区居民的信息中枢和参与换届的重要表达机制[8]。

2. 协商技术：弥合秩序合法性与社会情感性的张力

小组运用协商技术将正式规则与熟人情感相结合，促进制度性程序转化为业主可接受的社区决策。一方面，小组做好秩序合法性的刚性建构，在议题讨论中，通过规范发言、充分辩论、民主表决，构建权利平等、程序严谨的会议环境，提升决策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小组关注社会情感的柔性注入，积极营造“熟人社区”氛围[9]，将候选人信息在公示栏、微信公众号及楼栋群同步发布，制作候选人海报放置于社区广场、单元门口，鼓励候选人佩戴证件与业主交流，这迅速拉近了候选人与业主的心理距离，奠定了彼此的信任基础。程序正义与情感联结的结合，有效消解了部分业主因过往成见而产生的抵触情绪，提升了对公共事务的理性参与度。

3. 话语技术：完成意义建构的“认知赋能”工程

在动员环节，小组精心设计了一套话语体系，使业主更加认同个体参与和社区治理的联结。初期，小组在公告中清晰地阐述业委会“代表、决策、监督”的核心使命，强调业主大会是业主处理社区重大事务的唯一民主平台，突出投票权是参与的基石，缓解业主的观望和质疑。中期，小组重点宣传业委会成员“公共维修基金守护人”“业主意见的代言人”的身份，激活业主基于切身利益的工具性参与动机[10]。后期，小组以“每一张选票都是家园未来的契约”作为宣传宗旨，强调业主的权利与责任同在。经过持续的话语引导与意义建构，业主逐渐突破了个体局限，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共识。

三、实践反思与范式升华：T社区实践的内在逻辑与深化启示

T社区的实践展示了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理论的内在逻辑。第一，党组织在“授权”与“赋能”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有效避免了由于党组织过度介入而导致的社区治理矛盾和冲突。第二，团体赋权要求动员者必须深入诊断社区的“社会资本图谱”，而T社区基于对“社会资本图谱”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判断，制定了差异化动员方案，培养出了多元、有机的社会网络生态，推动社区动员从依赖行政指令的“机械发动”转变为依靠集体认同的“生态激活”。第三，技术赋权的深层挑战在于“技术理性”对“治理民主”的影响，T社区综合运用数字、协商与话语技术，兼顾了“治理效率”与“民主过程”，显著提升了动员效率和效果。

T社区在系统赋权式社区动员理论框架下开展的实践实现了三个维度的范式突破。在目标维度，它推动业主形成了社区共识，从“完成程序性投票”向“共建未来家园”意义升华；在路径维度，它提供了“党建引领—网络激活—技术赋能”的系统性工具箱；在机制维度，它探索了一条通过“程序化赋能”激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循环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T社区的实践为破解“业委会成立难、运作难、换届难”的困境提供了兼具理论严谨性、实践可操作性的创新范本，为激活基层民主活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 陈鹏 . 城市社区业委会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50(02):56-62.

[2] 冷向明 , 郭淑云 . 提升社区动员能力 : 从个体到组织的多重嵌套体系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03):46-56.

[3] 姜晓萍, 田昭 . 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 [J].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19,23(05):64-71.

[4] 方亚琴 , 夏建中 .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07):64-84,205-206.

[5] 郑永君 . 社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创新——厦门市“共同缔造”试点社区案例分析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2):46-52.

[6] 陈捷 , 呼和那日松 , 卢春龙 .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J]. 社会 ,2011,31(06):22-40.

[7] 许宝君 . 系统赋权式动员：社区动员运转起来的一个解释框架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3,24(06):72-85.

[8] 杨贵华 . 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01):127-133.

[9] 韦仁忠 . 关系式社区动员 : 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角色、困境及实践路径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187-197.

[10] 张雷 , 张平 . 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研究 [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5,17(03):60-66,2.

（作者系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流星花园南区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法治宣传教育法》实施背景下大学生参与乡村普法的路径探索

——基于团中央“法治中国青春行”立项团队“法之声反诈护乡实践队”的个案分析

刘恪兵

摘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出台为普法工作规范化与创新化提供了法律依据。综合运用实证调研、案例分析与参与式观察法，可发现乡村存在大量普法需求，大学生群体凭借专业知识、创新思维与数字素养，成为弥补基层普法力量不足的重要力量。大学生普法在形式创新、技术融合与受众精准化方面成效显著，但面临活动持续性不足、专业能力边界及乡土逻辑理解不深等局限。对此可构建全域全程长效协同机制、深化需求与能力双轮驱动、推动智慧普法与内生力量培育深度融合三条优化路径，推动大学生“送法下乡”从活动化走向机制化，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青春动能。

关键词：普法；送法下乡；法治宣传教育

一、引言：法治乡村建设与大学生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治的引领与保障。乡村振兴，法治必须先行。加快法治乡村建设不仅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核心路径，更是夯实“中国之治”制度根基的战略举措[1]。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通过在乡村开展法治宣传，能够将法治理念、法律知识、法治文化融入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法治宣传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它连接国家立法与乡土实践，促进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与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相对接，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和秩序基础[2]。

得益于法学专业对法学生将法条适用于实践的能力的塑造，当法学生群体展开基层普法宣传时，可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和模拟法庭等活动进行普法宣传[3]。这不仅能有效推进法律知识在农村基层的普及，也有助于学生在一次次普法实践中将法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法学学子投身农村普法工作，既是缩小城乡法治资源差距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法学学子具备基层视野和法治情怀的有效路径，这是法学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二、乡村法治宣传教育的现实必要性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撑，乡村法治建设的实际推进情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步伐。目前虽然乡村法治宣传教育体系已经初具雏形，但其工作的深度、覆盖面和实际效果仍有待加强[4]。

（一）坚持基层党建引领，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法治效能

基层党建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也是法治宣传的根本保障，需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法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5]。在实践层面，依托基层党建推进法治宣传已有初步成效，但如何将组织优势更充分、更稳定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普法效果，仍需进一步探索与实践。未来，基层司法机关与普法部门可定期为农村党员提供较为系统的法律培训，优先培养其成为“法律明白人”。在此基础上，党员要带头遵守法律，主动将法律知识融入日常实践，以身作则，以自己遵守法律的实际行动推动法律从文本规范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工具[6]。

（二）强化基层干部法治教育，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基层干部是政策执行者，其法治素养极大影响治

理工作成效。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强调要发挥基层干部的关键作用，正如有研究（刘宁，2021）所指出的，农村基层干部必须深入领会“增强法治观念，坚持法治为民”的核心要求[7]。2023年，司法部在全国部署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推动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建设，各地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8]。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法治审查员制度，推动合法性审查覆盖全省1364个乡镇（街道），浙江省所有乡镇（街道）均已实现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全覆盖，累计完成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事项27.8万余件[9]。这些地方实践表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正在逐步成为基层行政的基本准则。然而，面对乡村振兴中日益复杂的新挑战，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干部转变思维，从习惯于依靠风俗人情转向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的同时适当考虑乡村情理，特别是在土地管理、集体经济发展等农民关心的重点领域。对于乡村干部也要开展精准化的普法教育，帮助他们成为熟练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工作的“行家里手”。

（三）提升村民法治素养，激活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村民是乡村振兴主体，其法治意识直接关系治理效能与社会和谐。有研究（陈柏峰，2020）指出，提升农民法治素养尤为关键，事关基层依法治理、诉求表达和矛盾化解[10]。多年来，普法教育已使村民的法治观念得到普遍增强，但部分村民面临纠纷时仍倾向采用“闹事”“上访”等非理性方式，“谁闹谁有理”观念仍有影响。新时代普法须着力引导村民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观念，通过案例普法、文艺普法等贴近生活的方式增强实效，培育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的社会风尚[11]。

三、大学生参与乡村普法的独特优势

农村普法工作的核心要义在于使其内容紧密契合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唯有实现普法活动的“接地气”，才能真正达到与百姓“零距离”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凭借其知识结构新、学习能力强、创新意识活跃等特点，能够成为推动普法工作“接地气”“精准化”的重要力量，有效激发村民自觉学法、主动用法的内在动力，从而在法治实践层面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

（一）推动内容精准对接生活实际

普法宣传若脱离实际会难以深入人心。正如朱苏力在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强调，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于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法律知识的普及不能生搬硬套，而要跟当地的风土人情、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12]。在具体普法宣传中要深入关注了解农民的实际法律需求、明确农民关心什么、农民面临的棘手问题是什么。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实际才可能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农民生活相结合进行普法，要将普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充分考虑乡村情理，结合农村发生的素材以“身边事”讲“身边法”。

（二）创新形式契合乡村认知特点

有效开展普法工作需充分尊重乡村社会文化语境及村民认知特点。贺雪峰在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指出，法治宣传应嵌入乡村共同体的文化氛围中，以实现“软传播”[13]。大学生擅长利用新媒体，将法律知识转化为短视频等村民易于接受的表现形式，从而打破传统“发材料、开讲座”的僵化宣传模式。这种转化不仅符合乡村文化特性，更能将法治宣传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

（三）助力法律服务有效下沉基层

普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倡导在农村实践中运用法律，这就要求将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可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普法宣传的大学生尤其是法学生可以协助设立村级法律咨询站，实际介入田间地头的纠纷调解，为需要的村民提供基础法律服务，通过种种方式能够将专业服务直接送到村民身边。这种实践方式不仅突破了传统普法与法律服务分离割裂的传统现象，也使普法宣传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生活中可获得的实际法律支持。

四、大学生送法下乡的现状

（一）普法形式新颖多样

相较于传统普法方式如讲座等对村民吸引力不足的现状，大学生团队在送法下乡实践中探索出了更有个性、更有吸引力的普法路径。大学生团体在普法宣传中通过定点咨询与入户宣讲，既在村级法律咨询点提供针对性解答，又深入农户家中面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别需要普法宣传、了解法律知识的群体开展精准普法，实现服务覆盖面与精准度的双重提升。在传播形式上，大学生普法群体注重传统媒介与现代体验的融合，利用乡村广播开展方言普法，同时引入模拟法庭等类似情景剧的互动形式增强普法宣传的参与感。此外，大学生普法群体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快板、三句半等朗朗上口、抓人眼球的视听资源，实现“寓教于乐”的传播效果。

（二）技术融合拓展覆盖范围

大学生普法群体在农村普法时还充分发挥了数字素养优势，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普法矩阵。团队依托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制作发布30余部真实案例改编的普法短视频，总浏览量超1万次，有效突破时空限制。在入户过程中，引导村民关注普法账号、指导利用AI等工具方便快捷获得基础法律知识，延长服务时效。部分团队还与当地司法所合作建立“法治服务微信群”，活动结束后持续提供在线咨询。据司法部“智慧普法”平台2023年数据，此类由高校志愿者运营的线上社群活跃度与用户黏性均高于普通宣传群组，初步形成可持续的法律支持机制。

（三）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深度

大学生送法下乡活动在延续传统普法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受众定位、普法策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创新的服务模式。

一是对不同受众差异化组织普法内容。在普遍宣传基础上，重点面向留守老人开展方言讲解与一对一咨询，重点聚焦于赡养、防诈等留守老人可能面临的高风险领域；同时针对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等“关键少数”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法律的专题培训，倡导村干部等乡村法治建设关键群体在建设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等方面发挥示范效应。二是策略场景化。探索“普法短剧”模式：学生表演基于真实纠纷改编的情景剧，在关键节点暂停并剖析法律条文与维权路径，实现“剧情沉浸 + 法理释明”融合，提升理解深度。三是能力反哺化。学生通过备课、咨询、调解等实践深化对法理与情理关系的理解，形成“以教促学”的良性循环，反向提升普法内容的准确性与适切性。

（四）现实局限制约发展成效

大学生送法下乡活动虽然在形式创新与传播广度上取得了突破，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活动的持续性不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多数高校的送法下乡活动集中在寒暑假期间开展，周期短且分散，难以形成对村民法律认知的持续强化与深化。其次，对乡村治理逻辑的理解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乡村发生的法律冲突多与土地纠纷、宅基地争议等有关。这些问题往往涉及专门法律规范与地方政策，且在不同乡村还可能存在不同的特定风俗习惯，这也会影响法律案件的解决。而大学生对农村特有的人情世故、乡土风俗往往把握得不够精准，在调解实践中略显生硬，难以实现法律逻辑与乡土情理的有效融合。

五、大学生送法下乡完善机制建设的路径建议

为推动大学生送法下乡从“活动化”走向“机制化”、从“有声音”迈向“有效果”，需聚焦当前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出具体对策。

（一）构建全域全程长效协同机制

针对普法活动持续性不足的问题，可建立“高校—县乡政府—基层司法机关”三方协同机制，探索“一校一县”结对模式并设立县域大学生法治实践基地，形成常态化合作。服务时间上，采用“学期 + 假期”双轨制：学期内通过微信群进行线上值班，为村民提供日常法律咨询；寒暑假期间针对前期线上收集的共性问题开展线下驻村实践。同时，还可将普法实践成果纳入学分认定和优秀评选体系，这样既有助于推动出现更多优秀成果，也有利于推动优秀成果转化为地方治理的决策参考。

（二）深化需求能力双向驱动

为确保普法内容“接地气”、学生能力“跟得上”，必须精准锚定乡村法治需求，系统提升大学生的实务素养，实现双向赋能。通过下乡前与村委会座谈及线上问卷调研，构建需求精准识别机制；在高校开设乡村法治实务前置培训课程，邀请涉农律师、法官、调解员重点讲解土地承包、婚姻家庭等领域的实务操作；同时探索“大学生 + 法律职业者”联动指导模式，为团队配备在地律师作为实践导师，形成前端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与后端专家提供专业支撑的协作格局。

（三）推动智慧内生深度融合

关注长远发展，大学生普法不应仅是阶段性的外来帮助，更应通过大学生普法进一步激活乡村内部的法治潜能，不仅“授人以鱼”更要实现可持续的“授人以渔”。具体而言，实施“法治助手计划”，重点培养村干部及“法律明白人”群体。同时负责普法宣传的大学生在普法时面对有法律服务需求的农民，可协助其处理法律文书起草、政策解读等实务工作。同时对于大学生普法群体还可鼓励团队将实践成果转化为可复用资源，如将方言版普法短视频、典型案例剧本等形成“乡土法治资源包”赠予当地，以实现优质资源的持续积累与辐射。

此外，还需构建动态反馈优化机制，通过新媒体平台对传播效果进行数据分析，联合司法所对在普法过程中有法律需求的村民建立定期回访制度，以切实解决存在的法律问题。同时还可以真实数据驱动普法内容与形式的持续迭代，最终形成从外部赋能到内生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法治建设从“输血”向“造血”的根本转变。

六、结语：共筑乡村法治未来

大学生送法下乡是法治中国在农村落地的重要抓手。通过制度化、精准化和内生化的综合推进，这些普法行动将从短期项目转变为长期工程，从外部输入转化为内生动力。作为法律知识的传播者、法治精神的践行者和乡村治理的参与者，这支青春力量将与其他法治主体共同筑牢“中国之治”的乡村根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2] 张文显 . 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石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01):4-25.

[3] 黄文艺 . 论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06):10-16.

[4] 姜明安 .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J]. 法学杂志 ,2023,44(01):1-12.

[5] 罗杰 , 王伟慧 . 新时代法治乡村建设的内涵、意义及路径 [J]. 法制与社会 ,2021(11):142-143.

[6] 周庆智 . 基层治理中的党建统领与法治保障 [J]. 治理研究 ,2022,38(02):58-69.

[7] 刘宁 .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普法问题（下转 70 页）

TIE 架构下的残障儿童康复模式探索
——以上海市 J 街道残障儿童综融介护项目为例

周　蔚　徐千越

摘要：当前，我国残障儿童社区康复实务仍面临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在“人在环境中”（TIE）理论框架下，社会工作应将干预焦点从个体转向环境。以上海市 J 街道综融介护项目为例，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系统分析该街道残障儿童的康复现状与社会工作实践路径。该项目致力于促进残障儿童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有效推动其社会融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优化的“人在环境中”实践框架。这一探索为我国残障儿童社区康复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TIE 架构；残障儿童；社区康复

一、导论

残障，包含了“残”与“障”两个词素，它不仅包括身体上的限制，还涵盖了由于社会环境、态度或设施不足而造成的个体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的障碍，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年来，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加强儿童康复的诸多建议，但仍然无法高效地完成康复。一方面，残障儿童群体存在“残障 + 未成年”双重弱势；另一方面，环境与残障儿童的真实情状贴合度低，阻碍康复进程。因此，从残障儿童与环境的交流互动的层面上看，当残障儿童主体弱势与环境的低质量交互共同作用时，便会对康复效力产生一定的排斥效果。

社区康复作为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协作方式，为残疾儿童持续提供必要的康复服务和社会参与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社区康复以实现机会均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目标，其实施需要依靠各方力量[1]。随着我国嵌入式协调治理发展，残障儿童的社区康复作为一种以社区为治疗场域的康复模式，在促进残障儿童身心康复、提升其社会参与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潜力。

因此，在这样一个残疾儿童服务保障的转型期、治理能力的提升期、瓶颈突破的攻坚期，本研究以 J 街道的残障儿童综融介护项目的实践为例，将 TIE 架构介入残障儿童的社区康复，为残疾儿童争取平等发展的权利，深入研究残疾儿童的高质量社区康复之道。

二、理论基础

个体与环境互动（Trans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Environment，TIE）框架由蒙克曼（Monkman）与艾伦梅雷斯（Allen Meares）提出，是一种适用于儿童问题的分析视角。其核心观点并非将个体作为单一干预目标，而是强调关注环境的多元面向。在此架构下，社会工作者需聚焦儿童的应对方式、可及资源，并介入案主与环境的互动界面；同时，需回应案主在生存、依附、成长与成就等方面的需求。所谓“环境品质”，则指案主直接接触或与之交互的各种情境的内在属性与特征。该架构将个体置于动态环境中加以考察，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从“人在环境中”到“人与环境互动”的系统指引[2]。

三、项目介绍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残疾人事业

（上接 69 页）

研究 [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1(04):113-119.

[8] 司法部 . 司法部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2566 号建议的答复（摘要）[EB/OL]. (2023-11-17)[2026-04-27].https://www.moj.gov.cn/pub/sfbgwapp/zwgk/zwgkjyta/202311/t20231117_489795.html.

[9] 钱祎 , 干婧 , 戚祥浩 . 三千法审人员活跃乡土间 [N]. 浙江日报 ,2025-12-11 (07).

[10] 陈柏峰 . 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 [J]. 法学研究 ,2020,42(02):3-19.

[11] 苏力 . 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2] 朱苏力 .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M]. 北京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3] 贺雪峰 .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 < 涉外法治方向 > 本科生）

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实施并建设全面建构儿童友好环境与福利体系，加大对特殊困境儿童的精准救助帮扶力度优化并逐步提升残疾儿童公共服务质效[3]，上海市J街道残障儿童综融介护项目诞生。在残障儿童康复干预过程中，康复人员往往使用多种传统的康复疗法，将其整合并构建为系统化的康复方案，实现心理康复、教育康复、社会康复以及职业康复[4]；哈丽特·巴特利特（Harriet Bartlett）认为综融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应以全方位的观点看待问题。本项目致力于运用多种方法整合模式助力残障儿童康复、优化其外部社会支持系统，更加强调服务对象的社会系统，采用综融介护的方式调适TIE架构下残障儿童的康复实践[5]。

2024年10月—2025年5月，笔者实地参与上海市J街道残障儿童综融介护项目。J街道地处上海北部的繁华地段，依托其地理位置与经济基础等优势，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提供更佳的公共服务，持续增进辖区民生福祉。经统计，J街道下辖社区现有残障儿童110人，依据康复现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已错过黄金康复期（45人），主要因家长对残障认证存在认知偏差，不愿办理残疾证，导致孩子无法享受相应政策补助；第二类，尚在黄金康复期内（65人），虽持有康复救助卡，但无残疾证，未被纳入残联或民政保障体系。康复费用高昂（5万~14万元/年），政府补贴有限（0.5万~2万元/年），且需先自付后报销。经济压力与结果不确定性使许多家庭放弃康复，最终导致残障定型。

以上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残障儿童福利体系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均、服务专业化不足、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传统社区康复效能的发挥。

四、项目实践

（一）问题分析

1.TIE架构个体维度下存在参与性障碍

环境负反馈阻碍认知提升。残障儿童的生存行为与依附行为与认知功能高度相关。本研究发现残障儿童在谈话中往往会表现出认知功能受限、逻辑思维混乱的情况，通常在回答问题时会长时间迟滞。当环境中的接触者未产生保护残障儿童的意识时，会形成负面反馈，使得残障儿童社会参与度降低。

环境负反馈削弱自我效能。通过全面的访谈，残障儿童由于边缘化的特性，TIE架构个体维度下，残障儿童经常身处负面反馈积累的机制当中，日常生活中稀少的鼓励使得个体心理自卑，自我效能感被削弱。当个体很少被给予正向反馈，最终会形成自我效能感被环境负反馈削弱的局面。

2.TIE架构环境维度下存在结构性障碍

家庭文化认知限制导致的教育性障碍。由于文化习惯、层次不同，家长的知识断层或许能保证生活照料的满足，但无法在家庭教育上提供高质量的引导。项目中有极端案例如家长沉迷赌博、家庭结构破裂等情况，使得孩子完全依赖社区托管服务，家庭教育严重缺位。家庭环境支持匮乏，从系统层面加剧了残障儿童的教育性障碍。

学校“随班听课”制度导致的发展性障碍。TIE架构需评估孩子取得的成长成就，而学校虽允许残障儿童和普通学生坐在一个班里，但教学的内容并不适用于残障儿童，对其生存能力、心理认知、依附功能等的提高效果甚微，使得落下的功课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发展性积累障碍。

社区“未对症下药”式的资源性障碍。尽管多数残障儿童能够获得一些政府的正式资源（如课业辅导、体能训练），但针对心理干预、认知提升和创伤疗愈的核心需求，却缺乏专业化、精准化的资源链接。这种“一刀切”的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性障碍。

3.TIE架构个体与环境双向性交互障碍

TIE架构下残障儿童与环境之间的交流互动会呈现相互建构的特征。由于良好社会环境的支持不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一边倒式，而是服务对象与周围他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的支持，属于一种双向的获得[6]，因此在环境支持不足与质量低下的情况下会对康复与提升形成一定的排斥力，阻碍残障儿童拥有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削弱其潜能和自身积极性。环境对残障儿童的影响不是线性关系，残障儿童身处环境会做出适应行为，如社交回避等，这些异常行为往往会更加强化环境的排斥倾向，形成双向性的交互障碍。

（二）应对措施

1.TIE架构下的个体介入

开展“一对一心理介入”。由专业心理治疗师与社工开展，通过聊天式的交流方式与残障儿童建立专业关系，进行交流，并由现场志愿者记录整理。通过残障儿童喜欢的游戏形式，获取表现信息并进行分析。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心理治疗师耐心询问、悉心引导，与残障儿童建立信任关系的同时，分析其“症结”所在，鼓励儿童勇敢表达。

开展心理关爱与康乐活动。心理咨询师与残障儿童面对面交流，在心理方面深挖需求，引导残障儿童自发地思考问题，并且在介护中培养残障儿童自我问题解决的能力、自我情绪调节的能力。当残障儿童由于介入措施产生认知、心理、交流能力等方面的提升时，由在场的专业心理师与社工提供正向反馈，强化奖励机制，提升残障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2.TIE架构下的环境介入

在家庭层面，设置家庭疗愈点。开展“医+康+心+法”多维协同介入。部分家长将儿童残障归咎于命运或耻辱性成因，还有的家长对提供良好的教育方式处于失能状态。本项目定期开展家庭联合治疗，全面构建多维支持系统，为家庭提供医学护理技巧、普

及残障康复知识、转变错误认知、解读法律政策等服务，推动多维度服务协同介入，发挥合力效能。

在学校层面，开展校园专项讲座。打造符合群体特殊需求的高质量教学环境，针对残障儿童的成长成就与个性化受教育环境，开展有助于残障儿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升认知水平、提升保障自身权益意识的校园讲座，用引导性提问与科普教育的方式，启发残障儿童思考，逆转“滚雪球”般的障碍积累趋势。

在社区层面，建设残障儿童社区综合介护中心。为残障儿童搭建介护中心，关注可能影响服务对象行为的诸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7]。社区综合介护中心作为资源枢纽，整合心理介入、医疗康复、课堂教育、法律支持等专业性服务，同时搭建“社区—专业机构—学校”与残障家庭的多方协作网络，将社区综合介护中心打造成环境质量提升的介质和康复资源枢纽。

3.TIE 的个体与环境交互维度下介入

在 TIE 架构视角下，项目的介入聚焦于增强残障儿童与社区环境之间的积极交互。通过组建社区福祉援助联盟，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与社区代表牵头，联合居委会、家长代表形成领导小组，并吸纳教育机构、康复资源、志愿者组织及公益基金会等多方力量，构建起跨部门协作网络。该网络不仅整合专业团队与志愿者资源，还通过定期开展社区融合活动，形成“资源输入—能力提升—环境反馈”的闭环服务模式，系统改善儿童所处的支持性环境。

项目同步建设社区圃源庇护点，以嵌入式社区布局提供临时照料、社交活动及非正式教育服务。庇护点配备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引导残障儿童与普通儿童共同参与活动，并在社区层面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与家庭支持专员定期家访制度。同时，组织家长互助小组，促进照顾者之间的经验共享与情感支持。在此结构中，介护中心负责专业资源的统筹调度与能力建设，庇护点则深入社区日常场景，增强服务的可及性与渗透力。

这一多层次介入体系，旨在推动残障儿童从“被动受助”转向“主动参与”，协助其实现“启知—启智—启志”的阶段性成长。通过持续强化个体能力、拓展支持网络、优化环境互动，项目促进康复理念从外在的“他者治愈”逐步转化为依托环境与自身资源的“自我治愈”，在与环境的积极交互中提升其整体福祉与社区融入水平。

五、结论

本文基于 TIE 架构，通过对 J 街道残障儿童综融介护项目的实践探索，得出以下核心结论：个体层面，专业心理团队对残障儿童进行干预、介入、强化，在认知提升、自我效能提升等方面进行赋能，获得显著成效；环境层面，提高家庭、学校、社区三方面的环境适配度，以包裹性的姿态为残障儿童营造了科学、适宜、高效的康复环境；在人与环境交互层面，通过资源共享与活动协同形成多层次干预，最终实现“个体赋能—环境支持—交互强化”的良性循环。综上可见，TIE 架构在残障儿童社区康复领域展现出较高的参考价值。通过 TIE 架构对环境质量的重视，采用“个体与环境交互”干预服务对象，使残障儿童的各方面功能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验证了该理论架构在中国残障服务事业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研究提出的残障儿童社区康复中的 TIE 架构实为对原 TIE 架构的优化。原 TIE 框架呈现抽象且高度概括的特征，本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优化：第一，添加了个体维度和环境维度的分析，补足了个体与环境交互障碍的成因；第二，将原架构应对行为和接触环境质量的关系做出转变，体现康复专业性；第三，在残障儿童需要被评估的指标中加入激发自身积极性，强调了残障儿童对于康复强烈渴望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第四，指出了介入残障儿童服务后形成的隐性影响，即在政策扶持、媒体舆论、法律制定等社会文化符号方面，能更深层次地服务整个残障儿童群体。本研究对整体架构进行了细化，加强了 TIE 架构在残障儿童社区康复中的应用性。

总体来说，本项目的综融介护服务模式与实践经验为中国残障儿童社区康复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通过改善环境增强残障儿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发挥 TIE 架构下社区康复的优势，达到提高环境与资源质量，为残障儿童赋能，最终实现康复的目的，进一步实现残障儿童个体参与、环境友好包容的良性互构。

参考文献

[1] 王红，戴丽，陈志才，等．中国孤独症儿童社区康复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04):455-458.

[2] 顾东辉．社会工作概论 [M].2 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EB/OL](2021-07-08)[2026-01-31].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1/content_5626391.htm.

[4] 许晏子．社会工作介入残障儿童综合康复的实务研究 [D].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 ,2021.

[5] 云文静．综融取向下困境家庭儿童行为偏差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D]. 长春：长春理工大学 ,2020.

[6] 童敏．双向视角：“人在情境中”实践逻辑的新解释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3(22):8.

[7] 赖锦辉．“人在情境中”视角下智力障碍者社会工作个案服务探索 [J]. 社会与公益 ,2021,12(04):59-6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毕业设计（论文）重点项目“TIE 架构下的残障儿童社区康复研究”（1011LW250077-A22）。

（作者：周蔚，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徐千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法学本科生）

社会群体依恋的内涵与当代价值
——以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为视角

马靖怡　王　浩

摘要：社会群体依恋是指个体在超越私利的社会目的的引领下，对所在社会群体形成的深度情感联结与行为融合，表现为对群体的依赖以及与群体目标、规范的高度一致。其特征包括群体性、独特性、融合性和等级性，其中家庭、民族、国家等核心群体对群体依恋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社会群体依恋同样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价值，不仅可以实现教育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也能为个体道德行为提供规范约束和为个体道德情感提供社会支持。可以借助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维度，培养学生的社会群体依恋。
关键词：社会群体依恋；道德教育；涂尔干

一、社会群体依恋的内涵

（一）社会群体依恋的定义

涂尔干（1858.04—1917.11, 法国社会学家）将个人目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维持生命为目的，另一类是以享受生命和维持家庭为目的，当行为目的与既定的道德标准相契合，该行为即被赋予道德属性。涂尔干论证说，“除了由个人的联合所形成的群体，即社会，不会再有任何外在于或超越于个人的东西了。”[1]60 只有社会作为个体行动的终极指向时，道德和道德教育才得以显现，基于此，社会群体依恋成为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框架中的核心范畴。具体而言，社会群体依恋是指个体在超越私利的社会目的引领下，对其所属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区或国家等）形成的一种程度较深的情感联结与行为融合。这种依恋不仅表现为个体在情感层面对群体的依赖，更体现在行为上与群体目标、规范及价值观深度一致。

从情感联结的角度来看，社会群体依恋不仅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归属感，还能激发他们对群体的热爱与忠诚。当个体面临挑战与困难时，他们往往会从群体中寻求支持与帮助，共同渡过难关。在行为层面，社会群体依恋促使个体在行动目标上和群体保持一致。当个体认同并内化群体的价值观与目标时，他们会积极践行群体的价值观，为群体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此类行为的一致性有助于促成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此外，社会群体依恋还使个体受到群体规范的约束。当个体对群体产生深厚的依恋时，他们会更加珍视并维护群体的形象与声誉，自觉遵守群体的规范。

社会群体依恋的发展是社会得以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道德教育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构建于学校环境下的社会群体依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深刻的情感认同，使学生遇到来自外界的挑战时可以获得群体的支持和力量。这一依恋机制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又能够推动他们全面发展。因此，社会群体依恋对学生情感和行为的双重影响正是学校道德教育追求的目标之一。总体而言，社会群体依恋能够为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二）社会群体依恋的特征

1. 群体性

社会群体依恋彰显了个体存在的群体形式，即社会群体依恋现象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是个体需要先将自身纳入某一社会群体之内。涂尔干提出，“当我所保护的是像我一样的某个人的健康，当我所考虑的正是他的幸福或启蒙，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1]59 这种变化在情感中的表现就是社会群体依恋。人类道德行为、价值观及道德目标的形成深受所在社会环境影响。因此，个体追求的道德目标并非单纯考虑个人私利，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社会群体依恋也赋予了个体存在的群体“内容”，即特定的身份认同、行为规范和群体特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其促使个体内化群体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群体身份。这种身份为个体提供了社会归属感，还深刻影响着其情感反应和行为模式。社会群体依恋之所以能够提供此“内容”，是因为群体本身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拥有一套相对稳定且被个体共享的实践规范。个体通过紧密联系群体学习、接受并内化其特有的元素，进而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使个体确立自身位置和价值。

2. 独特性

社会作为一个复杂且独立的实体，拥有自身的存

在方式，涂尔干用“铜与锌”两个要素的结合阐释了社会的独特性，“铜与锌这两种基本要素都是柔软的、可塑的，当把它们组合起来时，得到的却是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的新物质，即坚硬的青铜”[1]62。社会自身的独特属性超越了个体属性集合的层次，形成了全新的、不可还原的整体特性。因此，社会群体依恋的根源来源于社会本身。但社会群体的独特性中也蕴含着稳定持久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没有随着时代变换而改变，而是保存下来成为社会群体依恋的核心对象。不同社会时期因文化背景、领导群体和社会成员结构不同，而各有其道德伦理与规范，这些伦理规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又确保了个体对所属群体的依恋在本质上维持稳定。

3. 融合性

社会群体依恋植根于个体与社会在语言、价值观、社会规范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其中与重要他人的联结是社会群体依恋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涂尔干认为若想将个体的自我与另外一种存在联结起来，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种存在相互融合，社会群体依恋由此形成。他论述道，“单身者中的自杀频率是已婚者中自杀频率的三倍，无子女家庭中的自杀频率是有子女家庭中自杀频率的两倍。”[2] 这一差距表明，个体的自杀倾向由于伴侣和家庭的出现得到缓解。换言之，个体与社会融入程度越高，社会凝聚力越强，社会群体依恋程度也就越高。

4. 等级性

个体置身的众多群体中，家庭、民族、国家等核心群体本身存在等级结构，因此个体的社会群体依恋也具有相应的等级特征。涂尔干说，“当人们受到它们施加在他身上的这三种力量的支配时，他们在道德上才是完善的。”[1]74 等级结构的最低一级是家庭依恋。家庭是与个体最为接近的社会群体，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归属与依靠。位于中间一级的是社会依恋。伴随社会发展不断集中化，个体被纳入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享有共同的社会目标并致力于建设社会。这种基于共同目标的联结使社会依恋程度略高于家庭依恋。位于最高等级的是国家依恋，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最高组织形式，爱国主义驱使着每一个个体都为国家的发展付诸行动，甚至做出牺牲。因此，社会群体依恋的最高理想在于国家依恋，它既体现了个体对最高层次社会群体的认同，也显示了人类崇高的政治生活追求。

二、社会群体依恋的教育价值

（一）促进教育与社会协同发展

第一，增强教育主体的凝聚力。当个体对其所属的教育社群产生依恋时，这种情感既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又促进了知识、技能与价值观的有效传递，形成了教育的良性循环，教育社群内的社会成员互相协作，能够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能迅速回应教育改革提出的挑战。

第二，形成稳定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强烈的社会群体依恋可以助推积极教育氛围的产生，减少冲突与分歧。教育社群成员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同时，也会考虑到群体福祉，这种自我约束和责任感是教育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社会群体依恋的培育，不仅是提升教育凝聚力的关键，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

（二）促进个体道德发展

1. 为个体道德行为提供规范约束

道德规范是社会价值观在群体内部的具体体现，为个体行为提供行动框架。随着个体在教育环境中承担起作为成员的义务，道德作为各种规范的集合体也随即发生作用。当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较强时，他们倾向于将群体的道德规范视为自我行为的参考标准。受此影响，个体与群体在行为上保持一致的同时也在精神上形成共鸣，从而增强教育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同时，道德规范通过复杂的反馈机制塑造个体的道德认知与行为习惯。当社会群体依恋与道德规范深度融合时，可以在社群内部催生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源自成员间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情感联系，激励着成员为群体的发展做出努力。

2. 为个体道德情感提供社会支持

教育社群内的道德情感发展是一个涉及文化、心理、社会互动等多个层面的多维度过程，个体作为教育社群的基本构成单元，在与教育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社会群体依恋。在和社群的道德要求契合过程中，个体不断获得来自群体的社会支持，这是“人们从社会中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3]。与此同时，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依恋类型大致可分为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三种[4]。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倾向于坦诚地表达情感，通常能够主动、积极地提供社会支持；相比之下，焦虑型依恋的个体则可能过度依赖群体认可，情感表达强烈频繁但情绪调节能力较弱；回避型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抑制情感表达，避免依赖群体，不轻易向他人袒露内心感受。总之，不同的依恋类型对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方式、意愿和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三、社会群体依恋的培养路径

（一）加强家庭教育

在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中，家庭被视为道德教育的起点并对个体的发展有启蒙意义。涂尔干强调，“这种作用可以而且必须始于家庭，从摇篮起步。”[1]200 个体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心理状态尚未稳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导致习惯成为塑造个体行为模式与道德观念的关键力量。家庭是个体最初接触并长期相处的社会环境，其内部的互动模式和关系结构对个体有着重要作用。父母则是家庭的核心成员，其言谈举止、教育理念均对个体习惯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父母需要遵循个体发展规律，建立正确的家庭培养模式，帮助个体养成习惯并内化道德规范。

（二）优化学校教育

涂尔干在探讨学校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时首先说明了学校存在的意义。他指出，儿童离开家庭时的道德状态和理想的道德状态之间存在差异，需要一个有效的中介机制予以填补，学校正是担此重任的关键机构。学校主要借助以下方式培养个体的社会群体依恋。

1. 确立集体道德目标

“道德要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公民就必须趋于集体生活。这里唯一的条件就是，它必须依恋集体的目标，而且这些集体目标也必须完全是道德的目标。”[1]66 因此，学校作为一个大型的集体，想要在个体身上构建社会群体依恋，需在集体内部设置统一目标。这些目标旨在塑造个体的集体意识，进而形成对学校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在此基础上，学校内部的每一个个体都对周围成员产生友好与关爱之情。唯有如此，个体才会对所在的社会群体产生依恋，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是集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树立集体道德权威

集体之内，成员将社会道德权威看作是行动指南，遵循其道德命令并维护由此建立的道德秩序。涂尔干在论证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时强调，“有一种能够反抗我们、超越我们的东西。我们并未确定它的存在或者它的性质。它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它支配我们，而不是表达我们。”[1]27 因此，学校应构建一个道德权威体系，确保全体成员都能在该体系下开展行动。“课堂就是一个小社会，组成课堂的社会是因为教师所履行的职能以及学生们不成熟的心理状况而结合在一起的。”[1]145 教师需要在其中展现出坚定的决断力和意志力，只有当教师具备一定的群体权威，才能帮助学生建构起稳固的社会群体依恋。教师必须对所在群体有坚定的信心，并承担起传递道德权威的责任。

3. 设立集体道德规范

在学校中，每位成员都需自觉遵守道德秩序，履行作为学校成员的基本义务。涂尔干借助劳动分工论述了这种秩序的意义，“在我们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中，劳动有非常精确的分工。这些工作像是许许多多的功能，必然包含有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听任他们为个人冲动所左右，为了使协作成为可能，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规定。”[1]235 与此惩罚类似，学校要想培养个体的社会群体依恋，同样需要借助强制性的惩罚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惩罚的功能不在于使违规者痛苦，而是为了恢复并维护法规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学校借助惩罚机制逐步引导个体养成习惯，一旦习惯得以内化，个体就能自主支配行为。

（三）强化社会教育

首先，个体由儿童变为成人后，其心理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心理结构完善的同时，也显示出对深层次心理发展需求的渴望。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SDT 指出，人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即自主、才能和关系。其中关系的需要是指个体在解决特定问题时拥有可以相互依赖之社会资源的需要，这一需要的反面是孤独感[5]。社会群体框架内，个体通过持续的沟通、协作、信息共享，共同塑造群体的文化特性，并从中得到必要的情感支持与社会资源。

其次，当个体内心产生关系需求时，为避免孤独感的袭扰，会主动寻求与周围个体及所属群体的联结，并产生依恋。若这种需求得到满足，将有助于个体与群体的和谐融合，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如果遭遇冷漠或排斥，则可能使个体感到被边缘化的痛苦，加剧其与群体之间的分裂。

最后，个体对群体的依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分享个人经历等途径得以强化。当个体在群体中担任关键角色并获得其他成员认同时，会获得一种正向反馈，这些正面激励不断提高其对群体的归属感，并且进一步巩固自我价值感。因此，个体与所在群体的互动质量以及在群体中的具体经历，成为塑造社会群体依恋的关键要素。

综上所述，涂尔干所阐述的社会群体依恋理论，从概念界定到特征，再到道德教育价值，无疑为我们开拓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哲学和心理学的道德教育研究思路。社会群体依恋的实现，与其说是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平衡，不如说是寻求道德、教育和社会的和谐共生。教育是社会的子系统之一，道德教育又是教育的子系统之一。因此，对社会群体依恋的探讨核心在于培养学生建立对家庭的深厚情感联结，保持对学校的积极参与态度，践行对社会进步的主动担当，这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1] 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 [M]. 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0,59,62,74,99,143,106,73,145,151.

[2] 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 自杀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9.

[3] 张文宏，阮丹青.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J]. 社会学研究，1999(03):14-19,22-26.

[4]Ainsworth M D,Bell S M.Attachment,exploration, and separation:illustrated by the behavior of one-year-olds in a strange situation[J].Child Development,1970,41(01):49-67.

[5]Ryan R M,Deci E L.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01):68-78.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乡村振兴下依托高校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模式探析

——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例

谢伟芳　秦品珠　段　英　杨　丹　陈涛涛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背景下，推动城乡接合部社区老年教育智慧化发展对提升老年群体福祉、促进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例，探析依托高校构建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模式。研究分析了当前城乡接合部社区老年教育面临的资源短缺、技术应用不足、协同不畅及参与度低等问题，阐述了高校在师资、技术、课程体系及系统办学等方面的显著优势。结合江苏开放大学的实践案例，验证了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研究表明，依托高校构建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模式，能有效整合资源、弥合数字鸿沟、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为乡村振兴战略下老年教育的均衡发展与质量提升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高校赋能；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江苏开放大学

一、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1]，城乡接合部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地带，其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为老年教育带来了智慧化转型机遇[2]。高校，特别是开放大学，凭借其教育资源富集、技术应用领先和系统覆盖广泛等优势，成为推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3]，江苏开放大学在智慧老年教育领域的积极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本研究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依托高校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模式，创新性地构建了融合线上线下、强调高校—社区—老年学员三方联动的教育模式框架，突出“智慧”特征与“城乡接合部”适配性。基于江苏开放大学翔实的实践案例，验证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同类高校及地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智慧老年教育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范本，是构建基层学习型社区的重要实践[4]，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智慧老年教育发展较早，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应用、在线课程开发、社区融合实践及应对老龄化与乡村发展结合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强调个性化学习体验与社会参与。国内研究近年来关注度提升，主要集中在智慧技术应用于老年教育的可行性、城乡社区老年教育需求分析等方面，但将乡村振兴、高校资源、城乡接合部特性与智慧老年教育进行系统性整合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5-6]。

三、 江苏开放大学参与老年教育实践现状

（一）学校办学基础概况

江苏开放大学坚守“面向基层、服务全民、终身育人”的办学定位，依托全省73家市县办学机构，构建了覆盖全域、纵向贯通的系统化办学网络，拥有成熟的远程教育技术平台、海量数字化教育资源与专业师资队伍，是江苏省终身教育与社区教育的核心支撑主体。学校自20世纪90年代创办江苏省空中老年大学以来，深耕老年网络教育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智慧老年教育办学经验。在学历教育层面，学校于2014年在全国率先开展老年本、专科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艺术学院开设摄影、书画、诗词赏析3个本科专业方向；摄影与摄像艺术、中文2个专科专业，截至2023年5月，累计培养毕业生900余人。在非学历教育层面，围绕手机技能、隔代教育等老年人实际需求开发课程，充实老年教育菜单。

（二）实践举措与成效

1. 智慧化课程体系构建

针对城乡接合部老年群体需求，开发涵盖健康养生（如慢性病管理）、文化艺术（如地方戏曲赏析）、信息技术（如智能手机应用、防范网络诈骗）、乡村振兴相关（如现代农业科普、农产品电商基础）等多元化线上课程[7]。此外，智慧化课程需强化本土化内容

设计[8]，特别体现在文化艺术方面，如：江苏开放大学开展的老年系列课程与培训“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昆曲”和“青石村社区手机摄影与短视频制作”课程等。

表 1 江苏开放大学 2025 年社会教育培训部分课程设置表

分类	学院名称	项目名称
综合能力提升	艺术学院	江苏开放大学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综合能力提升	老年发展学院	2025 年老年教育培训项目
综合能力提升	老年发展学院	2025 春季老年教育社会培训项目
艺术素养	艺术学院	老年艺术精品班
数字技能	设计学院	青石村社区手机摄影与短视频制作
数字技能	设计学院	玩转自媒体：从零到流量达人夜校培训
传统文化	老年发展学院	茶味初探：茶文化与茶艺
传统文化	老年发展学院	金石可镂：篆刻
职业技能	环境生态学院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中级）培训
职业技能	老年发展学院、乡村振兴学院	2025 年茶艺师、评茶师职业技能培训班

2. 双师型队伍建设

整合校内专业教师与校外行业专家、社区能人、志愿者，组建老年教育师资库。定期开展系列专项培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老年教育教学方法，如“体质辨识与保健养生”“老年法律守护计划”“老年常见突发健康问题的防治和应急处置”“中老年心理保健”等专题讲座。

3. 智慧化平台搭建应用

江苏开放大学打造江苏老年教育网、江苏学习在线两大专属平台，作为老年社区教育的核心支撑，为服务延伸社区、满足老人多元需求提供关键保障。其中，江苏学习在线不仅提供成熟的线上运营底座，还衔接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存认社区老人学习成果以激发持续学习热情；江苏老年教育网依托前者打造，聚焦社区老人需求，整合五大类 23 小类、2284 门课 12294 个单元的适老资源（含数字素养、健康养生等）。现有 51 余万名注册用户，大量基层社区老人通过其进行学习，助力该校将老年社区教育服务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4. 双线融合教学组织

线上提供自主学习资源与直播互动课堂，线下依托社区学习点组织面授辅导、小组活动、实践操作（如智能手机实操、摄影采风）及成果展示（如老年书画摄影展），增强体验感与社交性。如无锡开放大学 2025 年春季学期与长江社区合作开展“银龄云学堂”项目，借“线上直播 + 线下示范”教杨式太极拳等课程，构建社区 15 分钟智慧学习圈。东台老年开放大学福利院分校送课活动，会有计划地将老年教育课程、技能培训及文体活动送至福利院，助力老人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

5. 合作网络拓展

与南京各街道社区居委会、养老服务机构、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开展“送教入社区”、智能技术科普讲座、养教结合试点、一院一社区等项目。自 2017 年起，与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共同立项指导 33 家养教联动基地建设，12 个二级学院与南京 12 个街道社区结成社区老年教育工作对子。如武进老年开放大学积极开展送教上门活动，常年开设艺术健身类、生活类、信息技术类课程，目前基地在学人员 600 余人，结业学员超过 8000 人；镇江开放大学——金山水城“幸福小院”养教联动基地以艺术健身、戏曲乐器、信息技术三大类课程为主体，每年培训超过 2000 人次的老年群体。

四、乡村振兴下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存在问题

（一）教育资源供给适配性不足

一是课程数量与多样性不足。当前适合城乡接合部老年人特点的智慧化课程总量不足，贴合本地文化、乡村振兴实用技能（如本地特色农产品网络推广基础）方面有待加强。二是课程更新时效性滞后。部分课程内容（特别是信息技术类）未能紧跟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快速更新，如新型社交工具、智慧医疗应用等内容覆盖不足。三是分层适配性欠缺。对城乡接合部老年群体内部差异性（如文化水平、职业背景、数字基础）关注不够，课程难度分级和教学方式未能精准匹配不同层次学员需求。

（二）教育技术应用效能偏低

一是平台适老化改造不充分。现有智慧教育平台界面设计、操作流程对部分低学历、低数字素养老年人仍显复杂，字体、声音、交互方式等适老化改造需深化。智能教学设备在社区学习中需深化语音交互与简易界面设计[9]。二是系统性培训缺乏。对老年人使用智慧平台和设备的培训零散、不够系统深入，导致部分学员遇到操作困难时无法有效解决，影响学习持续性。三是技术维护更新滞后。受限于资金和人力，平台及设备的日常维护、故障响应、版本升级有时不够及时，影响用户体验和学习效果。

（三）社区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

一是协同运行机制不完善。高校与社区在项目规划、课程设置、活动组织、资源调配等方面的职责边界和协作流程不够清晰，存在沟通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二是资源共享深度不足高校的优质课程、师资、技术平台与社区的场地、本地化信息、组织动员能力未能实现高效整合与深度共享，存在资源闲置或重复建设现象。三是沟通渠道不通畅。缺乏稳定高效的日常沟通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影响问题及时发现与协同解决。

（四）老年群体学习参与动力不足

一是主观参与意愿薄弱。部分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或对智慧技术存在畏难情绪，学习主动性不高。宣传推广的精准性和吸引力有待加强[10]。二是客观参与条件受限。部分老年人仍需承担家务、干农活或照料

孙辈，难以保证固定学习时间；线下集中活动参与受精力、体力和空间距离限制。三是参与机会不均衡。智慧学习点覆盖不均、网络条件差异、设备可及性不同，导致不同社区甚至同一社区内老年人的学习机会存在差距。

五、对策与建议

（一）优化智慧教育资源供给

坚持需求导向，联合社区深入调研，重点开发贴合乡村振兴主题（基础农业知识、本地文旅、环保）、高需求（健康、智能技术）的智慧化微课程、直播课。构建分级资源体系，针对学员差异，设计入门、基础、提高等不同难度层级的课程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选择。开放共享资源生态，依托省域开放大学体系或联盟，共建共享优质智慧老年教育资源库，引入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如博物馆、文化馆线上资源）。

（二）提升教育技术应用效能

深化技术适老化改造，持续优化平台界面交互（简化流程、增强语音 / 手势控制）、开发老年人专属辅助工具（如大字阅读模式、语音输入），选择易用性强的智能教学设备投放社区。完善培训支持体系，开发体系化、趣味性强的智能技术普及课程（线上 + 线下），建立“线上智能客服 + 线下社区辅导员 + 学员互助”的多层级技术支持网络，推广“数字伙伴”志愿行动。探索创新技术应用，试点应用 VR/AR 技术于文化体验、健康科普等课程，利用大数据分析为学员提供更精准的学习建议和资源推送，探索 AI 助教应用。

（三）强化社区与高校协同效能

健全协同运行机制，建立高校—社区联合工作组，制定详细合作章程，完善定期沟通（线上线下结合）、信息共享（共建需求与资源数据库）、联合决策（课程与活动计划）流程。深化资源共建共享，高校开放平台、课程、师资库，社区开放场地、本地人力资源、需求信息，合作开发具有社区特色的本土化智慧课程，共建共享学习点设施设备。构建联合评价体系，共同制定包含智慧化水平、适需性、满意度、社区影响等维度的评价指标。定期开展联合评估，评估结果用于共同改进。

（四）激发老年人参与动力

精准化宣传引导，利用社区宣传栏、微信群、老年人口口相传及成功学员现身说法，多渠道宣传智慧学习的便利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组织开放日、体验课活动。增强学习吸引力，课程设计强调实用性、趣味性、互动性。教学活动融入竞赛、展示、社交元素（如学习社群、兴趣小组）。善用激励机制（学习积分、荣誉表彰、成果展示）。提供灵活学习方式，线上提供碎片化学习资源，支持随时学、反复学。线下活动时间安排充分考虑老年人作息，形式灵活多样（如短时工作坊、主题活动）。为有特殊困难学员提供个性化帮扶（如上门辅导），显著提升老年学员的社会参与感[11]。

六、结论

本文以江苏开放大学为实践案例，探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依托高校构建城乡接合部社区型智慧老年教育模式的路径。研究发现，依托开放大学的体系优势、资源优势与技术优势赋能城乡接合部老年教育，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教育资源短缺、智慧化水平不足、供需错位等痛点，是推动老年教育均衡发展、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构建的“高校支撑、社区落地、学员主体、智慧赋能”教育模式，以精准需求研判为基础，以双线融合教学为载体，以多元协同机制为保障，形成闭环式育人体系，具备较强的实践可行性。江苏开放大学的初步实践验证了模式在扩大覆盖面、提升学员能力（尤其是数字素养）、增强社区活力方面的有效性，但在资源深度适需性、技术适老化、协同长效性等方面仍需完善。未来推进城乡接合部社区智慧老年教育建设，需持续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聚焦精准资源供给、技术适老提质、校社协同增效、学员活力激发四大核心维度，持续优化模式体系，打造标准化、可推广、高质量的智慧老年教育发展范式，助力积极老龄化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

[2] 陈立新 . 城乡接合部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路径研究 [J]. 中国远程教育 ,2023(05):32-38.

[3]韩振燕,刘佳.智慧老年教育:模式、困境与路径——基于江苏开放大学的实践[J].中国远程教育, 2020(02):42-4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 [EB/OL].(2023-08-30)[2026-04-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07259.htm.

[5] 顾沛 , 洪煜 . 乡村振兴战略下老年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J]. 中国成人教育 ,2021(06):51-55.

[6] 黄健 , 张旭 . 城乡接合部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共享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26):63-67.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EB/OL].(2016-10-19)[2026-04-15].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9/content_5121344.htm.

[8] 李志刚 , 王丽 .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课程本土化开发策略 [J]. 成人教育 ,2024(02):45-50.

[9] 张伟 , 刘洋 . 智慧教育平台的适老化改造 : 挑战与对策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3(11):89-95.

[10] 周洪宇 , 董显辉 . 关于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的提案 [J]. 教育与经济 ,2018(03):71-76.

[11] 郑晓东 , 林静 . 智慧老年教育对城乡接合部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 [J]. 开放教育研究 ,2024(01):108-115.

（作者单位：江苏开放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以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齐庆国　黄　欣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肩负着为国家输送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建设者的使命。本文以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为研究样本，结合该校石油化工类专业特色与甘肃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从融入价值、现实困境、优化路径三个维度，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实践策略。研究旨在为同类院校推进课程思政提质增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入路径；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推动区域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甘肃省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地处省会兰州，其办学定位具有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双重使命，在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责任重大。当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研究仍有待深化。因此，如何结合高职院校专业特点与地域文化特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成为新时代高职院校面临的重要实践课题。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就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2.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是指高职院校在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实训实习课程等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教学模式，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二）理论基础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高职院校将其深度融入课程思政，是落实职业教育“大思政课”改革要求的具体实践。

2.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理论

立德树人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德技兼修是职业教育的核心，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德技兼修目标的重要载体。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是高职院校践行立德树人使命、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

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课程思政教学中，通过情境创设、实践体验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体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能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与实效性，实现价值认同的内化。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实践价值

（一）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职业教育课程思政，能够使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增强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提升课程思政质量的重要路径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内容空洞、形式单一、

与专业结合不紧密[1]，导致思政教育效果不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包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文化自信等，这些元素与专业课程的结合能够为课程思政注入鲜活内容。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专业技能的提升与思想道德的养成同等重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民族团结意识与社会责任感[2]，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服务区域发展的客观需求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高技术技能人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能够培养学生主动扎根西部、服务民族地区的职业情怀与行动自觉，为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3]。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与长远意义。

从人才培养层面来看，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与历史观的重要举措。帮助青年学生认清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紧密联系，破除狭隘认知，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爱国爱党、团结友善的道德品格，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向同行。引导各民族师生在技能学习、岗位实训、项目协作中互帮互学、同心共进，把民族团结要求内化为职业素养与行为习惯。

从职业教育发展来看，有助于营造民族团结的育人氛围。立足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该举措能够推动民族团结文化与工匠文化、产业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具有职教特色的民族团结育人阵地。依托实训基地、技能工坊、校企合作平台等校园载体，将团结互助、携手共进的民族理念融入实训教学、技能比拼、师徒传承全过程。同时丰富民族团结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构建团结和睦、崇德尚技、聚力奋进的职教校园生态，为院校高质量发展、技能人才培养筑牢思想与环境根基。

从落实教育强国层面来看，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能够培养一批认同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团结、担当时代使命的新时代人才。引导青年自觉践行民族团结要求，主动投身强国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起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合力，为社会长治久安、国家繁荣发展筑牢思想屏障，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稳步推进。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一）树立正确融入理念，强化思想引领

1. 提升教师思想认识与融入自觉

定期组织教师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帮助其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政策要求与融入价值，引导教师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增强教师主动融入的责任担当。

2. 明确融入目标定位

结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学校专业特色，制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的具体目标。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民族团结、专业精湛、勇于担当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总体目标，不断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提升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鼓励学生主动服务民族地区发展。

3. 营造良好的融入氛围

利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等平台，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及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建设民族文化长廊、展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定期开展各类民族团结主题教育，营造“各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校园氛围。

（二）重构课程内容体系，打造“专业＋地域”特色的融入载体

1. 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成立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团队，系统梳理本专业课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如“大学语文”课程可选取甘肃特有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石油化工类专业课程可以聚焦甘肃、青海、新疆等民族地区石化行业建设成就，讲述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的奋斗故事，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4]；“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专业课程中，可以介绍民族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案例，引导学生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等。

2. 整理特色校本课程思政资料

结合甘肃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与学校专业特色，整理“甘肃民族文化概论”“民族地区石化行业建设与发展”等校本课程思政资料，内容涵盖甘肃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民族团结故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利用地方民族文化增强课程亲和力与实效性[5]。

3. 拓展融入载体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校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专业实训、顶岗实习、社会实践等环节。组织学生到民族地区开展实习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了解各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开展“民族团结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民族地区的扶贫、文化、支教传承等志愿服务，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团结意识。在第二课堂建设中，培育与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手工艺相关的学生社团、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民族文化相关活动，营造各民族一家

亲的良好氛围；同时，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民族团结主题影片、纪录片，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分享活动；邀请民族地区的企业家、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来校开展主题讲座，分享他们在民族地区创业、工作的经历与感悟。

（三）创新教学方法手段，提升融入实效

1. 采用情境教学法

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创设相关教学情境，可模拟民族地区特有的工作场景、设置民族团结相关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思考、交流、解决问题，增强学生的代入感与体验感。

2. 运用案例教学法

收集整理国内外民族团结、民族地区发展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民族地区工农业发展、技术创新等与学校专业相关的案例，将其融入课堂教学。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从案例中感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3. 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

开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线上教学资源，如民族文化专题微课、民族团结案例库等，供学生自主学习；运用虚拟现实（VR）等技术，模拟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场景等，让学生获得沉浸式学习体验；通过线上互动平台，组织学生交流讨论，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4. 实行差异化教学模式

针对各民族学生的文化背景、认知特点，采用差异化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特别是在课堂环节鼓励各民族学生之间合作与交流；在教学内容中也可以适当融入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学生的文化差异。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1. 组建专业化教学团队

整合学校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等资源，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分工，思政课教师负责理论指导与专题教学，专业课教师负责专业课程中的元素挖掘与融入。

2. 加强教师培训与研修

建立常态化的教师培训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的培训与研修活动；鼓励教师到民族地区的高校、企业、政府部门挂职锻炼、调研学习；支持教师开展相关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的理论研究能力与实践教学水平。

3. 建立教师交流合作机制

搭建校内教师交流合作平台，定期组织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等，促进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与其他高职院校、民族地区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交流研讨等活动，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与融入模式等。

（五）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强化激励保障

1. 构建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素养纳入学生评价体系。评价内容从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民族团结意识、跨文化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入手；评价方式要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要与学生的评奖评优、就业推荐相挂钩，引导学生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2. 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的成效纳入教师教学评价体系，评价指标重点围绕教学方案设计、课堂教学效果、学生反馈、教研成果等方面；采用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相结合的多样化方式进行，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3. 强化激励保障措施

设立课程思政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校本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建设、教师培训等工作；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思政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同时为教师提供必要的教学条件与资源支持，确保融入工作的顺利开展。

青年是民族团结的传承者、实践者与守护者，高职学生作为产业建设、基层发展的生力军，其民族认同感、共同体归属感直接关系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社会稳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教育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高职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核与价值底色。未来，高职院校应持续立足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和办学特色等，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内核，不断优化课程思政融入路径，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模式，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引导广大高职学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职业品格，成长为拥护民族团结、担当时代重任、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助推各民族交融共生、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筑牢人才根基与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 李建国 .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12):45-49.

[2] 陈静 . 新时代高职院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与路径 [J]. 中国成人教育 ,2020(18):67-70.

[3] 张艳 .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03):186-190.

[4] 刘伟 . 石油化工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以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08):56-60.

[5] 马晓燕 . 地域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以甘肃为例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1,37(05):123-12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甘肃省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职学校课程思政实践研究——以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为例”（2025-YJXM-45）。

（作者单位：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陕西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调查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　丹　王国成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中小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青少年思想根基的核心要求。本文以陕西省中小学为调研对象，系统探究区域内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开展现状、存在问题及优化路径。调研结果显示，陕西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基础扎实、推进态势良好、育人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育人体制机制不健全、城乡资源配置不均、各学段教育衔接断层、家校协同育人支撑薄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区域教育实际，提出健全全员全过程育人体系，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构建螺旋上升式学段衔接机制，深化家校协同共育格局等优化策略，提升陕西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精准性、系统性与实效性，为区域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陕西省；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现状；育人对策

一、前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和精神力量之魂，是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奋进的精神纽带。中小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阵地，承担着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重要使命，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环节。2024 年 9 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也赋予教育系统重大的时代使命。因此，必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中小学教书育人全过程，帮助青少年从思想深处建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定认同。这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核心内容[2]。

陕西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基础教育资源，全省 6000 余所中小学校遍布城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近年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陕西中小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师生爱国主义情怀，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陕西中小学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状况如何？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陕西省 10 个地市 60 所中小学的田野调查，客观呈现该项教育工作开展现状，精准识别制约教育成效的瓶颈问题，针对性提出优化教育实践路径，助力区域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质增效。

二、陕西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

通过对陕西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进行量化分析发现，80.56% 的中小学生对所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感到“非常满意”；86.43% 的学生在思想层面形成了“理解共同体内涵、认同共同体价值”的清晰认知与深厚情感；75.46% 的学生能将内在认同转化为“尊重民族差异、参与民族团结实践”的日常行为。由此可见，当前陕西中小学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础扎实，成效显著。西安市第七十五中学、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路小学、渭南市大荔县羌白镇中心小学、延安市宝塔区实验小学等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称号，为全省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丰富经验。

这一成绩的取得与陕西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密不可分。作为多民族聚居区，陕西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动民族团结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各中小学更是立足地域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探索活动。尤其是西安市浐灞第一中学的陕藏家庭结对、西安八一民族中学的“石榴花开”

主题活动、宝鸡高新第二小学与新疆学校的线上联动、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初级中学的民族技艺教学等活动，商洛市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学生互帮互助、共同成长。同时，各中小学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了一系列优质精品课程，如西安交大附中的思政课“促进民族团结”，让广大学生在学科融合与情境分析中充分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红色足迹·民族同心”主题课程，让学生在革命传统教育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直接提升了学生对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水平与情感认同。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一）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其一，部门协同存在壁垒，未形成全员育人合力。部分中小学片面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视为德育处或少先队的专项工作，教育教学主要靠德育部门和班主任。访谈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专任教师表示对该项工作“不了解”“没有参与过”。因缺乏全局统筹协调机制，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环节衔接不畅，未能形成人人重视、人人参与的全员育人格局。其二，教育对象界定模糊，削弱了共同体理念的普遍价值。部分学校片面地将该项工作等同于对少数民族学生或民族地区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重心过度偏向于特定群体，忽视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培育目标，导致教育内容缺乏深度和广度，从而削弱了教育的整体效能与影响力。

（二）资源载体配置失衡

一方面，受地理位置偏远、生活条件艰苦等因素影响，乡镇及偏远地区学校普遍面临专业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优秀骨干教师流失严重，师资队伍缺乏稳定性；另一方面，因培训机会少、优质教育资源匮乏，部分乡镇学校教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解较浅，教学能力相对较低，教学多依赖课本讲解和常规化的宣教，形式单一，缺乏互动体验和实践探究。访谈中，超过半数的学生反映“内容枯燥、形式古板”，难以引起共鸣。这种教学方式既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难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内化为学生的情感认同与自觉行为。

（三）学段衔接与针对性不足

一是教育内容与学生认知发展阶段脱节，缺乏螺旋式上升的梯度设计。许多中小学在安排教育活动时，未能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进行差异化设计，存在“上下一般粗”的现象。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过于抽象，超出了低龄学生的理解能力，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深刻认知。而初高中阶段的教育内容又未能结合学生思维发展水平及时深化，导致理性认同不足。二是教育方式未能适应学段特点，互动性与实践性不足。小学阶段的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但当前的教育方式多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缺乏故事化、可视化的互动体验，导致吸引力不足，学生参与度低。初中生自我意识觉醒，渴望被尊重和参与互动，但教育过程中往往缺乏主题研讨、民族文化汇演、志愿服务等适配性互动环节，难以激发其内在认同。高中生虽然认知水平较高，但面临较大的升学压力，若教育方式过于刻板、与考试关联度低，也难以引起其重视，知行脱节现象明显。

（四）家庭教育支撑薄弱

调研显示，当前陕西中小学在推进此项教育时，普遍面临家庭教育支撑不足的挑战。其一，部分家长存在认知偏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片面理解为学校的政治任务或学业辅导，忽视对子女的日常教育引导，导致家庭场域教育出现空白。其二，部分家庭文化氛围淡薄，家长主动参与意识不足。个别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在涉及民族历史、文化差异等话题上难以给予子女正确的引导，制约了共同体意识的日常培育。其三，家校协同机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多停留在表面，沟通渠道单一且缺乏针对性，导致家长知晓率和参与度普遍较低。

四、对策建议

（一）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全员全过程育人格局

一是强化统筹领导。学校要成立由党委牵头的工作领导小组，将德育处、教务处、团委（少先队）及学科教研组负责人集合一处，明确责任主体，统筹规划课程开发、教育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确保各项工作协同顺畅推进。二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既要关注少数民族学生成长需求，更要面向全体学生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突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点，更要推动各学科深度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三是营造浸润式校园文化环境。积极推进“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创建，通过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景观、标语、展板等载体，营造和谐稳定的文化育人环境。

（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一是建立师资稳定机制，实施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师资补充政策，通过提高待遇、发放专项补贴、优先评定职称等举措，增强乡镇教师岗位吸引力，稳定教师队伍。二是建立城市优质学校与乡镇薄弱学校“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教师轮岗交流、联合教研与专项培训，提升乡镇教师的教学水平。三是推广用好学习强国、道中华等网络资源，推动优质网络资源共享。支持乡镇学校建设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基地，推进博物馆、非遗进校园活动，弥补乡镇学校实践资源短板，促进城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均衡发展。

（三）遵循认知规律，完善螺旋上升的学段衔接体系

从教育规律来看，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依照不同阶段的教育特征”，“分层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3]。因而，针对不同学段教育内容脱节与方式单一问题，需建立相互衔接、上下贯通的“一体化教育机制”[4]，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随学段推进层层递进、不断提高。一是实施分层教学。小学阶段应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通过绘本阅读、民族节日体验、结对交友等活动，将抽象概念具象化，提升小学生认知效果；初中学生抽象逻辑思维快速发展，具备一定的探究事物本质的能力，可结合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开展主题研讨、文化汇演等活动，引导学生深化理性认知；高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迅速发展，“理性政治态度逐步积淀，反映出个体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政治情感及行为倾向”[5]，因此这一阶段应侧重理论深度与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实现从感性认同到理性认同再到自觉践行的升华。二是强化实践育人。摒弃同质化的宣教模式，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能力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实践任务，如小学阶段的“民族故事我来讲”、初中阶段的“民族团结小课题”、高中阶段的“社区民族工作调研”等活动，确保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有效解决知行脱节问题，使青少年实现从感性认同到理性认同再到自觉践行的升华。

（四）深化家校协同，夯实家庭教育的基础地位

家庭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也是青少年认知启蒙、情感培育和行为塑造的“第一课堂”，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父母的行为示范具有先发性、渗透性与感染性的独特优势，是家庭教育中最直观、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方式。针对家庭教育支撑薄弱与协同机制表面化问题，需构建深度互动的家校共育生态。一是提升家长认知与教育能力。从作用机制看，青少年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的认知并非仅依赖学校教育，更源于家庭场域中父母在日常对话、节庆仪式、价值判断等过程中所传递的可感知的文化符号。因而，父母应主动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知识与政策，向子女传递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国家观。学校可通过家长学校、专题讲座、微信家长群等形式，向家长推送相关内容，普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与意义，并提供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法，帮助家长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认知。二是完善家校沟通机制。充分运用视频会议、家长群、易班等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动态掌握学生成长环境；针对不同学生的家庭背景，制定差异化的沟通与指导方案，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推动各民族学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均衡发展。三是挖掘家庭特色教育资源。基于这一特点，可鼓励有少数民族背景、跨民族交往经历或熟悉本地历史文化的家庭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如担任民族文化辅导员、分享家庭成长故事等，形成家校资源互补、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基础性的育人工程，关乎青少年思想根基培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本次实证调研表明，陕西中小学共同体意识教育具备良好工作基础，但在育人机制、资源配置、学段衔接、家校协同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新时代背景下，陕西中小学要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实践路径，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创新育人平台、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家校协同，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通过常态化、精准化、实效化开展共同体意识教育，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少年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厚植民族团结情怀，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助推区域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4-09-27)[2026-04-24].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962.htm

[2] 董慧，王晓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04):21-30.

[3] 蒋文静，祖力亚提·司马义.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及实践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0,31(01):13-21.

[4] 李妮.“学生主体”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建设[J].民族教育研究，2025,36(05):15-22.

[5] 李超民，周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应牢牢把握政治认同教育[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5(32):28-3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高校统战理论研究与实践项目“航空类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2025GXTZ43）；西安航空学院2025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时代航空文化融入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索”（25JXGG2002）；2025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省级精品思政课程项目“三维联动·五措并举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SJY202515）。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以活动聚人心：新时代高校工会凝聚教职工力量的实践与启示

孙曙光

摘要：在全面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职工队伍的凝聚力与行动力，是链接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落地、行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根本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重要纽带。高校工会作为党联系教职工的桥梁，正从传统福利保障向“价值共创 + 多元赋能”转型。立足我校实践，剖析工会通过思想引领、文化凝聚、成长赋能、身心关爱构建的活动体系，重点呈现其如何以活动为载体激发教职工工作热情、联动校园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高校工会活动通过锚定“服务教职工、助力发展”核心方向，既凝聚了教职工力量，也为高校高质量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有效支撑。

关键词：高校工会；教职工凝聚力；活动育人；服务创新；工会工作模式

一、引言

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教职工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行动力，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与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传统的工会工作常被狭义理解为“福利发放”与“文体活动”，而新时代对高校工会提出了更高要求：它不仅是温暖人心的“职工之家”，更应成为强化思想引领的“精神阵地”、服务教职工需求的“贴心港湾”、助力校园发展的“实践枢纽”[1-2]。

这一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回应两大现实需求：应对教职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层次需求，除职业发展、心理健康、家庭关怀外，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助力校园建设已成为重要诉求；打破高校各类教职工活动“碎片化”困境，通过工会统筹联动，让教职工参与校园建设相关事务更便捷、更系统，破解工会工作与学校发展需求脱节的问题[3-4]。因此，“以活动聚人心”不再是简单的娱乐联谊，而是一项兼具组织凝聚力与校园发展价值的系统工程，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载体，实现情感凝聚、价值认同、能力提升与组织赋能的有机统一，搭建起高校教职工投身校园建设、助力学校发展的常态化桥梁，引导全体教职工在立足岗位、服务学校发展中践行责任担当。

二、多维实践：凝聚教职工力量的创新活动体系

新时代高校工会凝心聚人、赋能发展的工作实践，已构建起层次清晰、功能互补、覆盖全面的立体化矩阵，形成思想引领、文化凝聚、成长赋能、身心关爱四维协同的工作体系，具体实践路径如下。

（一）思想引领性活动：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共鸣”

高校工会肩负着团结引导教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使命，是强化教职工思想政治建设与责任意识培育的重要阵地。创新思想引领活动模式，关键在于摒弃单向灌输、生硬说教的传统方式，通过“文化浸润 + 场景沉浸 + 实践延伸”的实践路径，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践行”的深层转变，让思想引领最终落脚于责任担当的履行。

在青年教职工思想引领方面，依托暑假常态化开展“红色传承 + 文化传播 + 社会实践”复合型社会实践活动，将思想引领与实践行动深度绑定。组织青年教职工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实地观摩、情景教学、互动研讨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融入“文化保护 + 传承传播”理念，让家国情怀在实践行动中落地生根[5-6]。

在先进典型选树方面，持续选树先进榜样。连续多年开展工会系统校内评优表彰，推荐参评上级先进、榜样，获评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2 名、首都劳动奖章 3 名、北京市工人先锋号 1 个、北京市教育系统“育人榜样（先锋）”14 名，以身边人的鲜活事迹激发全体教职工立足岗位、担当责任的内生动力。劳模类型、数量均有较大突破。

（二）文化凝聚性活动：从“娱乐活动”到“家园认同”

文体活动是滋养教职工心灵、凝聚群体情感的核心载体，更是强化集体意识的重要纽带。新时代高校工会的文化建设实践，正突破“校园内娱乐”的浅层定位，朝着“品牌化 + 特色化”深度融合的方向深耕，既以丰富文体活动营造温馨和谐的“职工之家”，更通过实践延伸让校园文化赋能发展，实现“文化凝聚人心、活动传递价值”的双重目标。

立足教职工多元需求与发展诉求，学校工会牵头组建了 20 个教职工文体协会，覆盖球类竞技、形体塑造、户外拓展、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让兴趣爱好与校园文化建设、精准对接：通过完善制度、保障经费、优化班子，协会已成为校园文体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引领者。品牌活动创新升级，让校园文化活动真正成为连接个人与校园的情感纽带，在凝聚人心的同时，持续扩大高校文化建设的社会影响力。

（三）成长赋能性活动：从“普惠福利”到“发展支撑”

新时代高校工会服务的核心要义，在于立足教职工职业发展诉求，推动服务模式从普惠式转向精准化、分层化的成长赋能，助力教职工实现全面发展。

工会精准聚焦教学、管理、技术三类岗位教职工的能力提升需求，搭建起系统化的成才竞赛平台，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青年管理干部业务能力竞赛、青年技术人员技能竞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优的方式，在全校教职工群体中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成长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劳模、教学名师、榜样先锋的示范引领作用，组建青年教师先进（创新）教研工作室，助力“青椒”成长，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储备人才动能。

（四）身心关爱性活动：从“节日慰问”到“体系关怀”

针对高校教职工普遍面临的科研教学压力与家庭生活负担，工会的关爱服务正突破传统节假日慰问的单一模式，构建起“自我关怀 + 成长赋能”双维度的全周期关怀体系——既守护教职工身心健康，更以关爱为纽带强化集体归属感，通过“工会关爱教职工 → 教职工助力校园 → 工会强化支撑”的闭环，让关怀与发展相互促进、双向赋能。

在健康促进层面，依托 20 个教职工文体协会升级“每日健身”机制，每日提供 3—4 项文体活动。全额承担场地费用，实现午间锻炼与文艺活动常态化开展。新增春季体育文化节、秋季教职工趣味嘉年华两大综合型活动品牌，优化运动会项目，实现球类赛事全覆盖，举办新春联欢会、读书日等活动满足教职工多样化需求。女工活动丰富多彩。构建校工会、协会、分工会三级联动机制，将“三八”妇女节扩展为“女工月”，年均开展 40 余场特色活动，丰富女教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让健康生活与校园建设深度融合，引导教职工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强化集体责任意识。

在心理与生活帮扶层面，精准对接教职工“自我调适 + 职业发展”双重需求，升级关爱服务内容，优化“幸福指南针”系列课堂，开展“爱自己 更美丽”关爱女性健康主题讲座，“幸福生活 有法守护”法律知识讲座。针对青年教职工的“急难愁盼”，在中高考考前开展“如何让家长和孩子以理想的状态迎接大考”讲座，让教职工感受到“立足岗位有温度、工会关怀有力度”，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7]。

三、核心经验：可复制的创新模式与工作逻辑

综合上述实践探索，可提炼出新时代高校工会“以活动聚人心、以协同促共赢”的核心模式与工作逻辑，既为同类型高校工会提升组织效能提供实践范式，更助力高校工会在赋能校园发展与社会服务中彰显价值。

（一）“发展融合式”工作模式

工会始终锚定以服务学校发展为核心的原则，将工会活动与学校建设战略、深度绑定、同频共振。主动联合教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青教赛”“青管赛”“青技赛”等专项活动，构建“以赛促能、以能助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需求分层 + 精准适配”服务模式

立足教职工群体差异化需求与参与意愿，构建“精准识别需求—分类赋能支持—精细服务落地”的闭环工作体系。核心逻辑在于，不同教职工群体的职业发展诉求、生活需求与服务参与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需通过“常规覆盖 + 精准滴灌”实现赋能服务全覆盖：一方面，以全校性主题文体活动、节日慰问等普惠活动为基础，培育全员责任意识，保障教职工基础需求与参与权利；另一方面，针对特定群体设计专属服务路径。比如：构建学院—学校—北京市—全国四级备赛体系，组建强大指导团队；40 岁以下青年教师全覆盖参赛；获奖教师后续发展持续发力，1 人获评北京市青年名师，4 人获评北京市教育系统“育人榜样（先锋）”，1 人获首都劳动奖章；半数以上学院成立院级青年教师培养平台，与 6 个北京市青年教师先进（创新）教研工作室合力，助力“青椒”成长。为女教授、女劳模组织“女性座谈会”，助力其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女性发展；为困难职工设立“爱心互助金计划”，累计帮扶 50 余人，资助金额达 83 万元。实现为教职工解决“急难愁盼”。

四、启示与展望：迈向“智慧工会”与“价值共创”

当前高校工会活动创新仍面临诸多共性挑战，各二级工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完全破解，特色品牌的思政内涵与示范效应有待进一步深化，服务供给与

教职工的分层化、个性化需求匹配度不足，以思政引领为核心的专业服务能力仍需持续提升。面向未来，高校工会需紧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思政引领核心方向，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实践，推动凝聚人心工作提质增效：

（一）强化理论引领与品牌塑造，筑牢思政育人根基

立足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思政工作要求，加强工会工作的理论研究，聚焦“思政引领融入工会活动”“教职工思想凝聚与价值认同培育”等核心议题，将实践中的创新举措、成功经验升华为系统性、规律性的理论成果，为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同时，深度挖掘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大力推动“一单位一亮点、一领域一特色”的品牌建设格局，引导二级工会立足学科优势、岗位特点，打造兼具思政内涵与教育特色的“一会一品”项目。例如，依托文科院系打造红色文化传播品牌活动，借助理工科专业优势开展科技报国主题实践，让每个品牌活动都成为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形成“百花齐放、思政铸魂”的生动局面，使工会品牌成为凝聚教职工思政共识的重要标识。

（二）深化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服务，精准对接发展需求

紧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以思政引领为导向，进一步推进“数智工会”建设与深度应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教职工思想动态、职业发展、需求诉求等多维度数据库，精准把握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教职工的思政需求与成长期待—— 既精准捕捉青年教职工的理想信念培育需求，也关注中老年教职工的价值认同强化诉求。通过数据研判实现服务供给的精准匹配，推动工会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针对青年教师群体推送师德师风建设、红色教育实践等思政类活动信息，为管理干部精准匹配政策理论学习、责任担当培育等赋能项目，全面提升思政引领的针对性与服务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让智慧服务成为强化思政引领、助力教职工成长的重要支撑。

（三）构建“价值共创”生态系统，凝聚育人发展合力

最高层次的凝聚，是让教职工在工会活动中既是思政引领的受益者，更是思政实践的参与者、设计者和贡献者。工会应立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搭建“价值共创”平台，鼓励教职工基于专业所长、兴趣爱好组建兼具思政属性与教育特色的社团组织：由思政课教师牵头组建理论宣讲社团，开展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院系活动；依托专业课教师团队成立行业前沿研讨社团，将家国情怀、责任担当融入专业交流；联合行政管理人员组建校园治理建言社团，引导教职工在参与校园建设中强化使命意识。通过让教职工主导活动设计、分享知识技能、共促校园发展，使其在价值共创中深化对高等教育使命的认知，在思政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建立与学校、与教育事业的深度情感连接，从而将思政认同转化为立足岗位、立德树人的内生动力，让组织认同感与归属感达到新高度，为高校落实思政育人根本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凝聚起磅礴合力。

五、结论

新时代高校工会以活动聚人心、以协同聚合力，本质上是新时代高校工会践行“以教职工为中心、以发展需求为导向”思想的系统工程，更是高校履行社会责任、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它要求工会工作实现从“校园内部服务”到“校园社会联动”、从“事务性保障”到“多元化赋能”、从“单向服务”到“价值共创”的深刻转变。

高校工会通过构建思想有高度、关怀有温度、实践有力度的活动体系，不仅能超越传统职能，成为激发教职工内生动力、汇聚学校发展磅礴力量的“能量站”，更能成为链接高等教育资源与社会发展需求的“核心枢纽”——在培育教职工责任担当、推动校地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桥梁作用，让教育的服务底色更加鲜明。

未来，高校工会将持续以活动为载体、以协同赋能为纽带，凝聚全体教职工的责任担当与奋进力量，推动教职工专业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与社会服务效能，让校园温情与育人力量辐射延伸至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筑牢人才根基、涵养和谐生态、夯实发展底蕴。

参考文献

[1] 邹豫荣 . 党工共建视域下高校工会工作的创新路径 [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185-191.

[2] 张赟赟 . 新时期高校工会提升教职工幸福感的对策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24(16):286-288.

[3] 李谦 , 肖雨微 . 新时期高校工会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2):129-131.

[4] 李天博 . 新时代高校工会管理服务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J]. 才智 ,2025(09):189-192.

[5] 董洁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在高校工会干部工作中的探索与应用 [N]. 河南经济报 ,2024-12-17(11).

[6] 卢玉亮 .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校教职工民主管理权利的保障机制研究 [J]. 山东工会论坛 ,2023,29(01):29-37.

[7] 卢娜 , 杨永祥 . 高校工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路径探究 [J]. 大学 ,2023(03):113-116.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基于意义疗法的中职生生命意义感缺失成因与培育对策

路月萌

摘要：本文基于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理论，聚焦中职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问题。首先，阐释了意义疗法的理论内核包括意义疗法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其次，分析了中职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现状表现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意义疗法的培育对策：一是构建“意义导向”的校园文化，二是开发以“意义重构”为目标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三是建立“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支持网络。旨在帮助中职学生建立积极的生命意义认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意义疗法；中职生；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 1537.8 万人。该群体处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阶段，其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个人发展与社会稳定。近年来，中职生中出现的学习倦怠、目标迷茫、价值感虚无甚至是一些极端行为，都折射出背后深层的“生命意义感”缺失问题。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提出的意义疗法认为，人对意义的追求是生命的原始动机，意义感缺失会导致“存在空虚”，犹如在迷雾中行走而不知方向。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最容易质疑生命意义的敏感阶段，当前中职生面临的学业压力、就业焦虑与自我认同危机，使其成为意义感缺失的高发群体。因此，从意义疗法视角探索中职生生命意义感激发路径，不仅可以拓宽职业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视野，还能为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可操作的干预方案，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意义疗法的理论内核

（一）核心概念

1. 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感即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与生活目标的认知及体验，这种感知不仅包含对生命本质的理解，更落实在日常生活具体层面，中职学生群体的生命意义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一是在专业学习中获得职业价值认同；二是对未来职业发展保持积极目标期待；三是重视人际关系的构建；四是能够客观认识并肯定自身的存在价值。

2. 意义疗法

意义疗法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隶属于存在主义治疗流派。这一疗法将“追求生命意义”看作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认为意义能通过个体主动选择与建构来创造。其核心是帮助个体探索并建立生命意义以应对心理困扰，同时也特别关注“意义意志”这一关键概念[1]。“存在空虚”同样是弗兰克尔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用来描述个体在缺乏生命意义体验时所处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情感淡漠、行为失控与存在性焦虑，而现实中部分中职学生呈现出学习动力不足、目标模糊等现象，正与存在空虚的特征相契合[2]。

（二）理论框架

意义疗法理论建立在三个基本命题之上：其一，人类具有意志自由，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始终保有选择自身态度与行为方式的能力；其二，追寻生命意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这种独特的心理需求既体现出人具备自主选择的能力，也反映着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追求；其三，每个生命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意义，意义疗法特别强调要把握眼前的生活，在此时此刻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

弗兰克尔的理论显示，个体寻找生命意义，可通过三个途径：

（1）创造价值：通过职业工作、艺术创作等生产

性的活动实现自我价值，中职学生自我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以及应用，通过完成具有社会价值的任务，获取成就感。

（2）体验价值：在人际关系、审美体验中实现价值，通过建立真诚的师生关系、亲密的同伴关系、体验自然之美，使个体的情感世界更加丰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意义。

（3）态度价值：可以通过改变认知来赋予苦难新的意义，面对不可避免的困境，积极地应对困难，可促使个体在逆境中收获成长，增加个体的抗逆力。

三、中职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现状表现及成因分析

（一）现状表现

一些中职生对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较低，学习过程就像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缺乏对所学知识的实际价值的思考。技能训练并非为了真正掌握技术，多为了考取证书、通过考试，学习态度功利性较强，难以长久坚持学习，遇到困难后容易放弃，且部分学生不认同所学专业，从中获取的价值感较少；学生缺乏职业发展方面的规划，对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情况和发展路径了解较少，无法回答“将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多根据他人的意见选择职业。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更加重了这种迷茫，部分学生因为职教生的身份而低估自己，对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在人际关系方面，学生与家人、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都面临挑战。亲子互动多为防御性沟通，父母支持多停留在物质满足层面；师生互动局限于课堂内容，较少涉及人生价值的话题；同学交往大多以实用为目的，真正知心的朋友不多。这种状况让学生陷入了既渴望被理解又不愿敞开心扉的矛盾中，遇到困难时很难获得有效的情感支持；在自我认知方面，不少学生存在自卑心理和身份认同危机。由于没能进入普高，给自己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忽视自身优势，自我价值感偏低。这种消极的自我评价导致抗逆力弱，个别学生通过沉迷网络游戏来逃避现实，进一步削弱了自我认同感[3]。

（二）成因分析

造成中职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原因包含多个层面。

个体层面：中职生处于15—18岁的青春期，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缺乏深度，易受外界评价影响，且部分学生成长中缺乏逆境体验，面对压力难以通过自我调节构建意义感。

教育层面：部分中职学校过度强调“技能培养”，所学课程多为专业技能课，人文素养课程占比低，忽视了学生的精神层次需求。

家庭层面：部分家长将中职教育视为“无奈选择”，对子女期望仅停留在“安分守纪”，缺乏对其生命价值的正向肯定，且因忙于生计缺乏与子女深度沟通，难以提供意义感形成所需的足够情感支撑。

社会层面：对职教生的刻板印象尚未根本改变，“低学历”“低技能”标签导致了其社会认同度偏低，同时过度强调物质成功的风气使部分学生将“赚钱多少”作为唯一价值标准，忽视自我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感追求[4]。

四、基于意义疗法的意义感培育对策

（一）构建“意义导向”的校园文化

1. 价值引领：重塑职业教育认知

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邀请技能大师、优秀毕业生分享成长经历，破除“职教无前途”的偏见；设立“职业荣誉墙”宣传栏，展示学生技能大赛、社会实践成果，将“技能进步”“服务他人”纳入荣誉体系；开发“职业意义”主题宣传栏，呈现不同职业对社会的贡献（如“汽车维修人员保障出行安全”“护理人员呵护生命健康”），强化“职业无高低，价值有大小”的认知，让学生看到自己所学专业的社会价值。

2. 环境浸润：打造“有温度”的校园空间

在图书馆、教学楼、宿舍楼下等场所设置开放的“意义角”，鼓励学生分享“本周有意义的事”（如“帮同学解决技能难题”），形成意义分享的互动平台，让学生在记录和分享中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增强对生活的热爱；构建“成长树”档案，以班级为单位记录学生小目标、小成就（如“本周熟练掌握了一项新技能”“主动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等），直观呈现学生的成长轨迹，强化“持续努力就是意义”的体验；组织“校园公益日”活动，通过参与利他性质的集体公益活动（如校园清洁、帮助低年级学生等）促进学生与他人、与校园环境的联结，让他们在“被需要”中真切体验到意义的存在，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二）开发以“意义重构”为目标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针对中职生意义感缺失的核心症状，将意义疗法的理念有机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各类团体活动中，引导学生主动追寻意义和建构意义，形成“认知—体验—反思”的闭环。

1.“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渗透：构建“三维意义”教学模块

模块一：在创造中找寻意义——职业技能与价值实现

内容设计：通过“技能溯源”活动（如让学生探究“我的专业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这项技能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等），引导学生发现所学专业和技能的社会价值；设置“职业愿景板”制作环节，让学生将自己的技能学习与长远的职业目标关联起来，明确学习的方向和意义。

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法（如讲述“某技师通过技术革新提升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了巨大价值”的案例）、角色扮演法（让学生模拟职场中用技能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场景）等方式，强化学生“创造即

意义”的认知，让他们认识到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不仅能为自己带来更好的职业发展，还能为社会作贡献。

模块二：在体验中感知意义——情感联结与生活美学

内容设计：开展“亲情叙事”活动（如让学生分享“父母为我做过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为父母做过的一件暖心小事”），强化学生与家庭的情感联结；组织“校园微美好”摄影比赛，引导学生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如“夕阳下的实训楼”“同学互助的美好瞬间”“老师认真教学的样子”等），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

教学方法：运用正念训练（如“专注感受一餐一饭的味道，体验生活的平淡与美好”“静心聆听校园里的声音，感受自然的韵律”）、小组分享等方式，培养学生“体验当下”的能力，缓解他们的焦虑与疏离感，让他们从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意义的存在。

模块三：在困境中创造意义——挫折应对与态度选择

内容设计：解析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经历，让学生了解到即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人依然可以通过选择自己的态度来赋予生命意义；结合中职生常见的挫折（如技能考试失利、求职碰壁、人际交往矛盾等），引导学生练习“矛盾意向法”（如“即使失败，我也能从中学到什么经验教训”“这次挫折能让我变得更强大”）。

教学方法：通过心理剧演绎挫折场景（让学生扮演在不同挫折情境中的角色，体验不同的应对方式）、撰写“挫折意义日记”（记录自己遇到的挫折、当时的感受以及从中获得的成长）等方式，引导学生从“受害者”角色转向“成长者”角色，学会在困境中寻找意义。

2. 团体辅导：设计“意义行动”主题活动

“职业角色探索”团体：通过“未来职业访谈”（组织学生采访行业从业者，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职业发展历程和对职业意义的理解）、“职业角色模拟”（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职业角色，体验该职业的工作状态和价值）等活动，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职业认同，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为职业目标努力”，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和意义。

“联结与陪伴”团体：设计“信任行走”（一名学生蒙眼，在另一名学生的引导下行走，体验信任与被信任的感觉）、“秘密分享会”（让学生在安全的氛围中分享自己的内心秘密和困惑，获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等活动，打破人际隔阂，在深度互动中缓解孤独感；组织“互助小组”，让学生在帮助同伴解决问题（如技能学习难点、学习方法困惑等）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感受到人际关系的温暖和意义。

“生命意义对话”团体：以“如果生命只剩一年，我想做什么”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人生目标；通过“墓志铭”书写活动（让学生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思考自己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引导学生澄清人生的优先级，将抽象的意义转化为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让他们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而更有方向地生活。

（三）建立“个体—家庭—社会”协同支持网络

1. 个体层面干预策略

对缺乏学习动力的中职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首先通过交谈、心理测评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状况，明确问题所在，然后运用意义疗法原理，引导学生关注当下能做的事情，消除负面情绪；最后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目标，组织其参加相互帮助活动，并定期进行评价，增加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成就感，逐渐形成良性循环。

2. 家庭系统协同机制

家庭与学校合作，共同干预学生的成长。对家长进行培训，讲解家长意义感缺失的机制、意义疗法原理，帮助家长调整教育期望；组织代际意义传递主题活动；学校与家庭密切沟通，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引导家庭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

3.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深入了解自己所学专业和技能的价值；加强与公益组织的合作，如设置汽修专业学生为社区老人免费检修电动车、幼教专业学生到福利院开展儿童活动等服务项目，让学生在发挥专业技能、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增加成就感。还可鼓励学生通过短视频分享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故事，拍摄自己的工作内容与成就感事情，在社会大众的认可和鼓励中增强自信心，获取学习的意义，增强自我价值认同[5]。

五、结语

中职生群体中存在的生命意义感缺失，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降低职业教育质量，进而影响社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本文系统分析了中职生在学业、职业发展、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揭示了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的“意义困境”。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为理论支撑，结合本土教育情境，设计出涵盖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的综合干预对策。期望通过这些综合干预对策，引导学生积极学习专业技能、建立健康人际关系、以积极态度面对困难，逐步发现并建构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

参考文献

[1] 怀丹丹，曲海英．意义疗法对公费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职业认同感的团体干预研究 [C]// 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专题研讨会．中国四川省成都市，2023:289-291.

[2] 朱炜，王少雄，吴蓉芳．生涯辅导理论之存在主义综述 [J]. 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33):277-278.

[3] 张凤娟，吴欢，黄绍旭．中职生生命 （下转 91 页）

新时代劳模精神传承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许卓君

摘要：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核心内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社会变迁、价值多元与媒介变革，使其传承面临认知虚化、传播低效、实践薄弱与机制滞后等现实挑战。本文旨在剖析上述困境，并系统地从认知重塑、传播升级、实践融入与机制健全四个维度，建构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传承路径，以推动其从典型宣传深化为大众自觉践行，从而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关键词：新时代；劳模精神；精神传承；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模精神是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要求全社会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1]。劳动创造历史，奋斗成就未来。劳模作为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既是“最美的劳动者”，也是劳模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与重要传承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劳模评选与劳模精神弘扬工作，培育出一批批扎根一线、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劳动模范，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劳模精神，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科技创新不断加速、就业形态日趋多元，这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能力结构及价值观念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现实语境，也为劳模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二、新时代劳模精神传承的现实困境

（一）认知虚化：价值隔阂与情感共鸣缺失

劳模精神传承的首要困境，是认知虚化与疏离。社会虽普遍认可其时代价值与引领意义，但多停留在抽象概念，难以转化为青年的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

传统宣传中对劳模的叙事多聚焦于“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单一维度，忽视了劳模在专业创新、个人成长与社会贡献之间的价值统一，难以契合当代青年追求自我实现、注重专业提升的职业诉求，导致青年群体对劳模精神产生“距离感”，甚至将其贴上“过时”“小众”的标签。部分青少年认为劳模精神是“特定群体的责任”，与自身职业发展关联度不高，缺乏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内在动力。同时，劳动教育的缺失加剧了认知隔阂，部分家庭、院校忽视劳动价值观培育，过度强调学业成绩与职业晋升，导致青少年对劳动的价值认知模糊，难以理解劳模精神的核心内涵，无法建立“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形成“重学历、轻技能”“重索取、轻奉献”的认知偏差。不少青少年对劳模工匠的认知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直观感受和情感共鸣，这种认知虚化成为传承工作的重要阻碍。

（二）传播低效：模式滞后与精准度不足

除了认知层面的虚化，劳模精神在传播环节同样面临突出困境，宣传方式与内容设计未能跟上时代变

（上接 90 页）

意义感与学习投入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J].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13(04):120-125.

[4] 陆婷，张建霞 . 中职生生命意义感提升的探索与实践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2(20):67-71.

[5] 胡霞 . 体验式生命教育课程对中职生生命意义感的提升研究——以慈溪市锦堂高级职业中学为例 [D]. 南昌：南昌大学 ,20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院级科研项目“意义疗法视角下中职生‘生命意义感’激发研究——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优化路径”（kyy202505）。

（作者单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化，难以真正走进大众、打动青年。

“劳模精神在教育和宣传中存在纸面化、虚化的倾向”[2]，这一问题在当前的传播实践中尤为突出。传播层面的低效与滞后，制约了劳模精神的影响力辐射。传统的劳模精神传播以单向灌输模式为主，依赖事迹报告会、纸质媒体报道、表彰大会等传统载体，形式单一、内容刻板，难以适应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与受众需求。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下，这种缺乏互动性、创新性的传播模式，难以吸引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关注，导致传播效能大打折扣。同时，传播内容缺乏分众化设计，未能结合不同群体的职业特点、价值诉求定制传播内容，导致传播内容与受众需求错位，无法实现“精准滴灌”。此外，传播渠道的整合不足也是重要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未能有效联动，线上传播缺乏系统性布局，短视频、直播、新媒体社群等新型传播载体的运用不够充分，未能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导致劳模精神的传播范围有限，难以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新兴群体，影响力难以深度渗透到社会各层面。

（三）实践薄弱：形式化凸显与落地性不足

实践层面薄弱且形式化，使劳模精神难以落地。传承多停留在活动化、项目化层面，缺乏常态化、系统化的实践机制，容易陷入“重形式、轻实效”的误区。

在院校层面，劳模精神培育未能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多以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缺乏与专业教学、实践实训的深度结合，协同层面的配合不足、评价层面的机制缺位，导致培育工作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知行合一”。在企业层面，部分单位对劳模精神的践行停留在口号宣传、事迹张贴层面，未能将其融入生产经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劳模创新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缺乏让职工在实践中践行劳模精神的平台与载体，导致劳模精神与生产实践脱节。在社会层面，工会等组织的品牌活动有时与地方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中心工作衔接不够紧密，存在“两张皮”现象，服务大局的效能有待提升，难以形成“人人践行劳模精神、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社会氛围。这种实践层面的薄弱，使得劳模精神难以从“口号”转化为“行动”，无法真正内化为大众的行为习惯。

（四）机制滞后：协同不足与保障体系不完善

机制层面滞后且碎片化，难以为劳模精神传承提供有力保障。现有机制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无法形成高效协同的传承合力。

一方面，协同机制不健全，教育部门、工会组织、宣传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相关主体各自为战，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渠道不够畅通。工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常面临资源相对有限、人才支撑不足的挑战，而院校、企业等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导致政策、人力、平台、经费等资源分散，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完善，对劳模群体的表彰多以精神奖励为主，对物质保障、职业发展、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支持不足，难以充分激发劳动者争当劳模、践行劳模精神的内在动力。同时，缺乏科学的传承效果评价机制，对传承工作的成效缺乏量化评估与动态反馈，难以精准把握传承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导致传承工作缺乏针对性改进，难以实现长效发展。

综上，新时代劳模精神传承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认知层面的价值隔阂、传播层面的效能不足、实践层面的落地乏力、机制层面的保障缺失，相互交织形成了传承阻隔。从深层次来看，这些困境的产生，既源于传统传承理念与时代发展语境的脱节，也在于对受众需求的把握不够精准、创新意识不足，更在于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与全方位的协同发力，亟须通过针对性的路径创新实现破局。

三、新时代劳模精神传承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认知：消解价值隔阂，筑牢情感认同根基

认知是传承的基础，唯有消解价值隔阂，才能实现精神的深度渗透。一方面，创新叙事方式，丰富劳模精神的传播内涵，摒弃单一的“奉献叙事”，兼顾“创新叙事”“成长叙事”，挖掘劳模在专业深耕、技术突破、个人成长中的鲜活故事，展现劳模精神与个人价值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关联，让劳模精神变得可感、可学、可仿。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教育，筑牢认知根基，将劳模精神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逐步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将劳动实践与劳模精神培育相结合，组织青少年走进企业、车间、非遗工坊，与劳模工匠面对面交流，在实践中理解劳动的价值，感悟劳模精神的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3]。要引导家庭、院校、社会协同发力，破除“重学历、轻技能”的认知偏差，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让尊重劳动、崇尚劳模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推动劳模精神内化为全民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自觉。

（二）升级传播：构建精准矩阵，提升精神辐射效能

适应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模式与载体，提升传播效能，扩大劳模精神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

一是构建分众化传播矩阵，结合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定制传播内容与传播渠道。针对党政领导干部，重点传播劳模的责任担当与实干精神，将劳模思政课纳入干部培训主体班次，深化其对劳动价值的理解；针对产业工人，聚焦技能创新、攻坚克难的故事，通过车间宣讲、技能比拼等形式，增强传播的针对性；针对青少年，采用短视频、动漫、校园情景剧等形式，打造贴近青年的传播内容，吸引青年群体主动传播、主动践行。

二是创新传播载体，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充分运用短视频平台、新媒体社群等新型载体，

打造劳模精神传播的线上阵地，制作接地气、有温度、有感染力的传播作品，打破时空限制，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也能便捷学习。通过线上知识竞赛、直播宣讲等形式，提升传播的互动性与参与度，让劳模故事“活”起来。

三是强化传播主体培育，鼓励劳模工匠主动发声。培育一批兼具专业性与传播力的劳模宣讲队伍，使其结合自身实践经历讲述劳模故事，增强传播的真实性与感染力；同时，引导媒体工作者、青年博主、行业达人参与劳模精神传播，形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扩大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

（三）完善实践：推动场景融入，实现知行有机统一

实践是传承的关键，唯有融入日常、嵌入实践，才能让劳模精神真正发挥引领作用。

一是推动劳模精神融入院校人才培养，将劳模精神与专业教学、实践实训深度结合，在职业学校开设“劳模工匠大讲堂”，在高等学校设立劳模工匠兼职导师，邀请劳模工匠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践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中小学生进企业”的“双进”活动，建立长期化的精神联结，推动学生在实践中践行劳模精神[4]。

二是推动劳模精神融入企业发展，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将劳模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生产经营、技能培训全过程，完善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职工开展技术攻关、技能比拼活动，让职工在实践中学习劳模精神、践行劳模精神。

三是推动劳模精神融入社会治理，结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组织劳模工匠参与志愿服务、技术帮扶、政策宣讲等活动，如开展“劳模工匠助力乡村振兴”行动，让劳模精神在服务社会、奉献人民中彰显价值，同时营造“人人践行劳模精神”的社会氛围。

（四）健全机制：强化协同保障，构建长效传承体系

机制是传承的保障，唯有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才能为劳模精神传承提供持续支撑。

一是构建多方协同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建立由党委统一领导，工会牵头抓总，教育、宣传、人社、企事业单位等多方参与的协同工作格局，明确各主体的职责分工，畅通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渠道，整合政策、人力、平台、经费等资源，形成传承合力。同时，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将劳模精神传承纳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要议程，强化统筹协调。

二是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加大对劳模群体的表彰与扶持力度，兼顾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健全劳模职业发展通道、权益维护和生活保障机制，解决劳模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劳模有荣誉、有待遇、有发展，激发劳动者争当劳模、践行劳模精神的内在动力。同时，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将劳模精神、职业道德养成纳入评价指标，建立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的双向比照认定制度，畅通技能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双向流动通道，为践行劳模精神的劳动者提供发展空间[5]。

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构建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传承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从认知度、认同感、践行度等维度，对劳模精神传承工作的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及时发现传承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优化传承路径，推动劳模精神传承工作持续改进、长效发展。

此外，还应推动劳模精神与地域文化、行业文化深度融合，挖掘地域内的劳模资源与文化基因，打造具有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的传承品牌，让劳模精神在文化浸润中实现更好传承。同时，前瞻性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传承中的应用，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传承体验，提升传承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四、结论

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传承，是一项关乎价值引领、人才培育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面对认知虚化、传播低效、实践薄弱与机制滞后等多重现实困境，必须坚持以创新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机制固本。通过重塑价值认知、升级传播矩阵、深化实践融入、健全协同保障等路径，推动劳模精神从“典型宣传”走向“大众践行”，从“活动化展示”深化为“常态化滋养”。唯有如此，才能使劳模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激励广大劳动者秉持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等品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书写“劳动创造幸福”的新篇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坚实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27.

[2] 吴沛东．当代大学生劳模精神认知状况分析与培育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2018(11):102.

[3]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4] 任嘉蕊．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三维探析 [J]. 理论导刊，2024(08):61-65,128.

[5] 夏一璞．论劳模精神的文化传承与时代内涵 [J]. 观察与思考，2022(02):57-6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全区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课题“‘全区高校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建设项目”（内教工委〔2025〕44号）。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银发经济背景下家政职业教育发展创新研究

刘世杰

摘要：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提速，银发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增量板块。在人口深度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业态迭代升级的双重背景下，本文聚焦家政职业教育与银发产业专业化、精细化、智慧化的人才需求适配矛盾日益凸显，存在人才培养体系错位、产教融合深度不足、数字化教学转型滞后、社会认知偏差等现实困境，难以支撑新时代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需求。基于此，本文立足银发经济全新发展内涵与养老服务人才能力重塑要求，从培养体系重构、产教深度融合、数字教学赋能、发展生态优化四个维度，构建适配银发产业发展的家政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打造“精准分层、跨科融合、数字赋能”的现代化育人体系，并搭建政策、行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保障机制，推动家政职业教育与银发产业深度耦合、协同发展，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银发经济转型升级筑牢人才根基。

关键词：银发经济；家政服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产教融合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纵深推进，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加速向深度老龄化阶段演进。伴随“60后”等新生代老年群体逐步步入老年生活，其消费理念、服务需求、价值认知较传统老年群体发生根本性转变，催生了规模庞大、业态多元的万亿级银发消费市场，为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注入全新动能。为顺应银发经济发展大势，国家先后出台《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等一系列专项政策，明确提出推动“家政+养老”业态融合创新，要求职业教育精准对接银发产业发展需求，强化养老服务领域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育。

当前社会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空巢化、独居化特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成为主流模式，老年人对专业化、个性化、精细化家政养老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家政养老行业面临人才结构性短缺与岗位吸引力不足并存的困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专业人才供给不足问题突出。究其根源，核心症结在于传统家政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与银发产业岗位技能需求适配性不足。

在银发经济发展新态势下，如何突破传统家政职业教育固化模式，从育人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产教协同、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系统化创新路径，推动家政职业教育精准赋能银发产业发展，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研究能进一步厘清职业教育和银发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银发经济领域的教育配套研究成果，完善家政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为新时代养老服务类职业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聚焦行业真实痛点，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创新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家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难题，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助推银发经济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二、银发经济的新内涵及家政人才的能力结构再造

（一）银发经济的核心特征与产业图谱

新时代银发经济已从传统单一的“养老经济”变为如今的“全龄备老经济”，其覆盖范围持续拓展，涵盖老年健康养护、日间照料、旅居康养、金融理财、文体休闲、智慧养老等多元领域，形成全链条、全方位的产业生态[1]。相较于传统养老模式，全龄备老经济凸显前置化、全员化、多元化特征，覆盖青年养老规划、中年亲老照料、老年康养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场景。

老年群体需求呈现分层化、精细化、差异化特征：低龄健康老年人侧重社交休闲、价值实现、轻量康养服务；中高龄老年群体聚焦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日常照护；失能、半失能、失智老年群体则高度依赖专业化长期照护与康复服务。需求分层倒逼产业业态深度融合，传统单一家务型家政服务加速转型，逐步

形成“家政＋医护”“家政＋康复”“家政＋智能”“家政＋金融”等融合型服务新模式。智能化手段在养老场景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远程健康监测设备、养老服务机器人、智能康养终端等数字化工具深度融入养老场景，推动家政养老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2]。

（二）对家政服务人才能力的颠覆性要求

要求家政服务人才实现从“劳务提供者”向“生活健康管理者”的角色转型。知识维度涵盖老年生理特征、常见疾病用药指导、老年膳食营养搭配、康复辅具使用常识、智能辅助设备安全操作、应急救护技能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等内容。技能维度包括专业生活照护（如沐浴协助、移动转运）、基础康复训练、老年心理疏导与情绪安抚、健康状况监测与管理、智能家电操作维护及代际关系协调等核心能力。

三、适配不足：当前家政职业教育应对银发经济的现实困境

（一）培养体系错位：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

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培养方案设计过于笼统，未能精准匹配银发产业细分岗位需求，失智照护员、康复辅助员、养老管家等新兴岗位尚未纳入培养范畴。由此导致毕业生知识技能泛化，核心岗位能力不足，难以契合企业实际用人标准[3]。课程体系内容陈旧滞后，与行业发展需求脱节。现有课程多聚焦于传统家居服务内容，“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老年心理学”“智能养老设备操作”等核心领域的专业课程严重缺失。此类课程设置与《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的最新要求存在显著差距。

（二）产教融合虚化：校企协同育人效能不足

校企合作流于形式，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不足，合作内容多局限于学生顶岗实习，在课程设计、标准制定、教材编写等深度合作环节参与度极低。校企双方缺乏长效利益绑定机制，企业担心投入资源后人才流失，不愿开放核心业务场景与技术资源。老年照护领域“双师型”教师缺口显著，多数专任教师缺乏一线照护实践经验，对行业最新技术与服务标准掌握不足，教师下企业实践多流于打卡式参观，难以积累真实的岗位操作经验[4]。

（三）数字转型滞后：智慧化教学体系尚未成型

教学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多数院校尚未将虚拟仿真、智慧养老实训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资源融入教学全过程，学生数字化服务能力难以得到系统培养，这一观点已得到闫文晟等学者（2025）的学术印证。尽管部分数字化工具已初步应用于课堂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了解行业技术应用，但整体融合深度与广度仍显不足[5]。

（四）社会认知偏颇：职业认同与发展生态整体偏弱

传统行业偏见与社会认知偏差深刻影响从业者的职业选择与发展，导致家政养老服务职业社会认可度偏低。社会普遍存在“伺候人”“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加之行业职业晋升通道不畅、发展路径不明晰，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行业整体离职率居高不下，薪酬待遇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突出，高素质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四、银发经济背景下家政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一）体系重构：构建精准适配产业需求的分层育人体系

树立“以老为本”的教育理念，从“技能培训”转向“全人培育与生涯发展”，既要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照护需求，更要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选择权，助力其实现自我价值与老有所为。根据低龄、中高龄、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的分层需求，细化各专业方向的核心能力标准，明确毕业生在细分岗位的任职要求，确保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岗位能力清单精准对接。优化专业方向设置，在高职、应用型本科层次分别开设老年健康照护、智慧养老管理、老年康复辅助、老年营养与膳食等细分方向，可借鉴日本家政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构建纵向贯通的教育培养序列，鼓励高校增设家政学（老年服务方向）硕士点，打通中职、高职、本科至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通道。同时，可探索将劳动与生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这一做法已得到闫文晟等学者（2025）的理论支持[6]。

（二）产教共融：构建校企双元协同育人机制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共建产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站、企业学徒岗位等平台，全面推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以资金、技术、标准等资源要素参与办学，构建类似德国“双元制”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联合打造高水平实训基地，整合生活照护、康复训练、智慧养老等多元场景，构建沉浸式综合实训中心。南通崇川区“驿站式”养老服务模式为此提供了有益借鉴。建立校企师资双向流动的常态化机制，将企业实践经历纳入教师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同时为产业导师提供系统的教学能力培训，提升其课堂教学与实训指导的专业化水平。锻造“跨界融合、专兼结合”的创新教学团队，实施“双聘双融”制度：一方面从行业引进技术能手、资深护士长、康复治疗师担任产业导师；另一方面组织专任教师定期到优质养老企业、康养机构轮岗实践。组建结构化教学团队，整合家政教育、护理、心理咨询、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师资力量，协同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7]。

（三）数字赋能：推进教学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构建“模块化、跨学科、数字化”的新课程体系，涵盖通用素养、老年照护核心、特色拓展三大模块，其中特色拓展模块包含失智症专项照护、康复技术、老年金融常识等内容。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有机融入护理学、心理学、康复治疗学、社会工作、物联网技术等多

学科知识。深化数字化教学实践，开发跌倒应急处置、失智老人沟通等虚拟仿真实训项目，广泛采用线上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建立课程内容动态更新机制，畅通与养老机构、康复中心、科技企业及行业协会的常态化反馈渠道。建设智慧教学平台，整合课程资源、实训管理、学习认证、就业追踪等功能模块。推行“多元主体、过程导向”的评价体系，明确各评价主体的职责与权限。例如，企业作为核心评价主体，应从岗位实际需求出发提供评价反馈。评价维度应全面覆盖服务对象反馈（包括模拟场景与真实服务场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证书）考核结果等多个方面。

（四）认知重塑，为银发家政人才留存构建支撑体系

为青少年开设养老照护方面的公益体验课，将老年康复、智能康养和心理疏导等核心操作内容直观展示给他们，利用社区阵地和融媒体等，对养老管家以及失智照护师等新型岗位加以大力宣传，使家政人才脱离低端的劳动标签。在行业协会牵头下，为家政人才建立分级评价体系，将职业服务成果以及智能设备运维的能力合理纳入评级范围，并使评级结果和他们的薪资待遇直接挂钩，同步开展市级和省级的银发服务标兵评选，让荣誉和人才落户以及公共优待等挂钩，为一线照护向老年营养研发和康养运营等转型提供更多渠道，进一步拓宽银发家政人才的职业发展范围。为在岗从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体检、专项意外保险以及心理疏导等服务，同时给予资深从业者住房或子女入学资源等待遇，并依托公益基金为在岗人员提供更多智慧养老、康复等技能培训和进修的机会。将社区文明实践站以及公共场馆作为依托，为从业人员开展老年康养方面专题宣讲，普及专业养老照护知识与技术，让社会大众能够正视和尊重银发家政人才的专业属性，在重塑认知的同时，也为银发家政从业者营造更加理解、尊重的和谐社会氛围。

五、多维协同的保障体系建设

（一）政策制度保障

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各地应出台银发经济专项规划，明确家政服务人才培养目标，并从资金补助、税费减免、场地支持等方面提供政策配套。完善职业标准与认证体系，加快制修订养老服务类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深入推进养老护理员“1+X”证书制度试点；探索建立证书等级与薪酬待遇挂钩机制，保障高技能人才获得合理薪酬回报；深化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对报考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相关专业的学生给予学费减免或奖学金资助，对吸纳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企事业单位落实社保补贴政策[8]。

（二）行业企业保障

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鼓励其牵头制定服务标准、编写培训教材、开发优质实习岗位。落实家政企业员工制经营补贴政策，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增强职业稳定性与吸引力。

（三）社会环境保障

加强正面宣传与价值引导：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宣传优秀家政服务人员的先进事迹，展现其专业素养与职业价值；定期举办家政服务技能大赛等活动，彰显行业专业性，逐步扭转社会刻板印象。开展全民生命教育与老龄教育，将尊老助老内容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通过社区宣传海报、专题讲座等形式，普及老年服务需求与家政服务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家政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9]。

六、结论与展望

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养老服务业态的迭代升级，对家政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机遇。当前家政职业教育存在的培养体系错位、产教融合虚化、数字转型滞后、发展生态偏弱等问题，严重制约银发产业人才供给质量。新时代家政职业教育需主动嵌入银发经济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实现从被动适配需求到主动引领产业发展的战略转型，通过重构分层精准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校企双元产教融合、推进全方位数字化教学赋能、优化行业发展生态，全方位提升复合型、智慧型、专业化康养家政人才培育质量。同时，依托政策、行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保障机制，持续破解人才培养痛点、行业发展难点，推动家政职业教育与银发经济深度耦合、双向赋能，为养老服务提质升级、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曹科岩，蔡楚佳．代际视角下城市银发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具体策略 [J]. 深圳社会科学，2026,9(01):63-74.

[2] 孙冬梅．我国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J]. 中国发展观察，2023(04):108-110.

[3] 晋家琦，胡雅菲．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河南省家政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J]. 社会与公益，2025(20):209-211.

[4] 李磊．家政职业教育发展内在逻辑、困境与路径——以吉林省为例 [J]. 中国培训，2023(05):94-97.

[5] 陈静，卢铖卉．“养老”变“享老”，多元化服务满足多样化需求 [N]. 南通日报，2025-08-14(A01).

[6] 闫文晟，刘芸，李晓梅．增强家政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家政学刊，2025,2(02):122-130.

[7] 孙鹃娟，孙可心．中国老年人家庭新形态及居家养老领域的银发经济发展 [J]. 家政学刊，2024,1(03):207-214.

[8] 陈倩，胡湛．银发经济浪潮下的家政养老服务：需求演变、供给挑战与策略创新 [J]. 家政学刊，2024,1(03):215-223.

[9] 俞华，徐娜．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现状、趋势、问题与对策 [J]. 湖北社会科学，2023(11):73-81.

（作者系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人工智能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路径研究

夏　颖　刘静雯 *

摘要：本文聚焦人工智能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问题，基于技术—制度互构理论、技能形成理论等，采用文献研究等方法，系统分析养老护理人才技能供需现状与人工智能对技能体系的重构逻辑。从技术种类、应用场景、工作模块三维度剖析技能重塑路径，提出“政—校—企—研”协同育人、“基础—专项—跨界”分层课程、“模拟实训＋场景考核”教学模式及“技能—薪酬—职业”联动机制的多维实施策略，辅以制度、资源、质量层面的保障体系。研究为优化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政策、提升智慧养老服务效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助力养老服务体系适配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发展需求。

关键词：人工智能；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智慧养老；人才培养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养老服务业，促使养老服务的需求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智能化转变，也对养老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解决技能短缺和技术使用与人员能力不符的问题，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完善，在资源上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以标准的制度设计、优质的资源保障和服务来支持养老护理人员提升自身技能，适应智慧养老的发展需要。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具备技术和方法论双重性质，技术应用场景是指图像识别、智能监测、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具体应用，包括健康监测、日常生活照料、紧急救助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工作；而分析框架是从人机互动角度探讨养老照护工作改变过程，关注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照护行为、照护关系以及所需技能所起的全面作用，而不是一种外部手段。

2. 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

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是指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养老服务过程中，养老护理人员技能发生系统性变化过程，包括技能构成变化、技能方向变化以及技能内容变化，主要是指技术能力、认知能力和关系能力共同提高，来满足“智慧康复照护者”角色的变化。

3. 三维技能结构体系

技术能力包括智能设备的操作使用、护理技术的应用以及健康信息的管理等具体的技术；认知能力包含在护理工作中对情况的判断、决策及对技术应用的效果进行评价等思考的能力；关系能力是指与老年人交流沟通的能力、给予老年人的情感关怀以及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协调等能力。

（二）理论基础

1. 技术—制度互构理论

该理论认为，技术与制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技术的发展会影响相应的制度建设，同时，制度的进步也会为技术的应用创造良好条件[1]。而在养老护理人员技能培训方面，这一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与养老服务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由于技术融入而产生的技能新需求会影响到培训制度、职业评价制度的变化，也可以说明制度创新是如何反过来促进技术和技能更好地结合。

2. 技能形成理论

该理论核心在于解释技能发展驱动力、影响因素及产生过程，认为技能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个人学习的结果，而是一个置于一定社会关系、制度背景以及行业需要之下的整体性结果。这一理论可以用来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养老护理技能的变化规律，在技术进步、市场要求、政府引导等对技能转型起到的推动作用方面给予建议，从而进行技能再构建的设计。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养老护理人才技能供需现状

（一）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基础现状

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年龄结构呈现中老年化特征，青年群体占比偏低，学历层次以中专及以下为主，高等教育背景人员占比不足，从业年限分布不均，短期从业者数量较多，长期稳定从业群体规模有限。职业资质方面，取得中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人员占比不高，多数护理人员仅具备基础照护资质，缺乏专项技能认证。队伍稳定性表现为流失率较高，职业认同感与薪酬待遇水平呈正相关，基层护理岗位人员流动频繁，机构养老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领域人才分布不均衡，居家社区养老护理人才缺口更为突出。

（二）养老护理人才技能结构现状

技术能力层面，护理人员对传统生活照料技能掌握较为熟练，但智能设备操作技能普遍薄弱，健康数据解读与分析能力不足，对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较低，缺乏人机协同运作的实操经验。认知能力方面，对常规护理场景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具备基础水平，但面对技术嵌入后的复杂场景，缺乏综合分析与灵活应对能力，对智能技术应用效果的评估能力欠缺[2]。关系能力上，传统护老沟通与情感支持技能有所积累，但在人机协同场景下的关系协调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平衡技术应用与人文照护的关系，技术伦理判断能力有待提升。三维技能结构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传统技能与智能时代所需技能存在断层。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养老护理技能需求现状

技能需求维度呈现多元化。技术能力方面，智能监测设备操作、健康数据整合分析、护理机器人协同作业等技能成为核心需求，数据安全防护与隐私保护相关技能需求日益凸显。认知能力需求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下的问题诊断、风险预判、决策优化等方面，要求具备技术应用效果评估与调整能力。关系能力需求延伸至人机协作中的沟通适配、老年群体技术接受引导、伦理冲突协调等领域，强调技术理性与照护伦理的平衡能力。需求分布上，机构养老场景侧重技术整合与系统操作技能，居家社区养老场景强调独立判断与应急处理技能，不同服务场景下技能需求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核心需求均围绕“技术应用＋专业照护”的复合能力展开。

四、人工智能对养老护理技能体系的重构机制

（一）技术种类维度的技能要求分化

替代型技术聚焦养老护理中的体力型、重复性操作环节，其应用使护理人员传统体力劳动占比下降，转而需要具备设备调试校准、运行状态监测、故障基础排查等技能，同时需掌握技术操作与人工照护的衔接流程。加强型技术以数据采集、分析与辅助决策为核心功能，推动护理人员技能向健康数据识别、异常指标解读、技术输出结果验证等方向拓展，要求具备数据整合应用与专业判断结合的复合能力。互动型技术侧重情感陪伴与信息传递，促使护理人员须具备人机协作沟通、老年群体技术使用引导、互动场景适配调整等技能，强化技术应用中人文关怀的传递与适配能力。不同技术类型从技能侧重、能力层级、应用逻辑等方面形成差异化要求，推动护理技能体系向多元化、精准化方向调整。

（二）应用场景维度的技能适配调整

机构养老场景中，智能设备系统集成度高、技术配备全面，护理人员须具备多类型技术协同操作、系统数据互通对接、跨部门技术应用协调等技能，同时需掌握规模化照护场景下的技术资源统筹分配能力。居家社区养老场景中，技术应用呈现分散化、个性化特征，护理人员须具备独立完成智能设备安装调试、远程技术故障应对、结合家庭环境优化技术应用等技能，强化复杂环境下的技术适配与风险预判能力[3]。两类场景基于技术配备水平、工作组织形式、服务辐射范围的差异，形成技能需求的场景化分化，推动护理人员构建场景适配的柔性技能结构，实现不同场景下技术应用与专业照护的有效融合。

（三）工作模块维度的技能迭代升级

生活照料模块中，部分重复性操作被技术替代，护理人员技能转向技术操作配合、照护质量优化、个性化需求适配等方面，强调技术应用与照护细节的精准衔接能力。健康管理模块中，技术的深度嵌入使技能需求集中于健康数据动态监测、慢病管理技术辅助、康复方案智能适配等领域，要求具备数据驱动的健康评估与干预能力。情感支持模块中，技术承担基础陪伴功能，护理人员需强化情感需求深度识别、人文关怀精准传递、技术陪伴与人际陪伴的协同互补等技能，凸显人际互动的核心价值。应急处理模块中，技术提供预警支持与初步响应辅助，推动护理人员技能向应急风险快速研判、技术预警信息验证、人机协同应急处置等方向升级，提升复杂应急场景下的快速反应与科学处置能力。

五、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的多维实施策略

（一）构建“政—校—企—研”协同育人体系

政府方面出台养老服务行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技能重塑的要求、标准以及资源分配等事宜，形成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给予资金扶持并提供相应政策保障，使技能提升与工资挂钩政策得以实施。学校方面改进养老服务课程体系，融入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及养老照护内容，搭建网络化教学平台，改善实验室条件及设施配备情况，加强教师队伍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授课水平。企业方面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中去，设立实习岗位和技术指导，参与课程开发以及考试要求设定，组织在职员工的专业培训和个人学习发展计划，成立校企联合共建实训中心。科研院所关注养老服务技术应用以及技能培训相

关热点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技术开发，为技能培训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使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或者培训项目。这四个方面的参与者通过相互协作、共同承担责任、共享收益的方式构建一个整体化、全面化的技能培训生态系统。

（二）搭建“基础—专项—跨界”分层课程体系

基础层次课程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基本知识、智能设备使用规定、数据安全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养老护理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实践技能，为养老护理人员提供扎实的技术应用基础和服务能力。专项层次课程根据不同的技术和工作任务进行划分，如智能监测设备数据分析、护理机器人配合训练、慢性疾病管理系统使用、突发事件应对配合等专项培训，使养老护理人员具备在某一方面较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和专业匹配度。跨界层次课程主要关注智慧养老服务管理、跨领域知识整合运用、人机协作道德标准、养老服务效果评价等问题，扩大养老护理人员的知识面并提升整体能力水平，符合“智慧康复照护者”的角色要求。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技术与专业的相辅相成，采取分模块、可变性的形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及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课程内容。

（三）创新“模拟实训＋场景考核”实践教学模式

基于 VR/AR 技术以及智能化仿真设备搭建真实度高的养老服务仿真实训室，设置各种智能设备使用、人机协同照护、突发情况处理等实训项目，让学员们掌握更多技能并提高其应急处理能力。开设多种类型的实训基地，如机构养老实训基地、居家社区养老实训基地等，让护理人员到各个实训基地进行轮岗实训，让他们了解各个实训基地的操作及工作流程，增强他们对不同实训基地的适应能力 [4]。制定符合工作岗位要求评价标准，从技术操作熟练度、数据分析准确性、人机配合默契度、道德评判正确率等方面对护理人员进行考核，采取过程性和结果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四）建立“技能等级—薪酬待遇—职业发展”联动机制

实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划分从低到高共八级技能等级标准，规定每个等级应具备技术应用能力、服务质量以及职业道德等，加强技能等级考评工作。使技能等级与工资挂钩，实行技能决定工资的办法，提高中级以上技能者的收入水平，通过发放技能补贴和支持优秀者评奖等措施，形成“技能越高，待遇越好”的导向。搭建畅通的发展渠道，在护理人员中设置由初级护理员至技术主管、服务经理等不同的发展阶梯，并对每个台阶所需达到的能力提出具体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新技术的学习培训，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技能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让护理人员能够及时地掌握新知识并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展。

六、养老护理人才技能重塑的保障机制与实践作用

（一）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制度体系

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薪酬待遇刚性挂钩机制，规定不同级别技能等级所对应的薪酬水平及增长方式，发挥制度对技能提高的激励作用。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人才的支持措施，将技能提升相关支出纳入保险赔付项目当中，增加培训机会，增强可得性。出台养老护理人员培养计划，在目标设定、资源分配以及落实方案上做出具体安排，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管理体系，促进技能重塑。

（二）强化养老服务资源供给能力

加强实训基地建设，配备人工智能实训设备及仿真教学系统，设置多种类型实训室以适应不同需求；建立数字课程资源库，收集智能养老技术运用、职业技能提升等方面的优秀素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进行学习；开展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培养既有良好养老服务理念又掌握一定人工智能知识技能的“双师型”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技能再训练 [5]。

（三）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与效能

优化养老护理人员队伍构成，提升高技能人才比例，增强队伍建设的专业性和稳定性，奠定养老服务的人才基础。推进养老服务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以技能提升促进技术与服务融合，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重视培养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和技术使用相结合的能力，适应老年人对多样化、高质量养老的需求，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体现技能培训的意义。

七、结语

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使养老护理职业技能重塑，在技能培训过程中要重视合作育人、分层次教学等手段并结合相应政策支持和资源。只有把技术和人文相结合，实现有效供给和需求匹配，才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解决养老服务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促进智慧养老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姜琳琳 . 智慧养老背景下高职养老护理人才培养研究 [J]. 辽宁高职学报 ,2026,28(02):40-42,100.

[2] 丁静 , 赵静 . 智慧养老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的发展困境与优化策略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06):111-113.

[3] 张飒乐 , 牛露露 . 智慧养老背景下智慧护理及养老护理员现状 [J].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2025,33(01):114-116,120.

[4] 胡宏伟 . 养老护理人才的专业化培养与高质量供给 [J]. 人民论坛 ,2024(13):36-41.

[5] 罗山 , 刘继红 . 人工智能在养老护理中的应用与展望 [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24,41(03):26-33.

（作者：夏颖，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刘静雯，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基于公益实践的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提升路径探究

沙炜娟

摘要：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师范生公共性素养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生力军，民族地区师范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不仅关系到其公共性成长，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高校民族地区师范生培养实践为基点，系统考察其职前职后发展轨迹，深入剖析以公益实践为核心载体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机制，进而构建并阐释“思想引领—实践淬炼—榜样示范—研究驱动”四维协同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要求深刻蕴含着对新时代青少年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培育的时代命题。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素养，其培育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应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民族地区师范生既是教育家精神的传承者与践行者，更是服务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育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的价值意蕴

民族地区师范生是未来教师队伍中肩负特殊使命的群体，他们的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养成不仅能促进其公共性成长，更为高校赋能民族地区教育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路径，对于新时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具有深远意义[1]。

（一）社会与情感能力是民族地区师范生涵养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

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育，是加强国家认同与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高校民族地区师范生是民族大学生群体中的重要力量，他们自身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能够通过教育引导的形式，传递给民族地区的学生群体，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助力民族团结。社会交往与情感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个体全面发展，还能在教育教学中传递包容、尊重的价值观，从而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注入持久动力。

（二）社会情感能力是民族地区师范生助力教育振兴的内在驱动

民族地区师范生作为未来基层教育的骨干力量，其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不仅能优化教育质量，更能通过文化传承与共同体建设辐射社会整体发展。民族地区师范生毕业后大多回到本民族地区任教，担负着振兴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养成，民族地区师范生能在边疆地区激活自我主体能动性、提高教育实践的人文温度、提升民族文化回应力，继而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为家乡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观念，使教育振兴从政策驱动转向内生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与情感能力是民族地区师范生促进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

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能够为民族地区教育的协同发展提供动力，确保各方力量同向而行。高校通过加强民族地区师范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育，在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养成中提升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民族地区师范生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活教材”，他们在言传身教中将共情、合作、尊重、韧性等品质直接传递给学生，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协作。这种教育实践本身，就是在培养具备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社会新公民，从而实现教育协同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校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已毕业的民族地区师范生为对象，通过比对其在职阶段的发展与在校期间的培养，探究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发展状况。调研发现，民族地区师范生在校期间存在沟通交往、问题解决、情绪管理等方面的弱势，但在入职后普遍展现出较高的职业认同感与发展自信心。值得关注的是，曾参与公益支教实践的民族地区师范生骨干，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劣势向优势转化的特征。

（一）职前民族地区师范生的抗逆力水平低于普通师范生

入学之初，以新疆、西藏、内蒙古地区为主的民族地区师范生抗逆力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沟通交往、情绪管理、实践能力、心理品质等方面。一是沟通交往和情绪管理能力欠佳，尤其在跨文化交往的灵活性、同理心、理性管理自我情绪及团队协作的主动性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需要引导其提升情绪觉察与调节能力，增强心理韧性。二是关联“重要他人”和亲社会行动力较弱。民族地区师范生对重要他人的依赖整体不高，需要及时引导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在社会服务方面，民族地区师范生表现出一定的亲社会能力但行动转化率受限。三是正向的价值观与积极心态需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师范生在诚信、友善、团结等价值观认知层面无显著差异，但在将价值观转化为具体行动方面存在能力断层。此外积极心态整体得分低，尤其在自信心与乐观维度上相对薄弱，需要进一步培育其持久稳定的积极心理品质[2]。

（二）职后民族教师的教学状况趋近或好于其他教师

以新疆、西藏、内蒙古地区为主的民族地区师范生，特别是有公益实践经验的，其在职后表现出较好的岗位幸福感、职业认同感、社会荣誉感、发展自信感。一是对师德师范、职业道德有着高度的责任意识。访谈调研显示，曾参与公益支教特别是担任学生骨干的民族地区师范生在跨文化沟通与共情能力、团队协作与领导力、情绪调节与抗压韧性、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等方面表现出较强优势。二是对教育信念、爱岗敬业有着积极正向的认同和理解。职后的民族地区师范生更强调爱岗敬业和教育信念的重要性，教育情怀普遍较高。访谈中，华东师范大学岗拉梅朵藏文化社的创社学生骨干多次提及，公益支教对他们树立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信念起到了关键作用。三是对教书育人、终身学习有着持续向上的认识和使命。在教学能力自我评价中，其在教学评估实施情况、任教学科学生积极性、教学研究、业务发展规划等维度上得分较高，有着客观自我评价和不断进取的职业精神[3]。

三、高校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的实践探索

为进一步探究民族地区师范生成长过程中的能力转化机制，特别是社会与情感能力养成对其发展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依托十余年持续开展的民族地区师范生公益支教项目，形成了一系列以公益实践促进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涵育的举措，为民族地区师范生的公共性成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一）基于“行知合一”的民族地区师范生支教实践的优化推进

一是以公益培训为核心抓手，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民族地区师范生公益培训全过程，设计专题讲授、主题实践、朋辈互助等环节，系统提升学生在公益理念认知、项目策划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及后勤保障技能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二是以公益实践为主要载体，为民族地区师范生在社区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提供实操锻炼平台，搭建自我认知与文化认同走向公共精神与行动担当的实践进路，引导其将社会情感能力从“自我”向“公共”延展。三是以公益课程为拓展方向，通过课程孵化、理论宣讲、科普教育等方式将传统教学课堂延伸至志愿公益理念与活动中，并配备专业导师、思政导师，指导其将个体化、情境化的支教经验提炼为标准化、模块化的公益课程。四是以公益研究为创新范式，引导民族地区师范生以研究者的视角审视公益实践，促进其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研究者的转变[4]。

（二）基于“服务学习”的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情感能力的行动干预

一是干预计划，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通过组织专题团体辅导，帮助民族地区师范生深入理解团队协作在项目实践中的关键作用；结合社会实践案例分享与经验复盘，强化前期调研的有效性。二是公益实施，强化前期调研的针对性。引导学生在实践前通过田野调查精准识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团队自主对接教育资源薄弱的边疆学校，围绕教育资源分配、师资建设、教学模式等关键问题展开实地调研。三是实践反思，重视实践进展的深度性。在前期调研与实践的基础上持续追踪支教实践对民族地区师范生的干预成效，并围绕教学能力、育人实效及教师专业成长等维度开展系统调研，最终形成可推广的实践案例。四是评估调整，注重服务学习的闭环性。以项目实施为契机，融合“服务学习”和公共性教育理念，持续完善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估反馈机制，系统追踪民族地区师范生的成长轨迹。

（三）基于“知情意行”的民族地区师范生志愿服务的长效探索

一是聚焦认知内化，提升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家国情怀”的担当能力。打造社会与情感能力主题讲座，引导民族地区师范生明晰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

情怀，促进其社会与情感能力“师德”“公德”协同发展。二是聚焦涵养浸润，促进社会与情感能力“文化使者”的自觉。打造社会与情感能力公益课程，培养民族地区师范生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进一步明确其在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与文化创新方面的重要角色。三是聚焦外化于行，对标富有民族教育智慧的“大国良师”。打造“我眼里的边疆教师”“朋辈导师的榜样力量”等公益教育实践课程，搭建“浸润式”的教育实践基地。四是聚焦专业评估，关注社会情感能力“终身学习”的效度。组织优秀民族教师与在校生结对，通过支教指导、访谈交流等形式提供持续的职业引导和精神支持，此外建立职前职后一体化档案袋，持续关注其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终身发展。

四、高校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的创新路径

通过“思想为基—实践为翼—榜样为引—研究为擎”四维联动模式，系统构建以公益实践为载体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培育体系，有效促进民族地区师范生实现从个人成长到社会担当的能力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探索创新路径。

（一）以思想为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引导民族地区师范生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社会情感能力涵养的同向同行。高校通过系统化开展民族文化节、公益实践等项目，进一步培育学生跨文化协作能力与情感联结，推动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同心共进”的育人环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五个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意识，厚植爱党爱国爱校情怀，从而实现文化交融在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中的长效赋能。如华东师范大学充分发挥教师教育特色与校园文化多元优势，通过举办主题开放日、教师技能竞赛、学科竞赛等活动，为民族地区师范生的专业成长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营造团结互助的校园氛围。

（二）以实践为翼，情系边疆接力教育振兴

以公益支教为依托，民族地区师范生在常态化社会实践中实现乡村教育振兴与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长效赋能。依托支教日志、复盘研讨等反思机制，强化学生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与职业认同；通过团队协作、家校沟通等场景，深化跨文化共情能力与协作意识，培育包容互助的共同体精神；引导学生在调研乡土需求、设计公益方案中提升社会责任感与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华东师范大学连续 15 年打造“雪域高原铸师魂”暑期支教项目，组织民族地区师范生深入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基层学校开展教学支持、文化互鉴与社会服务，有效提升了民族地区师范生的情感素养与社会适应力，更为其未来投身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注入了坚定的精神内核与持续的实践动能。

（三）以榜样为引，聚星成火实现示范带动

以榜样示范为助力，民族地区师范生在接力与传承中实现民族地区综合发展同社会与情感能力养成的双向奔赴。高校可通过组建多民族学习共同体，依托学业互助、文体活动、社会服务等多元载体，深化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融合。在持续的公益实践和民族融合中，民族地区师范生既锤炼了社会与情感能力，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实践智慧。他们凭借专业素养与教育情怀，扎根于边疆教育一线，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方面形成“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人才储备。华东师范大学着力构建“雁阵式”育人生态，通过跨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经验传递等持续助力民族教育事业的薪火相传。

（四）以研究为擎，深化内涵驱动长效发展

以创新研究为引擎，民族地区师范生在实践与循证研究中实现终身学习发展与社会与情感能力协同的提质增效。高校可依托跨学科平台优势，系统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相关的行动研究与理论建设。例如，通过对支教日志、课堂观察记录、学生成长档案等材料进行文本挖掘，逐步构建具有民族教育特色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教学案例库。在此基础上，动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推动有效个体经验向标准化课程资源与培训体系转化。此外，积极融入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可探索搭建“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数字平台”，打造突破时空局限的“智能 + 实践”育人生态，为民族地区师范生实现终身发展、成长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大国良师”提供有力支持 [5]。

参考文献

[1] 徐远琼 . 云南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参与能力培育研究 [D]. 昆明 : 云南师范大学 ,2019.

[2] 谭晓兰 . 抗逆力视角下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探讨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03):77-81.

[3] 吕翠翠 . 少数民族地区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一体化培养模式的研究 [D]. 乌鲁木齐 : 新疆师范大学 ,2014.

[4] 李伟元 . 少数民族免费师范生综合能力培养研究 [J]. 黑龙江史志 ,2009(10):141.

[5] 童汝根，刘妍，张云婷 . 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共育新时代大国良师——第十五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暨 2018 年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年会综述 [J]. 教师发展研究 ,2018,2(04):118-1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上海市学校共青团工作课题“数智时代志愿服务提升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功能研究”（2025LX7-19）；2025 年度紫江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项基金项目“基于公益实践的民族地区师范生社会情感能力提升行动研究”（2025ZJ09）。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

解　男

摘要：为探讨手机成瘾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机制，本研究以辽宁省某高校 312 名大学生为样本，测量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与人际关系困扰，并检验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三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中介分析表明手机成瘾显著预测社交回避与人际关系困扰，社交回避的间接效应显著且直接效应仍存在，支持部分中介，AMOS 对照检验亦支持保留直接路径。研究提示，高校除加强手机使用管理外，应同步关注社交回避识别与线下社交能力提升，以降低人际困扰风险。

关键词：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人际关系困扰；大学生；中介效应

一、引言

人际关系困扰是大学生常见的社会适应问题[1]1598，主要表现为沟通不畅、交友困难、亲密关系维持受阻及冲突处理能力下降等。大学阶段是人际能力与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时期，持续的人际关系紧张不仅损害主观幸福感与校园适应，还可能波及学习投入、情绪稳定与日常功能[2]。因此，明确其关键影响因素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数字化生活方式普及的背景下，智能手机虽广泛服务于学习与社交，但过度使用易引发依赖风险。研究表明，大学生是手机成瘾的高风险群体，持续的过度使用可能削弱注意力控制与自我调节能力，并在现实交往中表现为互动质量下降与关系维护困难[3]278，提示手机成瘾可能成为人际关系困扰的重要行为风险因素。

进一步而言，手机成瘾影响人际困扰的过程机制仍需细化解释。相关观点认为，个体在现实社交中感到压力或挫败时，可能转向更可控的线上互动，从而减少线下社交投入[3]280。社交回避可能成为关键中介：回避现实社交将减少互动机会与沟通练习，弱化关系经营能力，进而提升人际适应压力并加重困扰体验[1]1598[3]280。

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考察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联性，并检验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数字媒介依赖背景下的大学生社会适应问题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证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考察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检验社交回避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为保证研究的可重复性与结果解释的清晰性，本章从研究对象与样本、测量工具、数据收集与处理流程以及统计分析策略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在辽宁省某高校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共发放 350 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312 份。样本主要为大二和大三学生，年龄集中在 19~22 岁之间；男女比例约为 48.2% 与 51.8%。正式调查前进行了小样本预测试，各量表 Cronbach’s α 均超过 0.80，表明工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使用较为广泛且信效度良好的成熟量表测量主要变量，包括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与人际关系困扰。各量表均以得分高低反映相应特征水平，得分越高，代表该特征越突出。

1. 手机成瘾量表

手机成瘾采用 Kwon 等（2013）编制的简版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hort Version,SAS-SV），共 10 个条目，采用 6 点计分[4]。得分越高，表示手机成瘾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88。

2. 社交回避量表

社交回避采用 Watson 与 Friend（1969）编制的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中的社交回避分量表，共 14 个条目，采用二分计分方式作答[5]。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现实社交情境中的回避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中该分量表内部一

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87。

3. 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人际关系困扰采用郑日昌（1999）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共 28 个条目，采用“是 / 否”作答，“是”计 1 分、“否”计 0 分，总分范围为 0~28 分，得分越高表示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越严重[6]。该量表包含交谈、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四个维度。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0.82。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使用 SPSS 26.0 与 AMOS 26.0 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在 SPSS 中进行描述性统计与 Pearson 相关分析。随后采用 PROCESS（Model 4）检验社交回避在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 Bootstrap 重抽样 5000 次估计间接效应，并以 95% 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 来判断显著性。为补充验证，在 AMOS 中建立观测变量路径模型进行对照检验。统计检验以 $p<0.05$ 为显著性标准。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数据收集采用匿名、自愿作答并统一题项表述，但仍需在研究局限中审慎解释相关结果。

三、研究结果

（一）数据整理与信度检验

为确保后续模型检验的可靠性，本研究首先对量表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手机成瘾量表（SAS）、社交回避分量表（SAD）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RD）的 Cronbach’s α 均达到可接受及以上水平，表明整体内部一致性良好，主要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见表 1。为降低同源数据带来的偏差风险，本研究在匿名作答、强调无对错与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完成测量，并在结果解释中保持审慎。

表 1 主要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

量表	题数	计分方式	Cronbach’s α
SAS-SV 手机成瘾	10	6 点计分	0.88
SAD 社交回避分量表	14	二分计分（0/1）	0.87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28	二分计分（0/1）	0.82

注：N=312；Cronbach’s α 为内部一致性系数。

（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以呈现样本中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基本水平及其两两关系。结果显示，三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符合研究预期方向。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与 Pearson 相关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统计与相关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1. 手机成瘾	35.00	11.80	1		
2. 社交回避	6.92	4.23	0.47***	1	
3. 人际关系困扰	13.84	5.73	0.39***	0.55***	1

注：N=312；表中数值为 Pearson 相关系数；***$p<0.001$。

（三）中介模型路径检验

采用 PROCESS v4.1 的 Model 4 检验社交回避在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3 所示。首先，总效应模型显示手机成瘾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说明手机成瘾水平越高，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困扰体验越突出。其次，在中介模型中，手机成瘾对社交回避的预测效应显著，表明手机成瘾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更强的现实社交回避倾向。进一步地，在同时纳入手机成瘾与社交回避后，社交回避对人际关系困扰的预测效应仍显著，提示社交回避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同时，手机成瘾对人际关系困扰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但相较于总效应有所减弱，说明社交回避能够解释手机成瘾影响人际关系困扰的一部分作用过程。

为检验间接效应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 5000 次 Bootstrap 重抽样估计间接效应及其 95% 置信区间。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手机成瘾通过社交回避对人际关系困扰产生的间接影响显著。综合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结果，可以认为社交回避在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手机成瘾既可以通过提升社交回避倾向间接增加人际关系困扰，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对人际关系困扰产生直接影响，这为后续讨论中进一步解释潜在机制提供了依据。

为补充验证，本研究在 AMOS 中以三变量总分建立路径模型，并将删除直接路径的完全中介模型作为对照。结果显示，该对照模型拟合不佳（$\chi^2(1)=9.589, p=0.002$；RMSEA=0.166，PCLOSE=0.013；TLI=0.870），结果显示若不保留“手机成瘾 → 人际关系困扰”的直接路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会明显变差。结合 PROCESS 中直接效应仍显著，进一步支持采用部分中介模型。

本章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困扰越明显。手机成瘾还能显著加剧社交回避，而社交回避能进一步加重人际困扰，间接效应经 Bootstrap 检验成立，说明社交回避发挥部分中介作用。AMOS 对照检验也显示完全中介模型拟合不足，从而支持保留直接路径的部分中介结构。总体来看，手机成瘾既会通过提升社交回避间接影响人际适应，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直接带来人际困扰。

四、讨论

（一）主要发现与机制解释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手机成瘾水平越高，人际关系困扰越明显。这一结果提示，过度依赖手机不仅可能挤占现实交往时间，也可能削弱个体在真实互动中的投入度与敏感度，从而更容易在沟通、亲密建立与冲突处理等方面产生困难。进一步的中介检验表明，社交回避在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 3 中介模型回归结果

效应 / 路径	b	SE	t	p	95% 置信区间
a 路径：手机成瘾→社交回避	0.1688	0.0179	9.4135	<0.001	[0.1335,0.2041]
b 路径：社交回避→人际关系困扰（控制手机成瘾）	0.6451	0.0718	8.9863	<0.001	[0.5039,0.7864]
直接效应 c′：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控制社交回避）	0.0799	0.0257	3.1107	<0.002	[0.0294,0.1305]
总效应 c：手机成瘾→人际关系困扰	0.1888	0.0254	7.4307	<0.001	[0.1388,0.2388]
间接效应（a×b）：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人际关系困扰	0.1089	0.0162(BootSE)	—	—	[0.0786,0.1430] (Bootstrap 95%CI)

注：b 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间接效应的标准误与置信区间采用 Bootstrap 重抽样（5000 次）估计，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示间接效应显著。

换言之，当大学生更依赖手机时，更可能倾向于回避线下交往或减少主动社交，这种回避倾向会进一步累积人际压力与负性体验，最终表现为更高的人际关系困扰。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支持“部分中介”而非“完全中介”。这意味着，社交回避确实解释了手机成瘾影响人际困扰的重要一段过程，但手机成瘾仍可能通过其他路径直接影响人际适应。例如，与手机成瘾相关的注意分散与即时满足偏好可能降低深度对话质量，夜间使用带来的睡眠受损与情绪波动也可能增加在人际情境中的消极反应。这些可能机制为后续研究扩展模型提供了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启示

从理论角度看，本研究将“行为依赖”与“现实社交回避”连接起来，说明手机成瘾对大学生人际适应的影响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相关，而是存在清晰的过程机制。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提示，理解手机成瘾的后果时应同时关注个体在现实交往中的行为选择与回避模式，这有助于把“使用行为”与“社会适应结果”更具体地衔接起来。

从实践角度看，干预重点不应仅停留在“减少使用时长”，更应面向大学生的现实社交行为。一方面，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可将“手机使用管理”与“社交回避识别”结合，帮助学生觉察自己是否因为线上依赖而减少线下互动。另一方面，可通过小组辅导、同伴支持与社交技能训练等方式，降低社交回避带来的恶性循环，提高学生在现实交往中的自我效能感与互动质量。对于手机使用习惯较重的学生，逐步增加线下互动机会、设置可执行的小目标，可能比单纯限制手机更容易产生持续效果。

（三）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采用横断面设计，变量方向主要依据理论推断，未来可通过纵向追踪或实验研究强化因果检验。其二，数据来自自陈问卷，可能受共同方法偏差与社会期许影响，后续可结合手机使用客观记录或同伴评价等多源数据。其三，本研究仅检验单一中介，可能低估手机成瘾影响人际困扰的复杂路径；未来可在模型清晰的前提下，纳入情绪调节、睡眠质量、孤独感或自尊等变量，以进一步解释“部分中介”中未被覆盖的直接效应来源。

五、结语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检验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并考察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手机成瘾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且可显著提高社交回避水平；社交回避进一步加重人际关系困扰。Bootstrap 结果表明间接效应显著，且直接效应仍存在，说明社交回避发挥部分中介作用；AMOS 对照检验同样支持保留直接路径的部分中介结构。总体而言，手机成瘾既可通过增强社交回避间接影响人际关系困扰，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直接影响。实践中，高校干预除关注手机使用管理外，应同步加强对社交回避的识别与干预，通过同伴支持与社交技能训练促进线下互动，降低人际困扰风险。

参考文献

[1] 徐文希，张文渊．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关系：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C]// 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下）．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心理系，2021:1598-1599.

[2] 高学锋．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资本的双重作用 [J]. 心理学进展，2024,14(04):248-258.

[3] 杨青松，石梦希，张晓洲，等．人际压力与大学新生手机成瘾的关系：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与坚韧的调节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5,33(02):277-282.

[4]Kwon M,Kim D J,Cho H,et al.The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hort version for adolescents[J].PLoS ONE,2013,8(12):83558.

[5]Watson D,Friend R.Measurement of social-evaluative anxiety[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69,33(04):448-457.

[6] 郑日昌．大学生心理诊断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339-34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鞍山师范学院校级项目“大学生手机成瘾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社交回避的中介作用”（25kyxm0027）。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

高校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在离退休工作中的作用研究

刘亚辉

摘要：在人口深度老龄化背景下，高校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面临人员结构复杂化、服务需求多元化等新型难题。老年社团、老年协会作为衔接离退休群体和高校管理部门的纽带，其作用也越发明显。本文以高校离退休工作为研究背景，明晰老年社团、老年协会在离退休工作中的职能价值，从思想凝聚、服务保障、价值赋能三个维度，系统探析两类老年组织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能够强化离退休群体思想共识、精准匹配多元助老需求、盘活银发人力资源，为推动高校离退休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离退休工作；为老服务

一、引言

高校离退休人员属于高学识、高素养、高情怀的知识型老年群体，积淀了丰富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经验，对高校具备深厚情感。做好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是高校落实老龄工作要求、履行社会责任、构筑和谐校园的关键举措。当前老龄工作标准持续升级，高校离退休工作逐步向管理精细化、服务多元化、育人长效化方向转型。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具备自愿参与、自主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组织属性，高度契合离退休人员的社交诉求与精神需求。相较于高校行政化管理模式，两类老年组织具备亲和力强、灵活性高、群众基础扎实的优势，可有效弥补行政服务的短板。本文以老年社团、老年协会和离退休工作协同逻辑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二者运行机制，旨在优化高校离退休治理工作体系。

二、思想引领与凝聚共识：筑牢离退休工作的思想根基

思想建设是高校离退休工作的核心，离退休人员思想的稳定是高校校园和谐发展的大局。高校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以活动为载体，以情感为纽带，在加强离退休人员思想引领、凝聚群体共识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离退休工作筑牢思想根基。

（一）搭建理论学习平台，强化思想武装

高校离退休人员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较强的理解能力，关心国家政策、学校发展状况。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都很好地符合了老年人的这一特征，主动创建多元化的理论学习平台，将思想学习与社团活动有效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传统理论学习的枯燥性。以专题学习交流会、政策解读沙龙、红色主题研讨等形式，组织离退休人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龄工作相关政策，了解国际国内形势、高校建设与发展规划。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还能够依靠自身组织优势，成立以老干部、老专家为骨干的学习队伍，用以老带新的方式，推动理论学习在离退休群体中全覆盖，引导离退休人员树立“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政治本色。自主参与式学习模式，比行政化的集中学习更具有吸引力，可以有效地提高理论学习的实效性，使离退休人员始终保持思想清醒、政治坚定，主动与国家的建设、学校的发展同频共振。

（二）开展主题文化活动，凝聚群体共识

文化活动是思想共识的载体，高校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依托校园文化，组织策划面向离退休人员的文化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增强群体凝聚力。按照重大节日、校庆（纪念）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红色研学等活动，使家国情怀、校园情感融入其中，回望育人的过程，体会发展的成就。在活动组织中，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充分尊重离退休人员主体地位，鼓励其自主策划、主动参与，使离退休人员在活动中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离退休人员通过互动交流，及时互通思想、交流感悟、凝聚共识，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认识。以文化活动为媒介的思想凝聚

方式，使离退休人员之间、离退休人员与学校之间距离拉近，为离退休工作顺利开展创造和谐的思想氛围。

（三）畅通思想沟通渠道，化解认知偏差

离退休阶段是人角色转换的关键时期，部分离退休人员可能会因为角色变化、社会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出现认知偏差或心理困惑。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属于离退休人员的“自治组织”，能够及时了解群体思想动态，搭建离退休人员与学校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社团、协会骨干以日常交流、谈心谈话的方式，主动听取离退休人员的意见，对群体中出现的模糊认识，及时进行引导。将离退休人员合理意见和建议整理汇总后，精准反馈给学校离退休工作部门，形成诉求表达、反馈处理、结果告知的闭环机制[1]。畅通的思想沟通渠道，既可以使得学校及时了解离退休人员的思想动态，准确开展思想引导工作，又可以使得离退休人员的诉求得到充分关注，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保证群体思想稳定。

三、精准服务与需求对接：完善离退休工作的服务体系

助老服务是高校离退休工作的重中之重，伴随着离退休人员年龄增大和需求提高，对服务的精准性以及多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身处离退休群体中，可以准确地掌握服务需求，利用个性化、细致的服务措施，弥补行政服务的不足，完善离退休工作服务体系。

（一）对接精神文化需求，丰富晚年生活

精神文化需求是高校离退休人员的重要需求之一，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比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更高，对于离退休人员来说，他们对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品质性的要求更为迫切。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按照离退休人员的兴趣爱好，成立书画、声乐、舞蹈、棋牌、太极等各类兴趣社团（协会），常态化开展活动。通过开设兴趣课程班、组织技能交流、举办作品展示等形式，为离退休人员搭建系统的兴趣培养平台，使离退休人员在参与兴趣活动中丰富精神世界、提高生活品质。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也积极整合学校的各种资源，与学校团委、学生会、艺术学院等合作，开展与老一代文化传承相关的活动。精准对接精神文化需求的服务模式，很好地填补了离退休人员的闲暇时间空白，有效缓解孤独感、空虚感，帮助离退休人员实现精神富足，营造高品质晚年精神生活。

（二）提供生活帮扶服务，解决实际难题

高校离退休人员中高龄、独居、失能等特殊群体生活诸多不便，对日常帮扶服务需求迫切。老年社团、老年协会利用“邻里互助”的优势，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对特殊群体开展精准生活帮扶服务。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组织身体健康、刚退休的人员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买菜、做饭、家务等志愿服务；对离退休人员普遍关心的医疗保健、养老政策等问题，邀请专业人员举办健康讲座、政策咨询等系列活动，帮助离退休人员掌握科学养生知识和相关政策流程[2]。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主动了解到离退休人员的突发困难后，及时向学校离退休工作部门报告，帮助解决问题，形成社团帮扶和学校支持的双重保障机制，真正解决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困难，提升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幸福感。

（三）适应信息化时代，跨越数字鸿沟

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线上服务已经成为高校离退休工作的重要载体，但是由于年龄、技术等原因，部分离退休人员存在数字鸿沟，不能享受数字化服务所带来的便利。高校老年社团和老年协会主动担负起数字化适应帮扶的责任，搭建银发数字课堂，组织社团内的技术骨干或者青年志愿者，为离退休人员开展智能手机使用、线上服务平台操作等专题培训。培训采取“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的方式，根据离退休人员的需求，重点讲解健康监测 App、线上挂号、养老金查询、校园信息获取等实用技能的运用方法。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保证离退休人员在使用数字化操作时，遇到困难能得到及时帮助。建立常态化答疑帮扶机制，及时解决老年群体数字化操作难题，助力其快速适配生活、跨越数字鸿沟，平等享受校园数字化服务资源。

（四）强化心理关怀服务，疏导负面情绪

离退休人员在角色转换、健康状况改变时，很容易出现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心理关怀属于精准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凭借其群体亲和力优势，建构心理关怀服务平台，给予离退休人员情感疏导、心理支持。由心理学背景老专家、资深老教师组成的心理关怀志愿队，进行谈心交流活动，主动关注离退休人员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负面情绪并疏导[3]。根据老年心理特点，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情绪管理沙龙等，帮助离退休人员掌握科学的心理调适方法。对空巢、失独等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的长期心理陪伴制度，利用定期走访、线上问候等方式，给予离退休人员情感慰藉。这样的心理关怀服务，很好地弥补了高校行政服务中的心理疏导不足，使离退休人员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筑牢身心健康防线。

四、价值转化与作用发挥：激活离退休工作的内生动力

高校离退休人员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管理经验、深厚的行业积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宝贵的“银发资源”。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是激活“银发资源”的重要平台，以搭建价值发挥载体的方式，促使离退

休人员将自身经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及高校建设发展作出贡献，也激活了离退休工作的内生动力。

（一）助力高校人才培养，传承育人精神

育人工作是高校的主要任务，离退休老教师、老专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当中，积累了大量的育人经验，有着深厚的育人情结。高校老年社团、老年协会依托老年科协、校关工委等平台，组织离退休人员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青年与老年共学课堂、名师讲堂等，让老教师向青年教师传授教学经验，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邀请老干部、老专家等“五老”到课堂上开展思政宣讲、专业启蒙、职业生涯指导等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明确发展方向。可以让离退休人员担任大学生社团指导老师、社会实践导师等，运用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高校的育人精神、学术传统。还可以发挥关工委特邀党建组织员的作用，协助二级党组织做好青年师生党员的培养教育发展工作，做好传帮带。这种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模式，既利用起离退休人员的育人优势，又完善了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使“银发资源”和育人工作有机结合。

（二）参与高校建设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离退休人员对高校的发展历程、办学特色、优势等有深刻认识，是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智囊力量。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主动对接并为老年社团、老年协会搭建离退休人员参与校园建设的平台，组织离退休人员开展高校发展专题调研活动，引导离退休人员围绕学科建设、校园管理、后勤服务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通过召开座谈会、提交调研报告、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将离退休人员的智慧建议，准确传递给学校决策部门，为学校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4]。高校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邀请并组织离退休人员参加校园环境整治、校风学风监督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建设和谐校园。参与式服务模式，使离退休人员体会到自身价值与学校发展息息相关，增强离退休人员参与校园建设的积极性，为高校离退休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服务社会公益事业，彰显责任担当

离退休人员不但是高校发展的参与者，更是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者。老年社团、老年协会积极调动离退休人员的专业优势，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将“银发力量”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比如，利用离退休人员专业特长，组建“五老”科普宣讲团、法律援助队、文化服务组等志愿队伍，深入社区、乡村、中小学开展科普宣传、法律援助、“银龄”计划支教等工作，提高居民的知识水平，为公众提供法律帮助，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在重大灾害、重要公益项目中，组织离退休人员捐款捐物、参加志愿服务等，体现高校离退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公益服务活动，既可以拓宽离退休人员价值发挥的渠道，又可以提高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使离退休工作打破校园边界，达成校园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有机衔接。

（四）传承校园文化基因，厚植校园底蕴

高校的离退休人员是校园文化的见证者、创造者和传承者，具有高校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底蕴，老年社团、老年协会以校园文化传承为己任，创建文化传承平台，促使高校精神文化的延续与发展。组织校园记忆主题分享会、校史故事征集、老照片展览等系列活动，让离退休人员讲述校园发展历程中的奋斗故事、育人故事，鲜活还原高校的发展脉络；依托书画、诗词、戏曲、合唱等特色社团，创作包含校园元素的文化作品，举办校园文化专场展演，将高校精神内涵融入艺术表达中；邀请离退休人员做校园文化讲解员，为青年师生讲述校史沿革、办学传统，引导青年师生继承高校优良学风和育人精神 [5]。以社团为载体的校园文化传承模式，既发挥出离退休人员人生阅历、文化积淀的作用，又丰富了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为高校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五、结语

高校离退休工作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主体协同发力，老年社团、老年协会作为离退休群体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自治组织，在思想引领、服务保障、价值赋能层面构建起行政服务互补、群众自治联动的支撑体系。从老龄治理宏观视角来看，两类老年组织的规范化发展，既优化了高校离退休管理模式，也为老年自治组织参与公共养老服务提供实践参考。贴合知识型老年群体特征的自治运行模式，精准匹配多元化养老需求，让离退休人员享受有温度、有品质、有价值的晚年生活，持续释放银发力量，为高校建设、社会发展培育优质人才筑牢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文珠 . 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工作促进基层党建全面发展 [J]. 冶金企业文化 ,2025(06):26-27.

[2] 范进科 . 新时代高校离退休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 [J]. 办公室业务 ,2025(20):151-153.

[3] 吴朋 .“五社联动”共建老年友好型社区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4(30):33-34.

[4] 闫薇 . 让基层老年协会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3(32):1.

[5] 陆莉君 . 社区老年学习社团发展的支持策略研究 [J].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6,10(01):52-55.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服务中心副教授）

政策工具视角下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雷宇晨子　李建娜

摘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是保障儿童权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国家战略。本文以政策工具理论为框架，对2020—2025年陕西省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系统编码政策工具类型、政府层级结构、发文主体及目标领域。研究发现：（1）政策工具结构失衡，环境型工具占主导，供给型与需求型工具明显不足；（2）纵向传导不畅，国家级政策数量较多，省、市、县三级政策衔接不完整；（3）目标领域偏向，社会保障与权利保障类政策占比较高，环境建设类政策比例偏低；（4）政策组合偏重宏观引领，缺乏落地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反馈机制。为此，本文建议扩充供给型工具、完善需求型工具、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体系。

关键词：政策工具；儿童友好城市；政策文本分析；陕西省

一、引言

儿童友好城市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6年发起的重要倡议，旨在通过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这一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各地配套政策逐步从框架性引领向细化落实转变。

陕西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于2022年颁布《陕西省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并以西安为主阵地推进建设。西安、汉中分别于2023年、2025年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标志着陕西省相关建设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目前针对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文本的系统性量化研究较为缺乏，已有研究多停留于政策梳理或案例描述层面，鲜有学者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政策文本进行结构化编码分析。

政策工具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1-3]，其中Rothwell等提出的“供给—需求—环境”三维框架因兼顾政策手段的系统性与操作性，在国内公共政策量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已在产业政策[4]、公共服务[5]、人工智能[6]等多个领域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方法论基础。

鉴于此，本文以2020—2025年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相关政策文本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在上述三维政策工具框架下对政策工具类型、政府层级、发文主体和政策领域进行系统量化编码，以期为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的优化提供循证依据。

二、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一）“供给—需求—环境”三维框架

本文采用Rothwell等提出的“供给—需求—环境”三维政策工具框架，对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进行分类编码。三种工具类型的内涵如下：

供给型政策工具（G型）是政府通过直接投入资源、提供基础设施、配置专业人才等方式，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底层支撑的政策手段。需求型政策工具（X型）是通过构建标准规范、推行试点示范、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和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手段。环境型政策工具（H型）是通过制定法规规划、组织领导体制、宣传指导等方式，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营造系统性制度环境的政策手段。

（二）政策目标领域维度

借鉴国家《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关于“五个友好”的政策框架，将政策目标领域划分为五个维度：社会政策友好（A）、公共服务友好（B）、权利保障友好（C）、成长空间友好（D）和发展环境友好（E）。两维度交叉分析可进一步揭示不同政策目标领域的工具选择偏好。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通过访问国务院妇儿工委官网、国家发展改革委、陕西省政府及省发展改革委、各市级政府等官方网站，收集2020—2025年涉及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文本。文件纳入标准为：（1）题目或正文中明确包含“儿童友好”“儿童发展”“学前”“托育”“儿童保护”等关键词；（2）政策目标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密切相关；（3）由具有行政效力的机关或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最终共纳入政策文本30份，其中国家级、省级、市级政策各10份。

（二）编码方案

本研究以政策条款为分析单元，即将每份政策文本中独立表达一项具体政策措施的完整段落或条款作为编码单位，参照已有研究并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7]，构建政策工具编码框架（见表1）。编码工作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Cohen Kappa系数为0.86，达到较高一致性水平后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确保编码信效度。最终共编码政策条款547条，其中供给型工具条款178条（32.6%），需求型工具条款138条（25.3%），环境型工具条款231条（42.1%）。

表1　政策工具编码框架

工具大类	子类代码	子类名称
供给型工具（G型）	G1	资金投入
	G2	人才培养
	G3	设施建设
	G4	信息服务
	G5	技术支持
需求型工具（X型）	X1	购买服务
	X2	标准规范
	X3	试点示范
	X4	目标管理
	X5	监督评估
环境型工具（H型）	H1	政策法规
	H2	规划纲要
	H3	策略部署
	H4	宣传指导
	H5	组织领导

四、政策文本量化结果分析

（一）政策工具类型结构分析

编码结果表明，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政策工具在环境型上占优，在供给型上处于中间水平，在需求型上较弱（见图1）。

环境型工具条款共有231条，位居三种类型工具条款首位。其中，策略部署（H3）类条款占比最高，占所有条款的18.7%；其次是规划纲要（H2）类、组织领导（H5）类。这说明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指方向、搭框架，政策体系比较健全。

供给型工具条款共有178条，处于中间水平。其中，以设施建设（G3）、资金投入（G1）等类工具为主要方式，表明近年来政府重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财力的支持。但是信息服务（G4）、技术支持（G5）等类工具却较少被采用，说明政府在大数据应用、循证决策等领域新的供给方式开发还有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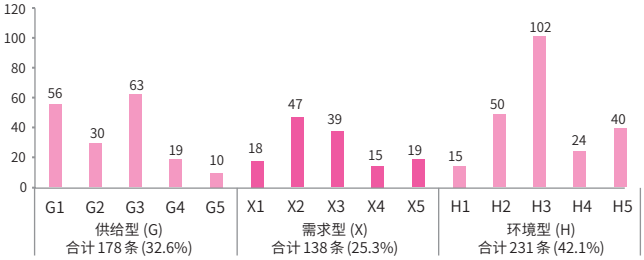


图1 政策工具类型分布统计图

需求型工具条款最少，只有138条。其中，标准规范（X2）、试点示范（X3）等类工具应用较多，而购买服务（X1）、监督评估（X5）等类工具采用较少，说明政府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以及评价体系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政策层级结构分析

从政府层级分布情况来看，国家级政策条款220条，占比40.2%；省级196条，占比35.8%；市级131条，占比24.0%，总体呈现上密下疏的倒三角结构。国家层面上的纲领性和导向性政策较多，但是省级层面的执行类政策以及市级、县级的操作性政策较少。

从工具类型与层级的交叉分析来看，国家级政策中环境型工具比例最高（48.6%），省级政策中环境型工具比例下降至40.8%，市级政策中供给型工具（38.2%）超越环境型工具（34.4%），成为最主要的政策手段。这一层级差异表明，政策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过程中，工具类型逐步由框架性部署向资源配置和具体设施建设转变，但需求型工具在各层级均处于弱势地位，说明社会参与和评估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各级政府中均较为欠缺。

（三）政策目标领域分布分析

从政策目标领域来看，社会政策友好（A）类和公共服务友好（B）类政策条款比例最高，分别占全部条款的28.9%（158条）和27.3%（149条）；其次是权利保障友好（C）、成长空间友好（D）和发展环境友好（E）类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19.6%（107条）、13.7%（75条）和10.5%（58条）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中提出的空间适儿化改造、公共场所增设儿童设施等要求与成长空间友好（D）方面相契合，

但是陕西省对此方面的规定较少，且缺乏具体量化的指标及执行标准。发展环境友好（E）方面的相关政策规定最少，儿童参与机制、家庭支持政策以及无障碍友好环境等方面的规定较为不足。

（四）政策工具时序演变特征

从时间维度看，2020—2025 年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发展可分为框架构建、体系形成和落实深化三个阶段。其中 2021 年是关键年份，国家层面《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后，省级及市级纷纷响应出台相关政策文件。2022—2023 年是政策体系形成阶段，主要是标准规范（X2）、规划纲要（H2）类型的文件，如《陕西省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 年）》《西安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 年）》等一系列中长期规划发布，政策目标更为清晰。2024—2025 年是落实深化期，需求型工具（X 型）方面有所增加，社区建设指导意见、联席会议制度等具体措施出台，但总体上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五、政策工具体系优化建议

（一）扩充供给型工具，强化财政与技术双轮驱动

设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专项财政资金，在省级财政年度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儿童友好相关工作，加大对陕南、陕北等经济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解决公共服务短板问题。此外还要加强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监测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对儿童需求进行判断、对选址是否合适进行判断以及对政策措施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提高决策科学性。同时，注重儿童友好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依托省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开设儿童发展、儿童社会工作、儿童空间设计等相关培训项目，并通过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与经验交流，持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为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与智力保障。

（二）完善需求型工具，激活市场与社会多元力量

进一步发展政府购买服务工具，鼓励各地将普惠托育、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儿童友好活动策划等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引入专业社会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参与，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加快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入高校、智库和国际专业机构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评价，形成政策落实情况的定期评价机制，倒逼政策从文件层面向实践层面切实转化。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大试点示范的覆盖范围，遴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的社区、学校与公共空间开展先行先试，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与建设模式，形成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同时，积极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良好生态。

（三）优化环境型工具结构，推进法治化与考核一体化

适度增加法律手段的比例，在陕西推动出台有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把儿童优先的原则纳入陕西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中，在制度上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进行刚性约束。此外，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相关内容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此促进各地积极地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宣传引导工具的作用，依托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儿童优先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发改、教育、民政、住建等多部门的横向协作，形成统筹有力、运转高效的工作合力。

（四）补强政策目标领域短板，重视成长空间与参与机制建设

针对不同类型的儿童友好空间制定具体的标准、数量指标以及完成的时间节点，着力推动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儿童游乐设施适儿化改造以及学校附近的人行道安全问题整治工作。参考国际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模式，建立儿童参与机制，在地方层面建立儿童议事会、儿童友好政策、儿童影响评估等相关机制以解决发展环境友好类政策缺失的问题。此外，注重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家庭支持与社会环境建设，完善生育养育、家庭教育指导等配套支持政策，系统推进城市公共空间、交通出行与服务设施的无障碍适儿化建设，让儿童友好的发展环境覆盖城市生活的更多场景，切实增强儿童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六、结语

本文以政策工具理论为分析框架，对 2020—2025 年涉及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30 份政策文本进行了系统量化编码分析。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其一，政策工具结构存在环境型偏重、需求型偏弱的失衡问题，政策重宏观框架轻微观落实的特征明显；其二，国家级政策完备、省级传导有序，但市县级政策创新不足，政策穿透力有待增强；其三，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政策覆盖相对充分，但儿童成长空间建设和发展环境建设领域存在系统性政策短板；其四，政策工具的演变呈现从框架建构到体系填充的趋势，但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是政策实施的主要瓶颈。

参考文献

[1]Mcdonnell L M,Elmore R F.Getting the job done: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J].Edu-（下转 112 页）

从“我”到“我们”：文化团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机制研究

马　霞

摘要：在个体原子化与认同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团体何以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本文基于文化团体的实证分析，揭示其通过四位一体机制，推动个体从孤立的“我”融入集体的“我们”。其中，空间联结在开辟出基于文化认同的“第三空间”，孕育“我们”意识的胚芽；实践熔铸通过具身规训与符号情感凝聚，完成从个体到共同体的身份转化；记忆活化借助符号解码、仪式操演与叙事重构，编织成员共享的意义图谱；交流互鉴则在多元碰撞与文明对话中拓展“我们”的边界，增强文化自信。研究认为，文化团体将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集体体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文化团体；具身实践；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 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然而，现代化进程在带来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伴生着深刻的社会变迁挑战：个体原子化趋势消解着传统社会联结，工具理性膨胀挤压着价值理性的空间，信息碎片化冲击着连贯的历史认知，导致社会认同呈现分散化、浅表化甚至冲突化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各民族成员如何在公共生活领域重建超越个体疏离的深度精神联结？如何获得稳固的情感归属与共同的价值依归？这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回应这一命题，不能仅依赖宏大的国家叙事或单向的政策宣导，更需寻找植根于日常生活、能激发个体主动参与和情感共鸣的微观实践载体。本研究认为，文化团体正是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战略性载体。文化团体以共同的文化兴趣为纽带，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在持续的互动实践中，悄然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可亲可近的集体体验与情感认同。

（上接 111 页）

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87,9(02):133-152.

[2]Howlett M.Designing public policies:principles and instruments[M].3rd ed.London:Routledge,2023.

[3]Rothwell R,Zegveld W.An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policies[J].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1984,3(03-04):436-444.

[4] 袁野，马彦超，陶于祥，等.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分析——供给、需求、环境框架视角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02):109-121.

[5] 包米兰，李少惠.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的协同演进——对 2002—2024 年政策文本的考察 [J/OL]. 图书馆论坛，1-11[2026-03-24].https://link.cnki.net/urlid/44.1306.G2.20260224.1256.007.

[6] 段戴平，高思琦. 政策工具视角下国际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政策偏好研究 [J]. 复旦教育论坛，2025,23(06):14-22.

[7] 吴光芸，周芷馨. 城市增长工具联盟：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政策工具选择——基于我国 45 个试点城市的实证分析 [J]. 城市问题，2023(11):15-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陕西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2025HZ1404）。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学院低空管理与数字经济学院）

一、空间联结：孕育“我们”意识的沃土

现代社会的认同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共交往空间的萎缩与异化。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论断警示我们，家庭的情感狭隘性与市场、行政系统的功利逻辑侵蚀着公共交往[2]。在此背景下，文化团体在“家”与“单位”之间，开辟并守护着一种独特的“第三空间”——基于共同文化价值追求的情感性公共场域属性。正是在这个场域里，个体间基于文化认同的初步联结得以建立，“我们”意识的最初胚芽得以萌发。

（一）关系维度：重构包容性社会联结的熔炉

“第三空间”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强大的社会关系重构能力，即其打破了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纽带或纯粹利益交换的社会关系模式，构建了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石、更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新型交往场域。以甘肃“花儿朵朵”合唱团的排练厅为例：这个约 30 平方米的空间，其社会属性与社区活动中心或商业场所有着本质区别。社区活动中心往往是居民基于地缘关系的物理性聚合，活动零散随机，社会互动深度有限；商业场所则被清晰的利益逻辑支配，人际关系带有明显的工具性。而在合唱团排练厅内，来自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等不同民族的成员，以及教师、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因对音乐的热爱而汇聚。排练时，高山族的山歌调式、白族的悠扬旋律等不同民族文化形式在这里交融碰撞。指挥老师的观察一针见血：“在这里，民族标签、职业身份、年龄差异在音乐面前变得模糊，大家最在意的是声音是否和谐、气息是否同步。为了达到完美的和声效果，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倾听他人、调整自我、协同配合。这种在音乐实践中形成的协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再造，让每个参与者都找到了超越原有社会角色的新定位和归属感。”在这个空间中，共同的艺术追求暂时悬置了日常的社会差异，通过声音的协同这一具身化实践，不同背景的成员之间构建起基于审美共鸣与协作精神的新型社会联结，为更广泛的“我们”意识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二）价值维度：追求超功利文化价值的净土

文化团体“第三空间”的另一核心特征是其显著的非功利性，即它剥离了市场交换逻辑和行政效率压力，将成员的互动聚焦于中华美学精神、文化传承使命、共同体价值追求等核心文化价值内核。这种价值纯粹性重塑了成员的行为逻辑和互动模式，如书法社团的“雅集”活动，明确拒绝商业炒作，社团成员以“以书会友”“涵养心性”为宗旨。如非遗戏曲社的日常排练，动力源于对濒危声腔艺术的守护热忱。老艺人对“水磨腔”进行口传心授，年轻学员在“一唱三叹”的细腻体验中，体味传统美学的精微奥妙与文化命脉的厚重，自觉地将个人兴趣升华为文化传承者的使命感。这种超功利的环境，促使成员的行为动机从工具理性主导的“我能得到什么”转向价值理性主导的“我们共同追求什么”“这本身有何意义”。在纯粹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探索中，团体成员对共同体所珍视的和谐、协作、传承、审美、伦理等核心价值，自然而然地生发出珍视与认同，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空间社会学家爱德华·索亚强调“第三空间”是“生活世界”的活力场域，它孕育着抵抗系统殖民化、重建社会团结的潜力[3]。

二、实践熔铸：锻造“我”融入“我们”的转化器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深刻揭示：社会结构并非僵化存在，而是通过行动者的日常实践不断被再生产出来[4]。文化团体正是通过制度化、高频度、具身化的共同实践，将宏观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转化为成员可感知、可参与的集体情感、行为规范与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从独立的“我”到融入集体的“我们”这一关键转化。

（一）具身规训：内化共同体行为密码

文化实践往往内含着一套特定的、强调集体性的行为规则与价值规范。团体通过制度化、高强度的具身化训练，将这些规则规范刻入成员的身体记忆和行为本能，在此过程中深刻重塑其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如在合唱团中，“和声的和谐统一”是最高法则。这要求成员严格遵循音准、节奏、音量、情感的绝对统一，个体化的嗓音表达必须让位于整体效果。成员在日复一日的发声练习、分声部磨合、整体排练中，通过肌肉记忆的反复强化（如控制呼吸、调整发声位置、倾听他人声部）和接受指挥、同伴的即时反馈（如音准纠正、情感引导），逐步将“集体优先”“协作至上”“纪律性”的价值观身体化。其自我认知也逐渐从追求独特性的“个性嗓音拥有者”转变为注重整体和谐的“和声有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艺术或技艺形式，本质上就是一套“共同体行为密码”。

（二）符号构建与情感凝聚：强化集体身份与责任担当

“第三空间”不仅是实践场域，也是意义生产的空间。文化团体通过构建和运用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并创造共享的集体记忆与责任体验，进一步强化成员的集体身份认同和主体担当意识。第一，团体往往创造或采用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视觉与精神标识，如专属团徽（融合多民族元素的设计）、特制宣纸（印有团体名称或格言）、统一的传统服饰（如合唱团的演出服、书法社的汉服元素）、特定的仪式器物（如龙舟的龙头龙尾、非遗团体的祖师牌位）。这些符号成为“中国人”“书社成员”“龙的传人”“文化守护者”等超越个体社会角色的集体身份的具象化载体。佩戴、

使用、凝视这些符号的过程，就是不断确认和强化“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过程。第二，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成员们共同经历、创造并传承着属于团体的“小历史”和情感故事，比如一起克服困难完成一次重要演出或比赛的经历；共同筹备一次社区公益活动的过程；师徒间技艺传承的感人瞬间；成员间因艺术、技艺切磋而产生的深厚友谊。这些“记忆共建”的过程，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团体发展的“集体叙事”之中，形成深厚的情感联结与文化归属感。第三，参与具有公共性和传承性的实践活动，能有效激发成员内心的责任意识，如代表团体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赛事，参与“文化进社区”“春联义写”“非遗进校园”等公益活动，这些活动具有明确的“对外代表”和“文化传播”属性。参与其中，成员会强烈感受到自己不仅是兴趣爱好者，更是肩负使命的“文化使者”“为民书写的践行者”“续写文化血脉的责任人”。

三、记忆活化：编织“我们”共享的意义图谱

依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记忆并非个体对过去的简单存储，而是依赖特定的社会框架才能被唤起、重构和赋予意义[5]。文化团体通过符号解码、仪式操演、叙事重构三位一体的方式，将静态的中华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意义世界”，使成员在共享的文化图谱中完成精神的皈依，践行“激活记忆基因，增强文化凝聚力”的时代使命。

（一）符号解码

文化符号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但其蕴含的精神密码并非自动显现，而是在鲜活的团体集体实践中被激活、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抽象的符号在共同行动中被“唤醒”，转化为承载深厚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具象媒介。当合唱团成员齐声唱响《黄河大合唱》或《我的祖国》，激昂的旋律与磅礴的歌词（如“风在吼，马在叫”“一条大河波浪宽”）便超越了音符本身。“黄河”“长江”等山河符号被集体解码，其蕴含的民族抗争史诗、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对故土的深沉眷恋等情感与意义在歌声的共鸣中喷薄而出，爱国精神与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被深刻内化。每一次排练和演出，都是一次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温习和情感能量的集体释放。

（二）仪式实践

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强调，仪式通过操演性和体化实践将记忆刻写进身体[6]。文化团体正是以身体为媒介、以动作为语言，构建了一条记忆活化的独特路径。比如，端午龙舟竞渡中，队员们合着鼓点整齐划一地奋力划桨，肩臂肌肉的协同发力、身体重心的同步移动、对节奏的精准把握，这一系列身体动作高度复现并强化了族群协作求存的古老集体肌肉记忆；传统戏曲表演中，程式化的动作（如“起霸”“走边”）、特定的发声方法（如“脑后摘筋”），本身就是历代艺人身体经验的结晶。学徒通过模仿师傅的“身上玩意儿”和“嘴里玩意儿”，将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审美的身体技艺内化为自己的“一体化知识”。

（三）叙事重构

集体记忆的本质绝非对过去的静态复刻，而是立足当下需求和共同体愿景进行的动态的文化意义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团体扮演着积极的叙事者角色，通过持续的互动，将碎片化的历史认知、个体经验与时代关切，共同编织为凝聚共同体认同的、不断更新的共享意义图谱。这一图谱定义了“我们共同珍视什么、铭记什么、追求什么”，成为支撑精神共同体的深层架构。比如在黔东南某银饰合作社的实践中，匠人们讲述技艺历史时，既会追溯苗族先祖蚩尤的传说和迁徙历史赋予银饰的文化象征意义（如驱邪祈福、身份标识），也会主动融入侗族、汉族等其他民族在技艺发展中的贡献。68 岁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通富在访谈中反复强调：“老一辈师傅总讲，没有侗族兄弟传过来的精细錾刻技巧，我们的银凤冠不会有这么生动的羽毛；没有早年走村串寨的汉族工匠带来的新式工具和錾子，我们打制复杂花纹的效率也提不上去。这门手艺啊，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兄弟姊妹你添一勺、我加一瓢，共同‘闯’出来、‘养’大的。”该团体每年举办的“匠心交融”跨民族技艺交流会，专门设置“记忆长河”分享环节，邀请苗族、侗族、汉族、水族等不同民族的匠人，讲述与银饰相关的本民族历史故事、生活习俗、图腾信仰，如侗族的“萨”文化、水族的“卯”文化都是如何影响纹样设计的。近五年已收集整理各类记忆故事 120 余个，这些故事被精心汇编成图文并茂的《银饰里的民族情》手册，成为技艺传承与对外展示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读本。

四、交流互鉴：拓展“我们”的边界与增强自信

文化团体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与互动性。要真正实现其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使命，必须超越内部循环，通过积极的对内交流与对外展演，在动态的“互为他者”与“文明对话”中，不断拓展着“我们”的认知边界，增强更深沉的文化自信，最终将基于共同兴趣的“小团体认同”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定归属与自豪感。这种交流互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成熟、开放与坚定的必经之路。

（一）对内：在“多元”碰撞中体认“一体”根基

文化团体组织的跨地域、跨民族交流活动，是“多元一体”格局最生动、最直接的实践课堂。这种交流超越了简单的“展示—观看”模式，强调深度互动、相互学习与情感共鸣。当一支来自苏州的评弹社团受邀深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进行交流演出，为当地

各族群众演绎《珍珠塔》或《玉蜻蜓》中的才子佳人故事时，初始的语言隔阂（吴侬软语）与艺术形式差异（坐唱、三弦琵琶 vs 山野对唱、高亢嘹亮）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差异恰恰成为激发好奇心与相互理解的催化剂。西北观众在努力捕捉唱词的同时，被评弹细腻婉转的唱腔、生动的人物刻画所吸引，更在故事中辨识出共通的忠孝节义、爱情伦理等主题内核。而江南演员在欣赏当地各族群众演唱的“花儿”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从那高亢激越、直抒胸臆的歌声中，感受到同样炽热的生活情感、对爱情的向往、对自然的赞颂。交流中，双方甚至会尝试简单的“跨界”合作，如评弹演员学唱几句“花儿”的衬词，当地歌手尝试模仿评弹的韵味。这种基于艺术形式的“互鉴”，促使双方在差异的镜鉴中，更清晰地辨识出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又在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深处，触摸到那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共同文化基因——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对生活的热爱。一次看似普通的民间艺术交流，成为一次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之美”和“深层精神相通性”的集体体验。

（二）对外：在文明对话中树立“我们”的自信

当文化团体走出国门，站上世界舞台，其角色便从内部的交流者转变为中华文明的使者，其展演行为成为一种主动的文化表达与价值传递。书法家在国际艺术展上现场挥毫，展现汉字线条的哲学意蕴与诗文内容的博大精深；京剧团、皮影戏班、古琴演奏家在海外剧场亮相，展示中国戏曲的程式之美、皮影的光影魔术、古琴的天籁——这些都不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中华文化独特审美价值、和谐、中庸、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坚韧、包容、守正创新精神气象的生动言说。演出后，异域观众惊羡的目光、经久不息的掌声、媒体专业而的报道，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正向反馈。这种来自“他者”的认可、欣赏甚至敬佩，对于身处异文化语境中的团体成员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心理强化作用。它让成员们跳出熟悉的国内语境，在更广阔的文明参照系中，重新“发现”和“确认”自身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兰州一合唱团从巴黎演出回来后，团员们一致认为，他们亲身体验到自己所传承、所热爱的文化，不仅属于家乡的小团体，更属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深厚底蕴和世界影响力的伟大文明——“中华文化”。

总之，文化团体的交流互鉴活动，其终极意义在于实现了共同体认同的层级跃升与边界拓展，形成一种同心圆式的认同扩展模式：团体内部的日常实践（排练、雅集、传习）培育了最基础的认同，成员共享着特定的技艺、目标、情感纽带与团体文化；对内跨地域、跨民族、跨艺术门类的交流，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边界；对外的国际展演与文明对话，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置于全球文明的宏大图景中进行定位和观照，并赋予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和自信心。

五、结论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与个体化趋势加剧的当代社会，文化团体绝非简单的兴趣集合或娱乐消遣，而是抵御社会原子化、重建深度社会联结、培育深层文化认同的高效凝聚机制与文化实践载体。深刻认识并善用文化团体这一微观实践力量，对于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呵护并激发文化团体这一源自民间、充满活力的凝聚力量，便是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深植认同之根、铸牢精神之魂，让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在亿万个体真实而温暖的共同实践中愈发深厚稳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02).

[2]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 [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345-400.

[3]Soja E W.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陆扬，刘佳林，朱志荣，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4]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 [M]. 李康，李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5-77.

[5]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38-92.

[6]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70-10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2024 年科研创新工程支撑项目“甘肃民族地区推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创新实践研究”（GSSYYB202404）；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2026 年科研创新工程支撑项目“城乡转型地带民族互嵌社区的‘半融合’状态及其治理逻辑研究”（GSSYYB202615）。

（作者系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红色文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程雅淇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国家建设、改革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淀形成的先进文化形态与珍贵精神财富，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文化载体与重要精神依托。依托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既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必然要求，也是凝聚民族共识、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从理论逻辑来看，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高度的主体契合、内涵契合与目标契合，能够有效强化各民族身份认同、凝聚团结奋斗共识、涵养时代责任担当。从实践逻辑来看，需立足资源根基、传播路径、治理落地三个维度，通过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与教育路径、构建红色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推动红色育人价值落地生根，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强劲精神动能。

关键词：红色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文化育人；时代赋能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锚定发展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党的治国理政重要内容，2024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进一步明确其核心主线地位，提出以该主线统领全局，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部署 [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目标，明确部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点任务。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深刻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势，顺应各族人民同心筑梦的共同期盼，为新征程抓实民族工作、深化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明晰了实践路径 [2]。

一、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探析

（一）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与发展演进脉络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进程中，积淀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彰显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形态，其核心内涵集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朽的革命精神、纯粹的集体主义价值追求与深厚的为民情怀。回溯百年发展脉络，红色文化的思想火种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悄然萌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阔实践中逐步成型，到了延安时期完成系统化的发展与凝练，而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并持续丰富与发展。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相继形成，共同构筑起红色文化的精神谱系，而这些珍贵的精神内核，也依托革命旧址遗迹、历史文献档案、红色文艺作品等各类物质载体，被一代代传承至今。1978 年以后，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红色文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环境，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像红色旅游、数字线上展馆等新型传播载体的出现，也让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变得更加多元。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也呈现出阐释视角的转变，从最初单一的政治叙事，逐渐走向多维度的价值解读，但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创新、阐释视角如何拓展，其核心始终扎根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始终坚守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被深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全过程，依旧在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过程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2021 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3] 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一脉相承延续了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体系，更充分彰显出我们党应对新时代民族工作各类新问题、新挑战的战略定力与坚定立场。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节奏持续加快，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愈发凸显，甚至还有别有用心的势力妄图借民族相关议题干扰我国发展大局。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主线，已然成为守护国家领土统一、维系各民族和睦团结的重要支撑。"五个认同"的明确提出，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不同层面，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起统一的价值遵循。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能让各族儿女始终坚守国土完整、不容分割的根本底线；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能让各族儿女凝聚起民族团结、绝不割裂的集体共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能让各族儿女守护好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薪火相传的精神根脉；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能让各族儿女坚定跟党走、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能让各族儿女汇聚起同心同德、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行的奋进力量。这五个层面的认同相互依托、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也为新时代做好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清晰的理论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遵循。

2024 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厘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历史必然逻辑与现实存在价值。当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要以理论武装凝聚共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让"五个认同"深入人心；更要以实践行动夯实根基，通过完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等举措，让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将"人心所向"转化为"行动自觉"。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认知与行动准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筑牢坚实的民族团结根基。

（三）红色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契合点

红色文化与共同体意识具有价值契合性。一是文化主体高度一致。二者均以"中华民族"为核心承载主体，始终围绕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与集体力量展开。红色文化诞生于党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无论是长征路上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援，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并肩御侮的壮举，抑或建设时期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工业化的实践，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始终是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其历史记忆与精神传承属于全体中华儿女。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以各族人民为实践主体，强调"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通过凝聚不同民族的个体力量形成集体认同，这与红色文化"全民共创、全民共享"的主体属性高度统一——二者均打破了地域、民族的狭隘界限，将"个体"融入"整体"，让各族人民在共同参与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二是精神内涵高度同质。二者在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上呈现出高度重合的特质。红色文化蕴含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核心要义，从井冈山精神中"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意志，到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团结互助"的品格，再到抗疫精神中"生命至上、举国同心"的担当，红色文化始终将"团结""统一""共同奋斗"作为精神底色，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倡导的"五个认同"深度契合。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应红色文化中"为国牺牲、为国奉献"的爱国情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呼应红色文化中"各族人民一家亲"的团结理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契合红色文化中"党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共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衔接红色文化中"追求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可以说，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具象化，而共同体意识则是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理论升华，二者共同构筑起"团结统一、爱国奉献"的价值体系。

三是目标指向高度统一。二者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增进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实践导向。红色文化从诞生之初便承载着"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激励各族人民推翻压迫、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引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奠定国家发展基础；新时代，红色文化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其目标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也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核心追求，注重以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铸牢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发展的过程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携手迈向共同富裕。无论是

红色文化所推动的“共同奋斗”，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追求的“共同发展”，最终都指向“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共同愿景——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支撑与行动指引，让各族人民在目标一致的实践中深化认同、凝聚合力。

这种价值契合性决定了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相互孤立地存在，而是能够形成“以红色文化滋养共同体意识，以共同体意识激活红色文化”的良性互动。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只有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资源，将红色故事、红色精神融入国民教育与社会传播，才能让各族人民在回望历史中深化对共同体的认知；同时，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才能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连接不同民族、凝聚共同意志的精神纽带，最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与文化根基。

二、红色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涵

（一）历史传承价值：筑牢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根基

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集体记忆，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从红军长征途经民族地区时与各族群众结下的鱼水深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族官兵共同屯垦戍边、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再到西藏民主改革中各民族携手推翻封建农奴制的历史壮举，这些红色记忆打破了单一民族的历史叙事，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史”的集体认知。当各族群众通过红色纪念馆、红色文献、红色影视作品重温这些历史时，不仅能清晰地看到本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更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进而在追溯共同历史根脉中强化民族认同，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坚定文化自信，让“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认知扎根心底。

（二）精神引领价值：弘扬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团结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抗战时期，“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回民支队”马本斋等英雄模范，用行动诠释了各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集体主义精神；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场上，各族干部群众携手攻克贫困堡垒，塞罕坝林场三代人接力造林护林、建设绿色家园，这些红色精神的当代实践，不断强化“团结就是力量、奋斗成就梦想”的集体共识。红色文化通过具象化的英雄事迹、精神符号，将抽象的集体主义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学习的行动指南，引导各族群众跳出“小我”视野，主动将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大局，在面对风险挑战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集体力量抵御分裂势力、克服发展难题，让团结奋斗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三）现实教育价值：培育新时代公民的责任担当

红色文化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鲜活教材，其蕴含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能够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4]。近年来，多地中小学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走进革命老区，聆听老党员讲述战斗故事；高校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通过“红色剧本杀”“红色主题辩论赛”等创新形式，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这些贴合实践的教育活动，不只是让青年学生读懂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奋斗过往，更让他们真切体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各民族同心协力”的时代使命。当青年一代在红色文化的浸润中，主动投身民族团结宣讲、扎根基层建设一线、助力边疆发展实践时，便会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内心的认知认同，实实在在转化为脚下的行动自觉，成为接续传承红色血脉、守护民族团结的新生力量。这种责任担当的培育养成，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动能，也为民族复兴大业筑牢了坚实的人才根基，让红色文化在代代相传中，持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增添助力。

往更深层次剖析就会发现，这三大价值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交织成“历史传承—精神引领—现实实践”的有机整体。其中，历史传承的价值为精神引领筑牢了事实根基，精神引领的价值又为现实教育提供了核心思想支撑，而现实教育的价值，则让历史传承与精神引领真正在新时代找到落点、扎根生长。这三者相互呼应、协同发力，让红色文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既贯通了过去与当下的历史脉络，也凝聚着各民族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远发展，筑牢了深厚且坚实的价值根基。

三、红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一）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

立足“全域性”与“差异性”双重维度，既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红色资源普查，建立涵盖革命遗址、文献档案、口述史料的数据库，运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绘制“红色文化地图”，清晰标注各民族共同参与革命建设的历史轨迹；也要注重挖掘地域特色资源，比如在内蒙古地区重点整理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体现民族团结的红色故事，在西南边疆挖掘各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的珍贵史料，让红色资源成为展现“中华民族

共同体历史”的鲜活载体。同时，保护工作需兼顾“物理存续”与“活态传承”，对国家级革命文物实施专项修缮工程，采用三维扫描、纳米修复等技术留存文物细节；针对非物质红色资源，如革命歌谣、英雄事迹传说，通过录制口述史、编排舞台剧等方式活化传承，避免红色记忆因时间流逝而淡化。

（二）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与教育路径

在传播层面，要突破传统单向输出模式，借助新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传播场景——制作多民族语言版本的红色文化短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红色记忆·民族同心”话题，邀请各民族博主分享家乡红色故事；开发红色文化 VR 体验项目，让用户“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延安窑洞等场景，直观感受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在教育层面，需构建“分层分类”的教育体系：中小学将红色文化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程，通过“红色故事会”“民族英雄角色扮演”等活动，培养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依托思政课主渠道，开设“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选修课，组织学生开展跨民族红色研学，如重走长征路时调研沿线民族地区发展变迁；针对基层干部群众，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红色宣讲进乡村”“民族团结红色课堂”等活动，用通俗语言解读红色文化中的共同体理念，让教育覆盖不同群体[5]。

（三）构建红色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

将红色文化与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创建深度结合，把“团结奋斗”的红色精神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社区治理中，设立“红色议事厅”，邀请老党员、民族代表以红色故事为切入点，调解邻里矛盾、商议社区事务，增强各族居民的归属感；在乡村振兴中，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 + 文旅”产业，如陕北地区打造“红军长征·陕北民俗”旅游线路，带动周边多民族村落共同增收，让各族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深化共同体认同。同时，需建立制度保障机制：将红色文化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考核指标，推动地方政府制定《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设立跨部门协作的红色文化治理专班，统筹宣传、教育、文旅等部门资源，避免各自为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如引导企业、公益组织资助红色文化项目，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长效格局，让红色文化持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

这三条实践进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资源挖掘保护是基础，为传播教育与社会治理提供素材；传播教育创新是桥梁，让红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治理融入是落脚点，将意识层面的认同转化为实践层面的行动。这三者唯有协同发力，才能让红色文化切实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助推团结统一的关键力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提供坚实的实践依托。

四、结语

红色文化作为百年党史与民族奋斗史凝练的精神瑰宝，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核心文化资源，串联各民族历史记忆、凝聚民族情感、汇聚复兴力量。红色文化从历史维度厚植民族认同、从精神维度凝聚团结合力、从实践维度培育时代担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动能。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优势，通过资源保护、传播创新、治理赋能多维发力，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赓续传承、团结精神生生不息，引导各族人民始终同心同德、携手奋进，持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大好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民族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09-27(01).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5-10-29(01).

[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1-08-29(01).

[4] 李明，曹悦 .“三全育人”视域下以红色文化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鄂州大学学报 ,2025,32(04):73-75,106.

[5] 白雪，梁秋栢，王毅 . 红色资源铸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研究——以抗美援朝红色档案资源为例 [J]. 保山学院学报 ,2025,44(06):23-30.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购买服务创新管理的路径选择

焦亚转　王　萍

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新时代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也是重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提升民生服务品质、优化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支点，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梳理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现状，分析其在采购项目结构、服务范畴、供给主体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紧扣制度重塑主线，结合体制机制优化目标，从监督评估、社会组织培育、资金配置与人才建设、治理架构完善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策略，在协同治理视角下，为城市购买公共服务采购走向标准化、城市治理迈向新范式提供理论样本与实践路线。

关键词：协同治理；政府购买服务；城市治理；创新管理；路径优化

一、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

城市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属于城市管理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1]。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核心目标：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主体履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当前，城市购买公共服务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一）采购项目构成呈现差异化分布特征

城市购买公共服务主要涵盖货物、工程、服务三大领域。依据财政部公布的相关数据，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颁布前，货物类项目占当年采购规模约 70%，工程类 20% 左右，服务类不足 10%，即货物与工程类采购占据主导地位，服务类采购份额占比偏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 2024 年全国城市管理者采购总额 3.37 万亿元，其中“服务类”成交 1.20 万亿元，占比 35.5%[2]。

（二）服务范畴不够精细化，区域布局呈现差异化

《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城市购买服务改革需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厘清政市边界、鼓励社会参与、兜牢民生底线、提升民众幸福感，核心是通过市场化方式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依据财政部 2025 年公布的 2024 年全国城市采购简要情况，民生“刚需”养老、托育、学前、普惠医疗、社工等板块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采购版图东部省市占全国过半份额，西部及县域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采购具备广阔的增长空间。

（三）服务供给主体较为单一

城市购买公共服务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的所有特征[3]。社会组织是协同城市治理过程中城市管理者购买公共服务的核心承接主体，企业作为重要补充力量，在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中发展潜力巨大。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增强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支持的通知》，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渠道，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完善。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城市购买主体数据分析，部分城市购买服务承接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民办非企业单位占比近六成，社会团体占比近四成，非公募基金会占比相对较小。

二、协力治理视域下城市购买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一）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以自主提供为主，社会化参与渠道有待拓展

依据财政部 2025 年发布的 2024 年全国城市采购简要情况，在公开招标过程中进入“公共服务”细分市场（养老、社工、心理援助等）的项目，根据服务特点灵活采用竞争性磋商或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保服务供给精准匹配实际需求。城市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监管者”与“激励者”的第三方角色，购买主体与承购主体之间以契约责任关系代替传统的行政权力关系[4]，依托固有优势，部分城市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特定领域承担生

产者角色，资源配置方式有待优化，公共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提升空间。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服务供给主体，与公共部门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模式有待进一步多元化，社会组织发展尚处于成长阶段，具备承接能力的主体正在培育发展中，市场参与主体有待进一步丰富，为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改进方向。

（二）政策资金配置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财政部公布的城市购买服务数据显示，2021—2022年，全国城市管理主体购买服务支出规模稳定在约5000亿元；2023年起，各城市财政压力骤增，一方面城市购买社会服务总额呈现下降趋势；另外城市针对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供给不足，2024年，多地部门预算将原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经费整体取消或大幅压减，部分城市购买公共服务主要向养老、救助等领域倾斜，未再单列“社会组织培育”增量资金。

（三）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持续优化，均等化进程有待稳步推进

根据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采购项目结构持续优化，资源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城区及不同群体间各具发展特色，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领域，采购资源在发达城市形成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具备广阔发展空间。

（四）评价与监督体系有待完善，服务质量管控机制有待优化

城市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采购主体结构相对集中，绩效评估与监督体系正在持续优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服务供给内容多聚焦于“数字政府运维、云计算资源管理”等信息化项目，其质量评估采用多元化指标体系，成本测算采用灵活定价机制；另一方面，各地已制定购买服务的评估准则与指标体系，城市间因地制宜建立评估标准，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和社会公众参与渠道正在培育发展，绩效评价与监管机制具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三、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购买服务创新管理的实践路径

面向协同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强筋壮骨”的新要求，紧扣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坐标，以制度重塑为切入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城市购买服务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全流程监管，完善监督评估体制机制

城市购买社会服务最核心的理论预设是“竞争出绩效”[5]。要把城市公共服务改革推向纵深、让质量真正跃升，必须把“盯得紧”和“评得准”这两根支柱立稳。为此，需要织一张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的监管网，形成闭环。

首先，用数字技术锻造“智慧监管脑”。借助数字技术搭建“智慧监管大脑”。基于政务云平台，把财政、民政、审计等部门的数据打通，建立一个实时在线的监测体系。从项目立项、资质审核、服务过程到资金去向，每个环节都能够留下数据痕迹，全程可查可追溯。系统能自动分析运行情况，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就及时推送优化建议，让监管工作更加精准、更有实效。

其次，建立分类量化评估标准。借助大数据技术，搭建一套灵活通用的质量评估体系，针对不同服务场景设置相应评价维度。将服务态度、资金使用效率、群众满意度、社会效益等指标量化处理，形成综合评估标准。同时引入专业机构、行业专家和受益群众共同参与评价，让评估结果既有数据支撑，也能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感受。

最后，推动政府治理角色转型。城市购买公共服务的主体脱下“球员”球衣，拿起“裁判”哨子，把具体服务交由达标的社会力量接力，站在中间位置，制定标准、协调资源、给予支持保障，以独立身份确保购买的过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以第三方立场守护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的公平。

（二）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赋能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

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外包的核心，城市购买服务可以将宁波海曙“从种子到森林”的全链条栽培作为样板，因地制宜打造“萌芽—蹲苗—助长—挂果”成长路径，让它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变得更专业、更合规、更出彩。

1. 构建“前期孵化 + 资源滴灌”双轮驱动机制

针对初创期与成长期社会组织，建立共享型基础设施包：提供模块化办公空间、一次性启动资金与政策合规辅导的集成服务；同时在优化市场准入方面，可以重点对办事流程做减法。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推行“一网通办 + 同步赋权”机制，打破过去部门间信息割裂的状态。具体来说，企业在完成法人登记备案的那个时间点，系统就自动同步赋予其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资格条件，这种即时赋权机制让所有市场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无论是刚成立的小微企业，还是有经验的社会组织，都能在同一时间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整个过程透明可视，企业随时能查到资格状态，提升参与的积极性。

2. 构建“公共服务资源交易所”

由城市公共部门建立社会组织资质白名单，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搭建线上撮合平台，将服务目录、历史绩效、信用等级等关键信息标准化上架，形成可检索、可比较、可竞价的电子目录；需求方（街道、社区、企业）通过平台发布采购意向，系统基于地理半径、价格弹性与质量权重进行智能撮合，实现供需秒级匹配。后续通过平台复制推广，建立“市—县—镇”三级服务节点，推动优质服务要素沿供应链下沉至末端网格，完成公共资源的最优配送。

3. 一手拿“温度计”一手拿“刻度尺”

城市购买公共服务按组织类型、成长阶段给予不同

的培训：新生的社会组织给予辅导课，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给予项目、人才猎头、品牌加持；同时用合规底线画好“安全栏”，让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优化资金配置与人才建设，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资金与人才是保障城市购买公共服务，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需通过优化资金配置、强化人才建设，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1. 精准配置财政资金，撬动城市社会资本参与

建立“民生紧迫度”评估机制，通过群众调研、需求征集、专家论证等方式，梳理形成覆盖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的“民生紧迫度”榜单，按民生需求优先级分配财政资金，确保财政“活水”精准流向最急需的公共服务领域；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县区设立“社会创新种子基金”，公共部门以“引导股”方式撬动企业捐赠、福彩公益金盈余、个人慈善捐赠等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公共部门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放大公益效应。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对社会组织引进的公共管理、社会工作、医疗卫生等专业人才，给予与企业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同等的户籍落户、子女教育、住房补贴等优惠政策；借鉴大学生“社工选培”模式，联合本地高校设立“公益管培生”计划，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方式，选拔优秀大学生进行系统培养，毕业后直接输送至龙头社会组织；打造“地方公益学堂”常态化培训平台，采用“城市公共部门买单、院校授课、机构实训”的三位一体培育模式，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从职场“小白”系统培育为具备专业素养的服务“专家”，持续优化城市管理创新过程中社会组织的人才结构。

（四）完善现代治理架构，构建“透明可信”的公益生态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推动城市管理过程中购买公共服务从“人情公益”向“制度公益”转型，拧紧公益“安全阀”，构建规范有序、透明可信的公益生态。

1. 健全城市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引导社会组织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理事会、监事会、执行层的职责边界，形成“理事会负责战略决策、监事会实时监督、执行层专业运营”的治理架构；建立会员大会一票否决制，对重大项目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等关键事项实行民主表决，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2. 引入外部监督机制，提升治理透明度

在社会组织治理中引入社会独立董事与公众观察员，吸纳行业专家、媒体代表、群众代表等参与组织决策与监督，将外部监督纳入组织治理程序，提升决策科学性与透明度；定期开展社会组织公信力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3. 建立信用约束长效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推动社会组织配套建立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与信用积分制度，明确信息披露的内容、频率与渠道，将服务质量、资金使用、合规运营等情况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将信用积分与政府采购准入、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直接挂钩，对信用良好的社会组织给予优先支持，对失信主体实行联合惩戒，以制度约束替代单纯的道德自律，构建“透明公益、可信公益、长效公益”的良性生态。

四、结论与展望

城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优化民生服务供给、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多元协同、合力赋能。当前我国城市购买公共服务整体呈现结构优化、主体多元、范畴拓宽的良好态势，但仍面临政社协同不足、资金人才保障薄弱、区域发展不均、监管评价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立足最新政府采购统计数据，从监管体系、主体培育、要素保障、治理架构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创新管理路径，为破解城市公共服务购买实践难题提供了实践方案。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务创新发展需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健全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完善监督评价机制，持续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标准化、精细化、均等化发展。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聚焦跨区域协同供给、柔性服务量化评估、数字赋能治理创新等重点领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 .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与边界分析 [J]. 财政研究 ,2014(03):2-11.

[2] 财政部国库司 .2024 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 [EB/OL].(2025-11-12)[2026-01-13].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511/t20251112_3976264.htm.

[3] 王浦劬 .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机理分析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04):78-89.

[4] 萨瓦斯 . 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M]. 周志忍 , 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7.

[5] 赵淑兰 .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 理论预设与实践检验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7(06):128-13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郑州市社科联项目“郑州市域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研究”（ZSLX20240740）。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甘肃省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研究

郭 婷 陈 尧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战略任务，也是各级各类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主线。甘肃省作为西北多民族聚居的关键区域，拥有多元民族文化富集、红色精神底蕴厚重、民族政策示范先行、职业教育平台完善的独特育人优势，为职业院校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良好基础。本文以甘肃省职业院校为研究对象，立足区域省情与职教育人特色，剖析职业院校开展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独特优势与现实必要性，探索构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构建跨文化交融环境、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优化综合评价体系、拓展服务性学习平台”五位一体的实践育人路径，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本研究旨在丰富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思政育人理论体系，为甘肃及全国同类院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培育新时代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实践参考与路径借鉴。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甘肃省；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实践路径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不仅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论断，更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行动指南[1]。青少年阶段是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对于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教育强国“六大特质”，将思政引领力置于首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进一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列为教育强国建设核心战略任务，充分凸显了共同体意识教育在新时代育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甘肃省作为西北重要门户和多民族聚居区域，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新时期更承担着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双重职责。在这一特殊省情背景下，甘肃省职业院校肩负着双重且紧密相连的时代使命：一方面，职业院校作为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主要场所[2]，需要为当地甚至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作为思想文化育人的重要平台，职业院校要深度融入并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多民族间的交流，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奠定稳固基石。这种人才培养与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双重使命，使甘肃省职业院校在践行国家战略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因此，深入探讨如何有效构建并实施甘肃省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甘肃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

（一）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富集

甘肃自古代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与融合之地，众多民族在此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汉族、回族、藏族、裕固族等民族在甘肃生息繁衍，其宗教信仰、服饰款式、节日庆典、口传文学等，均蕴含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为甘肃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丰富内涵。这些多元的民族文化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质，不仅凸显了甘肃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甘肃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构建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意识在甘肃的民族文化中得到了生动展现与传承，成为甘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源。

（二）红色基因凝聚精神认同

甘肃省蕴含着数量众多且极为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会宁红军长征会师旧址、腊子口战役遗址以及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不仅仅是过往历史真实且有力的见证者，更是我国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重要象征符号。它们以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了各个民族在革命时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协同抗争所形成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如同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且生动的素材，从而激励着各个民族的人民在新时代的浪潮下，持续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民族政策创新先行示范

甘肃独特的民族政策是其显著的优势之一。甘肃在遵循国家统一民族政策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政策。这些政策聚焦于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比如，推行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使各民族学生在学习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能够深入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同时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给予精准化支持，助力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在政策保障下，各民族紧密团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四）职业教育赋能融合实践

甘肃省境内职业院校分布广泛、层次多元、专业丰富，为来自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多民族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共同学习、掌握实用技能的平台。在学校，各民族青年学生共同生活，一起完成学习、实训任务，不仅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就业创业能力，更在共同追求职业理想的进程中，自然地增进了相互了解、尊重与认同。同时，依托“校地企”产教融合模式，将技能培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深度结合，把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成满足民族地区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三、甘肃省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

（一）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职业院校学生正处于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的关键阶段[3]。学校作为培育优秀学生的主阵地，不仅要致力于为学生构建专业的知识体系，更应强化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生的学习与校园生活，通过多种途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的言行和思想道德，助力学生塑造健全人格，有助于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同时，帮助学生树立家国情怀，使学生能够将民族的命运和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成长为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新时代大学生。

（二）深化民族交融团结

在甘肃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职业院校作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4]，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各族学生共同学习技能、共同参与校园生活，在密切的互动中加深了对彼此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理解与尊重，同时，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使“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职业院校学生作为未来各行业的中坚力量，其民族复兴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关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达成[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强化青年大学生的“五个认同”，推动大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觉。“五个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根基，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通过增强“五个认同”，即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制度认同和核心价值观认同，使学生明确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身力量[6]。

四、甘肃省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探究

（一）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牢牢掌握育人主导权

职业院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积极利用全媒体平台，弘扬主旋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传播正能量[7]。在日常教学及校园管理过程中，及时发现校园内外错误思潮，在关键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形成校内主流舆论强音。官方媒体、学生社团等不再被动应对，而是主动策划以“技能报国”“工匠精神中的民族团结”等为主题的正能量内容、短视频、榜样故事，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争夺话语权。定期开展网络素养教育，举办“热点事件辨析会”，由思政教师和优秀学生骨干带领，打造校园“信息防火墙”，教会学生如何理性分析、批判性地看待网络信息，提升媒介素养。

（二）构建跨文化交融环境，营造浸润式育人氛围

依托甘肃丰富的红色文化、敦煌文化等资源，组织多民族学生共同参与研学实践活动，在实地体验中共同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一体多元，进一步激发学生爱祖国、爱甘肃之情。推行“混合式”学习生活共同体，在宿舍分配、班级小组、技能竞赛团队、学生社团建设中，有意识地打破生源地界限，组建多民族混合团队，让合作成为常态。在尊重学生民族风俗习惯的前提下，鼓励不同民族的学生体验其他民族的特色风俗、相互学习传统工艺、结合自身民族特色共同进行表演，并共同探索将民族特色与现代设计、电子商务等专业结合，在共创中增进了解与认同。主动听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学校有归属感，激发学

生的集体感。

（三）深化“大思政课”改革，推动知识教育与价值引领融合

提升育人成效的关键在于打破壁垒，形成合力。职业院校可组织力量，深入挖掘本地蕴含团结奋斗精神的鲜活事迹，开发具有“甘肃特色”的思政教学案例库，为教学提供生动的地方性教材。深化课程思政，要求各专业教研室系统梳理并深度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工匠精神、职业道德、家国情怀、团结协作等思政元素，为每一门主干课程绘制清晰的“思政育人地图”，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精准融合。可为专业课教师提供培训，或者建立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联合教研机制，通过“结对子”的方法，定期开展集体备课与教学研讨，共同设计教学方案，让思政教育更贴近专业、更接地气，确保思政教育能有机融入专业技能培养的全过程。

（四）优化综合评价体系，激发学生内生成长动力

定期评选表彰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并通过报告会、宣传栏广泛宣传，发挥朋辈引领作用。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可以增设“民族团结与实践”模块，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情感、行为表现量化积分，参与相关活动、在团队中发挥融合作用等均可获得积分。将上述评价结果与评奖评优、入党入团、推荐实习就业等重要环节挂钩，让其“有用有效”，显著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同时，在平时课堂表现、期末考核等的评定中，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及文字素养差异，适当调整评价标准，避免因语言表达或文字书写能力的限制而影响对其真实学习成果的判断。通过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口头表达、小组合作、母语辅助作答等，给予少数民族学生更为公平的展示机会，真正体现教育评价中的包容性与公平性原则。除此之外，在学生会或其他学生组织中可以设立少数民族学生岗位，让少数民族学生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学校治理、发表言论，不仅增强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同时也能锻炼少数民族学生的能力，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

（五）拓展实践育人平台，推动认知认同向行为践行转化

坚持校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建设“校内实践育人基地”，除教学单位以外，职能部门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开展不同的活动，如图书馆可以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坊”，团委主导“民族团结主题游园会”，后勤部门支持“多民族美食文化节”等，将校园变为践行共同体意识的第一现场。同时，充分利用职业院校用技能服务地区、服务社会的特点，在专业技能实训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8]。开展各种社会实践，组建多民族师生技术服务队，赴民族地区开展电器维修、电商培训等公益服务，让学生在运用专业技能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体会个人价值与共同体发展的紧密联系。最后，强化实习期间的引导与管理，学校与合作企业共同设计实习任务，要求学生关注企业文化中的团队协作、社会责任等内容，并完成相关实践报告，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五、结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教育工作的核心主线，也是甘肃省职业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区域发展的核心使命。甘肃省凭借独特的多元民族文化、厚重的红色精神底蕴、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与成熟的职业教育平台，为职业院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育人优势。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既是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民族交融、维护区域稳定、助力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本文构建的“五位一体”实践育人路径，通过筑牢舆论阵地、营造交融环境、深化思政改革、优化评价机制、拓展实践平台，全方位打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育人链条，实现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实践赋能、制度保障的有机统一。未来，甘肃省职业院校需持续立足地域特色与职教优势，不断优化育人模式、完善育人体系、创新育人载体，持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培育一批兼具家国情怀、精湛技能、民族团结意识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凝聚民族复兴青春合力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与人才根基。

参考文献

[1]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EB/OL].(2025-06-18)[2026-05-10].https://zqb.cyol.com/pc/content/202506/18/content_412400.html.

[2] 陈吉民，刘春先.“双高计划”背景下贵州省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以贵州健康职业学院为例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24(11):93-95.

[3] 保钰.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江苏工院智能制造学院为例 [J]. 大学 ,2024(23):23-26.

[4] 祁光耀.民族地区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04):177-179.

[5] 张楠.高职院校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途径 [J]. 中国军转民 ,2025(12):168-170.

[6] 唐怀贵.高等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及优化路径 [J]. 中国军转民 ,2024(22):56-57.

[7] 于淑燕，包兵兵.全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J]. 职业教育 ,2025,24(13):62-65,80.

（下转 126 页）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实现与实践创新研究

程　芳

摘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持续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支撑模块，其育人地位愈发凸显。当前市场经济环境日趋复杂，高职学生面临激烈的岗位竞争与就业压力，极易滋生各类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专业技能习得与职业素养养成。本文聚焦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场景，系统探究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价值、实现路径与实践创新策略。研究表明，心理健康教育能有效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锤炼职业心理品质、提升岗位适配能力。通过重构立体化课程体系、革新数字化教学方法、构建多方师资协同育人机制，可实现心理育人与技能育人的深度融合。研究进一步从多元评价体系、协同育人团队建设等维度提出保障举措，旨在推动学生专业技能与心理素质双向协同提升，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输送德技并修、身心健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关键词：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心理健康教育；育人融合；实践创新

一、引言

职业技能教育立足就业导向，依托理论讲授、实操实训、岗位模拟等多元教学形式，帮助学生夯实专业基础、明晰职业标准、掌握行业态势、锚定职业发展目标，是培育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核心载体。当前，市场就业竞争日趋激烈，高职院校学生长期面临繁重的技能学习压力与不确定的职业发展焦虑，部分学生出现职业迷、学习倦怠、抗压薄弱、心态浮躁的心理问题，严重制约其职业技能学习成效与综合职业能力提升。在此基础上，高职院校在职业技能教学中注重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实际情况，模拟职场面试等场景，让学生感受到压力并学会应对的方法，为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教育环境。本文主要分析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职业技能教学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探索出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的实践策略，使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得以实现，培养出专业技能高、心理素质过硬的应用型人才，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的育人价值

（一）激活学生内生动力，破解技能学习倦怠

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通知》等政策的出台，高职院校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做好学生心理监测工作，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职业技能教学是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要面对较大的职业压力，学习比较复杂的职业技术，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的个体进行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引导学生如何管理情绪、如何缓解压力，培养学生成为健康、积极、乐观的人，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减轻学习压力，从而掌握职业技能。心理健康教育中，高职院校可以借助案例教学法、情境创设法、游戏教学法这些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

（上接 125 页）

[8] 贾玉刚，多布杰，朱红梅，等. 青海职业院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探究——基于“二个课堂”融合贯通分析 [J]. 社会与公益 ,2025(02):289-29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度校级职业教育教学建设项目“基于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路径的创新研究”（2025gsgykcsz-sx4）。

（作者系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讲师）

人生价值取向教育，大学生活情感矛盾教育，生命教育，学习困境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职业发展指导教育等，使学生亲身参与进来，获得学习体验，从而调动起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1]。

（二）锤炼职业心理品质，提升职场适配能力

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合于职业技能教学，能提升学生职场适应力，加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心理健康教育通过讲解情绪管理、压力管理、自尊心和自我认知、人际关系、沟通技巧、生命教育等知识，例如情绪识别、情绪调节、情绪表达、减压、正确应对压力、保持积极心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应对人际冲突等，指导学生学会合理有效地情绪管理，认识压力，使学生在职场中遇到压力或者挫折的时候能够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有利于学生树立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了解各个职业的特点、岗位要求、发展前景，避免因为职业认知偏差而阻碍职业发展，进而明确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使学生更快地适应职场的节奏和岗位的要求。

三、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实现路径

心理健康教育在职业技能教学中的功能定位体现为激发内在动力、提高职场适应力、塑造健康人格三个维度。通过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和团体心理训练，使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提高学生情绪管理和压力水平。在数控技术专业教学中，用“职业压力模拟实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岗位焦虑，用认知行为疗法调整负面思维模式，从而提高学习专注度和职业认同感。电子商务专业利用“客户沟通情景模拟”训练对学生同理心表达与冲突化解能力进行培养，进而直接提升职场沟通效率。

（一）重构立体化融合课程体系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重构需要按照“基础 + 融合 + 拓展”的立体化设计原则来实施。基础模块主要进行职业心理素养的培养，设置“职业心理基础”“情绪管理实务”等必修课，传授压力管理、自我认识等基本技能。专业融合模块体现心理技能与专业技能的相互渗透，在智能制造专业中加入“设备操作心理调适”专题，在护理专业中加入“医患沟通心理学”模块。拓展模块依靠“心理剧工作坊”“正念训练营”这类第二课堂活动，把心理技能迁移到职场场景当中。课程重构要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专业教师合作，形成课程、实践、反馈闭环培养体系，使心理健康目标与职业能力目标深度融合。

（二）革新智慧化情境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革新要依照学生认知规律，采用情境化、游戏化、互动式等新手段。情境模拟法利用 VR 技术创造出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职场环境，例如在航空服务中模拟紧急情况的处理，使学生处在真实的压力之中去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体验式教学法通过角色扮演、团队拓展活动，如通过“客户投诉处理”模拟来培养同理心表达与冲突化解能力。游戏化学习平台把职业规划、时间管理等心理技能变成任务挑战，用成就系统来激发学习的内驱力。引入 AI 心理辅导机器人进行个别咨询，并配合线上心理自助工具完成“课前预习—课中实践—课后反思”的心理技能训练，打造“技术加人文”新模式。

（三）构建多元化师资协同机制

师资协同机制就是“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创建与成长。专业教师要定期参加心理技能培训，掌握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等主要方法，提高课堂心理观察和干预的能力。心理教师要深入专业课堂，了解行业技能要求，使心理辅导与职业指导精准对接。校企协同，邀请企业 HR 专家开展“职场心理适应工作坊”，用真实职场案例来更新教学内容。同时创建教师成长共同体，开展跨学科教研、案例研讨等活动来实现经验共享。在激励机制上设立“心理育人专项津贴”，把心理辅导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体系，调动教师参与心理融合教育的积极性，形成“专业教师 + 心理教师 + 企业导师”三者协同育人的网络。

四、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创新策略

（一）深度嵌入课程内容，完善校本育人体系

为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在职业技能教学中，高职院校应当将两者深度融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加入情绪管理、压力管理、自尊心与自我认知、人际关系、沟通技巧、生命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发展指导等内容，丰富学生的认知。加大校本课程开发与研究的投入，可以参考重点示范院校校本课程开发的经验，积极开设“职场心理适应训练”“职业情绪管理”等校本课程，打破课内外教学壁垒，丰富学生的课程资源，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年级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紧抓课程内容，把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与职业技能目标有效融合到一起，例如将培养学生的情绪识别与调节能力、应对挫折与压力的能力、团队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责任感等作为融合目标，使学生在面对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

（二）创新智慧教学载体，提升心理育人实效

心理健康教育属于开放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应该从学生实际学习状况、兴趣爱好等角度出发，科学选择教学手段，构建高效课堂。以情境模拟法、体验式教学法为例，用虚拟现实（以下简称 VR）技术把职业生涯案例转化为三维模型，为学生构建接近真实的职场环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求职面试、客户沟通等场景，用沉浸式的体验方式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情绪管理能力[2]。以小组合作学习法为例，按照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心理状况、性格等条件

组建心理互助小组，鼓励和引导学生在职业技能教学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通过交流的方式缓解焦虑情绪，培养团队合作和共情能力。以游戏化教学法为例，利用信息化技术或 AI 技术开发出压力释放游戏、沟通破冰游戏等线上职业规划平台和心理健康自助工具，覆盖自我认识、职业规划、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各个方面，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决策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学生的职业取向和心理状况进行分析评价，从而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平台设计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包含职业规划工具、心理自助指导、在线互动咨询、社群支持网络等，识别学生的个人兴趣、特长和职业倾向，为学生推荐符合自身需求的职业信息和心理健康资源。利用社群支持、在线互动咨询，引导学生分享自己的职业经历、心理成长故事，邀请校内校外专家、导师给学生提供一对一咨询、在线讲座、实时答疑等专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心理健康管理建议，促进学生发展。

（三）凝聚多方合力，建强协同育人队伍

在职业教育体系当中，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学习同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方向。师资队伍是开展各种教育活动的引导者，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丰富的教学经验、过硬的心理素质，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指导和心理支持 [3]。因此，高职院校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技能相结合的专项培训活动，组织专业教师一起学习心理辅导技巧、职业规划理论知识、课堂心理观察方法、沟通技巧、职业心理案例分析、情绪管理等内容，拓宽教师的知识视野。还应该组织心理教师参加职业技能研修，通过开展实训课程来了解各个行业、各个专业的职业特点和技能要求，提高自身的指导技能，汲取经验。也应建立校企协同培训机制，坚持“请进来”的原则，邀请企业人力资源专家、职业心理咨询师进校园开展讲座、案例分享，传授职场心理调适经验，让教师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就业形势、心理健康研究等信息，更新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教学实效性。坚持“走出去”，积极开展校外实习、访学、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促使教师走进企业、社会组织，培养职业敏锐度和实操能力，有利于加深理论知识，形成实践 + 理论教学理念 [4]。重视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与职业规划，创建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推出职业发展路径规划、国际交流、教学成果奖励等措施，打造和谐健康的工作环境，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增强育人效果。

（四）健全动态评价体系，闭环优化育人模式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课程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优化课程体系，学校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定期对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掌握学生目前的职业规划和心理健康状况 [5]。收集信息之后，再进行精准分析，依据调查结果及时对教学方案进行调整与改进，以满足学生真实的需求。以评价主体为出发点，可以邀请职业心理师、学生代表等人员参与进来，就评价的内容展开打分和分析工作，保证评价过程客观公正。以评价方法为出发点，用过程性、表现性、终结性联合评价的方式科学有效地评价学生的传统理论测试结果、课堂参与度、项目实践中的心理表现等指标 [6]。教师在小组合作项目中可以观察学生面对意见分歧时的沟通方式、情绪稳定情况等，进行相应的评价，打破唯成绩论的评价方式。评价时以学期为单位，采用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MBTI 性格测试等工具开展心理测评活动。测评期间要结合学生的职业技能发展方向，从职业认知、情绪管理、抗压能力等多方面开展动态监测，对学生职业心理匹配度作出评价，并据此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做出及时调整，从而保证教育功能的有效实现。

五、结语

职能技能教学与心理健康融合教育是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培育德技并修人才的关键路径。高职院校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更新教育理念，积极探索两者融合的方法。以课程重构、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评价优化为核心抓手，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全方位嵌入职业技能教学全过程。通过系统化融合育人，助力学生实现专业技能与心理素质协同发展、职业素养与心理品质同步提升，引导学生以健康心态、优良品格、过硬技能应对职场竞争与职业挑战，持续为社会输送有技能、有素养、有担当、有韧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王永杰 . 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职业技能教学中的作用与实践 [J]. 知识文库 ,2024,40(22):67-70.

[2] 陆阿丽 . 高职院校团队辅导对学生职业技能和心理健康的双重影响研究 [J]. 科教文汇 ,2024(20):164-167.

[3] 王兆英 . CBL 教学法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应用中的 SWOT 分析——以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职业教育 ,2024,23(01):32-35.

[4] 尹锡杨 , 倪亚丽 , 刘玮玮 .“1+X” 证书制度实施背景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为例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22(05):114-117.

[5] 张娜 , 邓淇尹 , 管太兴 .“三全育人” 背景下农业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以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J]. 河南农业 ,2022(03):37-39.

[6] 潘尚瑶 .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形式探新——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公关世界 ,2021(12):72-73.

（作者系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马理学科研究生“教＋研＋调＋宣”融合育人模式的逻辑内涵与优化路径

曾　蓉

摘要：为适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高质量培养要求，构建全方位、复合型育人体系，本文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阐释“教＋研＋调＋宣”四轮驱动融合育人模式的核心内涵与实践价值。该模式依托教学、科研、社会调研、学术传播四个环节的联动互促，可全方位提升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生的专业素养、学术创新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与理论传播能力。文章系统剖析该育人模式的核心特征与协同育人机制，结合当前研究生培养现实痛点，从课程体系重构、实践平台搭建、导师团队协同、评价激励机制完善等维度，提出系统化优化路径。研究可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育人模式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助力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培育适配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教育；“教＋研＋调＋宣”；融合育人；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教＋研＋调＋宣”四轮驱动融合育人的模式，并非四大环节的简单叠加与机械组合，而是通过破除育人壁垒、重构育人逻辑，实现教学筑基赋能、科研深化提质、调研贯通知行、宣讲辐射育人的有机统一与闭环互促。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学科理论学习、学术规范训练、社会实践体悟、价值理论传播的深度融合，聚焦培养厚理论、强能力、善实践、重担当的高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才。本文深度阐释该融合育人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协同育人效应，剖析当前模式落地运行的现实困境，结合高校育人与实证经验，提出可落地、可推广的优化路径，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育人质量提质增效和优化提供参考。

二、“教＋研＋调＋宣”融合育人模式的逻辑内涵

（一）教学：能力奠基、思维塑造与职业准备的三维统一

本模式中的“教”是指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资源、强化教学实训、参与课堂教学、致力于教学竞赛来培养硕士生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突出的教学技能。其内在逻辑体现为教学是理论内化的主要途径[1-3]。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增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专题课程，并设定实践学分，使学生在深度学习理论的同时思考“如何教”的问题[4-6]。其次，教学是技能生成的主战场。创建“教学技能工作坊”、推行助教制度，让学生在参与导师课堂助教、组织专题研讨会的过程中把教学理论转化为实际技能，在“设计—实践—反馈—修正”的循环中磨炼自己的教学基本功。教学是价值认同的强化剂[7]。

（二）科研：学术训练、创新激发与问题导向的深度协同

本模式中的“研”指的是通过论文写作专题讲座、课题立项加分制、导师项目捆绑式、发表学术论文制度化，培养硕士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研究能力[8]。其运行逻辑在于：其一，用制度化的设计来激发科研内驱力。将“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必要条件之一，对高水平成果进行奖励，从制度上改变科研可有可无的观念。实行课题立项加分制、导师项目捆绑式，使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进入导师的科研项目，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快速融入学术前沿。其二，以问题为导向来提高科研的实效性。引导学生选题要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现实问题，如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党建引领机制、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念变迁研究等，保证研究贴合实际、具有生命力。其三，用全过程培育链来保证科研的严谨性。举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读、社会科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等专题讲

座，从文献功夫、方法训练、学术规范三个方面进行辅导。

（三）调研：理论验证、实践认知与群众路线的根本回归

本模式中所指的“调”是指以项目调研、论文调研、实践调研等多种方式，培养硕士生广泛的社会调查能力以及突出的分析能力[9]。其运行逻辑在于，一是认知逻辑，即亲身接触社会现实来修正、加深对书本理论的认识，把理论认识从抽象转变为具体。第二种是方法逻辑，掌握并运用社会调查的一整套科学方法（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大数据分析等），培养实证研究能力。三是价值逻辑，即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了解国情、民情的过程中培养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从而强化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因此需要创建起以项目、论文、实践为三个支柱的调研体系，使调研贯穿学术生涯始终。

（四）宣传：理论转化、价值传播与阵地巩固的能力拓展

本模式中的“宣”，指的是用党的创新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和学理性阐释，用科学性、实践性、时效性、有效性的理论宣讲来培养硕士生的专业引领力和突出的传播力[10]。其运行逻辑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对象化思维，即宣讲者要对不同受众（国企职工、社区居民、中小学生）的思想特点、接受习惯进行深入研究，实现从“我想讲什么”到“受众需要听什么、能听懂什么”的转变。第二，载体创新，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专栏、网络直播等青年喜欢的传播方式，拓展理论传播的边界。第三，品牌化运营，组建专业的宣讲队伍（星火宣讲团），进行持续的内容开发、技能培训、效果评估，形成持续的育人机制和品牌。

三、“教＋研＋调＋宣”模式的实践价值与系统效应

（一）知识、能力与价值塑造的融会贯通：实现全人教育目标

学生就“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等理论问题开展“研”，形成初步的认识；再经由“调”，深入社会，考察共同富裕在地方的体现与困境，获得感性认识与一手数据，进而对之前的理论认识加以检验与修正；之后，在“教”的环节里，他们要把调研案例转变为教学素材，向同学或者模拟对象讲述，这时需要将复杂的调研发现进行系统地、有逻辑地梳理和表达；最后，在“宣”的环节里，他们面向社会公众，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理论政策的现实意义，实现了知识的创造性转化[11]。当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问题的研究者、解决方案的贡献者、正面理论的传播者的时候，其主体性、责任感就油然而生[12]。

（二）培养主体与资源平台的协同联动：构建育人共同体

导师角色的多元化，导师是学术的引路人，也是教学的指导者、调研的顾问、宣讲的导师[13]。导师指导学生参加教学竞赛、带队到基层调研、共同精心修改宣讲稿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鲜活的社会实践，得到新的研究灵感和教学案例，实现了教学相长的常态化。吉首大学导师们在指导学生团队获得多项荣誉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省级以上教学竞赛奖5项，科研项目与成果不断增多，即为明证[14]。

（三）学科发展与社会服务的互哺共进：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

模式注重科研选题的现实观照，使学院的学术研究不再成为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大量来自调研一线的真实问题成为科研立项的重要来源，其研究成果（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文章）又可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或者基层理论武装工作。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多项调研成果被地方政府采纳，在权威报刊上发表系列理论文章，正是学科社会服务功能的直接体现。

四、融合育人模式的核心特征

（一）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

政治性始终是马理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根本底色，“教＋研＋调＋宣”一体化教育模式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学、科研、调研和宣讲的各个环节，使其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政治立场，积极担负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同时，课堂教育是为了夯实理论基础，科学研究培训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而调研是为了让学生深入到实际问题中去，而宣讲和传播是为了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政治引领与学术训练并行展开、彼此依靠，既防止学术研究偏离正确方向，也避免思想教育失去理论支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应有的鲜明特点。

（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融合

理论性是马理学科最突出的优势，融合育人模式以“教”为起点，较为系统地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研”的推进中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使研究生逐步把握理论要义，形成问题意识和创新自觉。实践性则指向这一学科的现实关怀，“调”把研究生带入基层和现实情境，让书本知识转化为分析问题、开展调研的能力；“宣”又提供了检验理论理解的场域，使其在传播中不断校正认识、增强实践本领。理论走向实践，实践又回到理论，二者在往复互动中推动“教、研、调、宣”彼此贯通，也推动马理学科研究生培养更具实效。

（三）主体性与引导性相结合

主体性重在确认研究生在培养中的中心位置，“教

+ 研 + 调 + 宣”融合育人模式不再停留于单向传授，而是把更多主动权交还给研究生：课堂学习强调自主思考，科研训练鼓励自主选题，调研过程允许独立设计，宣讲活动注重激发个人表达与创新能力，由此推动其形成独立判断和自主实践的能力。与此同时，引导性仍是这一模式不可缺少的一面，教师在教学安排、科研点拨、调研指导和宣讲训练中持续发挥主导作用，帮助研究生校准方向、解决困惑，使自主成长始终建立在正确轨道之上。

五、优化路径：迈向系统集成与机制创新的融合育人新生态

（一）理念升维与战略重塑：从“项目思维”到“生态系统思维”

高校需牵头组织学科委员会、教学管理团队、全体导师、行政管理人员、研究生代表参加的系列研讨会和工作坊。核心议题是对传统培养模式弊端的反思，认识融合育人的战略意义，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是“厚基础、强实践、善传播、有担当”。将融合育人理念纳入学科建设章程和人才培养总体方案，实现育人理念的全员共识、全域落地。同时成立由学院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的融合育人模式改革领导小组，赋予其跨部门统筹协调、资源整合调配的职能。统筹制定整体实施方案、创设跨领域育人项目、建立部门联席工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与育人碎片化问题，构建育人工作“一盘棋”格局。

（二）体系重构：打造“纵横贯通、虚实结合”的一体化培养架构

打破传统二级学科壁垒式课程设置，以“教、研、调、宣”四大核心能力为主线，搭建四大模块化必修课程体系。每个模块均配套“理论基础课 + 实践实训课”，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学”等理论课程，“微格教学与诊断”“科研项目实战”“田野调查工作坊”“宣讲稿写作与演讲艺术”等实训课程，足额保障实践学分，夯实学用结合基础。推行多学科导师组制度，为每名研究生配备 3 人固定导师团队，分别专攻教学育人、学术科研、实践传播领域，集体制定培养方案、开展阶段考核、评定综合素养。同时深化校地协同，联动地方党校、重点中小学、主流媒体、示范社区、标杆企业搭建人才共育基地，聘请行业骨干担任校外兼职导师，通过专题授课、项目指导、岗位实训等方式，补齐校内实践育人短板。

（三）机制革命：扭转评价“指挥棒”与构建动力引擎

对学生开发一套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评价系统进行研究。把学生在“教、研、调、宣”四个方面的成果和表现，转化为可以累计的“贡献值”。发表学术论文、获得科研项目按级别计“研”值；获得教学竞赛奖、开发优秀教学案例计“教”值；调研报告被采纳、完成社会实践项目并获好评计“调”值；组织宣讲活动受众广、反馈好、在媒体发表理论文章计“宣”值。贡献值是奖学金评定、优秀毕业生评选、博士申请推荐的主要依据。毕业资格除了满足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外，在四个维度上均要达到最低标准，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六、结语

“教 + 研 + 调 + 宣”四轮驱动融合育人模式，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创新探索，精准契合新时代高素质思政、理论人才的培育需求，为高校社科类学科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全新思路。该模式通过四大环节闭环赋能、协同发力，能够系统培养理论功底扎实、创新思维突出、社会责任感强、理论传播能力优异的复合型人才，助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守正创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人才支撑与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 薛永志，王欣欣，张学明，等. 研究生课程思政认识情况、发展现状及范式调查研究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4(10):142-143.

[2] 李驿. 跨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困境和对策 [J]. 科教文汇，2025(22):17-20.

[3] 曾璐. 协同培养视角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及创新路径 [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19(03):97-103.

[4] 苏畅，马雪. “课程思政”建设融入研究生教学体系的应对策略 [J]. 辽宁经济，2024(09):89-92.

[5] 许从洁. 基于实践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改革探索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41(10):175-177.

[6] 杨慧，刘建华.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提升研究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11):25-31.

[7] 李嘉玉. 将实践教学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5(36):62-65.

[8] 钱周伟. 教育强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五维探析 [J]. 北京教育 (高教)，2024(10):69-72.

[9] 李伟.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现状、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问卷调查与制度分析 [J]. 职业技术教育，2025,46(26):18-24.

[10] 马忠贵，彭云峰. 融入思政元素的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J]. 教育教学论坛，2024(43):77-80.

[11] 王佳靖. 高质量就业视域下高校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J]. 就业与保障，2025(07):121-123.

[12] 张廷. AI 赋能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5,45(04):96-103.

[13] 王彩萍，张宇，邓寅，等. 新工科背 （下转 132 页）

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探索

南　冰

摘要：“道德与法治”课程是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课程之一，对教师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对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策略进行探索至关重要。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强国建设中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专业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文章对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意义及原则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加强教育理念学习、涵养教育情怀、深入教育研究等策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实践策略

教育家精神充分体现出教师的职业精神，反映了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独有的精神品质，也是教师教学的价值取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重大。因此，对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策略进行探索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教育家精神对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道德与法治教师在专业成长过程中，受到教育家精神的影响和熏陶，有利于教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革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做到与时俱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教育家精神的影响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能够更好地履行教育使命，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个性，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同时，道德与法治教师应基于教育家精神，具有科学的教学方法、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精准的评估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从而提高教学质效。

（二）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十分关键，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并且在学生今后学习和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而教育家精神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等理念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对此，将教育家精神赋能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品德修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而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三）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对整体教学质量、学生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对此，学校应充分发挥教育家精神的重要作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秉持教育家精神，增强终身学习意识，持续创新，并主动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教师在教育家精神的激励下，参加多种教育教学培训、相关科研活动等，积极探索全新的教学策略，更加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从而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

（上接 131 页）

景下“特色方向 +”的高层次人才创新能力进阶培养模式研究 [J]. 科技风 ,2025(12):58-60.

[14] 吴正刚 , 刘宇奇 . 基于“教、赛、学”一体化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5,8(05):108-1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湖南省研究生学位与教学改革研究立项课题“马理学科研究生‘教 + 研 + 调 + 宣’四轮驱动高质量培养模式研究”（2024LXBZZ086）。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有利于改善教育生态

教育家精神在赋能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中，对教师的教学理念、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使得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践行教育家精神，从而对整个教育生态带来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学校逐渐形成良好的教风，对全体教师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教师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并对学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除此之外，教师在教育家精神的感召下，主动和家长、社会进行协作，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共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二、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原则

（一）以人为本原则

在对教育家精神的内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发挥主导作用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培养人为核心[1]。因此，使这种精神赋能德育与法治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种原则要体现于德育与法治教师专业化过程中，关注教师的需求和发展现状，考虑到不同个体存在的差异性，创新专业化发展模式。同时，这种原则还强调以学生为本，德育与法治教师专业化发展要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支撑点，为其服务。德育与法治教师在进行教学实践过程中，要从各方面分析学生的需求和发展现状，提高教学活动的有效性，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理实结合原则

教育家精神内涵丰富，且独具特色。教育家精神强调了教育创新、责任和人文关怀，需要教师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致力于教学方式的创新，并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实践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在积极学习教育家精神的相关理论知识后，就需要将其灵活应用在实际教学中，引发学生产生一系列思考，进而在实践中提高教学水平。

（三）创新性原则

教育家精神关注教育文化和创新，对教育现代化建设有着深刻影响。对此，在教师教育家精神引导下，要遵循创新原则，勇于创新教学形式与方法，努力创新教育理念，提升创新能力，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满足小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创新数字化教学技术，使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实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化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提升教学实效性。

（四）系统性原则

教育家精神对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长远的过程，培养教育家精神离不开社会、相关部门和学校的多方面支持和保障。在推动教育家精神赋能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相关教育机构和学校要充分发挥相关优势，开展协同和合作，全面形成合力，从系统性角度支持道德与法治教师的专业成长。在教育家精神赋能的实践中，学校重视道德与法治教师的专业发展，制定培养计划，加强培训，教育部门结合实际和需要提供政策保障，优化教师专业成长环境。

三、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策略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宣传教育家精神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发展过程中，学校需要注重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宣传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学校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学校需要使用多种宣传手段更好地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教师更好地了解教育家精神，并可以在实践教学中更好地践行教育家精神，为学生知识学习、技能学习、优良品质养成提供必要帮助[2]。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需要引导道德与法治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教育职业的责任意识、认同意识，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构建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

例如，以“寻访教育先贤，铸就师者之魂”主题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层面，教研组长带头组织全体道德与法治教师每月举办一次“教育家精神读书会”，重点研读陶行知、陈鹤琴、于漪等教育家的著作与生平事迹，要求每位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撰写“教育家精神践行承诺书”，并在年级组内公开宣读。学校还可设立“师德观察员”制度，由资深教师轮流走进年轻教师的课堂，记录其在教学中是否体现“仁爱、奉献、责任”的教育品质，每月召开一次反馈交流会。在宣传中，学校创新形式，将教育家精神更直观地展现在教师面前，再结合道德与法治教师的特点，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影视欣赏、案例分析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对教师产生影响。校内外联动，通过线上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形式将教育家精神充分阐释，使得更多教师对其深入理解，从而有效助推道德与法治教师的专业成长。道德与法治教师在多样化的活动中，学习更多优秀教育家的事迹，切实体会其教育情怀，汲取教育智慧，坚守教育初心，遵循职业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二）学习先进教育理念，明确专业成长方向

道德与法治教师的专业成长十分关键，需要学校提高重视程度。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中，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从而需要全面促进教育家精神赋能[3]。在实践中，教师应主动结合道德与法治教学实际，选择关系密切的教育家，深入探究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从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弥补自己教学实践中的不足，明确专业成长方向，践行教育家精神。

例如，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与遵守社会规则相关内容时，可以结合教材内容，主动学习

教育家精神中蕴含的先进教育理念，借鉴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等理念，创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并在实践中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和发展。在实践中，教师落实“生活即教育”理念，优化设计并开展“发现身边的规则”等活动，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学校、社区等不同公共场所，细致观察现实生活中不同场景具有哪些规则，并详细记录和分析。在课堂上，各小组选出代表，主动分享小组观察和分析的结果，并共同探析规则的作用，并思考在不同场景下应当如何遵守规则。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社会规则，并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灵活运用在实践中。而教师在教学中融入教育家理念，创新了教学方法，并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创新，改进教学内容、形式和方法，明确了专业成长方向。

（三）汲取教育智慧，提高专业成长能力

在教育家精神赋能中，教师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产生思维碰撞，对不同的教育家精神内涵产生新的观点，并汲取其教育智慧，分析成功教育案例，借鉴成功经验，提高教学水平。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基于新时代教育背景，明白先进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教育家精神蕴含的教育智慧和先进技术融合，创新教学活动设计内容和实施方法。同时，教师对教育家们的教学实践进行深度思考，反思自己的教育模式，总结经验，加强创新，提高教学能力[4]。

例如，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教师在讲解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知识时，创新教学活动，有效提高自身教学能力，在专业成长方面有大幅度的提高。在课前，教师通过互联网资源，主动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的先进教育思想，汲取其教育智慧，对于“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这一独特观点，教师产生一系列的思考，受到教育启发。在课堂上，教师突破以往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创新设计了知识竞赛活动。学生在活动正式开展前，主动通过阅读书籍、互联网搜索等方式查询大量资料，学习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知识。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了解更多国家利益的内涵、重要性，增强了自身的责任感，并在现实生活中主动维护国家利益。同时，教师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主动汲取教育智慧，创新多样化教学策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成长能力。

（四）加强教育研究，深化专业成长内涵

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其主动参与道德与法治教育的相关研究活动，解决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突破教育瓶颈，为学生解决学习难题，从而促进自己专业成长，并且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成长与发展[5]。在教育研究中，教师之间可以交流，记录教育实践中的典型问题，并以相应的教育家为榜样，更多地关注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教师对教育家精神进行不断深入研究，多角度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不断深化专业成长内涵，获得显著的研究成果。同时，教师将这些成果灵活应用在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与学生共同进步和成长。

例如，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实践中，对于一些抽象难懂的概念，学生理解和学习的难度较大，整体教学效果不佳。对此，教师基于教育家精神，勇于探索和实践，主动参与教育研究，深入探究道德与法治概念教学的情境创设。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教师以教育家的科研和探索精神为指引，通过查阅文献、课堂教学实践观察和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了解学生对道德与法治概念学习困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教师基于教育研究，创设角色扮演、生活真实情境再现、真实案例分析等多种情境，并将其落实在道德与法治课堂。在实践研究中，学生在课堂上对相关道德与法治概念的理解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应用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对此，教师将相关的教育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并在学校与其他教师分享，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也促进了团队同行的专业成长。

四、结语

教育家精神赋能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探索至关重要，能够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有效的指导，给予更多精神资源。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道德与法治教师在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参与教育研究等多样化的实践路径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应主动践行教育家精神，促进自身和团队的专业成长，并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屹，宋世宁. 教育家精神赋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时代价值与生成路径 [J]. 职教论坛，2024,40(09):11-17.

[2] 姜乃强，张光伟，邓胜旺，等. 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教育家期刊社线上圆桌论坛实录 [J]. 留学，2025(01):30-35.

[3] 本刊编辑部. 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J].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24(17):1.

[4] 李笑笑，王强. 教育家精神赋能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透视与突破 [J]. 生活教育，2024(10):121-122.

[5] 卢怀，王喜. 让精神之光照亮教育前路——论教育家精神对思政课教师的赋能与可能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4(05):11-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滨州市思政教育专项课题“融入教育家精神的小学思政课教师专业成长路径研究”（2024SZ016）。

（作者系滨州经济开发区定吕小学一级教师）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

欧阳日平

摘要：在数字经济与产业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重塑产业结构与人才能力谱系，对高职思政课提出从“知识讲授”走向“价值塑造和能力赋能”的新要求。本文立足新质生产力视域，阐释其对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育人方式上的深刻影响，梳理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逻辑转向，在此基础上提出内容对接新兴产业并融入技术伦理与创新文化、方法引入项目式与数字赋能、平台推进“课堂＋车间”融合、师资打造“双师型”协同团队等实践路径，以提升思政课的时代适配性与育人实效。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产教融合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水平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载体、以要素重组与效率跃迁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正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深度转型[1]。产业链升级与岗位能力重构，使企业更加重视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创新意识、数字素养、协作能力与职业伦理。现实中，一些高职思政课存在内容与产业实践脱节、方法单一、实践育人不足等问题，影响课程的吸引力与针对性。基于此，本文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系统探究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推动思政育人深度适配产业升级需求，助力学生职业成长与高质量就业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导向下高职思政课教学的时代要求与价值意蕴

（一）时代要求：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引领＋创新能力培育”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迁，岗位能力结构由“熟练操作”转向“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系统优化”。在此背景下，高职思政课不能停留在知识讲授与概念记忆层面，而应实现从“教知识”到“育价值、强能力”的转向：一方面，以价值引领为主轴，将创新报国、质量为先、法治合规、绿色低碳发展、风险底线等理念嵌入职业情境，帮助学生形成稳定的职业信念与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以创新能力培育为目标，把思政课嵌入真实问题与任务过程，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证据意识与方案思维[2]。

（二）价值意蕴：服务于“新质人才”培养，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跃升，归根结底依赖于“新质人才”的供给质量。对高职教育而言，新质人才应具备创新意识、数字素养、协作能力、职业伦理与持续学习能力。通过价值观塑造，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战略、产业升级同向同行，增强职业认同与成长韧性，通过规则与责任教育，强化标准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合规意识，通过劳动精神与工匠精神培育，推动学生形成精益求精、持续改进的职业品质。

（三）功能定位：思政课在高职教育中的“铸魂＋赋能”双重功能

在新质生产力导向下，高职思政课的功能定位应从单一“铸魂育人”拓展为“铸魂＋赋能”并重。“铸魂”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强化制度认同与价值判断，使学生在面对技术变革与利益诱惑时守住方向、站稳立场；“赋能”则强调面向职业场景生成可迁移的综合能力，使学生在新技术、新流程、新组织中“能适应、会协同、敢创新”。具体而言，思政课要把价值议题转化为能力训练，围绕标准与质量、数据与安全、算法与伦理、绿色与责任等主题，引导学生进行情境决策、风险识别、合规推演与改进方案设计，培养其规则意识、系统思维与实践表达能力[3]。

同时，通过与专业课程、企业实践、社会服务协同联动，把思政课堂延伸到实训车间与项目现场，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悟”中实现价值内化与能力外显。

三、新质生产力导向下高职思政课教学理念的转型重塑

（一）从“知识本位”到“创新驱动”：厚植新发展理念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要素重组与效率跃迁，这要求高职思政课的教学理念从“讲清知识点、记住理论条目”的知识本位，转向以创新驱动为牵引的“新发展理念”。一方面，课程目标要从“知晓理论”升级为“形成面向未来的价值判断与创新意识”，把创新精神、问题意识、系统观念与风险底线作为关键培养点，引导学生理解创新与国家战略、产业升级、岗位成长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内容组织要从“章节式灌输”转为“主题式、问题式建构”，围绕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数据安全等发展议题设置学习任务，让学生在分析“技术为何改变生产”“岗位为何重构”“创新如何落地”中形成发展视角。强化过程性评价与成果性表达，如方案论证、观点辨析、改进建议等，促使学生把价值认同转化为可迁移的思维方式与行动能力，真正实现思政课对“新质人才”成长的前瞻引领[4]。

（二）从“封闭教学”到“产教融合”：强化协同理念

新质生产力下，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高度耦合，思政课如果仍停留在校园内部“自我循环”，容易出现案例陈旧、情境缺失、价值引领与职业实践脱节的问题，教学理念必须从封闭教学转向产教融合导向的协同育人。一是协同对象要拓展：与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班组长、劳模工匠共建课程资源与实践任务，形成思政、专业、企业共同体；二是协同内容要真实化，将企业质量管理、数字化流程、合规制度、职业伦理冲突等转化为可教学的案例与项目，使价值议题落在真实岗位情境中；三是协同机制要制度化，推进联合备课、案例共建、实践共评与成果共享，把企业参与从“来做讲座”升级为“深度育人”。

（三）从“理论灌输”到“实践导向”：树立实干理念

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创新的工程化落地与组织效率提升，背后需要大量“能把理念转化为方案、把方案转化为改进”的实干型人才。高职思政课理念应从“讲道理、背概念”的理论灌输，转向以实践导向组织学习的实干理念，以真实问题为起点（如数据合规、智能设备安全、质量追溯、节能降耗），引导学生开展调研访谈、资料检索、证据分析与方案设计，在“做中学”中理解原则、形成观点。课堂结构可采用“情境—任务—行动—反思”模式，强化对决策逻辑与责任边界的训练，例如让学生进行岗位伦理情境推演、质量事故复盘、流程风险识别与改进建议撰写。

（四）从“技能培养”到“工匠精神”：坚守育人理念

新质生产力追求的是“高质量的效率”，对产品可靠性、过程稳定性、安全合规与绿色低碳提出更高标准，仅靠技能熟练远不足以支撑持续竞争力。高职思政课应坚守育人理念，把工匠精神作为连接技能、质量与责任的关键支点，实现从“技能培养”到“品质培育”的升级。一方面，工匠精神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可培养的职业行为体系，包括标准意识、精益意识、质量责任、风险敬畏与持续改进；思政课要把这些内容嵌入职业情境与案例分析中，让学生理解“按标准做事”“对质量负责”“对安全守底线”的价值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微项目 + 复盘”机制培养精益习惯，例如围绕工位 5S、流程优化、缺陷原因分析、能耗对标等任务，让学生体验改进的过程与成效，并在复盘中形成自我要求，结合劳模工匠事迹与企业质量文化，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与职业使命相连接，形成敬业、专注、守正创新的职业品格，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

四、新质生产力导向下高职思政课教学实践的改革路径

（一）教学内容优化：对接新兴产业，融入“技术伦理 + 创新文化”

教学内容改革的关键，在于推动思政课由单一的宏观叙事转向“产业议题 + 职业情境 + 价值判断”相结合的内容供给方式。首先，应建立产业、岗位与议题之间的映射清单，围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梳理相关岗位中常见的价值问题，如数据合规、算法偏差、自动化安全、质量追溯、知识产权保护、绿色责任落实等，形成可持续更新的教学议题库。其次，要将教学内容重构为模块化内容包，围绕创新与劳动创造、技术伦理与行为边界、质量与标准治理、数据安全与法治合规、绿色发展与责任担当等主题，分别配置关键概念、典型案例、情境任务和评价要点，增强内容的系统性与针对性。最后，要强化“创新文化”的系统表达，将从 0 到 1 的探索精神、从 1 到 N 的工程化落地能力以及持续改进的精益文化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创新有方向、应用有规范、责任有边界”的稳定认知结构。

（二）教学方法创新：引入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数字赋能手段

教学方法改革要着力解决学生参与度不高、学习与应用脱节、评价流于空泛等现实问题，重点可从三

方面推进。首先，推行微项目式教学，以 2—3 周为一个学习周期设置明确的“可交付成果”，如车间数据采集合规方案、质量追溯流程优化建议、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风险清单等，并按照问题提出、证据收集、方案设计、影响评估、展示答辩的流程组织教学，突出证据支撑和方案可执行性。其次，应将传统案例教学升级为决策推演式教学，让学生带着岗位身份进入情境，在具体任务中作出判断和选择，再通过量规评价其分析逻辑、责任意识和价值立场，使案例学习由“听故事”转向“作决策”[5]。最后，推进数字赋能的混合式教学。课前可借助微课、知识图谱等工具完成基础知识输入，课中运用互动投票、协作文档、即时测验等方式提升参与密度，并合理引入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资料检索、观点比较和文本润色，要同步明确引用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形成工具可用、边界清晰、过程可评的课堂教学新形态。

（三）实践平台搭建：校企共建“思政实践基地”，推动“课堂 + 车间”融合

实践平台建设的关键，在于把“校企合作”真正转化为可持续运行的育人机制，使思政课由课堂延伸到真实生产场景。具体可从基地共建、任务共创、过程共管、成果共评四个方面推进，选择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智慧物流等企业作为实践基地，以校内实训中心作为前置训练平台。围绕质量、合规、安全、绿色、创新等主题，将课堂中的理论内容转化为车间可执行的实践任务，并配套任务书、过程记录表、成果验收标准和复盘模板，确保学生“进厂有角色、实践有边界、完成有成果”。

以汽车零部件企业“质量追溯”实践为例，思政课教师与企业共同设定任务，组织学生分组进入装配线，依据企业 IATF16949 质量管理要求梳理产品追溯链条，重点核查关键工序中的二维码绑定、首检记录和异常处置单等证据材料。回校后，学生围绕“质量责任与职业伦理”开展专题汇报与答辩，由企业质量工程师参与评价。优秀方案可纳入企业班组改进资源库，实现课堂教学与车间实践的有效衔接，形成“课堂 + 车间”融合育人的实践。

（四）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双师型”思政教师团队，提升产教融合能力

“双师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不在于简单增加企业经历，而在于提升教师将产业资源转化为教学任务、将岗位规范转化为评价标准的能力。首先，要推动企业实践制度化，实施学期跟岗和项目参与机制，明确每次实践都应形成案例一则、任务一套、量规一份，把企业实践成果沉淀为可持续使用的教学资源。其次，要组建由思政教师、专业教师、企业导师共同参与的三元教研共同体，围绕基地任务、情境案例和评价标准开展协同开发，切实解决思政教学与专业教学脱节的问题。最后，应推进教师能力提升模块化，重点加强数据素养、质量标准、合规治理、项目化教学设计和学习评价设计等方面的训练，通过培训、试讲、实战和成果评审等方式完成能力认证，将基地指导、案例库建设等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和职称评价体系。

例如，某高职院校与智慧物流企业共建实践基地后，思政教师参与企业“仓配数字化”改进项目，跟随现场主管开展一周岗位观察，获取拣选差错、延迟发货、能耗波动等数据，再与专业教师共同设计“履约与责任”项目任务，引导学生在企业 WMS 模拟环境中分析差错原因，提出改进方案，评估其对效率提升与合规管理的影响，课堂评价采用“证据充分度、方案可行性、责任边界意识、表达协作能力”四维量规，由企业导师参与终评，在校内推广应用，体现出“双师型”思政教师队伍对产教融合教学的有效支撑。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下，高职思政课改革的关键在于把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可落地、可评价的“育人行动”。通过校企共建思政实践基地，将课堂议题嵌入车间真实流程与岗位规范，以任务驱动获取证据、产出成果并反哺课堂，实现“课堂 + 车间”融合育人，以“双师型”队伍建设为支撑，推动思政教师常态化参与企业实践与三元协同教研，把产业案例、标准与项目转化为教学资源、任务链与评价量规。两条路径协同发力，可提升思政课的现实解释力、实践牵引力与育人实效，为培养兼具创新意识、数字素养、工匠精神与职业伦理的新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保障，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申技红 .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 [J]. 河南教育 (高教),2026(01):50-51.

[2] 郑芳 . 涉农高职思政课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 [J]. 农村科学实验 ,2026(01):181-183.

[3] 汪凤兰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质路径研究 [J]. 公关世界 ,2025(23):175-177.

[4] 张博雅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创新路径探赜 [J]. 河南教育 (高教),2025(11):52-53.

[5] 吕少娇 . 新质生产力理论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的三重维度探析 [J]. 改革与开放 ,2025(19):94-9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路径研究”（ZJGB20247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副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研究

施秋瑜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智慧结晶，为文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深厚滋养。“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深入研究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根本要求，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研究的多维度展开思考，以期为相关领域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遵循。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价值意蕴；实践路径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本国文化影响力已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竞争的关键目标之一。因此，坚定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而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3]。本研究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相融合，实现课程内容的文化赋能，旨在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深度和广度，用润物无声“以文化人”的浸润方式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理论依据与价值意蕴

（一）理论依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文化底蕴，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道德品格与法治素养的重要源泉；连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为建设思政课注入灵魂与活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提供了理论框架与行动指南。

（二）二者融合的必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魂育人、以文化人注入深厚力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4]；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而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治素养的关键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能够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落地生花。

（三）价值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精神命脉，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是高校的主旋律，肩负着培育青年一代坚定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使命与担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领域深度融合，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可持续的精神动力与人才保障，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之需。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融合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研究，有助于增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文化底蕴与育人效能，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本研究以专题式教学为切入口，结合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各章节的核心目标，精准挖掘适配性教育资源，实现文化资源与课程内容的有机衔接，为科学融入奠定理论基础。

（一）人生方向维度：浸润“修身立世”的生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修身立世”的人生智慧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第一章“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科学内涵存在深层的共鸣。儒家强调“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学要求相契合。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对引导新时代大学生避免“空谈理想”，在实践中确立人生方向具有重要启示。而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有助于大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找准自身定位，辩证地看待和解决人生矛盾。

（二）理想信念维度：厚植“家国同构”的担当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价值理念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都是课程第二章的主旋律，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重要文化资源。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理想与家庭幸福、国家兴盛、天下太平紧密相连，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体系。而《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强调大学生要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

（三）中国精神维度：凝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兴国强国之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课程第三章的“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主要包含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从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都是培育当代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素材。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则凝聚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辛勤劳作中，闪烁在近代抵御外侮的英勇抗争中。回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到现代科技成果“天宫”“蛟龙”“悟空”“墨子”“奋斗者”“神舟”“嫦娥”等，都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的同频共振，能让新时代大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精神的历史延续性。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度：追溯“价值共识”的文化源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课程第四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共识，是涵养公民道德的重要资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追溯至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以和为贵”等理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与儒家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观念以及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公正理念相呼应。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与“敬业乐群”的敬业精神、“一诺千金”的诚信准则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友善理念等高度契合。

（五）道德品格维度：汲取“崇德向善”的道德滋养

儒家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对应着课程第五章，作为核心道德规范，涵盖了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无论是“六尺巷”的谦让之德，还是“曾子杀猪”的诚信之举，抑或是“黄香温席”的孝亲之道等美德故事，都能穿越历史的长廊，走向现代社会引导新时代大学生自觉践行道德规范。

（六）法治素养维度：挖掘“德法合治”的传统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礼法结合”的法治智慧是历史遗产，与课程第六章高度契合，如《唐律疏议》中强调的“引礼入法”“出礼入刑”等理念，以及“亲亲相隐”等法律原则，再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都体现了法治建设需要兼顾文化传统与社会伦理，也是中国法系的重要标识。除此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法不阿贵”“执法如山”理念，也在现代法治建设中得到继承发展。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创新设计及实践路径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5]；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6]。立足新时代，切实推动传统文化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移植传统文化元素，而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与时俱进传承发展，唤醒时代青年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基于上述六个维度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有机融合，构建“文化引领、信念培育、精神凝聚、价值践行、品格锤炼、素养提升”的递进式创新设计，以本土文化资源为切入口，探索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育人效能的提升。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高尚的人生追求，构建“文化经典＋人生思考”新模式

在“成就出彩人生”专题，主要以《大学》《论语》《道德经》中的经典篇目为导向，在诸如专题讲座、主题演讲、主题辩论赛、经典诵读、社区文化宣讲、志愿者服务活动、拍摄“我心中的思政课”大学生微电影比赛等教学实践活动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立世”的智慧，引导大学生确立高尚人生追求，科学从容地解决人生困惑；以身边事为着力点，也可以在实践中践行“修身立世”的理念，在建设家乡美的实际活动中，自觉将高尚人生追求转化为实际行动。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崇高的理想信念，构建“历史案例＋理想教育”新模式

在“培育理想信念”专题，主要以“传统爱国精神与当代理想追求”为核心，结合“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先进典型”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组织观看《大国崛起》《典籍里的中国》等纪录片和开展走访历史

文化名城的实践活动，在实地调研中感悟理想信念的力量，增强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国精神，构建“文化基因 + 精神内涵”新模式

在“凝聚中国精神”专题，主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勤劳勇敢、改革创新”等精神元素为抓手，深入阐释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例如，联合历史学院、文学院等学科教师开展跨学科教学，从历史、文学、哲学等多角度解读中国精神；组织开展“传统精神与时代创新”主题研讨会、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文化”实践活动；同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如“岳飞抗金”“文天祥就义”等古代爱国志士的奋斗场景，让大学生沉浸式感受爱国情怀。

（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传统文化 + 价值阐释”新模式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要求”为核心，开展“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主题班会，分享传统美德故事。搭建实践平台，开展“社区核心价值观宣讲”“传统美德践行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大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认知向价值行动的转化。

（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锤炼道德品格，构建“道德规范 + 实践养成”新模式

在“锤炼道德品格”专题，主要以“当代社会道德热点问题”为契机，选取孔子、孟子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模范相结合，开展“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主题活动研讨与学习，培育正确的道德观；定期组织“孝亲敬老”“诚信校园”等主题实践活动，践行道德规范。

（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法治素养，构建“传统法治智慧 + 现代法治理念”新模式

在“提升法治素养”专题，以“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传统法治理念为关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现代法律条文，分析传统法治智慧与现代法治建设的契合点，引导大学生理解“德法兼修”的重要性。同时创新教学形式，组织开展“传统法治案例研讨”“法治实践调研”和“模拟立法建言”等主题活动或邀请法律实务工作者开展专题讲座，以便帮助大学生提升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

众所周知，将“知行合一”理念与本土文化资源相结合，是推动教学模式创新的有效路径。在此以海南为例，创新教学模式，深入挖掘海南历史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构建“历史、现实、实践”三位一体的融合路径，推动海南历史文化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为大家抛砖引玉，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例如，组织大学生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课堂教学活动中，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创新等时代品格相融合；在实践教学活动中，走进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等自贸港重点园区进行实地考察；在建功自贸港的实际行动中，书写人生华章。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开展“寻访海南文化遗迹”实践活动，了解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和琼崖革命根据地“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壮举，引导新时代大学生自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建设祖国、服务人民。品读海南“军坡节”的文化内涵，学习冼夫人的历史功绩与家国大义，厚植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而这也是高校思政教育与海南文旅融合的重要资源。学习海南历史文化名人海瑞的故事，他那刚正不阿的优秀品格与廉洁公正的法律思想，常通过琼剧、话剧等艺术形式被现代演绎，成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研究，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质增效、深化课程育人效能的重要路径，能够为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课程润物无声的育人温度。系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全过程融入课程教学，有利于实现优秀文化传承与青年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切实助力培育坚定文化自信、锤炼高尚道德品格、筑牢法治观念的新时代青年，为高校思政育人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0.

[3] 习近平.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9-03-18(01).

[4]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5-05(02).

[5] 人民日报编辑部.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N]. 人民日报，2023-05-30(01).

[6] 张烁.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2016-12-09(0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专项重点课题“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路径研究”（HWJ<XJJ>20220109）。

（作者系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教师）

智能建造背景下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教学改革探究

——以职业本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为例

郑述芳　陈祥花　陆燕青

摘要：本文针对智能建造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建筑工程专业面临的课程滞后、教学模式传统等问题，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为例，探讨了智能建造背景下提升学生职业素养的教学改革实践路径。本文从课程思政融合、职业技能强化、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构建了“理—虚—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强调通过任务驱动、虚拟仿真与真实场景结合，提升学生的数字化管理能力、跨学科协同素养和持续学习意识。

关键词：职业素养；工程项目管理；智能建造；职业本科；教学改革

职业素养是指职业内在的规范和要求，包含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行为、职业作风和职业意识等[1]，是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适应职场并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支撑[2]。建筑业正经历着智能化应用的深刻变革，智能建造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并从概念探索逐步迈入规模化实践。2020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推动智能建造在工程建设各环节的广泛应用，2035 年实现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取得显著进展。这一宏观战略背景对建筑工程领域人才培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3]。

当前，职业本科院校的建筑工程专业在适应智能建造转型中普遍存在课程体系滞后、教学资源不足、师资能力薄弱等问题，导致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成效不足。这一问题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等核心课程中尤为突出，因此推动该课程的改革对带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课堂教学作为素养培育的主渠道，急需通过教学改革系统性提升学生职业能力与素养[4]。职业本科教育需在知识技能传授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以真正回应行业转型与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5]。

一、职业素养与课堂教学现状分析

以职业本科建筑工程专业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为例，该课程是专业核心课程，在大三下学期开设，主要培养学生的项目管理能力，是学生毕业实习之前重要的课程之一。

（一）建筑行业职业素养需求现状分析

目前，随着智能建造的逐步推广，建筑行业对专业人才的职业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技术融合能力。未来的项目管理者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的工程技术知识，还必须熟练运用建筑信息模型（BIM）协同平台、智慧工地管理系统、项目管理云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二是跨系统协同能力。智能建造环境下，设计、施工、运维等多体系深度联动，要求管理者具备多体系思维和跨界面协调能力。三是持续学习与创新适应能力。智能建造技术迭代迅速，只有具备强烈的学习意识和快速适应能力，才能跟上技术发展步伐，满足建筑行业的需要。

（二）学生职业素养现状分析

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更强调技术应用的熟练度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与高职专科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更强调对知识原理的深入探究以及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能力的培养。目前学生的职业素养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职业行为上，学生热衷于动手操作，实践能力较强，对实操任务往往易于以小组合作的模式去完成，但在实操的过程中缺乏对任务的深层次思考能力，有时会出现不遵循规范的行为。二是在职业意识上，学生的思想积极，学习有自己的内驱力，在团队合作和责任意识上有一定的优势，但缺乏更高级别的职业意识，比如主动思考、分析解

决问题的科学素养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三是在职业技能方面，学生前期已经学完了专业基础课程，具备了相关的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实践技能，但是对项目的系统管理涉足不深。

（三）课堂教学模式现状分析

目前学生的职业精神、意识、能力仍与行业职业素养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有：一是教材和课程仍以传统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为主，围绕“三控三管一协调”展开。智能建造相关内容仅作为“信息化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一章简要介绍，篇幅不足总内容的 10%，且多以概念描述为主，缺乏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管理流程讲解。二是教学方法仍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传统方法。虽然院校引入了 BIM 实训，但往往作为独立实训环节，未能与项目管理核心内容深度融合，缺乏真实智能建造项目的复杂性和技术集成性。三是课程内容更新速度远低于智能建造技术的发展速度。例如，在进度管理中仍主要讲解横道图和网络计划技术，而对基于 BIM 4D/5D 的动态进度管理、基于物联网的实时进度跟踪等新方法介绍不足。

二、智建背景下课程教学的新模式

（一）思政资源深度融合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不止于传授计划、组织与控制等相关专业知识，更承载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于建筑行业关乎国计民生、影响深远的特点，以及对从业人员岗位职责与职业素养的深度剖析，课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树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魂，强化规范意识。为此，教学过程中以思政目标为引领，从历史工程故事、社会热点与专业知识中自然挖掘思政资源，并通过主题研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将其有机融入课堂教学。

例如，在讲解项目质量管理的内容时，模拟项目现场，让学生扮演各类相关主体角色（项目经理、材料员、监理、施工班长），演绎利益与诉求的交织碰撞。最后，解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让学生深入理解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与工匠精神，树立学生的法治意识、职业道德与品质至上的工程价值观。

（二）职业技能多维度提升

1. 提升数字化工具应用的能力

在智能建造背景下，项目管理者须掌握各类数字化工具：BIM 软件（如 Revit、Navisworks）用于三维建模和碰撞检测；BIM 协同平台（如 BIM360、BIM5D）用于多方协同工作；智慧工地系统（如视频监控、环境监测、人员定位）用于现场实时管理；项目管理软件（如 Project、Primavera）用于进度和资源管理 [6]。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与 BIM 技术有关的课程，能熟悉使用 BIM 软件。因此本课程重点学习 BIM 融入项目进度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合同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及项目管理的相关软件 [7]。

2. 培养应用数据优化决策的能力

在传统项目管理教学中，学生能掌握进度、成本与质量管理的核心要点、计算原理及判别标准。而在智能建造背景下，以 BIM、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着建造模式向数据驱动转型。为此，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运用数据进行优化决策的能力，使其能够定义数据采集需求、设计数据分析模型、解读可视化数据结果，并最终依托数据作出科学决策。

例如，在进度管理中，可基于历史项目数据训练预测模型，动态研判工期风险；在质量管理中，借助物联网实时采集施工数据，自动识别异常并预警质量隐患；在成本控制中，通过大数据分析资源消耗规律，实现动态优化与精准调配。

3. 形成跨学科系统协同的思维

当前，建筑行业对施工现场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要求不断提升，智慧工地随之成为行业转型的重要实践方向。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必须重视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系统思维与协同能力，以适应行业日益增强的集成化、智慧化发展趋势。

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开展沉浸式实践教学。学生首先在平台中创建新项目，导入 BIM 模型，并进行轻量化处理。随后，依次配置以下核心管理模块：设置人员管理模块，添加人员信息，实施电子考勤与岗位动态管理；设置施工机具与设施管理模块，添加设备信息，实现运行状态实时监控与调度优化；设置物资管理模块，添加物资信息，进行库存管理和出入库管理；设置环境与能耗管理模块，添加环境监测设备，进行扬尘、噪声、温度等数据监测，实现绿色施工数据可视化；设置视频监控模块，添加摄像头，进行施工现场监控，远程实时巡检与安全行为识别；设置施工过程检测与监测模块，添加检测设备，进行构件质量检测和结构安全监测。

4. 强化持续学习和创新能力

当前，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社会的各行各业，新技术迭代迅速，新软件、新设备、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对项目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8]。面对这一趋势，项目管理者必须保持开放心态与敏锐的行业洞察力，主动学习并掌握新兴技术与管理方法，并勇于在项目实践中进行探索与应用 [9]。在教学层面，教师应及时跟踪并整合行业的前沿技术资料，将其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中，构建适应未来岗位所需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在直观了解行业发展动态的同时，也对自身所应掌握的综合能力有一定的认知。

（三）教学模式优化重塑

1. 课程改革理念分析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已完成“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建设工程法规”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具备一定的工程安全、质量标准和规范操作意识。但对智能建造技术的应用，由于学生接触的该类项目太少，他们在创新应用和思维拓展能力方面较弱，需要进一步提升。同时，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单一，容易导致学生被动学习，进而使得其职业意识培养成效不佳[10]。基于此状况，教师可充分利用动画、短视频、案例故事等信息化资源，将实际工程案例有机融入课堂，推动书本知识“案例化”，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优化课堂氛围。

2. 教学内容设计重构

基于上述课程现状，结合职业本科学生职业素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异分析，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进行重构设计。在整体教学设计上，采用任务驱动模式，融合理论讲授、虚拟操作与学生角色扮演等多种方法，依托工程项目管理实训室开展一体化教学，使学生能够在理论学习后及时进行实践操作，强化知识与技能的同步内化和应用。在内容体系上，课程在确保学生牢固掌握目标管理、网络计划技术、全面质量管理等基础方法上，将 BIM 协同设计、智慧工地实时管控、绿色建造管理等前沿内容作为核心模块进行深度融合。例如，将网络计划与 4D-BIM 进度模拟结合，将质量验收与 AI 图像识别技术关联。为了强化知识的连贯性与应用性，课程以“学校一期实训楼”的真实项目作为贯穿始终的教学载体，学生直接调用在前期 BIM 课程中已创建的完整 BIM 模型，在本课程中进行深度应用，实现从建模到模型应用的完整能力链条建设，强化学生的数字化协同工作能力与“先模拟，后建造”的现代管理思维。

3. 教学路径融合创新

为实现上述目标，课程设计并实施了“理—虚—实”螺旋递进的一体化创新教学路径。在“理”的阶段，课程利用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该平台建设了包含大量动画、短视频和前沿案例的动态教学资源库，支持学生课前课后自主学习，同时也可以使课堂的教学内容更深更丰富。在“虚”的阶段，教学的核心转移到虚拟仿真环境，学生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的虚拟项目中扮演项目经理、BIM 工程师、智慧工地管理员等不同角色，尝试多角色多种类管理方案。在“实”的阶段，学生在实训室操作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进行模拟管控，并走进校园内在建的工程现场进行实地观摩。这种将虚拟认知与真实场景进行关联印证与实操校验的过程，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知和综合应用能力。

三、结语

本文针对职业本科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迫切需求，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为例，探索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在智能建造背景下，课程改革突破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模式，构建了“理—虚—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沟通合作能力等职业素养。改革同步推动课程知识的动态迭代，在夯实传统工程管理方法的基础上，深度融合智能建造技术，实现对项目成本、进度、质量与安全的更精准、全面监控。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提升了学生在智能建造技术工具化应用、适应行业变革的可持续学习等方面的关键能力，从而为建筑行业输送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实现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 裴丽娜，唐霞 . 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高职土建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探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0(30):30-31.

[2] 朱晓玲，韩萍，王敏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学生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创新与实践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34):49-52.

[3] 刘小龙，张正举，梁钊，等 . 建筑业人才需求演变：数字化、绿色建筑与复合型技能的融合趋势研究 [J]. 中华建设 ,2025(11):136-138.

[4] 张伟建 . 高职《传感与视觉检测技术》课程改革提升学生技能与职业素养研究 [J]. 才智 ,2025(31):109-112.

[5] 乔祎，姚会娟，李海鸽 . 职业本科学生职业素养评价体系与职业能力提升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33):77-80.

[6] 李頔，郭菲菲，刘延金，等 . 新基建时代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土木工程专业“三维协同”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J]. 西部素质教育 ,2025,11(21):45-48.

[7] 程斌，林贤光 . 职业院校土建类专业学生数字素养与职业素养协同培养研究 [J].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37(02):100-104.

[8] 孙霞，张尚，黄建维 . 传统建筑业与智能建造背景下项目管理人员胜任力评价指标的比较 [J]. 项目管理技术 .2025,23(03):82-90.

[9] 严小丽 . 多重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特色化创新转型发展探究 [J]. 高等建筑教育 ,2025,34(06):67-72.

[10] 马静媛，肖海峻，张晋，等 . 课堂革命背景下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教学改革实践——以高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课程为例 [J]. 农产品加工 ,2025(14):118-121,12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本科建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GXGZJG2023B098）；2025 年度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研教改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与农业设施建设融合的实践研究”（XJG2579）。

（作者单位：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城乡建设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研究

杜　燕

摘要：“三全育人”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理念，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在该背景下，构建“辅导员—专业导师”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可以进一步整合育人资源，形成育人合力，进一步契合“三全育人”对育人的系统性要求，同时还能摆脱育人困境。本文主要阐述了“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的价值，分析了当前协同育人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目标融合、沟通联动、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如在平台共建机制方面，应搭建多元化的协同育人平台，共建课程思政与实践育人协同平台，进而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工作机制；辅导员；三全育人；专业导师

当前“三全育人”背景下，对育人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分工不同，但育人目标高度一致。但当前辅导员与专业导师普遍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存在职责边界模糊、沟通机制缺失、协同平台匮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育人的成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应从目标融合、平台搭建等方面出发，确保辅导员与专业导师的育人方向一致、行动协同，同时还应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沟通联动机制。在落实“三全育人”的过程中，制定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还应围绕学生成长需求，搭建多元化的协同育人平台，补齐辅导员与专业导师的协同能力短板，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协同育人工作提质增效。

一、“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构建的意义

（一）健全“三全育人”工作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全育人”的核心是打破育人主体的孤岛效应。在传统育人模式下，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存在明显的职责边界，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可以明确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在立德树人中的共同任务，形成“思想引领+专业赋能”的双轮驱动模式[1]。辅导员依托专业导师的专业资源，可以避免思政教育流于形式，专业导师借助辅导员的育人经验，可以使专业教育有效承载育人使命，有效协同真正实现了全员育人从理念到实践的落地。同时，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可以为两类育人主体搭建能力互补与共同成长的平台，辅导员可以弥补专业认知短板，专业导师可以补齐育人理念与方法的短板，这种双向赋能，推动全员育人队伍向复合型转变。当今时代大学生的专业能力、文化素养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高校应加强学业思想、科研等方面的教育。在“三全育人”的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的构建，可以充分将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的过程中，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辅导员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协同育人机制可以构建分阶段递进式的协同育人体系，如入学阶段，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协同开展专业认知和思想教育，帮助学生快速适应大学生活，明确专业方向。毕业阶段，辅导员开展就业引导，专业导师对接行业资源与岗位需求，可以实现学生从校园到职场的平稳过渡，进而实现育人环节的无缝衔接[2]。

（二）整合育人资源，创新育人体系

“三全育人”的核心是整合各类育人资源，协同机制可以推动辅导员与专业导师育人资源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整合校内资源，将思政教育资源、专业教育资源、实践基地资源等统筹协调，并联动社会资源，共同搭建协同育人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同时，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实现了育人场景从单一课堂向多元场景延伸，辅导员参与课程设计，使课堂教学成为育人的主阵地。实践场景过程中，专业导师提供专业技术支撑，辅导员提供思想引领，这种多场景的育人模式，可以构建立体化的育人生态。“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打破了传统育人条块分割的壁垒，进一步促使高校完善育人制度设计，

建立跨部门的育人领导小组，出台协同育人考核制度体系，进而提高高校育人制度的协同性。此外，协同育人机制的运行，打破了高校部门壁垒，建立了跨部门的协同联动体系，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助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构建优势

（一）优势互补效应显著，协同基础扎实

在当今”三全育人“的全新背景下，辅导员和专业导师能够在知识结构和育人职能层面形成一种天然互补的格局，其中辅导员学科背景以教育学以及心理学为主，更加擅长于进行思想引导以及心理层面疏导，在对学生日常管理、价值塑造层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专业导师则掌握前沿专业知识以及行业最新动态，能够为学生提供准确的学业指导。两者协同则能够形成一种“思想引领 + 专业赋能”的双轮驱动模式[3]。这样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的育人当中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脱节的问题，并且辅导员也可以借助专业导师的学科资源来提升育人深度，专业导师可以根据辅导员的育人经验来拓宽育人维度，双向赋能也能够为协同育人机制的落实提供主体基础，以此来推动育人队伍朝向复合型变化[4]。

（二）资源整合能力突出，育人场景多元

协同育人机制在资源整合以及场景拓展层面均展现出较为显著的优势，这项技术能够推动思政教育资源、专业教育资源以及实践基地的融合，也能够统筹校内资源，并且联合社会资源，以此来共同构建协同育人理念，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育人场景层面，辅导员采用课程设计方式能够让课堂教学具有育人效果，在实践场景当中专业导师能够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辅导员提供思想层面的引导，这样也能够实现从单一课堂向多元场景的延伸。协同机制的运行也能够建立跨部门的育人领导小组与考核制度体系，并且对管理流程进行优化，从而助力高校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能够进一步提升育人制度所具有的系统性以及协同性。

三、“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的构建策略

（一）目标融合机制

在“三全育人”背景下，构建“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时，应注重目标融合，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辅导员聚焦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心理健康等价值引领维度，落实全员育人责任；专业导师应聚焦专业知识掌握、学术素养塑造等专业赋能维度，确保两者围绕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目标发力。高校应打破传统的育人模式，致力于教育资源和教育力量的整合，辅导员和专业导师应注重对彼此目标的理解与认同，将辅导员的思想政治引领目标嵌入专业导师的专业素养培育目标。在具体的融合过程中，辅导员可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专业导师在专业教学中积极渗透职业责任、学术诚信，通过科研指导等，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在目标融合过程中，还应进一步构建“通用能力 + 专业能力”的复合型能力培养体系，辅导员搭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平台，专业导师提供专业实践项目、实训机会，使学生在执业过程中，提升专业应用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辅导员还可以开展生涯规划教育，专业导师结合行业需求、岗位能力，提供专业层面的生涯指导，促使两者协同，制定生涯认知和专业储备的融合目标，使学生能够明确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

（二）沟通联动机制

传统模式下，辅导员与专业导师的沟通多为碎片化的个案对接，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平台，而且辅导员侧重思想动态与日常管理，专业导师侧重学习进展，两类信息缺乏联动与整合。在“三全育人”背景下，学校应积极结合育人场景的差异化需求，构建分层分类的沟通体系，加强专业导师与辅导员之间的联系，定期召开育人推进会，明确沟通的战略目标和制度框架，重点内容应围绕育人资源整合、共性问题破解等展开探讨。学校定期开展学术研讨活动，设置不同的讨论话题，以学院为单位，建立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常态化沟通培训制度，并分专业分年级制定目标衔接方案、学生共性问题研判机制等，进而解决执行层面的堵点。为实现对学生日常思想、学业、生活等基础信息的实时掌握，应依托数字化平台建立日常信息共享台账，使辅导员、专业导师能够进一步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业成绩、课堂表现等，并围绕学生成长的关键节点和重点任务开展专题沟通，如实践与科研期，协同搭建实践与科研育人平台。沟通重点为实践项目设计，辅导员对接实践资源，专业导师提供技术指导，推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践行责任。当前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在沟通联动机制构建的过程中，还应积极拓宽沟通渠道，学校应建立专门的微信群、QQ群等工作平台，整合学校、学工系统、教务系统搭建辅导员与专业导师的专属数字化沟通平台，完善平台数据查询、在线沟通等功能模块，同时还应建立线上资源共享库，进一步整合思政教育资源、实践平台资源、生涯指导教育资源等。

（三）平台共建机制

为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实现全方位育人，应积极构建平台共建机制，破解传统育人模式下衔接断层、资源分散的问题。高校应组建由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共同参与的课程思政建设团队，聚焦学生成长全周期，明确平台在协同育人中的枢纽作用，通过平台划分责任边界，构建精准对接的联动机制。

在平台构建过程中，专业导师应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职业道德、家国情怀融入教学内容，辅导员应协助专业导师设计思政教学方法，共同打造思政示范课程。资源分散是协同育人的重要障碍，在平台共建中，应整合辅导员的思政课程资源，收录专业导师挖掘的思政元素，形成“思政 + 专业”融合的教育资源库，支持双方检索、下载共享。学校还应汇聚专业导师的科研课题、实践项目专业前沿资料等，纳入辅导员组织的志愿服务资源，通过校企合作渠道，整合专业导师的行业资源，通过多资源的有效融合，提高资源对接效率。实践是育人的关键环节，学校应联合企业、社区等共建实践基地，辅导员负责基地实践的思想引领、组织协调，专业导师负责专业指导、成果转化等。同时，还应搭建协同育人项目申报与实施平台，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可以联合申报学科竞赛指导、社会实践项目等案例，推动协同育人从理论走向实践。

（四）考核激励机制

辅导员和专业导师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考核激励机制是破解协同壁垒、激发育人合力的核心保障。高校应设立专门负责协同育人的校级领导机构以及协同育人组织。考核过程中，将协同育人成效纳入辅导员与专业导师的核心考核指标，从协同意识、过程、成效三个维度，构建可量化的指标内容 [5]。例如，全程协同维度，应围绕学生成长关键环节、关键阶段，考核协同育人在不同阶段的衔接效果。过程跟踪中，考核双方是否对学生成长进行动态跟踪，是否及时干预学生在就业、思想、心理等方面的问题。为了避免考核的片面性，还应引入多元考核主体，在学生评价中收集学生对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的满意度，评价双方在专业指导、问题解决等方面的行动效果，学校管理部门在考核中应重视制度落实、资源投入等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应打破单一的结果考核模式，依托协同育人信息平台，定期统计协同任务的完成进度和质量，以学生成长成效为核心，考核协同育人的最终成果。同时，构建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设立协同育人专项经费，对协同成效突出的教师，在科研立项、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并设立协同育人荣誉称号，将优秀协同育人案例汇编成册，推广典型经验 [6]。

（五）能力提升机制

能力提升机制是激活育人合力的核心引擎，当前两类用人主体普遍存在能力短板问题，高校应针对辅导员与专业导师的能力短板，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积极将“三全育人”理念融入培训核心，邀请专家解读“三全育人”的核心价值，明确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在全员育人中的定位。高校应组织辅导员与专业导师交叉培训，专业导师学习思政教育方法、心理疏导技巧，掌握思政融入路径，辅导员应学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弥补专业认知短板。同时，还应围绕协同育人核心需求，针对两类主体能力短板，提升专项能力。比如，辅导员应精准对接专业导师，协同开展学业指导与思想引领，同时还应开设协同育人专项课程，围绕协同目标制定任务分工等，开展情景化模拟实操演练，进而提高协同配合的执行力。能力提升过程中，还应根据育人主体的能力层级完善内容，如针对新入职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开展能力基础培训，针对具有一定经验的骨干人员开展进阶培训；在实践赋能中，还应鼓励辅导员与专业导师联合申报课程思政项目、学科竞赛指导项目等，在项目申报实施总结过程中总结行动经验，打造协同育人品牌活动，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磨合协作模式，优化协同流程。

四、结语

综上，在“三全育人”背景下，构建“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可以有效破解单一固化的育人主体格局，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学校应充分发挥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设立协同育人专项经费，并加强辅导员与专业导师队伍建设；建立协同育人工作督导机制，共建实践育人、课程思政等协同平台，进而通过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邹友，何铬颖，刘逸文，等. 基于导师制理念的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24(16):250-252.

[2] 晋程妮，边晶晶，郭辛茹，等. “三全育人”视域下研究生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研究——以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为例 [J]. 西部素质教育，2025,11(12):32-36.

[3] 于园园，刘德海. “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学生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研究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24(11):217-220.

[4] 陈燕美. “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学生辅导员与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研究 [J].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23,32(06):49-52,64.

[5] 周荣凤. 协同学视域下辅导员和专业导师协同育人路径探索 [J]. 新课程教学（电子版），2023(11):150-151.

[6] 陈爱林. 高职院校“辅导员 + 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C]// 延安市教育学会. 第四届创新教育与发展学术会议论文集（一）. 广州：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2023:623-62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三全育人’背景下‘辅导员—专业导师’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研究”（SCHYB-2022-27）。

（作者单位：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李慧明　赵静雯　魏　来

摘要：当今，我们正处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在全球文化浪潮的冲击下自觉坚守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的内涵进行梳理，探究二者融合的必要性。结合对当前现状的分析发现，主要存在中医药文化认同有待增强、国际视野培养有待深化、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不足等现实问题，从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向度出发强调以价值引领筑根立魂、以知识整合夯实基础、以氛围营造强化认知，助力中医药高校培养国际化人才。

关键词：中华文化认同；国际视野；中医药人才培养

一、问题提出

教育对外开放是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医药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然使命。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革命使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空前频繁，具备国际视野已成为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素养；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守护文化根基、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上升为国家发展、时代发展的要求。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如何以思政工作为抓手回应这一时代命题，至关重要[1]。然而，在实际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往往容易将“国际视野”简单化，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等同于外语能力的提升或者是留学经历的积累，对于国际视野背后的文化理解与文化对话有所忽视。对于“文化认同”的理解也局限于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体验或者是灌输，未能结合当前全球化背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就导致了“传统文化”与“国际视野”在育人过程中融合不足的局面。通过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找出促进二者有机融合的纽带，是培养既有文化底色又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的关键所在。

二、核心概念梳理

（一）中华文化认同的多维内涵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 中华文化认同是集心理演进、文化形态和实践过程于一体的多维动态体系。首先从文化认同的结构来看，文化认同需要载体，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文字、历史古迹和文学艺术等都是文化赖以传播的载体，为文化认同提供了具象化的认知基础。其次从文化认同的情感归属来看，文化认同是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认可感、归属感的表达，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精神内核。最后从文化认同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认同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文化表达，这是个体基于对文化的认可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适应、文化自觉乃至文化创新的具体行动，是从“知”到“行”的重要转化[3]。因此，文化认同的过程是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为的逐步深入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对于中医药高校而言，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关键就在于将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中医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医智慧、养生观念逐步转化成学生的文化自觉，引导学生在日常行为中自觉地践行。

（二）国际视野的深层意蕴

国际视野也被称为国际视角，是一种能够站在宏大视角，完整、全面地了解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现象的认知能力[4]。国际视野的内涵是认知、规则、实践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在认知维度上，国际视野的建立需要承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文化共性，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世界问题，这对个体的格局有着一定的要求；在规则维度上，国际视野需要通晓国际规则、国际规范，能够理解国际行为背后的法律与制度逻辑；在实践维度上，国际视野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个体适应全球性挑战的实践能力，在学生的培养方面需要注重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就包括我们常说的跨文化沟通、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国际视野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学生在深刻理解世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我国文化的独特性，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传播中华文化。

（三）认同与视野的融合：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

通过对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的内涵剖析可以看出，二者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深层次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二者内在结构的一致性和目标指向的一致性两个方面。首先在内在结构方面，无论是文化认同还是国际视野，本质上都是从知到行的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实际作用的发挥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可以为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稳定的坐标体系，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则是学生了解国际规则的重要参照，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是确保学生在国际交流中坚守文化底色的重要基础，对国际规则的理解也是学生将文化自信转化为保国行动的“方法论”。最终文化认同所追求的文化自觉与创新与国际视野所强调的解决全球问题的实践能力，都共同指向培养能够既有文化自觉又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实干型人才，引导学生成为既懂中国话语又懂世界语言、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复合型复语人才。对于中医药高校而言，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在汲取中医智慧的同时能够创造文化价值，然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理解世界医学与文化的多样性，使学生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转化，使中医药文化能够被世界接受和认可。

三、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现状

（一）中医药文化认同有待增强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医思想。然而在中医药高校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当前无论是在教育教学的实施、课程体系的构建还是在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当前中医药高校对于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尚有待提升，教师在中医药相关课程知识的讲授过程中还是以传统的知识传授为主，对于学生思想的培育还有一定的欠缺，对中医药文化的隐性育人功能的关注有待加强。任课教师从专业视角对课程的内容进行讲授，重心在于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而对于中医药课程的人文属性的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这就导致学生对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不高，难以通过专业课的学习培养归属感 [5]。再有就是对跨文化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不足。随着近年来国际上“中医热”浪潮的出现，来华学习中医知识的留学生数量正在逐年增加，但是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成为阻碍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留学生对于中医知识的学习和吸收效果不佳 [6]。因此，如何创新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形式，使中医药文化在国际化传播中能够抵御地域、文化、政治差异所带来的冲击，是当前中医药高校在跨文化人才培养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国际视野培养有待深化

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于高校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言，国际视野的培养一直是关键所在。然而国际视野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表层化”陷阱。在学生培养方面，当前较为常见的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的路径多侧重于学生双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学生与外教之间的沟通或者参加国际化会议作为重要参考，忽视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是全球性的批判思维、跨文化的认同能力和对国际问题的分析能力的系统塑造，这就导致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过程看似完整，实则缺乏应对全球挑战的骨架。同时在活动的组织和策划中也缺乏持续的、连贯的认知建构，当前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国际文化节、国际化会议等亲身体验感受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在体验过后如何将这种感受内化而不仅仅停留在“打卡”式的纪念上，也是同样需要化解的难题 [7]。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师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多数高校针对师资对于国际素养和国际视野提升的培训资源仍然有限，许多教师能够真正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较少，对于国际视野缺乏具体的感受，这种资源的稀缺也影响了教育工作者国际视野的拓展。

（三）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不足

当前在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方面存在着国际视野拓展与本土文化认同建构“失衡化”的现象，产生这种失衡的原因在于认知结构、情感倾向、教育实践与价值导向等多个方面。在认知维度上，已有的研究表明：当前大学生在知识与能力之间存在着脱节现象。学生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有更加多元的渠道能够获取知识，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在学习不同国家文化知识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甄别、判断能力，导致知识难以顺利实现转化，学生在对待文化差异时就很难做到理性审视和辩证扬弃。在情感倾向上，随着当前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推进，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否则在拓宽文化视野时就容易导致对本土文化的疏离，动摇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在课程资源的配置方面，容易出现本末倒置的问题，为了满足国际化办学的需要，往往会引进外籍教师、拓展国际化办学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忽视对本土文化教育资源的投入，产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配置不够均衡的问题，学生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时没有必要的本土文化工具作为支撑，就难以形成对本土文化的深度认同。在实践导向层面，国际化人才往往对外语能力提升、国际交流经历积累等有一定的要求，学生容易对此类经历产生功利化价值取向，这也就导致了国际视野培养的功利化，长此以往国际视野与文化认同的深度融合过程被简化甚至

消解，难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8]。

四、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协同育人模式探索

（一）以价值引领筑根立魂

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价值引领增强学生对于中华文化价值内核的理解与认同，可以有效避免文化认同浮于表面，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多方合力，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为层层深入，逐步建立起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首先，在课程方面，要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通过结合专业课程的教育，深入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阴阳平衡”的辩证思维以及“医者仁心”的职业伦理等，引导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中能够认识到中医药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与伦理价值，促进专业知识学习与文化价值传递同频共振；在学生活动方面，可以组织学生开展《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经典诵读，引导学生自发研讨，探讨“治未病”理念对当代健康管理的启示、经络理论在国际补充与替代医学领域的独特价值等，让经典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活力。此外还可以通过邀请专业领域的名医专家或者是援外医疗的中医药工作者讲述中医药的国际推广故事，用真实案例强化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导学生将个人职业理想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家文化传播使命相结合。

（二）以知识整合夯实基础

知识整合的关键在于打破学科壁垒，将国际视野培养与文化认同教育有机融合于知识体系，帮助学生构建兼具本土深度与国际广度的知识框架。在课程设置中引入“中西医学哲学比较”课程，对比中西医在病因认知、诊疗思路上的差异与互补性，如中医“辨证施治”与西医“精准医疗”的理念碰撞，引导学生在比较中既深化对中医药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又客观认识西方医学的优势；在教学手段方面，注重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结合。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培养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不仅需要课堂教学作为基础保障，更要采取有助于促进知行合一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要多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认识到专业知识在全球健康问题中的作用，让学生看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动实践[9]。同时，也要切实把握住社会实践这一重要抓手，促进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育人合力，在社会实践中结合专业特色和优势，引导学生能够将自身所学回馈社会，例如在社会实践中为留守儿童开设双语与中医相关课程，在语言的启蒙教育中筑牢文化自信，在实践中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可，能够真正做到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自觉传播，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

（三）以氛围营造深化认知

在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中要充分发挥环境的隐性育人功能，将育人工作从课堂延伸至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学生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体验中自然实现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的融合。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而言，可以在班会、社团活动、宿舍走访等活动中开展诸如“中外养生方式差异、各国传统医药故事”等主题的研讨活动，通过即时性交流引发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学生组织的重要作用，开展中药标本制作展示、中医推拿体验、中外传统医药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学生在真实互动中增进文化理解；在文化的传播方面，也要主动利用新媒体、新平台，同时在线上开设与中医药知识科普、中外中医药文化对比相关的专栏，鼓励学生积极投稿，用双语传播、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强对外交流，定期组织学生到国外交流学习，实地感受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深化对国际文化的认知，从而提升跨文化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 杜晓萍.“双一流”视域下中医药院校教育对外开放的路径探析——以入选“双一流”建设的6所中医药大学为例[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3,31(05):537-542.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85.

[3] 苏玉波,牧士钦.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内涵、价值及路径探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06):46-53.

[4] 王高阳,李小雨.融入国际视野与本土精神:国际关系史课程教学模式探新[J]. 河南教育(高教),2025(10):61-63.

[5] 吴晶晶,官翠玲,高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院校对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构建[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8,20(05):775-780.

[6] 宋晓焕,王晓静,张亚文.西安“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现状调查研究[J]. 知识文库,2016(20):34,36.

[7] 沈成成.“一带一路”倡议下大学生国际视野与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 国际公关,2024(18):179-181.

[8] 刘慎军.大学生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认同关系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9.

[9] 潘玥琦,韦子瑜.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协同培养的理论基础及实践[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02):106-10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苗圃项目资助“中华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融合的思政育人模式探索”（2025MPXG12）；河南中医药大学2024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高校中医药文化育人的路径与实践研究——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HZYSZ2024-42）。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AI 赋能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型本科生教学体系重构研究
——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

李朝晖　李晓娟　康　露　魏明强　张国明

摘要：在 AI 赋能背景下，研究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土木工程本科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以 AI 技术为纽带，搭建“科教产融合”的育人框架。从土木工程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跨学科融合等多角度切入，探索体系化项目驱动学习、学科性问题导向、以学生实践为中心的土木工程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构建 AI 赋能教学平台、AI 仿真实践平台和校企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撑。

关键词：AI 赋能；科教融汇；产教融合；课程体系；数智化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崛起 [2-3]。在土木工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AI 技术已成为推动行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其赋能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作用。从行业需求来看，当前土木工程领域正面临智能建造、绿色建筑、灾害预警等多重挑战，传统依赖经验的设计、施工与运维模式已难以适应发展需求，而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行业稀缺资源 [4-6]。

科教融汇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科教融汇已成为推动工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衔接教育链与创新链的核心路径，是科技、教育、产业要素的动态耦合与深度协同 [7]。其本质是打破教育与科技的壁垒，实现“科学研究反哺教学、教学活动滋养科研”的双向赋能，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实现教育与科技创新协同的必然选择 [8]34。通过资源汇聚与机制创新，解决传统工科教育中“教学与科研脱节”“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弊端，科教融汇成为工科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通过“科技赋能教育、科研滋养教学”，实现“培养创新人才、服务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

2011 年，教育部首次在职教领域明确提出产教融合理念；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在政策文件中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标志着产教融合从理念走向制度化推进 [9]。产教融合的核心意义是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助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10]。

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教育理念的核心意义在于二者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位一体”建设，通过产教融合衔接教育链与产业链，通过科教融合贯通创新链与人才链，形成“四链融合”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撑 [8]35。

综上所述，在大时代背景下，需要变革本科生培养模式，使得新时代本科毕业生能够具有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能够跨学科融汇可持续发展，能够结合信息化时代利用 AI 赋能拓展学生职业道路，成为行业升级的核心动力。需要重构教学体系，建立数智化 AI 赋能人才培养模式，凸显教学体系化、跨学科资源融合化、学习内容个性化、评价体系多元化。

一、AI 赋能“双融”培养的核心内涵

在土木工程本科教育中，AI 赋能“双融”培养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纽带，深度融合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其内涵可从“技术赋能”与“双融协同”两个维度展开，覆盖四个层面：跨学科知识融合、科研反哺教学、产业需求导向、能力靶向培养。

第一个层面体现跨学科知识融合及知识体系重构，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分析和智能优化算法等 AI 技术深度融入工程设计、施工、运维全生命周期，打破传统课程壁垒，构建“土木工程基础 +AI 核心技能 + 交叉应用”三维知识结构。

第二层面是科研反哺教学，将智能建造、数字孪生、BIM+AI、结构健康监测、智能防灾减灾等科研课题转化为教学案例，让前沿技术进课堂；依托国家级 / 省部级科研项目（如智慧桥梁监测、智能施工机器人），设计本科生可参与的微课题，形成项目驱动学习机制。

第三层面对接行业升级聚焦建筑业数字化转型（智能设计软件、无人施工、智慧运维）对人才的新需求。

第四层面强化算法应用能力靶向培养（如 PyTorch/TensorFlow 用于结构分析），强化算法应用、物联网技术、工程大数据处理能力。

二、AI 赋能“双融”培养的关键特点

（一）技术驱动性与行业适配性紧密结合

以 AI 技术为核心工具，紧跟土木工程行业向“智能建造”转型趋势，将数字孪生施工管理、AI 工程质量检测等产业前沿技术与科研最新成果直接转化为教学资源，确保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技术前沿同步，避免“能力脱节”，形成“技术赋能教学、教学服务产业”的闭环逻辑。

（二）教学与实践、科研的深度协同性

打破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分离的培养模式，通过“科研内容进课堂、企业项目进实践”实现三者联动。学生既能在课程中接触教师科研项目（如地下工程灾害防控技术项目），又能参与企业实际工程项目，在“学—研—产”一体化场景中提升创新思维与实操能力，体现“科研反哺教学、产业支撑实践”的协同优势。

（三）培养目标的复合型与个性化

核心目标是培养“掌握 AI 技术 + 具备专业能力 + 拥有科研素养 + 适配岗位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借助 AI 大数据分析捕捉学生知识漏洞，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避免“一刀切”教学，兼顾学生的共性能力与个性发展需求。

以“AI+ 土木工程”为抓手的模式，本质是推动工程教育从“技能传授”向“创新赋能”跃迁，最终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协同。坚持“AI 工具化”而非“AI 理论化”，确保土木工程本体知识不被削弱，符合《新工科建设指南》中“交叉融合、需求导向”原则。

三、当前土木工程本科培养教学体系与 AI 赋能“双融”培养要求的差距

（一）课程体系

碎片化、滞后性突出，未形成“AI + 双融”系统衔接。当前，课程体系未实现 AI 技术、科研内容、产业需求的有机整合。一方面，AI 相关课程多为“人工智能基础”“BIM 技术应用”等单一课程，与“结构设计原理”“施工技术”等专业核心课程脱节，学生“学用分离”；另一方面，课程内容滞后于技术前沿与产业实践，未纳入 AI 驱动的智能监测、数字孪生施工管理等行业新技术，也未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如新型抗震墙体材料）转化为课程案例，导致课程与“双融”所需的“技术—科研—产业”联动需求严重不符。

（二）实践教学

资源不足、形式化，难以支撑“AI + 双融”场景。实践环节难以匹配 AI 赋能“双融”的场景化需求。从资源来看，多数地方高校受资金、技术限制，缺乏 AI 实践平台（如 BIM 虚拟仿真实验室）与企业先进设备（如 AI 工程检测仪器）的共享，学生难以开展系统性 AI 应用训练；在形式上，科研实践仅覆盖少数优秀学生且多为“浅层参与”，企业实习多为“参观式”，学生无法深入核心工作（如施工组织设计、工程质量控制），难以通过实践提升“AI + 专业 + 科研 + 岗位”综合能力。

（三）教育资源

复合型师资匮乏，“双融”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师资队伍难以支撑 AI 赋能“双融”培养。具备“土木工程 +AI+ 科研 + 产业经验”复合背景的教师极少，多数教师仅能开展基础 AI 教学，无法指导学生进行“AI 在土木工程中的深度应用”科研，也难衔接企业技术需求；同时，高校未建立有效的“科研资源—教学资源—企业资源”整合机制，科研项目、企业资源无法高效转化为教学资源，导致“双融”缺乏人力与资源支撑。

（四）评价机制

评价单一化，未体现“AI + 双融”能力导向。当前评价仍以理论考试为主，未将 AI 技术应用成果（如 AI 优化结构设计方案）、科研实践成果（如科研报告、专利、专利申请）、企业实践表现（如工程实操能力）纳入评价体系，无法全面衡量学生的 AI 综合应用能力、科研素养与岗位适配能力，难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AI+ 双融”相关的学习实践，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脱节。

四、改进的必要性与改革路径

当前土木工程专业 AI 赋能、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在课程体系中的不足，已严重影响本科生培养质量，改进具有必要性。从行业层面看，土木工程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转型，若课程体系仍停留在传统模式，培养的学生将因缺乏 AI 应用能力、前沿技术视野、实践操作能力，难以适应行业需求，导致“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从高校层面看，若不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将难以提升人才培养竞争力，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将陷入“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从学生层面看，传统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因“学用分离”，毕业后适应岗位周期加长，影响职业发展起点，而改革课程体系可帮助学生在校期间构建“技术 + 实践 + 创新”的综合能力，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潜力。

（一）构建“AI+ 科教产融合”的系统性课程体系

以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能力为导向，将 AI 技术、科研成果、产业需求融入课程体系，分为四大模块：

一是 AI 基础与专业融合模块：开设“人工智能基础”“BIM+AI 技术应用”“AI 在结构设计中的应用”“大数据与工程风险管理”等课程，实现 AI 与专业深度融合。

二是科研成果转化模块：将教师科研项目转化为课程内容，如将“基于 AI 的桥梁健康监测”“绿色建筑能耗优化”等科研项目转化为“建筑节能”课程案例或课程设计题目。

三是校企共建实践模块：与企业共研“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实训”“AI 辅助工程质量检测实践”“数字孪生施工管理课程设计”等课程，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

四是综合创新模块：开设“土木工程创新设计”“AI+工程创新项目实践”课程，开创微专业，实现个性化培养需求，引导学生组队完成“AI 优化深基坑支护设计”等综合项目，培养创新能力。

（二）建设“AI+ 科教产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

AI 虚拟仿真平台：投入资金建设“土木工程 AI 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开发高烈度地震区建筑结构响应模拟、极端天气桥梁施工风险模拟等虚拟项目，提供沉浸式场景开展实践训练。

校企联合实训基地：与大型建筑企业合作在施工现场设立“实习实训基地”，配备 AI 工程检测设备、BIM 协同管理平台，让学生参与实际工程施工管理、技术研发等环节。

科研竞赛实践平台：设立“本科生科研创新中心”“学科竞赛培训中心”，整合教师科研资源，为学生提供“AI+ 土木工程”科研与竞赛项目（如“基于机器学习的混凝土强度预测”），配备科研、竞赛导师指导开展科研实践和学科竞赛。

（三）打造“AI+ 科教产融合”的师资队伍

引进复合背景教师：招聘“土木工程 +AI”“土木工程 + 产业经验”背景教师。

开展教师培训：与 AI 企业、建筑企业合作，组织“AI 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产业前沿动态”等培训，提升教师 AI 能力与产业认知水平。

组建校企混编团队：由高校教师与企业技术专家共担“AI 辅助工程实践”“校企共建课程”教学，确保教学与产业技术同步。

（四）建立“AI+ 科教产融合”的课程评价体系

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引入企业专家、科研导师参与评价，例如“校企共建实践模块”课程由高校教师与企业专家共同评定成绩，“科研成果转化模块”课程由科研导师评价学生的科研实践表现。

二是评价内容多样化：将学生的 AI 应用（如 AI 优化结构设计方案）、科研实践成果（如科研报告、专利申请）、企业实践表现（如工程实操、现场问题解决能力）纳入评价体系，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评价模式。

三是评价机制动态化：用 AI 构建课程评价大数据平台，实时采集学生的课程学习、科研实践数据、企业实习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评估课程效果，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确保课程体系适配行业需求与学生发展。

五、结论

本研究围绕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教学体系重构展开探索，核心在于以 AI 技术为纽带，搭建“科教产融合”的育人框架：通过“AI 基础与专业融合—科研转化—校企实践—综合创新”课程体系打破壁垒，依托 AI 虚拟仿真、校企实训、科研竞赛平台提供实战场景，借助复合型师资与多元化评价机制提供有力保障。

变革后的教学体系可精准对接行业需求，培育具备“AI 应用能力 + 专业核心素养 + 科研创新思维 + 岗位适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解决供需脱节问题；贯通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与人才链“四链”，形成“AI 赋能教学—教学反哺科研—科研支撑产业—产业滋养教学”闭环，为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储备人才；同时助力地方高校破解“招生—就业”困境，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研究表明，AI 是“双融”的技术工具与资源桥梁，未来需进一步深化 AI 与教学融合，细化培养路径，优化培养机制。

参考文献

[1] 渠慎宁，梁航远 . 新兴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核心机制与主要路径 [J]. 技术经济 ,2025,44(02):58-66.

[2] 王轩，张丽娟 .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以制造业为例 [J]. 理论探讨 ,2025(04):180-186.

[3] 陈明华，冯依然 .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难题与路径选择 [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4(03):37-47.

[4] 林沛元，黄林冲，马保松，等 .“土木工程 +AI”本科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J]. 高教学刊 ,2024,10(35):17-22,28.

[5] 钟志彬，焦彤，陈旭，等 . 数字经济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新路径 [J]. 西部素质教育 ,2024,10(08):174-178.

[6] 陶世峰 .AI 在土木工程中的局限与突破 [J]. 施工企业管理 ,2025(05):79-82.

[7] 赵春宝，张君，陈和祥，等 . 科教融汇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J]. 江苏科技信息 ,2025,42(11):37-41,53.

[8] 卢晓中 . 科教融汇视角下高校教学与科研更好结合刍论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11):32-38.

[9] 徐守坤 . 深化产教融合的九大关键问题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08):1.

[10] 李文虎，艾桃桃，赵中国，等 .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材料类专业“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J]. 高教学刊 ,2025,11(26):149-1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本科生培育模式研究——以‘AI+ 土木工程’为例”（GJJGA017）。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文化自信背景下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的思政教育策略研究

方　骞

摘要：在文化自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核心要素的宏观背景下，把民族传统音乐系统化地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是对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发挥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民族传统音乐承载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审美追求及集体记忆，它进入课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过程，对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以文化自信为宏观语境，系统探讨民族传统音乐进入课堂所蕴含的思政教育价值，为实现音乐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协同育人提供理论参考及实践指引。

关键词：文化自信；民族传统音乐；课堂教学；思政教育

民族传统音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把它纳入课堂教学之中，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做法——借助挖掘其内部蕴含的思政资源，发挥价值引领及情感认同方面的育人功能。不过，当下的实践存在思政融入不够、内容设计零散、教学方式单一、评价体系片面等诸多瓶颈，有必要展开系统的研究，并构建包含目标、内容、方法及评价的完整思政教育策略框架，以此推动美育的深入发展，提高思政教育的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的思政教育价值意蕴

（一）增进文化认同与培育文化自信的核心载体

民族传统音乐进入课堂的首要思政价值在于，它是增进文化认同及培育文化自信的关键载体。音乐凭借其超越语言且能直抵心灵的感性特质，可以有效地唤起深层的情感共鸣及文化归属感。当学生在课堂上接触蒙古族长调、十二木卡姆、江南丝竹、信天游等多种音乐形态时，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只是艺术形式，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及价值追求。这一沉浸式的审美过程，实际上是潜移默化的文化认知及情感认同过程。经过系统学习，学生可理解中华音乐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领略各民族文化独特魅力之际，深刻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自身文化体系的热爱与自豪之情。

（二）陶冶情操与塑造健全人格的美育路径

民族传统音乐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及人生智慧，它进入课堂是开展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活动，对于陶冶情操、塑造健全人格而言是一种有效的美育途径。不少传统音乐作品本身就是民族美德及集体价值观的艺术化呈现，比如说，大量民歌赞扬勤劳勇敢、尊老爱幼、热爱家乡、保家卫国的精神品德及行为；古典乐曲像《高山流水》暗喻知己之情和高尚志趣；戏曲音乐中大多时候包含着忠奸善恶的鲜明评判及扬善惩恶的道德劝诫[1]。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深入领会这些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就是在进行生动的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音乐的情感渲染力可让抽象的伦理规范变得可感可触，使得学生在审美愉悦中接受真善美的熏陶，不知不觉地影响其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性纽带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民族传统音乐进入课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隐性纽带。我国各个民族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景象。课堂教学可有目的地对音乐传播路径进行阐释，比如琵琶、扬琴等乐器，同时分析音阶、调式及节奏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创作或演奏民族团结主题的作品。学生通过学习，可领略到各个民族音乐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之美，还可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华音乐文化内在所蕴含的统一性与整体性，理解各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兼收并蓄、经济方面相互依存、情感方面相互亲近的历史状况与现实情况。

二、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的思政教育现状审视

（一）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合的深度有待加强

当下民族传统音乐进入课堂在目标定位方面，普遍存在对思政元素挖掘及融合不够深入的情况，大多数的教学实践依旧更加注重音乐知识的传授及技能的培养，教学目标大多限定在“会唱歌曲”“认识乐器”“了解形式”等比较浅的层面，就算有部分教案提到了“培养民族情感”等情感态度方面的目标，其表述一般也比较笼统空洞，无法和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学生的体验构建起可操作的联系[2]。没有深入分析经典作品及音乐形态背后的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及民族精神，思政目标的达成缺少坚实的内容支撑，容易流于形式或者成为附加的标签。

（二）系统性、时代性与思政导向性有待提升

在教学内容的构建环节，系统性、时代性及思政导向性欠缺成为不足之处。内容选取带有随意性，并未依据学段的认知特性及思政需求来开展整体性、阶梯式的规划。教材里作品数量有限且类型单一，无法全面呈现中华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及精神核心。在内容组织方面，大多时候孤立地展示作品，缺失必要的文化背景、历史脉络及跨文化比较，使得学生难以领会音乐背后的深层文化奥秘。特别关键的是，内容没有充分彰显时代性，没有把传统音乐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时代主题进行创新性的关联与阐释，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割裂。

（三）学生主体体验与价值内化环节有待创新

在教学方法方面，灌输式及讲解式的模式依旧占据主要地位，然而，这种模式却很难契合民族传统音乐体验性突出、情感性强烈的特性及思政教育内化的需求。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往往侧重于单向地讲授知识背景，学生只能处于被动听讲及机械模仿的状态，缺少引导学生借助多感官参与、多路径实践，如深度聆听、主题讨论、文化剖析、创意改编及舞台展演等方式，去主动体验音乐美感、挖掘文化内涵的教学设计[3]。如此一来，学生在交流反思中达成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关键环节就受到了影响，音乐所具有的情感陶冶与价值引领功能，需要依靠学生的深度参与及主体体验才可真正实现内化。

（四）育人成效的综合考量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存在的教学评价体系，一般侧重于对学生音乐技能掌握状况及知识记忆情形的考核，这属于典型的“技艺本位”评价类型。此种评价导向在无形中强化了技能训练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却忽视了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情感态度的变化、价值观的形成及文化理解深度等思政育人成效的关注与评估。缺少科学且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与方法，用以全面考量学生经由民族传统音乐学习在其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审美品位及道德认知等方面所产生的发展变化。评价机制存在的片面性，无法精准反映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也难以给教学改进提供有效的反馈，甚至还可能误导师生仅仅关注可被量化的技艺成果，致使“进课堂”的深层育人目标在实践当中被置于边缘地位。

三、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思政教育策略的优化

（一）明确思政导向，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

在课程设计的起始阶段，就要着重深化目标设计：把清晰明确的思政导向融入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的整个过程，达成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制定教学目标时，要深入探寻每一单元、每一课时内容里所包含的思政要点。例如，学习民歌的目标不能仅仅限定于“准确演唱”，而应该扩展为“借助学唱，感受其旋律及方言特点，了解歌曲的劳动生活背景，体会其中所蕴含的乐观坚韧精神或者乡土情怀，提高对相关地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目标表述要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及可评估性，让音乐审美体验与价值认知、情感态度目标紧密相连。

（二）精选经典作品，建立“音乐—文化—精神”一体化内容体系

优化教学内容供给，属于关键环节。需要按照系统性、典型性、教育性原则，用心挑选各民族的经典音乐作品、有代表性的乐种、关键音乐家及其创作成果，构建起内容丰富且层次清晰的内容库。在内容组织方面，着重构建“音乐本体—文化语境—精神价值”三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体系。要教授音乐形态本身，还要有机融入相关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社会变迁、哲学美学等背景知识，并且着重揭示与阐释其中所承载的民族精神、道德观念、审美理想与集体记忆。比如在讲授古琴音乐时，将其与古代士人修身养性、寄情山水、追求“中和”之境的文化关联起来[4]。重视内容的时代性转化，探索将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审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创新作品进入课堂，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意义，让古老音乐在当下焕发出新的育人活力。

（三）强化体验参与，促进审美体验与价值内化的深度融合

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主体体验及深度参与程度，构建起一座从审美感知通向价值认同的桥梁，摒弃单一的讲授方式，综合运用情境教学法、剖析式学习、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实践展演等多种教学手段。比如，借助多媒体创设历史或者民俗情境，帮助学生“沉浸”于音乐产生的文化空间之中；围绕某一音乐文化现象设计剖析课题，引领学生自主收集资料、分析探讨；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学习并排演一部小型地方戏曲或者一场民歌联唱，在协作过程中深化理解；鼓励学生基于传统音乐元素进行简单的改编或者创作，体验创新传承。在所有这

些活动里，教师应当充当引导者与促进者的角色：设计关键问题，组织分享反思，引导学生在动人的旋律、深情的唱词、和谐的演奏当中，自然而然地去感受、思考、讨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达成审美愉悦与价值领悟的同频共振及深度融合。

（四）注重过程与成效，构建多元综合的思政育人评价体系

必须改革与完善评价机制，构建以思政育人成效为导向的多元综合评价体系。评价内容应突破单一技能考核，增加对学生文化理解深度、情感投入程度、价值判断能力及合作精神的考察。评价方式上，融合过程性评价（如课堂观察、学习日志、讨论表现）与终结性评价（除技艺展示外，引入研究报告、创意改编、主题策划等形式），并综合定性定量方法[5]。评价主体可包括教师、学生及社会第三方等。通过设计科学的评价量表、观察清单等工具，全面客观评估学生在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的积极发展与变化，切实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与诊断功能，保障思政教育目标的落地实现。

四、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的思政教育实施保障条件

（一）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与思政教育能力

教师身为教学的主导者，他们的素养能力会直接对融合教育的质量产生决定性作用。要着重加强针对音乐教师、思政教师的专项培训，培训需要从两方面同时推进：一方面，要加深教师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系统知识、历史脉络及精神内涵的理解，以此提升文化底蕴与审美解读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强其思政教育意识及方法论素养，掌握把思政合理融入音乐教学的设计策略与引导技巧。应当鼓励教师借助集体备课、课题研究等途径来开展教研工作，探索有效的模式。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同样需要对培养方案作出调整，在师资职前教育中强化相关课程与训练，打造一支精通专业又熟知育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二）开发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与共享平台

优质系统的教学资源，乃是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的关键基础。教育主管部门、教研机构、学校及文化单位应当协同合作，系统地开发与整合适用于不同学段的数字化资源库。这些资源库包含名家讲座、文化背景资料及优秀教案课件等诸多内容。应当充分借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现有的渠道，构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资源共享机制，以此促进优质资源得以流通普及，切实解决部分学校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时，鼓励学校与本地博物馆、非遗中心、艺术院团及民间艺人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地引进“活态”资源。

（三）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与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课堂教学要和校园文化氛围及社会支持体系协同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凝聚起育人的强大力量。在学校方面，应当努力营造出崇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园环境：借助校园广播经常播放经典民族音乐、举办民族音乐文化节、成立相关的学生社团、设置传统文化主题长廊等举措，让民族传统音乐蕴含的文化和精神在校园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形成一种持续存在的隐性教育环境。在社会方面，需要政府、媒体、家庭、社区等多方面的力量一起给予支持，比如，媒体要加大对民族传统音乐及其当代价值的正面宣传力度，社区文化中心可提供活动场地和展示平台，家庭应该鼓励孩子去接触和学习传统艺术。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召唤下，推动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并深度融入思政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关乎未来的人才培育工程与文化传承工程。它绝非简单的课程内容增减，而是一场深刻的教育理念变革与教学实践创新。展望未来，民族传统音乐进课堂的思政教育实践，需要教育工作者持续深化理论认识，勇于探索实践路径，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民族音乐精髓的同时，积极回应时代需求，创新表达方式与育人模式。

参考文献

[1] 娜响 . 边疆地方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探究——以普洱学院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为例 [J]. 普洱学院学报 ,2025,41(02):137-140.

[2] 丁欣彤 , 陈睿菁 . 电影音乐中的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J]. 艺海 ,2024(06):83-87.

[3] 何立 .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音乐的艺术特色与传统民族音乐结合的思政价值 [J]. 黑河学院学报 ,2024,15(05):38-40,57.

[4] 陈毅 . 音乐专业课程思政“三融三进”育人模式构建与实施效果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32):53-56.

[5] 李艳 . 高校钢琴课程思政教学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融入路径研究 [J]. 乐器 ,2025(09):44-4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中医药大学 2025 年校级科研项目学生思政工作专项“文化自信视域下民族传统音乐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2025JKXSSZ11）。

（作者系浙江中医药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讲师）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三重向度

马　丽

摘要：当前，在人工智能重塑各行各业的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必须将AI技术视为教学创新的强大引擎，主动利用其优势，推动思政课教学模式的全面优化与升级。本文将从内涵阐释、价值旨归与优化路径三个向度，系统探讨AI如何赋能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旨在推动思政课教学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提升教学的实效性与针对性，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本文立足于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实际问题，结合AI的发展趋势，从“内涵阐释—价值旨归—优化路径”三个向度系统构建AI赋能思政课精准教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以期为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关键词：AI；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教学改革

一、引言

在高职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职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渠道。当前，高职思政课教学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比如教学内容趋同、教学方法固化、评价标准单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难以充分契合高职学生多样化与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二、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内涵阐释

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改革创新，不仅回应了时代对思政课教学的新要求，而且从现实层面有力推动了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改革创新。

（一）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内涵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已成功进入智能化的社会。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助力我国各行各业深刻变革的加速器。而高职院校思政课以AI为重要载体，牢牢抓住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改革的新机遇，打造了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崭新图景。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是指高职院校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AI技术在显示学生认知水平、专业背景、思想动态与情感需求动态的数据支撑下，精准识别学生的个性需求，精准选择教学内容，精准实施教学方法，精准开展教学评价。其核心在于“因材施教”“按需供给”，实现思政课教育的“精准滴灌”，进而切实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

（二）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特征

1. 教学对象的差异性

近年来，随着高考招生比例的不断提升，加上高职院校本身生源的多元化，使得教育对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由于生活环境、学习习惯、个人理想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这些差异会使学生对事物、知识的理解不一样。基于此，如何在思政课教学中精准把握及正确处理教学对象存在的差异性，这是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中亟须解决的一个难题。然而，仅仅依靠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个人的经验来解决该问题，其过程将是漫长且曲折的，只有将AI融入思政课教学，在人机协作的背景和环境下才能高效地破解教育对象的差异性难题，从而提高思政教学的个性化服务[2]。

2. 教学内容的适配性

思政课教学内容能否满足学生个体的需求和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是衡量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否实现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学生个体角度看，接受系统

的思政课教育是为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学生个体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尽相同。因此，教学内容理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变化而有所区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发展的速度和任务在不断变化，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也在动态调整，因此，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应与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变化接轨，与时代发展保持同频共振。

3. 教学方法的精准性

教学方法的精准性是 AI 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重要环节，在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方法理应突破传统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局限，不断更新。一方面，在 AI 的加持下，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识别学生的学习偏好、知识盲区与情感倾向，为教师提供学情诊断，从而帮助教师更精准地识别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采取更精准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通过运用 AI，教育双主体模式得以呈现，改变了传统思政教育中教育主客体对立的模式，极大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同年级的大学生都可以实现“课前—课中—课后”三维自学，并可以通过“学习通”等 App 随时与任课教师沟通，形成自由交流的氛围。思政课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更高效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方式，以便在教学实施中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实现实时互动与反馈优化，增强思政育人的针对性 [3]。

三、AI 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价值旨归

在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三重向度研究中，不仅要理解其独特内涵，还必须精准把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价值旨归。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这对思政课教学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通过运用 AI，精准识别教学对象的差异性、精准适配教学内容、精准调整教学方法，以切实提高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效果。

（一）应时代之召：AI 赋能新青年培育

在 AI 深刻影响的背景下，高职院校通过 AI 赋能思政课精准教学是新时代培育新青年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因此，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响应时代的要求。当前，在 AI 技术日益完善的背景下，高职院校通过运用 AI 赋能思政课精准教学能够更精准地响应时代召唤，更高效地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新青年。

（二）革课程之弊：AI 打造新金课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指明了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方向。当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在 AI 的有力支持下，有利于促进思政课程革新，全要素打造“金课”生态。其一，推动思政课教学模式的创新与转型。AI 技术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智慧课堂、虚拟仿真、智能问答等新型教学形态，打破时空限制，拓展了教学边界，增强了思政课的感染力和针对性。其二，强化思政课教学的科学评价与反馈机制。传统思政课评价多以考试、论文为主，主观性强、反馈滞后。AI 技术可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课堂参与、作业完成等多维数据的智能分析，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三）践行“以生为本”育人理念：AI 涵养新面貌学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广大青少年学生‘四个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奋发昂扬”，这彰显出新时代思政课的教学成效。新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更是智能化的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在多元信息的干扰和冲击下，他们的个性差异性、思想多元性更加鲜明。因此，在智能化背景下的思政课教学改革中，高职院校通过 AI 赋能思政课精准教学真正落实了坚持“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例如，高职学生来源多样，认知基础与学习能力差异显著。AI 技术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持续追踪与分析，可为不同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路径，提供差异化辅导资源，避免“优生吃不饱、差生跟不上”的教学困境，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促进教育过程公平，真正做到以生为本。

四、AI 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优化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革命浪潮，深入推进 AI 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更有成效地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新时代“后浪”，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实践路径。

（一）强化技术支撑，打造互动型智能教学系统

高职院校需加大资源投入，建立融合数据采集、智能研判、资源分发、互动教学等多项功能的思政智慧教学平台。在推进 AI 与思政课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应始终以激发学生主体性为核心，同时实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变化。一方面，平台建设必须立足对学生思想状况、行为特点与发展诉求的准确洞察，通过动态生成学习任务，广泛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引导其主

动探究，从而提升思政课堂的教学实效。另一方面，“00后”学生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普遍具备思维活跃、个性鲜明、需求立体多元等特征。因此，在构建智能思政教学平台时，应充分重视其群体特点，借助人工智能的学情画像、教学决策支持等技术，精准识别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二）提升数智素养，打造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

深化AI在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中的应用，核心在于提高教师的数智素养，建设一支具备现代技术能力的高水平思政教学团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高职院校应深入贯彻这一指示精神，以“六要”标准为指导，强化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系统提升教师的数智素养，确保他们能在思政课精准教学中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助推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落地实施。具体而言，可从两方面协同推进：一是将数智素养纳入多元化教师培训体系。高职院校应通过专题培训、工作坊、校企合作等多种途径，增强教师在数据解读、智能工具运用等方面的能力，使其胜任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化教学任务。二是将数智技能作为评价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4]。

（三）增强风险意识，保障人工智能规范化应用

深入推进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既要充分发挥AI技术的优势，也要充分认识到“智能思政”的局限性，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与伦理规范，保障AI技术在思政课精准教学中的规范化应用，确保思政课教学的正确方向。一方面，AI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必须遵循教育伦理与数据隐私保护原则，随着AI技术的广泛应用，学生的个人信息、学习数据、思想动态等大量敏感信息被采集和存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学校应制定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与安全防护机制，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的边界与规范，建立数据安全审核机制与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对智能教学平台的安全防护，防止学生信息泄露、被篡改、被滥用。另一方面，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教师需要主动驾驭技术，而不能仅仅是被动适应，更不能让技术取代教师的核心作用[5]。要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是服务于教学目标的有效工具，其核心价值在于辅助教师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不能替代教师在价值引领、思想启发、情感关怀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其核心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需要教师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情感共鸣与思想碰撞，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因此，教师应始终处于教学的主导地位，合理运用AI技术辅助教学，而不是被技术牵着走。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理论阐释、价值旨归和优化路径的三重向度研究，进一步明晰了AI技术能够有效赋能思政课精准教学改革，为破解传统思政课教学难题、提升教学针对性与实效性提供强大支撑。AI赋能社会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是回应时代要求、深化课程改革、践行“以生为本”理念的必然选择，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因材施教”与“精准滴灌”，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未来，高职院校应进一步深化AI技术与思政课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在技术支撑方面，持续优化智能教学平台功能，拓展数据采集维度，提升数据分析的精准度与智能化水平；在队伍建设方面，建立常态化的数智素养培训机制，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激励教师主动开展教学创新；在风险防控方面，健全教育伦理规范与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人文关怀与价值引领，确保AI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健康有序应用。通过多方面的协同发力，推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向智能化、精准化、人本化方向持续发展，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实保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9-08-15(01).

[2]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求是 ,2020(17):4-16.

[3]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N]. 人民日报 ,2024-05-12(01).

[4] 邵晓枫 , 刘文怡 . 智慧教育的本质：通过转识成智培育智慧主体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10):7-14.

[5] 王雷 , 董强 , 祝晓璇 . 高校思政课对大学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及教学改革的建议 [J]. 河南农业 ,2023(18):34-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校级教改项目“虚拟仿真技术赋能三峡库区涉农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质效提升研究”（XJ251008）；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2025—2026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大数据技术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cqgj25283C）。

（作者系重庆三峡职业学院讲师）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优化与实施策略

杨　怡　周晶玲　张　获　王树培

摘要：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在落实该任务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课程内容科学性、时效性对育人质量影响较大。受社会转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需逐渐转型为“价值引领”，通过体系化重构、精准化实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深度融合。本文基于立德树人视域，分析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的逻辑规范、内在要求，探讨具体的实践路径与实施策略，以提升育人效果，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立德树人；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实施策略

一、引言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思政课可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1]。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革、多种文化的碰撞，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带来了挑战，部分高校存在课程内容与时代发展脱节、不符合学生需求、难以应用于实践等问题，影响教学效果。本文在立德树人视域下，重构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探讨与内容相匹配的实施策略，促进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新时代教育方针。

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优化的逻辑遵循

（一）理论逻辑

立德树人的理论根基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时，需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学内容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实践力量。立足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核心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构建教学内容，避免内容碎片化、教条化[2]。

（二）价值逻辑

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是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高校需立足立德树人核心重构教学内容，在其中融合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并通过梳理历史、剖析现实、展望未来等维度强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的必然性、合理性[3]。创新教学模式，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学生在理解理论的同时自觉践行。

（三）实践逻辑

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时，需坚持问题、需求导向。高等教育需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等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时代议题，增强课程内容的针对性、时代感[4]。重构教学内容时还需关注学生的成长需求，多关注学生的学业发展、职业规划、人际交往，结合理论知识、学生实际需求，使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更加贴近，促使理论解惑、实践赋能统一发展。

三、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优化的内在要求

（一）鲜明的价值导向性

高校思政课本质属性为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立德树人视域下教学内容重构仍需以此为核心要求。思政课核心功能为价值引领，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个环节、模块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追求。设置教学内容时，需选择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内容；避免抽象化、教条化的内容，融会贯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抵制错误思想，树立远大的奋斗理想[5]。

（二）深厚的理论系统性

立德树人任务的完成需要坚实的理论作为支撑，高校须具备深厚的理论系统性以完成思政课内容重构，避免因内容零散化、碎片化而降低育人效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构建完整的理论知识体系，并衔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逻辑清晰严密的理论内容，促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脉络；增强理论内容之间的关联，促使不同思政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互补，避免重复讲授、内容脱节；将理论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相结合，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增加教学内容理论深度，引导学生使用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6]。

（三）强烈的现实观照性

思政课需立足现实情况，强烈的现实观照性可引发学生共鸣、提升育人效果。基于立德树人视域重构教学内容，需与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现实需求密切联系，构建课程内容时，需在其中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富裕实践等议题，用国家发展成就、社会进步实践辅助教学，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聚焦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就业焦虑、价值选择迷茫等现实困惑，采用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理论阐释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解开谜团。多关注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及时回应社会热点，传播正确价值观，帮助学生明辨是非。

（四）素养培育的自觉性

立德树人目标为培育全方位发展的时代新人，高校思政课进行教学内容重构时，需培育学生自觉素养，同步完成传授知识、提升素养。需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展开教学内容重构，强化其思想政治素养、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政治判断力和领悟力；要重视学生的道德素养，在课程内容中融入“四德”教育，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思政课教学还需培育学生的法治、创新、责任素养，通过讲解科技创新、中国建设实践等案例，帮助学生形成法治意识，提升创新思维，并增强社会责任感。设计教学内容时，需融入实践案例、探究议题、体验式内容，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参与实践，以提升综合素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7]。

四、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优化路径

（一）纵向贯通

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时需打破时空限制，使内容纵向贯通。强化社会主义发展史教学，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增强历史自觉、自信[8]。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教学内容中加入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实践议题等内容，分析中国道路的优势、意义。结合青年学生的使命担当与民族复兴蓝图分析新青年的时代责任、机遇，激发学生的奋斗热情、精神。

（二）横向融合

横向融合可打破学科壁垒、提升教学内容系统性。整合理论内容，有机衔接各类思政课程的核心内容，避免重复讲授。拓展深化实践内容，在教学内容中纳入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实践活动，促使理论、实践教学融合。在思政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深入挖掘育人元素，增强思政课的文化底蕴、精神力量。

（三）精准分层

不同专业、年级学生具有不同的认知层次、成长诉求，需按照分层分类原则进行教学内容重构。通识层面，可构建面向全体学生的核心内容模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培育等内容融入其中，强化学生的思想理论基础。专业层面，可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质开发不同的思政内容，如在工科专业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在法学专业教学中融入法治精神、在历史专业教学中融入文化传承责任，推动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的同步发展，促使思政价值嵌入专业知识传授过程中。特色层面，依据高校办学定位、地域特点，深入挖掘学校与地方的红色文化资源、区域产业发展资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例如依据红色资源开发特色研学内容、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思政教学案例，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教学内容体系，提升教学针对性、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五、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优化的实施策略

（一）创新教学方法

科学的教学方法可支撑内容的有效实施，立足重构后教学内容特点促使教学方法转变为双向互动模式。其一，深化专题式教学改革，将重构后的教学内容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青年担当与民族复兴”等关联性强的专题，各专题围绕核心问题设定探究方向，通过组织小组研讨、主题发言等形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理论建构过程，摒弃“满堂灌”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9]。其二，优化案例式教学模式，构建“时代典型 + 地方特色 + 专业关联”的案例库，既遴选大国工匠、时代楷模、脱贫攻坚先进事迹等全国性典型案例，亦深度挖掘地方红色资源、行业优秀人物、校园身边榜样等本土化案例，同时融入问题导向思维，遵循“案例呈现—问题提出—理论分析—解决方案”的逻辑链条，引导学生运用思政理论破解实际问题。其三，升级信息化教学手段，充分依托智慧教学平台、虚拟仿真技术及短视频等新媒体载体，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其四，推广体验式教学，结合教学内容组织红色研学、企业调研、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通过带领学生走进革命老区体悟初心使命、深入科创企

业感知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引导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深化理论认知与价值认同，实现“知行合一”。

（二）建好师资队伍

教师是教学内容实施的核心主体，师资队伍素质直接决定育人实效，需紧扣教学内容重构与实施的核心需求，系统打造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着力提升思政课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构建多层次系统化培训体系，通过专题研修、学术研讨、实践历练、教学竞技等多元形式，助力教师精准把握教学内容重构的核心要旨，增强理论阐释深度、教学创新能力与实践指导效能；鼓励教师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支持其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挂职历练积淀实践经验，将实践感悟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切实增强思政教学的生动性、说服力[10]。着力推进协同育人队伍专业化建设，破除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协同壁垒，组建跨学科教学协作团队，通过常态化集体备课、专题教学研讨等协同机制，联合开发与专业深度融合的思政教学资源，探索“思政 + 专业”融合教学范式；聘请行业专家、革命先辈后代、优秀校友等担任兼职思政课教师，充实专业化师资力量，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学术视角与实践经验支撑。健全教师成长激励机制，将教学内容重构成果、教学创新成效、育人实效等核心要素纳入职称评聘与评优评先的核心考核指标体系，加大对优秀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充分激发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兼顾教师身心健康发展，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育人氛围，为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三）完善评价机制

科学的评价机制是保障教学内容落地、提升育人实效的关键手段，需打破单靠考试成绩定优劣的传统评价模式，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多元评价体系不仅要包括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评价，还需涵盖学生的道德品质、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等多个维度。具体而言，可从课堂表现、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报告、社会实践反馈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综合成绩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体系更加注重过程与结果的结合，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在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下，学生的思政课教育成果应成为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制定明确的德育评价标准，将学生的道德行为、价值观践行等纳入评价体系。例如可设立“道德实践”课程模块，引导学生以实践行动践行道德规范，将实践成果纳入德育核心评价体系；教师结合常态化日常观察与学生自评、互评等多元评价维度，全面客观研判学生德育成效，进而激励学生持续提升道德素养。

（四）健全保障体系

思政课教学内容重构、有效实施与健全的保障体系具有较大联系，可从组织、资源、制度等多个维度强化教学基础。强化组织保障根基，高校需引领思政课建设，在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年度重点任务中纳入教学内容重构、教学实施工作，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系统化梳理解决思政课内容重构、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推进等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支撑思政课程的改革发展。强化资源保障支撑，高校应设置专项研究经费，推动思政课建设，促进教学内容重构，研发特色教材、创新教学方式、建设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整合校内、校外优质资源开发智慧教学平台，构建多元化育人体系，保障思政课的改革发展。高校需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明确思政课教学内容、方法、考核等环节的管理规范，有序开展教学，并构建思政课教师激励机制，在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绩效考核中纳入教学创新成效、科研转化成果、育人效果，给予优秀教师奖励，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创造性，提升育人质量。

六、结语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优化重构与实施为系统性工程，需立足理论、价值、实践逻辑构建教学内容体系，并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建好师资队伍、完善评价机制、健全保障体系等路径推动思政课教学转型，以培养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唐云豪，王立军.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公共体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问题及创新路径 [J]. 武术研究，2025,10(01):81-84.

[2] 罗茂，刘萍. 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5,33(10):146-149,163.

[3] 孙丽敏.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J]. 现代园艺，2025,48(02):190-192.

[4] 王琦. 立德树人视域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25,46(04):130-133.

[5] 刘利峰，张妍，庞雪林，等. 立德树人理念下高校足球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路径探析 [J]. 当代体育科技，2025,15(01):157-160.

[6] 阚欣宇. 立德树人视域下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与实践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4,40(02):19-21.

[7] 蒋金蒙.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J]. 黑龙江教育，2025(12):29-32.

[8] 钱孙处.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径 [J]. 中国军转民，2024(12):180-181.

[9] 孙佳蕊.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J].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0):94-98.

[10] 邱梅. 基于立德树人任务视角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成效评价研究 [J]. 才智，2024(15):49-52.

（作者单位：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机遇、价值与创新路径研究

周长萍

摘要：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具有引领思想、沟通情感、传递信息等多种功能。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思政课教学改革，其在整合资源、模式创新、优化评价中具有明显优势，可增强思政课育人效果。但数字化技术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认知偏差，师生素养不同，且具有数据安全隐患，可影响到数字化育人效能。基于此，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现实困境，以构建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纾解路径，推动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数字化；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现实困境；纾解路径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高校思政课教学加快变革。数据技术不受时空限制，思政课通过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融合，改变了教学资源呈现方式，推动思政课从“单向灌输”转为“双向互动”[1]。但思政课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多种问题，可影响到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因此，分析数字化为高校思政课带来的机遇，了解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并构建疏解路径，以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大机遇

数字化技术具有交互性、高效性、包容性，可增加高校思政课教学活力，全方位整合教学资源、构建教学模式、优化评价体系，发挥高效的育人作用。

（一）整合思政教育资源

传统思政课教学主要依赖于教材、地域资源，内容更新缓慢、资源分配不均匀。数字化技术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传播能力，不受时空限制，可建立“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结合的思政课教育资源。采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党史文献、红色遗址、社会热点等资源，形成具备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态的资源库，帮助教师根据需求筛选相关素材，结合现实案例、历史场景教学。通过数字化技术还原长征历程、抗战遗迹，增强学生的红色记忆，让其深入感受和领悟革命精神带来的力量。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促使优质资源跨校流动，偏远地区高校也可通过数字化平台获取精品课程，参与到名师讲座中，实现教育公平性。还可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社会热点思政元素，融入思政教学中，保持思政教育课程与时代发展一致，满足现实需求[2]。

（二）构建沉浸式、个性化教学场景

应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思政教学，可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学模式，建立新型沉浸式、个性化教学场景，提升教学效果。通过 VR、AR 等技术进行沉浸式教学，可创建仿真教学情境，促使学生在参与历史事件中感受思政内涵。使用 VR 技术模拟改革开放关键节点、中共一大召开场景，学生可在互动体验中理解思政理论，激发情感共鸣，凝聚价值认同。通过 AI 技术进行个性化教学，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测试成绩、互动反馈情况，根据学生特点推动针对性教学内容，制定个性化学习路径[3]。对于基础理论薄弱的学生，可推送基础知识点讲解视频，对于思想活跃的学生，可推送拓展性学术资料，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弹幕互动、小组协作工具等数字化载体构建可互动的教学空间，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增强学习效果。

（三）优化思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传统思政课程主要通过期末考试评估教学效果，该评价方式无法及时反馈学生状况，教师不能全面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价值观形成过程。数字化技术可帮助教师评估思政课教学成果，有机融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通过大数据技术采集学生课堂互动数据、

课堂互动数据、在线学习时长、作业完成质量、观点表达倾向，可建立全面评价体系，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思想变化。对学生在讨论区的发言内容进行分析，可了解其核心价值观认知情况；分析学生学习路径数据，可明确学习难点，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精准化评价学生学习情况，可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指导学生自我反思、自主提升，形成“教学—反馈—优化”闭环，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

二、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核心价值

（一）强化价值引领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数字化技术有效突破思政教育传统时空局限，可精准对接时代发展趋势与社会热点议题，强化价值引领的时代适配性；依托数字化平台，思政理论能够转化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呈现形态，切实破解思政教育与现实脱节的核心难题，助力学生深刻认知思政理论的现实指导效能[4]。同时，依托大数据技术对学生思想动态、价值倾向开展精准研判，可聚焦学生思想困惑与认知误区实施靶向教育引导，显著增强价值引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助力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针对网络空间涌现的各类社会思潮，教师能够借助数字化平台快速整合权威理论解读与典型现实案例，精准引导学生明辨是非界限、坚定理想信念根基。

（二）拓展思政教育的覆盖面并提升可及性

数字化技术打破高校思政教育的物理边界，在校学生与社会学习者均可依托数字化平台获取优质思政教育资源，显著拓展思政教育覆盖范围；针对高校学生群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突破传统课堂局限，支持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自主化、个性化学习，精准适配多样化学习需求；面对网络空间涌现的各类社会思潮，教师可借助数字化平台快速整合权威理论解读与典型现实案例，有效引导学生明辨是非界限、坚定理想信念根基。针对偏远地区、基层单位等传统思政教育资源匮乏区域，数字化平台可实现优质思政资源的精准输送，保障更多群体便捷获取高质量思政教育，有效提升思政教育可及性，助力推进思政教育全民化与普及化进程；同时，依托数字化资源可重复利用的核心特性，学生能够结合自身学习需求随时回溯学习内容、夯实学习成果，进一步提升思政教育资源的利用效能。

（三）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传统思政教育普遍存在内容抽象化、形式单一化等现实问题，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热情；数字化技术依托多元化呈现载体，实现抽象思政理论的具象化转化与生动化表达。例如，通过短视频、动漫、互动式教学游戏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思政知识，借助 VR、AR 技术构建沉浸式教育场景，引导学生在趣味性学习与沉浸式感官体验中接受思政熏陶，切实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数字化平台的互动特性，赋予学生观点表达与深度讨论的自由空间，教师可实时回应学生诉求，在拉近师生情感距离的同时，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感染力，保障思政教育入脑入心的实效；此外，数字化技术为跨校、跨区域思政教学协作搭建支撑桥梁，助力学生接触多元教学内容与差异化教学方法，拓宽学习视野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主动学习的内生动力。

（四）实现思政教育的科学化与精准化

数字化技术正为思政教育革新筑牢科学方法论根基，依托大数据分析对学生学习规律、思想动态与成长需求的精准洞察，可将隐性需求转化为量化教学决策支撑从而根除传统教学盲目性，其深度渗透让教学内容贴合认知特质、方法适配学习偏好、评价依托多维动态数据，既实现因材施教与成效评估的客观全面，更让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兼具科学深度与实践温度[5]。数据驱动的思政教育范式，可实现教学决策精准化落地、教学实施精细化推进与教学评价科学化实施的协同增效，持续提升育人实效；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入，能够对思政教育整体成效开展动态追踪与系统性评估，将评估成果转化为政策制定与优化的核心依据，推动思政教育体系实现迭代完善与质量跃升。

（五）助力思政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数字化技术为思政教育的传承赓续与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通过数字化转译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等优质思政资源转化为可存贮、可传播的数字形态，能实现这类精神文化资源的永久留存、广泛辐射与代际传承，技术创新持续为思政教育的模式革新、内容优化与方法突破注入核心动能，推动其在坚守并传承优良传统的前提下精准适配时代发展诉求，完成自我迭代升级，始终维系鲜活的育人生命力。

三、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创新路径

（一）树立“技术赋能 + 价值引领”理念

数字化转型可受认知变革影响，可通过理念引导、实践示范消除技术认知误区。高校可开展专题培训、学术研讨活动，深化教师对数字化技术的认知，全方位变革教学理念、模式、评价体系，明确技术的使用成效[6]。构建数字化教学示范机制，创新教学课程，在其中加入新型技术，通过公开课、教学沙龙传授教学经验，消除教师错误观念。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形成批判性思维。

（二）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建立分层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教师层面，在教师继续教育体系中纳入数字技术培训，

内容包括基础操作技能、新型技术应用、数据解读能力、伦理判断能力，并建立思政教师与技术人员常态化协作机制，通过定期研讨会、联合攻克项目等形式促进知识互补、协同创新。

学生层面，在思政课程体系中融入数字素养教育，增设“网络伦理”“信息辨别”“算法认知”等教育内容，采用小组辩论、案例分析等形式培养学生伦理判断能力、信息筛选能力。

（三）建立规范保障制度

完善制度保障可有效开展数字化教学，构建全流程规范体系，保障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方面制定标准化管理方案，明确数据采集、储存、销毁流程，禁止采集与教学无关数据，采用先进技术实现资源共享、模型训练，避免泄露数据；设计智能入侵检测系统，并制定数据安全应急预案。由思政教师、法学专家、技术人员及学生代表共同组成伦理审查委员会，在数字化思政教学项目开展前进行审查，评估项目的真实性、价值导向正确性，保证输出内容的权威性、正确性。

（四）深度融合：打造“内容创新＋技术适配”的教学生态

推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需以内容重构、模式创新、平台整合为核心支点构建协同育人生态。内容重构层面，要贴合数字化传播直观化、互动化的鲜明特性革新思政教学内容，借助数据可视化、情景化交互等具象化手段，把原本抽象的理论内核转化为可直观感知、能深度参与的教学资源，既让专业内容的严谨性丝毫不减，又凭具象化表达消解理论的晦涩感。模式创新层面，搭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框架，线下课堂聚焦价值引领、深度研讨等核心环节增强认知，线上平台发挥资源推送、个性化辅导、互动交流等延展功能，形成“线下强沉浸、线上广覆盖”的互补形态。平台整合层面，打通“信息孤岛”，搭建统一的思政数字化教学平台，让教学资源、学习数据与评价结果实现无缝贯通，同时建立校际协作机制，联合打磨适配数字化教学的优质资源，在资源共享中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共建共赢的思政教学资源生态。

（五）构建动态评价体系

深度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效能，以数据要素驱动思政课评价范式深度转型，围绕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路径三大核心命题优化思政课评价机制。搭建多主体协同评价体系时，可依托数字评价工具开发线上自评问卷，问卷聚焦知识掌握精准度、价值认同坚定性、实际操作有效性设计，引导学生对照问卷深剖自身表现、梳理优缺点，这一过程让评价跳出形式化窠臼，成为学生深化自我认知的抓手，助力靶向改进提升，清晰凸显其在评价体系中的关键地位[7]。优化校内多元主体评价机制时，需为学生、任课教师、辅导员及教学督导等角色科学划分评价权重，同时延伸外部评价触角，搭建与实习基地、用人单位的数字化反馈链路，将其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养、行为规范的真实反馈系统融入评价体系，通过内外协同发力筑牢评价的公正客观根基。拓展评价内容维度以实现知识、价值与能力的协同评价，在强化知识运用能力评价的基础上，依托数字技术动态捕捉学生学习平台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倾向，教师定期跟进研判并将价值认知与行为转化纳入评价范畴，同步设置思政主题短视频自主创作等实践任务，推动学生在实操历练中增强数字素养与创新表达能力。最后需平衡量化与质性评价，加大过程性评价权重，借助数字技术建立贯穿学习全程的档案，细致留存学生课堂内外的各类学习表现，而评价与学习平台的智能即时反馈，能让教师精准优化教学策略、灵活调整内容呈现、合理规划教学节奏，通过精准施教推动教学效果升级与学生全面发展，切实提升育人质量。

四、结论

数字化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资源整合、模式创新、评价优化带来了机遇，并可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系统化梳理科学理念，提升师生素养，并筑牢安全防线，发挥深度融合育人作用，为社会培养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时文龙 .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多维探析 [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03):143-151.

[2] 王晓红 .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金课”建设的逻辑理路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17):37-40.

[3] 万淼 , 冯欣欣 , 张盈盈 .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教学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04):76-83.

[4] 陈琳 , 戴建兵 . 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工作内在逻辑的“变”与“不变”[J]. 黑龙江高教研究 , 2025,43(11):108-112.

[5] 沈强 .ChatGPT 类技术模型助力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风险与路径探析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80-92.

[6] 任艳妮 . 教育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政课“融合式教学”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5,44(01):67-73.

[7] 李国泽 , 杨玉仁 . 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与路径探究 [J]. 甘肃教育研究 ,2025(19):70-73.

（作者单位：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社区议事治理法治化构建研究

谢青辰

摘要：社区议事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抓手，其法治化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工程。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指引下，本文聚焦社区议事治理这一核心环节，探讨其法治化构建的实践路径，即通过设计一套系统性、操作性的议事治理法治化制度，将民主协商与法律程序有机融合，提升社区议事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与公信力，在法治框架与民主程序中公正、有效、平和地化解社区的公共矛盾与利益纠纷，为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社区议事治理；法治化构建；基层治理现代化；制度框架；程序规范

一、引言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根基在基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其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衡量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指标。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要把重要的社区议事治理转入法治轨道，确保议事机制的权限合法、程序透明与结果有效。同时，鉴于社区事务兼具群众自治性与公共管理性的双重特征，其协商运转制度须在恪守法律红线的前提下，充分融合民主协商元素，保障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因此，本文秉持推进法治化的首要之举就是构建法治机制的理念，且立足理论到实践的转化需求，依据社区事务的性质（即可自主处理事项与需协同公权力部门处理事项），将社区议事治理区分为“一般性议事”与“特殊性议事”两类，并分别建构相应的法治化操作框架，为社区议事治理法治化工作提供清晰、实用的指引。

二、构建一般性社区议事的“1—3—6”模块式的法治化框架

法治的基础是合法性，议事治理法治化的根本，也就是保障议事治理行为合法性，即保障议事协商运转具有合法的权限、程序、效力。当然实际操作中要更好地达到此目的，构建治理绩效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亦须与时俱进，借助当下社会数字化科技添砖加瓦。现经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案例和地方市民服务手册的考量、筛选、归纳，对社区可以建立处理情况的议事机制，提炼出“1 条底线、3 张清单、6 步流程”的法治化操作模块，公正、有效、和谐地化解在社区里发生的矛盾纠纷，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法治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1 条底线

为恪守议事活动全过程合法合规的底线，对议题目录前置审查便至关重要。不仅需要排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物业管理条例》、其他消防相关法规等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内容，还需要保持与国家政策导向的一致性 [1]。当然，参与议事的主体资格亦需明确，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规定，保障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及相关职能站所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并且居民代表的比例通常不应低于总数的一半，以体现自治广泛性。同时对于议事形成的成果，特别是涉及费用收取、公共空间改造或增设居民义务等重要决定，可引入社区法律顾问或驻点律师进行合法性确认；对于部分关键决议，还有必要通过司法确认或公证程序来强化其法律约束力，防范事后争议。

（二）3 张清单

为使合法性原则落地为具体工作指引，清单化管理则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工具。即通过制定与运用下列三张核心清单，可以将抽象的法治要求转化为社区工作者和居民易于理解与执行的操作标准。

1. 权力清单

权力清单的功能在于清晰界定社区议事会议的权力边界，明确划分其有权自主决定的事项范畴、可以向上级或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建议的事项领域以及不予讨论或作出决定的事项类别 [2]。例如，小区内部停车管理方案的制定属于可议决范围，而涉及燃气管网改造等专业性强且关乎公共安全的工程事项，则明确超出其权限，必须由专业部门负责，防止因无权而逾法的负面影响发生。

2. 程序清单

法律谚语有云：“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正义的

保障。”因此，不仅不能忽视，而且应当充分关切规范议事活动过程的程序清单设置，使之详细规定从会议通知发布、会议过程中的记录方式与要求，到决议形成后的公示期限与渠道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流程与时间节点。这些程序性规定不仅是议事规范运行的依据，也应成为上级部门对社区工作进行有根有据的监督考核指标。

3. 责任清单

众所周知，治理中滋生的是非混淆问题，往往在于责任不清。为此，要令社区议事治理法治化落地开花，就少不了一份责任清单。其着眼于决策之后的执行与问责环节，明确“谁负责组织会议、谁负责具体执行决议、谁负责对整个过程的监督”这个问题的结果，将任务分解到具体主体，如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并将职责履行情况纳入年度依法治理考核体系，激活对执行不力情形的相应责任追究机制[3]。

（三）6 步流程

一个结构完整、环环相扣的流程设计是关系社区议事从意见征集到决策落实形成治理闭环的关键。而下列制定的六个步骤，显然概括了社区议事之基本操作的序列：

1. 议题的采集与初步筛选

社区应通过网格员、楼道长、线上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居民关心的问题与诉求，收集到的议题需及时交由社区法律顾问或驻点律师处理，由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法性的初步判断与过滤。

2. 确定参与会议的主体与必要的专家支持

在确保议题相关方的参会的基础上，于会议前随机抽取若干名专家列席（社区可以建立包含法律、工程、财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库），为议事活动提供专业技术与法律层面的双重咨询，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适当性。

3. 开展会前协商与信息公示

会议组织者应提前足够的时间，通过社区公告栏张贴公告、居民微信群推送、特殊人群上门、电梯电子屏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渠道，同步公布待议事项的主要背景资料、初步拟定的解决方案以及会议的时间地点，尤其重要的是确保当事人及时、准确地知悉相关内容。充分保障居民的知情权与事前预备的可能，彰显公平、公信，阳光透明。

4. 组织正式议事会议

担任会议主持人的人选，必须遵守回避与中立规则，不仅是社区内具有一定威望的社区负责人，而且要防止其立场偏颇，不能与所议事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以确保有效引导会议进程。同时，为提高议事效率与审慎性，对与会者的发言时间与次数要进行适当限定，在表决前引入短暂冷静期，保障其综合思考和独立评价。整个会议过程记载，要采取同步录音录像与专人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并鼓励运用存证技术进行固定，以防记录被事后篡改或遗失，确保过程的可追溯性。

5. 进行表决与结果公示

涉及社区重大利益事项的表决机制，宜采用兼顾参与广泛性与共识性的“双三分之二”原则，即要求出席本次会议的人数达到应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且投赞成票的人数占实际到场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此作出的决议方为有效通过[4]。表决结果要当场宣布，并在会议结束后，即时在小区的显著位置及线上平台全面公示，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在具备成熟技术的条件下，要与时俱进，认可线上参会方式的合法性，明确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6. 决议的执行与监督

建立决议执行台账，清晰记录每一项决议的具体内容、指定的责任单位或个人、明确的完成时限以及相关的资金预算，并定期通过社区居民微信群等渠道，推送社区执行进度，保持信息的公开顺畅。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定期对重大决议的执行情况与资金使用，进行联合审计与效果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实际利益挂钩，如物业服务企业的星级评定、业委会成员的津贴等。对于无故拖延、变相不执行或执行变形、走样的行为，社区组织应依据相关规定，采取约谈、通报等督促措施。若其仍不改正，社区则可释明、支持利害关系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或提起民事诉讼，借助国家司法力量强制责任人履行义务，从而维护社区公共意志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完成从“议”到“决”再到“行”的完整闭环。

简言之，法治嵌入社区议事治理，应抓住“议题、主体、结果”为导向的一条合法性底线，配套三张清单、六步流程，塑造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降低矛盾纠纷处理成本，以强化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价值共创和尊崇法律的观念，促进社区议事务实、合法、有信誉。

三、构建触碰行政权力类的特殊性社区议事法治化框架

社区议事在实践中，回避不了面对配合、联合行政强制执法的特殊情况，这也是复杂且棘手的问题，如消防安全整改、违法建筑拆除等。诚然，社区组织没有执法权限，但涉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类别的事项，依法需要履行风险报告、执法协助、整改监督与人员救助等方面职责，而这些工作成效无疑关系到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与居民权益的保障。因此，需顺理成章地将此类议题纳入社区议事治理范畴，构建法治化协调治理机制。不过，此时需关注的重点，是精准把握社区自治协商与国家行政执法的权力边界。其要求社区在积极履行协助执法、反映民意职责的同时，必须严格避免越权决策，以防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围绕治理合法轴心，建立一套区分不同情况和不同方法方式的协调治理机制。

（一）精准定性识别

不言而喻，有效协调的基石是对事项性质的准确法律定性。为此，社区要建立由法律顾问与街道司法所共同参与的快速识别机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及时出具专业法律意见，将事项区分为三类：一是完全属于行政机关专属权限的“纯行政强制事项”；二是兼具行政强制与居民配合要素的“混合型事项”；三是不涉及强制手段、可完全由社区自主处理的“常规事项”。此项分类是后续所有应对策略的法律基础，决定着社区议事的权限与方式。

（二）会前分流准备

在启动正式议事程序前，须对被识别为涉及行政强制的事项进行审慎的“分流”处理。第一项工作是向居民发布清晰的法律告知书，明确说明事项的行政强制属性、社区议事会议的协商性定位及其与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关系，着力疏导居民预期；第二，社区须主动将情况通报对口行政执法部门，并正式邀请其派员列席后续协商会议，由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法律、政策解读与程序说明；第三，会议的议程设置必须将讨论范围限定在如费用分摊、施工配合方式等属于居民自治范畴的非法定内容，明确排除“是否执行强制措施”等执法核心问题的表决。

（三）会中协商定位

会中协商采取全程录音录像的双重模式记录，确保过程能够追溯与复查。会议所形成的成果文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决议”，而是一份旨在客观反映各方协商情况与社区居民意见、建议的纪要。不过，该纪要需由在场的行政执法人员、社区代表与居民代表共同签字确认，并须在文中明确载明，其内容仅供行政机关决策参考，不具备阻止或替代法定行政强制决定的效力。此举有助于在法律上界定会议成果的属性，厘清社区作为与不作为的是非责任。

（四）会后双轨执行

会议结束后的事项处理，应遵循“行政”与“自治”两条并行且偶有交叉的路径展开：在行政线上，执法机关继续依照《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立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决定等法定程序独立履行其职责，居民若对行政决定不服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在自治线上，社区组织将议事会上形成的关于居民层面如何配合的具体建议方案，按照社区自治规定程序提交业主大会等进行表决，形成正式的配合整改方案以备执行。不过，无论路径如何，均需申明“居民自治组织内部的表决结果，不管通过与否，均不影响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其强制职责；若因配合方案未通过而导致执行成本增加，相关法律后果与费用仍由法定责任人承担”。

（五）配套保障措施

为支撑流程有效运行，离不开将配套完善的标准化文书工具包作为保障，其中包括安全隐患报告单、文书送达回证、现场见证笔录、事后回访表等必要表单。一是应将复杂流程提炼成直观的图表指南，便于工作人员快速掌握；二是应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建立专项台账跟踪整改情况，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并将处理结果形成闭环报送备案；三是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与司法所、应急管理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培训机制，通过定期开展情景模拟演练，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现场应对与风险防范能力。简言之，社区议事治理中的议题，除一般性之外，实际上还有涉及行政强制执行类事项如何处理的特殊情况，对此显然不能“绕道走”，而是要“民有所呼，必有所应”，针对这些“硬梗”着力破题。此中关键是设计针对不同情况积极转化并合法可行的解决机制，既能让行政机关依法强制顺利落地，也能让居民权益得到及时救助，体现社区议事治理的法度和温度。

四、结语

古人云：“法者，治之端也”[5] 这句话，尽释法与治的密切关系，从中不难看到社区议事活动的法治化转型，既是治理发展的必然，也是一项构建系统性规则与实践性能力的复杂且巨大的工程，且其成功绝非依赖于单一要素，法律规范、内部规则、程序设计与技术工具等多重要素的协同支撑，尤其是国家立法提供的强制性规范，为社区议事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基本底线，是一切活动的根本前提。

本文通过区分一般性自治议事与特殊性涉权议事两类场景，搭建分层分类的法治化运行框架，以清单化管理明晰权责、以流程化规范严控程序、以闭环化监督压实责任，有效破解了社区议事“议而不决、决而难行、行而无责”的治理顽疾，推动基层议事实现“议之有据、决之合规、行之有效”的良性循环。依托数字化存证、第三方监督、常态化普法等多元赋能手段，进一步保障了议事全过程公开透明、可溯可查，持续提升社区治理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持续深化社区议事法治化改革，不断优化自治与行政协同机制、完善程序规范、压实治理责任、培育法治文化，持续激活基层自治活力、规范基层治理秩序、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为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根基、推进基层法治建设提质增效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阴雯 .JT 医药公司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D]. 长春 : 长春理工大学 ,2019:3.

[2] 胡慧馨 . 法治框架下的社区廉政路径 : 城市基层社区运行机制再塑造 [J]. 河北法律职业教育，2024,2(12):74-79.

（下转 168 页）

乡村振兴视域下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质量提升路径探析

杨 玲

摘要：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呈现出多样化与结构性并存的特点。研究表明，就业质量不仅取决于岗位数量，更与能力匹配度、生活保障水平、职业成长通道和激励机制紧密相关。本文从高校毕业生的能力结构、基层岗位特性以及职业发展诉求出发，深入分析了当前就业环境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揭示了岗位契合与成长机会在提升就业质量中的核心作用。基于这些分析，提出具体路径：包括能力培养、工作生活支持、职业晋升通道完善、激励机制设计以及校企乡村协同培养等策略。通过这些路径，高校毕业生在基层能够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本文意在从系统性和操作性两个维度，提供针对性建议，使基层就业不仅是数量的满足，更是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乡村振兴；职业能力；就业质量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基层岗位是地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基础功能的承载者，也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道路、能力成长的重要因素。目前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岗位的时候会考虑到能力是否匹配、成长空间是否足够、生活条件是否舒适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一起形成了基层就业质量的现实情况。理解这一现象要从毕业生自身职业需求和基层岗位结构特点两方面入手，分析岗位选择的内在逻辑以及它对就业稳定性、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本文试图对以上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实施的策略，以期提高基层就业质量、优化人才结构，进而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概况

（一）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现状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总量不断增多，但其结构也趋于多样化。毕业生分布到教育、乡村管理、农业技术推广、社区服务等各个领域，各地区岗位密度也有所不同。毕业生在选择基层岗位的时候，不只看重岗位本身是否合适，更看重今后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虽然岗位数量不多，但是因为岗位内容符合毕业生的能力、兴趣，所以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另外一些岗位存在技能要求与毕业生能力不符的情况。基层就业现实状况是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映，也是高校毕业生在乡村就业时考虑职业价值、成长机会、生活条件等因素的结果。

（二）基层岗位对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与价值

基层岗位的价值不单是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更是职业能力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毕业生到基层可以直接从事管理、公共服务、技术推广等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培养具有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综合判断力的人员。岗位吸引力包含职业发展的机遇、多样的职业发展途径，高素质的毕业生可以在岗位上慢慢积累经验，形成一个明晰的职业发展路线。基层单位吸引、留住毕业生不仅可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还可以改善人才结构和提升组织能力。

（上接 167 页）

[3] 陈会广，杜佳琦，管红良，等. 小微权力配置与网格化管理：基于社会治理体系的村级宅基地协管制度创新 [J]. 土地经济研究，2022(02):1-30.

[4] 王雪珍. 新时代社区精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 [J]. 湖湘论坛，2019,32(04):94-103.

[5] 胡佳. 法者，治之端也——红色法治史话 [J]. 中国老区建设，2021(08):9-18.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二、影响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就业岗位匹配与能力契合度因素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之后，岗位是否对口、能力是否满足岗位要求、满意度如何等都会影响到工作效率、员工的满意度以及长期的留任情况。基层岗位一般会包含管理、技术执行以及协调沟通等诸多方面的能力要求，然而毕业生所具备的学科背景同岗位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或者是使毕业生的某些才能不能得到完全发挥，或者是某些毕业生面临更大的能力需求压力。能力同岗位不相匹配，也会对毕业生职业信心、工作积极性造成影响。提高匹配度要从教育阶段开始就做好专业知识和岗位要求的衔接，入职前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使毕业生能理解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1]。

（二）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影响因素

基层岗位就业质量不单是工作内容决定的，生活环境、社区条件也会对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基础设施、交通便利、医疗保障、生活成本、社区互动水平都对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心理适应性起着重要的作用。生活条件不好，会使岗位的吸引力降低，进而影响到毕业生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满意度。创建健全的工作生活支持体系，安全方便的住宿设施、稳定的收入保障、便捷的交通服务以及基本的医疗保障等，能够较好地减轻毕业生的生活负担。社区文化、社会支持网络等都会对毕业生的社会认同、心理归属感产生影响。环境条件的改善一方面可以保证基层人才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也能加强毕业生对岗位的长期投入以及职业责任感。

（三）职业成长与技能提升的制约因素

基层岗位的职业发展通道以及技能提升机会，会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岗位结构单一、培训资源匮乏或者晋升通道不畅通，会造成毕业生的能力无法得到提升，职业发展受阻。技能提升受阻会阻碍个人能力的发展，也会降低对岗位的认同感以及留任的意愿。建立系统的、以岗位任务为起点、以能力培养为途径、以晋升通道为终点的规划体系，使岗位任务、培训资源、晋升通道三者形成闭环，是提高基层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岗位要给予多方面的能力发展机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都要配备，并且要定期举办培训以及能力评定。

三、提升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质量的路径探索

（一）加强职业能力培养与岗位适应训练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后所具有的职业能力以及岗位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以及就业满意度。职业能力培养不能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还要包含综合素质、组织协调能力、问题分析能力、沟通能力等诸多方面。根据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高校和基层单位可以共同制定定向培训方案，使毕业生在入职前就对岗位的要求有充分的认识和技能储备。培训内容包含岗位操作规程、政策业务规定、数据处理手段、应急处置办法等内容，使毕业生能迅速适应工作环境。岗位适应训练不仅是完成任务，也能使毕业生形成稳定的基层工作行为模式和心理承受能力，能适应基层岗位上的压力、保持高效积极的工作态度[2]。训练形式多样，线上课程、模拟任务操作、集中工作坊、跟岗实践相结合，使理论知识和实操经验相结合。从长远来看，该种能力的培养、适应训练可以成为毕业生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在基层岗位上既能做好本职工作又能获得发展空间和自我价值感，从而降低离职率、增强岗位稳定性。同时，利用定期测评、反馈机制可以跟踪培训效果，及时调整培训内容、方式，使培训与岗位需求保持动态匹配，实现能力与岗位的双向适配，为基层单位源源不断输送高质量人才，为乡村振兴筑牢人才根基。

（二）完善基层工作生活支持体系

基层岗位的就业质量不但与工作内容有关，而且与生活保障、环境条件密切相关。毕业生在基层长期工作需要稳定的住房条件、交通、医疗保障、文化生活和社区交往等各方面支持。完善工作生活支持体系要依靠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面的协作，依靠资源整合来提供系统化的服务。住宿条件要保证安全、方便、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以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或者住房补贴，从而减少毕业生在基层的生活成本。交通保障需要覆盖主要的通勤线路，提高出行效率，减少工作时间的浪费。医疗服务要满足基本的健康需求，给予心理上的支持以及健康教育，重视毕业生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基层文化、社区活动要系统化创建，让毕业生产生社会归属感、集体认同感，进而对工作的稳定性和岗位认同感起到直接的作用。工作生活支持体系还要具有灵活性和可调整性，根据不同的岗位特点、地区条件、毕业生需求等动态地改变服务内容。在偏远乡村提供集中式的生活设施以及在线的远程教育资源，使毕业生能在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构建起完整的支持体系之后，基层岗位既为毕业生赋予了职业的舞台，又给予其稳定的生活依靠以及良好的发展环境，进而加强高校毕业生对于基层工作的信任感、满意程度以及留任意愿，从而为乡村振兴赋予持久的人才支撑。

（三）构建有序的职业晋升与成长通道

基层岗位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由职业发展空间、成长通道的明确程度所决定的。毕业生在基层工作长期的动力来源于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预期以及成长机会的获得。建立有条理的职业晋升通道，要确定岗位等级结构和晋升标准，把能力表现、工作贡献、专业发展同晋升机制直接联系起来，让毕业生知道努力的方向以及成长的节点。晋升通道应包括岗位内部晋升、外部培训、资格认证和职称评定等各个方面，把基层岗位作为职业能力积累、职业生涯发展的阶段。职业

发展通道要重视多方面的能力培养，把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纳入考核范围之内，形成纵向晋升和横向轮岗并行的制度安排，使毕业生在不同的岗位上得到全方位的经验积累[3]。成长通道设计还要考虑到个性化的发展，给每个毕业生提供定向的岗位或者能力提升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动态的反馈与评价体系可以对成长通道的运行情况加以监测，进而对晋升标准以及岗位设置做出调整，保证通道具备实际可行且公正的运作特性。

（四）完善激励机制与激发工作积极性

激励机制对于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质量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既会改变工作的投入程度，又关乎岗位的稳定性以及长久的职业发展。有效的激励体系要融合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塑造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激励架构。从岗位特点、工作绩效、贡献大小出发来设计薪酬增长机制，把薪酬水平同工作付出、技能提高直接联系起来，提升基层岗位的吸引力和留任率。从精神激励的角度来讲，可以对岗位荣誉评定、工作成绩认可以及职业发展规划引导等加以推行，从而增强毕业生对于岗位的归属感与使命感。激励机制还要重视目标导向、能力导向，使毕业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时候能体会到自身的成长与价值体现。机制设计要有动态调整性，根据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毕业生需求等，灵活地改变激励方式，使制度同实际情况相适应[4]。还要建立绩效反馈体系，对激励效果进行科学的测量和定期的评价，把毕业生的意见纳入改进的过程之中，使激励制度更加具有操作性、针对性。建立综合激励机制之后，毕业生在基层岗位上可以获得持久的职业动力和成长信心，进而提高工作品质，增强岗位认同感。

（五）校企乡村联合培养与就业协作机制

校企乡村联合培养和就业协作机制属于提升基层就业质量的有效途径，它把教育资源、企业需求和基层岗位实际融合起来，达成毕业生能力培育同就业岗位需求的高度契合。联合机制设计要以毕业生能力发展、岗位匹配、职业成长为主轴，构建起系统的培训、轮岗实践、协作指导三者相互衔接的闭环。高校在联合机制中担负着基础知识、综合能力的培养任务，以专业课、技能训练、能力评价的方式给毕业生提供能力储备。企业、基层单位参加岗位设计、实操训练，使毕业生在真实的岗位上较快地适应岗位要求，获取一定的实践经验。协作机制要确定好责任分工、资源投入以及评价标准，从而达到各方共同促进毕业生成长、岗位贡献双向提升的目的。具体操作时可以创建校企联合实训基地、轮岗实习体系、定期技能研讨会等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平台。就业协作环节可以开展岗位定向输送、就业指导以及职业规划辅导工作，保证毕业生能够顺利进入基层岗位，并且可以长久发展下去[5]。该机制不但可以提高毕业生在岗位上能力的匹配度、适应性，为基层单位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和能力储备，也可以增强高校课程设计的实用性、针对性，从而形成教育与就业需求的闭环。高校毕业生经由校企乡村联合培养和就业协作机制，在基层岗位上达成能力价值同职业成长的有机结合，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撑，增强基层单位的服务效能和组织能力[6]。

四、结语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一方面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乡村振兴。依靠能力培育、岗位对接改进、职业通道创建、激励体系健全、校企乡村协同机制的完善，达成人才同岗位深度契合的目的，提升毕业生在基层工作的稳定性及满足感。提高就业质量要实现系统性策略和具体操作的协调统一，保证每一个岗位既能保障生计，又能让员工得到成长和发展。本文所提出的路径是从能力、环境、机制、协同四个方面来为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基层单位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并且为高校毕业生在乡村振兴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和职业发展目标提供相应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郑直，孔令海．乡村人才振兴与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分析 [J]. 经济问题，2024(02):91-97.

[2] 李颖，张天仕．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基层就业现状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J]. 农村科学实验，2025(19):20-22.

[3] 阳岱延，谢梦雪，王向基，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医药类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路径研究 [J]. 就业与保障，2025(05):22-24.

[4] 黎扬．安庆市创新开展高质量就业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J]. 中国就业，2025(06):117.

[5] 周晓新．乡村振兴背景下以职业培训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路径研究 [J]. 河北农机，2025(02):151-153.

[6] 柯西钢，杨玲．毕业生基层就业赋能乡村人才振兴：价值、困境与进路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09):146-1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质量评价研究”（GJXY2025N081）；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课题“毕业生基层就业驱动西部乡村人才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SGH25Y2887）；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 2025 年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延安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创新与路径提升研究”（25BSG41）。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

张锦玉

摘要：社区治理涵盖社区党委、政府组织、社会组织、辖区商户、社区居民这五类参与主体。当下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存在治理共识缺失、权责划分模糊、沟通协调机制不畅、协同参与动力不足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要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借助强化党组织的协调能力来凝聚共治共识，清晰界定各主体角色定位并划分权责边界，构建资源共享的沟通机制以促进协同联动，同时兼顾情感因素与利益驱动来激活参与动力，进而形成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格局。

关键词：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困境；对策

一、引言

《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顾炎武也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1]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多元共治，呈现出以亲缘、地缘、业缘作为连接纽带，由此形成的家族、村庄、行帮等各类社会组织大量涌现，这些组织还成为基层管理所依靠的主要力量[2]。基于此，本文从多元主体参与这一角度切入，剖析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探究社区党委、政府、社会组织、辖区商户、社区居民等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各自的角色定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机制，以此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二、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一）社区党委参与

社区党委是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关键作用，是凝聚多元主体力量的"主心骨"。其核心参与在于政治引领和组织协调，健全"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组织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社区党委牵头搭建协商议事平台，采取上门沟通、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协调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促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成效，对各方力量进行统筹安排以形成治理合力，保证社区治理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行，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3]。

（二）政府组织参与

政府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主要承担政策指导、资源供给、监管规范等职责。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完善社区治理政策法规，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和义务，优化社区治理制度环境[4]。政府加大对社区治理的资金投入，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15分钟党群服务圈"建设，统筹养老、托幼、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推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实现"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此外，政府借助监督考核、业务指导等手段，规范社区各类主体的参与行为，针对跨部门、跨社区的复杂治理难题进行协调处理，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搭建有效平台、营造良好条件。

（三）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关键辅助力量，依靠其具备的专业性与灵活性，为社区治理的形式增添丰富元素。众多社会组织将目光聚焦于社区的实际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如"燕赵老兵"开展安全巡逻工作，也会对困难群体进行帮扶；"健新阳光"专注于提供心理咨询服务[5]。社会组织借助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途径获取发展方面的支持，主动投身于社区纠纷调解、健康养老服务、居民融入引导等工作。社会组织还具备引导居民有序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能够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与协作精神，在居民与其他主体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为社区治理引入多样化的活力元素。

（四）辖区商户参与

辖区商户是社区治理中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参与程度会直接对社区治理的活力、实际效果产生影响。商户把社区当作经营的依托，与社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联系紧密，其参与核心在于履行社会责任，融入社区发展过程，进而达成自身发展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辖区商户依照社区治理的相关规定，规范自身经营行为，以此维护社区的公共秩序、环境整洁，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生活服务。商户还能够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主动反馈经营期间遇到的问题、诉求，并且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助力社区服务模式得以完善，推动社区营造出共建共享的治理氛围。

（五）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内居住着各族人民群众，社区治理的本质就是社区各族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居民主要通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楼栋长等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部分居民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参与环境整治、邻里互助、政策宣传等活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随着治理模式优化，居民通过线上微议事、线下议事厅等渠道来表达自身诉求、提出治理建议，逐步从“坐等服务”向“主动议事”转变，推动社区治理更加贴合居民需求，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6]。

三、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多元主体社区治理共识尚未达成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前提是形成统一的治理共识，但当前社区党委、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之间仍存在认知偏差，尚未形成协同治理的思想共识。社区党委主要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注重治理方向把控；政府组织主要以公共服务供给、政策落实为导向；社会组织主要关注特定群体需求满足、公益价值实现；辖区商户更侧重自身经营利益，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不足；社区居民主要以个人利益、居住体验为出发点，缺乏对社区公共利益的整体考量[7]。各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治理诉求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一致理念。

（二）不同属性主体权责划分模糊不清

若想切实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明确各主体权责是关键前提。当下社区治理领域，不同性质主体的权责边界不够明晰，权责交叉、缺失、错位等情况屡见不鲜。鉴于社区当前资金匮乏的状况，社区治理主要依靠社区党委牵头，联动商户与居民的力量共同开展。政府部门参与社区治理时，主要问题体现在职责界定不清晰，经常出现不知该由哪个部门负责，各部门相互推诿。在职责不明晰的情形下，究竟该由哪个主体承担责任成为棘手难题。权责划分不明确会引发各主体之间互相推卸责任，最终使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上升。

（三）治理主体间沟通协调机制不顺畅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沟通协调，目前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完善，存在沟通渠道单一、信息传递不畅、协调反馈滞后等问题。不同属性主体之间缺乏常态化、规范化的沟通平台，沟通多为临时对接，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信息传递存在不对称现象，政府组织的政策信息、社区党委的治理部署未能及时全面传递给社会组织和居民，辖区商户以及居民的诉求、社会组织的意见也难以有效反馈至核心治理主体。此外，缺少专门的协调机构和协调流程，当各主体出现利益分歧或治理矛盾时，难以快速达成协调共识，导致治理问题久拖不决，影响协同治理效果。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参与动力不足

当前各主体在协同开展治理工作时的参与动力普遍欠缺。社区党委虽承担引领责任，但部分基层党委引领方式单一，缺乏主动联动其他主体的意识和动力。政府组织受行政体制制约，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协同治理主动性，更注重自身行政任务完成，忽视与其他主体协同。社会组织面临资源短缺、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参与治理动力难以有效激发，难以持续发挥专业治理作用。一些辖区商户因参与社区治理无法获得直接经济收益，且缺乏责任约束，参与积极性不高。一些社区居民公共意识淡薄，多存在“搭便车”心理，多数居民对社区公共治理事务参与度不高，难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合力。

四、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社区治理的优化对策

（一）强化党组织的协调能力，凝聚多元共治共识

社区党委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导力量，要打破以往那种传统的协调方式，着手构建“党建+数字赋能”协同发挥引领作用的体系。社区党委要发挥牵头作用，搭建起类似“党群e家通”这样的数字平台，把各类治理资源整合起来，促使政府组织、社会组织、辖区商务、社区居民的信息都纳入网络管理，进而建立起涵盖全流程且形成闭环的诉求协调机制[8]。政府组织要协同社区党委，将管理与服务力量下沉，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以及资源上的保障，以此助力共识凝聚。社会组织在社区党委的指引下，应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向各个主体阐释治理理念，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辖区商户要积极响应社区党委的号召，主动参与到治理工作当中，树立“社区发展与自身经营相互依存”的理念。社区居民在社区党委的动员下，要强化自身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共识讨论，主动表达个人诉求。经社区党委统一规划协调，各方主体能够明确治理方向，达成“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共同治理共识[9]。

（二）明确多元治理角色定位，合理划分权责边界

社区党委需发挥统筹指导与监督协调作用，将工作重心置于治理方向规划与多元主体整合上，构建政策框架与运行机制。政府组织应履行公共产品供给与

政策保障职能，通过治理资源下沉、基础设施优化及民生政策落地等手段，避免“大包大揽”，重点向社区组织及社会力量转移部分管理权限[10]。社会组织则发挥专业服务的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便民服务、化解矛盾纠纷以及开展公益援助等事务上。辖区内的商家要肩负起社会责任，规范自身的经营操作，投身到社区环境的改善和治安的维护等工作当中，为提高社区服务质量贡献力量。社区居民作为治理的核心参与者，拥有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权力，同时需履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的责任。通过清晰界定各参与方的角色定位，详细列出权力与责任清单，保证每个主体都能履行好自身职责，进而构建起协同合作且高效的治理体系。

（三）构建资源共享沟通机制，促进主体协同联动

社区党委要发挥引领作用，着手搭建一个资源共享平台，把政府组织所具备的政策资源、社会组织拥有的专业资源、辖区商户的信息以及社区居民手中闲置的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以此达成资源的精准匹配。在线上，可以借助智慧治理平台，设置诉求反馈和议事协商这两个模块，让各个主体能够随时就自身需求进行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在线下，可建立“定期联席会 + 楼栋议事会”的机制，由社区党委负责主持，邀请各方主体就社区面临的公共难题展开面对面的协商讨论。政府组织要借助这个平台将服务资源下沉下去；社会组织要分享自身的专业服务经验；辖区商户应开放场地、服务等自身资源；社区居民则要贡献闲置资源并反馈真实需求。此外，社区党委还需建立协同联动的考核机制，把各个主体在资源共享、沟通配合方面的表现纳入评价范围，进而形成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治理合力。

（四）兼顾情感利益驱动因素，激活多元参与动力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是社区多元治理稳健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着力解决各治理主体积极性欠缺的问题，通过情感与利益激活治理主体的持续性动力。社区党委要发挥引领作用，营造“熟人社区”环境，举办睦邻宴、邻里运动会以及非遗进社区等一系列特色活动[11]。政府组织要健全利益保障机制，针对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给予资金支持与项目优先权，还要建立“志愿服务数字积分”体系，居民凭借积分可换取便民服务或者实物奖励。社会组织则需将关注点放在主体需求上，为居民提供贴合其需求、具备专业水准的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长。辖区商户可通过参与社区共建活动，优化自身商业信誉与社会形象，达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12]。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既能解决个人实际困难，又能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感与价值认同感。这种以情感纽带凝聚社区共识、以利益保障机制激发参与热情的做法，能够持续强化社区治理的内在驱动力。

五、结语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必然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党委、政府组织、社会组织、辖区商户、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参与主体，各自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依旧存在一些困境，所以要强化社区党委的引领与协调功能，明确各参与方的权责范围，搭建高效的沟通协调及资源共享平台，完善相关激励制度，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只有推动各类主体共同发力，才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使社区治理水平得到提升，让居民幸福感不断增强。

参考文献

[1] 蔡璟浩，于若含. 城市社区治理中物业服务困境的生成及治理 [J]. 社会治理 ,2025(05):36-46.

[2] 许文文，张牧辛.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差异研究——以北京市三个社区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21(02):77-90,173.

[3] 余正军，韩朝阳.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过程与路径——以拉萨市达东村为例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05):114-120.

[4] 韩清雪. 数字化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探索 [J]. 住宅与房地产 ,2024(16):69-71.

[5] 胡晓慧.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研究 [J]. 住宅与房地产 ,2023(31):89-91.

[6] 李杰民. 党建赋能聚合力社区治理焕新颜 [J]. 支部建设 ,2026(02):49-50.

[7] 尹利民，张洁. 社区社会企业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多重逻辑——基于 A 区的经验分析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57(01):145-155.

[8] 王延隆. 民族互嵌型社区：空间形态、塑造机制与治理创新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02):73-82.

[9] 李婧，李丽君.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J]. 秘书之友 ,2026(02):21-24.

[10] 殷铭泽：迈向整体智治：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型 [J]. 当代党员 ,2026(03):54-55.

[11] 陈爽. 社区治理视角下南宁市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J]. 广西城镇建设 ,2026(01):82-87.

[12] 韩欣宇，朱子悦，邱彩琳，等. 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建构机制与分异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6,33(01):72-84.

（作者系秦皇岛市海港区万象城社区中级社会工作师）

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融合路径研究

李文静

摘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法治与德治的协同运用是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本文以理论溯源、实践张力、融合路径为逻辑主线，系统探讨二者辩证关系。二者对立性体现为治理依据、适用范围与实施方式的差异，统一性聚焦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的共同目标及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内在关联。实践中存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法律刚性与道德弹性冲突、资源分配不均等张力。为此，需构建制度衔接、执行协同、机制保障的三维融合体系。研究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对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德治；融合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本质是通过多元治理手段的协同运用，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公平正义彰显、人民福祉增进的治理目标。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日益复杂、数字技术快速渗透，传统单一化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新型社会矛盾与治理挑战——既有法理难容却合乎情理的价值冲突，也有制度刚性与伦理弹性的执行困境，更有规则约束与道德自觉的协同缺位。在此背景下，法治作为“治国之重器”的刚性约束作用与德治作为“化民之本”的柔性引领价值，如何实现辩证统一与深度融合，成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一、社会治理中法治和德治的概念界定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手段，其核心要义并非单纯的以法而治，而是以良法为前提、以权利保障为核心、以权力规范为关键、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的治理形态，具有鲜明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法治是通过一套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体系，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主体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方式，其本质是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它不仅要求公民、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严格遵守法律，更强调法律本身必须符合正义价值、尊重人权、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即“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德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柔性手段，是以道德规范为核心、以价值引领为路径、以个体自觉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治理形态，其核心是通过道德的教化与浸润，实现个体自律与社会共治的统一。德治是依托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价值理念，通过教育引导、文化熏陶、榜样示范、舆论评价等非强制方式，激发个体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调节社会关系、规范个体行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治理方式。其本质是“道德的引领”，强调通过内化的道德信念约束行为，而非外在的强制力压迫[1]。

从治理依据看：法治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具有明确的文本载体；德治以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为依据，多以习俗、舆论、信念等形式存在。从实施方式看：法治是外在强制约束，通过他律实现规范；德治是内在自觉引领，通过自律实现规范。从调整范围看：法治侧重调整具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强制规范的社会关系，如权利义务纠纷、违法犯罪等；德治的调整范围更广泛，涵盖日常交往、情感伦理等法律难以触及的领域。从价值目标看：二者终极目标一致，均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幸福，但法治更侧重不违法，德治更侧重讲道德。

二、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核心

法治与德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手段，并非孤立叠加，而是呈现“对立中统一、统一中发展”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在治理依据、适用范围、实施方式的显性差异，也蕴含于目标导向、功能支撑、动态转化的内在契合，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双轮驱动格局。

（一）对立性：治理逻辑的多元差异

对立性源于二者治理逻辑与实现路径的本质不同，具体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

第一，治理依据不同。法治的依据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体系，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条文清晰明确，依靠军队、法庭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违反则受到明确惩戒，是社会治理的“硬准则”。德治的依据是社会长期形成的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源于民间自发认同，内容相对灵活模糊，依靠群体共识和舆论评价形成约束力；违反仅面临道德自省或谴责，是社会治理的“软规范”。法治强调强制服从，德治强调内心认同，二者的惩戒力度和效力来源完全不同[2]。

第二，适用范围不同。法治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它主要针对国家权力运行、市场秩序规范、违法犯罪惩治等关键领域，这些领域需要明确权利义务，靠刚性规范保障公平和可预期性。德治的适用范围则更广泛，兼具灵活性和包容性。它覆盖了法律难以触及的日常交往、情感伦理等领域，这些领域不需要强制约束，更多依赖个体自觉和社会氛围引导。

第三，实施方式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通过明确界定行为边界与违规后果，依靠执法监管、司法裁判等外部强制力量，确保社会主体遵守规则。比如，交通违法行为会依法受到罚款、记分等惩戒，无论个体主观是否意愿，违反法律规范必然承担相应后果，以此实现对社会行为的刚性约束。德治的核心是自律，关键在于引导社会主体从内心认同道德准则，并落实到自觉行动上。

（二）统一性：治理效能的内在契合

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性，本质是因为二者有着服务社会治理的共同目标，而且在实际作用上能相互支持，在发展过程中还能相互转化。

第一，二者目标一致。法治和德治的最终目标，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法治靠刚性的规范，划清大家的权力边界，惩治违法行为。德治靠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文明风尚。二者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相互配合，共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第二，二者相互依存。法治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良法的制定必须契合社会基本伦理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公序良俗”确立为基本原则，正是法律与道德价值相契合的体现；同时，公众对法律的道德认同，能够显著降低执法成本、提升守法自觉。反之，德治的推进也需要法律的保障，对于虐待老人、遗弃儿童等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仅靠舆论谴责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必须通过刑事规制等法律手段予以惩戒，才能守住道德的底线。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第三，二者相互转化。法治与德治存在双向转化的动态关系。一方面是道德法律化，一些社会共识度高、实践成熟的道德规范，会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例如“诚实守信”这一核心道德要求，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条文，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环境保护”的道德理念，也转化为专门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是法律道德化，经过长期实施与教化的法律条文，会逐渐内化为社会公众的道德自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文明出行”逐步从法律规定转化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风尚。这种双向转化机制，推动法治与德治实现深度融合[3]。

三、社会治理中德治与法治的实践张力

尽管法治与德治在理论层面呈现辩证统一关系，但在实际社会治理过程中，二者的衔接往往难以顺畅。受治理环境、主体能力、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二者在价值、执行、资源三个核心层面出现明显张力，成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瓶颈。

（一）价值层面：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失衡

法治追求的形式正义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当”为核心，强调严格依据法律规范作出统一裁决；而德治蕴含的实质正义更注重个案中的伦理诉求、情理平衡与社会效果，二者的价值侧重差异易引发失衡。例如，执法部门对占道经营的困难摊贩采取“一刀切”式处罚，虽符合城市管理法规的形式要求，却忽视了摊贩维持生计的现实诉求与社会大众对包容弱势群体的道德期待，引发舆论争议。这种失衡本质上是法治的工具理性与德治的价值理性冲突，若仅强调形式正义，易使治理失去人文温度，削弱公众对治理的认同感。

（二）执行层面：法律刚性与道德弹性的冲突

法律的刚性特征要求执行过程中坚守边界、统一标准，无特殊例外；而道德的弹性特征允许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调整行为尺度，这种差异在复杂治理场景中易引发情理与法理的两难。例如，基层常见的家庭纠纷案件中，子女因经济困难未完全履行赡养义务，从法律层面看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赡养义务规定，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从道德层面看，子女的经济困境、亲子间的情感纠葛等因素需被考量，简单的法律制裁可能加剧家庭矛盾，违背修复亲情的道德诉求。法律的刚性约束难以完全适配复杂多样的道德情境，而道德的弹性又缺乏强制力支撑，导致治理陷入“合法伤德”或“合德违法”的两难困境。

（三）资源层面：法治建设与德治培育的资源分配不均

社会治理资源总量有限，直接导致法治建设与德治培育的资源分配失衡，“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尤为突出。从资源投入来看，法治建设得到的制度供给与财政支持更为集中。立法、执法、司法等核心环

节的机构设置持续完善，人员配置不断优化，技术支撑力度逐步加大，一套系统完备的资源保障体系已然成型。反观德治培育，其资源供给始终缺乏稳定性与持续性。道德教育、文化浸润、榜样示范等关键工作，大多依赖临时性举措推进，既没有长期规划作为指引，也缺乏常态化的资源投入机制，很难形成长效治理效能。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不仅削弱了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也让法治建设失去了坚实的道德理念支撑，进一步加剧了二者协同推进的现实困境[4]。

四、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融合的实践路径

要破解法治与德治在实践中的张力，关键在于搭建一套制度衔接、执行协同、机制保障的一体化融合体系。通过这套体系，把二者的辩证关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最终实现“良法善治”与“德润人心”的深度契合。

（一）制度层面：完善“良法善治”体系，推动道德理念法治化

制度是法治与德治融合的根本依托，核心是要以“良法”为载体，把社会核心道德理念转化为明确的法律规范，从立法源头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

立法融入核心道德准则：立法的全过程都要充分吸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核心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等关键道德理念，明确纳入法律条文的价值导向和具体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经把“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确立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接下来还可以在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细化道德理念的法律表述，让法律规范更贴合社会大众的伦理共识。

健全法律法规道德审查机制：在立法起草、审议这些关键环节，专门增设道德审查程序。针对法律草案中涉及伦理争议的条款，组织法学、伦理学专家开展专项评估，避免法律规范与公序良俗相冲突。

（二）执行层面：注入道德关怀，实现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结合

执法环节推行柔性执法与道德教化并重模式：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工作，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且能通过道德补救纠正的违法行为，优先采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限期整改等非强制性手段。同时，要同步开展道德教化，向当事人讲清行为违背的道德准则，引导其主动改正不当做法。比如，面对占道经营的困难摊贩，不用“一刀切”式处罚，而是通过协调划定便民经营区、协助办理合法经营手续等方式，既守住城市管理底线，又兼顾摊贩生计需求[5]。

（三）机制层面：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强化融合实践的制度保障

构建责任联动机制：要清晰划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明确彼此在法治与德治融合中的协同义务。政府层面，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联合宣传、教育、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组建法治与德治协同治理工作组，统筹负责融合政策的制定、资源调配和工作落实。社会组织层面，鼓励行业协会、社区组织等结合自身领域特点，把相关法律要求与行业道德、社区公约结合起来。比如，餐饮行业协会可整合诚信经营的道德准则，制定具体的行业自律规范。企业层面，需将合规经营与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推动法律义务与道德责任的有机统一。公民层面，则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规范，明确学法守法、崇德向善的基本义务，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治理格局。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法治与德治融合成效纳入治理主体的考核体系，破解重法治、轻德治的资源分配失衡问题。例如，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增设“道德理念融入立法”“柔性执法覆盖率”“全民素养提升成效”等量化指标；在基层治理考核中，将“法治调解 + 道德疏导”的纠纷化解率、群众对治理的满意度作为核心指标；对考核优秀的地区与单位给予资源倾斜，激励其持续推进融合实践。

五、结语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多元治理手段的协同优化，法治与德治作为治理体系的“双轮”，其辩证关系贯穿于治理实践的全过程。本文通过理论溯源、张力分析与路径构建，得出核心结论：法治与德治的对立性是治理逻辑的自然差异，统一性是价值目标的内在契合，而实践张力的破解关键在于构建制度衔接、执行协同、培育同步、机制保障的融合体系，实现刚性约束与柔性引领的有机统一。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正是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唯有坚持二者辩证统一，以良法善治筑牢治理根基，以德润人心凝聚治理共识，才能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高度，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学习问答编写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学习问答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2]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4] 江泽民文选 : 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6.

[5] 任雅娜 . 新时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研究 [D]. 上海 : 上海师范大学 ,2022.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校）

洛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刘亚莉　白蒙蒙

摘要：市域社会治理是衔接国家顶层治理与基层微观治理的关键枢纽，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层级。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首批试点城市，洛阳市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网格；统筹推进“四治”并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但同时洛阳在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城乡社会系统复杂，市域统筹治理难度加大；部门职责交叉不清，市域协同治理效能不高；社会力量吸纳不足，市域共治活力仍需激发的问题和挑战。本文立足洛阳治理实践与现存短板，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从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明晰部门权责体系、激活多元共治活力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为新时代地级城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市域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四治融合；洛阳

一、引言

市域社会治理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2]，对新时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洛阳市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洛阳模式，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洛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洛阳市始终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根据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坚持党建引领，建设社会治理一体化指挥中心，以网格化和信息化为工作基础，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发展，创建“党建 + 一中心 + 两基础 + 四治并进”的市域社会治理洛阳模式，打造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洛阳品牌。

（一）强化党建核心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基层党组织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洛阳以网格党支部为核心，建立党小组，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和党员中心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多样化，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网格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涧西区有 581 个城市小区，小区党支部在 2019 年底只有 3.4% 的覆盖率，目前已经实现 100% 的覆盖。全区所有党员“入网进格”，并自觉肩负起网格治理责任，实现了“支部建在小区中、‘四治’融在楼院里、服务送到家门口”的小区治理新格局。

同时，洛阳各行政村（社区）以特色党建品牌为引领，加强行政村（社区）党建，提升组织能力和融合度，着力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在开展以“清资产、清‘村霸’、清矛盾，建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强村民自治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三清两建”乡村治理专项行动中，村级党组织发挥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与政法、纪检、组织、宣传等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党委领导、四级联动、专班推进、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二）整合多元治理力量，构建全域协同网格

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洛阳不仅坚持党建引领，同时注重多元参与，积极调动社会力量。洛阳市通过构建“综治中心—信息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格局，建设“雪亮工程”，规范化建成综治中心 3421 个，通过建立网格化管理和信息化平台统一调配政府和社会的

力量资源，使各级综治中心成为党委解决应对社会治理问题的“指挥所”，发挥街道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的力量，逐步建立辖区多元治理的长效机制。

洛阳市将全市城乡社区联结起来，将各方可以动员的力量归纳到“一张网”中。按照“1+1+N”模式，每个网格确定1名网格长，配备1名专（兼）职网格员，同时配备人民调解员、楼栋长、“四官”服务队、平安建设志愿者等工作力量[3]，建成专兼并举、长员联动、内外结合的网格员和志愿服务队伍，实现“网中有格管、格中有人干、人在格中转、事在格中办”的工作格局。

（三）深化“四治”融合赋能，健全矛盾化解体系

洛阳市在市域社会治理探索过程中结合实际，创新使用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等治理手段，坚持“四治”并进，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洛阳市以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常态化开展“四官”服务（法官、检察官、警官和法律服务官）进村（社区）担当平安“村官”活动，通过开展政策法规宣讲等活动一对一为群众服务，把小矛盾小问题解决在基层。通过开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修订村规民约等手段建立以县为中心、乡（镇）为所、村为站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三级德教阵地，在市域范围内营造倡导文明新风的氛围。

在自治方面，洛阳强调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创造性实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和“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重视民主决策，管好“小微权力”。此外，洛阳市重视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通过AI智能、数据中心、区块链等手段进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建强“智慧大脑”，实现应急指挥“全天候”。

三、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洛阳正在不断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在推进城市提质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文旅融合发展等举措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城乡社会系统复杂，市域统筹治理难度加大

在国家政策主导下，撤县设区的行政规划顺应了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加快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但同时意味着城市的市域统筹治理难度加大。洛阳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在2021年3月正式落地，县级偃师区成为偃师区，孟津县、吉利区合并成为孟津区，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村屯土地被政府征用为城市用地，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村里人”一夜之间变成“城里人”，但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体量的加大，更需要政府关注人民的多样性需求。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各部门各层级的治理任务都需要下达基层社会实现政策落地，同时民众诉求和社会矛盾一般也积聚在基层社会，这对市域统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市域是政策制定者，而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者，更是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场所，需要解决的事情千头万绪，肩上担负的责任重如泰山，但经常出现重复填报重复考核等问题，形式化工作的压力使基层单位忙于行政事务，疏于关注群众矛盾，对群众需求回应得不及时容易引发新时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从而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部门职责交叉不清，市域协同治理效能不高

各地政法委是推进各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主要责任部门，但是市域社会治理需要依靠众多相关部门比如民政局、住建局等协同合作，所涉部门关系错综复杂。洛阳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部分部门之间的配合不够紧密，部分部门不能充分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城市管理局仍存在职责边界不清、执法行为简单粗放等问题。市域治理是基层治理的总体指导，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基层治理，各级政府将治理任务下放到基层，但是很少提供具体的服务和保障，导致“权小责大，有责无权”的基层政府成为“无奈政府”，为了满足上级部门的任务要求，只能在形式上进行改造创新，实际却不能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政府管理体系呈现“条块分割”的特征，横向部门权责界限模糊，纵向层级部门协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各部门的力量较为薄弱，市域社会治理缺乏统一调度力量，导致市域社会治理资源难以统一规划，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很难适应市域社会治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治理特征，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较大挑战。

（三）社会力量吸纳不足，多元共治活力仍需激发

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是中国式政社关系的特色，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提升治理主体的参与度，实现多元共建共治。从目前洛阳的工作情况分析，群众、社会组织等已经初步具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在日常社会治理的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参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非常有限。居委会、村委会等对群众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显然不够，忽视群众参与治理的作用，在治理的实践过程中过度依靠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行政力量。而群众作为治理的客体，思维仍然停留在传统管理理念上，还没有转变到现代治理理念上来，大部分群众将政府当作社会治理的主体，几乎没有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此外，洛阳市虽然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布了较多的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由于社会组织尚处于幼稚时期，对自己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位，因此暂时承担不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政府、社会和人民多元治理的主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建构，因此不能

有力发挥各方社会力量的治理潜能，大大降低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效。

四、新时代洛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针对社会治理现存短板，洛阳市立足新时代治理现代化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靶向施策，通过统筹城乡融合、明晰权责体系、激活多元活力，持续完善全域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效能，推动洛阳市域社会治理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现代化。

（一）突破城乡界限，推动治理体系整体发展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市域社会治理不再是单一的专业型治理，而是以解决城乡居民的现实需求为导向，在市域层面建立起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综合治理[4]。所以，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突破城乡界限，整合城乡资源，全面推动建立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让城市和乡村两个维度的群众平等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一，完善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市域社会治理离不开城市与乡村的协同治理。因此在进行市域社会治理时，要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并且能够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城乡壁垒、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建立共生共荣的高质量城乡关系。市政府应该综合运用市域的立法权限和各种行政资源，尊重城市和乡村存在的天然差异，做好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过渡和衔接，形成城乡协同治理新模式[5]。

第二，统筹解决城乡社会治理难题。市域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是一个关键的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社会主要矛盾、降低社会潜在风险，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角色。首先，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考虑，不同层级的政府应该上下联动，携手推进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均衡分布，缩小城乡差距。其次，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举措，加强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积极听取治理对象的意见，吸纳治理对象的诉求，排查流动人口的管理漏洞，维护市域社会稳定。

（二）明确权责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合力

市域社会治理权责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市域社会治理能否形成强大合力的重要原因。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更加明确并且能够相互配合，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梳理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责任边界。

在纵向上，抓住“市域”关键环节，发挥市一级党委的综合统筹作用。洛阳市要借助全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契机，把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工作纳入市域社会治理的工作中。根据不同层级的特点分类确权，执行权责清单，助力形成市级统领、区（县）负责、街（乡镇）、社区（村）和网格五级联动的治理体系，推动市域范围内各方力量协同发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

在横向上，要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关于社会安全、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管理责任，建立综合治理一体化平台以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对市域治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从而灵活调动各部门的资源。同时，要优化各行政部门的职能设置，横向对比剔除部门之间交叉重叠的任务考核，明确相关部门的权责界限，实现组织联动、资源联动、服务联供。

（三）汇聚社会力量，激发多元主体共治活力

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应该遵循不同的治理规则，政府要摆脱“社会不行，政府万能”的传统思维模式，通过政策扶持、资金奖励等方式与群众、社会组织建立起密切联系，汇聚社会力量，激发多元主体共治活力。

首先，创新参与制度。基层政府要重视群众的所需所想，从群众反映的问题中找到短板，带着问题到一线找到解决办法，积极问计于民，创新群众参与的相关制度，提高群众在市域社会治理推进过程中的参与感、自豪感。比如，搭建更多类似“百姓呼声”的沟通渠道，通过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建立群众和政府之间信任的桥梁，提高政府的权威，使市域社会治理在基层的实践取得良好的效果。

其次，优化培育环境。社会组织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党政机关要进一步降低门槛，扩大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范围，减少对社会组织的台账检查和项目过程性干预，同时赋予社会组织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并且在项目引进、资金支持等方面鼓励社会组织实现规范化发展。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鼓励，积极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力量。

五、结语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也是新时代平安洛阳、法治洛阳建设的核心内容。作为全国试点城市，洛阳市立足地域特色，依托党建引领、网格赋能、四治融合、多元联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市域治理模式，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同时，受城乡结构变革、权责体系不畅、社会参与不足等因素影响，洛阳市域治理仍存在统筹难度大、协同效能弱、共治活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新时代背景下，洛阳市需持续立足试点定位，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持续打破城乡治理壁垒、明晰部门权责体系、激活多元共治活力，不断完善现代化市域治理体系，持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服务提质，全力构建全域统筹、协同高效、共建共享的市域治理新格局，以高质量治理赋能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下转 180 页）

侗族文化赋能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探析

王　莹

摘要：侗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伦理智慧、社群观念和民俗基因，可赋能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本文以侗族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实践为依托，从文化价值引领治理方向、文化机制创新治理模式、文化实践提升治理效能三个方面入手，对侗族伦理文化、民俗文化、社群文化在社区组织建设、矛盾化解、服务供给、认同构建等各方面的赋能作用进行系统分析，挖掘出“款约精神”“鼓楼议事”“寨老调解”等文化载体的现代治理价值，结合新时代社区治理数字化、精细化的趋势，提出有文化传承、有治理效能的现代化方案，为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摆脱认同困境、激活治理活力、实现长效稳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侗族文化；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赋能路径

易地搬迁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保证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支撑。侗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一支少数民族，其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款约制度”“议事传统”“互助文化”等，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和现代社区治理所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不谋而合。在侗族易地搬迁社区，文化既是民族认同的维系者，又是激活社区治理活力、提高治理效能的一种资源。目前，怎样把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现代治理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文化来助力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成了亟须探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侗族文化特色和易地搬迁社区治理需求为基础，从价值引领、机制创新、实践拓展三个方面，对侗族文化赋能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进行分析，为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一、文化价值引领，锚定社区治理现代化方向

（一）侗族伦理文化赋能治理价值重构

侗族伦理文化以“和”为本，强调邻里和睦、族群团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邻里守望、患难与共”的传统信条给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核心价值支撑。把侗族的“敬祖睦邻”“诚实守信”“互助互爱”“勤俭持家”这些伦理规范融入社区治理的价值体系，组织侗族德高望重的长辈编写通俗化的伦理读本，开展“伦理讲堂进社区”系列主题活动，在侗族春节、吃新节等传统节日，选出“和睦家庭”“诚信标兵”，并且进行公开表彰与宣传，促使搬迁群众把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转变成现代社区生活的行为准则，增强社区成员的责任感、集体意识和道德自觉[1]。依靠侗族“款约”文化中包含的契约精神和公序良俗，联系现代法治观念来创建社区治理的价值共识，借助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入户走访征求民意等多种民主形式，促使搬迁群众在文

（上接 179 页）

参考文献

[1] 陈一新 .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 [J]. 社会治理 ,2018(08):5.

[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2:54.

[3] 洛平安 . 护航古都复兴路 共筑平安洛阳城 [N]. 洛阳日报 ,2023-04-10(A10).

[4] 杨磊 , 许晓东 . 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结构功能与路径选择 [J]. 改革 ,2020(06):23.

[5] 郑会霞 .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现实挑战及创新路径 [J]. 领导科学 ,2022(12):106.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化认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的讨论和规则的制定当中，营造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环境，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筑牢价值根基、夯实群众基础。

（二）侗族社群文化赋能治理主体凝聚

侗族传统社会的“聚族而居”生活模式和围绕鼓楼、戏台形成的公共生活空间，孕育出了强烈的社群联结和集体意识，这些文化特征给易地搬迁社区凝聚治理主体、激发治理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充分发挥侗族“鼓楼议事”“寨老调解”“宗族互助”等传统社群组织的现代转型价值，在社区治理中搭建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平台，专门吸纳社区内有声望的寨老、懂侗族文化的侗族传承人等参加社区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参与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邻里纠纷的调解以及公共服务的全过程监督[2]。组建侗族大歌合唱团、芦笙舞表演队等文化社团和兴趣小组，定期举办搬迁群众参加的侗族大歌传唱、芦笙舞展演、合拢宴品鉴、侗族叙事歌分享等沉浸式文化活动，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增强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情感联系和归属感，有效地消解了搬迁初期的陌生感和隔阂感，凝聚起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搬迁群众等多方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为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而稳定的内生动力。

（三）侗族生态文化赋能治理理念升级

侗族长期生活在湘黔桂交界处的山水之间，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其“依山傍水建寨、因地制宜耕作、林木保护有规、污水自然净化”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社区治理提倡的绿色发展、生态宜居理念不谋而合。将侗族生态文化融入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当中，在社区规划建设时主动参考侗族传统干栏式建筑的通风采光特点、村寨布局的山水和谐思想，科学安排绿地空间、污水排放路线和垃圾处理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营造出绿色、宜居、可持续的社区生态环境[3]。邀请侗族生态文化传承人作专题讲座，组织群众参加“生态保护故事会”分享传统经验，开展“绿色家园”创建评比活动，向搬迁群众普及侗族“山林是命根、水土是根基”的生态思想，让群众树立起绿色生活观念，养成节水节电、垃圾分类、保护绿植的习惯，促进社区治理向生态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实现治理现代化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使搬迁群众在优美环境中真正提高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

二、文化机制创新，优化社区治理现代化模式

（一）侗族“款约制度”转型赋能治理规则完善

侗族传统“款约制度”是依靠民族共识而形成起来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社会规范体系，用“款词”传唱、“款会”商议的方式确定族群的行为准则，其中包含的契约精神、民主协商思想和公开公正的原则，给现代社区治理规则的完善提供了一些参考。推进侗族“款约制度”的现代转型，组织法学专家、民俗学者和社区工作者一起整理传统款约的内容，从中选择“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爱护公物、遵纪守法”等符合现代治理要求的条款，并与国家法律法规、社区治理实际相结合，制定出具有文化特色和法治精神的《社区治理公约》《居民行为规范》等。建立规范化的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参照侗族“鼓楼议事”的人人平等、自由发言、集体决策模式，在社区设立固定的议事场所并公布议事流程和结果，确定议事参与范围和决策程序，使搬迁群众就物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优化等热点问题充分表达诉求、深度参与社区事务决策，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性治理格局，明显提高社区治理规则的科学性、可行性以及群众的认可度。

（二）侗族“寨老调解”传承赋能治理矛盾化解

侗族传统社会里，寨老是族群里的长者和智者，凭借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高尚的道德品质、对侗族传统习俗的深刻认识以及广泛的人群威望，一直担负着调解邻里纠纷、化解族群矛盾的任务，这便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寨老调解”方式，给现代社区矛盾化解提供了特别途径[4]。在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调动寨老调解的优势，正式设立寨老调解工作室并挂牌运行，采取群众推荐和社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从寨老中选出有能力和有声望、热心公益的寨老担任调解员，并聘请专业的律师对其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培训。寨老在调解中既用国家的法律法规来明辨是非、划清界限，又用侗族的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进行情理疏导，用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化解矛盾，在处理邻里宅基地纠纷、家庭赡养问题、日常生活琐事摩擦等方面，依靠自身的独特公信力、亲和力达成“法、理、情”的有机融合，迅速解决各类社区矛盾，保持社区和谐稳定，为社区治理现代化营造出安全有序、邻里和睦的环境。

（三）侗族“互助文化”弘扬赋能治理服务供给

侗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互助精神，“一家有难，全寨相帮”“春耕秋收，邻里互助”是侗族传统社会重要的风尚，不计回报、守望相助的互助文化为易地搬迁社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保障困难群众生活提供重要支撑。把侗族互助文化融入社区治理服务供给当中，创建起系统化的社区互助服务体系，以社区党组织为依托，组建起社区党员、共青团员、志愿者、热心群众等多方参与的互助服务队伍，按照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准确划分出生活照料、生产帮扶、情感慰藉、技能传授等服务模块，并对服务清单和联系方式进行公示。根据社区内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需求，提供上门理发、健康体检、代购代办、农业技术指导等个性化、精准化的上门服务；以每月一次的合拢宴、集体农耕、节日互助活动为载体，促进搬迁群众相互帮助、凝聚力量，解决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使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推动了社区治理精细化、人性化发展，

使搬迁群众真正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和关爱[5]。

三、文化实践拓展，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效能

（一）侗族文化阵地建设赋能治理空间优化

侗族鼓楼、戏台、风雨桥等传统建筑既是民族文化物质载体，又是社群活动、公共议事、文化传承的空间，其公共性、包容性的特点，给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空间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易地搬迁社区建设中重视融入侗族文化元素，规划出包含文化传承、议事协商、公共服务、休闲娱乐等功能的综合性侗族文化阵地，有复刻传统样式的社区鼓楼、侗族非遗文化专题展示馆、文艺活动戏台和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这些阵地在设计上保留了传统形制的同时又考虑到了现代需求，在鼓楼上设置便民服务窗口，在展示馆内配备数字化讲解设备，使传统文化场景更适合当下治理场景。把所有的文化阵地都纳入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之中，鼓楼是社区议事中心，专门用来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开展矛盾调解工作；非遗展示馆是文化教育基地，系统开展侗族文化系统的培训与体验活动；文化广场和戏台是举办政策宣讲、文艺演出、节日庆祝等各类活动的场所，使搬迁群众在熟悉的环境中更方便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大大提高了社区治理的可达性和实效性，使文化传承和治理空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文化阵地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中心治理平台。

（二）侗族文化产业发展赋能治理效能提升

侗族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侗族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芦笙制作技艺、侗族刺绣等。发展侗族文化产业既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又是提高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6]。依托社区内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联合文旅部门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发展壮大大众文化，通过引入优质企业合作、成立村民文化合作社等形式搭建起专业的文化产品生产与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推动搬迁群众特别是留守妇女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制作、文化旅游服务、传统技艺的展示等各方面。另外，还要建立技能培训机制，邀请非遗传承人来现场授课，提高群众的创作水平和服务质量。采取文化、产业、就业融合发展模式创建侗族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研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刺绣银饰等特色文创产品，提供侗族歌舞表演服务，增加搬迁群众的经济收入，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文化产业发展为纽带，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充实社区治理人才力量，推动社区治理与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协同发展，实现治理效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升。

（三）侗族文化教育传承赋能治理根基夯实

文化传承发展依靠教育，侗族文化教育传承是保护民族文化、延续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夯实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根基的长久之计。在易地搬迁社区创建专门的侗族文化教育基地，配备专业师资和标准化的教学设施，同当地中小学、职业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侗族语言、传统歌舞、手工技艺、民俗礼仪等内容为教学重点开展文化课程教学，将文化传承融入日常教学体系和课后服务中，开设兴趣社团、非遗工作坊等特色项目，使易地搬迁社区青少年从小就开始认识、认同并传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文化传承进校园、进家庭为载体，举办家庭文化节、社区非遗展演等活动，在社区内营造浓厚的文化传承氛围，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和文化自信。以文化教育传承凝聚社区精神力量，培养出具有文化认同感、责任感及参与能力的社区治理后备人才，筑牢社区治理的思想文化根基和人才根基，为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才支持和精神支撑，保证文化赋能治理的可持续性。

四、结语

侗族文化中蕴含的诸多治理智慧，给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条特殊的赋能路径。以文化价值引领确定治理方向、以文化机制革新改善治理方式、文化实践拓展提升治理效果，进而实现侗族文化传承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共同发展。实践中应当充分尊重侗族文化特有的、多样的特点，结合社区的实际需求来优化融合的方式方法，不能简单地套用模式。要注重治理实效和文化传承，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防止文化形式化、表面化使用。未来应当继续加强侗族文化同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研究，联合学界、基层治理者开展实证研究，利用数字化手段拓展融合场景，不断探索文化赋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新方法，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给我国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李寒冰，褚兴彪，刘庆涛. 基于文化基因与形状文法的三江侗族布贴围涎纹样创新设计应用研究 [J]. 设计艺术研究，2025,15(06):104-113,149.

[2] 范海静. 新媒体时代侗族款文化传播路径探索 [J]. 嘉应文学，2025(23):133-135.

[3] 温玲. “三交”视域下侗族礼乐文化基因谱系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7(05):113-124.

[4] 陈勤学. 基于侗族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思政教育研究 [J]. 网印工业，2025(11):125-127.

[5] 张琰，徐波. 侗族文化中的迁徙叙事与艺术符号表达 [J]. 贵州民族研究，2025,46(03):100-104.

[6] 李忠霖. 侗族音乐的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跨代传承与保护 [J]. 中国民族博览，2025(02):66-68.

（作者单位：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党校）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的路径

王翔宇

摘要：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纵深推进与企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是规范基层权力运行、防范廉洁风险、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关键举措。当前，多数企业已初步建立覆盖关键岗位与核心业务的基层监督网络，在防范“微腐败”、规范业务流程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监督力量薄弱、方式传统、协同不足、文化渗透不深等问题。由此，本文围绕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核心需求，从强化队伍建设、创新数字化监督、搭建协同平台、厚植廉洁文化、构建监督闭环、完善评价机制、推行清单化管理七个维度，提出系统性的融合路径，为企业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纪检监察工作；企业基层治理；监督方式；数字化

一、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基层治理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企业战略落地、合规经营与可持续发展，而纪检监察工作在规范基层权力运行、防范治理漏洞、净化经营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索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对于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防范廉洁风险、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纪检监察工作概述

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聚焦权力规范运行与廉洁风险防控，兼具政治属性、监督属性、治理属性，是保障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落地的重要支撑[1]。纪检监察工作核心职能围绕监督执纪问责与监督调查处置展开，贯穿于各类组织治理全流程，在企业场景中更是赋能基层治理、护航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纪检监察工作以政治监督为统领，坚守政治定位，重点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情况，确保基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日常监督作为核心抓手，覆盖权力运行各环节，通过常态化检查、专项督查等方式，精准排查廉洁风险、纠正履职偏差，推动基层工作规范开展。同时，纪检监察工作兼具教育与惩戒功能，既通过严肃执纪问责形成震慑，对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规处理，又通过廉洁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价值观，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

三、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的价值

纪检监察工作与企业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企业强化内部管控、激活基层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价值集中体现在规范权力、防范风险、凝聚合力、赋能发展四个维度，为企业基层治理筑牢根基、注入动能。首先，企业基层岗位虽层级不高，但直接对接生产经营、物资管理、人员调配等关键环节，权力运行风险点多面广，而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可通过常态化监督、精准化执纪，厘清基层权力边界，规范决策流程与操作标准，杜绝权力滥用、暗箱操作等行为，确保基层权力在制度框架内透明运行，维护企业及职工合法权益[2]。其次，纪检监察工作立足基层业务实际，精准排查生产经营、流程管控中的廉洁风险与管理漏洞，推动基层完善制度、优化流程，从源头化解经营风险与治理隐患，提升基层治理规范化水平。再次，通过严肃执纪问责形成震慑，引导基层干部职工坚守廉洁底线、强化责任担当，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工作氛围，激发全员干事创业热情。最后，纪检监察工作能强化政治引领价值，确保企业基层治理始终契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企业战略部署，实现政治监督与业务监督有机统一，推动基层治理与企业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为企业整体发展

筑牢坚实的基层根基。

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的现状

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与企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首先，在融入基础层面，多数企业已明确纪检监察部门在基层治理中的监督定位，将纪检监察工作纳入企业基层治理整体规划，初步建立起覆盖基层部门、关键岗位、核心业务的监督网络。其次，在实践推进层面，部分企业积极探索融合路径，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参与基层重大事项决策、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台账等方式，推动纪检监察监督与基层治理深度衔接，在防范基层“微腐败”、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最后，在协同联动层面，企业纪检监察部门与基层业务部门、人力资源、审计风控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日益频繁，初步形成了多维度的监督合力，推动监督工作从“单一监督”向“协同监督”转变。但总体来看，当前二者的融合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在实践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优化。

五、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的路径

（一）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基层纪检监察人员专业素养

要让基层纪检监察力量更好地融入基层治理，关键在于把人员配置、结构优化、能力提升、复合素养、培训体系同步做实，形成稳定高效的监督队伍支撑。第一，应推动基层纪检监察岗位配置向专责化方向优化，使基层监督力量能够集中精力履行监督职责，从而更好地保障监督工作日常化运行。第二，结合基层治理任务特点完善选拔标准与年龄梯次配置，还要推动知识结构更新与能力结构升级，使队伍在理念理解、规则把握、治理适配方面保持持续活力。第三，围绕监督检查、线索研判、合规审查、纪律教育等核心能力制定能力清单与技能标准，使监督工作更具精准性与规范性。第四，围绕基层经营管理、财务审计、招采管理、数字化工具应用等领域设置跨界学习路径，使监督力量能够更顺畅嵌入治理场景。第五，将培训内容从理论讲授拓展为“制度要点 + 流程实务 + 情境演练 + 能力测评”一体化安排，使培训与岗位需求实现高频对接。第六，通过明确职业发展通道、完善绩效评价维度、建立荣誉激励与专业认证机制，增强队伍职业获得感与成长确定性，使基层监督力量保持长期稳定与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

（二）创新监督方式，推进数字化监督赋能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更好地融入基层治理，需要在监督方式上实现从线下到线上、从静态到动态、从经验到数据的升级，构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监督体系。第一，应推动监督手段向线上化与常态化转型，将重点事项监督嵌入审批、采购、项目管理等关键流程，形成“流程即监督、节点可追溯”的运行模式，使监督覆盖面更广、频次更稳。第二，应强化监督的前端嵌入与过程协同，在基层决策制定、业务执行、资源配置等环节设置监督嵌入点，使监督与治理流程自然衔接、同步运转[4]。第三，应加快建设统一的数字化监督平台，将监督所需信息与业务系统数据进行集中汇聚，形成统一的数据看板、任务分发与闭环处置模块，使监督工作实现平台化运行。第四，应提升数据分析赋能水平，将监督关注点转化为可计算、可识别的异常特征，实现线索筛选更精准、研判更高效。第五，应推动监督工具与业务数字化场景同步升级，围绕线上审批、电子合同、移动办公等场景设计监督触发机制与工具插件，完善流程节点提示、自动留痕与在线核验功能，使监督工具能够覆盖新型业务形态并实现过程贯通。

（三）搭建协同平台，凝聚跨部门监督联动合力

推动跨部门监督联动合力形成，关键在于做好领导统筹、信息互通、流程规范、职责明确、沟通协调等工作。第一，由党委纪检机构牵头，明确联动监督的组织架构、统筹职责与议事规则，形成“统一部署、统一协调、统一推进”的工作格局，使各部门监督工作在同一框架下协同运行。第二，按照监督需求构建数据目录与共享清单，将业务数据、流程信息与线索信息纳入统一交换通道，形成标准化的提取、推送与查询机制，使纪检监察获取信息更顺畅。第三，需固化跨部门协同流程，围绕联合监督启动条件、任务分派、资料调取、核验反馈与结果归集建立流程模板，使联动监督从“临时协作”转向“流程驱动”，提升协作的稳定性与可复制性。第四，需完善职责边界与责任清单，针对涉及多部门的监督事项建立分工表与责任链条，明确牵头、配合与支持职责，使协同监督在执行层面有清晰抓手，形成闭环衔接。第五，需健全沟通协调制度，建立定期会商、线索移交、联合研判与成果共享机制，使共性事项实现集中研判、集中推进，提升协同处置效率。

（四）厚植廉洁文化，营造基层崇廉尚洁氛围

廉洁文化融入基层治理要坚持目标引领、内容精准、传播多元、教育常态、示范带动与制度融合同向发力，使廉洁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第一，需明确廉洁文化建设定位，将其纳入基层治理总体规划与年度重点工作，形成长期坚持的建设路径，使文化建设在基层治理中具有清晰坐标与持续动能。第二，需提升文化内容的针对性，围绕基层岗位职责、关键环节管理要求与员工思想特点进行分层设计，构建“岗位廉洁要点 + 行为规范指引 + 价值理念阐释”的内容体系[5]。第三，需创新文化传播方式，统筹利用企业

内网、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信息平台或文化阵地，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矩阵，使文化传播更具触达力与感染力。第四，需建立常态化廉洁教育机制，将廉洁教育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班组学习与岗位培训活动，推动廉洁理念内化于心。第五，需强化领导干部示范引领，通过“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使基层员工在日常管理与工作互动中形成明确的行为参照。第六，需推动文化与制度融合，把廉洁要求嵌入采购审批、招投标管理、费用报销、项目管理等流程规范，使廉洁文化在制度运行中自然呈现、持续落地。

（五）建立监督闭环管理机制

构建全流程、规范化的监督闭环体系，实现从问题发现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管控，提升纪检监察监督与基层治理融合效能。第一，规范问题排查与分类梳理，对监督发现的问题按性质、层级、影响范围精准分类建档，明确整改方向与重点，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清晰指引。第二，细化整改责任分工，将整改任务逐一分解至具体部门、岗位与人员，签订整改责任书，明确整改标准与完成时限，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整改责任体系。第三，通过定期调度、实地核查、专项督导等方式，实时掌握整改进度，主动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各类情况，确保整改工作有序高效推进。第四，制定量化可操作的判定依据，从问题解决、流程优化、效果巩固等维度开展全面核查，确保整改质量达标过硬。第五，结合整改情况系统梳理制度与流程短板，完善基层治理相关制度规范，实现整改成效向长效机制转化。第六，整改完成后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将整改情况反馈至监督环节，优化后续监督策略，形成“发现—整改—提升—再监督”的良性闭环。

（六）完善监督评价机制

以科学量化、多元高效为导向，构建标准化监督评价体系，精准衡量纪检监察工作与企业基层治理融合成效，以评促改、以评促优。第一，摒弃单一定性描述，围绕监督深度、广度、精准度等核心维度，设定可量化、可操作的评价指标，明确指标权重与评分标准，提升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第二，在纪检监察部门自我评价基础上，纳入基层部门互评、职工群众评议、上级单位考评，拓宽评价视角，形成全方位、多维度评价格局，确保评价结果全面准确。第三，调整评价导向，弱化监督次数、覆盖面等表面指标权重，强化监督质效、问题整改转化率、风险防控成效等核心维度考核，精准匹配基层治理需求。第四，明确评价周期、节点分工与操作规范，制定标准化评价流程手册，实现评价工作程序化、规范化开展，杜绝评价随意性。第五，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将评价结论与纪检监察人员绩效核算、岗位调整、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第六，评价结束后及时向相关主体反馈结果及改进建议，结合评价情况动态优化监督策略与评价体系，推动评价与监督工作深度融合、同向发力。

（七）完善监督重点清单化管理与基层治理事项嵌入机制

精准锚定基层治理核心需求，通过清单化管控、事项化嵌入，实现纪检监察监督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精准赋能。第一，结合基层生产经营、岗位特点与业务流程，在落实上级要求基础上，细化贴合基层实际的监督重点，形成差异化清单，确保监督内容与基层治理需求精准匹配。第二，密切跟踪基层治理新事项、新流程、新变化，及时梳理新增风险点，更新完善监督重点清单，实现对基层治理全领域、全环节覆盖。第三，推动监督重点与核心业务深度融合，将清单内容嵌入基层决策执行、物资采购、人员管理、安全生产等关键治理事项，实现监督与业务流程同步推进、无缝衔接。第四，按基层治理事项重要程度、风险等级，将监督重点划分为核心类、重点类、常规类，合理配置监督资源，聚焦高风险事项强化精准监督。第五，主动收集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与治理痛点，纳入监督清单优先推进，提升监督工作的群众认可度与支持度。第六，围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合规经营、风险防控等核心目标，校准监督重点方向，确保监督工作与基层治理整体部署协同一致，切实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

六、结语

综上所述，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基层治理是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防范基层廉洁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监督模式创新，深入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深度融合路径，为企业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更全面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张高峰 . 地方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意义、现状与推进 [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5,40(06):13-18.

[2] 魏涛 .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国有企业基层治理的路径 [J]. 上海企业 ,2025(12):65-67.

[3] 张政军 . 提升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质效的路径分析 [J]. 办公室业务 ,2025(23):46-48.

[4] 刘宝元 . 新时代国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思路探析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10):189-191.

[5] 刘晖 . 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探讨 [J]. 知识经济 ,2016(15):103.

（作者系国电投 < 兴安 > 风电有限公司广西兴安政工师）

精准理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杨正才

摘要：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是夯实社会稳定根基、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落实国家顶层治理方略的关键抓手。精准理念作为科学化、精细化、务实化的现代治理思维，为破解传统粗放式基层治理困境、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引与实践范式。本文剖析了基层治理面临群众价值观偏移、政权角色转变滞后、部门协同有壁垒、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等困境，并基于精准理念，从治理体系建构、治理队伍锻造、基层基础夯实、治理能力提升、多元治理渠道拓展五个维度，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精准理念；基层治理现代化；逻辑架构；实践路径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效能直接关乎社会大局稳定、民生福祉提升与中国式现代化落地成效。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基层治理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与新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命题，将基层治理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时代以来，精准思维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在脱贫攻坚、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为基层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实践指引[1]。深入探究精准理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民族团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精准理念的内涵与时代背景

（一）精准理念的核心内涵

精准理念是精确务实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理性的实践方法，核心要义是注重具体准确，针对具体问题各个击破，避免大而化之与“一刀切”，以最小资源投入获取最大治理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精准的重要性，指出工作中要从细节着手，杜绝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扶贫工作中更是明确“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这些论述为精准理念的践行提供了根本指引。

（二）精准理念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体现

精准理念贯穿于治国理政各领域，在脱贫攻坚中，通过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综合考量家庭收入、财产状况、致贫原因等因素，确保帮扶对象精准；再以“一户一策”实施产业、教育、健康等多元扶贫措施，实现数亿贫困人口脱贫，彰显精准效能。在改革发展领域，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助对市场需求和产业趋势的剖析，去除落后产能、孵化新兴产业，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与实践范例。

（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演进速度不断加快，国际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基层治理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宏观环境的转变，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外部变量。在国内，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促使基层社会结构持续优化与升级，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人们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且精细，这推动了基层治理标准的不断提升和治理内涵的逐步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治理不仅承担着稳固社会稳定基础的重大政治任务，还肩负着提升治理效能、契合时代发展的现实任务。《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步实施”的治理原则，为将精准理念全面融入基层治理、实现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现实困境剖析

（一）基层群众价值呈现多元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多元思潮与文化碰撞使部分基层群众价值观出现显著变化，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

价值判断趋向实用化、利益化，价值取向更趋多元。这导致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热情不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象普遍，部分群众对治理工作不配合、不满意，个别经济和社会组织影响力超过基层政权[2]。背后原因包括市场经济催生个人利益至上观念、多元文化冲击主流价值观、基层宣传教育引导不力，重塑群众价值观、增强治理认同感成为重要课题。

（二）基层政权角色发生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基层政权处于全能地位，掌控生产生活资源，群众高度依赖集体。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城镇化发展，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群众诉求更趋多元。但部分基层政权未能及时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干部仍习惯“发号施令”，缺乏服务意识，部分干部消极“躺平”[3]，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现代化治理要求存在差距，导致无法有效满足群众需求，影响治理效果与公信力。

（三）部门协同联动存在壁垒

社会分工精细化背景下，政府部门“三定”方案宏观宽泛，部分治理事务出现管理“真空”，如无物业老旧小区治理因职责不清难以推进。“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部分部门下放事项未落实“费随事转”，缺乏技术与物资保障，导致基层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外，部分干部受利益驱动，选择性执行上级决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问题突出，严重影响治理协同性与有效性。

（四）基层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群众对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及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非物质需求日益增长。但多数村（社区）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托幼养老、家政服务等专业化社会组织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部分村（社区）自治组织不完善，存在“三无”小区，公益性社会组织经费紧张、活力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效能不高，难以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三、精准理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以精准为目标定位，健全基层治理体系

1. 优化机构人员配置

按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整合乡镇（街道）党政机构和站所，设置党建、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机构，允许乡镇按需灵活设置机构并保持县域相对统一。对派驻部门实行属地管理，纳入乡镇统一指挥，建立动态管理、问责等制度。优化编制配置，探索“县管乡用”“乡管村用”模式，结合人口、产业等实际灵活调整机构人员，避免“一刀切”[4]。

2. 细化层级权责边界清单

依据权责一致原则，制定市、区、街道、社区治理“三张清单”，明确与县级部门职责边界，不随意下放基层无力承担的任务。确需下放的同步落实“人财物随事转”，剥离乡镇不适合承担的经济和专业管理职能，推动重心向公共服务转移。克服村（社区）行政化，出台“四张清单”，杜绝随意摊派任务，加强清单动态管理与干部培训。

3. 深化基层赋权扩能改革

构建稳定乡镇财政投入机制，完善与区域面积、人口等挂钩的转移支付机制。制定乡镇（街道）赋权清单，明确其在重大决策、考核监督等方面的权力，支持中心镇发展，探索产业功能区优化行政体制模式。加强权力监督，保障基层资金资源投入，鼓励治理模式创新。

（二）坚持以精准为主攻方向，锻造基层治理队伍

1. 发挥“头雁效应”，优化乡镇（街道）干部队伍结构

建立干部专业背景与岗位动态匹配机制，鼓励“二次选岗”，通过督查考核梳理干部配备短板。为年轻干部配备“成长导师”，建立考核延伸制度，将包村（社区）干部考核与村（社区）考核挂钩，赋予乡镇党组织人事考核权。健全激励容错机制，提拔优先考虑乡镇工作经历人员，激发干部担当作为。

2. 发挥“鲶鱼效应”，提升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

打通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上能下”的通道，从优秀书记里选拔乡镇干部、招录公务员，推动社区书记实现社工证全覆盖，试点末位淘汰。深化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建设，建立能力与职业等级认定机制，推行“全岗通”，开展业务技能竞赛，优化薪酬与晋升体系，聚焦为民服务主业。

3. 发挥“虹吸效应”，集聚基层治理专业人才

在村（社区）配备人民调解员、民辅警、法律顾问等，设置治理专干，按“一格一员”标准配备专职网格员并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提高薪酬。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深化“法律明白人”工程，构建基层依法治理骨干体系。完善志愿者制度，联合高校企业打造社工室和志愿服务站点，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

（三）坚持以精准为问题导向，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1. 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对标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清单动态管理，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统筹资金建立全程跟踪评价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建立民生投入增长机制，科学确定公共服务配套标准与布局，构建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的服务设施矩阵，打造“15分钟公共服务圈”，推进菜市场、停车场等标准化智能化改造。

2.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分层分类推进老旧小区、街区改造，加大城乡接合部、安置点等重点区域投入，补齐水电气路等短板。因地制宜建设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解决管网混错接问题，构建排水防涝体系。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强污水和污泥处理，完善垃圾分类系统，实现原生

垃圾零填埋[5]。

3. 强化安全韧性治理

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救助”转向“事前预防”[6]，建立风险清单管理制度，搭建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完善灾害监测与物资征用机制。整合公共空间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配套应急物资储备间、微型消防站等设施。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四）全方位提升基层现代化治理能力

1. 激活集体经济动能

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推动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整合闲置资源转化为资金并入股企业。组织群众利用特色资源开辟电商平台，创建品牌，实现群众、企业、集体共赢[7]。

2. 提升智慧治理水平

建设“城市大脑”，推动传统治理优势与信息技术融合，深化视觉识别、数字孪生等技术应用。开发信息处理平台，完善基础数据，建立政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矛盾纠纷与突发事件智能处置。推进市政设施物联网改造，发展智慧物流、远程医疗等服务，精准对接信息化供需。

3. 完善育幼养老体系

发挥商业机构与社会组织作用，构建“个人 + 公办 + 民间”协同的育幼养老体系，分区分级规划服务场地，利用闲置资产打造儿童之家、城市书房等。鼓励医疗机构在社区和养老机构设点，发展日间照料、假期托管等服务，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改造。

4. 升级普惠服务供给

以完整智慧街区建设为目标，优化新建小区商业网点配置，配套共享空间。通过委托项目、经费资助等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便民服务，支持物业拓展嵌入式服务，培育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

（五）拓宽多元基层治理渠道

1. 激活群众内生动力

明确党对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8]，加强村（居）委会规范化建设，推动“两委”与业委会、物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建立治理联席会、民情沟通日等制度，依托院坝议事会等平台实现事务共商共决。创新自治形式，鼓励成立“微自治”组织，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2. 筑牢公平治理底线

将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法律下乡、入社区”行动，增强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建立法律服务站点，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三级矛盾调解机制，达成信访、法律维权与接警处置的无缝对接。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深化扫黑除恶，加强警力配备，严厉打击基层多发违法犯罪。

3. 凝聚基层治理共识

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弘扬兵团精神等地方特色精神，凝聚崇德向善共识。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爱国主义和法治宣传。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施优秀文化传承工程，挖掘特色文化内涵。建设互嵌式社区环境，推进移风易俗，彰显家教家风家庭的作用。

四、结语

精准理念是破解新时代基层治理粗放化、碎片化、同质化难题的核心思维与关键方法，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处于转型提质的关键阶段，面临价值分化、角色滞后、协同不足、供需错配等多重现实困境。唯有将精准思维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维度，通过精准建制、精准赋能、精准补短、精准施策、精准善治，全方位优化治理体系、锻造治理队伍、夯实治理基础、提升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才能有效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未来，需持续深化精准理念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能导向，持续优化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基层治理范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1] 盛美真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五个发展取向 [J]. 理论与改革 ,2020(05):156-164.

[2] 向达 . 多元协同视域下的五治结合 : 渊源、意涵及实现路径 [J]. 民间法 ,2022,29(01):377-397.

[3] 张洁云 .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为例 [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20,21(05):30-34.

[4] 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强战斗堡垒——建党百年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启示 [J]. 党建研究 ,2021(07):41-44.

[5] 李鹏 , 张奇林 . 村级党政同构：乡村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与运行保障 [J]. 学习论坛 ,2021(03):87-94.

[6] 王仲祥 , 王贝 .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迁研究 [J]. 社科纵横 ,2020,35(01):56-59.

[7] 王韬钦 .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工作认同度研究——基于湖南各经济区农村社区的研究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33(01):61-68.

[8] 沈筱芳 . 党的领导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D].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新疆政法学院校长基金项目“精准推动新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XZSK2024031）。

（作者单位：新疆政法学院）

国际友好社区治理模式构建
——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机制研究

汤雪梅

摘要：在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背景下，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金桐社区鉴于外籍居民集聚、文化多元的特点，以国际友好社区建设为抓手，将“五色课堂”服务和“五桐工作法”治理体系深度融合，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文化共融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本文对二者的协同逻辑进行剖析，探究其在“社工+”志愿服务、数字化治理、社会化协同中的融合路径，总结成效和问题，提出优化方向，为国际化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样本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国际友好社区；基层治理；“五色课堂”；“五桐工作法”；协同机制

一、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国际化进程加快，外籍居民聚集的社区增多，国际友好社区建设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金桐社区处于国际交往的重要区域，外籍居民的密度比较高，并且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鉴于传统治理模式存在局限，社区党委坚持开展党建引领工作，探索构建以“五色课堂”为服务载体、“五桐工作法”为治理抓手的协同体系，并且整合社工及数字化技术、辖区企业等多元资源，推动跨文化、国籍、代际的深度融合，处理文化隔阂、需求差异、参与不足等难题。此模式从服务和治理这两个维度发力，形成系统化方案，以此回应中外居民的多样需求，构建起共治共享的格局，对丰富国际化社区治理理论以及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二、“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的核心内涵及协同逻辑

（一）“五色课堂”：社区国际友好社区建设的特色服务体系

在国际友好社区建设中，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打造“五色课堂”，并且围绕社区建设需求，构建全维度的服务体系，对中外居民的多元需求进行精准对接。

“红色课堂”以社区党员为核心，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开展专题讲座、治理研讨等活动，并且联动中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凝聚跨文化社区向心力。在社区党委统筹推进下，“红色课堂”成为宣传党的政策、传播治理理念的重要阵地。

“金色课堂”聚焦社区老年人、青少年、外籍家庭等群体，开展定制服务与国际化特色活动，缩小群体间服务差异，做到对全年龄段民生痛点的全覆盖。针对外籍家庭子女教育、养老照护等需求，课堂提供精准服务方案。

“绿色课堂”以绿色环保为情感纽带，开展绿植DIY、家园共建等活动，促进中外居民跨代际、跨文化交流，突破语言与文化障碍，让环保理念成为中外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

“橙色课堂”聚焦培育中外居民融合的志愿队伍，推动志愿者从单纯的“服务者”转变为社区的“治理参与者”，进而完善社区多元共治格局。“橙色课堂”帮助社区成功开展了多支融合型志愿队伍的组建工作[1]。

“白色课堂”充分挖掘社区白领的专业优势，畅通企业、社区与白领资源对接渠道，推动辖区企业资源下沉，实现企社双向联动。该课堂有效激活了辖区楼宇资源，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动能。

（二）“五桐工作法”：社区国际友好社区建设的科学治理体系

结合“五桐工作法”，将“桐”诠释为同心、同筑、同融，从而形成五大治理维度。

社区“桐治理”：以党建为引领，协同居委会、专业社工、外籍居民以及辖区企业等多元主体构建社会化共治格局。

议事“桐参与”：搭建双语议事平台，开展跨文化议事规则的制定工作，保障中外居民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区决策制定当中。

阵地“桐建设”：把党群服务中心、涉外服务站

等资源进行整合，打造“一站式”服务枢纽，进而推进治理阵地的国际化升级。

搭建“桐心桥”：开展双语服务、文化沙龙等活动，畅通跨文化沟通渠道，增进理解及情感的融合[2]。

打造“桐空间”，融合中外文化元素，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促进邻里间沟通交流，增进文化交融。

“同心”促进组织协同，“同筑”夯实资源基础，“同融”实现文化共生，构建完整的三维治理体系。

（三）“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的内在逻辑

在社区实践中，“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机制，其实质是社区服务与治理体系深度融合，从而形成“服务引领治理、治理保障服务”的良性循环。这种协同性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协同，二者以国际友好社区建设为核心，推动中外居民在社区内形成共融共治、共建共享格局，体现了社区社会化协同治理的根本追求。

二是主体协同，开展“五色课堂”服务、实现“五桐工作法”治理落地，在社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整合党员、社工、志愿者、中外居民、辖区企业等多方面力量，明晰各方权责分工，推动各方协同发力。

三是场景协同，“五色课堂”所拥有的五大服务场景与“五桐工作法”的五大治理场景在社区工作中深度嵌套，比如“金色课堂”与议事“桐参与”进行对接、“绿色课堂”对接打造“桐空间”，让服务在治理场景中落地见效，让治理在服务过程中深化。

三、“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构建国际友好社区的实践路径与支撑体系

社区把“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进行深度融合，同时结合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数字化治理、AI 社工等现代治理手段，打造全场景协同的国际友好社区治理模式，借助五大维度推进落地工作，把相关内容融入社区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每一条实践路径中，嵌入相应的支撑体系，从而形成一个将服务、治理以及支撑这三方面结合为一体的完整闭环[3]。

（一）“红色课堂 + 社区‘桐治理’”：党建引领，夯实共治核心

在社区党委领导下，以“红色课堂”为抓手强化党建引领，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贯穿社区“桐治理”全过程。将该课堂作为党员教育的主要阵地，凝聚治理共识，依托党建共建、治理研讨等形式，让外籍居民、辖区国际企业代表等参与治理，明晰社区国际化融合发展路径。

专业社工牵头组建跨国籍党员志愿服务队，同时把党员帮扶、民生服务以及矛盾调解结合起来，帮助外籍居民解决生活适应和政策理解等难题，依托“社区之家”“红色课堂”与议事功能开展无缝对接。党员志愿者常态化地参与议事，夯实了群众基础，实现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二）“金色课堂 + 议事‘桐参与’”：精准服务，激活民主活力

“金色课堂”和议事平台形成工作闭环，课堂通过精准服务夯实民意基础，议事协商明确优化方向。针对社区中的特殊群体，课堂开展双语早教、外籍长者康养、国际文化体验营等特色服务，组织汉语学堂、非遗体验等活动，搭建起中外居民互动平台。

专业社工统筹策划，以“社区之家”作为主要议事场所，社区双语议事平台通过共治提案会、邻里沙龙等征集居民诉求。针对外籍居民提出的双语标识完善、国际医疗对接、子女教育帮扶等诉求，逐一纳入课堂优化方案。该治理机制引导外籍居民从“服务享受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有效地激发了社区自治活力。

（三）“绿色课堂 + 打造‘桐空间’”：生态共建，塑造融合载体

“绿色课堂”借助生态共建活动促进社区中外居民开展跨文化交互，为打造“桐空间”提供丰富实践内容的环境；同时“桐空间”可为绿色课堂提供固定落地载体，让社区生态共建成果成为文化融合的鲜明标识。

典型案例：2024 年端午节期间，社区党委依托“桐空间”牵头开展“解五毒”民俗体验活动。活动融合端午传统习俗与环保理念，通过互动游戏、跨文化解读，吸引了 200 多位中外居民参加，其中外籍居民占 30%，活动的满意度达 95%。活动现场，中外居民一起制作香囊、了解端午文化，有效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支撑体系融入：把“绿色课堂”居民绿植 DIY 的成果纳入社区景观打造中，实现“绿色家园”“友好空间”的打造。居民会客厅作为“桐空间”的核心部分，融入双语标识、多元文化元素，打破传统治理阵地功能边界，社区公共空间成为中外居民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

（四）“橙色课堂 + 搭建‘桐心桥’”：志愿培育，畅通沟通渠道

“橙色课堂”开展培育社区志愿队伍工作，为“桐心桥”的搭建提供了人力支撑，而“桐心桥”搭建中的跨文化沟通需求，又为志愿服务活动明确了方向。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组建了“金桐之霞志愿队”“外籍志愿者队”等融合型志愿队伍。

支撑体系融入：专业社工为志愿者提供跨文化沟通、社区服务技能等专项培训，有效提升了志愿队伍专业化水平。志愿者开展双语咨询、文化调解、组织邻里节等活动，畅通中外居民诉求表达渠道，化解因文化差异引发的生活摩擦，增进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

社区以“社区之家”为志愿服务枢纽阵地，为志愿者提供培训、交流、休憩场所，与“橙色课堂”“桐心桥”协同联动，推动社区志愿服务从“单向服务”转为“双向融合”，完善社区多元共治格局。

（五）“白色课堂＋阵地‘桐建设’”：资源联动，筑牢服务基础

“白色课堂”推动的业社联动为阵地“桐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阵地“桐建设”又为“白色课堂”提供了固定的落地载体，实现了社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笔者深入挖掘社区白领在金融、法律、外语等领域的专业优势，依托其所长开展楼宇工间服务、专业公益课堂等活动。

典型案例：在推进“白色课堂”过程中，社区党委调研发现，白领群体周末参与社区活动的比例不足10%。经与辖区企业协同，笔者将活动时间调整至工作日午间，参与率大幅提升至65%以上，实现了服务与需求的精准匹配。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社区社会化协同治理中“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作理念。

支撑体系融入：笔者积极推动辖区企业为社区治理阵地的国际化改造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形成了“社区服务企业、企业反哺社区”的双向循环。同时，笔者对社区治理阵地进行功能整合，将“白色课堂”的服务阵地与社区涉外服务站、AI社工服务点相融合，打造社区“一站式”服务阵地——“社区之家”。这一阵地集党建、服务、议事、交流于一体，成为“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载体。

（六）数字化治理与AI社工：贯穿始终的智能支撑

在“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推进工作中，数字化治理与AI社工作为贯穿各路径的共性支撑，其作用变得愈加重要。社区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搭建，实现了居民需求收集、活动发布、议事投票等功能的线上化。AI社工系统拥有提供基础双语咨询及信息查询等功能，能够给中外居民带来更为便捷的服务体验[4]。

目前，正在探索深化AI社工在跨文化需求分析、双语服务精准匹配等方面的应用，争取让数字化治理成为国际友好社区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

四、实践成效与现存问题

（一）实践成效

在社区党委领导下，“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发力，取得以下三方面成效。

一是跨文化融合显著提升。中外居民文化与身份壁垒有效消除，外籍居民从“过客”变“参与者”。2025年邻里节，外籍居民主动分享自制蛋糕，营造“中外一家”氛围。

二是治理水平大幅提高。融合专业社工、志愿服务、数字化治理与社会化协同，破解多元需求与跨文化沟通等难题。

三是形成可复制经验。协同机制兼具体系化与可操作性，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服务与治理融合等思路为涉外社区提供参考。

（二）现存问题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笔者发现二者的协同机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社区跨文化治理能力有待提升。部分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跨文化沟通、矛盾调解能力较弱，难以高效应对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类治理难题，亟须系统化的专业培训。

二是数字化与AI社工的应用较为浅层化。目前仅实现基础的信息录入、查询功能，数据整合分析能力不足，AI社工的跨文化需求分析、双语服务匹配等核心功能未能充分开发利用。

三是业社联动缺乏长效性机制。辖区企业资源下沉多以短期公益活动为主，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

四是外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不足。因语言障碍、对社区治理机制不了解等原因，外籍居民大多仅参与浅层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议事决策等深层治理环节的参与度较低[5]。

五、结论与展望

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该社区以“五色课堂”与“五桐工作法”协同机制为核心，开展国际友好社区治理创新推进工作，此模式借助党建引领开展服务、治理深度融合，整合多元资源，解决跨文化融合和协同治理难题，实现中外居民共融共治，体现“以人民为心中”的理念。未来，将持续开展跨文化治理、数字化应用及多元参与机制的深化工作，为国际化社区治理提供能够复制推广的基层经验，助力城市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以及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司马蕾，刘奕莎，刘艾娜．失智友好社区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基于多国模式的比较[J]. 住宅科技，2026,46(01):53-59.

[2] 韩嫣然．家庭友好型社区：托起“15分钟幸福生活圈”[N]. 中国妇女报，2026-01-08(03).

[3] 王译博，董茜．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社区“郑州样本”[N]. 郑州日报，2025-12-02(03).

[4] 宋海浩，宁盈盈．中职“五色课堂”思政教育新形态的探索与实践[J]. 大众文艺，2025(17):138-140.

[5] 王志刚，宋斌．吴忠公安打造“五色课堂”提升队伍精气神[N]. 宁夏法治报，2023-06-12(03).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金桐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师）

数字治理视域下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研究

浦颖娟

摘要：在数字治理的视角下，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正面临着提升自身治理效能的关键任务，现如今数字技术正以加速度形式不断发展，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契合新形势下教育的需求，迫切需要构建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新形势，本文分析了影响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数字治理的多种因素，提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强化教职工数字化素养，推动产教协同发展以及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体系等创新路径，从而全面提升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的数字治理水平。

关键词：数字治理；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创新路径；信息孤岛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数字中国”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教育部也明确要“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一系列顶层设计都表明，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关系到未来的教育竞争力，它是一场深刻重塑教育所秉持的理念、所构建的体系、所形成的模式和所涵盖的内容的系统性变革。对于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而言，医药卫生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以“智慧医疗”“互联网 + 健康”“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为核心的深刻数字化转型，包括远程诊疗、可穿戴设备、电子健康档案等新的业态和模式，对卫生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结构、技能素养甚至数字伦理都提出了全新的标准。对于承担着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而言，响应国家战略，把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治理全过程，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自身现代化转型的指引方向。

当前，关于高职院校数字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是围绕高职院校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框架展开多层面的探究，以此为实践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撑。二是通过实证调研与理论解析的手段呈现出高职院校在数字治理方面遭遇的诸多阻碍。三是针对治理方面存在的险阻提出一系列实践路径。四是对深层次的议题如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转型逻辑潜在风险，以及伦理边界等展开深入的探究。现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教育领域或者高校数字治理的应用和实施，针对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探究相对较少。

二、数字治理理论概述

数字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1 世纪初，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政府察觉到信息化对社会治理的重大影响，最初的数字治理侧重于电子政务，政府运用信息技术来提高行政效率，借由在线服务信息公开等手段达成对公众的有效管理 [1]。在 21 世纪 10 年代伊始数字治理的发展便逐步迈向系统化与智能化。

目前，数字治理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在组织管理决策和服务等方面实现高效透明、协同的治理模式，它不只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治理过程中运用数字技术的实践，还涉及企业以及教育机构等不同领域内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治理的框架下，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及应用成为提高治理效能、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关键基础 [2]。借助数字化手段可使信息流通更为顺畅，让决策过程更为科学进而提升各治理主体的协同能力与响应速度，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信息管理及技术应用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其中尤为突出技术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关系构成数字化治理的核心要素，从而让数字化治理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灵活应对 [3]。数字治理通过对各类资源予以调整优化与整合，推动组织达成精准管

理与高效服务，促使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变革。

三、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数字治理的现状与挑战

（一）当前治理效能分析

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现有的内部治理结构呈现出多层次、多部门的特点，目前普遍采用的是以教务科研、学生事务等多个方面为主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内部治理的参与主体主要涉及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由于受到传统科层制的影响，大多时候会造成信息沟通不顺畅、决策效率比较低下的情况，而且治理主体之间没有将权力和责任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划分，这就使得内部的协同和配合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进而对学校整体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产生影响[4]。

院校内部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逐步推进，但在多层级治理框架下，数字化转型仍面临不少挑战。多数院校在推动数据共享、进行流程再造时与当前已有的工作习惯产生一定的冲突，如果只是单纯地依靠倡导和协调，却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体系，难以对原有业务流程进行深入的数字化改造，特别是在数据管理、资源共享和决策支持等方面，亟须加强相关机制与策略的建设[5]。因此，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协同效率、推进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成为提升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向。

国家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利用当前先进数字技术，提升自身教学质量和治理水平。由于医药卫生类院校具备鲜明的行业特点，学生的实习和实训相当重要，有些院校可能投入重金购置了高端的虚拟仿真实训设备，但这些设备操作训练与真实临床所需的综合判断、医患沟通、应急处理等能力培养有所脱节。在实训实习的过程管理和评价过程中，也较少有数字化治理的融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各界对智能教育的重视程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医药卫生领域数字健康电子病历等概念的兴起，促进了校内外数字资源的整合，这种环境促使医药卫生类院校在数字治理中更加重视数据的有效利用，以及技术的更新换代，从而提升内部治理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二）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信息孤岛效应，信息孤岛效应指的是在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里，因为各个部门、各个系统之间没有展开有效的数据共享和沟通交流，这就造成信息资源分散，彼此之间不能连通的状况，在数字治理大背景下，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到了决策的科学性以及管理的实际效果，一方面，信息孤岛效应会让信息资源的重复建设情况变得更严重，进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各个部门在做决策的过程当中没办法获取到全面的信息，大多时候就会导致决策出现失误或者产生偏差，这样一来就降低了治理的效能[6]。学校的管理层和行政部门负责人大多在教育管理方面很精通，但是缺乏数字思维，很难提出有前瞻性的数字化需求，而信息技术部门人员往往技术能力比较强，但是对教育教学、医疗卫生行业业务的理解比较弱，这就导致技术和业务之间“对话险阻”。

第二个挑战是数字素养不足，在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当中，教师数字素养不够已经成为提升数字治理效能的一个主要妨碍因素，很多教师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路径，对于使用智慧教学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存在害怕险阻的情绪，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中，又缺少必要的数字技术知识以及应用能力，这种状况使得教师在利用数字工具开展教学管理的时候，会面临很多险阻，和数字治理的目标与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数字素养不足还会让教师没办法在数字治理中发挥主动作用，从而对整个院校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产生影响[7]。

四、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

（一）理念重塑与顶层设计创新，构建战略驱动的数字治理生态

数字治理转型最关键的前提就是认知革命以及顶层重构，我们要确立“以师生发展为中心，以数据驱动为引擎”的核心理念，把数字化转型从技术部门负责的项目，提升到全校发展的核心战略高度，还要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组织实施体系。所有数字化建设和流程设计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能够为教师的教学科研、学生的成长成才以及行政人员的减负增效提供实实在在的价值，进而推动管理决策以“经验驱动”为主向“数据驱动”为主的模式转变，需要成立一个由校长或者副校长直接牵头的数字化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要包括所有关键职能部门、二级学院以及直属单位，并且领导小组要定期对数字化治理工作进行研究。依托“十五五”发展规划的编制，形成有关数字化治理的规划内容，并且把这部分内容列入学校整体的中短期发展规划之中，明确数字治理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内部管理、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详细具体的贡献度指标。

（二）平台重构与数据治理创新，打造“医卫职教”特色数字底座

基础设施处于碎片化状态是效能提升面临的硬障碍，我们要从“系统思维”转变为“平台思维”，去建设有集约化、赋能化特点的新型数字平台。借助构建统一的数字平台，有效地整合教育资源、优化管理流程，从而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个数字平台要能支撑数据的集中管理和数据共享，还得能够实时监控各项指标，以此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高效利用，借助

数字平台，学校可以让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从而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

在实施数字平台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技术选型以及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愈加快速，这就要求在选择数字工具时要有前瞻性和选择性，这样才能确保投入使用的技术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需求，还需要注重对教职工进行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的培训，这样才能让教职工充分发挥新平台的优势，内外部多方协同也是数字平台能够成功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外部企业和机构进行合作，可以丰富平台的资源，提高平台的使用价值。

在数字治理的大背景下，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应该建立起健全的数据共享机制，实行数据共享就需要构建跨部门的信息平台，打破数据孤岛的局面，提高信息的流动性和透明度，借助整合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实现校内教务部门、学生管理部门、科研部门、后勤部门等之间的无缝对接，形成一个集成化的信息共享系统。

关于数据共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明确各个部门在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存储和数据的使用等方面的职责以及权限范围，这样才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还可以确保数据的使用符合相关规定，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被滥用的可能性。

想要优化数据共享机制，还要依靠现代信息技术，例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这些手段，提高数据的处理效率以及数据处理的能力，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就可以从海量的数据当中把一些有效的信息提取出来，从而实现智能的决策支持。同时还需要建立反馈机制，定期对数据共享的效果进行评估并不断完善，持续推动院校治理朝着数字化方向转型，实现创新发展。

（三）保障体系与能力建设创新，夯实可持续发展的数字根基

若没有配套的“软环境”来提供保障，就算是再先进的“硬技术”也无法发挥作用，在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提升数字治理效能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推进制度建设、人才建设以及文化建设。

在制度层面，要出台全校关于数字化治理的相关规定，用一种统领全局的思维和角度对全校的数字化治理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把数据质量、系统使用的活跃度、流程优化的贡献度等数字化的治理思维纳入部门以及个人的年度绩效考核当中，要对原来的制度进行梳理，积极引入数字化治理的思维和场景，把数字化治理真正融入党建工作、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学生管理工作、交流合作活动、服务保障工作等各个不同的层面。

除此之外，要实施分层的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在校领导以及中层干部这个层面，要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战略思维以及决策能力。在教师层面，重点培养教师利用在线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虚拟仿真和数据进行教学分析的能力，培育一批“数字教学名师”，可以根据数字治理的需求设置系统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需要涵盖数字化教学工具的使用、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的更新；在行政管理人员层面，要开展业务流程管理与数据分析工具专项培训，使其成为熟练运用数字工具提升管理效能的“业务分析师”；在学生层面，要将信息素养、数据伦理、网络安全课程纳入通识教育体系，培养其成为数字时代的合格公民与终身学习者。针对不同群体的学习和培训，都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学习方式，包括线上学习、面对面交流、研讨会等。这不仅可以提高参与度，还能增强培训学习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学校还应设立定期评估体系，以监测各类群体在培训学习后的进步和数字技能的应用效果。通过反馈机制不断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以形成可持续的数字化培训学习发展路径。

五、结语

随着新技术的涌现，数字治理的手段与工具将更加多样化，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需灵活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面提升内部治理水平。这不仅有利于解决现存的管理难题，还将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整体的教育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1] 薛艳莉，张罗琦．数字化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的逻辑、困境与实现 [J]. 教育观察 ,2025(13):39-41,44.

[2] 胡萍．数字赋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向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0):49-51.

[3] 张红艳，陈波，陈维．数智时代教育数字依赖的生成逻辑、风险审视与化解路径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5(10):43-51.

[4] 王春柳．数字化赋能高职院校治理新生态对策探究 [J]. 中国经贸导刊 ,2023(06):71-74.

[5] 李健．高职院校“数智化”转型的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 [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06):35-39.

[6] 王云波，周荣亚．新时代高职院校数字化治理能力及提升路径研究 [J]. 国际公关 ,2024(07):185-187.

[7] 刘雨航，吴照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风险与治理 [J]. 职教论坛 ,2025(10):107-1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数字治理视域下我校治理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研究”（SZWZY202429）。

（作者单位：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看不见”的脚本：算法推荐的价值嵌入与治理路径

张宁远

摘要：作为Z世代接受教育的重要场域，社交媒体对于内容的选择性推荐反映其价值负载，不同的社交媒体负载着不同的价值导向。算法作为信息分发的核心媒介，削弱了用户在信息来源、信息选择、信息保护方面的自主性，其选择的信息具有单一性、虚假性、操控性、监视性与掠夺性的特点，风险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反映出算法推荐内嵌的社群传播导向、收益最大化导向和实用内容导向。基于价值敏感设计三重方法论，在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中嵌入“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可以有效降低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伦理风险，助力网络内容生态治理。

关键词：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价值负载；价值敏感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发挥数智技术对改善民生福祉的作用[1]，Z世代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日渐增长，互联网成为Z世代接触世界、理解世界的虚拟场域。互联网平台可以分为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内容平台、工具类平台、社区论坛，其中后四类平台聚焦于特定功能，而社交媒体以用户为核心，是接收信息的主要场域，算法推荐是社交媒体分发信息的核心媒介，成为预设设计者价值偏向的“脚本”，影响用户认知与社会文化。中国主流社交媒体针对信息茧房、低俗内容与观点极化等问题的治理效果不明显[2]。根据社媒内容生态数据报告，当前主流社交媒体的内容关键词包括“随拍”“搞笑”“民生政务”“干货种草”等[3]。社交媒体内容生态由算法推荐所塑造，内容的侧重性体现了算法推荐负载的价值原则。提升社交媒体内容质量需溯源其负载的价值原则，进而在源头优化设计算法推荐，发挥社交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加强网络治理效能。

一、社交媒体算法推荐风险的多维表现

算法推荐是运用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排序精选、检索过滤、调度决策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信息的媒介[4]，其选择的信息往往依据用户偏好与点击率等指标，而忽略了信息的真实性、多样性与公共价值，对网络内容生态造成一定风险。

其一，算法推荐选择的信息具有片面性，造成群体极化与信息茧房风险，削弱了用户在信息来源方面的自主性。算法推荐通过用户的个人信息和社交圈层形成“标签”和“数字肖像”，基于语义的过滤机制（如关键词屏蔽、话题聚类）使用户接收符合自身兴趣偏好的部分信息，事实上用户得到的是“窄化”的信息并处于由算法推荐打造的信息茧房中。长期接受同类内容的社群会造成隔阂与极化，因此用户在个性化环境中失去多元信息的选择权。其二，算法推荐选择的信息具有虚假性，造成信息诚信风险。首先，互联网具有“全球范围多对多通信”“匿名性”和“可再生产性”的三大特征[5]184，允许同一人用多重身份散布信息或多个个体使用统一身份[5]371，用户接收到的信息来源与可信赖性成为问题。其次，在算法推荐的逻辑下，信息获得用户的一次点击，就可以被推荐给更多用户，即用户基于他人的推荐来获取知识。然而，用户无法保证每次点击都经过理性思考，故而在单一化、同质化的信息茧房中，用户无法识别内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虚假、错误或带有偏见的信息会病毒式传播。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算法推荐虚假信息产生的原因为数据的庞杂性、技术的局限性与人为因素。然而，虚假信息不仅源于错误的数据库，更源于选取错误数据进入数据库的价值取向。

其三，算法推荐选择的信息具有操控性，放大了情绪风险，进而危害社会秩序稳定。用户接收的信息会直接影响用户的情感与行为，算法持续推荐符合用户偏好的“窄化”信息，进而增强用户黏性，以获得更多流量和商业变现。同时算法依托社交网络推荐内容，如果群体成员具有偏见，社交互动会增强偏见的

作用[6]，具有“初始倾向”的片面内容被不断放大固化，极易引发极端化情感与行为。

其四，算法推荐选择的信息具有监视性与掠夺性，用户面临隐私泄露与滥用的安全风险。首先，算法推荐关于收集、分析与使用用户信息的边界与过程不完全公开，也难以完全理解，对用户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即使普通用户找到公开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并理解全面的技术代码。其次，算法具有“互联性”，实现了对用户行为信息的全方位监视，为各个平台的算法推荐提供了更多用户行为数据与个人信息。最后，用户若想保护自己的隐私信息，可以拒绝“知情同意”和“隐私条款”，但代价是无法完整地使用社交媒体的功能，变相强制用户提供隐私信息。

二、社交媒体算法推荐的价值原则解析

技术能够实现人的意图、拓展人的可能性，社交媒体算法推荐负载了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选择，其不同的“意向性”可以展开用户不同的“可能性”。应对上述风险，需要溯源社交媒体算法推荐负载的价值原则，并对其进行优化设计。

（一）以社群传播为导向

社交媒体中，算法推荐收集用户信息与行为数据形成“兴趣标签”，依据用户的社交图谱进行“去中心化”分发。同时，算法遵循“私域流量撬动公域流量，公域流量反哺私域流量”的推荐机制，用户点赞等互动行为对好友可见（私域），较多用户互动的内容能进入公域，公域中的内容会推荐至超出发布者的社交关系网络的潜在用户。

其一，负载社群决定个体身份的价值原则，个人的身份认同是由社群构成的[7]47。首先，“社交图谱”机制将个体信息边界预设为社群信息之内。其次，用户会因好友关注的领域而接触到非主动选择的内容，丰富身份标签。其二，负载社交推荐优先价值原则，个人只有理解所处社群的历史和文化才能解释自己所拥有的价值与目的[7]47。在数字化社群中，用户的每次互动行为都在构建自我身份[7]67。内容生产者的视频需要在所属的兴趣共同体中获得认可，方可传播到更多共同体；内容接收者选择与好友兴趣相关的视频互动，以维护社交关系。“社交推荐”机制可促进公益内容传播，人类天生具有为公众带来好处的“天然情感”，“只要是出于爱、人道、同情的行为，不论时间地点和距离远近，我们都会在心中产生愉悦和钦佩之情”[8]219。情感共鸣来自观察者在具体情境下对他人情感的观感，因此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8]237。

（二）以收益最大化为导向

在社交媒体的“流量池层级结构”机制中，算法会分析用户的互动行为（如完播率、点赞量、评论量和转发量），以决定视频是否能进入更高层级的流量池，获得更多推荐。这实质上将个体用户的快乐体验转化为群体利益，通过层级推荐机制来最大化流量收益。因此，社交媒体算法推荐，负载感官快乐最大化和流量收益最大化的价值原则。功利原理根据增大或减小利益相关者幸福的倾向，赞成或否定任何一项行动[9]58。首先，快乐与痛苦决定人类行为的选择[9]57，而简单快乐的第一种为感官之乐[9]90，15 秒的视频时长使创作者多采用猎奇的手段以激发用户的感官快乐。流量池在初次分配阶段计算个体用户的情感体验，在层级推荐阶段满足细分群体的偏好，通过更高效的利益分配来实现最大多数的快乐。

（三）以实用内容为导向

以社交媒体的 CES 评分机制为例，C（community）代表社区和社交状况，E（engagement）代表互动效果，S（score）代表评分，能够整体评价笔记的内容质量（原创性、准确性、专业性和用户反馈）和内容传播效果（传播范围、影响力、用户分享次数），以此促进创作者发布真实有用的内容。一方面，干货性的实用内容为用户提供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成为指导用户智慧实践的“德行榜样”；另一方面，推荐实用内容能直接满足用户的个人现实需求，提升用户的购买行为概率，平台也能够获得商业利益，实现互利。然而，用户在面对大量符合自身需求的干货内容时，易于产生非理性的购买行为，在算法的持续内容推荐下，用户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需求，进而购买本不必要的商品，甚至购买具有虚假效果的商品。

综上，在社交媒体算法推荐的“意向性”作用下，用户难以接收超越兴趣社群之外的多元内容，在感官快乐的刺激与大量符合个人偏好的商品推荐中，易于产生偏激的思想观念与非理性的购买行为。因此，需要优化设计社交媒体算法推荐的价值原则，规避伦理风险，维护用户的主体性地位。

三、基于“价值敏感设计”的治理路径

“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HITL）治理模式强调提升人在算法设计和运行过程中的参与度，价值敏感设计理论提倡设计者将价值观嵌入技术以引导技术发挥道德作用。算法推荐的价值原则具有多维性和历时性，但核心皆为“以人为中心”，并且最终要理解人类的价值观，能够在新的语境中作出合乎伦理的决策。

（一）“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原则

社交媒体平台存在虚假信息、信息茧房和算法操控的共性伦理风险，同时加剧了自我规训与群体驯化，剥夺了用户的自由意识。因此，源头治理需在算法中嵌入提升人的主体性的价值原则。科技的利益相关者是一个“中心”，通过价值整合克服多元主体价值排序的困境。“以人为中心”的算法推荐把用户的信息

圈视为目的本身，其内容选择的根本出发点是服务用户、促进用户的全面发展，概念框架包括推荐多元内容，实现人的全面多元发展以及培养人的美好品质。

（二）如何设计“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原则

1. 实证性调查：“以人为中心”的价值重构

概念性调查后需要实证性调查以明确具体价值的情境。在实证性调查阶段，设计者须在社会环境中理解具体价值，主要针对不同语境下算法如何贯彻“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原则这一问题，进行实践分析。

该阶段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嵌入“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其一，需要重点嵌入“安全”价值原则，例如，在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的全过程中明确何人在何种情况下，出于何种目的，访问并使用用户的信息；其二，需要嵌入“包容”价值原则，减少用户表达不符合社交共同体的价值观点的风险；其三，除可预判的语境，算法在面临新语境时也需作出合乎伦理的决策，设计师需要构建“价值函数”（某一具体语境的决策越合乎伦理，函数值就越高）[10]，使算法推荐能够自主演绎出与人类向善价值观对齐的判断。进一步，实践转化需要将具体语境的价值原则“转译”为技术编码。

2. 技术性调查：“以人为中心”的协商设计

技术性调查可以实现价值原则“转译”为具体规范，进而“转译”为算法编码，确保技术能够真正支持价值观。

首先，针对信息茧房、内容低质和算法操控的伦理问题，应负载多样性、道德判断、免受偏见等价值规范并转化为技术实践。其次，具体语境的技术转译中要明确技术能够满足的价值预期，以及是否存在概念框架中未包含的价值。直接利益相关者在终端与推荐系统交互，包括用户、企业、广告方；间接利益相关者不与推荐系统交互但仍受其影响，涉及政府、高校、伦理审查者等主体。其一，政府采取“人在回路”的治理策略，由事后治理转向事前规范，明确算法责任归属与发展标准；其二，科研院所针对流量平权悖论，加强科技伦理审查与教育；其三，企业调整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权重排序，持续更新“一键破茧”“内容偏好评估与调节”等功能，加强算法的安全性、透明性与公平性。其四，用户加强对自我隐私的保护意识，监督平台算法的监督，与单一的算法机制保持距离。同时，“价值堤坝与价值流”的方法能够处理不同平台的具体语境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先移除少部分利益相关者强烈反对的选项，再凸显被较大比例的利益相关者认可的选项，并将其纳入设计中。

价值敏感设计三重方法论需要实践检验并迭代使用，根据受试者的反馈数据，检验算法推荐的价值选择是否以人为中心，追问利益相关者是否包含更新的价值需求，以此促进概念框架、具体语境的价值重构与技术机制迭代升级。

四、结语

社交媒体作为预设价值原则的“脚本”，“放大”或“缩小”不同的内容以“转译”设计者的价值观，成为构建社会文化的“行动者”。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对用户和社会产生的风险反映其负载的价值原则。其一，算法选择感官快乐和流量收益最大化的价值原则，筛选热点内容变现商业利益；其二，通过“社交推荐优先”的价值原则构建用户的信息边界与社交圈；其三，通过“真实有用、互利共享”的价值原则为用户提供生活实践指南。“以人为中心”是算法推荐的核心价值原则，并在具体语境中进行价值重构，最后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转译为技术编码，让正能量的内容得到传播，构建优质的网络生态环境，推进网络育人。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 两会受权发布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EB/OL].(2026-03-13)[2026-03-14].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3005293?docid=13005293&newstype=1001&d=13525d9&channel=weixin&time=177344567017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强信息推荐算法治理 [EB/OL].(2025-05-22)[2026-03-2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5/0522/c1001-40485468.html.

[3]新榜.2024社媒内容生态数据报告[EB/OL].(2025-01-02)[2026-03-06].https://www.newrank.cn/report/detail/42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EB/OL].(2022-01-04)[2026-03-01].https://www.cac.gov.cn/2022-01/04/c_1642894606364259.htm.

[5]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 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 [M]. 刘钢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0.

[6] 凯斯·R. 桑斯坦 .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M]. 毕竟悦 , 译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08.

[7] 俞可平 . 社群主义 [M].3 版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5.

[8] 宋希仁 . 西方伦理思想史 [M].2 版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9] 杰里米·边沁 .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M]. 时殷弘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1.

[10] 朱松纯 . 为机器立心 [M]. 杭州 :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114..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航空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陈　巍　朱明玉

摘要：研究着力从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瓶颈问题切入，针对如何构建创新性航空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的问题进行剖析。研究首先以如何理解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的挑战问题，分析了航空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提出了在构建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将航空精神的宣传、课程体系建设、校内外合作及整合资源、实践活动设计等方面作为创新思路，系统有效地开展航空精神的渗透教育。

关键词：航空精神；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教育实践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影响，新时代的青少年生活在复杂的环境中，面对多元复杂的思想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青少年既是国家未来发展建设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者和践行者，因此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是新时期教育的重要问题。航空精神作为民族自信力和国家精神的凝聚力、反映民族自尊自强的价值和文化，具有敢于拼搏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同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团队意识，让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与航空精神相结合，有助于弥补传统教育存在的缺陷，同时还能给予青少年在思想和价值上的引导。因而，探析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航空精神的途径，对于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新时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具有重要意义[1]。

一、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四个结构性问题：首先，教育内容与青少年心理现实不符，例如，《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实施纲要》强调“坚持全团抓引领”“聚焦为党育人主责主业”，但在具体实施中青少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教育中的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并不强。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青少年成长规律、时代媒介环境相冲突，例如，《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在改革上强调课堂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教育需“一体设计”，但实践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进缓慢、衔接不畅。再次，面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性缺失，例如留守儿童、农村随迁子女教育领域的教育不足，政策上虽强调“服务青少年全面发展”“促进和助力家校社协同共育”，但实践中资源整合、体系支撑相对滞后。最后是网络碎片化、媒介多元化背景下，青少年的价值观、责任感培育面临新媒介的冲击、社群弱化、参与动机松动等现实问题。总之，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资源—媒介”四维交叉均存在结构性冲突，迫切要求通过与时代机制相适应的创新路径解决。

二、航空精神的核心价值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性

航空精神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蕴含着勇敢探索、坚韧不拔、团结协作与创新突破的核心价值，这些特质与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高度契合。首先，航空精神强调的创新意识与科技探索精神与当代社会对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需求相吻合。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传授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还要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激发他们面对复杂问题时的解决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航空精神中的创新突破精神，能够为青少年树立敢于挑战、追求卓越的价值导向。其次，航空精神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密切相关。航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度的团队协作，而这一点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对青少年社会

责任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视不谋而合，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在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平衡，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担当感[2]。此外，航空精神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坚韧品质，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对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应对挑战能力的塑造高度契合。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青少年需要具备足够的心理韧性与坚持不懈的态度，以应对来自学业、职场、人生等各方面的挑战。通过航空精神的引导，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有效激发青少年不畏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力量。因此，航空精神不仅是时代赋予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的重要源泉，其核心价值为塑造青少年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支持。

三、航空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

（一）航空精神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认知传播逐步拓展

航空精神作为有明确时代特征又富于价值引领功能的精神形态，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已有十分扎实、清晰的认知基础：航空事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科技强国建设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史本身就是航空报国、协同攻关、勇攀高峰、精益求精诸种精神品格最生动、最有力的体现，因此也是青少年理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科技自立自强最自然、最鲜活的素材。更难得的是，航空精神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能被恰如其分地转化为具体的英雄人物、重大工程、科技成果、奋斗故事，让学生在知识学习、情感体验、价值认同诸种情境中切实掌握其精神内核。

（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航空精神的融入格局逐渐形成

当前，航空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呈现课程融入、活动融入、文化融入和实践融入相结合的发展格局。部分学校和教育机构将航空精神嵌入思想政治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科技教育课程和校园主题教育之中，使其逐步进入课堂教学、社团活动、研学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融入教学不仅可以依托航空文化展览、航空主题讲座、航模制作和科技竞赛等形式展开，也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集体主义精神涵养、创新思维训练等教育内容，同航空精神中的协同作战、勇敢进取、刻苦奉献等价值理念结合起来[3]。

（三）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航空精神的支撑体系持续完善

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日趋完备，因此航空精神融入教育全过程有了十分扎实、丰富的支撑条件：航空精神教育资源绝不止是教材、课程、师资，更包括航空博物馆、航空科普基地、航空文化展馆、航空企业、科研院所、航空主题研学基地诸种社会资源，以及模拟飞行、航空模型、科技体验、专家讲座、主题展览诸种实践资源，由此自然地让青少年在课堂之外接触真实的航空文化场景，潜移默化地理解航空事业背后所承载的国家战略、科技创新及集体奋斗。更难得的是，“大思政课”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网络教育四者协同关系愈加紧密，航空精神因此能依托校内外资源联动实现内容转化、场景延伸。故而航空精神教育可真正形成课堂讲授、现场体验、项目实践、价值升华彼此衔接、互为补充的完整育人格局。

（四）航空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青少年实践活动的作用持续显现

航空精神有十分突出、清晰的实践属性，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航空事业中技术攻关、团队协作、应对风险、开拓创新诸种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故而很自然就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极有力、极妥帖的价值引领载体。正因如此，各级学校及社会机构以青少年课外航模制作、模拟飞行体验、航空科普讲解、航空主题研学、科技创新竞赛诸种活动为载体，有计划、有意识地创设知识学习、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价值体悟彼此衔接、互为促进的实践场景，让青少年在参与航空主题活动时切身感受创新意识、纪律观念、协同精神、责任担当诸种航空精神内核，潜移默化地将价值认知落到实处[4]。

四、针对航空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一）加强航空精神宣传与认知提升的措施

为了提高青少年对航空精神的认知度，首先是大力宣传和推广航空精神，使航空精神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融入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可以通过与电视、抖音、微信、新闻客户端等融媒体平台合作，以宣传短视频、互动测试、主题新闻等方式宣传航空精神的主题和内涵，以吸引青少年群体的关注。譬如，通过宣传我国航空英雄的事迹、各类航天成就等，激发青少年认识航空精神中的开拓创新和奋发有为的勇气。又如，通过定期开展航空文化传播活动、开设航空精神研究课堂，以及邀请航空专家、航天员等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将航空精神的内涵传达给更多的青少年。

（二）完善航空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

为确保航空精神能够切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课，学校应当在青少年思想政治课程框架建设上进行创新与改进，比如在思想政治课中增加“航空精神与中国

之梦”板块，将航空精神的内在价值与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可以通过案例分析航空事业发展中的创新创造与集约奉献精神，结合中国航天员的先进事迹加以佐证，以此探讨青年自身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当。再如，可将航空精神融入各个学科课程体系，如将航空历史、科学技术发展与国家崛起结合，介绍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使得青少年对于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和理解。此外，学校还要切实加强实践性，可以开展融入航空精神元素的专题性实践活动，比如航空模型的制作、模拟飞行等活动内容，促使青少年群体能够通过实践操作感受到团结协作、创新、坚持不懈的航空精神。

（三）推动校内外合作与资源整合提升航空精神教育的实践性

为使航空精神教育更具实践性，学校应积极与航空企业深度合作，将航空企业、航空博物馆、科研所等纳入航空精神教育体系中。一方面可与航空企业合作组织开展航空知识竞赛、航天模型大赛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科技兴趣，而且能通过实践操作、团队参与等深刻领悟航空精神。在学校教学过程中，还可组织学生参观航空博物馆、航空企业和科研机构，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发展前沿，认识航空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体悟航空人的团队协作精神。建立校外长期合作实践基地，结合地方航空产业特色，为青少年提供从事航空生产、科研的机会，在真实工作岗位上感受航空精神对工作的赋能作用，培养其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通过校内外合作与资源整合，不仅丰富了航空精神的教育形式，还拓展了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使青少年在不同场所都能感受航空精神[5]。

（四）加强航空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设计与组织

为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中航空精神发挥的实效，需要学校设计并组织一系列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不仅要让学生了解航空精神，更要通过亲身体验感悟并践行。比如，组织开展“航空梦想日”活动，邀请航空专家及飞行员来校开展专题报告会，并组织青少年参与模拟飞行、制作航模等参与性强的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学生对航空事业的兴趣，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航空事业中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基于航空精神的社会实践活动，还包括“航空志愿服务计划”，鼓励青少年参与航天科技科普活动，使他们在活动中认识到团队合作、责任担当、创新精神的价值。组织青少年参加与航空航天相关的夏令营活动，使其获得参与航天模拟训练、在空中航行的体验，让他们在体验中理解集体主义、勇于突破、勇于创新等航空精神的价值。在组织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不仅获得知识，还能实现心灵的成长。

五、结语

航空精神为推动我国社会进步与实现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并融合了开拓进取、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等价值观念，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将航空精神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社会道德准则，还可以丰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将航空精神充分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构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丰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深化校内与校外合作等方面着手，全方位开展航空精神教育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使学生树立高远志向、淬炼意志品质。

参考文献

[1] 曹玉枝 . 红色航空文化融入航空院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5,41(10):118-120.

[2] 关博文 , 陈正辉 . 航空报国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逻辑理路 [J]. 文教资料 ,2025(12):88-91.

[3] 李遂贤 , 王同印 , 任传永 , 等 . 航空类研究生“学科思政”实施路径探索 [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5,42(03):65-72.

[4] 张靓 . 航空报国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研究 [J].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25(01):1-4.

[5] 杨维 .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航空文化融入航空院校“大思政课”的价值与路径 [J]. 世纪桥 ,2025(02):92-9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航空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2025jqy-215）。

（作者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四个课堂”联动路径研究

李　昀　申晓善　刘本伟

摘要：高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新时代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由课内教学、校园活动、社会实践、网络教学构成的“四个课堂”育人体系，立足课内课外贯通、线上线下融合、知行实践统一，是破解高中思政课教学固化、育人实效弱化问题的重要抓手。当前学界关于“四个课堂”联动的研究多聚焦高校领域，针对高中学段的系统性实践研究相对匮乏。本文立足新课标育人要求与高中学生认知规律，阐释“四个课堂”联动育人的时代价值，厘清四大课堂的差异化功能定位，从健全联动育人机制、强化教师能力赋能、构建协同育人体系三个维度，搭建系统化、可落地、可推广的联动实施路径，旨在推动高中思政课从单一理论灌输向全方位立体化育人转型，切实提升思政教学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为新时代高中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大思政课；高中思政课；四个课堂；联动育人；教学路径

一、引言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界定高中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综合型、活动型学科课程”，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进行教学。“四个课堂”联动符合新课标的要求。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 的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实践化革新指明了根本方向。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推动教育适配时代变革、服务社会发展[2]，为高中思政课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个课堂”育人模式紧扣“大思政课”建设内核，整合课内教学第一课堂、校园活动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第三课堂、网络教学第四课堂，构建起时空贯通、优势互补、知行合一的立体化教学体系，契合高中思政活动型课程的改革要求。当前国内关于“四个课堂”联动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高校思政教育领域，针对高中学段的针对性、系统性研究较为薄弱，难以适配高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升学育人双重需求。基于此，本文聚焦高中思政课教学痛点，系统探究“四个课堂”联动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助力破解思政课理论与实践脱节、育人维度单一、教学形式固化等难题，推动高中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二、高中思政课“四个课堂”联动路径的构建意义

对于高中思政课“四个课堂”联动路径的构建意义，可从思政课本身、学生以及教师三方面来把握。

第一，有利于增强高中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提升其吸引力和感染力。构建以教材知识为核心、以教师讲授为主体的课内教学课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走出校门，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如果教学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黑板之上，迫于高考升学率的现实压力，高中思政课往往容易陷入“唯分数论”的误区，过度侧重于知识点的记忆与应试技巧的训练，导致教学形态固化，重知识传授而轻实践能力培养，重理论灌输而轻情感体验。这种教学，容易使学生感到理论空洞、与现实脱节，从而削弱高中思政课的育人效果。通过“四个课堂”的有机联动，能够有效打破时空界限，拓展高中思政课的教学场域，让思政课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变成鲜活的体验和深刻的认知，极大地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使教学内容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第二，有利于落实高中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思政课肩负的崇高使命和根本任务。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至关重要。单纯的课堂理论灌输，往往难以触及学生

灵魂深处，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对学生思想的冲击。通过思政课“四个课堂”联动的深入开展，构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体系，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四个课堂”联动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实践参与者。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模式，不仅能有效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思政课与时代发展同向同行，更能在潜移默化中锻炼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有利于提升高中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教学质量。“四个课堂”的有效联动，并非简单的活动叠加，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对新时代高中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四个课堂”联动需要强大的师资力量作支撑，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主动求变，深入研究新课标和新教材的编写逻辑，精准把握学科核心素养，挖掘“四个课堂”的结合点，教学后积极反思，确保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的内在统一。通过应对“四个课堂”联动带来的挑战，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教育创新能力都将得到全面锻炼和提升，对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也能逐步深化，从而推动整个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成长，最终实现教学质量的整体跃升[3]。

三、新时代高中思政课“四个课堂”联动实践路径

通过明确“四个课堂”的功能定位、完善“四个课堂”联动体制机制、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四个课堂”联动的现实展开提供可行路径，从而更好地达成新课标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一）明晰功能定位，筑牢四维联动育人根基

“四个课堂”育人场景不同、功能各有侧重、优势互为补充，精准界定各课堂核心职能、厘清育人边界、明确联动逻辑，是实现高效联动的前提基础。

第一，课内教学“第一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课内教学第一课堂是指在学校规定的教学时间内，按照教学计划在规定地点进行的课堂教学活动。“第一课堂”作为传统教学形态的核心载体，具有国家规定的教材、专业化的师资团队以及规范化的课时安排。在“第一课堂”，教师通过多种课堂模式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开展教学活动。“第一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主要功能在于帮助学生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利用好课内教学第一课堂，能够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为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第二，校园活动第二课堂是课内教学的延伸。校园活动第二课堂是指在学校范围内，除课堂教学之外，由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的各种文化、体育、科技、艺术等活动。“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伸，具有趣味性、高互动性和自主选择性，主要通过学校社团、党史知识竞赛、红色歌曲歌唱比赛等文体实践活动达到教育目的。在“第二课堂”，教师借助各类文化艺术课、文体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相配合。“第二课堂”作为课内教学的延伸，主要功能在于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利用好校园活动“第二课堂”，能够使学生在活动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育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第三，社会实践“第三课堂”是课外教学的新场域。社会实践“第三课堂”是指校园之外的各种教育实践场所，如纪念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等教育实践场所。“第三课堂”的关键在实践，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体验式和感悟式的教学活动。在“第三课堂”，教师深度整合纪念场馆、博物馆、革命旧址等教育资源，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此外，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专题调研任务，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第三课堂”作为课外教学的新场域，主要功能在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实践能力，促进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的结合。利用好社会实践第三课堂，能够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网络教学“第四课堂”是对教学时空的拓展。网络教学“第四课堂”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数字化教学环境，通过在线平台、工具和资源实现师生互动与知识传递的教育形式。“第四课堂”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时间与空间，具有资源丰富性、时空灵活性、多元互动性。“第四课堂”的主要功能在于突破时空限制，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利用好网络教学“第四课堂”，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弥补传统教学课堂受制于课时、受限于教室的不足[4]。

（二）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多方联动育人体系

在“大思政课”理念的指引下，构建“四个课堂”联动体制机制，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有力举措。实现“四个课堂”的有效联动，仅仅依靠学校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建立畅通有效的联动机制”，从而夯实联动基础，“真正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5]。

第一，学校方面。学校需要制定具体的方法与措施，在课时设置、经费保障、评价标准等方面制定统一的标准，将“四个课堂”联动的机制具体落实到实践层面。一方面，学校要落实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学校需深入了解国家的相关方针政策，做好保障工作和教学工作。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开发校外实践资源，并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针对新课标要求，组织教研组定期研讨，结合本地特色文化资源设计课程内容。另一方面，学校要做好教师的培训工作，形成完备的教师培训制度。

第二，社会方面。社会各方面在支持“四个课堂”联动的过程中，要尽可能提供多方面支持和保障，以形成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一是通过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鼓励社会各界为思政课提供丰富的平台，比如文化场馆、教育基地、社会实践项目等，使学生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二是通过舆论引导机制，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提高全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激发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思想成长的关注。

第三，政府方面。对于社会实践课堂，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健全资金保障机制，严格组织管理制度等，确保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落到实处。一是完善相关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学校的合作，提高社会资源的开发力度，比如一些实践基地、社区服务等实践平台。二是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仅靠学校难以长期维持。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学经费的投入，确保形成长效机制。三是严格组织管理制度。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社会实践课堂的场域选择、学生安全、组织形式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三）赋能师资建设，焕发联动育人内生活力

讲好思政课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的教学能力关系着思政课育人成效的达成度。“提升思政教师综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进思政课‘四个课堂’协同育人的关键一环”。“四个课堂”联动育人模式要求教师具备一定能力，这样才能使“四个课堂”有效联动起来，焕发联动的活力。

第一，夯实专业理论素养。高中政治教师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这是深刻理解教材、科学把握讲授内容、精准把握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如果思政课教师做不到专业过硬，对教材的理解不够透彻，便可能照本宣科，导致课内教学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思政课教师应该读原著、学经典，全面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用马克思主义感染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征服学生，这样不仅能赢得他们的尊重，更能激发他们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兴趣，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第二，革新教育教学理念。思政课改革创新永无止境，高中思政课教师要紧跟思政课改革发展的动向，及时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从而使思政课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四个课堂”联动是高中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发展方向，课内教学课堂与其他三个课堂的联动能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注入强大动力。受升学压力影响，考试成绩往往成为衡量教学效果的主要指标，部分教师可能因此将更多精力集中在课内教学“第一课堂”，而忽视校园活动“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第三课堂”和网络教学第四课堂的作用。这种功利化观念不仅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还削弱了“四个课堂”联动的实际效果。思政课教师应该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破除过度的功利化观念，树立生活教学理念，将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融为一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三，提升资源运用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学会利用教学资源。一是社会资源。思政课教师应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进社会，使知识更加生动形象。思想政治课程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名胜风景区等，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和探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网络资源。如通过人民网、新华网、“学习强国”等平台获取最新时政资讯、政策解读，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案例分析，满足学生拓展学习的需求。还可以借助VR（虚拟现实）资源，让学生“亲历”历史事件或法治场景，增强学生的参与感。总之，教师应充分挖掘并有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围绕教学目标寻找与利用资源。

四、结语

“四个课堂”联动是新时代推进高中思政课改革创新发展、落实“大思政课”建设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四个课堂相辅相成、功能互补、有机统一，“第一课堂”固本铸魂、“第二课堂”浸润素养、“第三课堂”践行知行、“第四课堂”赋能拓展，共同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思政育人新格局。新时代高中思政教学，需彻底打破单一课堂教学局限，立足学生认知规律与成长需求，持续明晰四类课堂功能定位、健全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强化师资队伍赋能建设，推动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通过持续优化联动育人路径，不断破解思政教学痛点难点，切实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性，助力培育具备坚定理想信念、深厚家国情怀、过硬综合素养的新时代青年，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2021-03-07(01).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18.

[3] 李珂.“四个课堂”联动，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体系 [J]. 思想教育研究,2017(02):122-125.

[4] 陈有红. 中职思政课“四个课堂”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究 [J]. 中学教学参考,2025(12):95-98.

[5] 付世林. 新时代高中思政课“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研究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3.

（作者：李昀、申晓善，山东建筑大学；刘本伟，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五高级中学）

课程思政在药理学的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聂金兰 *　刘桢宇　黄华奎　陈露英

摘要：“药理学实验”是医学教育的核心实践课程，是夯实学生药理专业基础、锤炼临床实操技能、培育科研思维的关键载体，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三位一体”育人目标的重要阵地。本文基于一线教学实际，深入探寻“药理学实验”课程中隐藏的思政元素，从培养家国情怀、培育严谨科学素养、塑造高尚职业操守等方面，探索课程思政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的具体实施办法。借助具体的教学案例，证实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帮助学生在熟练掌握实验操作技能时逐渐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为成长为既有扎实专业能力又有人文责任担当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打下基础，这也为医学类课程思政的常态化、实效化推进提供了可供参考、推广的实际案例。

关键词：课程思政；“药理学实验”；实践教学；医学教育；立德树人

新时代高等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落实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战略举措。教育部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明确要求[1]，各类课程均需承载价值引领功能，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药理学”是衔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药学的核心桥梁课程，其实验教学作为实践育人的关键平台，兼具理论验证、技能训练、科研启蒙与人文培育多重价值，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天然载体。伴随《“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医药行业对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职业素养、伦理操守、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标准[2]。强化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培育有仁爱之心又有高超医术的复合型人才，已然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这无疑给传统的实验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药理学实验”课的独特性，深入探寻课程思政元素怎样更巧妙地融入实验教学中，希望能够为培养德才兼备、医术高超的医学人才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与参考。

一、课程思政融入“药理学实验”教学的必要性

药理学是一门作为医学与药学之间桥梁的学科，其以实验为基础，而实验课程在药理学教学中是相当关键的部分[3]，药理学实验最关键的是，凭借一系列设计精心的实验环节，去验证药理学的诸多核心理论，以此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课程可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燃起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培育他们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态度[4]，药理学实验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从药物研发的初步探寻，经过动物实验的严格验证，直至临床转化的最终实践都包含其中，药理学实验天然有着科学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深刻意义，能让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实验教学的各个环节[5]。然而审视当下“药理学实验”教学的状况，不难发现“重技轻德”的现象较为普遍[6]，实验设计过度注重技术指标的精确考量，却忽略了医德伦理这一精神层面的培育，动物实验的操作规程虽严密，但缺少对生命敬畏之心的教育渗透，案例分析虽倾向于药理机制的深入剖析，但在职业责任的引导方面力度不足。这些问题致使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差距，无法符合新时代“新医科”教育理念下对全面培养的高要求，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时需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细微之处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科学素养与职业道德，这是教育的根本，意义重大[7]。

二、“药理学实验”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挖掘

（一）挖掘医药成果资源，培育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

在疟疾抗疟药物的研究中，屠呦呦团队研发的青蒿素展现出传统精髓与现代创新的活力，这种充满生机的成果，让学生对中华民族医药宝库产生自豪感，激发他们更强烈的认知欲望和崇敬之情，促使学生认真研读我国自主创新的药物学术著作，仔细撰写实验报告并详细阐述，课堂上积极交流心得，推动学术探讨与思想碰撞。

（二）依托实验规范体系，塑造科学精神与职业操守

借助标准化的实验技能训练，促使学生精确地进行试剂称量，全面且规范地记录实验数据，培育学生细致严谨的操作习惯，以追求较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在开展动物实验教学前，需设置实验动物伦理模块，组织学生深入探讨伦理审查案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并理解实验动物对于医学进步的关键性作用，在价值层面牢固树立尊重生命、合理规范用药的职业规范，为其成长为专业素质突出、职业道德深厚的医学人才筑牢坚实基础。

（三）依托综合实践任务，锤炼团队协作与社会责任

设计一种多人协作的综合性实验任务，比如药物半数致死量测定，这类工作对操作精度有很高要求，流程衔接必须严密，通过这些任务让团队成员在分工中调整沟通方式，提升合作效率，增强个人对团队目标的投入感，从而优化整体实验效能，针对当前社会关注的“抗生素滥用”问题，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调研并编写社区抗生素使用指南，在药敏实验教学中结合用药安全内容，穿插公共卫生相关知识点，使学生理解医药工作与社会健康的紧密关联，逐步培养其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意识。

三、课程思政在“药理学实验”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一）教学目标重构

以专业能力培养为根本，一方面关注知识目标的实现，采用分层教学，让学生准确理解药理学实验的基本原理，熟练操作实验技能，另一方面从能力目标切入，通过分析变量、排查问题等环节，提升科学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入思政目标维度，紧扣药学职业道德，着重培养以病患为中心的职业价值观，最终构建专业知识、实践能力、价值引领三者协同的教学目标体系，打破传统实验教学仅侧重技能传授的局限。

（二）教学方法创新

为达成思政元素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目标，该校运用了两类有特色的教学方法，其中一种是临床案例沉浸式教学，挑选典型的用药安全案例，如可乐定长期用药后突然停药导致血压反跳的事件，引导学生从药理作用机制方面着手，剖析问题的根源，还要探讨临床用药实践中规范操作以及人文关怀的意义，让学生依据案例撰写包含伦理思考的分析报告。另一种是角色扮演式情境教学，其最关键的是设计新药临床试验的模拟场景，使学生分别担当伦理审查员、临床研究者、患者家属等角色，凭借模拟伦理审查会议中的意见讨论、风险评估等环节，帮助学生树立法治思维，提高其在实际工作中平衡“科研需求”与“伦理底线”的判断能力。

（三）评价体系优化

为防止思政评价仅停留在表面形式，我们特意构建了一种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互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在过程性评价这一环节里，专门设立了思政评价模块，此模块具体囊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为实验报告中的伦理反思部分，着重考查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对数据真实性等相关问题的理解程度，其二是组内协作互评部分，会从责任担当以及沟通合作等多个维度对学生的团队素质展开评价。该思政评价模块在课程总成绩中所占比例为 30%，借助量化指标的方式，保证价值引领与专业评价同步推进，以此全面评估学生的综合素养情况。

四、教学实践案例：家兔呼吸循环抑制解救实验的课程思政设计

（一）明确教学目标

以课程思政理念为根本，依据实验特性确定三维目标，使专业训练和价值培育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要完全了解家兔呼吸循环抑制的病理生理机制，必须熟练掌握气管插管、药物急救等技术并能识别出各种抑制程度的治疗方法。

能力目标是根据实验中家兔呼吸频率、心率等各项指标的改变来快速判断抑制类型，灵活应对，准确开展急救。

在素质目标方面，依靠开展实验操作来培育科研人员严谨细致的科研作风和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强化生命至上的职业理念。

（二）完善教学环节

在课前阶段，凭借学习通等线上平台，为学生推送与实验相关的病理机制动画以及操作规范微课等预习资源，同时附上一篇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科普短文，以此引导学生提前形成“操作即责任”的认知，课堂实施环节采用“情境导入—任务驱动—反思升华”三步方式，通过一段“院外某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急救医生争分夺秒抢救患者”的视频引入新课[8]，画面中院外某位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情况万分危急，急救医生迅速响应，争分夺秒地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这段视频以其高度的真实性和紧迫感，瞬间将学生们带入了一个真实的临床急救场景之中，使他们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通过这样的引入方式，学生们不仅被深深吸引，更激发了他们主动思考如何有效应对此类紧急状况、探索解决方案的强烈欲望，在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随后，教师开始详细讲解操作任务，强调在练习过程中必须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追求卓越，将每一次实验操作都视为对真实患者的救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对待。如在操作过程中动作要轻柔细致，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以最大程度地减轻实验动物的痛苦，这不仅是技术要求，更是对生命尊重的深刻体现。在急救操作环节，模拟突发状况，如通过模拟在限定时间内抢救处于危重状态的家兔，让学生们在紧张而有序的氛围中锻炼心理素质，提升

决策速度，培养应急反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课程总结环节，教师特别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要求学生们将实验结果认真整理后上传至学习通平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操作过程中的得失进行反思，激励他们不断改进和提升实践操作技能，追求更高的专业水平。课后，学生们需迅速完成实验报告，并将实验操作过程精心制作成微视频，上传至学习通平台，分享他们的学习成果与心得，同时还需积极参与学习平台上的讨论、答疑和测试活动，激发自身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培养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反馈中，成效较为明显，90% 的学生感到实验提升了他们的“敬畏生命”意识，85% 的学生表示对临床急救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78% 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使他们深刻体会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及大医精诚的人文关怀，88% 的学生认为在面对困难时，应积极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不放弃任何有希望的可能性。教学反馈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通过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可以了解教学效果和学生的需求，为今后的教学活动提供参考和改进方向。

五、教学反思与优化改进策略

（一）提升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要打造契合课程思政需求的师资队伍，需要构建一套“培育—实践—交流”三位一体的系统成长机制。在培育方面，抛弃单一的研讨会模式，设计分层递进的培训体系，基础层聚焦课程思政核心理念的解读，帮助教师明确价值引领与专业教学的界限，进阶层开展思政元素挖掘工作坊，针对药理学实验中的动物伦理、用药安全等场景，详细指导教师设计思政融入方案。在交流方面，搭建跨学科思政教研平台，除了和思政课教师进行常规研讨，还新增临床药师专题分享会，邀请临床药师讲述用药纠纷中的伦理决策案例，让教师获取更鲜活的思政教学素材。在实践方面，安排教师定期参与药企的药品质量管控、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等工作，把行业实践中的思政感悟转化为课堂教学的生动案例。

（二）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以药理学实验教学的职业导向特性为核心，搭建起“场景共建—师资共融—标准共定”的校企协同体系，在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和药企携手打造药理学实践教学中心，中心里设有模拟药房等场景，以此还原真实的工作环境，在教学模式层面，把传统双导师制升级为“双导师 + 项目驱动”模式，企业导师不再只是参与课程设计，而是主导用药方案优化等实际项目，引领学生完成从实验操作到职业应用的整个流程训练，学校导师则同时引导学生思考项目中的职业规范与伦理要求。在标准制定环节，联合企业一同开发药理学实验思政考核标准，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临床用药安全准则等行业标准，分解为操作规范性、数据真实性与应急责任意识等可量化的考核指标，融入实验总成绩评定之中，使学生在学习阶段就建立起与行业接轨的职业素养。

六、结语

将药理学实验教学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新医科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破解传统实践教学重技能、轻德育的育人困境，实现专业能力培育与职业素养塑造协同推进。通过重构三维教学目标、创新多元教学方法、优化综合评价体系、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课程思政育人格局，切实培育兼具扎实专业技能、严谨科学素养、高尚医德操守的复合型医药人才。未来仍需持续深耕“药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断优化育人路径、丰富育人载体、完善育人体系，持续提升医学实践教学育人质量，为健康中国建设输送高素质、有担当的新时代医药人才。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2020-05-28)[2026-02-21].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2] 庄琦 . 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成就与经验 [J]. 管理世界 ,2022,38(07):24-37.

[3] 徐静雯 , 臧林泉 , 王桂香 , 等 . 线上线下融合式药理学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J]. 药学教育 ,2025,41(01):121-125.

[4] 臧林泉 , 韦锦斌 . 药理学实验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0.

[5] 朱琳 , 仲华 , 阎澜 , 等 . 课程思政在药理学实验教学中的运用 [J]. 军事医学教育与培训 ,2023,44(01):28-29.

[6] 杜文彬 . 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重要性的研究 [J]. 卫生职业教育 ,2013,31(05):15-16.

[7] 曲卓 , 石英 , 王锐 , 等 . 药理学课程教学中思政元素的合理融入 [J]. 药学教育 ,2023,39(01):22-25.

[8] 刘丹 , 邓雪松 , 孙志爽 , 等 . 基于 OBE 理念的药理学实验课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J]. 卫生职业教育 ,2022,40(22):89-9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玉林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知识图谱 +BOPPPS 教学模式在中职《药物基础与应用》中的应用研究”（2025B1008）；2023 年广西医科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混合式教学融入课程思政模式在《药理学》中的应用探讨”（2023YC25）；2021 年广西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SPOC 联合 PBL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药用植物学中的应用研究”（2021XJGB63）。

（作者：刘桢宇、黄华奎、陈露英，广西医科大学玉林校区、附设玉林卫生学校讲师；通信作者聂金兰，广西医科大学玉林校区、附设玉林卫生学校讲师）

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

薛依沙　何　菲 *

摘要：当前，我国高校思政与校园文化建设协同育人的实践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机制不健全、美育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以及资源配置不充分的问题，需要深入探究和分析当前协同育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揭示现存问题根源。基于此，本文立足美育视域，首先阐明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与校园文化协同育人的现状，然后提出针对性策略与保障措施。研究旨在进一步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在美育视域下的深度融合，通过提升协同育人的实际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育人成效。

关键词：美育；高校思政；校园文化建设；协同育人

美育是一种旨在培养和提高人们认识、体验、感受、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其目标在于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温润心灵，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创造力，以及促进其实现全面发展。高校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和实践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通过精神、制度、物质和行为协同发展，形成体现学校共同价值体系和办学理念的系统工程，重点在于通过营造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促进师生全面发展。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协同育人模式能整合三者优势，在教育方面形成合力[1]。通过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增强学校师生凝聚力，并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强化其道德品质，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一、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课与校园文化协同育人的现状

（一）协同育人的探索成效

近年来，随着“五育并举”政策的推进，部分高校已开始尝试将美育、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并初步取得实践成果。这些实践主要从课程教育与校园文化活动两方面着手，通过在思政教育中融入经典音乐、画作等艺术作品的赏析，引导学生在美育过程中学习思政知识。在校园文化活动中，通过举办红色主题文化艺术节或思政主题的书画展等活动，通过将思政教育、美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此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认同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

（二）协同育人存在的问题

1. 协同机制不健全

现有的协同实践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未形成常态化、系统化的协同机制。部分高校虽有探索美育结合思政课程的文化活动，但三者在活动中存在脱节问题，导致育人目标分散，未能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优势。

2. 美育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对于美育，许多高校通常将其视为艺术技能教育，主要通过音乐、美术课程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未能将审美理念融入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过程当中。

3. 资源配置不充分

协同育人工作需要充足的师资、场地、资金等资源提供支持，但在实际过程中，负责美育的教师缺少思政理论知识，未能建立起具备协同教学能力的专业教师队伍。再加上实践活动主要以讲座、展览等形式展开，缺少数字化、沉浸式的实践活动，对当代大学生的审美需要和认知习惯缺少适应性。

二、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课与校园文化协同育人的对策

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与校园文化协同需要加强协同机制，形成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模式，具体应从课程、活动和环境三个方面着手[3]。

（一）课程协同

1. 思政课程设计

在思政课程中融入审美元素，需要将生硬、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形象、具体的美学作品展示。例如，

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中，知识点多为历史史实，并包括大量时间点，学生记忆起来负担较重，但是在授课过程中适当插入《黄河大合唱》《开国大典》等艺术作品，不仅可以引导学生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切入知识点，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的历程，还能让课堂教学更具故事感，从而吸引学生的兴趣，降低其认知负担，并深化其思想认识。

2. 专业课程设计

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应当根据课程特点，筛选与课程内容联系紧密的思政元素与美育元素，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完成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和审美培育的统一。教师可以采取分层教育以及小组合作的形式，为不同层次学生安排不同的学习目标，并要求各个学习小组成员担任不同职责，承担不同的学习任务，共同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以此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提高他们的课堂参与度与活跃度，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

3. 美育课程设计

将思政元素纳入美育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应当注意避免出现重视技能而轻视审美价值的现象。对于美术与音乐等艺术类学科，教师除了教授专业技巧之外，还要注重思政元素的融入。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展示历史故事的电影、短片，为学生剖析画面设计、空间布局或是片中配乐技巧与音乐特点等艺术知识，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历史故事，在进行艺术培训的过程中植入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并鼓励其以其他英雄模范的实际事迹进行相应的艺术创作。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以此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到创作中来，在美育课程中完成思政教育的任务。

（二）活动协同

1. 打造红色美育主题活动品牌

学校可以选取学校所在区域及周边存在的先进案例为依托，邀请学校师生共同参与打造红色美育主题的活动品牌。学校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开展一系列美育活动，有效传承红色精神与文化。为强化品牌的记忆点，还可以设置专属的红色美育主题活动品牌专属文化节，每年固定在节日期间举办合唱比赛、话剧表演、摄影展等活动，并为参加活动的学生提供由学生设计的、具有学校特点以及红色主题相关的文创书签、笔记本等纪念品，以此吸引学生踊跃参与活动，强化全校师生的凝聚力。

2. 开展校园美育文化活动

学校可以从学校特点出发，通过挖掘校园里的思政元素与美育元素，开展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文化活动。可以鼓励学生以校训、学风建设等主题设计校园地标、文化走廊等景观，从而在校园内营造出浓厚的美育氛围，为师生带来沉浸式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也可以让学生拍摄校园内其他师生的助人行为或环保行为等，用影像传递正能量，鼓励师生共同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这些活动不仅能提升校园的美学内涵，也能让师生树立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学校文化建设的活动中来。

3. 数字技术创新美育思政形式

在教育数字化的政策背景下，学校应当顺应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趋势，主动引入与智能技术相关的设备为师生提供物质资源支撑，并利用这些技术与设备，打造更具沉浸感与互动性的活动。学校可以利用VR技术，为学生提供数字化观看历史故事或校园文化成果的数字平台，也可以鼓励学生利用校内机房安装的视频剪辑软件、动画制作软件等，以Vlog、动画等形式讲述具有积极引导作用的思政故事或美学作品，并通过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账号、官网、食堂电视、校园文化墙等线上线下渠道推广学生作品，扩大育人工作的影响范围。

（三）环境协同

环境对个体的认知发展与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可以为学生打造美育、思政以及校园文化相融合的校园环境[4]。

1. 打造美育与思政相融合的校园环境

通过在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融入思政内涵与美育元素，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学校也可以建设校训文化广场，通过雕塑、石刻等艺术形式展现校训精神，并搭配绿植、灯光等景观设计，提升景观的审美价值。又或是建设红色主题的文化长廊，以连环画、油画、摄影作品等艺术形式，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时代成就，使学生在行走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熏陶与审美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思政教育应当与校园文化相结合，学校应当充分挖掘学校历史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独特的育人氛围，避免因文化环境同质化严重，缺少特色，无法吸引学生兴趣，导致环境育人效果不理想。

2. 培育美育与思政引导的精神环境

立足于校风、学风、班风建设，传递美学育德、美学育智的理念。在校风建设中，强调求真、向善、尚美的价值追求，通过评选“最美大学生”“最美教师”，为学校师生树立道德与审美兼具的榜样。在学风建设中，将学科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开展学术海报设计大赛、科研成果艺术化展示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形式美、创新美。同时，可通过校园广播、校报、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开设美育思政专栏，通过分享美学资源、思政故事，营造出富有美感且正面积极的精神氛围。

3. 建设开放共享的育人环境

开放的环境育人格局能帮助学生将校园所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升思想认知与审美能力。育人虽然

是学校的主要任务，但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与配合。因此，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协同育人的实践可以走出校园，通过与本地美术馆、博物馆等事业单位进行合作，整合校外资源，拓展环境育人空间，将校外文化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为学生提供可以定期参观学习的校外环境。

三、协同育人的保障措施

（一）制度保障

成立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教学科研处、学生处、团委、美育教学等部门组成的协同育人领导小组，并明确各部门职责[5]。还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实施方案，明确协同育人的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评价标准等内容，并通过定期举行会议，对协同育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应对措施，不断推进协同育人工作持续深化并取得良好效果。对于评价的结果，要求全面评估协同育人的成效，不仅要包括课程设计、活动组织等过程性的评价内容，还要包括学生思想素质、审美能力、态度变化等内容在内的结果性评价，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确保评估客观公正，从而为后续改进提供可靠的参照。

（二）资源保障

为保障协同育人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取得理想效果，学校方面应当从经费、场地、设施以及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可以设立协同育人专项经费，并将其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将其用于课程开发活动组织、师资培训、文创产品开发等必要支出，以及为活动场地租赁、道具采买、奖品设置等提供经费。为确保资金能够服务于协同育人项目，必须设置专门的经费监督机制，确保经费实现专款专用、有效利用，避免出现贪污腐败或资源浪费等问题。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协同育人提供支持，通过建设协同育人数字平台，有效地整合课程资源、活动信息以及学生作品等信息，方便师生随时随地便捷查阅。也可以开发专门的活动系统，用于学生参与活动报名、提交作品以及进行网络互动，以此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并为学生提供可靠的活动反馈渠道。基于此，还应配备专业的技术团队，为系统提供维护与升级等服务，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三）人才保障

协同育人的主导者是教师，因此需要通过培训、交流、人才引进与合作等方式，提升教师团队的思政素养与美育能力，以此打造现代化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学校需要定期组织思政教师、美育教师、专业课程教师参加协同育人相关培训，更新其思政理论与美育知识，使其学习融合性的教学方法等。培训方式除了邀请专家或外校优秀教师，也可以是线上课程，以此便于教师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还可以组织教师前往协同育人成效显著的高校继续调研学习，从中汲取优秀经验，并进行本校化改良。并将协同育人能力纳入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的考核指标，以此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也可以建立由思政教师、美育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共同组建的协作团队，通过合理分工，由他们共同开展课程设计并组织活动。其中，思政教师负责对思政元素进行挖掘，以及提供课程相关的思政案例，美育教师则负责将审美元素融入思政材料，并由专业课教师进行知识内容的衔接、教育与反馈，从而实现美育、思政与校园文化活动的流畅贯通与紧密衔接，从而提升协同育人的效果与质量。

通过外聘他校教授或邀请讲师入校等方式引进校外人才，可以丰富学校的师资队伍结构。同时，学校也要注重对内部人才的培养和挖掘，通过鼓励教师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形成多元化的教师团队，为协同育人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结语

美育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协同育人实践，不仅是对当下教育模式的创新与突破，更是对时代发展背景的顺应。这一实践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思政素养与审美能力，更激发了他们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培养具有情操高尚、知识渊博与能力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洁明 . 大思政视域下高校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J]. 改革与开放 ,2024(14):14-23.

[2] 王诗琦, 张富成 . 五育并举视域下美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J]. 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2025(12):223-225.

[3] 刘茜 , 周家华 . 思政教育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41(01):8-13.

[4] 周欣颖 . 思政元素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 [J]. 时代报告 ,2025(03):99-101.

[5] 郑金召, 王琦 . 基于高校思政教育视域下校园文化建设路径 [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2(01):114-1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北海职业学院校级辅导员专项研究课题“美育视域下校园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FDYY06）；2024 年度北海职业学院校级辅导员专项研究课题“‘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学风优化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2024FDYY05）。

（作者：薛依沙，北海职业学院讲师；通信作者何菲，北海职业学院助教）

“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形成探索

李　钦

摘要：当前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塑造，直接关乎个人成长以及社会人才配置效能，其价值观呈现出多元特征，部分学生存在就业认知偏差，在就业过程中过度关注个人的职业发展与舒适体验，忽视国家需求发展与社会责任。传统的思政教育针对性不足，难以满足学生就业引导及就业能力提升的现实需求，因此本文立足精准思政视域，阐述了该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养的价值，分析了当前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多元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并从精准开展思想引领识别需求、精准供给内容、创新多元培育载体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进而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为高校创新思政育人模式、提升学生竞争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就业价值观；精准思政；思政教学

精准思政强调以精准识别为前提，以供给为核心，可以实现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需求的匹配，将精准思政融入大学生就业的价值观培育，可以有效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并满足大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中，高校应通过多维度数据收集与分析，构建精准的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画像，搭建多维数据采集平台，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并基于画像制定分层分类的培训内容，实现内容与需求的精准化匹配。高校应依托数字平台实现线上精准推送，开展实践教育，并实施个性化辅导，还应精准构建评价反馈体系，优化培育机制，进而提升就业价值观培育的科学化水平。

一、“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形成培育的意义

（一）筑牢人才根基，凝聚价值共识

“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培育是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核心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关键阶段，对人才的需求转向价值契合与能力精准[1]。传统的就业指导忽视价值观层面的深层对接，导致学生因价值观偏差，不愿投身国家战略领域，在精准思政下开展价值观培育，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树立个人职业选择与国家战略同频的价值导向，这种精准培育能从源头上破解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为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就业价值观直接关系到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部分大学生存在功利化就业倾向，忽视职业的社会价值与国家意义，精准思政就业价值观培育，可以从思想深处筑牢青年的家国情怀，通过系统培训，引导学生树立“劳动光荣、奉献崇高”的职业观，还可以将国家发展目标、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就业价值观培训的过程中，确保青年人才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2]。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高校就业价值观培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抓手，其关系到学生成为什么人、怎样成为这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传统育人模式忽视价值观的深层培育，“精准思政”视域下开展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可以精准对接学生的成长需求，将就业价值观培育与专业教育、实践教育深度融合，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践行职业责任，确保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坚定的价值立场。精准思政通过精准供给内容、精准适配方法等，能够直击学生的思想困惑，以精准识别需求为前提，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行业趋势，更好地把握社会对人才的价值观要求与能力需求，帮助学生明确职业方向；将就业价值观融入专业教学，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这种方式能够提高高校育人的精准度。传统思政教育难以引发学生共鸣，导致思政育人实效不足，精准思政下培育就业价值观，可以将抽象的思政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职业选择指导，积极创新思政教育载体与方法，推动思政教育创新，破解传统思政教育的痛点，并帮助学生把握好就业趋势，树立契合时代发展的就业价值观。

二、精准思政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特征

青年一代彰显着时代的个性，大学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高校思政教育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将思政教育渗透到人才培育的全过程，是当前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精准思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任务，进一步从整体层面、全局入手，以“三全育人”为导向，将思政工作贯穿到各领域。为发挥好思政课的功能和作用，就业价值观培育应明确课程的协同性，将思政课与专业课、实践课有机衔接，还应整合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资源整合、经验共享，形成覆盖面较为广泛的思政育人网络。

三、“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精准定位模糊

部分高校对精准思政的理解停留在技术层面，将其等同于就业信息的精准匹配、求职技术的精准培训，忽视就业价值观培育的核心，导致培训工作陷入重技能轻价值的误区，忽视对学生价值困惑的精准研判与引导，背离了精准思政的引领本质[3]。在培训过程中，部分学校沿用传统的说教式、理论式的讲解方式，未结合学生的成长阶段、专业背景进行分层分类解读，导致价值引领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脱节；而且还忽视学生就业价值观形成中的深层诉求，导致培训内容与学生实际需求“两张皮”。学校将就业价值观培育与精准施策割裂看待，未将思政教育的核心价值融入就业指导全过程，就业指导中只关注学生的职业选择结果，未引导学生认识职业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关联，导致学生就业价值观呈现功利化倾向[4]。

（二）精准机制缺失

“精准思政”视域下就业价值观培育，需要构建分层分类、动态协同的体系化机制，但当前多数高校尚未建立完善的分层分类培育机制，仍然采用“一刀切”的培训模式；教育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容易受到行业、社会、学生等多重因素影响，需求呈现持续变化的特征。但当前精准培训体系缺乏动态调整机制，如高校未建立常态化的学生就业价值需求跟踪机制，面对国家战略调整、行业技术变革等，培训体系未能及时迭代优化，也未能引导学生理解技术变革对职业价值的影响。

四、“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育路径

（一）精准开展思想引领并精准定位

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形成是个体、环境、教育等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精准思政下，应聚焦不同学生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识别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大一大二学生的需求集中在职业认知探索、行业发展洞察等；大三学生的核心需求是职业定位与价值匹配，应关注其对职业发展空间、价值意义的深度诉求。针对特殊群体应识别其个性化需求，如学习困难、就业困难学生，核心需求是就业信息重建与基础能力补位，应精准识别其技能短板、心理障碍，以及在就业过程中价值认可的隐性诉求。新兴专业、传统专业学生的需求各不相同，传统专业学生的需求侧重于专业转型与价值重构，应识别其在行业竞争下对职业适配性、创新突破的诉求。

（二）精准供给内容

精准供给是精准思政培育就业价值观的核心，应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分层分类定制培育内容，精准思政实践下就业价值观内容供给，应紧扣学生需求，精准匹配时代要求等，如帮助大一大二学生建立对职业世界的理性认知，搭建基础就业价值观框架，针对大三学生，应锚定价值方向分析专业对应的行业领域、核心岗位以及职业价值属性，建立合理的价值排序。高校应设计专门的职业规划课程，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内容体系，结合学生的专业职业目标完善模块化内容，如价值认知模块，讲解不同职业的核心规范并解读国家就业政策，价值判断模块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价值排序。在职业兴趣探索相关课程中，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与老师沟通交流，促使学生基于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方案。

（三）数字化赋能载体

数字化时代，高校应充分利用智慧校园平台、就业指导、App、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基于学生的价值观画像，精准推送个性化的培训内容[5]。学校可以开发不同职业的VR场景，如工程师的制造车间场景、教师的课堂场景等，使学生通过VR设备体验不同场景下职业岗位的价值，并搭建元宇宙就业空间，使学生通过虚拟身份参与虚拟职业任务，在互动中理解职业价值[6]。

当前时代背景下，学校应重视数据的建设工作，依托校园信息化系统整合学生的行为轨迹、就业意向等数据，基于数据挖掘精准识别学生的核心诉求，自动推送视频内容。数据整合中引入先进的工具，如云技术、智能算法等，重视数据的迭代处理，进而为学生精准推送内容。例如，为大一学生推送与职业认知有关的视频，为大四学生推送就业决策案例等，并通过平台的互动数据实时评估载体效果，动态调整推送策略。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在当下被大学生广泛应用，学校还应不断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积极拓展新媒体平台，如开发就业价值观云课堂、行业趋势数据看板等模块，学生可以利用机器人获得基层就业政策、校友案例等数据。当前短视频、观看直播等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高校应积极打造就业价值观微课堂系列短视频，充分挖掘投身国家战

略的校友故事，制作时长较短的微纪录片，用真实故事传递责任担当、坚守等价值，还需要针对就业中的价值观偏向，制作与求职避坑有关的短视频，强化学生的风险意识。

（四）积极开展实践体验教育

实践体验是深化就业价值观认知的重要途径，高校应构建场景化载体，聚焦学生日常学习的核心场景，通过环境营造、日常引导等实现价值浸润，如在教学楼、食堂设置文化墙，展示行业价值标语、就业价值观金句等，建设职业体验角，放置职业评测工具、展示行业数据等，使学生在课余时间获得就业价值信息。教师还应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展差异化的实践体验活动，比如组织有投身基层意愿的学生开展基层岗位体验活动，组织理科生开展科技企业研学活动。同时，将就业价值观融入校园品牌活动，成立职业发展协会，开展行业调研、求职模拟活动，开展“我的就业价值观”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在案例讨论、情景模拟中梳理自身价值排序。实践是知识内化的重要渠道，实践活动中应结合时代的发展特征，强化学生的就业观念，鼓励学生利用节假日或寒暑假，投身于生产一线，积极进企业、进社区开展社会调研、实习实践等活动，进而使思政教育与社会有机结合，提高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

教师还可以在专业学习场景中，使价值观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在机械制造相关课程中融入大国工匠的责任担当，在文科课程中通过反面案例警示虚假新闻的危害，并强调实验课程中记录实验数据必须保证真实性，强化诚信科研的价值观。学校还应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抓手，积极鼓励学生在社会生产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实践中，掌握创新创业知识方法技能，并拓宽校内与校外发展渠道。校内实践载体打造过程中，可以设置模拟招聘会，模拟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学生扮演求职者、创业者等角色，参与模拟招聘、创意策划等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开展就业价值观实践项目，组织学生调研本地重点行业、撰写行业价值观调研报告，要求学生结合自身专业兴趣，制定个人职业规划。学校在实践过程中，应与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开展职业价值观培训，安排企业导师一对一指导，引导学生在岗位实践中践行责任担当，诚信守规；组织学生赴乡村开展支教农村产业调研，并组织学生参与企业科研项目、高校实验课题，在科研实践过程中，锤炼创新精神与责任担当。

（五）构建家校社联动格局

就业价值观培育应打破学校单一主体的局限性，在大思政视域下，学校应积极整合社会、行业、企业、家庭的思政育人资源，构建协同联动载体；校企协同载体中，应与企业共建就业价值观育人基地，邀请企业高管、技术骨干担任校外导师，将部分就业指导课程搬到企业现场。相关政府部门应围绕大学生就业问题，颁发各类指导政策，制定一系列有关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计划方案，使各方能够明确自身的育人责任、义务。学校应持续推进家庭与学校的内在联系，建立常态化家校沟通机制，通过线上家长课堂、家访的形式，发挥父母言传身教、文化引导及家庭对学生个人品德、就业价值观的作用。积极开展家庭职业价值分享活动，邀请家长分享自身的职业经历与价值感悟，组织家庭职业规划讨论会，使家庭与学校达成价值共识。社会教育方面，学校在引领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前提下，应发挥自身的主渠道作用，与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合作，共建就业政策宣传站，及时解读国家就业政策，联合开展基层就业、创业扶持等项目。同时，为大学生提供义工服务、公益职教实习培训的机会，如与行业协会合作，开展行业趋势分析、职业标准解读等，使学生了解行业的核心价值与发展趋势。

五、结语

综上，精准思政为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在国家层面可以筑牢人才根基，在社会层面推动社会进步，在高校层面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核心抓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应进一步探索技术赋能的新路径，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精准推送，并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展差异化的实践体验活动，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并结合学生的专业学历、职业目标等目标，制定培育模块，强化价值引领。

参考文献

[1] 刘惠 . 思政教育赋能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养路径探析 [J]. 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 ,2024(01):221-229.

[2] 杨殿毅 , 王越芬 . 就业价值观视域下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现实审思与消解策略 [J]. 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 ,2025,23(05):100-105.

[3] 张识君 . “大思政”视域下新时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4(06):16-18.

[4] 李星举 . “就业 + 思政”视域下高校如何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 [J]. 四川劳动保障 ,2024(08):115-116.

[5] 郝文 . 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引领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及长效机制 [J]. 长春大学学报 ,2024,34(02):52-56,72.

[6] 张冰华 , 杨红月 . “大思政”视域下新时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02):133-14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精准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创新研究”（2025SJSZ0649）。

（作者系苏州城市学院讲师）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策略

林映麟

摘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支撑，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承担着价值引领、精神塑造、能力赋能的重要使命。在新质生产力加速演进的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需主动适配时代需求，立足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本质与发展要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价值引领体系。文章分析新质生产力与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契合点，探索优化策略与保障机制，期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创新精神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策略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核心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协同发力，更急需兼具坚定理想信念、家国情怀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高校作为人才培育和科研创新核心阵地，是培育适配人才的关键载体，而思政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生命线，其价值引领作用直接决定人才培养方向，关乎青年学生能否投身新质生产力实践、坚守技术创新正确导向。

二、新质生产力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契合

（一）目标契合：培育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需求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创新能力，更需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坚守伦理底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提升综合素养，成长为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二者目标高度契合，均以服务国家发展、培育适配时代的高素质人才为核心，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的核心作用，就是为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技能+价值”复合型人才注入精神动力、明确价值方向，实现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二）内涵契合：坚守创新导向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新质生产力核心特征体现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本质是创新驱动，核心是通过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及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生产力向更先进质态发展。其创新导向不仅涵盖技术、模式创新，更注重理念与价值创新，核心是在创新中坚守正确导向，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是价值引领，通过理论武装、思想引导，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培育创新、奋斗、担当精神。二者内涵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创新需思政教育提供价值支撑，规避“唯技术论”偏差；思政教育也需依托新质生产力实践，丰富内容、创新方法，增强价值引领的时代性与实效性。

（三）实践契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质是实践层面的变革，离不开大量人才投身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等实践，在实操中实现创新突破[2]。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绝非单纯理论灌输，核心是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通过实践育人赋能青年学生，引导其在实践中深化价值认知、提升实践能力与责任担当。二者实践路径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场景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载体，高校可依托相关科研、企业合作等场景开展沉浸式教育，强化学生价值认同；思政教育则引导学生主动投身实践，将专业能力与国家需求结合，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优化策略

（一）更新教育理念，确立创新导向的价值引领理念

高校需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确立以创新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支撑的价值引领核心思路，把创新精神贯穿思政教育全过程，重点培育青年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能力，引导其树立“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主动投身新质生产力创新实践，依托新质生产力相关实践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价值认同、提升实践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同时树立“大思政”理念，将价值引领融入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各环节，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衔接，构建全方位价值引领格局，确保价值引领贯穿新质生产力人才培育全过程。

（二）优化教育内容，构建适配时代需求的内容体系

高校需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优化思政教育内容，构建兼具时代性、针对性与专业性的内容体系，要主动融入新质生产力相关知识，将其内涵、特征、发展趋势及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产业升级等核心内容融入教学，帮助学生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价值，树立适配发展的正确价值观。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技术伦理难题，强化人工智能伦理、数据安全、技术垄断等相关教育，引导学生坚守技术创新的伦理底线，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结合不同专业特色优化内容，针对理工科学生，重点融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报国等内容；针对文科生，侧重融入产业升级、文化创新、社会服务等相关内容，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3]。同时，紧跟时代热点与学生需求，将新质生产力领域的重大事件、先进典型、创新案例融入教学，兼顾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等内容，切实解决学生实际困惑，增强价值引领的针对性。此外，加强思政教材建设，结合新质生产力时代特征更新内容，增加案例与实践教学模块，打造兼具理论性、实践性与时代性的教材体系，为价值引领提供坚实支撑。

（三）创新教育方法，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教育模式

高校应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思政教育方法，构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育人模式，打破传统教育局限。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摒弃单一灌输式教学，采用案例、讨论、情景等多元教学方法，融入新质生产力领域创新案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充分调动学习热情。强化数字技术深度应用，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搭建智慧思政平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教育体系，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场景，让学生沉浸式感受创新精神与责任担当；依托大数据分析学生思想动态和学习需求，开展个性化价值引领，提升教育精准度[4]。丰富实践教育载体，对接新质生产力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和创新创业园区，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参与科研实践、企业实习、创新创业大赛，在实操中深化价值认知、提升创新与担当能力。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建设以创新、奋斗、担当为核心的校园文化，通过校园广播、新媒体等载体，宣传新质生产力领域先进典型与创新成果，营造崇尚创新、乐于奉献的良好氛围，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四）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的综合引领能力

高校需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多措并举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与价值引领能力，为思政教育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高校要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定期组织思政教师参与新质生产力相关培训、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帮助教师吃透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熟练掌握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相关知识，切实补齐专业素养短板。同时，高校要重点培育教师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鼓励教师探索思政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优化教育方法与内容；主动引导思政教师深入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调研实践，积累鲜活案例并融入课堂教学，增强教育的实践性与针对性。此外，高校要完善师资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的教学、科研成果纳入考核，充分调动教师投身价值引领与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同时，高校要拓宽师资来源渠道，聘请新质生产力领域的企业技术骨干、科研专家担任兼职思政教师，丰富师资结构，进一步提升价值引领的专业性与实效性。

（五）强化数字赋能，构建智慧化价值引领载体

当前，数字技术已深度渗透高校教育教学各环节，高校需主动借助数字技术，搭建智慧化价值引领载体，切实提升思政教育的精准度与实效性，重点打造一体化智慧思政平台，整合线上教学、思想动态分析、实践管理、家校沟通等多元功能，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捕捉青年学生的思想困惑、学习需求与价值倾向，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引领。高校要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主题，组建专业团队打造微视频、动漫、H5 等青年学生喜爱的数字思政作品，将党的创新理论、新质生产力相关知识及技术伦理要求融入其中，增强价值引领的吸引力与感染力[5]。除此以外，高校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实践教育深度融合，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模拟新质生产力相关科研、产业场景，弥补线下实践资源短板；搭建线上实践交流渠道，助力学生深化价值认同，同时强化数字素养教育，将数字伦理、数据安全等内容融入思政教学，引导青年学生规范使用数字技术、坚守价值底线，在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六）深化文化浸润，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精神文化

高校需立足自身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以文化浸润为抓手，着力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校园精神文化，强化价值引领实效。高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基因与担当内核，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导向，将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家国情怀等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力量，树立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高校要重点培育校园创新文化，依托创新创业社团、科研兴趣小组、创新论坛等载体，开展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创新交流、成果展示等活动，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勇于探索的校园氛围，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与创造活力。高校还要加强与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主动引入行业先进文化、工匠精神与伦理规范，让学生在了解行业发展、接触行业标杆中，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与技术伦理观，明确自身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责任使命。除此之外，高校要推动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文化宣传、科普推广活动，让学生在文化传播中深化价值认同，同时将校园创新精神、担当精神传递至社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文化环境。

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压实价值引领工作责任

高校应成立新质生产力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要负责人牵头，统筹协调宣传部、学工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各院系及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配合、院系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6]。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解决价值引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统筹推进教育理念更新、内容优化、方法创新等各项工作，确保价值引领工作有序推进。同时，强化院系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将价值引领工作纳入院系工作考核，推动价值引领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

（二）夯实资源保障，筑牢价值引领物质基础

高校应加大经费投入力度，设立思政教育与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专项经费，用于教材建设、师资培训、实践基地建设、数字思政平台搭建等，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实践资源整合，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创业园区等，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实践平台；同时，整合校内科研资源，鼓励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合作开展相关研究，为价值引领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此外，加强师资资源保障，完善思政教师招聘、培养、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思政教育工作，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养。

（三）健全机制保障，推动价值引领长效开展

高校可以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价值引领工作成效纳入高校办学质量评估、院系工作考核、教师绩效评价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明确考核指标，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倒逼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完善协同联动机制，构建高校、企业、社会、家庭协同育人体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引入行业资源丰富教育载体；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家校沟通，引导家庭参与价值引领，形成育人合力。高校还要建立健全反馈调整机制，定期收集学生、教师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及时掌握价值引领工作的实施效果，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和学生思想动态的新变化，适时调整工作策略，提升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其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支撑，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是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人才的核心环节。新质生产力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内涵、实践上存在高度的价值契合，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工作也需要持续创新、不断完善，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不断探索二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提升价值引领的实效性与针对性，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李铁英，李晶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 [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25,34(07):83-89.

[2] 仇竹妮，刘文艳．新质生产力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路径 [J]. 吉林教育，2024(17):6-8.

[3] 黄思琦．新质生产力赋能高校思政课的路径探析 [J]. 时代报告，2025(06):39-41.

[4] 刘晓静．新质生产力促进高校思政教育智能化发展的路径探索 [J]. 时代人物，2024(25):182-185.

[5] 陈希慧，徐建亮，林钰珍，等．新质生产力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及路径研究 [J]. 机械职业教育，2025(06):53-57.

[6] 赵倩．新质生产力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与对策 [J]. 长江丛刊，2025(22):658-66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融合《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在线精品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基于智慧康养专业”（JAS24358）。

（作者系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副教授）

“躺平”“内卷”的思政应对策略与博物馆教育创新的育人效能比较研究

王　振　张梦迪

摘要：“躺平”“内卷”作为近年来新兴并蔓延的社会现象，显著影响了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思想认知、价值取向和实际行为，对思政教育的实际成效构成了冲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展示平台，博物馆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正不断提升，其蕴含的思政教育功能也日益凸显——思想引领、政治认同与人格塑造等，扩充思政教育的资源储备、拓宽实施路径。如何借助博物馆这一渠道消解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前探索的核心课题。教育工作者应主动研究博物馆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与实际成效，高度关注青年大学生“内卷”现象对思政教育有效性的削弱与消解问题，引导青年大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关键词：“躺平”；“内卷”；博物馆；思政教育

“躺平”“内卷”这两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不仅影响了健康的社会心态，更是青年大学生亚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1]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为青年大学生们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也为高校教师擘画了教育的蓝图。当下，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躺平”“内卷”与时代语境结合进行整体性探索与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博物馆教育中所蕴含的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高度契合，是实现思政育人的完美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2]将博物馆资源与思政课堂有效结合，让青年大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减少亚文化的不良影响，为学生营造茁壮成长、安全成才的宽松氛围，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才进步。

一、“躺平”“内卷”的思政应对与育人效能提升策略

（一）夯实思政教育的政治有效性

思政教育的主体是广大的青年大学生。立足于这一点，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将“躺平”“内卷”等亚文化词汇中产生的质疑党的领导的负面内容剥离出来，才能正确高效引导和帮助青年大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需要在教育中引导学生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政治方向，教育方式做到润物细无声，这也是政治有效性提升的基础。预防青年大学生群体“躺平”“内卷”现象中的双面人的情况，是巩固青年大学生群体对党的领导认同感的必要手段。不少青年大学生群体嘴上说不“躺平”不“内卷”，实际表里不一，标定自己是“思想的巨人”，却在实际行动时成为“矮子”。“躺平”“内卷”语义的演变，折射出的是青年群体的心路历程与社会症状，它们互相交织，存在共性。应新时代青年发展之需，教师应当积极回应青年群体的现实诉求，通过持续的思想引导与价值涵育，助力其自觉抵制亚文化侵蚀，从而重塑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培育其持久而坚定的奋斗品格。

（二）提升思政教育的育人有效性

人的发展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从这点出发，思政教育的场景不应只局限在课堂，更应深入生活实际。以教育的目的和施教者的真心感召青年大学生，做他们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领路人。思政教育还需以心理健康教育为前提，建设心理预防与疏导的护城河，帮助青年大学生学会自我调节情绪，防止在激烈高压的“躺平”“内卷”社会竞争环境中失去健康心态与奋斗精神。为防范青年群体在“躺平”与“内卷”交织的社会语境中出现言行不一的倾向，强化其对党的

执政理念的认同，已成为一项关键任务。当前部分青年虽在言辞中排斥“躺平”与“内卷”，却在现实利益考量下表现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显著落差，往往在理念层面呈现积极姿态，而在实践中则呈现出明显的退缩姿态，这映射出青年心理轨迹与社会结构性症候之间的交织与共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机遇。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具备健康完善的人格，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成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思政教育要培养青年大学生群体自理自立、自律自强、自重自爱的健全品格，倡导其理性面对挫折，在矢志奋斗中适应时代需求，在挫折中成长成才。

（三）注重思政教育的人文育人成效

做人道理与处事智慧的传授，是思政教育实现人文育人成效的关键，可以帮助青年大学生在“躺平”“内卷”的社会现状中保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了解“躺平”“内卷”现象，首先需要正视其所触发的消极思绪与消极行为的现实性，其次就是通过思政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让其可以客观理性地看待“躺平”“内卷”现象。想要短时间内消解“躺平”“内卷”心态非常困难，思政教育就必须激励青年大学生群体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除“躺平”“内卷”现象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中。

（四）提升思政教育的实践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只会误国，只有实干才能兴邦。作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应与“躺平”“内卷”的不良风气作斗争，从摆烂和内耗中走出来，以强国兴国为使命担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呼唤着持续的开拓创新。在此背景下，“躺平”“内卷”只能让迟疑怯懦者望而却步，却无法阻止实干创新者的崛起。思政教育亟须引导青年大学生坚决摒弃坐享其成和享乐主义的错误倾向，代之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懈奋斗，最终交出一份出色的时代答卷。

二、博物馆教育创新的育人实践与效能解析

（一）必要性

博物馆是承载中华璀璨文明的实物载体，在其中可以直观感受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体悟其中蕴含的智慧真理，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独立解放到繁荣富强再到日益强大的历史必然。这不仅能拓宽视野、涵养情怀，更能全面提升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涵养。因此，将博物馆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是教育创新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利于完善育人体系，并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博物馆丰富的信息资源能够帮助青年大学生深化审美体验，感知历史、感悟真理。通过承载历史的展品陈列，领悟展品蕴藏的文化内涵，寻找展品背后的真实故事。

（二）功能性

相较于学校教育，博物馆更具大众化的功能属性。因此，将博物馆教育融入思政后，将充分释放思政教育的潜在价值，推动其更加科学规范地发展，最大化地实现育人功能。除此之外，博物馆融合了人文之美与艺术之韵，馆中经过系统梳理的馆藏文物，承载着人类的历史与经验，凝结着过往社会的思想成果与人文情怀，在思想引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而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针。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又充满诱惑，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大学生而言，思想的引导至关重要。因而，发挥博物馆的育人功能，以富有温情的教育形式引领青年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外界的不良诱惑，在一次次与历史的对话中明确人生方向。

（三）效能性

自党的十八大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博物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始终紧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步伐，顺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贴合师生的实际需求稳步前行。博物馆资源是思政课程的优质教学素材，高校教师要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真理内涵、情感共鸣、事理逻辑。在教育的引导环节遵循三步走以最大化实现效能：第一步，为青年大学生打造“沉浸式”教学情境，重点塑造以情感人的氛围，并以文物背后的故事，激发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热情；第二步，调动青年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其自觉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第三步，实现青年大学生精神的洗礼与思想的升华，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增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两类教育育人效能的实践启示

（一）意识培养

不管是“躺平”还是“内卷”，都是消极的生活观念，其折射出的生活状态对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正因如此，高校教师需着力引导青年大学生培养责任意识。具体而言，不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教育层面，都应将培育青少年的家国情怀作为重要工作，以此培养青少年群体的责任担当精神[4]。博物馆在其中可以作为媒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博物馆作为重要宣传阵地，定期组织青年大学生参观博物馆，充分发挥课程思政与博物馆协同育人的作用。一方面，博物馆可以结合时事热点、重要节庆时间点开展特色专题教育，同时面向青年大学生征集优秀作品，持续优化内容供给，打造高品质的育人载体。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媒介作用，向学生灌输正确的思想观念，让学生产生共鸣，树立正确的责任意识，升华思想境界。

（二）平台构建

时下，“内卷”是一种非理性选择，在社会裹挟下卷入内部竞争状态，陷入“内耗式” 的内部简单重复与停滞不前状态，过度竞争导致内部自我懈怠、自我消耗，是资本逻辑运作下的一种社会资源消耗[5]。博物馆作为记载文明、保护文明、传承文明的重要场所，肩负着沉甸甸的教育功能与使命。“躺平”与“内卷”现象，既是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也是网络信息时代青年大学生亚文化的产物。高校教师应积极探索博物馆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利用博物馆这一平台培养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使其以主动进取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在思政教学中也应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不断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与创造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服务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应有之力。除此之外，高校教师还应有针对性地对博物馆平台的资源进行整理、创新，以达到动态更新与精准融合的目的。这样做不仅可以为青年大学生创建一个深刻有趣的思政环境，还可以加深认知深度，激发主动学习的欲望，推动思政教育有效落地，形成良性闭环。

（三）回应诉求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多元价值观念与思想倾向不仅弥漫于网络空间，也广泛渗透于现实生活之中，各类思想观念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与接受度日趋上升。与此同时，社会整体对青年亚文化所展现的包容态度，客观上为诸如“躺平”“内卷”等行为模式提供了适宜的滋生环境。青年大学生群体在受到相关亚文化氛围的浸染之后，亦容易在心理层面形成呼应。作为高校教师，需要给予青年大学生正向的思想引导，在平时的学生生活中多关心和回应青年大学生的诉求，帮助青年大学生抵御亚文化带来的心理冲击。博物馆可以作为帮助学生抵挡不良亚文化的一把利器，其特定的环境与内容非常容易使青年大学生的情绪受到感染，

如果加以正向的引导，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把握历史规律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面貌。高校教师要时刻关心学生的状态，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将榜样精神进行内化，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培育奋斗精神。

四、结语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单向传授的模式，青年大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导致育人效果不够显著。高校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关键在于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躺平”“内卷” 这类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现象，对部分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对此，我们既要遏制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急功近利、精致利己的不良倾向，也要警惕他们出现精神松懈、消极躺平的苗头。因此，将博物馆资源融入思政教学，使“平面化”的口头讲解转化为“立体化”的生动体验，推动青年大学生形成以自我成长为导向的“学习闭环”，从而有效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成效，为新时代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开辟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2] 隋笑飞 , 吴晶晶 , 周玮 , 等. 留住历史根脉 传承中华文明 [N]. 人民日报 ,2015-01-10(01).

[3] 刘慧 , 乔湘平. 数字博物馆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J]. 华章 ,2024(11):108-110.

[4] 杨东晓. 青年“内卷”与“躺平”现象探析 [J]. 品位·经典 ,2023(23):73-76.

[5] 徐英瑾. 数字拜物教 :“内卷化”的本质 [J]. 探索与争鸣 ,2021(03):57-65,17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躺平’‘内卷’现象的青年心态分析与思政应对策略”（2025SJSZ0377）；2025 年度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乐山师范学院四川特殊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立项项目“面向视障儿童的博物馆教育创新：交互式触摸绘本的设计与应用”（SCTJ-2025-B-03）。

（作者：王振，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讲师；张梦迪，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讲师）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的评价机制探析

赵羽涵　李光衿

摘要：在“德技并修”的职业教育背景下，将职业伦理融入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文章剖析了职业伦理的内涵及其在职业教育中的定位，确立了涵盖认知理解、情感内化与行为践行的三维评价维度，并客观审视了当前评价工作在标准细化、主体协同、方式组合及结果应用等方面的现状表征，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构建科学评价机制的策略，旨在提升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的科学性、精准性与实效性，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道德培育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支撑。

关键词：高职英语；课程思政；职业伦理；融入成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主要问题。英语课程作为高职院校覆盖面广、课时量大的公共基础课，既担负着语言能力培养的功能，也肩负着价值引领和文化育人的使命。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高职学生将来会从事涉外性、服务性或技术合作型工作，他们的职业行为不仅是个人素养的表现，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以及行业的声誉。因此将职业伦理有机融入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对于引导学生在跨文化语境中坚守诚信、责任、敬业等道德准则，弘扬中华优秀职业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职业伦理的核心内涵及其在职业教育中的定位

职业伦理是指从业者在特定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价值准则与行为操守，其核心内涵包括诚实守信、责任担当、敬业奉献、公平公正以及对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它不仅体现个体的职业素养，更承载着行业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传承功能[1]。在职业教育中，职业伦理具有基础性与导向性双重定位。一方面，它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关乎学生未来从业的道德判断力与行为自律性。另一方面，职业伦理是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通过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和价值观。尤其在高职教育强调“德技并修”的背景下，职业伦理不仅是职业技能的配套支撑，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兼具家国情怀与职业精神的新时代工匠的关键路径。

二、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的评价维度

（一）学生对职业伦理规范与核心价值的理解掌握

此维度主要是考查高职生能否精准辨别、认识中外职场环境的通用伦理准则以及相关专业领域里的道德规范。在英语课程思政的语境下，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英语词汇和表达，更要能够通过语言材料深刻领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职业道德的具体内涵。评价的重点在于学生能否区分出中西方文化背景下职业伦理的不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职业场景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对行业行为准则和职业纪律的认知程度。这一层次的评价一般采用课堂提问、伦理案例分析报告、理论知识测试等方式来进行，以检验学生是否形成了完整的职业伦理知识体系，为后面情感内化、行为实践打下坚实的认知基础。

（二）学生对职业道德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内化程度

该维度重在研究职业伦理由知识到情感的转变过程，主要考查学生是否真正地把职业价值内化为自己内心的文化认同。高职英语教学中，这体现在学生对未来从事的职业是否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2]。本维度注重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即学生在遇到多元文化冲突的时候是否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工匠精神，不盲目崇奉西方的价值观。评价此维度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态度的转变、价值取

向以及通过心得体会、主题演讲等形式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从而判断职业伦理精神是否真正融入学生的精神血脉，成为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和精神支柱。

（三）学生在职场情境中践行职业伦理的行为表现

该维度是评价职业伦理融入成效的最终落脚点，主要考查学生把内化的职业道德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高职英语课程的实践环节中，考查学生在模拟面试、商务谈判、职场角色扮演等具体情境中，能否自觉遵守职业礼仪，妥善处理利益冲突和伦理困境，表现出诚信交往、团队合作、爱岗敬业等良好的职业素养。学生在实习实训和社会服务中的实际表现也是评价的重要指标，包括是否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是否具备良好的抗压能力、责任感等。这一维度评价重视知行合一，用过程性观察、实践记录和第三方反馈来验证学生是否具备符合行业要求的职业操守，实现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的跨越。

三、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评价的现状表征

（一）评价标准缺失，缺乏统一可操作的职业伦理素养指标

当前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的评价标准正处于逐步探索与建构的阶段，呈现出以通识性德育内容为核心的鲜明特征。由于职业伦理本身具有高度抽象性与内涵丰富性，而高职英语课程兼具语言工具性与人文思政性，二者的融合点呈现多元化态势，使得评价指标的细化需要经历持续的实践沉淀。现有评价实践多围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普适性职业道德规范展开，已形成一套覆盖基础价值维度的考核框架，为评价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3]。针对跨境电商、涉外旅游、国际工程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差异化伦理要求，细分评价指标的构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部分院校已结合专业特点开展了试点探索。在认知理解、情感内化、行为践行三个维度的层次划分与权重配比上，各院校基于自身教学理解进行了多样化设定，整体评价体系展现出较强的基础性，行业针对性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二）评价主体以校内教师为主，企业行业参与度逐步提升

目前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的评价形成了以校内任课教师为主导、多元主体逐步参与的格局。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依托课堂教学平台，对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伦理认知反应、互动表现及作业任务中的价值取向进行系统观察与评定，构成了当前最普遍且核心的评价形式。随着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持续深化，企业导师、行业专家及学生群体的参与程度稳步提升：实习实训阶段，企业导师开始依据岗位规范对学生的职业行为提供反馈；课堂项目中，学生自评与互评被纳入评价体系，成为教师评价的重要补充。这种以教师评价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正在初步成型，多视角的评价生态不断拓展，既保留了教师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中的专业判断，也逐步融入了行业一线的实践视角与学生主体的自我反思，使评价的全面性与客观性在实践中得到渐进式增强。

（三）评价方式采用多种手段结合，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并存

现行评价方式呈现出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并存的多元化特征，力求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与素养发展。在结果评价方面，通过理论知识测试、课程论文、案例分析报告等量化或定性手段，重点考查学生对职业伦理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理解深度，这类评价在阶段性考核中占据重要地位，为衡量知识目标达成提供了明确依据[4]。在过程评价方面，教学过程被纳入评价视野，教师通过课堂提问、主题演讲、角色扮演等活动观察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数字化教学背景下，学习平台记录的在线讨论数据、资源访问轨迹等过程性信息也开始作为评价参考，为学生素养形成的动态轨迹提供了数据支撑。这种兼顾知识掌握与素养养成的评价方式组合，既关注学习的阶段性成果，也重视价值内化的渐进过程。

（四）评价结果主要用于成绩评定，对教学改革的支撑功能尚待开发

当前职业伦理融入成效评价结果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教学管理环节，核心功能是学生的课程学业成绩评定与综合素质测评。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客观依据，被规范记录并纳入学分管理体系，为学业认定提供了标准化支撑。在教学改进层面，评价结果发挥着基础的反馈作用，教师能够依据成绩分布与课堂表现情况，对教学难点进行常规性调整，维持教学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如何将海量评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并将其转化为系统性的课程优化方案、具体的教学策略调整以及教学资源的精准配置，相关探索与实践正在逐步展开。评价结果与教学体系深层优化之间的联动机制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其对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质量的深层支撑作用展现出进一步开发的潜力。

四、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的评价机制构建

（一）构建三维评价指标，实现认知情感行为可测可评

针对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评价标准缺失的问题，需要立足高职英语课程的涉外性、实践性和育人导向，构建认知、情感、行为三者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使职业伦理素养可以被观察、记

录、量化。从认知层面来说，应该关注学生对职业伦理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将其细分为行业伦理规范识别、跨文化伦理准则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职业伦理的融合认知三个二级指标。用标准化测试、案例分析报告等形式来量化评分。从情感维度来讲，应着重评价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同度和文化自信的内化情况。设置伦理价值认同度、职业精神共鸣度、跨文化语境下本土伦理坚守度等观测点，用问卷调查、反思日志质性分析等方法综合判断。从行为维度来说，重点放在其在真实或模拟职场中的伦理实践能力上，涉外工作的诚信履约、跨文化沟通中的尊重包容、团队合作中的责任担当等。结合课堂任务评分、企业的实习鉴定等实证数据进行评价。还可以根据不同专业方向如跨境电商、涉外服务、翻译实务等，为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并邀请行业专家参加论证，保证评价体系既符合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逻辑，又能准确对接岗位对于职业伦理的实际要求，科学反映出职业伦理融入的效果。

（二）拓展多元评价主体，吸纳教师企业学生协同参与

为了突破当前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效果评价主体单一、视角局限的困境，应该构建多元协同的评价机制。任课教师作为教学的执行者，评价的是学生在高职英语课堂上对职业伦理内容的反映、互动表现以及语言输出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5]。合作企业可以利用顶岗实习、校企项目等真实场景，从岗位胜任力的角度对学生在涉外工作中的职业伦理践行情况（守信履约、客户尊重、团队责任等）进行客观鉴定，并填写相应的评价量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可以通过写职业伦理成长日志、自评、互评，主动反映自己在职业伦理方面的认知变化以及行为反思的过程。行业专家要根据行业发展动态、岗位伦理新要求为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学生职业伦理素养与行业需求匹配度提供专业意见。最终要把各方面的评价数据通过线上协同平台进行统一归集、交叉比对，形成多维印证的综合判断，从而全面、真实地反映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的效果。

（三）推行全过程动态评价，结合课堂实习与数字追踪

针对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评价方式静态化、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应该推行覆盖高职教育全周期的动态评价机制。在课堂教学环节中，可通过伦理议题辩论、跨文化角色扮演、小组协作任务等形式，实时记录学生在语言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职业伦理敏感性和价值立场。在实习实训阶段可以利用情境任务完成质量、企业导师即时反馈、实习日志分析等方法来跟踪学生进入真实涉外职场以后处理伦理冲突、遵守职业规范的行为表现。另外，还要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创建职业伦理成长数字档案。用学习分析技术自动采集学生在线参与伦理案例研讨、查阅相关资源、提交反思文本等行为数据，客观刻画学生自主学习和素养发展的轨迹。建议每学期进行 2 到 3 次阶段性评价，并结合终结性综合评定，既重视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内化的达成度，也重视在内化践行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效果，从而实现职业伦理融入效果的动态、精准、全景式评价。

（四）建立闭环反馈机制，驱动教学优化与育人提质

为解决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评价结果与教学实践脱节的问题，必须建立“评价—分析—反馈—改进—再评价”的闭环运行机制。一要由课程团队与思政教师、企业代表组成评价数据分析小组，对多源评价数据进行梳理。二要准确地识别出学生的职业伦理认知偏差、情感认同不足、行为践行薄弱等主要问题，以及教学内容嵌入程度较浅、方法不匹配等症结。三要建立分层反馈渠道，向教师反馈教学改进建议，向学生提供个性化素养提升指导，向院校管理层上报课程资源、制度支持需求。然后须推进针对性教学优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增加行业真实伦理案例、设计跨文化伦理决策任务、强化中华职业精神话语表达等，真正提高职业伦理融入的深度和效度。四要在改进措施实施之后进行再评价，检验调整的效果，然后据此不断更新完善评价指标和教学方案。通过闭环机制，使评价真正起到对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中职业伦理融入成效持续改进、育人质量全面提升的作用。

五、结语

建立科学规范的成效评价机制是深化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高职业伦理育人实效的重要环节。确立认知、情感、行为三方面评价标准，促使评价主体从教师单一主导向校企师生多元协同转变，实行课堂、实习全过程动态追踪，建立评价结果反哺教学改进的闭环体系。不仅可以客观地衡量职业伦理融入的实际效果，还可以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导向、激励作用，促使教学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转变。与此同时，随着产业升级对于技术技能人才道德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职业伦理评价机制还要不断对接行业新标准、融合数字新技术、探索智能新工具，在守正创新中促进高职英语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职业精神、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工匠注入持久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赵羽涵 . 职业伦理视角下高职英语课程教学创新路径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35):129-132.

[2] 张英 .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的全面育人路径 [J]. 四川劳动保障 ,2025(13):163-164..

（下转 222 页）

大思政视域下
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研究

吴　萍

摘要：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高校网络舆情事件易发频发，且易形成泛化异化炒作，对校园安全稳定和学生成长造成潜在影响。舆论场域与 AI 技术耦合催生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干扰大学生理性认知判断，加剧价值选择困惑，也让高校舆情引导面临传播节奏快、引导难度大等现实挑战。为筑牢意识形态前沿阵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高校舆情引导中的突出难题，需从强化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主流思想舆论建设、提升思政工作队伍舆论引导力三方面综合发力，完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环节，切实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推动舆情引导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守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大思政”；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已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关键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6 年 2 月发布的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5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80.1%[1]，在这之中，高校大学生是主要力量。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使得高校网络舆情呈现高发、频发态势，一个微小的事件就可能导致网络舆情。高校网络舆情主要是指在高校发生或涉及学生、教职工等群体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网民或公众所持有对该事件态度、意见、情绪、观点的集合[2]。“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为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高校肩负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理应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奏响奋进新征程主流舆论强音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如何引导高校网络舆情走向，优化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防范高校重大舆论危机事件，是高校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更是高校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这一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高校网络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因此，深入探究高校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管与引导，对高校的稳定发展、思政教育的创新以及学生的健康成长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的价值意蕴

（一）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夯实风险防控的坚实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不断推进工作理念、方法手段、载体渠道、制度机制创新，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

（上接 221 页）

[3] 谢思，李静依．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职英语课程思政评价研究 [J].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4,27(02):76-80.

[4] 李首权．新文科背景下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J]. 新疆职业教育研究 ,2024,15(01):27-32.

[5] 吴宇媚．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评价的实践路径 [J].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22(05):28-3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校级教改课题“职业伦理视角下高职英语类课程思政设计研究”（JG202304）；2025 年度江苏省终身教育研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基于社会服务赋能的江苏省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研究”（25SZJ003）。

（作者单位：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的最大增量。”[3] 高校作为思想活跃、人员密集的特殊场域，网络平台常成为各类矛盾的“集散地”与“放大器”。从学生对后勤服务的吐槽到突发事件的不实传言，若缺乏及时干预，极易从线上情绪演变为线下秩序波动。舆情监控通过实时捕捉关键词、追踪传播路径、分析情绪倾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潜在风险点，为职能部门争取处置先机。监管与引导通过快速回应、澄清事实、疏导情绪，可将矛盾控制在可控范围，可有效避免舆情“小火星”演变为“大风暴”，保障课堂教学、科研实验、行政服务等工作有序开展，从源头筑牢校园安全的“防火墙”，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二）引导理性认知，培育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大学生涉世未深，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较弱，易被虚假、极端信息影响认知判断。有效的监管与引导能帮助学生过滤不实信息，建立“先核实、再判断”的认知习惯，避免被错误信息带偏，形成正确的认知体系。部分学生存在“随意转发未经证实信息”“在网络发表过激言论”等不规范行为，校方在监管到该舆情后可通过分析案例，让学生明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需对自身言论负责。长期的舆情监管与引导，能帮助学生掌握“理性表达”“合法用网”的技能，培养规范的网络行为习惯，成长为合格的网络公民。高校网络舆情常与学生学业、就业、生活等切身利益相关，负面舆情还会引发学生心理焦虑。高校通过舆情监管，及时掌握学生焦虑点。有效的舆情监管与引导能及时干预负面舆情对学生心理的冲击，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为其成长保驾护航。

（三）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倒逼治理体系完善

传统高校治理常陷入“问题爆发后才处置”的被动局面，而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通过构建全周期舆情管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向“主动预判、源头化解”升级。这种基于舆情数据的主动干预，打破了原有的那种“学生投诉—学校受理—滞后解决”的传统流程，将治理关口前移，实现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的转变，让治理更具前瞻性。完善的舆情监管与引导机制，能构建“发现—研判—处置—反馈”的快速响应闭环，大幅提升治理效率。舆情数据的积累与分析，还能帮助高校建立“治理效果评估体系”，通过舆情反馈的正面率、问题解决率等指标，动态调整治理策略，实现治理能力的持续迭代升级。

二、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的现状与挑战

在信息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并积极应对。当前，高校虽已搭建起基础引导框架，但在价值引领穿透力、技术治理能力、协同机制效能等方面仍有短板。

（一）价值引领与多元舆论的碰撞加剧

网络传播具有媒介类型多、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一方面，西方思潮与功利化价值观借助算法推荐渗透，部分学生受“精致利己主义”影响，对师德师风、学术诚信等问题产生认知偏差；另一方面，学生权利意识觉醒与社会阅历不足形成反差，面对“课程考核”“宿舍管理”等问题时，易被偏激言论裹挟，导致理性沟通缺失。技术迭代带来传播治理难题，舆情发酵的“快节奏”与引导的“时滞性”存在矛盾：生成式 AI、短视频等技术让信息传播实现“瞬时扩散”，而高校需经一系列流程，回应往往滞后于舆论蔓延速度。“信息茧房”形成引导壁垒：算法推荐使学生陷入个性化信息闭环，主流思政声音难以穿透圈层壁垒。网络舆情群体存在极化现象，即某一社会问题或热点事件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中，网民的观点越来越极端化，最终产生极端言论和行为[4]。部分学生对学校官方通报存疑，却轻信非正规渠道的“内幕消息”，加大了舆情引导的难度。

（二）思政协同机制存在“碎片化”短板

部分高校尝试联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行政部门人员构建舆情应对小组，但多为临时性协作，缺乏常态化沟通机制。例如，思政课教师侧重价值理论引导，辅导员聚焦学生日常情绪疏导，行政部门人员负责事务性回应，三者在舆情信息共享、策略制定上常出现脱节，尚未形成“理论—实践—服务”的闭环协同。部门协同的“表面化”明显，多部门联动常停留在“事件通报”层面，缺乏舆情后的思政转化设计。如部分高校在处理师德舆情时，仅聚焦于对涉事人员的处分，却未同步开展全员师德教育、完善监管机制，导致同类事件反复发生。还有队伍能力的“适配性”不足，思政工作者是舆情引导的核心力量，但不少辅导员缺乏专业的舆情分析能力与网络话语素养——既难以用“网言网语”回应学生关切，也无法及时识别隐性舆情中的思想风险，在应对“00 后”学生的个性化表达时尤为被动。

（三）舆情转化能力与思政需求不匹配

要将舆情危机转化为教育契机，但多数高校仍停留在“灭火式”处置：对课程争议、考核投诉等舆情，仅解决个体问题却未上升到制度反思与价值引导；对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负面事件，过度强调责任追究却忽视了对学生道德判断力的培育。如某高校处理学生网络抱怨事件时仅通过帮扶化解个体情绪，却未深入开展网络素养与理性表达教育，未能实现“处置一案、教育一片”的思政效果。未来，唯有将“舆情即教材”的理念贯穿始终，通过理念革新、技术升级、队伍建设与机制完善，实现舆情引导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耦合，破解技术迭代带来的传播治理难题，方能真正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三、大思政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优化路径

（一）构建完善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是实现有效监管与引导的关键

在舆情预警环节，高校需以技术赋能为核心，搭建融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体化舆情监测平台。该平台要实现对校内论坛、社交社群如微信群、QQ群及公共社交平台如微博、抖音等的全域覆盖与实时数据抓取，通过构建多维度关键词库，结合深度学习算法开展语义分析与情感倾向识别，精准捕捉潜在舆情信息。为提升预警精准度，需建立分级预警阈值模型，将舆情热度如信息转发量、评论数、传播速度、影响范围等作为核心指标，设定一般预警、较重预警、严重预警三个层级的触发标准。一旦监测数据达到对应阈值，系统需自动生成预警信号并推送至相关责任部门，为后续舆情处置预留关键响应时间，实现“早发现、早介入”的预警目标。舆情监测环节需构建“技术主导 + 人工补位”的双轨监测机制，确保舆情信息收集的全面性与分析的深度。在技术层面，高校可以借助“数据收集、特征提取”的方法依托数据挖掘技术对全域抓取的舆情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按照舆情主题（如学术诚信、校园服务、政策解读）、情感倾向（正面、中性、负面）、传播路径进行分类归档，形成可视化舆情态势图谱，清晰呈现舆情发展阶段与核心诉求。在人工层面，需建立常态化人工巡查制度，组建由辅导员、学生工作干部、网络管理员构成的巡查团队，定期对技术监测可能遗漏的“小众平台”（如校园小众论坛、兴趣社群）及“隐性言论”（如匿名留言、私信讨论）进行排查，补充收集碎片化舆情信息。同时，人工团队需对技术分析结果进行校验，结合校园管理实际场景解读舆情背后的深层矛盾（如学生对奖助政策的误解、对校园服务的诉求），为后续应对策略制定提供“数据 + 场景”的双重支撑。

（二）构建协同机制：整合资源形成舆情引导合力

强调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这一理念需贯穿网络舆情引导的全流程，打破“单一部门应对”的局限。首先是建立“思政教师 + 辅导员 + 专业技术人员”协同队伍。对于教师，高校要“创新青年教师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利用青年教师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掌握网络舆情，主动占领思想政治工作阵地，搭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服务平台”。思政教师负责“理论解读”，针对舆情背后的价值冲突提供理论支撑；辅导员负责“一线沟通”，深入学生社群（如宿舍群、兴趣社团群），收集舆情诉求并传递思政引导内容；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数据监测”，通过舆情监测系统捕捉校园网络热点，为思政内容创作提供精准方向，实现“舆情动态—内容响应—效果反馈”的闭环。联动“校内 + 校外”思政资源，强化引导权威性。当舆情涉及社会层面议题时，邀请校外思政专家、行业榜样参与线上思政座谈，结合自身经历解读政策、疏导情绪，用真实案例化解焦虑，避免舆情向负面方向蔓延。

（三）发挥思政教师在舆情引导中的重要作用

思政教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在舆情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具备扎实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看待舆情事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例如，在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结合网络舆情中的典型案例，拆解案例背后的价值导向，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互动研讨、深度剖析等方式，让主流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增强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在日常工作中，思政课教师可以通过谈心谈话等方式，关注学生的网络行为和言论，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思政课教师还可以培养学生干部成为舆情监管引导的得力助手，发挥他们在学生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培训，增强学生干部的舆情意识和引导能力，让他们在舆情发生时，能够积极传播正能量，引导其他学生理性看待问题，避免盲目跟风和情绪化表达。通过思政教师主力军守住和扩大“红色地带”、争取和引导“灰色地带”、压缩和打击“黑色地带”，确保高校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确保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安全[5]。

总之，面对当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现实挑战，高校需以大思政教育理念为指引，紧扣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要求，以技术赋能构建精细化、全周期的舆情监管机制，以资源整合打造校内外联动的舆情引导协同体系，以队伍建设提升舆情引导与思政转化能力，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与思政教育深度耦合。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全文）[EB/OL].(2026-02-05)[2026-05-27]. https://www.cac.gov.cn/2026-02/05/c_1133687654.htm.

[2] 杨柳，徐宇昭，邓春林 . 高校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及预警研究 [J]. 情报科学 ,2022,40(05):65-72.

[3]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3:43-71.

[4] 叶晓丽 . 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分析与应对策略探讨 [J].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5(05):82-84.

[5] 邓力，刘志欣 . 数字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04):78-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题项目课题“大思政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研究”（2021SJB0926）。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谈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与作用

张　琪　张秀梅　张　栋　杨兴廷 *

摘要：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方法论遵循。在互联网深度融入大学生生活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要求为指引，基于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探讨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与实践路径。文章提出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推动其成为自我教育的核心力量；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工作理念，依托学生参与提升思政教育的感染力；践行“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方法，打造贴近学生需求的教育内容；主动向学生学习，把握网络传播规律。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价值观引领与网络法治教育，确保网络思政教育的正确方向，最终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

关键词：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青年大学生；角色作用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1] 伴随数字技术飞速迭代，网络空间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青年思想引领的主战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突破了传统线下教育的时空局限，形成了兼具独立性、交互性、传播性的全新育人体系。与传统思政教育单向灌输模式不同，网络思政依托互联网开放共享、即时交互、多元传播的特性，实现了教育内容、传播载体、参与主体的全方位拓展，青年大学生既是网络信息的接收者，更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与实践者，主体作用愈发凸显。

尽管近年来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在平台建设、内容供给、技术赋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青年大学生作为参与主体的实际作用仍未被充分激活。一是参与行为的碎片化，多数大学生在网络思政平台上的行为以“点赞”“转发”“表情包回应”等浅层互动为主，参与难以形成持续、深入的价值内化过程；二是表达内容的情绪化与非理性倾向，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或校园议题中，部分学生不自觉地使用夸张、戏谑甚至偏激的语言表达立场，对主流价值存在“围观式认同”或“隐性疏离”；三是角色定位模糊与制度缺位，多数学生仍将自身定位为“受教育者”或“被引导者”，缺乏作为“网络思政主体”的角色认知。这些现实困境的根源，在于传统网络思政教育仍沿袭“教师—学生”单向输出模式，未能充分激活学生的内生动力。而群众路线所强调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的辩证思维，恰恰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方法论武器。

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方法，适配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网络思政育人规律，为破解传统网络思政“教师单向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育人困境提供了全新思路。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局限于教育内容的线上平移，更需立足群众工作思维，重塑师生育人关系，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激活学生内生动力。这里还需要明确的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虽紧密关联，但各有侧重：群众观点是认识论层面，回答“怎么看群众”的问题，核心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学习等基本判断；群众路线是方法论层面，回答“怎么对待群众”的问题，核心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二者统一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在网络思政育人领域，群众观点首先回答了“如何看待学生”的问题——学生不是被动的教育接收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育人主体；

群众路线则回答了“如何组织学生参与”的问题——通过“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实现育人目标。本文基于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核心内涵，精准界定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多元角色，系统梳理其育人价值与实践路径，为推进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提供实践参考。

一、大学生是网络思政教育的自我教育主体

当前自媒体发展迅速，大学生们能够迅速地通过各大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获知社会热点新闻，然后利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进行再次传播，成为传播人；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中最具活力、思想最有前沿活跃的代表，在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资源；大学生思维活跃，有将学习、生活、经历和感悟实时分享和传播的强烈意愿，拥有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课程改革也在强调建立一个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的现代教育思想，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当前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普遍面临“供给侧热、需求侧冷”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学校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网络思政平台、制作微课、推送理论文章；另一方面，学生的实际参与度、认同感、转化率却不尽如人意。有些学生在网络表达中呈现出碎片化、情绪化、娱乐化的倾向。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网络思政教育长期遵循“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模式，学生被定位为被动接受者，其主体性、创造性、参与感被系统性忽视。要改变这一局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应遵循现代教育的基本思想，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换为主体，把学生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实现“双主体”协同，提高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参与度，这样，学生既是学习的主体（自我教育），也是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协同教育），还是教育效果的传播者（价值扩散）。这种转换不是削弱教师的作用，而是将教师的角色从“灌输者”转变为“引导者、组织者、赋能者”，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目的。

二、践行“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育人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坚持“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工作宗旨，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从网络思政内容的选材、研究到输出，学生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好的。网络思政的活力来源于学生的持续参与。网络思政不仅需要从国家政策等宏观方面着手，也要从学校日常生活的小事切入，如新生入学不适应问题、宿舍矛盾、考试焦虑等。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大思政，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其中双向奔赴。我们只有依靠学生才能最大范围、最真切地了解学生的思想；我们只有依靠学生，才能走进学生内心世界；我们只有依靠学生，提高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从调研到输出的参与度，才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提高关注度，才能更好地将网络思政教育的效果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达到育人的最佳效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抗疫宣传”“建党百年”等重大事件的宣传活动为例，一系列的快闪、宣传片制作活动，学生从策划到产出，都亲身参与其中，学生从中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党和国家带领人民群众发展的光辉历程，能够感受到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的伟大，我们依靠学生去做，过程和结果对学生都具有教育意义，且学生引以为豪能够更加主动进行传播，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因此，网络思政中，我们要通过激励机制、参与机制、反馈机制，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表达欲望、传播动力，让“学生教育学生”“学生影响学生”成为常态。

三、坚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实践过程。只有走进学生生活，才能了解学生，只有从学生中来，才能有底气、才能有活水，才是学生想要的，我们要了解学生的关心关切。网络思政教育者应定期分析学生网络行为数据，及时调整内容策略、话语方式、传播节奏，实现“以学生反应倒逼内容迭代”，网络思政设计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学生思政教育，做出的成果如何最大程度让学生受益、为学生服务。范蕊老师的“陌上花开”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内容既有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也有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个人小事。通过从学生中寻找学生的关心关切，解决遇到的各种小问题，能够更好地贴近学生需求。这种方式能让学生更加信赖老师，提供的服务也能够更好地贴近学生学习生活成长需要。

四、主动向学生学习，把握新时代网络育人规律

网络思政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要想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就要密切联系学生，把学生当作我们做好网络思政教育的老师，学习学生语言，了解学生特点，与大学生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如建立学生网络思政观察员制度，定期收集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等方式，设立学生网络思政创作基金，鼓励学生自主生产微视频、推文、漫画等内容，为学生提供低门槛、渐进式的参与通道，依靠学生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困难，取得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我们要学习学生的思维方式。一代人的青春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我们不走进学生的学习、生活，不进行调研，不积极与学生谈心谈话，不认真了解他们的想法，就无法真正地把握学生心之所想。我们要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要学习最前沿的生活内容。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老师在 B 站通过生动活泼的方式讲授刑法知识，并开展网络思政教育，深受学生喜爱。我们要学习学生身上的朝气与活力，不断增强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动力，增添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和形式本身的青春活力。

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并非放任学生自主发展、盲从学生片面诉求，而是要在尊重学生主体、激活育人活力的基础上，坚守思政教育政治属性 [2] 与育人底线，实现活力创新与规范引领的有机统一。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必须坚守四大核心原则，确保育人方向不偏、育人标准不降。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 [3]，也是网络思政教育的立身之本。网络空间思潮交织、舆论复杂，各类错误观点、不良思潮持续渗透。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教育全过程坚守正确政治方向，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御各类错误思潮侵蚀，确保网络思政育人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二）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4]。新时代，我们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青年大学生的头脑 [5]，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又红又专、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6]。

（三）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引领

大学时期，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当前网络上传播的东西纷繁复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也借助网络平台悄无声息地传播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在互联网环境下，也面临新的冲击和挑战，呈现新的特点，因此，我们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凝聚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确保大学生全面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夯实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教育根基

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和新生性，会让学生在获取信息和发表观点的时候可能网络和现实社会一样是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的。一些网络功能如匿名等，一定程度上让学生认为可以不受法律、道德的约束，随意发表各种言论而无需承担后果。因此，我们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补好网络教育管理缺失的短板，积极在教育内容中加强学生对这方面的教育认识，增强法治意识，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网络行为的严肃性与规范性，自觉遵守网络法规、恪守网络道德、规范网络言行，主动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争做守法崇德、理性自律的新时代青年网民。

六、结语

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为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指引。立足群众工作思维开展网络思政建设，核心是重塑师生育人关系，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主体地位，践行“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育人初心，落实“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实践路径，主动对标青年成长规律、紧跟网络传播规律，持续创新育人内容、育人形式与育人载体。同时，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主流价值引领、筑牢法治道德底线，平衡学生主体活力与思政育人规范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贴合时代、贴合青年、贴合实际的高质量网络思政育人体系，充分发挥青年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协同育人、价值传播作用，持续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感染力，为培养新时代合格青年人才筑牢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 石书臣 . 深刻把握“大思政课”的本质要义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8(07):104-112.

[2] 秦冰馥 , 徐德斌 . 网络空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19):81-83,91.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9:43.

[4] 赵春华 . 高校青年教师意识形态建设机制研究 [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42(02):120-124.

[5] 毛奎 .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18,10(03):90-94.

[6] 唐斌 , 周易初 .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守正与创新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36(06):5.

（作者：张琪、张秀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 医疗保障学院讲师；张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 学生工作部助教；通信作者杨兴廷，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 临床与基础医学院讲师）

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化叙事能力提升策略探析

李　莉　李新萍

摘要：在科技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应用范围日益扩大的影响下，数字化技术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阵地，在开展思政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打破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利用数字化叙事教学模式，更具针对性地开展多元化的教学工作，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素养。本文首先从数字化建设对高校思政育人的深远影响入手，随后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升数字素养的现实问题，最后提出了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化叙事能力提升策略，仅供参考。

关键词：思政教学；数字化叙事；高校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教学需求，高校思政课教师亟须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基础。特别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积极探索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策略，已经成为高校重点工作，以培养更多适应能力强、知识应用灵活的高素质人才。

一、数字化建设对高校思政育人的深远影响

（一）促进思政育人关系深度交互

数字化建设工作的推进，为高校思政教育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在数字化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学生的定位发生了转变，他们由单一的信息推送者、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发布者、选择者。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智能工具，可为学生创设多元化、跨时空的动态交互学习环境。其次，在媒介资源、技术创新等技术的支持下，数字技术能够为学生打造沉浸式的教育空间，提供自主选择课程、表达话题的新契机，真正实现了按需教育，并为师生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二）推进思政育人供给精准适配

高校中不同学生的学习诉求存在一定差异，利用数字技术可搭建教与学之间的综合资源平台，从学生的个人偏好、需求方面入手，进行相关数据资源的查阅获取。另外，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行系统化分析，为学生提供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建议。因此，在开展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有助于实现教学资源、方法、内容等多方面的重新组合，进一步提升思政教学的政治性、科学性、亲和性，推动教育从传统的填鸭式向个性化、系统化转变，提升理论教学的趣味性[1]。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化叙事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一）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数字叙事作为教育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和吸引力。高校思政课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化叙事能力，才能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二）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的需要

当代学生是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通过数字媒体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式往往难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而数字叙事能够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呈现思政内容，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爱好。提升教师的数字化叙事能力，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三）提升思政课实效性的需要

思政课的实效性一直是思政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重点。数字叙事能够将抽象的思政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故事，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通过数字叙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故事中体验、思考和感悟，从而实现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和行为塑造。提升教师的数字化叙事能力，能够有效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2]。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化叙事能力提升策略探析

（一）实施理念革新

1. 强化价值引领的核心地位

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开展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将立德树人作为数字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教育始终。另外，教师应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配合专题研讨、系统培训等活动，促进自身理论素养的提升，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保证教育方向科学可行。在开展叙事设计的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借助中国故事、时代故事、身边故事讲述等方法，增强学生的价值认同感，获得情感共鸣。比如，通过讲述改革开放成果、抗疫精神、英雄事迹等内容，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配合进行数字叙事内容和价值导向方面的定期检查，真正实现日常教学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高度一致。

2. 树立技术赋能的创新理念

为避免教师过度追求技术形式而影响教学效果，需要引导教师正确认识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避免盲目利用。可通过组织教师参与技术应用体验活动、邀请业内专家开展知识讲解等方式，为教师进行数字化叙事的综合理解提供便利，让教师了解技术在互动性、可视化、传播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进而消除内心的抵触情绪。并且，在实践过程中鼓励教师积极探索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点，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历史事件的模拟，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学生叙事能力的反馈和分析，形成独具特色的数字化教学风格。特别是在学校层面，需要为教师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和资源平台，利用创新表彰激励机制等方式，吸引教师积极分享自身的工作经验和成果，为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支持[3]。

（二）落实智能教学实施模式

1. 搭建智能教学场景

智能化教学场景的搭建，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课程内容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持。高校利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可实现对国家重大发展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等教学内容的还原，学生通过虚拟场景可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亲历”历史场景，感受时代变迁。另外，高校通过统筹教学资源，组建专门的技术与教学融合研发团队，由校内思政课教师以及校外技术专家共同完成情景化教学方案的设计，确保所搭建的教学场景既满足技术规范要求，又能符合思想政治教学目标。比如，通过搭建跨学科、跨院校的智能教学场景资源共享平台，可实现对不同高校优质场景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科学互补，进一步节约了高校课程的研发成本。

2. 构建个性化智能教学推送体系

高校思政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建立学生政治学习画像，综合收集学生的兴趣爱好、认知水平、行为规律、思想动态等方面的信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及薄弱环节。同时，智能教学系统可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学习资源指导，如为基础理论相对薄弱的学生推送图文资料或基础理论解读视频，为存在思想困惑的学生推送更具针对性的案例分析和解读文章，为对红色文化感兴趣的学生推送革命先辈的优秀红色故事等特色资源。并且，高校应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机制，实现资料的规范化收集和处理，保证学生的隐私安全和数据安全，指导思政课教师定期进行教学方案的个性化设计和优化完善。在筛选教学资源的同时，利用对智能推送资源的补充提升教师自身经验和智能技术结合运用的能力[4]。

（三）开展叙事数字化发展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升级，为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交互的作用，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提供了新的指导，有助于实现高校学生的综合发展。现阶段，高校思政教育叙事化教学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利用技术赋能，提升人才素养，实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通过引入数字育人的底层逻辑，真正地将学生作为主要发展目标，转变教师思想，使其认识到发展学生、服务学生的重要性。同时，确保叙事数字化能够从提升学生主体性、维护学生尊严、发掘学生价值、增强学生素质等方面入手[5]。

（四）落实数字空间新场域

1. 拓宽叙事物理空间

高校在开展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主要以面对面的教学形式进行部分理论知识的教授，并通过案例讲解、问题探讨等方法组织日常教学活动。但在数字媒介和虚拟技术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数字化技术有效打破传统思政课程的空间局限性，借助符号创设叙事情境，教学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环境的限制，既延长了思政课程的教学时长，也拓展了教学应用场景。与此同时，数字叙事通过数字空间的综合运用，为高校开展“大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新的支持，帮助学生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深入理解教学内容，拓展了教学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2. 提升教学灵活性

利用此种教学模式，高校教师以及学生能够从现代化角度更加深入地理解“大思政课”课程，进一步提升教育的灵活性和实效性。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数字空间，依托其开放性和虚拟性，引导师生沉浸式体验虚构场景，加深对数字空间的相关感知。另外，高校在利用数字叙事方法开展日常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可帮助教师和学生打破传统教育课堂思维的束缚，将思政课堂转向数字化大课堂，在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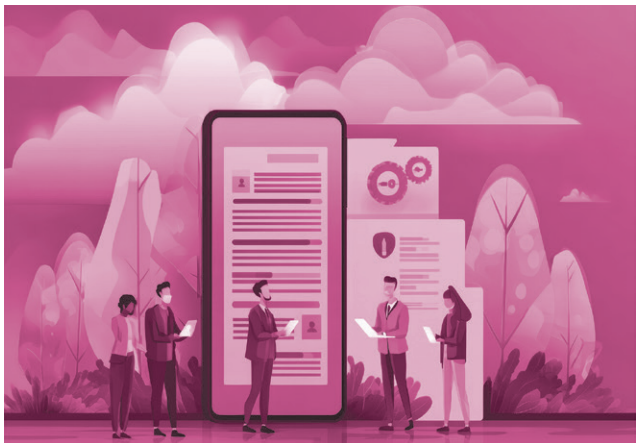
社会中探寻更多知识奥秘[6]。

（五）组织主题探究式学习

在开展主题探究式学习的过程中，利用大数据技术主要是将 AI 技术融入多元教学数据中，实现对教学情境的精准把控，将传统的被动式灌输教育转向主动探索教育。大数据可有效打破历史资料的限制，实现文献、数据、影像等资料的科学汇总并建立数据库。同时，借助智能学情分析系统，在探究学生学习规律的同时，为教学内容和思政目标的全面融合奠定基础，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历史资料，进行正确辨析。比如，在开展改革开放、民族复兴主题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利用 AI 平台，可完成改革开放后我国 GDP 增长数据以及脱贫攻坚成果的系统化整合分析，将相关影像以及数据整合为时间轴和数据图谱。系统在分析学生课前预习数据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学生的知识理解薄弱点，并推送相关的学习资料，为学生深入掌握知识要点提供参考。同时，在探究阶段利用大数据技术，学生能够完成特定时段民生数据和政策文件的精准检索，最终得出关于改革开放、民族复兴之路的结论。AI 系统具有整合学生探究成果的重要作用，利用生成的分析报告，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展开思考和探索，通过数据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实现学生政治情怀、历史素养的全面提升[7]。

（六）推广公益数字化收集活动

公益数字化收集活动主要是将公益活动和数字化元素进行有效融合，通过设置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学习任务，为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收集公益信息等提供保障。借助数字化收集方式，在丰富学生学习体验、激发学习积极性的同时，有效保障学生在日常实践活动中的整体效果。利用创建公益游戏话题的形式，教师可收集更多数据，引导学生带着任务参与相关活动。学校通过与公益组织合作，可在微博、小红书以及其他社交 App 上进行公益话题的创设，引发学生关注。活动正式开始前，可借助公益数字拼图了解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激励学生主动参与。相应的公益数字拼图对应具体的公益活动环节，学生在完成活动任务后即可获得拼图碎片，全部收集完整并完成拼图，即可获得虚拟奖励。另外，可将虚拟奖励兑换为实物奖励，并由学生自己决定是否将实物奖励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这样不仅能够激励学生持续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同时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比如，高校通过组织公益型实践教学活动，能够将线下公益活动与线上数字积分相关联，并设置公益积分排行榜。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后，学生可实时了解线上数据的更新情况，校方根据学生的任务难度、志愿时长等给予相应的积分奖励，并通过积分兑换证书、礼品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培养学生服务社会、关心他人的优秀品质[8]。



四、结语

总之，高校在进行思政课程教学创新的过程中，融入数字化教育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思政课程教学效果，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政治认同感、责任意识等。与此同时，此项工作的开展，契合“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要求，为思政教育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参考，通过深化教学研究和探讨，保障了高校思政教学的整体效果。

参考文献

[1] 张伟 . 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建设困境与纾解进路 [J]. 世纪桥 ,2025(10):76-79.

[2] 张艺璇 .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升数字素养的路径探索 [J]. 大学 ,2026(10):135-138.

[3] 宋静静 , 侯韦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探寻 [J]. 公关世界 ,2026(15):134-136.

[4] 林嘉丽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学途径创新研究 [J]. 理论与学习 ,2026(02):1-3.

[5] 唐良虎 .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数字化 : 历史生成、逻辑主线与实践路向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5(02):146-152.

[6] 韦清秀 . 数字叙事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教学探赜 [J].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09):40-44.

[7] 钟连东 .AI 赋能高中历史课程思政数字化叙事的价值探究 [J]. 大学 ,2025(12):43-45.

[8] 王雪琪 .“大思政课”视域下“行走的思政课”数字化路径指向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5(08):22-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教育部社科司 2025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研究”（25JDSZK106）。

（作者单位：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思政视域下应用型高校的就业育人模式探究

夏翠云　龙　腾 *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就业压力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与毕业生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就业育人理念与实践脱节、职业指导内容缺乏个性化设计、就业信息服务覆盖面有限等。本研究立足于“大思政”教育理念，探讨应用型高等院校就业育人体系的创新路径，旨在实现就业育人机制与毕业生职业发展需求的无缝对接，从而提升毕业生的专业素养、实践技能和职业竞争力，最终达成促进毕业生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

关键词：大思政；应用型高校；就业育人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将就业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2022 届突破千万大关，至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222 万人，同比增加 43 万人，就业总量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1]。构建科学的就业育人模式，对于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具有深远意义，这不仅符合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应时代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 [2]。

在此背景下，高校就业工作正在从单纯的服务功能向育人功能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就业指导的整个过程，就业育人与就业指导的融合成为研究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教育部等部委的相关文件，为“大思政”格局下就业育人与就业指导的高度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学者积极响应，深入剖析了“大思政”的内涵与实施路径，高校也开展了多样化探索，包括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管理机制等多个层面的协同创新工作 [3]。这些研究和实践，为就业育人模式的研究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引导思政教育贯穿于高校教育的全过程及方方面面，充分发挥了其在教育中的核心价值引领作用。

然而，早期关于就业育人与就业指导融合的研究相对匮乏，实践层面更少。两者融合的难度在于观念的转变、资源的整合和绩效的评估三个方面。长期以来，就业指导被视为临时性工作，教师和学生对就业育人与就业指导融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整合企业资源、社会资源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在实际操作上形式大于内容。就业育人与就业指导的融合效果难以衡量。

因此，当下亟须打破碎片化研究的局限，构建全面、多层级的融合体系，深入剖析就业育人的内在机制，为新时代高校就业工作的创新提供科学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二、思政引领下应用型高校就业育人模式的构建

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显示，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的学生人数已超过总数的 60%。作为一所立足地方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就业育人，探索就业育人与就业指导融合途径，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和充分就业，逐步形成了“就业育人 12345”的就业育人模式 [4]。

（一）“就业育人 12345”工作机制的内涵

具体内涵是：坚持一个中心，即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培养两种精神，即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打造三种能力的即实践动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贯彻四条标准，即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强化五个教育，即以红色教育为主线、以学习教育为核心、以安全教育为保障、以养成教育为途径、以做人做事教育为落脚点 [5]。“就

业育人 12345”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教学中心地位，创新管理机制，激发内部活力，注重内涵发展，努力实现教学质量提高和人才培养新跨越的目标。

（二）“就业育人 12345”工作模式构建

“就业育人 12345”工作机制的构建，核心要义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高度融合[6]。

从学生成长成才目标导向出发，学生的就业观是就业指导的关键。智能化时代，就业模式、就业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生要清醒认识到职业选择的意义。单纯以薪资为就业标准，不利于其未来发展。职业的社会价值远高于薪资待遇，关注国家发展战略，选择投身乡村振兴、基层建设等领域，既能实现个人价值，也能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三）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育元素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融入就业指导课程？首先，优秀校友案例是极具说服力的教育资源，能使课程更具深度和感染力。其次，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深入企业调研等，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效果。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就业育人实际上是高校把住“出口”关，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就业指导全过程的集中体现[7]。

三、培养学生核心竞争力：应用型高校就业育人实践路径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的“就业育人 12345”工作机制以 OBE 理念为指导，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从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入手，狠抓学风建设，提高学生应用实际的能力和素质，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五个一”工程服务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的“五个一”工程是落实“12345”工作机制、培养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具体抓手。具体内涵为：学生发展实施“一人一案”、养成教育着眼“一针一线”、学风建设抓住“一早一晚”、心理健康教育致力于“一课一室”、学生满意度建设注重“一点一滴”的“五个一”工程。

学生发展“一人一案”。从大一新生开始，用“学生成长记录卡”帮助学生规划好大学四年，确定如何在大学四年练就核心竞争力，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让学生懂得爱党爱国要从爱校爱自己做起，把个人生涯规划和国家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养成教育“一针一线”。一是把学生宿舍作为养成教育的重要基地，从宿舍来访要做到“一起二迎三送”，到学生行为规范“四字歌”，用“绣花”的方式从细节着手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二是根据学校《学生劳动教育实施方案》，组织学生劳动实践。每周四下午为学生集中劳动实践时间，每个班级都有校园公共区责任范围，定期清扫、维护校园环境。

学风建设“一早一晚”。为确保学风建设成效的可持续性，构建了“三位一体”的学风管理机制：首先，通过严格执行早晚自习制度，强化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其次，重点把控学生宿舍、课堂教学及考场纪律三大关键场域，形成全过程监管体系；最后，创新性地开展多层次学风促进活动，包括组织学习经验分享会、举办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实施优秀寝室与班级评选制度，并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挑战杯”“互联网 +”等高水平科技创新竞赛、社团风采展示、最美大学生评比、读书征文比赛、良师益友评选等八大活动，实施优良学风提振计划，充分让学生“动”起来，“忙”起来。

心理健康“一课一室”。探索“体验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成立涵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班级心理健康委员、宿舍心理健康安全员四级网络体系，成立心理健康辅导员主题工作室，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指导学生心理健康协会开展活动，培养学生开放、平和心态，有效防范心理健康危机事件发生[8]。

学生服务“一点一滴”。把学生满意度建设作为学校管理工具，组建学生生活服务监督委员会，召开学生生活服务联席会议，推动开展“校领导接待日”活动，将新媒体技术手段融入学生服务，建立维修快速反应机制，培养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爱校感，让学生成为学校最好的宣传员[9]。

（二）全员协同育人体系的构建

在推进“五个一工程”的同时，学校构建起全员协同育人体系，以党政干部为主导依照政策法规和学校实际状况制定就业战略规划以及年度计划，指引方向，调配各方资源，整合教学、管理、后勤等部门力量，为就业育人提供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支持；辅导员实施思政引领，加强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动态以及心理状况，借助主题班会、个别谈心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就业观，协助学生筑牢职业理想信念之基[10]。精确进行个性化就业指导，参照学生专业、兴趣、能力特性，提供定制化求职策略、简历优化以及面试技巧辅导，提高学生求职成功率；对专业教师进行专业赋能，发挥专业教师在就业育人进程中的浸润功效，深度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教学内容，如在工程类课程中渗透工匠精神、在管理类课程中强化职业道德，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培育学生的职业操守与专业精神。通过系统指导学生参与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活动，包括科研项目、实习实训及学科竞赛等多种形式，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与创新实践能力，从而显著增强其在就业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三）大学四年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把生涯教育贯穿大学四年，针对不同年级在学涯中所处的阶段，分层分类开展系统化的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大一阶段重点是职业启蒙与规划，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同时运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职业测评、情景体验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全面认识自我特性以及职业世界发展趋势，依照“一人一案”原则，帮助学生制定适配个人特质、专业方向以及发展愿景的初步生涯规划，把大学四年的学业目标以及职业发展道路明确下来。同时，举办职业规划专题讲座与经验分享会，邀请不同行业的优秀校友、企业人力资源专家进校园，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与行业前沿信息，拓宽学生职业视野，增强职业认同感，激发持续探索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11]。大二、大三阶段，重点提升学生的能力和进行实践教学，要紧密关联专业教学大纲，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适当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借助引入由企业真实项目驱动的实践课程以及校企协同实训，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系统地提高专业技能水平，逐步积累实际工作经验，为高质量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着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育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系统化设置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举办创业训练营、创新实践工作坊以及项目孵化活动，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展开创新实践，鼓励学生积极加入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依靠竞赛促进学习、带动创业，持续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意识、风险意识以及团队协作能力，为学生的多元化就业以及自主创业开拓出实际路径[12]。大四阶段重点聚焦求职冲刺以及精准就业帮扶，系统开展求职技巧培训课程与模拟招聘活动，内容包括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薪资谈判以及职业适应等专题。选用企业资深面试官、人力资源专家开展实战指导与点评，以实现帮助学生提升求职实战能力、增强就业信心的目标。借助加强就业形势分析与政策解读，定期举办就业政策宣讲会和行业就业趋势研讨会，帮助学生准确把握就业市场变化和政策导向，引导学生合理调整就业预期，科学定位职业目标。针对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的焦虑、迷茫等常见心理问题，精准运用就业心理辅导，借助专题心理讲座、个体心理咨询以及团体辅导等方式，使学生可有效调适心态、缓解心理压力，始终保持理性、积极的就业心态，促进毕业生稳定就业以及可持续发展[13]。

四、结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是时代之问，也是高校必须回答并践行的根本命题。立德树人要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其目标是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和充分就业，其核心是在就业指导服务过程中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理念，以就业育人推进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构建“12345”就业育人模式，并通过“五个一”工程具体实施，实现了就业育人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为应用型高校提供了就业育人工作范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 尚小芳. 大学生就业工作新探索 [J]. 人力资源 ,2023(14):111-113.

[2] 陈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质量提升问题研究——以安徽省某高校为例 [J]. 滁州学院学报 ,2024,26(04):60-65.

[3] 李成龙 , 叶磊 . 多元协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J]. 中国高校科技 ,2016(06):67-69.

[4] 尹新明 . 应用型本科高校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探索——以新乡学院为例 [J]. 管理学刊 ,2023,36(05):149-158.

[5] 魏锦萍 . 焦裕禄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D]. 郑州 : 河南工业大学 ,2023.

[6] 王静 . 以生涯教育为抓手的就业育人体系建设与实践探索 [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26(03):99-106.

[7] 桂亚可 . 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路径研究 [J]. 办公室业务 ,2023(20):74-76.

[8] 丁闽江 .“全员育人”视角下的心理育人工作队伍建设研究 [J]. 北京教育 (德育),2022(06):87-92.

[9] 邓向群 . 隐性德育视角下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D]. 衡阳 : 南华大学 ,2013.

[10] 李海波 .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思想教育发展研究 [D].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11] 陈宏俐 , 张昊 , 洪新丽 .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策略 [J]. 生物学教学 ,2023,48(10):62-64.

[12] 罗惠英 , 段毅平 . 基于新职业教育法的创新创业团队培育机制与实践研究 [J]. 知识文库 ,2024,40(11):89-92.

[13] 宫钦浩 .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就业心理品质培育研究 [J]. 改革与开放 ,2023(08):58-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课题“‘大思政’视域下应用型高校就业育人有效模式研究”（ND249709）；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024 年教学改革课题“大思政视域下应用型高校的就业育人”（JG240208）。

（作者：夏翠云，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龙腾，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助教）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国有企业思政工作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研究

马　硕

摘要：在数字化转型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其思想政治工作迎来全新机遇与考验，传统模式存在短板，不容易契合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的要求。深度融入数字技术，为提升思政工作质效注入了强劲动力。本文依据数字化转型观点，深度探究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增强思想引领穿透力、增强组织凝聚向心力、激发企业发展驱动力、筑牢风险防控警戒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打造一体化数字思政平台、助推思政内容数字化革新、健全数字化支撑机制、强化数字协同融合四个层面，探析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良与创新途径，意在为国企使用数字化技术增强思政实效、汇聚发展合力提供理论参照及实践指导。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思政工作创新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度改变着各领域的发展形势与实践形态，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肩负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思政工作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核心抓手，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思政工作遭遇内容传播滞后、互动性不足、覆盖范围有限等现实难题，不能很好适应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需求。助推思政工作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实现理念、载体、方法的创新，是国有企业加强思政工作实效性的必然选择，深度探索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国有企业思政工作的创新途径与方法，不仅可以丰富思政工作的理论体系，更能为国有企业筑牢思想根基、激发内生动力给予实践指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转型下国企思政工作的核心价值维度

（一）强化思想引领穿透力

数字化转型为国企思政工作思想引领效能的增强带来技术帮助，明显加强了思想引领的穿透力，传统思政工作多靠线下会议、纸质材料等方法，信息传递链条较长，容易出现信息衰减或偏差，很难快速准确触达基层职工，数字化手段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借助搭建线上思政平台，把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方针等内容用多样化形式推送到职工终端，实现思想内容的即时传播[1]。职工能按自身需求自主获取学习资源，随时随地接受思想熏陶，有效扩大了思想引领的覆盖范围，同样地，数字化传播方式更符合新时代职工的信息接收习惯，可以凭借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降低理论学习的理解门槛，让思想引领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切实把主流价值观根植于职工内心，为助力国企发展凝聚思想共识。

（二）提升组织凝聚向心力

数字化转型助推国企思政工作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有效加强了企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国有企业职工构成越来越多元，不同年龄段、不同岗位职工思想需求各有不同，传统思政工作很难做到准确回应，借助数字化工具搭建互动交流平台，职工可以便捷地表达自身诉求、反馈意见建议，企业可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引领工作[2]。借助线上主题讨论、虚拟团建等活动，打破部门、层级的壁垒，助推职工交流互动，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另外，数字化平台可记录职工的工作表现与思想成长轨迹，为个性化激励与培养提供依据，让职工感受到企业的关怀与重视，更进一步激发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凝聚助推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赋能企业发展驱动力

国企开展思政工作，紧跟数字化转型步伐，同企业生产经营紧密结合，有力助推企业发展，让思政工作不再游离于业务之外，借助数字工具，落到战略规划、生产运营、科技创新等实处，线上思政教育搭配业务培训，可增强职工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带领职工把个人发展同企业目标紧密联系，激发工作积极性与创

造性。靠着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能准确发现职工思想动态同企业发展间的内在关联，为企业决策提供参照，帮助企业避开发展风险、抓住发展机会。此外，思政工作倡导的责任担当、敬业奉献等精神品质，经由数字化传播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助推企业形成爱岗敬业、求真务实的良好工作氛围，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筑牢风险防控警戒线

数字化转型给国企思政工作筑牢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警戒线带来有效手段，目前，网络信息纷繁复杂，各种错误思潮、负面信息容易冲击职工思想，给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考验，数字化技术可实现对网络信息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及时发现、甄别涉及企业的负面舆情和错误思想倾向，为快速处置提供预警。搭建线上意识形态教育平台，常态化开展风险防控教育，提升职工的辨别能力与防范意识，带领职工自觉抵制错误思潮。同样地，借助数字化手段规范思政工作流程，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保证思政内容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从源头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维护企业的和谐稳定和良好形象[3]。

二、数字化转型下国企思政工作的实践现状审视

（一）数字化基础建设初步成型

多数国有企业已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思政工作的重要性，逐步推进相关基础建设，为思政工作数字化发展打下基础，不少企业搭建了线上思政学习平台，整合理论学习资料、政策解读、先进典型事迹等资源，给职工提供便捷的学习渠道。部分企业借助内部办公系统、微信公众号等现有数字化载体，开设思政专栏，推送思政内容，扩大了思政工作的传播范围。此外，企业开始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基础技术，尝试收集与分析职工思想动态数据，为准确开展思政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国企思政工作数字化基础建设已有一定规模，为后续深化发展带来有利条件。

（二）数字化内容供给逐步拓展

伴随数字化转型推进，国有企业思政工作内容供给方式不断丰富，逐步从传统的文字、图片形式向视频、音频、动画等多样化形式开拓，不少企业把思政内容变成短视频、音频党课、H5 等轻量化产品，更好满足职工碎片化学习需要，内容更吸引人，也更容易读。部分企业结合自身行业特点与发展历程，打造了有着企业特色的数字化思政内容，比如企业发展史数字展馆、先进人物数字事迹库等，让思政工作更对路、更有用。企业还注意把思政内容和时代热点联系起来，及时加入国家重大政策、社会热点事件等内容，使思政课内容更适应时代节奏、更贴合职工实际，职工参与热情也更高。

（三）数字化传播渠道不断丰富

数字化转型助推国企思政工作传播渠道由单一走向多元，形成线上与线下协同联动的传播格局，线上除传统内部网站、电子邮件外，企业大量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企业专属 App、小程序等载体，搭建多维度传播矩阵，实现思政信息全方位、多渠道传递。线下借助电子显示屏、互动终端等数字化设备，同线上内容联动，让传播更直观、更具互动性，这一种多元渠道突破了传统思政工作的时空约束，让职工能借助多种方式接触思政内容，有效扩大了思政工作的覆盖范围并提升了效果。

（四）数字化工作队伍建设起步推进

国有企业为适应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需求，开始重视数字化工作队伍建设，逐步加强思政工作人员的数字化素养，部分企业组织开展了数字化技术培训，包含线上平台运营、内容制作、数据分析等内容，帮助思政工作人员掌握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方法。此外，企业尝试整合内部资源，吸纳具备数字化技术能力的人员加入思政工作队伍，形成一支同时拥有思政专业素养和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队伍。另外，企业开始建立相关激励机制，激励思政工作人员积极探索数字化思政工作新形式、新方法，激发队伍的创新活力。但是整体而言，数字化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还需持续增强，满足思政工作数字化深度发展的需求。

三、数字化转型下国企思政工作的优化创新路径

（一）构建一体化数字化思政平台

建立一体化数字化思政平台是助推国企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举措，要整合现有线上资源，打通不同平台的信息壁垒，打造集学习教育、互动交流、数据管理、风险防控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学习教育模块要依据职工岗位特点和思想需求，准确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形成“千人千面”的学习体验；同时加入直播、虚拟仿真等技术，加强学习的沉浸感与趣味性。互动交流模块要增加留言反馈、在线答疑、主题讨论等功能，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回应职工诉求，助推思政工作由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互动，数据管理模块要整合职工学习数据、思想动态数据、舆情数据等，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与趋势，意在为思政工作决策提供依据[4]。风险防控模块需建立实时监测、智能预警、快速处置的全流程舆情防控体系，保证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平台建设要重视用户体验，改良界面设计，让平台更好用、更可靠，还要管好数据，保护职工信息以及企业数据安全。

（二）推进思政内容数字化创新

内容创新是加强国企思政工作吸引力与实效性的核心，需立足数字化转型背景，助推思政内容的准确化、特色化、场景化创新，准确化创新要求深度调研职工思想动态，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岗位职工的需求差异，开发针对性强的内容产品，避免内容同质化

与泛化。特色化创新需深度挖掘企业自身的红色资源、发展历程、先进典型等，把这些内容变成数字化思政素材，比如制作企业红色故事系列短视频、打造虚拟数字先进人物，让思政内容更有企业辨识度感染力，场景化创新要把思政内容同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具体场景融合起来，开发场景化学习课程与实践实例，带领职工在实践中体会思想含义，达成思政教育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此外，要注重内容表现形式的多元创新，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还可加入动画、纪录片、互动游戏等形式，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生动形象的数字内容，让职工更愿意看、更愿意加入，建立内容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加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国家政策方针和时代热点，让思政内容紧跟实际、保持活力。

（三）完善思政工作数字化保障机制

健全的保障机制是国企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需围绕组织领导、制度建设、资源投入建立全方位保障体系。组织领导层面，应成立由企业主要领导牵头的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把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规划，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保证思政工作和企业整体发展同频共振。制度建设需制定加强思政工作数字化管理办法、内容审核制度、数据安全制度、考核评定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思政工作数字化流程，明确工作标准与要求，考核评定制度要把数字化思政工作成效纳入相关部门与个人的绩效考核体系，细化考核指标，加强监管和结果运用，激发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5]。资源投入方面，要增加资金投入，保障平台建设、内容开发、技术升级、队伍培训等工作顺利推进；要重视人才资源整合，一方面增强现有思政工作人员的数字化技能，通过专题培训、交流学习、实践锻炼等方式，增强他们的数字化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引进既有思政专业背景又懂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改良队伍结构，助力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

（四）深化思政工作数字化协同融合

加强协同融合是增强国企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效能的重要途径，需助推思政工作同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协同发展，使思政工作与生产经营协同推进，融入企业数字化平台，准确推送思政内容、开展思想引领，调动职工积极性与责任心，增强生产经营能力，融合生产经营数据和思政数据，分析职工思想变化与生产活动的关系，为决策提供依据。激励思政工作者同企业科技创新团队携手，围绕科技创新遇到的难点问题开展思政教育，弘扬创新精神、奋斗精神，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同时使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科技创新成果，增强思政工作的技术含量与创新水平，协同人力资源管理，把思政学习情况、思想表现放进职工成长档案，同职工培训、晋升、激励等联系起来，带领职工主动参与思政学习，借助数字化思政平台提供职工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指导等服务，增强职工融合素质。除了上述内容以外，需增强企业内部各部门协同配合，打破信息壁垒和工作壁垒，形成工作合力；同时主动参照行业先进经验与外部优质资源，助推国企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思政工作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考验，本文围绕重点价值、实践现状、改良途径三个维度展开研究，明确了数字化转型下国企思政工作在加强思想引领、增强组织凝聚、赋能企业发展、筑牢风险防控等方面的重点价值，检视了目前基础建设、内容供给、传播渠道、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现状，提出建立一体化数字化思政平台、推进思政内容数字化创新、精进数字化保障机制、加强数字化协同融合的改进途径。国有企业思政工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立足企业实际，统筹规划、稳步推进，借助数字化手段深度融合，才能有效增强思政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为国有企业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发展活力提供有力保障。伴随数字化技术持续进步，国企思政工作要一直推陈出新，主动探索契合时代步伐与企业需要的新形式、新方法，助推思政工作同企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夯实国有企业在新时代履行新责任、展现新行动的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 刘晓辉 . 国有企业基层党支部在思政工作中的作用提升策略 [N]. 市场信息报 ,2025-11-07(13).

[2] 孙欣 .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青年职工思政建设工作探究 [J]. 中国集体经济 ,2025(31):57-60.

[3] 崔雅祺 .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思政工作融合创新的路径研究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10):192-194.

[4] 宋瑜婷 . 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政工作的创新思考 [N]. 中卫日报 ,2025-10-21(04).

[5] 国有企业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融合的实践研究 [C]// 郑州市社会学学会 .2025 年社会学研讨会人文与发展分论坛论文集（下册）. 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 ,2025:56-57.

（作者单位：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

晋曼钰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引领，是破解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回应“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世界性命题的中国方案，也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核心主线。高校思想政治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担负着向青年群体系统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核心使命。新时代育人背景下，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系统性、整体性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全过程，构建完备的理论框架与落地化实践体系，是破解思政课教学碎片化、理论空洞化、叙事同质化问题的关键举措。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论内涵，从时代命题、价值意蕴、契合逻辑、实践路径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研究，厘清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搭建“理论筑基—价值赋能—实践落地”的一体化育人体系，有效回应“为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青年如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育人效能提质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校思政课；价值意蕴；理论契合；实践路径

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时代命题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各国普遍面临的时代课题，但长期以来被西方话语所垄断，现代化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在很多话语中被简单画上等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探索现代化道路，逐步在实践层面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党的二十大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并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揭示了其本质特征，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代化问题上实现了新的原创性突破[1]。

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校思政课面向的是成长在互联网、全球化与社会转型交织时代的青年群体，他们一方面对国家发展充满自豪感与参与意愿，另一方面也在全球信息流和价值流冲击下产生诸多困惑。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高校思政课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理转化为大学生听得懂、愿意听、听得进、用得上的“小道理”，如何引导青年学生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同时形成稳固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自信，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绕不开的重要议题。

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重构高校思政课的理论叙事与教学体系，不仅是对国家战略的主动回应，也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提高政治站位、彰显课程优势、增强育人实效的内在要求。从理论视角看，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校思政课在价值目标、理论根基、实践逻辑上的内在一致，从而为课程改革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从实践视角看，则应在课程目标设定、教学内容安排、话语方式选择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贯穿高校思政课“教与学”“知与行”的一条主线。

二、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时代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进步或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赓续发展的基础上，对现代化价值取向与发展模式的全面重构。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鲜明体现了人民性价值旨趣。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

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性发展与共同性进步。这一价值取向与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高度一致。思政课不仅要向学生讲明“我国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要回答“这种现代化与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青年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通过课堂教学，把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结合起来，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给家庭、社区、就业、创业等方面带来的真实变化，有助于把抽象的国家战略转化为具体的生活体验，从而增强课程的亲近感和说服力。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突出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理念突破了传统现代化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单一尺度，强调现代化不只是“造更多的物”，更是“造就更好的人”。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与高校思政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的根本使命高度同构。思政课既要讲清物质发展背后的生产关系变革，也要讲清精神世界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追求，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引导学生认识到，真正的现代化不是“金钱至上”“消费至上”，而是物质富裕、精神富足、人格健全、社会和谐的统一。这种价值观的引导有助于抵消某些青年群体中流行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观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目标，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高校思政课若能通过系统阐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能够帮助学生纠正“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片面认识，增强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伦理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通过讲授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创新实践，如国家公园体制、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能源结构转型等，思政课可以将抽象的生态文明理念具体化，使学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文明属性和世界意义，强调在坚持自身道路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这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世界观对于正在成长为全球公民的大学生具有重要的价值引导功能。通过在思政课中深入讲解“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实践，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封闭自守，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和塑造全球治理新格局，有利于克服部分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形成更加自信、开放、理性的国际理解能力。

从理论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理论素材，也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系统更新提供了根本依据。将中国式现代化纳入思政课教学，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更加紧密，把“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的鲜活资源，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中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与优越性的理性把握。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大时代主题，为思政课课程研究和教材建设提供了持久议题，有助于形成结构稳定、逻辑清晰、内容丰富的课程体系。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校思政课的契合逻辑与内在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校思政课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价值意蕴上的高度一致，更体现在理论基础、实践逻辑与话语方式上的多维契合 [2]。从宏观上看，两者的契合点主要表现在目标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等方面。

在目标逻辑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校思政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两者共同指向“民族复兴”这一历史目标，前者强调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后者强调人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品质的塑造 [3]。思政课通过讲授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成就，帮助学生理解国家层面的伟大目标，同时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观培育，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如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同向同行，从而实现国家目标与个体目标的有机统一。

在理论逻辑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高校思政课则是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重要载体。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更替等经典命题，与新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治理实践和发展模式结合起来，使理论讲授摆脱抽象化、空洞化倾向，呈现出“原理—历史—现实”一体化的逻辑链条。

在历史逻辑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生长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是因为它继承了近代中国人民对“走什么道路”的历史探索成果，克服了照搬西方模式带来的种种挫折，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得出。高校思政课在开展历史观教育时，如果仅停留在简单的时间线叙述，而没有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在百年奋斗和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系

统阐释，就难以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通过讲授从“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到“开辟新形态文明”的历史纵深，思政课可以帮助学生构建起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理解框架。

四、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整体实施路径与体系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章节”或“补充一些案例”，而是课程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的整体优化与重构[4]。基于高校思政课的课程特性，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构建整体实施路径。

在课程体系重构层面，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贯通不同门类的思政课程。一方面，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中专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专题”，通过比较分析方式讲清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差异，强调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超越经典模式的独特性；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逻辑置于百年奋斗的历史叙事中进行阐释，通过对近代以来几次道路选择的对比，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必然；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公民道德、职业伦理和法治意识的分析，引导学生理解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则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任务和战略部署为主线，及时纳入最新政策文件和实践案例，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同步更新[5]。另一方面，在课程结构设计上要避免“碎片化添加”，而要构建横向互补、纵向递进的整体框架，使学生在不同学期、不同门类课程中多角度、分层次地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认知。

在教学内容整合层面，应对现有教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更新。一方面，可以在教材修订和教学大纲制定过程中，增加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章节或专题，如“新时代中国发展新方位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等；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主动整合来自党代会报告、中央文件、权威理论文章以及国家重大战略实践中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多维度比较与案例剖析，使学生不仅“知道”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而且能够“理解”其理论根基和实践逻辑。比如，在讲授共同富裕时，除了介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还可以结合具体地区在教育公平、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的实践，使学生看到共同富裕目标在现实中是如何被一步步推进的。

在话语方式创新层面，应注重构建具有青年特点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一是要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将党的大政方针和国家战略目标用贴近青年语言和生活经验的方式加以表达，避免空洞说教。比如，可以通过“一个村庄的变迁”“一条高铁的故事”“一颗芯片的研发历程”等微观叙事阐释宏大主题。二是要善于运用比较话语，通过中西对比、古今对比、理论与实践对比等方式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现实合理性，纠正部分学生“拿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的惯性思维。三是要注重情感话语，通过英雄人物、时代楷模、科研团队、基层干部等身边典型的故事，将宏大叙事具体化、人格化，使学生在情感共鸣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品格的理解。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主题，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核心主线。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融入高校思政课，是顺应时代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思政课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塑造、从理论灌输向知行合一转型的关键路径。这一融合育人并非表层化、碎片化的内容叠加，而是涵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话语方式、实践场景的全方位、系统性重构。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建设，必须始终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叙事，立足青年成长规律与育人实际，持续优化融合机制、丰富育人载体、创新教学模式，持续深化理论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从“讲道理”到“铸灵魂”、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塑造”、从“课堂教学”到“全程育人”的深刻转变，为引导新时代青年深刻把握时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2]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0.

[3] 张雯 , 李洋 .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校“四史”教育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20):41-44.

[4] 张固宁 .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逻辑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5(01):16-24.

[5] 张明海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郑州西亚斯学院 2025 年度校级科研经费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效思政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2025XKE106）。

（作者单位：郑州西亚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枫桥经验”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

魏明宇

摘要：作为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自主探索形成的原创性治理智慧，“枫桥经验”植根中国本土治理语境，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回应群众现实诉求，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持久有效的实践范式，至今仍具备鲜活的时代价值与强大的实践生命力。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是基层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更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是回应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协同融合发展命题的重要载体。文章立足本土治理视域，深度挖掘“枫桥经验”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核与育人资源，系统梳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层面的创新价值，探究其赋能思政教育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升育人亲和力、针对性与实效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枫桥经验”；教育方法创新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基层治理智慧的典范。其“发动和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核心治理逻辑，集中彰显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柔性治理的深度融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迭代发展，“枫桥经验”已从单一的治安管理模式，拓展为涵盖基层自治、矛盾化解、文化浸润、价值引领的综合治理范式。其蕴含的预防为先、协商共治、浸润引导、群众主体等核心方法论要素，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与实践借鉴。

一、基于“枫桥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关理论概述

（一）“枫桥经验”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时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1]。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体现了群众主体性与实践导向的辩证统一，本质是通过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激活基层内生治理动能，实现矛盾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治理目标，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实践观高度契合、内在统一。“枫桥经验”并非固化的政策文本，而是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治理哲学，其生命力在于“问题导向、群众参与、机制创新”。这种模式有效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单向灌输、被动施教的现实困境，重塑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教育目标的具身化与内化[2]。

（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聚焦个体政治认同与思想引领的教育活动，其核心指向是引导个体形成符合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发展目标的外在政治观念体系，本质是塑造政治认知、培育政治素养的方向性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泛指人类所有阶级社会共有的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活动，特指无产阶级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活动[3]。政治认知层面，旨在帮助个体理解国家政治制度、政党理论、法律法规的内涵与逻辑，形成对国家、政党、社会制度的理性认知。思想观念层面，注重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化为思想武器。价值引领层面，强调培育个体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对国家发展道路、文化传统的认同。政治能力层面，致力于提升个体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其能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辨别政治方向、坚守政治立场。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在受教育者的协同下在解决人的思想行为问题的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思路与原则、手段与方式及其操作程序与操作技巧的总和[4]。其构成要素涵盖教育主体的方法选择与运用能力、教

育客体的接受特性、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具体手段工具、教育环境的适配性等，各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动态运行机制。从功能维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承担着教育内容的传递功能，更兼具引导受教育者认知深化、情感认同、意志锤炼与行为转化的整合功能，是实现“知、信、行”统一的重要保障。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线上与线下互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发展趋势，如朋辈互助法、数字化教育法、情境体验法等新兴方法不断涌现，既丰富了方法体系的内涵，也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提供了新的路径支撑。

二、“枫桥经验”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在联系

（一）价值契合：“枫桥经验”蕴含丰富思政教育元素

根植基层治理深厚实践的“枫桥经验”，蕴含大量可迁移、可活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元素，二者在价值导向、主体参与以及方法原则等多个层面都展现出了深刻且紧密的内在契合关系。立足价值导向这一维度进行分析，“枫桥经验”倡导践行“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准则要求，它的本质内涵在于依靠群众自我教育以及协商共治的具体路径，促成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与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推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培育公众公共理性思维的根本目标处在高度契合的状态。这一经验的核心要点在于把价值引导的相关工作充分融入基层治理的各项具体实践环节当中，让广大群众在亲身参与各类矛盾化解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对社会运行规则、责任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这样一种“治理即教育”的实践逻辑，能够切实有效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容易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相互脱节、价值宣讲和生活实际体验彼此分离之类的短板与不足。聚焦实践主体这一层面展开探讨，“枫桥经验”始终坚守“发动依靠群众”的核心原则，突出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与思想教育双重过程中占据的主体位置。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同样着重强调教育对象自身具备的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倡导借助双向互动以及深度参与的方式方法，实现思想价值理念在个体层面的内化与升华。着眼方法论原则这个角度加以考量，“枫桥经验”中“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相互契合，主张借助日常生活场景当中的柔性引导以及具体情境建构的方式，将各类可能出现的价值冲突问题化解在萌芽未发的初始状态。“枫桥经验”当中包含的“文化浸润”相关元素，还进一步拓宽延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可借助的载体空间。依托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家风建设的深化推进、社区文化节的组织开展等多样化载体，将原本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广大群众可以切实感知、能够自觉践行的日常行为规范，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充分融入大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这样一种“润物无声”的隐性渗透方式，不仅显著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接受度，还有助于保障价值内化过程具备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特点[5]。

（二）方法借鉴：“枫桥经验”工作原则的思政育人启示

“枫桥经验”在长期基层治理实践中凝练出的“预防为主、群众参与、协商共治、柔性引导”工作原则，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十分深刻的启发和借鉴。这些原则不仅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贴合紧密，更能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清楚地指明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的老旧模式朝着协同赋能的新型模式转型过渡的具体路径和方向。预防为主的原则着重强调要把开展教育引导的时机往前挪，提倡通过打造贴合日常的各类教育情境，识别那些有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来实现价值引导工作的主动介入和有效干预。这一点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提倡的“防微杜渐”的理念高度契合，它要求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彻底摆脱“出了问题才去补救”的被动工作模式，转而借助网格化观察、朋辈之间的日常沟通、对学生情绪状态的监测等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机制，及时准确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把可能出现的价值冲突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代替群众解决问题”，通过搭建开放且平等的参与平台，充分激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这一原则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是，相关工作需要重新构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摒弃过去“权威—服从”的单向传输关系，转而建立起“对话—协商”的双向良性互动关系。

（三）机制融合：构建“枫桥经验”赋能的思政教育协同模式

“枫桥经验”蕴含的群众参与、协商共治与柔性引导等运行逻辑，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提供了可迁移的机制框架。构建基于“枫桥经验”的思政教育协同模式，核心在于将治理机制有机嵌入教育全过程，实现教育主体、场域与过程的系统性整合。该模式强调通过多元主体协同、生活化情境浸润以及制度化载体设计，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知识传递向多维价值共育转型，形成“治理—教育”良性互促的育人生态。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聚焦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而主体协同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在场域融合方面，协同模式主张将教育空间从课堂延伸至生活全域，构建“教室—宿舍—学院—网络”四维一体的浸润式育人场景。“枫桥经验”强调矛盾就地化解，其启示在于通过空间重构使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实践。在学生社区设立“红色文化角”“协商议事厅”，将价值讨论嵌入生活环境，利用数字化平台

开发“线上意见箱”“微提案系统”，拓展学生参与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互融互通。这种空间拓展打破了教育与实践的壁垒，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生活智慧。

三、基于“枫桥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构建

（一）矛盾化解导向的预防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矛盾化解导向的预防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枫桥经验”中“预防为主、就地化解”的核心逻辑为方法论基础，强调通过前瞻性介入与情境化引导，将价值冲突的消解置于矛盾生成之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的范式转型。这种教育方法不仅重视对学生外在可见的行为偏差进行纠正，还更加看重对他们思想观念层面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和疏导，它可以借助网格化观测、情绪监测、朋辈沟通这类具体可行的机制，搭建起一套能够覆盖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全过程的早期预警体系。高校可以借鉴“枫桥经验”中包含的“村民说事”和“积分管理”这类成熟有效的机制，在学生社区、班级组织、网络社群这些学生经常活动的场域，设立“宿舍议事角”“学业互助岗”这类实在的载体，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协商、动手解决身边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在不知不觉间建立起对规则意识、责任伦理以及共同体价值的认可和接纳。学校还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开展“班级事务听证会”这样的活动，引导学生围绕学业压力缓解、人际关系处理、生涯规划制定这类和自身息息相关的议题，展开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让学生在理性的沟通和探讨当中，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碰撞、磨合与整合。柔性引导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另一项重要特征，它明确反对采用生硬的理论灌输和强制的手段压服的方式开展教育，而是换一种思路，通过情感浸润、文化熏陶、榜样示范这些温和且有效的途径，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思政教育方法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思政教育方法，核心在于重构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关系，将“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治理逻辑转化为“激发学生主体性、促进师生共治”的育人机制。这一路径强调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以教师为单一权威的线性传输模式，构建起以党组织为引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家庭与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网状协同结构。“枫桥经验”通过群众自治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协同式教育路径主张通过制度化的参与平台，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内化与行为养成。在高校语境下，多元主体协同的具体实践需依托学生社区、班级组织、学生社团等日常场域，设计具有可操作性的参与机制。借鉴“枫桥经验”可在学生社区设立“宿舍议事角”“班级事务听证会”，鼓励学生就学业压力、人际矛盾、公共规则等议题展开平等对话。这种“生生互育、师生共商”的机制，不仅有效化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二元对立，更使价值引导从外在规训转化为内在需求，形成“事中育理、理中融情”的良性循环。

（三）情理法数交融的创新型思政教育方法

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打破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要以情感共鸣为基础搭建起价值认同的底层逻辑。“枫桥经验”的实践做法充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注重挖掘个体生命体验和集体价值观念之间的契合之处。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强调的“情理法融合”的治理智慧，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入法治化的全新维度。这种法治化的思维模式迁移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可以搭建起一套“规则底线—价值引导—行为养成”的三维教育框架。通过开展常态化的普法教育，让学生明确自身的行为边界；借助典型案例的分析讲解，向学生阐释清晰的价值导向。一步步强化学生的良好行为养成。数字技术的融入和应用，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体系。“枫桥经验”推进的“智慧平台”建设工作中包含的“矛盾预警—智能研判—协同处置”的闭环工作机制，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高校搭建“数字枫桥”平台，整合学生的课堂表现、日常行为数据等多维度的信息内容，为每一位学生建立起动态画像，以此实现对各类潜在风险的提前预警和教育干预的智能化开展。这种数字化的教育模式不只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还能通过可视化的分析工具，揭示出学生群体的行为特征和各类矛盾的演化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精准施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 仲音 . 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N]. 人民日报 ,2023-09-27(01).

[2] 侯勇 , 肖洋 . 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理路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01):18-26.

[3] 代玉启 . 思政引领力 :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标识性概念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5,11(08):105-112.

[4] 莫付欢 . 地方高校“1+6 式”科研育人创新模式探索与示范——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为例 [J].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8,33(05):79-81,92.

[5] 王梦宇 . 论“枫桥经验”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引入路径 [J]. 公安学刊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8(05):128-132.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的研究

关思宁

摘要：思想政治课是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凝聚社会思想共识的核心阵地。在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社会多元思潮交织碰撞，使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面临全新挑战，大幅提升了思政育人工作的难度。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须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深化实践育人内涵，通过建强师资队伍、优化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深耕校园文化建设等多元途径，持续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认同，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价值支撑。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认同机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持续深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与较量日趋激烈。高校作为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的主要阵地，肩负着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使命，筑牢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要义。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成熟的关键阶段，对社会思潮的辨别能力、思辨能力尚未完全完善，极易受到多元观念的渗透与影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未强化其意识形态认同，可能动摇部分学生的信仰，影响到个体成长发展[1]。基于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认知规律与成长需求，本文系统剖析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现状、影响因素，构建科学完善的意识形态认同机制，探索精准有效的育人路径，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二、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国内高校持续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育人路径。各高校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培育了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人才，为意识形态教育筑牢师资与理论根基。在日常教学中，高校依托思政必修课、专题讲座、学术研讨、理论宣讲等多元化形式，系统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理论体系与时代价值，持续提升大学生的理论素养与政治觉悟，有效夯实了青年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知基础。

校园文化浸润与实践育人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载体。各高校普遍依托校园文化活动、学生社团建设、社会实践项目，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育人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熏陶。多数高校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育人活动，组织学生走进红色革命纪念馆、革命遗址、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景研学，引导学生直观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部分高校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团、时政研讨小组，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与研讨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理论学习兴趣及相关能力[2]。整体而言，当前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体系逐步完善，育人载体不断丰富，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整体向好。

三、影响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的因素剖析

（一）内部因素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价值观塑造、思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该阶段学生认知能力、判断水平持续提升，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能力不断增强，需系统化、深层次引导学生辨析社会复杂现象、多元价值观念。高校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热情逐渐增加，通过课堂学习、课外阅读、关注时政、社会实践等途径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并在自主思考、团队探讨、社会实践中重构世界认知，教师可通过互动性、体验性、实践

性强的教育方式进行教学。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需以学生为中心，避免单向灌输，可根据学生的认知需求、学习习惯设计教学内容与教学性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学习主动性，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部分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断创新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项目式学习法、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式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教师选取典型的、具有时代性的案例深入分析，组织学生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理论争议议题，并搭建在线讨论平台，鼓励学生展示自我观点、相互交流思想，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促使其在深度讨论中加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认同[3]。

（二）外部因素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模糊了地域之间的文化界限，促使不同区域相互交流文化、价值观念，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丰富价值选择维度、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多种渠道广泛传播各类积极向上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文明成果，可促使学生重视精神追求、社会责任，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强化团队协作意识与奉献精神，并加深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使其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加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学生的意识形态认同受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民生福祉的不断改善影响较大，大学生深入了解我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民生等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后，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独特优势，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制度自信，主动接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全新载体、技术支撑，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具有较强交互性、丰富表现形式，全方位、即时传播思想文化，促使大学生群体快速接触到优质思想文化资源。高校与相关部门可积极打造清朗网络资源，采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校园 App 等新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通过图文、短视频等方式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新时代发展成就，并采用新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思想滋养、精神养分。不断完善网络监管体系，持续强化正向引导机制，提升互联网的技术防控能力，为用户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广泛传播、深度渗透。

（三）综合分析

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受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正向互动、协同发力、有机融合的影响。大学生不断提升自身认知能力、增强主动学习意愿、升华自身思想境界，为其提供坚实内在动力，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外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国家发展成就持续感召、优质信息广泛传播、社会正能量持续传递，可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氛围，加强学生意识形态认同。高校连接了内部因素、外界因素，可通过整合育人资源、优化教学方式、完善育人体系等多种方式促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汇聚外部积极力量形成全方位育人合力，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统一个人发展、国家需求[4]。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的构建

（一）认知认同机制

加强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实现，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课程占比，并强化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建构。设置课程时，选择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现实针对性的课程，引导学生多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与含义。

创新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加强认同感，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为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单向传递方式，影响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学习积极性，影响教学效果，故高校进行教学时，需创新教学方式，使用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观能动性。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实践教学，在课堂上深入分析案例，并进行讨论，可促使学生深刻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要义、核心价值；采用小组讨论法教学，在课程内容中加入争议性的议题，并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促使思想内容碰撞，加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

（二）情感认同机制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是强化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的重要途径，校园文化作为学校精神、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集中载体，会对学生的思想认知与行为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高校须主动构建积极向上且彰显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主流意识形态切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具体环节之中。在校园环境建设层面，可通过布设文化景观、宣传栏与标语等具体形式，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要义与精神内核，让学生在日常校园生活中时时处处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同时打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文化广场，设置承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的雕塑与展板，使学生在休闲娱乐过程中自然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与教育引导。

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的培养可通过开展实践活动实现，实践活动可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增强认同感。高校需加强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实践活动，通过社会调研活动，可促使学生了解社

会现实状况，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进而增强学生的主流意识认同感；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可培养学生的情感认同，在志愿服务实践中，可增强奉献意识、社会责任感，深刻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与价值观念。

（三）行为认同机制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其将意识形态转化为实际行动，主动践行主流意识形态。高校教育过程中，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展现出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正确价值取向的学生给予表彰奖励，促使学生积极参与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相关活动。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加入意识形态认同情况，据此开展评优评先、奖学金评定、推优入党等工作；在奖学金评定中，可加入思想政治素质考核，优先考量思想政治表现突出、主动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学生，促使学生认识到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意义，增强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5]。

加强社会实践指导是助力学生将意识形态认同落到行动上的关键环节，社会实践虽为学生转化理论知识的重要平台，但缺乏有效指导，学生往往难以在实践过程中真正理解并践行主流意识形态；高校需强化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力度，为学生配备专业指导教师，协助其制定实践计划、剖析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实践所得经验。指导教师需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与方法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同步培养其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高校还应深化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与资源、拓宽实践渠道，让学生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践行主流意识形态。

五、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的策略与路径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的意识形态素养，定期组织教师参与培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使教师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价值取向，坚定政治立场；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培训，解读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增强教师的敏锐感知、辨别能力，保证教师准确把握教育方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式，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教学，增强学生的积极性，主动进行学习；教师可向学生讲解典型案例，深入剖析案例内容，增加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解程度，增强学生认同感；健全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反馈机制，组织教师参与专题研讨、教学观摩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相互学习经验，不断提升教学能力。

教师需以身作则，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学生树立典范，以自身言行感染并影响学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同时要严格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秉持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的准则，主动关心关爱学生，着力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为意识形态教育创设有利的实施氛围[6]。

（二）优化教育内容与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主要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开展交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需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效率、覆盖范围，拓展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与覆盖空间。高校可开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定期发布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文章、深度分析时事热点、解读权威政策，增强学生的兴趣；还可制作相关短视频，采用直观的画面、简洁的语言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意识形态教育；采用直播平台开展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增加教育的影响力，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管理，并正向引导，避免不良网络信息影响学生[7]。

（三）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需强化校园文化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工作，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学术讲座、社团活动等形式多样且内容丰富的活动，以适配不同学生的兴趣偏好与实际需求，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自然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与感染；同时要将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各环节，使校园文化切实承担起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载体功能。

建设校园环境时，需打造具有文化内涵、教育意义的景观，让学生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氛围中；建立健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制度，并引导学生主动遵守规则意识、道德观念；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需选择合适的主题与内容，在其中加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元素，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教育。

六、结论

本文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认同为研究核心，系统梳理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现状，从内部、外部双重维度剖析了影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核心因素，构建了涵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的“三维一体”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并从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内容方法优化、校园文化建设三个维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提升路径。研究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构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丰富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本文提出的育人机制与优化策略，能够有效破解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难题，持续强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三观，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新时代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参考。

（下转 246 页）

朋辈心理辅导体系为“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育人赋能

焦小茹

摘要：“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园地，为朋辈心理辅导的实现提供了沃土。本文首先阐释了“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朋辈心理辅导的重要载体，具备多方面的显性特征和可行性，是高校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有力举措，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普适性。其次阐述了“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体系构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价值，最后提出朋辈心理辅导体系为“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育人赋能的实践路径，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心理育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环境态势、多元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冲击下，处于Z世代的当代大学生面临诸如学业、就业等多重问题的压力和困扰，心理健康问题愈加凸显，全面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迫在眉睫。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学校聘请的社会工作者等的作用，增强同伴支持，融洽师生同学关系[1]。

朋辈心理辅导是指年龄相近者对有心理辅导需求的同伴提供心灵慰藉和支持，是一种由非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心理咨询式的帮助。朋辈心理辅导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形式的创新，是学生自助与助人需求相统一的体现，是提高“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

2019—2023年，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实现了“试点、集成探索、扩大覆盖”的三步迈进，学生社区“末梢”变成了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前哨”[2]。2024年，《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提质增效指南》明确提出推动心理服务、学业支持、就业指导、后勤保障等力量汇聚一线，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鼓励建立学生自我管理组织，支持学生开展朋辈教育帮扶。

一、高校朋辈心理辅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逐渐普及，高校乃至社会各界对心理咨询的认知和接受度逐步提升。高校心理专任教师在安抚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处理突发事件、跟踪心理健康监测与科学评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专任心理教师无法直观掌握学生第一手资料，其心理咨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因此借助多方教育力量的合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上接245页）

参考文献

[1] 王滢 .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教学探析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4(36):28-31.

[2] 陈文静 , 齐敏 . 智能思政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J]. 传播与版权 ,2025(09):93-96.

[3] 郑立 . 高校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教育探析 [J]. 青年时代 ,2019(23):81-82.

[4] 贺全 . 新媒体环境下思政教育赋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路径研究 [J]. 成才之路 ,2025(24):29-32.

[5] 张薇 . 高校思政课意识形态功能及话语权提升路径 [J]. 池州学院学报 ,2025,39(01):126-129.

[6] 兰妮 . 新时代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困境、维度和路向 [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5(01):121-125.

[7] 隋灵灵 , 胡明晓 . 算法推荐赋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风险审视与调适路径 [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25,40(04):48-56.

（作者单位：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朋辈心理咨询形式，为心理辅导力量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形式的有力补充。朋辈心理咨询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需要，更好地践行“以生为本，生命至上”的教育理念，更好地契合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特点以及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朋辈心理互助的实现依赖于其多方面的可行性。

（一）朋辈心理互助的研究和实践得益于相关心理学理论的支撑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朋辈互助通过平等、非评判的关系帮助青年感受到被接纳和理解，促进自我成长。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青年更易模仿同龄人的积极行为，朋辈榜样的示范作用比其他人更易被接受，帮助习得适应性行为。发展心理学认为，朋辈互助提供安全的社交实验场，通过同伴反馈探索自我，解决归属感问题，避免孤独感或行为偏差。积极心理学关注青年发展的优势而非缺陷，注重通过朋辈活动来提升青年希望、韧性的心理资本。这些理论犹如明灯点亮了朋辈心理互助模式的实践探索，彰显了朋辈心理互助模式对青年社会化成长与发展的强大引擎与重要价值。

（二）朋辈心理辅导具有自发性、简便性等显性特征

朋辈辅导员与受助学生长时间生活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面貌、看待问题视角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因而朋辈辅导员更能理解同龄人的压力，进而提供更具共鸣的支持，学生接受程度高[3]。朋辈辅导员在给予心理安慰和支持的同时，更提供了知识和经验分享，锻炼了自身心理适应能力，有利于提升综合素质，实现朋辈间的自助与互助。此外，朋辈心理互助模式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专业的心理教师、辅导员相比，朋辈辅导员可随时深入学生群体，对潜在的朋辈心理危机进行及时干预，因而可以实现更便捷地跨时间、跨空间的心理健康教育。

二、“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模式的优势

（一）朋辈心理辅导模式是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有力举措

为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落实“三全育人”理念。心理健康教育专职人员、各系院书记、副书记、专职辅导员、专任教师等与朋辈辅导员通力合作，对学生的心理动态实现信息共享[4]。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要将朋辈辅导模式贯穿学生成长的全周期，从入学到毕业，从课堂到课外，从学习到生活，针对不同时期大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动态调整朋辈心理辅导的形式和内容，有助于实现全过程育人，例如，针对大一新生适应探索期，可以开展“学长学姐导航计划”；针对大二、大三能力提升阶段的大学生，可以开展“心理微课大赛”，通过新媒体传播对大学生进行技能训练；针对大四转型期，可以开展“校友心理导师计划”，邀请毕业两到三年的校友以线上形式分享职业转换期的心理调适经验。

（二）朋辈心理辅导模式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教育普适性

学生朋辈队伍咨询模式对传统的来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构，本质上是朋友、同学、同龄人关系，彼此间更易促进信任建立，学生无需标签化自己，更易打开心扉，打通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毫米”。加强朋辈队伍建设，一方面有益于增强朋辈辅导员的主人翁意识，同时能与学校专业的心理资源形成合力，识别出需要转介的心理问题学生。“一站式”学生社区依附朋辈关系网，扩大了心理咨询覆盖面。

三、“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体系构建意义

（一）理论意义

1. 为“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体系的构建是学生社区心理育人模式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探索，丰富了高校心理育人理论体系，创新了公寓管理模式，赋予了“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思政教育、管理与育人工作的属性，提升了心理育人实效性[5]。

2. 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状立体管理模式

构建“学校—院系—学生社区—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状立体管理模式，突出学生朋辈力量参与学生社区活动的参与性与主体性，充分激活学校“哨点”，发挥朋辈心理辅导力量“哨兵”的预警与干预作用。校级层面对朋辈队伍开展线上线下协同模式的专业心理培训，增强朋辈及早发现心理异常学生的意识以及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能力，对其进行生命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培养其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信念，在“一站式”学生社区背景下逐步实现学生自洽，让学生当家[6]。

3. 深化对大学生心理特征的具象化研究

通过大数据分析、宿舍网格采集等方法，对不同心理类型学生进行画像，提出针对性干预模型，为精准心理育人提供理论依据，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

（二）实践价值

1. 打造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品牌

“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体系将心理委员、学生党员、宿舍长等多支朋辈力量结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的培训与锻炼，在内部实行“传帮带”的工作模式，使朋辈辅导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朋辈辅导员常驻社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心理异常现象并及时干预和上报辅导员，实现“楼内可询，宿舍可聊”，形成具有大学特色的学生社区“一站式”文化品牌，逐渐成为高校“三全育人”的创新模式[7]。

2. 丰富第二课堂与社区文化

心理健康教育打破了传统的课堂传授模式，将其融入学生日常社区生活，通过在社区内举办心理剧创演、“情绪驿站”游园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利于营造积极健康的社区文化氛围，既增强了学生心理资本的张力，同时又达到了实践育人的效果，实现了文化育人与心理育人的教育合力与同频共振。

3. 创新心理危机“网格化”管理模式

构建“学校—院系—学生社区—宿舍”四级网格化管理模式，“一站式”学生社区依靠朋辈辅导力量，各个宿舍设立“心理气象员”，确保问题早发现、信息早收集、危机早干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扩大了危机干预的覆盖面，提升了心理育人实效性[8]。

四、“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的赋能路径

（一）加强朋辈心理辅导员队伍建设

完善选拔机制，开展系统培训。优秀的朋辈辅导员应具备完备的知识结构、积极的处世观、完整的人格特征、灵活变通的技巧以及认真负责等良好品质。高校应制定完备的培训计划方案，加强对朋辈辅导员的培训，以期提升心理育人实效性。首先，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包括但不限于对常见发展性心理问题的甄别与应对，以及对异常心理现象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的识别，对心理危机的排查与干预等。其次，定期开展咨询技能培训，掌握必要的人际沟通技术，如倾听、询问、共情、积极关注、无条件接纳以及其他会谈技术，便于取得更加良好的咨询效果。最后，科学的考核机制对激发朋辈队伍工作热情，提升其工作效能大有裨益。每年可定期举办诸如“十佳心理朋辈辅导员”的评选活动，促进学校良好精神风貌的形成。

（二）丰富朋辈心理辅导活动形式

为了促进心理保健的“文化渗透”，提高社区整体学生的心理保健素质，必须持续不断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活动。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需针对性地开展精准帮扶[9]。例如，针对大一学生的适应性问题，可借助新生入学教育的契机，开展“学姐学长引路计划”“破冰启航”等新生联结相关活动。针对高年级学生的升学、就业等发展性咨询，可借助朋辈支持与榜样引领方式，开展“前辈之光”经验分享会活动，同时鼓励有相同需求的学生组成“同行者”支持小组，配备指导教师，促进育人合力有的放矢。

（三）营造融洽氛围

定期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宣传栏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开展适应不同年级需求的讲座，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每个院系设立一个朋辈辅导员工作室，“全天候”保障心理求助服务，充分将心理健康教育扎根宿舍楼宇；根据系院各自特色布置相应的学生社区，划分不同的功能区，满足不同社区活动的场地需要，并在社区内部配备一些专业的心理设施，学生可进行自助预约，朋辈辅导员提供相应服务，将心理健康教育深植于学生内心；为学生社区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任心理教师，对朋辈辅导员起到定向督导作用，促进朋辈辅导员工作顺利开展。

（四）利用网络平台赋能服务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构建“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线上互助平台是时代所需。因此，应着力构建网络心理支持矩阵，整合学工系统、心理健康网站与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资源，建立线上朋辈互助机制。在开学、毕业等关键节点，针对性推送心理调适内容，有效疏导学生情绪压力。同步设立树洞、吐槽墙等匿名倾诉通道，广泛征集学生诉求，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全校心理数据的动态管控。设立关键词预警机制，如出现自杀、抑郁等敏感词汇，自动触发预警，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注。构建网络互助平台，能更便捷地服务学生心理健康。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朋辈心理辅导具有自发性、简便性等显性特征，在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内是新亮点、新举措。作为高校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重要举措，“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模式为培养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3(05):4-9.

[2] 邢晓雪 , 王怀勇 . 朋辈心理咨询进社区：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育人功能实践路径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43(01):135-139.

[3] 李晓晴 , 祖羞月 . 朋辈心理辅导体系为“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育人赋能 [J]. 品位·经典 ,2025(08):83-86.

[4] 冉晓丽 .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模式探析 [J]. 华章 ,2025(01):78-80.

[5] 金玉宝 .“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育人探赜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5,46(05):132-136.

[6] 李冬倩 , 羌杨洋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措施研究 [J]. 公关世界 ,2025(11):37-39.

[7] 胡海燕 . 忻州师范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研究 [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5,41(01):124-129.

[8] 卜梦瑾 .“一站式”学生社区朋辈心理辅导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及意义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15):61-64.

[9] 俞国良 . 发挥朋辈咨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10):42-45.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

筑牢生命防线：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教育的现状与路径探索

丛中流　祁艳波　葛　杰　贾月辉　马淑丽

摘要：在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作为社会重要青年群体，其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是构建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作为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急救教育成为筑牢生命防线的关键环节，高效开展大学生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培训，提升校园乃至社会的应急救援效能，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本研究围绕筑牢生命防线的宗旨，主要论述了强化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教育的价值意蕴，系统分析了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从教学体系、校园文化、保障机制等多个维度，提出了提升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的有效路径，旨在完善高校急救教育体系，全面提高大学生应急素养，为校园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关键词：大学生；急救能力；生命教育；施救意愿；教育路径

随着社会发展和公共安全意识的提高，急救能力已成为现代公民一项必备的核心素养，如何保障公民生命安全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知识接受能力较强的群体，大学生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的频率极高，也是急救知识传播和实施的重要力量，其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直接影响突发事件的处置效果。然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代高校大学生急救能力整体薄弱，施救意愿有待提高，暴露出大学生急救知识水平与施救意愿之间的转化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亟须构建完善的大学生急救教育体系。本研究立足筑牢生命防线的核心目标，聚焦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两个维度，探索一套切实可行、多方联动的急救教育提升路径，能够推动高校急救教育的系统化、规范化发展，并促进急救教育理念从“技能中心”向“全人发展”转变，为社会生命安全保障体系的完善注入青春力量。

一、强化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提升大学生生存技能，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高校通过开展急救教育来强化大学生急救能力，提升其施救意愿。这一方面可以增强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提升综合生存能力，使其在遇到运动损伤、突发心血管疾病等突发意外事件时，能够快速作出正确判断和处理，有效利用黄金抢救时间来提高自救、互救效率，减少因意外导致的伤残、死亡事件的发生，促使大学生从被保护者向具备主动防护能力者的转变，直接保障了大学生的个体生命健康安全[1]；另一方面，急救教育让大学生掌握医学相关应急救护知识、关键技能的同时，还能够让大学生直观理解生命的脆弱与宝贵，树立起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精神，形成勇于担当、乐于助人的公民品质，从旁观者转变为主动施救者，在实践中塑造社会责任意识，并在未来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中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成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合格社会公民。

（二）完善高校安全教育体系，建设平安校园

将急救教育融入、渗透到高校教学育人工作中，兼顾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的提升，可以打破传统安全教育单纯强调技能熟练度的局限，深化高校安全教育改革，在提升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应急自救互救能力的基础上，更关注大学生施救认知、情感与行为意向等的综合培养，极大地丰富了应急教育学科体系，推动安全教育从理论、技能传授向“全人发展”的转变。同时，急救教育也是平安校园建设的核心支撑。完善和补充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在校园内部搭建起立体化、反应快速的生命安全监测及安全防护网络，大幅提升高校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将安全事故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由此，高校保障了教职工、师

生的生命安全，维护了校园教学秩序，营造出稳定、安宁的教学育人环境，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公共安全体系，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提升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教育不仅关乎个体与校园，更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社会急救力量的储备军，通过扎实掌握急救技能，能够成为社区应急响应网络中的有生力量，产生积极的辐射效应，将急救知识、技能推广给社会群众，为提升社会整体应急能力注入了强劲动力，夯实了社会公共安全的群众基础。在急救教育中，同步提升大学生的施救意愿，还可以让大学生深化对“能救、敢救、愿救”的认知，打破社会冷漠心态，培养其人道主义精神，有助于弘扬救死扶伤、互帮互助的思想品德，培育互助友爱的社会风尚，传递社会正能量。由此，可以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为社会文明建设注入内生动力，推动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

二、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的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急救能力现状

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整体急救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出理论知识薄弱、实践技能匮乏并存的显著特征。在急救知识掌握方面，大学生虽然知道学习急救知识的重要性，但仅停留在了解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概念的层面，对关键急救知识指标的掌握远远不够。例如，人工呼吸的规范比例、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使用时机、止血方法、心肌梗死的识别等，不了解完整的急救流程、常见急症以及创伤处理等知识，并未构建起知识体系，导致其在真实情境中难以形成清晰、正确的施救思路。而在急救技能水平方面，大学生缺乏高仿真、重复性的实操环境，实践操作经验不足，无法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存在“理论懂、实操错”的表层化问题[2]。多数学生的“知”与“行”严重脱节，出现胸外按压的位置 / 频率不达标、人工呼吸方法不规范、感染防护不到位等状况，使其即便有施救意愿，也因能力不足而可能束手无策，甚至因错误操作对施救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二）大学生施救意愿现状

相比急救能力状况，大学生的施救意愿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从整体施救意愿水平来看，大学生主观上深度认同救死扶伤的道德价值，认为自身承担着援助他人的社会责任，潜在施救意愿较为强烈，体现出大学生群体拥有良好的道德基准、同情心。但是大学生的施救意愿在不同情境下也存在显著差异，面对不同紧急状况、施救对象，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隐含着对他人施救可能带来法律纠纷、被讹诈风险的担忧。例如，对于突发心搏骤停、癫痫等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其施救意愿相对较高；而在创伤出血、醉酒等情况下，其施救意愿则有所降低。同时，施救对象与大学生的关系亲疏也会影响施救意愿，其对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施救意愿明显高于对陌生人的施救意愿，这也反映了大学生在施救决策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社交顾虑。

（三）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的关联性及影响因素

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耦合关系，呈正向关联。其中，急救能力是施救意愿的底气，而施救意愿是急救能力价值的体现。受到认知、情感、环境及培训等多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二者在实践中表现为存在“高学习意愿、低施救意愿”的矛盾现象，大学生普遍无法将积极的学习态度有效转化为实际的施救意愿，揭示其在知识接收到行为实施间存在复杂的心理转换障碍。在认知层面，大学生急救知识自信度、对后果的预期、责任分散效应认知等观念，决定了其施救意愿和行为。自信于自身急救技能、对法律责任较为了解、潜意识不接受旁观者效应的学生表现为强烈的施救意愿，在紧急时刻会果断出手；在情感层面，大学生的焦虑、恐惧等情绪与同情心、利他主义思想，也直接影响着施救意愿。突发情况下能够有效疏通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接受生命教育且具备良好人文素养的大学生，施救意愿较高；在环境层面，社会舆论与法律保障、校园急救文化氛围会干扰大学生施救意愿的形成，驱动其做出相应的施救行动[3]。在正向的社会舆论、明确法律保障及高校常态化急救教育的环境下，大学生呈现出强烈的施救意愿；在培训层面，培训内容、方式会影响急救教育成效，进而影响大学生施救意愿。兼顾理论与实践的培训内容、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会增强大学生施救能力及意愿，促使其做出正确施救行为。

三、提升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的多维路径

（一）构建“必修 + 选修 + 认证”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急救教育的核心载体，需要高校通过顶层设计，构建“必修课程普及基础知识 + 选修课程深化专业能力 + 认证体系检验培训效果”的急救课程体系，实现急救教育的全面覆盖与急救能力的分层培养。首先，要推动设立面向所有大学生的急救基础必修课程，将急救知识技能纳入入学教育或公共必修课，实现全员覆盖；其次，要对各专业背景、具有学习兴趣及潜能的学生，开设系列化的“急救知识与技能”进阶选修课程，设置基础生命支持、创伤救护、突发事件应对、心理援助等模块，让学生在系统化专业教

学中掌握心肌梗死及卒中等的识别方式、火灾与地震中的医疗自救互救等能力，满足学生多元学习需求。例如，对于医学专业学生，可增设高级生命支持、产科急救等专业性强的内容，实现与职业能力的无缝对接；最后，还要建立校内认证与社会认证互通的急救技能等级认证制度，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成果证明，激发学习动力。可参考技能等级考试模式，制定初级、中级、高级救护员三个等级，鼓励学生获得认证，培育出一支有组织、专业化急救学生队伍。

（二）推行“理论 + 模拟 + 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

为了提升大学生急救能力和施救意愿，高校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以能力产出为导向，推行“理论 + 模拟 + 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实现急救教育的完整闭环。在理论教学环节，教师要灵活运用问题导向教学、情境教学或小组探究教学等多元教学方式，依托微课、慕课等线上平台，通过短视频、动画等形式，让学生学习急救知识及技能，并引入真实的校园或社会急救案例，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急救知识，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在模拟教学环节，高校要搭建急救模拟训练中心，配备智能模拟人、AED 训练机等设备，组建由临床急救专家与专业教师构成的“双师型”教学团队，让学生拥有更多实践操作的机会，引导学生将所学的急救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操作中 [4]。

（三）打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校园文化

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急救能力、施救意愿的提升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此，高校要通过多渠道的宣传与活动，营造积极的急救文化氛围，让大学生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打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校园文化。一方面，高校要在教室、宿舍、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张贴急救流程图示，张贴校园 AED 位置地图，并利用校园广播、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传递急救重要性理念，定期推送急救知识科普、成功施救案例报道，使急救文化深深植根于校园文化土壤；另一方面，高校要定期举办校园急救技能大赛、急救知识主题宣传、急救培训成果展示等活动，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急救教学氛围，形成“主动学习、互助施救”的校园风气与道德共识。

（四）完善法律支持、心理疏导与激励机制

构建健全的全链条保障机制是消除大学生施救顾虑，维持急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这就要求高校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强化法律支持，消除施救顾虑。高校应邀请法律专家开展专题讲座，结合施救免责典型案例，深入为大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好人法”等相关法律条款，让大学生明确紧急现场救助的法律豁免权，消除责任担忧，增强其施救意愿。高校也可以与地方立法机构联合起来，发布声明来鼓励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校内发生的紧急医疗事件进行施救，并为符合规定的施救行为提供相应法律援助，从制度上为学生提供支持 [5]；其次，高校要建立大学生心理疏导机制，缓解其施救压力。高校可加大心理健康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并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室，为参与实际施救的学生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支持与疏导，帮助学生正确处理焦虑、内疚等情绪，以心理调适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和抗压能力；最后，高校要将急救技能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大学生评奖评优、推荐免试研究生等挂钩，形成制度性激励，对在突发事件中成功施救或表现突出的大学生，给予公开表彰、公共服务学分，形成积极、正向引导。

四、结语

深入研究大学生急救能力与施救意愿教育现状及提升路径，不仅是当前社会公共安全建设、应对校内外突发事件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公众应急救护意识的必由之路。针对大学生急救能力及施救意愿不足现状，高校应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文化氛围、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多维度、系统性、可持续的推进路径，形成育人合力，提升安全教育成效，筑牢校园生命防线，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急救能力的新时代大学生。

参考文献

[1] 董鑫怡，李秋格，陈玉迪，等. 高校在校本科生急救知识与需求调查研究——以石河子大学为例 [J]. 农垦医学，2023,45(04):368-371.

[2] 文琴. 非医学类高校学生急救知识及技能知晓率调查研究——以铜陵学院为例 [J]. 铜陵学院学报，2024,23(01):121-124.

[3] 王宗华，杨漾. 非医学专业大学生急救知信行现状的调查研究 [J]. 西南国防医药，2020,30(02):176-178.

[4] 袁小平，臧若颖. 提升高校大学生应急救护培训效能的对策研究 [J].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01):87-91.

[5] 怡建平. 在校大学生对自救互救的认知现状与培训效果分析 [J]. 卫生职业教育，2020,38(18):126-12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齐齐哈尔医学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急救能力现状与施救意愿调查研究”（QYSKL2023-05QN）。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医学院）

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促进教育家精神培育的有效路径研究

唐　娜

摘要：推动教育家精神在高职院校的实质化落地，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实现宏大精神叙事与微观育人实践的有效对接。本文通过构建“价值具象化、行为情境化、关系教育化”三重逻辑转化机制，通过搭建靶向性实践平台、构建系统性长效机制两个层面探讨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创新，有效促进高职院校全体教师领悟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提升班集体育人效能，为教育家精神从理念倡导走向师生共同体的日常实践与内生生长，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框架。

关键词：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教育家精神；培育路径

一、引言

大力弘扬与践行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赋予教师队伍建设的崇高使命与价值引领。这一精神体系以其“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等六大核心内涵，勾勒出新时代“大先生”的理想群像。但在高职教育的具体语境及实际场域中，这一崇高而相对抽象的精神理念如何能真正转化为驱动每日教学、管理、互动行为的“实践逻辑”至关重要。班集体作为高职院校组织架构的终端、师生交往的枢纽，恰恰因其规模的最小性、场景的真实性与互动的密集性，成为这一转化最具潜力的关键性实践场域。但当前实践中的高校班集体建设主要关注班集体实然层面的含义，并表现出管理主义的趋向，班集体建设往往被等同于班级管理[1]，其固有的育人共同体属性未能彰显。而优秀的班集体能够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学生积极进取、全面发展[2]。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对于高职院校学生的作用更加重要，也更能彰显出教育家精神在班集体建设中的实际引领作用。

二、教育家精神融入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的三重转化机制探讨

让班集体这一日常场域成为教育家精神可感知、可践行、可生长的实践土壤，构建从口号到实操的可行性路径，核心是让教育家精神在班集体场域中“活”起来，实现从宏大理念到微观实践的“软着陆”。

（一）价值目标的具体化：从宏大叙事到班级使命的转化

精神落地，关键是建立意义联结。高职院校班集体是师生学习共处、沟通交流的重要场域，它不仅停留在班级这个基本组织形式层面，更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场域，是大学生知行转化的重要环境[3]。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育人质量，关键在于发挥好班集体的主阵地作用[4]。因此，高职院校通过引入真实产业问题、分析技术演进脉络等路径，引导学生在解决实务专业挑战中亲身建构个人技能与社会价值、国家需要之间的意义链条，让宏大精神价值与学生职业发展、班级建设深度联结。

（二）行为示范的情境化：从道德律令到日常言行的嵌入

精神的感召力源于具体情境中的以身作则。教育家精神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等内涵主要嵌入班集体建设的两类高频具象情境：一是专业实践情境，在实验实训、项目开发、技能竞赛中，教师以对技术标准的极致恪守、对操作流程的一丝不苟、对失败数据的坦诚剖析与系统性复盘，在细节中生动诠释“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二是人际互动情境，在学业评价、矛盾调解、团队协作中，教师以程序公正、情感共情、诚信守诺与尊重包容的言行，直接体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与“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全体教师，在班集体建设全过程中，围绕班级事务、专业学习、活动开展等具体任务，将精神内涵转化为一系列“可观察、可模

仿的示范性行为”，用教师的持续身教激活班级制度与文化，生成真正的教育权威与精神感染力。

（三）关系互动的教育化：从个体管理到共同体建构的转向

精神的滋养依赖于高质量的关系生态。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的情感表达和“胸怀天下”的格局视野，要求全体教师将班集体建设从单纯的个体管理转化为“成长支持型关系网络”的构建。这需要教师超越对群体的粗放管理和统一化模式管理，通过建立学生个性化成长档案、设计互补型合作小组、构建师生朋辈多维支持系统等方式，转向对“每一个具体学生”生命历程的深度关切，有意识地营造安全、信任、互助的集体氛围。在此生态中，教育在深度互动中自然发生，精神价值在关系体验中得以内化。

三、实践进路：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促进教师教育家精神培育的具体路径

在三重转化机制支持下，拟从实践平台搭建、长效机制构建两大维度提出针对性解决路径，以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全过程为实践载体，最终实现教师教育家精神的深度培育与师生双向赋能、共生发展的目标。

（一）搭建靶向性实践平台，破解教育家精神转化落地的现实梗阻

紧扣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核心属性，以创新班集体建设模式、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为抓手，聚焦价值传导、行为示范、关系建构三大实践痛点，为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搭建具象化、可操作的实践载体，让教育家精神在班级日常育人场景中落地生根。

1. 构建“三维协同”培育机制，打造“班级 + 专业 + 行业”融合建设模式

融合建设模式深度锚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核心优势，打破教师群体壁垒，建立“德育团队 + 专业教师 + 企业导师”三位一体的协同培育机制，将班集体建设与专业教学、实训实践、行业需求深度绑定，从根源上破解价值传导悬浮化、泛化问题。

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德育团队作为班集体建设的核心组织者，聚焦班级日常管理、思想引导与心理健康教育，主动践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精准传递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筑牢价值引领的核心防线；专业教师担任各个班的专业导师，将专业讲座、技能竞赛、职业规划指导融入班级活动，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以丰富多样的专业活动为载体引导学生自觉坚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以专业实践诠释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据班级专业特色配备企业导师，将行业规范、职业素养、岗位要求渗透到班集体建设这一微观育人阵地，让学生在专业浸润中建立“技能强国”的职业认同，实现价值引领与职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2. 打造“师生共生”建设模式，构建“教师培育—学生成长—双向反馈”闭环机制

立足新时代高职教育育人要求，将班集体从被动的“管理对象”重构为能动的“教育家精神实践转化器”与“师生成长共生体”，其核心是转变教师管理理念，在引导学生自主管理的过程中，构建“教师培育—学生成长—双向反馈”闭环机制。

首先，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班级制度制定、活动策划、日常管理，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与责任意识；同时坚守价值引领主线，对学生自主管理进行科学引导、专业指导与贴心服务，在协同管理中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班主任要科学管理班级事务，做到“一生一册”，对学生问题要形成“一事一策”，通过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将学生真正视作一个个独立的灵魂；专业课教师在专业知识传授中要摆脱任务观念，提前了解学生入学成绩、兴趣爱好等，根据生源结构常态化更新教案，做到“一班一案”；德育条线管理人员要全面掌握各班级实际情况，在奖惩评优、助学助困等工作中做到“全员 + 个例”的统筹管理。总之，以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作为教育家精神的培育场域，构建良好的师生共同体，前提就是要“看见”每一个学生个体。正如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所说的，一位教师每天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张张学生的脸，还应当是学生的心灵，应当看到他们心灵的组合方式，看到他们心灵的变化过程及变化方式[5]。其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教学条线可借助教学评价系统、德育条线可借助智慧学工系统，搭建教师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学生全面成长的双向反馈平台。教师将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与学生成长变化同步记录，及时吸纳学生的反馈意见；学生在班级生活与学习实践中感知教师的精神素养，主动提出自身发展需求与建设建议，形成闭环式互动机制，让班级成为稳定的精神与文化共同体，为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提供深厚的关系土壤。

（二）构建系统性长效机制，夯实教育家精神培育的制度支撑

教师在班集体建设中所进行的复杂的、创造性的“隐性育人劳动”，存在激励机制缺位的现实困难，应立足内生动力，从能力提升、教研赋能、评价保障三个维度，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系统化的长效机制，为教师持续践行、深度涵养教育家精神提供坚实的能力支撑、资源保障与动力支持，确保实践平台长效运转、教育家精神培育常态推进。

1. 开展针对性分层分类培训，提升教师教育家精神培育的实践能力

结合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结构与实际育人需求，构

建分层分类、线上线下融合的培训体系，重点提升教师将教育家精神六大核心内涵融入班集体建设的实操能力，破解教师培育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开展模块化培训，围绕教育家精神六大核心内涵解读、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创新方法、工匠精神培育路径等核心模块展开，确保培训内容与育人实践高度契合。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专业教师授课任务重的现实困难，培训形式采用“线上＋线下”形式实现多元高效。线下以案例分析交流、实践演练展示为主，线上培训侧重针对性，注重将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相结合，让教师在掌握班集体建设方法的同时注重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转化。同时将教师教育家精神培育与班集体建设纳入学生工作常态化管理任务，推动培育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形成“以班育人、以育促师、师生共进”的长效格局。

2. 搭建常态化教研交流平台，促进教师教育家精神素养的迭代提升

以教研室、班级为基本单元，搭建多维度、常态化的教研交流与互助平台，推动教师在交流研讨、反思总结中深化对教育家精神的践行，实现全体教师精神素养与育人能力的共同提升。定期开展专题教研活动，围绕“班集体建设中教育家精神的转化实践”“价值具象化的班级活动设计”等核心主题开展交流研讨，让教师分享班集体建设的实践经验、破解育人过程中的共性难题。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反思，群策群力形成班主任手册活页式管理范本，通过提炼推动实践经验向理论成果转化，形成“实践—反思—提升”的闭环。同时，注重搭建教师互助成长平台，建立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的结对帮扶机制，由骨干教师指导青年教师参与班集体建设，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提升育人能力，实现全体教师的协同成长、共同进步。

3. 完善全方位激励保障机制，彰显教师教育家精神的榜样示范作用

立足高职院校教师评价与资源配置实际，构建“激励＋保障＋示范”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充分认可教师在班集体建设中的“隐性育人劳动”，破解制度激励缺位化问题，激发全体教师参与班集体建设、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内生动力。完善多元激励机制，将教师参与班集体建设、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表现，全面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绩效工资分配的核心指标，对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与政策倾斜，树立“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绩优酬厚”的鲜明导向；健全坚实保障机制，加大对班集体建设的经费投入与资源支持，为班级特色活动开展、班级文化建设、教师培训研修提供充足保障；科学调配教师工作任务，合理减轻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班集体建设与教育家精神培育；关注教师身心健康，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机制，从而为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营造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

进一步注重强化榜样示范机制，打破班集体建设荣誉仅归班主任的固有格局，将班集体建设成效纳入德育团队、专业教师、企业导师的集体评价体系，从专业引领、价值传导、实践赋能等多维度开展评比，挖掘一批践行教育家精神、班集体建设成效显著的教师榜样与团队典型，通过典型宣传、经验推广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体教师主动投身教育家精神培育与班集体建设实践，形成“人人践行教育家精神、个个参与班集体建设”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其本质是一场“育人范式的微观革命”。通过价值具象化、行为情境化、关系教育化这三重转化机制，对高职院校班集体这一育人基本单元进行“基因重组”，使其从被动的、工具性的管理空间，蜕变为主动的、生成性的“教育家精神实践转化器”与“师生成长的共生体”。通过搭建靶向性实践平台、构建系统性长效机制两个层面创新班集体建设，有效厚植高职院校全体教师教育家精神的深度涵养，提升班集体育人效能，最终实现教育家精神的育人价值与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教育家精神从理念倡导走向职业教育一线的日常实践，成为师生共同体的内生力量。

参考文献

[1] 徐明波，王明. 高校班集体建设的困境及其化解——基于个体化理论的视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21):3-8.

[2] 石敬敏，毛广. 高校“达标·竞标”双核型先进班级评选制度探微 [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2,14(06):94-97.

[3] 曹斯. 基于班级视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6):134-137.

[4] 张飒. 高校“五位一体”班集体建设与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沈阳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2017 级生物科学 2 班为例 [J].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4(05):19-23.

[5] 魏书生. 班主任工作漫谈 [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20:33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的创新与实践”（2025SJSZ0453）。

（作者单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高等数学建模应用创新路径探析

彭　昂

摘要：本文探寻高等数学建模在公益场景的实践创新方向，剖析公益资源属性与建模契合机理，聚焦既有供需匹配失衡、动态适配欠缺、数据联动短板与精准度不足等问题。明确多目标规划优化、机器学习整合、动态调度搭建、效益量化研判四项创新维度；辅以协同研发、分层适配、四维研判、基层落地的实施举措；研究依托数据驱动纾解公益资源配置困境，为资源分配公平性、精准性与效益性提供学理支撑，推动公益事业品质提升与效能释放。

关键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高等数学建模；公益场景；创新路径；精准配置

一、引言

公益事业提质进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适配性与靶向适配度提出了更高标准，公益资源分配中供需适配偏差、效能不足、公平性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传统经验主导的配置范式已难以契合多元公益诉求。高等数学建模作为数据驱动的科学工具，在量化复杂问题、优化资源分配方面具备内在适配性，深度融入公益场景可纾解资源配置的决策困境，推动公益事业从经验驱动向科学赋能转型。本文聚焦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高等数学建模的应用革新，结合公益导向下资源配置的核心要义，剖析既有阻滞因素，探索适配公益场景的建模创新方向与落地路径，为提升公益资源利用效能、拓展服务辐射广度、筑牢分配公平维度提供学理参照与实践依托，助力公益事业高质量推进。

二、公益导向下社会资源配置与数学建模的适配基础

（一）公益类社会资源的特性与优化配置核心诉求

公益属性社会资源自带公共性与普惠特质，囊括村社基建资金、乡村人才培训物资等具象资源与社区服务、应急援助等非具象服务，辐射困难群体、乡村居民、社区群众等各类受众。不同场景需求分化明显，乡村常渴求道路硬化、饮水安全等基础保障，城市社区更偏向流动儿童关怀、适老化改造等专项支持，资源配置需以公平性为基准，精准契合不同群体的迫切诉求，追求效益最优，让有限资源惠及更多急难愁盼事项。

（二）高等数学建模适配公益资源配置的核心逻辑

高等数学建模将复杂公益需求转化为可量化指标，为资源配置提供精准分析工具，需求侧可整合数据量化不同区域的资源缺口，以数值模型标注村社缺水人口规模、社区老年人口密度等，面对资金受限、地域分散等约束搭建对应参数边界，设定公平权重、覆盖范围等优化目标，经算法运算锁定最优分配方案，破解传统配置中“物资堆积与短缺并存”“服务与需求脱节”的效率症结，推动资源流向最急需领域。

（三）公益场景下建模应用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理论维度，建模为公益资源配置搭建起从经验推演到数据驱动的科学范式，将公平、精准等抽象诉求转化为可演算的数理逻辑，弥补公益领域资源分配的理论空白。实践场域，建模提升公益项目实效，优化算法助力村社互助基金精准契合基础设施需求，依托预判模型前置部署应急物资[1]。建模的科学性可提升公益资金利用率、拓展服务辐射广度，强化公益事业的靶向性与落地效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坚实的资源支撑。

三、公益资源配置中数学建模应用的现存瓶颈

（一）公益资源需求的多元性与模型适配性矛盾

传统公益资源配置模型多以单一目标为核心导向，乡村医疗资源分配中仅侧重服务覆盖人数，忽视公平与精准的适配平衡。部分偏远村社人口分散，模型显示覆盖达标但实际医护力量匮乏、药品种类错位，人口集中村镇则出现资源闲置，难以契合不同村社“基

础医疗保障”与“特色病种救治”的多元诉求，最终造成资源分配与实际需求错位，弱势群体特殊诉求未获充分关照。

（二）传统模型对公益资源流动的动态适配不足

传统静态数学模型对公益资源动态流转属性适配性不足，在应急公益场域中短板更为凸显，暴雨突发灾害时预置物资调度策略依托灾害前区域人口基数，忽略受灾群众转移后的空间位移、物资消耗速率差异等动态变量。部分灾区道路阻断造成物资积压，新增临时安置区域却面临物资缺口，静态模型无法实时校准分配方案，难以契合应急资源“即时调度、动态补位”的诉求，影响公益救灾落地效能[2]。

（三）公益数据的碎片化与模型运算的协同短板

公益领域数据散落于政府部门、公益组织、社区机构等不同主体，无统一数据规范，在困境儿童帮扶场景中，民政部门掌握户籍信息，公益机构记录帮扶诉求，社区了解日常照料情况，数据未实现互通，建模仅能依托单一来源信息，部分数据因统计口径差异存在冲突，导致模型运算对困境儿童数量、需求类型的判断出现偏差，影响资源配置靶向精度，难以达成“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

（四）面向弱势群体的精准配置模型针对性薄弱

现有建模对弱势群体需求识别靶向性不足，适老化资源配置中仅以“老年群体”笼统界定服务范畴，未细化区分行动不便、独居、慢性病患者等不同类型老人的诉求[3]。部分社区的助老设备配置多为通用型，难以适配瘫痪老人上门护理需求，在乡村低收入群体帮扶资源配置中未兼顾地域特质，将适配平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导入山地村社，致使资源实效受限，精准适配成效不足，未能切实回应弱势群体的急难愁盼。

四、公益场景下数字建模的应用创新方向

（一）多目标规划视角下公益资源分配模型优化

针对公益资源需求多元性与模型适配性的症结，可搭建整合“公平权重”“效益系数”“覆盖范围”的多目标规划模型，权重动态调整平衡多维度诉求。模型设计环节公平权重可参照区域经济差异、弱势群体密度界定，西部脱贫县乡村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权重，高于东部县域配置标准，效益系数参照资源使用效率核算，村小营养午餐项目按“受益儿童数量 / 资金投入”量化，覆盖范围依托地理空间分析明确服务半径阈值，该方式被运用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县域公益资金分配。模型融入基金会项目审批流程，基层工作人员简易录入村社数据便能输出方案，受益村社反馈显示偏远村社医疗设备可及性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步提升，让困境儿童、独居老人等群体优先受益，凸显公益分配的公平底色。

（二）融合公益数据特征的机器学习建模方法创新

针对公益数据零散化问题，可借助机器学习算法搭建“数据整合—需求预测—资源匹配”一体化模块，强化模型适配效能，以联邦学习技术实现公益数据“可用不可见”，在保护受益群体隐私的同时，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前提下促成民政、社区、公益机构的数据特征协同，运用随机森林算法开展需求预判，依托历史帮扶数据、区域人口结构预判困境儿童数量与帮扶类型，以神经网络模型实现资源精准对接，使捐赠物资与需求点高效契合。腾讯公益平台应用该模式，在2024 年“99 公益日”期间整合全国多省困境儿童数据，资源匹配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规避“物资错配”问题，助学礼包、医疗援助等资源精准送达目标群体，健全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三）应急公益资源调度的动态响应模型构建

针对传统静态模型动态适配短板，融合微分方程与动态规划理论搭建即时响应突发公益事件的调度模型，动态规划算法依据灾区即时情况校准物资运输路线，微分方程构建物资消耗速率方程，结合受灾人口数量、灾害持续时间、物资消耗强度刻画物资需求变化，动态规划算法规划多阶段调度路径，即时融入道路通行状况、临时安置点增减等变量，校准运输路线与物资补给频率。2023 年京津冀洪灾期间，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地方公益组织应用该模型，即时抓取灾区交通数据、安置点人数变化，将微分方程计算的“每24 小时物资消耗增量”作为调度参照，规划出最优运输路径，受灾群众需求响应效率提升，临时安置点物资短缺问题有效纾解，彰显应急公益的时效性与温度。

（四）公益项目效益评估的量化建模体系创新

针对公益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可构建涵盖“社会效益 + 受益群体满意度 + 资源利用效率”的三维量化评估框架，为策略校准提供支撑。社会效益依托可量化指标测算，生态公益项目的植被覆盖面积、教育帮扶项目的升学率提升幅度均属于核心维度，受益群体满意度通过分层抽样调查实施，搭配李克特五级量表转化为数值分值，资源利用效率以“项目产出 / 资源投入”核算，养老服务项目的“服务老人人次 / 资金投入”为典型核算方式。蚂蚁森林“乡村生态修复项目”运用该评估框架，通过入户走访采集村民反馈，评估数据表明项目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乡村增收，依托该模型校准资源投入导向，更多资金向西北干旱地区倾斜，生态公益与民生改善相得益彰，为公益资源后续优化提供学理支撑。

五、公益资源配置建模创新的实践落地路径

（一）公益组织与科研团队的建模协同研发机制

搭建“公益组织提需求 + 科研团队建模型 + 基层

实践验效果”的协同模式，厘清三方权责与协作流程，公益组织深入基层摸排乡村养老资源配置需求，走访村社收集老人数量、健康状况及现有服务缺口等一手信息，梳理“覆盖独居老人”“降低服务成本”等核心诉求，科研团队把相关诉求转化为模型参数，将“独居老人占比”“服务半径”等指标嵌入建模框架，开发适配乡村场景的资源分配工具。在基层实践环节遵循“需求调研1个月、模型开发2个月、试点验证1个月”的时间规划推进，双方在试点村社试运行该工具，指定对接专员汇总服务人员反馈与老人满意度情况，针对模型中“服务频次计算偏差”等问题实时校准参数，保障模型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实践落地性，有效解决实际公益问题，规避“理论可行、实践难用”的脱节现象[4]。

（二）分层分类的公益场景建模适配方案

针对各类公益场景拟定场景适配型建模路径，保障模型与场景诉求高度适配。公益资金分配领域聚焦搭建多维度权重适配体系，按项目属性划分差异化优先级，为重症儿童医疗救助项目配置更高资金倾斜比例。乡村公益服务结合区域特质调整模型因子，山地村社重点嵌入“交通可达性”指标，平原村社侧重“服务辐射范畴”，规避单一模型漠视区域异质性。应急公益帮扶领域重点构建动态数据交互模块，联动气象预警、交通管控、安置点变动等即时数据，使模型可依据突发状况自主适配物资调配优先级，在暴雨灾情中向交通未阻断的安置点优先拨付物资，各场景建模路径均精准贴合核心诉求，推动资源向最急需领域定向流动。

（三）建模应用效果的公益价值量化评估标准

确立公平性、精准性、效益性、可持续性四维评估框架，全面测评建模在公益领域的实际价值。公平性维度侧重资源触达弱势群体的占比，核查资源是否向困境儿童、残障人士等重点对象倾斜；精准性维度依托需求契合度核验，确认助学物资与受助学生年级及学习诉求的适配程度；效益性维度聚焦资源利用效能，研判资源闲置与浪费现象是否缓解，保障公益资金投向核心服务而非行政开支。具体可通过建立透明化的资源使用机制，明确资源支出的标准与流向，确保资源优先用于核心服务（如公益帮扶、项目执行）而非行政成本；同时强化资源统筹管理，避免重复投入或闲置浪费，例如对公益物资、设备等实行归口管理，通过动态监测使用情况减少闲置，让有限资源最大化发挥效用[5]。一方面推动建立多元资源供给机制，如引导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捐赠，构建资源投入分担体系；另一方面可将资源利用效率评估结果与资源获取挂钩，以高效的资源使用成效提升社会公信力，进一步吸引更多社会捐赠与合作资源，形成“效率提升—资源集聚”的良性循环。可持续性维度聚焦模型长效适配能力，研判模型能否随政策动态、诉求更新开展指标校准，在人口老龄化态势下及时嵌入“失能老人数量增长”等新增因子，以四维标准全域校准建模应用的公益价值，规避单一指标引发的评估偏失，支撑公益事业稳健发展。

（四）基层公益实践中建模工具的推广与适配调整

以操作简化、培训强化、反馈机制构建三维路径助力建模工具在基层落地，切实服务一线公益实践。在操作简化层面开发轻量化适配工具，整合需求录入、参数调校、结果输出等功能模块，将复杂算法封装为可视化交互界面，基层工作人员仅需填报村社人口、资源存量等基础信息即可自动生成分配方案，无需具备专业建模素养；培训实施采用“线上微课+线下实操工作坊”组合形式，结合本地高频公益场景现场演示帮扶资源分配建议生成流程，针对性解答数据录入纠错等实操疑问。动态反馈机制通过工具内置意见提交端口与明确响应时效保障，基层人员可实时反馈模型测算的帮扶名额与实际诉求偏差等问题，后台定期归集反馈信息校准模型指标，每季度组织线上经验交流会分享不同地区的实操案例，助力基层人员更好地适配本地场景，提升工具应用效能。

六、结语

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与高等数学建模的深度耦合是公益事业科学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应锚定公益资源公共属性与普惠特质，梳理建模与公益资源配置的适配逻辑，剖析需求适配、动态响应、数据协同及精准适配等现存梗阻。构建多目标规划、机器学习融合、动态调度、效益量化评估四大创新维度，提出协同研发、分层适配、四维评估、基层推广的落地路径，后续仍需强化建模工具的公益场景适配能力，促进科研与实践深度联动，让数字建模更好地服务公益资源公平分配与高效运转，为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赋予持久科学动能。

参考文献

[1] 聂冬冬，陈进华．数学建模在高校数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J]. 科技风，2025(18):113-115.

[2] 冯洁．“建模+应用”双驱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J]. 时代青年，2025(18):72-74.

[3] 郑秀亮，李清，刘晓洁．数学建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原则与实施策略探析 [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02):107-109,117.

[4] 董新海．数学建模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 大学，2023(25):55-58.

[5] 杨娅．关于高等数学建模思维的经济学应用分析 [J]. 科技经济市场，2023(07):41-43.

（作者系菏泽职业学院副教授）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创新研究

蒋晓燕　韩滢滢　蒋晓斌　王　玥　詹　彬

摘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医学高层次人才作为医院医疗技术和学科发展的核心力量，直接影响着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医学高层次人才思想动态呈现三大特征：注重科研能力的提升；重视继续教育；注重职业发展。基于此，提出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五项路径策略：搭建科研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创新能力；设立竞争性激励机制，激发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潜能；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增强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持续创新能力；设置创新保护机制，健全医学高层次人才的保障体系；强化医院发展共同体理念，提升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归属感。以期为新时代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高层次医学人才；人才培养；发展共同体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对大国竞争的影响进一步增强[1]。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而经济发展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都与人才培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2]。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医学高层次人才作为医院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提高的主体，直接影响医院高质量发展[3]。因此，强化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不仅能增强他们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还能提升公立医院的综合实力，进而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一、提升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紧迫性

在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公立医院要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科技革命要求加强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

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关键时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科技的发展[4]，对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模式、医疗技术水平和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医学技术要求医学高层次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临床能力，还需掌握跨学科知识与技术创新应用能力。为了适应科技变革的挑战，必须加强对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二）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公立医院的发展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这就需要提高公立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聚焦医疗质量与科技创新，而医学高层次人才正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呼唤加强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不仅要关注疾病治疗，更要注重预防、康复与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这对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医疗服务的精准性与高效性，更强调医学人才的专业素养与综合服务能力。因此，公立医院必须加快培养具备高超医术、深厚人文关怀和创新能力的医学高层次人才，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需求。

二、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我国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作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研究调查问卷》，采用文献研究与现场问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于 2023 年 8—10 月对江苏省内苏南、苏中、苏北有代表性的几家地市级公立医院的高层次医学人才发放了问卷，调查了解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态度倾向，并进行分析。本文中的医学高层次人才调查

对象为地市级公立医院中从事临床、教学、科研等一线工作，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

调查问卷发出 160 份，全部有效回收，回收率为 100%。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收集、整理，用关键因素综合排序法归类，发现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思想动态呈现出三大特征：

（一）医学高层次人才注重科研能力的提升

调查数据显示，78.75% 的受访者认为科研方面需要政府和用人单位的科研项目资助，74.38% 的受访者认为要制定专项科研倾斜政策，69.38% 的受访者认为科研方面应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施，68.75% 的受访者认为需要政府或用人单位的重点人才培养计划。可见医学高层次人才对科研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视，科研场所和设施是科研工作的基础保障，而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则为人才成长提供重要支撑。这反映出当前医学高层次人才对科研环境优化的迫切期待，也揭示了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完善科研体系为突破口。只有强化顶层设计，整合资源优势，才能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卫生健康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二）医学高层次人才重视继续教育

调查数据显示，在培训方面，68.13% 的受访者选择单位支持的继续教育学习，66.25% 的受访者认为要引导建立政府培训、行业培训、企业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体系，57.5% 的受访者认为要给予一定数量的培训资助，57.5% 的受访者认为要实现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国内培训与国外培训的有机结合。其中，67.5% 的受访者指出工作繁忙是妨碍医学高层次人才国内外进修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医学高层次人才已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更加注重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医学知识迭代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唯有不断学习，才能紧跟学科前沿，提升临床与科研水平。

此外，受访者还建议建立系统化、个性化的培训机制，根据个人发展方向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从而全面提高医学高层次人才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竞争力。然而，调研也发现部分医学高层次人才因工作与培训时间安排之间存在冲突，难以抽出时间参与系统培训，导致知识更新滞后，影响了个人成长与单位整体实力的提升。

（三）医学高层次人才注重职业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在职称评定方面，80% 的受访者认为要制定合理的职称评定标准，66.25% 的受访者认为要增强职称评定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激发医学高层次人才创新最有效的手段方面，68.75% 的受访者选择晋升，56.88% 的受访者选择提供培训机会。由此可见，受访者对于职称评定的合理性、公正性与科学性的重视程度较高，这说明大家普遍认为职称晋升是衡量个人职业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认可其专业能力的核心体现。受访者在激发医学高层次人才创新最有效的手段方面选择晋升和培训的居多，则反映出医学高层次人才希望通过晋升和系统培训实现自我价值与专业突破，体现出对于职业发展通道有清晰的规划。

三、优化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策略

（一）搭建科研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创新能力

科研工作是推动医院开发新技术、新项目，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的必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医学高层次人才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当前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医院更需注重培养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通过搭建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完善学术交流机制，为医学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的科研环境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支持。

医院对积极参与科研工作的青年医学人才进行科研辅导，可通过科研查房等形式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指导。同时，鼓励青年医学人才积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借助重大项目的申报过程，培养其创新研究能力。对于医学高层次人才获批的重点重大研究项目，医院将匹配专项科研基金，确保专款专用，并在人力、财力、设备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对重点重大研究项目进行定期检查与评估，推动研究进度和研究质量，同时及时解决科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对医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确保科研成果的高效产出与转化，从而激发他们的科研热情与创造力。

（二）设立竞争性激励机制，激发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潜能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教授在对员工激励的研究中发现，按时计酬的分配制度仅能使员工发挥 20%~30% 的能力，而若充分激励员工的内在动机，员工的能力可提升至 80%~90%。因此，公立医院管理者需要从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内在需求着手，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医学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 建立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考核激励机制

医院应设定明确的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选拔标准，对入选培养计划的医学高层次人才，明确其在培养期内需完成的临床及科研创新任务，并提供必要的研究资金及科研平台支持。同时，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进行中期与终期评估，并设立中期末位淘汰机制。中期淘汰者将退出计划，合格及以上者则继续培养。终期考核将进行奖惩，优秀者将给予奖励，如可优先推荐省级以上的人才项目申报、优先安排出国研修等。使医院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格局，以增强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危机意识与进取精神。

2. 创建医学高层次人才多元化晋升通道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关

键激励需求在于尊重和自我实现[5]。医院可以从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设计切合其本人实际情况的职业发展路径，构建临床、科研、教学多维度、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满足不同人才的成长需求。比如，为临床型高层次人才设立主任医师、临床督导、临床首席专家等临床晋升通道，为科研型高层次人才设立研究员、研究督导、研究首席专家等教学晋升通道，为教学高层次人才提供教授、教学督导、教学首席专家等教学晋升通道。对于有志从事管理岗位发展的医学高层次人才，可以提拔到医院的行政管理岗位任职，参与医院战略决策与运营管理，实现从专业人才向复合型管理人才的转型。通过多通道晋升体系，医院为医学高层次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让医学高层次人才在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专长，实现个人进步与医院发展的同频共振。

（三）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增强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持续创新能力

当前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医院需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继续教育体系，支持医学高层次人才持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医院每年让各专科制定科室医学高层次人才研修规划，对研修人员和研修专业方向要有科室的细化方案，医院根据科室的规划每年择优选送医学高层次人才到国内、外专业领域顶尖的医院研修，对研修的医学高层次人才给予一定的研修补贴：研修期间发放 60% 的补贴，待研修回院工作后，进行期末考核，考核合格发放另外的 40% 补贴。医院给学成归来的优秀医学高层次人才提供一定的科研平台，促进其将所学先进技术与理念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与科研创新，进一步推动医院整体技术水平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

医院支持医学高层次人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也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院开展专题讲座、学术交流与技术指导。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医院构建起开放共享的学习平台，促进医学高层次人才拓宽国际视野，紧跟学科前沿动态，持续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四）设置创新保护机制，健全医学高层次人才的保障体系

发明创新的工作任务往往伴随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显著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医学高层次人才在医学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样面临这一挑战。因此，医院及卫生行政部门亟须为从事临床技术研究或基础医学研究的医学高层次人才构建完善的保护机制。

医院应高度重视风险管理，相关科室部门需协同医学技术创新团队，共同进行风险预测、识别、评估及控制，并采取有效措施以降低风险。对于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应及时分析，必要时由医院多部门协调支持，协助团队迅速应对和化解风险。同时，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对因探索性研究导致的非主观性失误给予理解与包容，避免因失败而挫伤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医院要保障高层次人才在创新探索中的合法权益，医院应依法依规保护其知识产权与技术成果，建立知识产权申报与管理绿色通道，协助高层次人才及时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通过这些举措，让医学高层次人才在创新实践中深刻感受到医院的关心与支持，从而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创新事业。

（五）强化医院发展共同体理念，提升医学高层次人才的归属感

医学创新与人类生命健康紧密相关，医学高层次人才所具备的高尚道德品质，是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医院要强化“医院发展共同体”的理念，营造尊重人才、关爱人才的良好环境，以增强医学高层次人才对医院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实现个人价值离不开团队、专科和医院的支持；同时，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能推动学科的进步和医院综合实力的提升。医学高层次人才应深切地体会到，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学科的内涵建设和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的。

医院从人文关怀角度，对医学高层次人才的生活和家庭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切实解决其后顾之忧。比如，提供优质的子女教育资源、便捷的医疗服务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投身到工作中，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医院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通过构建医学高层次人才与医院发展目标共谋、发展过程共力、发展成果共享、发展责任共担的整体氛围，从而有力促进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本文对参加调研的 160 名地市级公立医院的医学高层次人才态度倾向进行分析，探索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的策略。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结合医学高层次人才的职业倦怠、合理流动意愿等现实问题，探讨医学高层次人才发展与组织支持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进一步探析医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因与外部环境影响，研究制定保持公立医院医学高层次人才队伍稳定性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 孙锐 .“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布局高质量发展人才工作新体系 [J]. 中国人才 ,2021(03):19-21.

[2]高质量发展.[EB/OL].(2017-10-18)[2025-12-31]. https://baike.so.com/doc/27274318-28672359.html.

[3]沙静华,缪琪,沈燕,等.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下医院人才培养路径的研究[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3,14(03):70-74.

[4] 王涵 , 李雪云 , 江小华 . 新科技革命（下转 261 页）

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育人模式实践探索

刘佳婧

摘要：随着时代的飞速变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高职院校学生因为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行为失常愈发严重，心理危机事件日渐增多。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单位，特别是各个二级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和模式也应随之调整。本文以陕西工商职业学院二级学院探索出的“12562”心理健康辅导站育人模式为例，从辅导站的构建、运行机制、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提出创新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育人模式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育人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二级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普遍以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为主要依托，在其要求和指导下组织开展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动态信息、协助提供学生心理咨询服务等。为促进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的目标，二级学院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也应发挥相应的价值和力量。

一、高职院校建立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的意义

（一）国家有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提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积极推进在院（系）设立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室[1]，充分发挥二级学院（系）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主体作用，积极开展符合本院系学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2]195。

（二）学生有需求

多项研究表明，当今大学生心理健康帮扶的现实需求日趋迫切，而高校现有单一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存在与学生群体联结脱节、覆盖范围不全面且实施深度不足的诸多问题，工作开展多偏重事后干预与问题处置，缺乏系统性的事前疏导和预防性建设，整体工作呈现被动应对、滞后推进的特征，这也使得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推进实效与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帮扶需求之间的矛盾持续凸显。

（三）工作有需要

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辅导站的建设既是响应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现实工作中，心理辅导站相对于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直接面对学生，更便于学生接受，更容易发现问题，具备现实优势[2]195。

二、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健康辅导站的运行与服务模式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指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基本观点、基本理念和基本研究方法，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育人功能，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的工作范式。

学院在校生规模较大，且贫困生占比偏高、就业竞争压力突出、学生学习内驱力匮乏、人际联结不足等多重现实诱因，易引发学生心理危机，心理健康教

（上接 260 页）

背景下欧洲发达国家国际人才政策比较与启示 [J]. 世界教育信息 ,2025,38(07):32-42.

[5] 王新江 . 扬州市高层次人才激励与评价机制研究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07):11-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江苏省人才人事课题“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研究”（2023-SRC-027）。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育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与较大压力。二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以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心理素质提升为核心定位，依托学校心理网格化管理体系、心理辅导工作站及“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平台，尝试探索“12562”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1”即一套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服务体系；“2”即两大心理健康教育目标；“5”即五个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内容；“6”即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实的六条途径；“2”即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两项考评机制，形成“齐心共育，守护未来”的工作思路，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心从事后干预向日常预防转型，在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素质培育、聚焦学生成长实施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服务体系。建立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任课教师、二级学院心理辅导站专职教师、辅导员、学生干部、宿舍长“六级”管理服务体系，修订《二级心理咨询站工作职责》，通过各个环节的不同职责功能，发挥预警防控、引导教育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关心关怀、支持帮助每一名学生。

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充分整合心理教师、辅导员及学生骨干的专业力量与组织优势，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着力实现优化学生心理品质、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核心目标。深度发挥学院管理服务体系的协同效能，以心理普查、专项排查、实证调研等科学手段为支撑，严格落实心理危机“早发现、早预防、早报告、早干预”的工作机制，进而达成防患于未然、显著提升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效的教育目标。

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内容。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发展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大一学生心理困扰主要集中于新生活适应、自我管理能力建构等方面；大二学生则面临人际交往调适、学业发展规划、情感认知疏导、自我价值实现等多重问题；大三学生的心理压力核心聚焦于择业选择困惑与就业竞争压力。此外，部分特殊群体学生还存在个性化心理诉求。基于上述阶段性特征与差异化需求，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内容确立为以下五大维度。其一，学业发展指导。结合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强化实践操作能力，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其二，人际交往指导。帮助学生厘清各类人际关系的本质属性，培育主动交往意识与沟通协作技能，掌握人际关系处理技巧与基本原则。其三，自我认同教育。注重对学生的正向激励与优势挖掘，引导学生主动展现自我价值，增强自我认同感与自信心。其四，情绪管理教育。指导学生掌握情绪表达与调控，学会对消极情绪进行有效疏导、合理调节与健康宣泄。其五，就业指导。如邀请企业代表做宣讲；定期组织召开就业情况沟通会了解学生综合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指导意见；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职业生涯大赛，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突破，不断提升学生技能和自信心。

探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途径。其一，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充分凸显课堂教学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主渠道功能，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基础理论与实用知识，培育学生心理问题的认知能力与自主解决能力。其二，以多元化校园文化活动为重要载体，系统提升学生心理素质。通过举办心理主题班会、专题学术讲座、心理征文、心理短剧展演等形式，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着力提升学生自我教育、自主成长的核心素养[3]。其三，完善心理辅导服务机制，助力学生化解心理困惑。心理辅导站依托学生心理档案建档工作与心理异常学生动态报表制度，精准掌握学生心理发展动态，面对不同学生群体持续开展心理团体辅导和特色活动。其四，开展心理危机预防工作。每届新生入学报到后，学工群体及时关注学生信息，将其“综合画像”印刻在脑海中，并筛选出存在身心问题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有针对性地预防心理危机事件。其五，充分发挥“六级”管理服务体系的协同效能，精准捕捉班级、宿舍层面学生的心理动态变化，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发展跟踪台账，同时深化家校协同育人机制，与学生家长保持常态化密切沟通，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力。针对单亲家庭学生、经济困难学生、有心理疾病史等特殊群体学生，实施重点关注与精准帮扶，完善心理咨询服务供给，做好专业转介的前期筹备工作。其六，立足实际开展专项调研。通过科学调研方法系统排查学生面临的心理困扰与突出问题，精准把握学生群体的心理发展特征，将调研形成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数据转化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指导依据，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健全考评机制。一是依据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将心理排查、心理访谈、心理疏导等记录作为专职心理辅导教师和辅导员日常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与年终考核相结合；二是构建针对学生干部、心理委员及宿舍信息员的专项考核评价机制。考核内容涵盖参与心理健康专题培训、学术讲座的成效，以及心理相关工作推进、各类主题活动与竞赛组织实施的实绩；考核结果将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作为量化考评的重要依据，以强化相关学生骨干的责任意识与工作实效[4]。

三、目前工作实践的成效与思考

（一）实践成效

工作体系方面。二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以预防高职学生心理危机和提升心理素质为目标，通过各项举措尽可能地实现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学生全覆盖，学工队伍共同参与，营造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环境，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育人效果。

体制机制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普查

制度，结合心理测评结果，为入校的每一位新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落实常态化心理监测机制，通过每周自查、月度排查等方式，及时把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对筛查中发现需求的学生进行定期回访与动态跟踪。二是构建“个人—学院—家庭”协同联动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强化多级联动与资源整合。系统推进心理危机预防培训体系建设，面向全院学生开展常态化、多样化的心理健康专题教育与生命教育，提升心理韧性，强化风险预防意识。如定期对不同层面的学生开展“月月团辅”“525心理嘉年华”“最美心灵摄影”“经典观影”等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旨在增强学生自主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与能力。三是系统开展面向辅导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专项培训，以增强其在心理危机预防、识别与早期干预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实务能力。

平台载体拓展方面。考虑到当代大学生习惯性使用电子化产品和网络的特点，结合部分内向学生和有其他顾虑等心理因素，特别开设线上心理咨询服务，安排心理工作专职教师辅导，将团体辅导与个体咨询结合，当面咨询与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结合，多方位服务学生。

重点难点突破方面。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通过心理测评系统筛查问题学生，第一时间告知家长，提出合理建议，做好沟通记录，及时反馈近况，根据学生发展情况做好家校衔接，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纾解学生困惑，构建家校联动的和谐环境[5]。

育人品牌创建方面。利用学院专业优势，借助信息化手段，对学生综合信息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化分析，结合问卷调查分析结果，为心理健康育人工作提供科学化辅助，提高管理效率和科学化管理水平，创建学院心理教育工作育人品牌。

（二）存在的不足

一是运行机制。现多聚焦“校—院”二级管理体系下的协同机制，但实践层面仍存在权责划分不清、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二是服务模式。管理服务体系的创新层面仍待加强，如在传统心理咨询、开展活动和讲座为主的基础上，能否考虑朋辈辅导、课程融合等其他创新形式。三是技术应用。近3年出现数字化转型研究，涉及大数据预警、VR心理训练等方向，但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缺乏可复制的实践案例，如何利用专业优势，借助信息化手段，将已有技术与实践相结合，进行多维度数据化管理分析，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管理效率和科学化管理水平，创建育人品牌，也将是后期努力方向。

（三）改进工作的思考建议

1. 建立全员育人队伍

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辅导员—其他管理服务人员”全员育人队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与各二级学院实施结对的方式，“一对一”或“多对一”定期深入不同学院，与二级工作站紧密联系，根据不同学院专业特点共同商议个性化心理健康育人服务方案。同时，制定适宜二级工作站的更加细致的工作职责和制度，发挥二级工作站的主观能动性和育人一线功能，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前瞻性，在出现问题时能及时、有针对性地解决。

2. 打造全过程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的构建与运行，应注重全周期覆盖与机制长效性，实现从入学适应到毕业离校的全过程贯通。同时要发挥朋辈支持在心理健康促进中的积极作用，如针对学生更倾向于向同伴倾诉的特点，可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牵头，通过制度建构与人员选拔，在各学院组建经过系统培训的朋辈心理互助队伍，从而形成专业的朋辈心理辅导体系，提升心理支持的及时性与可及性。

3. 开展全方位网络式育人体系

推进教育渠道多元化与育人模式协同化，一方面应融合校园文化浸润与“学校—家庭—社会”联动机制，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合力；另一方面，须积极拓展“互联网+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借助微信、抖音等平台，系统化、持续性地传播与推广心理健康知识与技能，促进教育服务的广泛覆盖与长效渗透。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日益艰巨，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学生，方能探索出高职院校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的有效途径，构建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心理服务体系，真正解决学生实际困惑，促进学生心理健康，保障校园和谐稳定，为培养“心理素质过硬、职业能力突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吕晓霞，朱璐. 心理健康教育二级工作站“12345”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学院为例[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3(04):84-86.

[2] 魏桂娟，王珊珊. 在高职院校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二级工作站的思考[J]. 科技资讯，2019,17(12):195-196.

[3] 荆玉梅.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校、院二级工作模式的创新与探索[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4,30(03):115-117.

[4] 朱璐. 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建设研究[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4(01):47-49.

[5] 王艳碧，曾艳琳，肖雨函. 高校二级学院“12352”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重庆科技学院为例[J]. 教育教学论坛，2017(24):56-5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度陕西高校学生工作精品项目（研究课题）“基于‘12562’模式的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心理辅导站育人创新研究——以信息学院为例”（2025XKT87）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新质生产力驱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路径构建研究

何　雷　于　楠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正在渗透至教育与心理健康领域。面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高发与隐蔽性增强的情境，本文提出以大数据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导向干预路径。研究主张通过多维数据分析实现心理风险的精准识别，以智能化系统构建动态干预闭环，并以学校为主体、社会与企业协同参与形成立体化心理支持网络。本文基于数据驱动理念，提出五项系统干预路径：心理状态大数据监测、差异化干预方案设计、校企协同辅导体系建设、智能预警平台开发与闭环干预机制持续优化，强调路径间的流程衔接与资源协作。研究旨在为高校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与体系化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大数据；新质生产力；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智能预警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在社会与教育领域持续受到关注。学业压力、就业竞争、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使心理危机呈现高发、隐蔽与多样化特征，风险更易出现、识别更难、类型更为复杂[1]。传统心理干预模式主要依赖线下访谈与人工判断，受主观性与时滞约束，早期识别与动态追踪常难以落地，服务覆盖与证据留存也较为有限[2]。随着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正在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治理方式发生结构性调整。数据驱动的干预体系通过对行为、学习与社交等多维数据开展分析与建模，实现心理状态的实时监测与精准预警，同时促进服务流程的智能化协作与标准化执行[3]。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心理危机干预不再仅限于个体层面的治疗与教育，而应纳入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在识别、处置与评估环节实现联动与闭合。本文从大数据与心理健康融合的角度展开讨论，梳理干预原则与路径的内在关联，旨在为构建科学、智能与系统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提供思路与可操作参考。

一、基于大数据的新质生产力驱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

（一）数据赋能原则

数据赋能是大数据驱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首要原则。高校心理健康工作长期依赖问卷测评与访谈观察，存在滞后性与覆盖面不足的问题。通过引入大数据分析，管理者能够将学生心理状态进行量化识别与趋势预测。行为数据、学习数据、社交互动与网络言论等多源信息，为早期识别提供相对客观的基础。依托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系统可以捕捉学习行为异常、消费波动与情绪倾向变化等潜在信号，并在时间窗口内动态更新心理风险指数。数据处理流程应保持口径一致与指标可追溯，便于跨学期与跨人群进行对比分析。高校同时需要强化数据安全与伦理管理，建立最小必要原则、分级访问与留痕审计机制，明确授权边界与使用场景，保证心理数据在合法与可控范围内运行[4]。该原则的核心在于以数据要素驱动决策，将经验化识别转化为可验证的智能决策流程，为心理治理提供稳定与可复用的支撑。

（二）智能协同原则

智能协同原则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整合能力。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涉及心理咨询中心、学生处、辅导员、教务与信息部门等多主体，若缺乏协同流程，信息孤岛与重复处置问题难以避免[5]。高校可以依托人工智能算法与数据平台，构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任务联动体系。系统通过标准化数据接口汇聚学生行为、学业与健康信息，自动生成心理风险分级报告，完成“感知—分析—干预”的流程衔接。当系统识别到心理异常时，平台根据风险等级分派任务：轻度风险由辅导员进行关怀与提醒，中度风险转入心理中心

持续跟进，重度风险触发校级应急机制并同步通报相关部门。联动体系应设置时限、优先级与回执状态，确保节点责任明确与处置可闭环。智能协同在数据反馈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分工方式与流程边界，形成“技术驱动、组织协作、动态响应”的综合机制，使心理干预由分散执行转为整体联动，提升治理的可控性与一致性。

（三）闭环反馈原则

闭环反馈原则强调干预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动态修正。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贯穿识别、干预、评估与再干预的循环过程，高校需要建立标准化记录与数据回流机制，对干预时效、学生反馈与后续变化进行连续跟踪。系统在对干预数据进行再学习后，可对风险识别阈值与策略参数进行校准，形成模型的自适应迭代。管理层面应设立固定评估周期，审视流程瓶颈与处置偏差，完善指标解释与操作规范，确保每一次干预均可追踪与复核。闭环反馈不仅用于危机事件的复盘，也构成治理体系自我演化的内在动力。通过“预警—干预—评估—再优化”的循环路径，学校持续提升识别精度与执行效率，使大学生心理危机治理由静态响应转向动态学习，最终形成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智能心理服务体系。

二、基于大数据的新质生产力驱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路径

（一）利用大数据监测心理，精准识别高风险学生群体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早期识别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法依据。高校可以整合校园卡消费、宿舍门禁、课堂出勤、在线学习行为与社交媒体互动等多维数据，构建较为完整的学生行为画像。系统在此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异常检测与情感识别算法，对日常行为与情绪波动进行量化评估，以基线对照、阈值设定与时间窗口分析为判定依据，识别偏离常态的变化趋势。系统在检测到大学生消费模式异常、出勤率下降或社交行为减少等组合信号时，自动触发预警流程并将对象纳入重点关注清单，同时保留可回溯的记录以支持后续人工核验与持续跟踪。

在技术层面，系统采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情绪识别模型，对社交平台与学习论坛的语言特征进行语义分析，量化负面情绪的频率与强度，并与行为数据交叉验证以降低误判率。模型侧以机器学习构建心理风险评分，依据风险指数划分为轻度波动、中度应激和重度危机三个层级，为各层级匹配相应干预路径与沟通渠道。流程由被动应对转为主动识别，强化发现的前置性与判定的准确性。该数据驱动的早期识别框架在问题未显性化前介入，降低风险扩散概率，为高校心理健康治理提供可量化证据与程序化依据。

（二）构建差异化干预方案，提高学生心理应对与调适能力

差异化干预是推进心理危机管理精细化的重要环节。高校可基于大数据分析，以学生心理特征为主，兼顾情绪模式、学习状态和社会支持网络，形成相对清晰的个体化画像，并据此制定分层干预策略，明确辅导员、心理咨询师、校医院和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对轻度困扰个体，学校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主，配合在线情绪调节训练、正念冥想和压力管理微课等自助资源，并设置自评与复测节点，观察其情绪变化和学习适应情况。对中度风险群体，心理咨询师或辅导员可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合出勤、学习参与度和行为数据制定个性化辅导方案，明确随访周期、阶段目标和转介条件。对重度危机群体，学校应启动校医院与专业心理医疗机构的联合干预程序，使院校、医院与家庭在知情同意和安全规范范围内参与处置，保证信息通达、处置连续与安全边界清晰。

差异化干预需同步推进动态评估与策略更新。高校通过干预后数据追踪，围绕行为变化率、情绪稳定度与人际交往指数等指标构建时间序列，对成效进行纵向比对，并将反馈回流模型以完成参数更新与阈值校准，实现策略自适应调整。相较统一化路径，数据驱动的分层机制更能反映个体差异，减少资源浪费与过度干预。高校以精准识别为起点，配合靶向干预与持续优化的闭环推进工作，提升学生自我调适与情绪管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可复制为基础、兼顾可评估与可持续运行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三）校企协同开展心理辅导，建立多层次干预支持体系

新质生产力强调要素重组与系统协同，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场景中，主要体现为高校、企业和社会机构之间的资源衔接与平台配合。高校可以与心理健康企业、互联网科技公司及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面向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和日常咨询等场景，建设多层次、可持续的心理辅导支持体系。首先，高校与企业共建联合心理服务平台，引入企业侧算法优化能力与数据安全方案，完成心理监测、咨询预约、风险评估等功能的技术集成，并在同一平台上保留服务记录和处置过程，便于后续跟踪。其次，高校与社会心理服务资源推进互联互通，使心理咨询中心、社区服务站与企业健康管理系统在授权范围内开展数据共享与协同会诊，逐步形成覆盖校内外的支持网络。最后，校企联合开发“AI+ 心理教育”课程体系，将虚拟现实训练、情绪测评与智能问答有序纳入教学环节，使学生在互动体验中练习情绪识别、压力调适和情境应对，增强课程教学与心理服务之间的衔接。

校企协同能够补充高校在人力与技术方面的不足，也有利于社会力量以较为规范的方式进入校园心理服

务。各方可以围绕咨询转介、风险分级、隐私保护和应急处置等环节，共同制定心理服务流程和数据接口标准，逐步形成政府指导、高校负责、企业参与的运行模式，推动心理危机干预向社会化和智能化方向延伸。该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校园内部管理边界，使校内咨询、家庭联系、社区服务和专业机构干预之间保持必要衔接。当学生出现持续情绪波动、学习适应困难或危机风险时，不同主体可以依据分级标准开展信息核验、会诊评估和后续回访，减少单一部门独立处理带来的延误。这样既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也能让大学生心理健康支持工作在不同业务环节中保持连续。

（四）开发智能心理预警平台，实时反馈学生心理状态变化

建设智能心理预警平台，是推进心理危机防控信息化的重要环节。平台以大数据分析为核心，整合学习、出勤、健康与社交等行为数据，借助算法建模对学生心理状态进行持续监测和风险预测。系统设置数据采集、风险评估与反馈响应三类核心模块。数据采集模块自动汇聚教务系统、宿舍门禁、校园应用与学习平台日志等多源信息，并按时间顺序形成可用于建模的连续数据；风险评估模块基于多维特征生成个体心理风险指数，同时输出可视化健康图谱，支持辅导员、心理教师进行纵向对比与分层查看；反馈响应模块依据风险等级，自动推送干预建议、关怀信息或心理咨询预约提醒，使风险识别后能够较快进入提醒、联系和转介等后续环节。

平台建设在可解释性与合规性上需明确边界。系统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教育部门隐私管理标准，保障学生数据在采集、分析与应用各环节的安全与匿名性，避免心理风险判断被简单标签化使用。平台保留一定的自学习能力，依托持续的数据积累与结果校验，对算法参数和预警阈值进行修正，减少误报和漏报对实际管理工作的影响。平台上线后，高校心理健康管理可以由被动检测逐步转向主动预测，学生心理状态变化也能够以图表、指数和预警记录等形式呈现。当系统发现学生在出勤、学习活跃度或情绪反馈上出现连续异常时，相关工作人员可结合实际访谈和日常观察作出判断，使心理危机干预更及时，也更便于后续追踪。

（五）持续优化干预策略流程，保障心理干预实施闭环运行

大数据驱动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具有动态调整属性，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不能只依靠一次预警或一次干预完成。高校应建立以数据回流为核心的干预优化机制，对干预全过程进行跟踪、评估与再设计。以效果评估为主，运用量化指标对干预后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纵向分析，记录咨询次数、情绪波动、学习参与度和风险等级变化等关键节点，识别干预成效与可能存在的偏差；以模型更新为辅，将真实反馈数据纳入训练样本，对参数和阈值配置进行校准，增强预测结果在不同学生群体和具体场景中的稳定性；在“决策反馈—再干预”环节，平台生成结构化干预评估报告，帮助学校判断后续资源投放和工作调整方向，同时对处于风险边缘或短期内反复波动的学生实施定向联系、持续访谈和跟踪观察，使策略能够根据实际变化及时修正。

依托上述流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由事件驱动逐步转向动态调整，干预工作也不再停留在发现问题后的单次处理。数据循环与模型迭代相结合，可以提高风险判断的精细度，也能减少工作人员在信息筛查和重复核验上的时间消耗。持续优化机制建立后，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单向响应走向动态学习，管理人员可根据评估结果修正预警规则、调整咨询资源，并对重点学生保持连续关注，使心理服务在日常运行中不断适应学生状态变化。

三、结语

大数据与新质生产力的结合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点与实践路径。依托数据驱动、智能协同与闭环反馈三项原则，心理健康治理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决策，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干预路径以监测为枢纽，配合分层干预与协同服务，并兼顾智能预警与持续优化，构成贯穿识别与处置全流程的动态体系。该体系提升了危机识别的准确性与干预的时效性，同时推动心理服务朝向智能化、系统化与社会化发展。面向未来，高校需完善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机制，强化跨部门协作与校企联动，持续深化技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以新质生产力带动教育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程娟娟 . 大数据驱动下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策略研究 [J]. 文教资料 ,2025(09):169-172.

[2] 王丽丽 , 孙悦涵 .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对策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03):120-122.

[3] 安娜 . 高职院校心理危机干预的现状与突破路径 [J]. 山西青年 ,2024(17):114-116.

[4] 余小高 , 余骥超 . 基于个体特征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策略研究 [J]. 长江信息通信 ,2023,36(11):17-20.

[5] 梁黛婧 . 大数据驱动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校—家—社”协同机制研究 [J]. 教育观察 ,2023,12(32):7-1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陕西高校学生工作研究课题“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大数据赋能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路径研究”（2025XKT29）。

（作者：何雷，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讲师；于楠，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助教）

最优停止理论在大学生学业规划中的适用性研究

王钦正　石海英 *

摘要：帮助大学生充分利用在校时间，全面提升综合素质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研究通过将最优停止理论引入大学生学业规划，来解决“选择困难”“决策延迟”问题，从决策对象、决策目标、决策周期三个前提条件入手确定该理论在学业规划中的适用性，并以四年制本科生为例介绍最优停止理论的应用过程，同时提出应对可能性挑战的措施。在大学生学业规划的过程中，引入最优停止理论这一量化工具，可以帮助大学生高效利用时间，聚焦核心任务，提高大学生初次就业率和职业满意度，对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最优停止理论；学业规划；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

读书学习是大学生的核心职责，更是实现大学生从学生角色向职业角色顺利过渡的关键支撑。这一属性在当前就业市场竞争加剧、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愈显重要。然而，高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抬头率偏低、学习动力匮乏、学风考风异化等学习精力投入不足的问题，多年来亦未得到根本解决，“沉睡的大学生”现象依然制约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职能，向社会输送更多适配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强化学习过程管控、严把毕业出口关，推动学生主动“忙起来”，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国学者舒伯提出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指出，15~24 岁处于职业生涯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完成自我认知与职业认知的精准匹配。大学阶段正处于这个关键窗口期，大学生学业规划是为了促进学业与职业目标的有效衔接，而最优停止理论的引入，可以为大学生学业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助力其有效完成这一任务。

如今国内高等教育整体步入普及化发展时期。在校学生总量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人才培养工作的重心，也从规模拓展逐渐转向质量提升。大学生学业规划，在高校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起到衔接作用。依据教育部 2025 年相关数据，高校毕业生人数 1179 万人，在持续增长之下，就业市场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面对当下发展形势，传统依赖经验、指向模糊的学业规划模式，已经很难支撑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诉求。对科学量化类决策工具的引入，也显得尤为必要。最优停止理论本身有着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将其运用到大学生学业规划中，可以补上量化研究层面的短板，也能为高校学业指导工作开辟出新路径。

一、研究现状

最优停止理论，又称为 37% 法则，是一种用来解决序贯观察与选择问题的重要决策理论，其内在逻辑是通过精准界定最佳停止时机，整合前期观察形成的判断进行决策与行动，达成期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最终目的。37% 法则在平衡“探索充分性”与“决策时效性”的现实冲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也使得该理论与大学生学业规划的内在需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规划需综合权衡个人素质、专业发展、家庭支持、就业市场现状、行业发展前景等综合因素，才可能找到可行性方案，作出最优决策，取得理想结果。在大学生学业规划的进程中，引入 37% 法则提供量化支撑，从而加大对关键节点的管控力度，可以有效帮助大学生找准努力方向、锁定任务目标，并通过有条不紊的努力实现预期成果。

近些年，国内关于大学生学业规划的探讨逐渐成为热点，但总体上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多数时候是将学业规划作为职业生涯规划的一部分进行阐述，而对大学生学业规划的专门研究较少，在学业规划中借助量化工具帮助决策的应用性研究则更少。纪贝、钱佳玥认为系统性的职业生涯教育可以使高职学生就

业竞争力提升 28.7%，对推动高职学生精准就业具有显著作用[1]。赵倩倩依托辅导员与大学生密切接触的现实，从沟通机制、激励体系、保障措施三个维度，提出构建大学生学业生涯全周期管理模型，为大学生学业指导工作提供实操框架的观点[2]。马静从高校管理提质角度，对新入学大学生进行研究，提出建立学业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三位一体”的学业规划协同指导机制，通过多方联动保障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作用[3]。在实践探索方面，采用大类招生模式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打消新生在专业选择与生涯发展上的疑虑，开设了“本科生学业规划”课程，通过“理论授课 + 实践模拟”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学生校园生活充实度提升 42.6%，开设学业规划专门课程的经验也被不少高校学习。王巧玲、李娴通过对江苏大学 2000 余名本科生的实证调研发现，仅 35.2% 的学生形成了科学可行的学业规划，针对这一问题，她们提出了“需求诊断—方案定制—过程督导—效果评估”的闭环优化策略，该策略在试点班级应用后发现学业规划实施成功率提升至 62.8%[4]。

在最优停止理论的应用研究这一领域，近年来出现了跨学科拓展的趋势，但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基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困境，通过设定决策规则、构建数学模型、数值求解及 Monte Carlo 仿真验证等研究路径，证实最优停止理论可使毕业生就业决策的满意度提升 19.5%，对优化就业选择具有显著指导价值。有研究指出，当前大学生学业规划研究存在“定性描述多、量化支撑少”的突出问题，最优停止理论等量化工具的应用较少，导致学业指导的精准性不足。以上观点与张磊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呼应，其引入量化决策工具的学业规划指导，可使学生目标达成率提升 23.1%[5]。

从国际研究层面观察，欧美地区高校很早便把决策理论用于学生学业及职业指导相关工作，也逐步构建起体系化的量化指导模式。美国高校大多会把标准化测评工具与各类决策模型结合使用，以此为学生提供适配自身的学业规划服务，相关规划完成度与就业适配度也都处在较高水准。在学业规划实施上，日本高校习惯把生涯发展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之中。依靠不同阶段的决策节点，来帮助学生规划好自身学业安排。国内高校相关指导工作，大多还停留在定性引导层面。量化分析工具使用不多，理论和实际操作也存在隔阂，这些现状都为本文研究留出了创新与实践空间。

二、理论基础与适用性分析

（一）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支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舒伯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二是最优停止理论。舒伯的理论明确了大学生处于职业生涯探索期的定位，并且强调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通过自我认知与职业探索实现“自我—职业”的精准匹配。有研究显示，自我探索期的任务完成质量与后续职业发展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基本上是任务完成度提升 10%、职业满意度约提升 8.7%。最优停止理论可以为这一匹配任务的顺利进行提供量化决策工具，帮助解决探索阶段“选择困难”“决策延迟”等常见难题。在学业规划过程中，引入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和最优停止理论，可以实现“阶段定位”与“方法支撑”的相互促进，为大学生学业规划的科学进行提供核心理论支撑。

（二）理论适用性分析

最优停止理论的应用依托特定前提条件：一是决策对象具有可序贯观察的属性，二是决策目标具有明确的收益衡量标准，三是存在有限的决策周期[6]。大学生学业规划恰好满足上述条件——毕业去向选项可逐步探索、学业目标可量化评估、在校学习年限特定。从决策场景看，大学生学业规划具有明显的贯性特征，从前期的全面探索到渐渐锁定某一选择，这与 37% 法则“先观察后决策”的序贯逻辑十分契合。从最终目标看，学业规划注重毕业去向与个人发展的最优匹配，最优停止理论关注的是期望收益最大化，两个理论皆以“实现最优选择”为衡量标准。从约束条件看，大学学制的特定周期为 37% 法则的应用提供了清晰的时限，而毕业去向的有限选择又刚好对应最优停止理论中的“有限备选方案”这一前提。以上条件为最优停止理论在大学生学业规划中的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性。

三、应用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根基所在，本研究以四年制本科生为核心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对其他学制的大学生亦具有参考价值。强化本科生学习过程管理，需构建“学生主体—教师引导”的协同机制，既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全体教师、辅导员，尤其是班主任的指导作用，使班主任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与守护者。教师通过系统指导学生开展学业规划，可助力学生精准认知自我、动态把握社会需求、树立科学职业理想、合理规划学习与生活节奏，为顺利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换筑牢基础。

在四年周期内，班主任应主动引导学生深度思考毕业去向，通过目标分解的方式逐步细化阶段任务，激发学习内生动力，提升自主学习与自我管理能力，最终才能得偿所愿，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依据最优停止理论的 37% 法则，四年制本科生的学业规划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决策节点：第一次是在入学后 1.48 年（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到寒假期间）完成决策；第二次是在剩余 2.52 年内，于 0.93 年后（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到寒假期间）完成决策；第三次是在毕业前 1.59 年内，于 0.59 年后（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前后）完

成决策。随着决策由前及后依次推进，学业规划的内容逐步细化、聚焦，这种循序渐进的递推模式，有利于提升学业规划目标的可及性。

结合当前“考研热”的现实背景，以考研为例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班主任应从新生入学起就开始引导其开展毕业去向的思考，并建立全程跟踪督导机制。在第一决策阶段，学生需用 1.48 年时间全面探索自我与市场需求，在公招考试、军队文职、基层服务项目、企业合同就业、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留学深造、考研升学等多元选项中，结合自身特质完成考研升学的初步锁定；在第二决策阶段，利用 0.93 年时间开展精准调研，明确考研的地域偏好、院校层次、专业类别，并系统梳理备选院校的招生政策、报录比、培养方案等核心信息，形成初步备选清单；在第三决策阶段，通过 0.59 年的深度研判，最终确定目标院校、具体专业及研究方向，并制定针对性的备考计划。需要强调的是，考研目标的达成并非在第三决策阶段一蹴而就，而是入学以后持续地勤奋钻研、高效的学习方法贯穿大学生活全过程，这些是实现考研目标的重要前提。

借助最优停止理论对四年本科生涯进行关键节点管控，可有效引导大学生逐步收窄关注范围、聚焦核心任务，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求知欲望，克服浮躁功利的学习心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更能为学习目标的实现提供清晰路径。最优停止理论运用起来特别简单，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掌握。实操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实践主体，需主动开展探索，担负适时决策的职责；班主任则需扮演好引路人与监督者的角色，帮助大学生系统学习就业、创业、升学等领域的最新动态。

在最优停止理论应用于大学生学业规划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因为学生个体差异而产生的决策时限问题，不同学生的自我认知程度、信息获取能力、个人偏好等存在显著差异，统一的决策时间要求可能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二是信息获取不充分导致的决策偏差问题，在校大学生获取就业、升学、创业等信息的渠道有限，而且这些信息的完整性与时效性难以保证，可能因此增加决策风险。三是政策变动导致的学业规划目标调整，考研政策、就业创业政策等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前三年探索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可能无法及时应对大四时期的政策变动，比如某高校是否继续接受跨专业考研、某专业硕士点是否停招、是否可以参加选调生考试等。对于这些挑战，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解决：其一，坚持个性化决策时间弹性管理，在统一决策节点的基础上，允许部分学生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决策时限，班主任需通过一对一谈心谈话，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评估与建设性意见。其二，完善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高校可整合企业、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多方资源，优化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就业市场动态、院校招生信息、创业政策解读等最新信息，为学业规划的科学开展保驾护航。院系组建由行业专家、校友、教师构成的就业信息咨询团队，为学生提供实时咨询服务。其三，建立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结合政策变化与自身发展状况，从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始，可允许学生根据评估结果对学业规划进行一次调整。

四、结语

随着《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落地深化，《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及《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混日子”的大学生终将被时代淘汰。高校需切实扛起人才培养的核心使命，聚焦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输出更多高质量毕业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教师助力大学生做好学业规划并监督执行，是推动学生真正“忙起来、学起来”的关键举措。最优停止理论为这一举措提供了简便可行的量化工具，通过限定关键任务的完成时限，可有效增强大学生的学习紧迫感与主动性，引导其心无旁骛探求真理、锲而不舍锤炼本领，早日成长为适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纪贝，钱佳玥 . 高职扩招背景下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策略研究 [J]. 福建茶叶 ,2020,42(04):183-184.

[2] 赵倩倩 . 辅导员视域下的大学生学业生涯管理研究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7(08):146-148.

[3] 马静 . 加强本科高校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与学业辅导的对策研究 [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20(02):94-95.

[4] 王巧玲，李娴 . 大学生学业规划现状调查——以江苏大学为例 [J]. 中外企业家 ,2019(25):186-187.

[5] 张磊，樊彩连，高华山 .BOPPPS 模式下大学生科研训练融入药剂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J]. 中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 ,2024，7(03):195-199.

[6] 吕德龙，翁溪，周小为 . 基于最优停止理论的网络欺骗防御策略优化 [J]. 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 ,2021,40(07):47-5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内蒙古医科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培育路径研究”（NYJXGGSJ2025004）。

（作者：王钦正，内蒙古医科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助教；通信作者石海英，内蒙古医科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副书记、副院长）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的精神意蕴、问题及策略研究

刘　勇　赵龙娟 *　邹山丹

摘要：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培育是大学生成功创新创业的重要部分。我国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使创业人格培育也发展为具有系统理论、模型支撑的内容。本文基于多篇核心文献系统梳理了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内涵、精神意蕴，旨在总结创业人格培育的意义。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增多，使得更多学生面临着就业危机，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方面也出现重技能轻育人、实践环节缺失、评价体系片面、师资教育经验不足的倾向，通过总结不同学者的文献，发现可以从转变教育理念、整合实践资源、融入德育元素三方面进行改进。同时，未来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应建立长期有效的评价体系，综合考察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为创业教育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创新；实践

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222 万人，较 2024 届增加 43 万人，增长率为 3.65%。从 2015 年到 2025 年 10 年间，年均增长也呈稳步态势，反映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加速。2022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阶段。再到 2025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高达 1222 万，直观反映出社会就业形势的严峻和毕业生人数就业压力的增大。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社会上的岗位数量无法满足其人数增长的速度，让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危机 [1]。经调查发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培养是由诸多因素影响的，最重要的是大学生创业人格因素。大学生创业人格因素的缺失，意味着大学生在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两方面存在缺陷，从而导致大学生创业失败，这也使得有必要重视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培育。笔者基于多名研究者文献，以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为切入点，概括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内涵、精神意蕴，并就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

一、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内涵研究

首先，人格包括四个方面的表现，即知、情、意、行；它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社会环境、社会系统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 [2]。其次，大学生创业人格是大学生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指大学生在创业活动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也是决定大学生能否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

创业人格是个体中与创业密切相关的特定人格特征的总和，而且在创业活动中往往产生积极效应。大学生创业人格指大学生群体中所具有的、与创业活动紧密联系的一系列稳定的、积极的心理与行为特质的集合。同时，刘秀琦教授使用中文创业人格问卷，用于评估大学生群体的创业人格，研究得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创业人格可以预测未来的创业意向和创业成功，具有一定的价值 [3]。

二、大学生创业人格的精神意蕴研究

（一）创新精神

大学生创业人格精神意蕴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不仅仅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最重要的是指向大学生创业人格的深层——目标。创新精神在大学生创业人格中旨在塑造的主体是：不满足于被动接受外界环境，而是以强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全国普通高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背景下，致力于提升大学生的“双创”能力，通过持续有力的创新创业来带动大学生就业，从而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就业。经过近几年的创新创业发展，“双创”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追求高品质的发展新阶段。在大学生创业人格结构中，创新精神不是暂时性的，而是稳定且持久的特质，这也说明创新精神在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中起到重

要作用。

（二）实践精神

大学生创业人格精神意蕴中的实践精神，一个健全的创业人格绝对不是在课堂上呈现的，是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国家大力推行“双创”战略，其本质是一场实践的号召，创新创业不能只停留在文章上，应通过实际行动将书本知识和人格特质转化为现实价值，打造出“知行合一”的创新创业环境。李海垒教授介绍“创业者人格特征与成功模型”，提出相关假设之一，一般人格特质影响了对于创业来说更加具体的特质，如成就需求、冒险、创新等，这些更加具体的特质又影响了目标和行动战略，最终影响了企业创建和成功[4]。

健全的创业人格并非简单的主观臆想，它是在具体的活动和挑战中形成的。它立足于真实的社会实践，与团队成员进行密切合作进而转化为外显的行动力、执行力和内隐的意志力。

三、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存在的问题研究

（一）重技能轻育人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存在重技能轻育人问题，这一问题是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拦路虎”。一些大学生创业者虽然掌握了完备的技能技术，但多数大学生在内在品质的培养方面涉及较少，如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诚信、意志力等，这也间接影响了创业活动的长远发展。

祁美琪、刘秀荣等多名研究者指出，当我们将视野聚焦于“如何成功”时，大学生创业者的内在价值信念将削弱，而聚焦于“为何成功”时，关注的是创业人格的育人功能，这是大学生创业者长期稳步前进的关键因素之一[5]。而在我们实际的创新创业规划中往往强调技能的培训，忽视了创业者内在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的培育。

如今，我国高校越来越意识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类教育活动也正在有序开展着，但一部分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只侧重创业知识培育，而忽视了对创业“人”的教育。创业“人”的培养的核心在于创业者人格品质的塑造，只有具有优良人格的创业者才能够将创业知识得以有效合理地运用，使创业设想能够真正实现，这也是创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打造所谓的“成功企业者”，而是塑造“有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创业者”。

（二）实践环节缺失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存在实践环节缺失问题，对于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较多停留在课堂理论方面，真实的创业活动涉及较少，未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一项针对山东青岛三所不同类型院校中 1839 名本科学生的研究[6]提出，在课程设计上，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与当地经济发展需求适配度较低，未能充分利用当地的创新创业实践优势；教学模式上，人机简单交互式所呈现的教学资源，在教育者和学习者身上表现得过于机械，对学习者的适应性关注不足，多数情况下仅仅充当“教具”的角色，而非“教学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者和学习者的思维和行动，表现出现有的在线教学模式只是一种机械的、被动且单向的知识传递模式。

校内和校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资源分散、整合不足，如在教学与实践两方面缺乏衔接，导致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效果欠佳；家校社三者联系不够紧密，使其资源无法充分得到利用，导致大学生实践效果差强人意。

（三）评价体系片面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存在问题的评价体系片面，刘秀荣教授在研究中详细地指出，在创业活动中，以企业经营和盈利情况为主要方面进行评估，从而认定盈利的创业活动才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7]。这一现象无疑助长了功利主义倾向，导致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唯成绩论”，仅以单一方面为评估标准，使其评价结果可信度不高，评价体系片面。在实际活动中，指导老师、团队成员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团队合作意识、诚信、社会责任感等品质的反馈，未被纳入评价体系，而且大学生个体也同样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估[8]。

（四）师资教育经验不足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存在师资教育经验不足问题。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授课老师多为非专职的授课教师，教师在创新创业方面经验不足，缺乏创业经历，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偏离创新创业的主题，过多关注概念传授，导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趋向形式化，课程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标，对学生创业能力和人格教育效果不明显。由于经验不足，任课教师只能以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为榜样来引导学生，学生只是单纯模仿成功案例，没有真正树立正确的创业动机和创业意识，一味追求功利化、速度化，更不了解创业的不易和艰苦[9]。教师也未打造完备的大学生创业人格心理建设体系，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无法正确调节自身异常的心理行为和意识，无法承受过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大学生创业失败。

四、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的策略研究

（一）转变教育理念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转变教育理念，从外在的创新创业活动“唯成绩论”到内在的创业人格成长，培养的是“完整的人”以及服务社会、引领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刘秀荣、孟凡琦、祁美琪等研究者认为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的核心目标应从单纯的技能培训

逐步转移到塑造大学生内在品质、健全人格的目标。在学校方面，可以聘请有经验的社会人士与大学生进行交流探讨，帮助学生摆脱错误的理念，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尤其可以聘请成功的社会创业者与大学生深入沟通，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增强大学生在创业方面的社会使命感，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创新创业榜样，起到良好的价值观引领作用。

（二）整合实践资源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需整合实践资源，刘秀荣、孟凡琦、祁美琪等研究者共同强调必须打破课堂与社会的壁垒，通过家校社以及企业共同合作、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健全大学生创业人格，构建一个开放、和谐、真实、有价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

王怡学者的研究中，提出量表可以揭示创新创业教师在各个胜任力维度上的具体表现，而且量表测评结果为高校创新创业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指引。通过聚焦教师能力短板，高校能够系统规划专项培训、产教融合实践及跨学科协作平台建设，切实增强创新创业教师的教学胜任力。在真实的创新创业活动中，高校不仅要加强创新创业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应加强育人教育和创新创业实践，将课堂上的知识与实践结合，将校内与校外资源进行集中、整合，使其应用于大学生创业方面。

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开拓学校—社会互通渠道，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自主创办创新讲座、论坛、分享会等。学校应鼓励大学生在寒暑假期间，积极参加创业创新类社团和学术论坛，学习除课堂之外的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将自身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充分应用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健全创业人格，扎实提升自己的创新创业能力。学校也可为全体学生提供学习创新创业知识的机会，让所有对创新创业知识感兴趣的人有机会享受高水平、高质量的学习环境与资源，从而切实提升学习者就业、择业、创业的能力。

（三）融入德育元素

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需融入德育元素，刘秀荣、孟凡琦、祁美琪等研究者，共同主张将思想道德、职业道德、价值观教育作为创业人格的基石，必须将其深度融入创业教育的全过程，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李范成研究者提到在大学生创业人格中融入德育元素，应根据大学生的实际创新创业能力和未掌握的技能进行灵活调整[10]。同时，对大学生进行抗压能力的训练，增强法律意识，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全面的视角对大学生创业人格进行培育，从而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大学期间，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找到自身不足，从而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在未来的创新创业过程中，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愈战愈勇，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以及创业人格魅力，未来在创新创业道路上越走越远。融入德育元素，为学生制定创新创业目标、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健全创业人格提供了基础性教育。

从“重技能”到“重育人”的转变，是基于我国大学生创业现状的反思和总结，这种转变是更为科学的探索，这也标志着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的升华，让大学生创业人格更为全面和具体。

五、结语

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培育，是决定大学生创新创业成败的关键。本文通过多名学者的研究，总结我国大学生创业人格的内涵、精神意蕴以及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未来，我国在大学生创业人格方面应建立全面且长期有效的评价体系，系统考察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为创业教育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1] 刘瑜，曹婧妤，刘英杰．双创时代工科大学生创业人格教育 [J]. 化工时刊，2022,36(09):56-59.

[2] 刘秀荣，孟庆新．“双创”视野下大学生创业人格培养问题与有效策略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9(03):192-195.

[3] 刘秀荣，刘勇，张本金，等．中文创业人格问卷测评大学生样本的效度和信度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1):11-15.

[4] 李海垒，宫燕明，张文新．创业人格研究述评 [J]. 心理科学进展，2012,20(03):403-411.

[5] 祁美琪，姚锡长．“三全育人”背景下师范院校的双创育人路径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47(S1):265-267.

[6] 许云．“广谱教育”到“全纳教育”：中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与突破 [J]. 福建开放大学学报，2025(01):35-40.

[7] 刘秀荣，王欣欣．“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人格研究 [J]. 经济师，2021(06):8-10.

[8] 胡晓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 [J]. 湖湘论坛，2025,38(03):14-22.

[9] 王怡，郭萌，武婷婷．创新创业教师胜任力的要素提取与测量研究 [J]. 创新与创业教育，2025,16(04):51-62.

[10] 李范成，张然，葛茂奎．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创业人格培养中的作用探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11):129-13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影响因素及促进策略研究”（22SHE413）；2022 年佳木斯大学博士专项科研基金启动项目“无聊的意义调节过程及应对策略研究”（JMSUBZ22-17）；（下转 273 页）

核心素养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有效性研究

潘柏权

摘要：大学生核心素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所涉及的内涵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本文通过对核心素养在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中的应用及其有效性进行探析，分析当前高校在大学生心理危机防控中的问题，提出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干预路径。首先，强调通过整合式课程群建设，系统培养学生的心理素养，增强其情绪管理与压力应对能力。其次，提出价值引领与情绪管理的双维融合，促进学生内在动能的激发，以促进心理韧性提升。同时，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智能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学生心理状态，提高危机识别与干预的精准性。最后，建议培育具备心理引导能力的复合型育人力量，提升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实效性。

关键词：核心素养；心理危机预防；情绪管理；智能预警系统

一、大学生心理危机面临的现实挑战

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隐蔽性、复杂性与累积性急剧增强，已成为国家教育健康政策高度关注的深层问题。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明确将心理健康工作纳入学校办学水平评价、人才培养体系与督导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健全分级管理与协同联动机制以应对学生心理问题多发的态势。实证报告表明，我国 15~24 岁青年群体中抑郁检出率大致在 20.8% 至 24.2%，焦虑检出率在 13.7% 至 45.28%，睡眠问题（如失眠、睡眠质量差等）检出率约 23.5%。尽管政策层面强化公共必修课义务，高校需为本科生开设 2 学分（32~36 学时）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公共必修课程，并在条件允许时配置选修与专题课程以提升心理素养，许多高校在课程实施质量、师资配备与课程持续性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在学生心理状态监测体系方面，多地已尝试将心理健康监测纳入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体系，构建市、区、县三级监测网络，但在预警灵敏度、数据共享、跨部门协作机制与隐私保护方面尚未成熟[1]。

（一）核心素养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适配性解析

核心素养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适配性，体现了其在心理自主发展与社会适应中的深远意义。所谓的核心素养，其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水平及理论或应用水平的体现，而是一种基于情绪管理、压力应对、社交处理、自我认知的综合心理状态以及素养提升。实际情况中高校学生心理危机的引发，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一种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的能力及素养，在不同的因素影响和压力环境下，特别是学业、就业等任务的影响下，无法对压力做出合理的控制和处理，心理危机的产生显得尤为普遍。而核心素养中就隐含了对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以及情感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在遇到逆境或者不利情况时采用正确的应对方式进行情绪控制以及自我调整，在心理危机的预防上有着方法论的基础和内涵。

二、当前高校在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缺乏应对压力与情绪管理的基本训练

高校在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一是

（上接 272 页）

2023 年度佳木斯大学国家基金培育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回流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JMSUGPRW2023-00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4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创业人格培育路径研究”（24CX0407）。

（作者：刘勇，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赵龙娟，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邹山丹，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缺乏系统性的应对压力与情绪管理训练。这一缺失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深层次地反映了高校育人理念的结构性偏差。以某大学图书馆事件为例，肖某某由于遭遇网络“人肉”搜索，处于极度悲伤的情绪中，出现焦躁不安的状态，继而造成急性应激反应，后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且自陈有自杀或自残行动的可能性达 80%。可以看出，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施暴方，当时都经历了强烈的心理应激过程，在其经历网络暴力时，情绪陷入极度愤怒与痛苦之中，且存在自杀倾向。如果学校能建立有效机制对当事人进行事前心理危机评估和及时介入，对学生健康成长肯定是有益处的。该事件中，学生的怒气和委屈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宣泄，以致整个事件最后升级，由此可见加强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培育，锤炼抗压能力，提高情绪管理能力尤为重要。

（二）课程设计忽视学生心理素养能力的系统培养

在我国高校中，诸多课程设计侧重文化基础、职业技能、实践创新等方面，将学术能力、就业能力放在重要位置，严重忽视学生的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两大维度。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仅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上讲述情绪调节、压力应对、人际关系发展等内容，且课程内容设计上以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心理疾病的识别、预防等为主，缺乏各学科在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培养上的交汇，如思政课、创新创业、体育等相关课程中蕴含的心理育人元素未被挖掘，在价值引领、就业支持、团队竞技上没有强化学生的心理支撑，缺少对其抗挫折能力的培养，未设计分年级递进式的核心素养培育目标，导致学生在面对复杂社会情境时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核心素养的培育与心理危机预防严重脱节，造成了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缺乏应有的解决能力，在面对专业课学习压力、考试受挫、面试失败时自我调节能力差，产生极大的情绪波动，出现焦虑、抑郁、自我否定等现象，极易造成心理危机现象的出现。

（三）心理状态识别和预警机制不够敏感和精准

高校将核心素养的评价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主要以专业成绩、竞赛奖励、社会实践三方面为衡量指标，心理相关素养如人际适应、情绪调控、压力应对等方面缺乏清晰评价标准，主观随意性较大，多以辅导员、同学评价或学生自评为主，缺乏数据支撑。因此造成学生心理状态的识别与预警机制普遍存在敏感性不足和精准性缺失的问题，导致潜在心理危机个体未能在早期得到有效识别和干预。如在某高校发生大学生心理危机自杀事件时，该学生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前多次出现心情沮丧、人际退缩等迹象，然而高校无法准确通过核心素养的评价及时了解学生日常状况以识别出其潜在的心理危机，且未健全心理状态监测和预警机制，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2]。该事例充分说明了高校需尤为重视大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评价、心理状态的识别及预警机制的完善。

（四）教师与辅导员心理干预与指导能力不足

在我国高校中，教师与辅导员的心理干预与指导能力普遍不足，成为学生心理危机防控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尽管许多高校已经设立了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并开展了一些培训，但这些培训往往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对教师进行具体心理干预技巧与实操能力的培养。教师和辅导员在学生出现情绪问题或心理困扰时，往往无法准确识别问题的根源，也未能提供有效的干预措施，导致学生的心理困境得不到及时解决或进一步恶化。许多高校未能将心理干预与指导作为教师和辅导员的核心职业能力进行系统化培养，导致部分一线教育工作者在面对学生心理危机时感到力不从心。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尤为关键，然而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和心理支持资源的匮乏，辅导员往往只能在最初的阶段对学生进行简单的情感安抚，缺乏更为深入的心理疏导和专业化的干预手段。教师作为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群体，在面对学生的心理问题时，常常因为缺乏心理学专业知识，导致其应对策略无法精确对症，也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引导。

三、核心素养驱动下的心理危机预防路径重构

（一）构建以整合式课程群为基础的核心素养导向心理建设体系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心理建设课程群的构建，既要整合现有各类课程资源，更要构建与核心素养契合度较高的课程群。课程不仅要丰富内容体系，更要从深层入手，疏导学生的情绪与心理，引导其合理应对压力、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同时还要在横向上构建心理素养课程体系，在跨学科交叉整合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首先，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从大一时期即可进行，通过场景模拟以及深度分析等方式，关注心理健康课程中学生对初级情绪、初级压力和初级社会适应的自我学习与自我识别；在课程内容建构层面关注学生的自我情感和自我感受，促进其培养反思意识与思维 [3]。其次，通过跨学科方式综合设计心理健康课程群，让心理健康知识融入各专业课程，帮助学生解决自身情感问题和学业问题。具体而言，可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教育、体育教育和美育课程进行结构性嵌合，在不同课程场域中渗透情绪调节、压力管理、人际沟通、挫折应对和生命意义建构等内容，使学生能够在专业学习与真实生活情境中持续形成稳定的心理调适能力。例如，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强化价值判断、责任意识与生命伦理教育，引导学生在价值冲突和现实压力中形成积极认知；在职业规划课程中融入生涯焦虑识别、就业挫折应对和职业自我效能训练，降低升学就业压力引发的心理风险；在体育课程中通过耐力训练、团队合作和竞赛情境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与情绪释放能力；在美育课程中

借助音乐、绘画、戏剧和影像表达疏导隐性情绪，提升学生的审美感知与情绪转化能力。同时，高校还应依托案例研讨、团体辅导、心理剧展演、朋辈互助和项目化实践等教学形式，将心理知识转化为可体验、可训练、可迁移的核心素养能力，避免心理课程停留在概念讲授和常识普及层面。在课程评价方面，应突破单一考勤和书面作业评价方式，将情绪识别能力、压力应对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协同能力和危机求助意识纳入过程性评价体系，通过成长档案、情境任务、反思日志和教师反馈动态记录学生心理素养发展轨迹，从而使心理建设课程群真正服务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前端预防。

（二）以价值引领与情绪管理双维融合推动学生内在动能激活

仅进行情绪管理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必须将心理危机预防系统中的情绪管理教育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内在的驱动力，更好地实现学生心理教育的全面化。第一，价值引领是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成长的根本。各高校在课堂教育、讲座研讨、实践活动等方面，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学生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与社会的关系，让学生拥有自身的价值感与责任感，能够在遇到压力、危机时，将自身的潜能激发出来，成为前进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第二，情绪管理能够为学生进行自我成长提供积极动力。各高校要为学生提供情绪管理方面的知识和实操指导，帮助学生进行自身情绪的发现、理解、调节。情绪管理不仅仅是用来应对自身外界的压力，更是使学生内在潜能得以有效激活的基础，并能够使自身在保持心理健康的状态下生活和发展。

（三）建立以数据驱动为支撑的学生心理状态智能预警系统

建立以数据驱动为支撑的学生心理状态智能预警系统，是提升高校心理危机预防效能的关键举措。传统的心理危机干预多依赖人工识别和直观判断，往往存在识别延迟和遗漏个体的风险。数据驱动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通过对学生行为数据、学习成绩、情感状态等多维数据的实时监测，建立起更加科学、精确的心理健康评估体系，实现对潜在心理危机的早期预警和精准干预[4]。

一是建立数据支撑的学生心理健康智能预警系统。主要从大数据分析入手，对学生课堂纪律情况、学习情况、社交活跃程度、情绪状态、作业完成情况、身体健康状态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收集学生的数据，实现大数据分析，生成学生心理健康“画像”，借助“画像”，可以实时监控学生当前的情绪波动、压力大小、交际情况等，及时进行预警。二是构建数据驱动的学生心理健康智能预警系统。数据驱动的预警系统需要有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能力，具有识别学生行为的功能，比如学生在电子教室的学习行为，在学习网络平台上与其他人的交往行为，在与同学在线聊天和表达情感时情绪的细微波动，通过收集学生的微表情，识别哪些学生的心理状况有异常等。

（四）培育具备心理引导能力的复合型育人力量提升干预实效

培育包含教师、辅导员和心理引导员等在内的复合型育人队伍。提升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性和落地性至关重要，高校不仅要培育心理师，更要培育具有心理知识、心理引导能力的教师和辅导员，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引导“大家庭”，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拓展危机干预的辐射面[5]。首先，针对教师和辅导员进行心理学基础培训，包括情绪心理学、压力管理、危机心理干预等，确保广大一线教师及辅导员能及时准确辨别学生何时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何时给予学生心理引导，在学生心理困扰发生的初期给予心理引导，及时准确把握心理危机程度。其次，高校心理引导工作需结合教育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资源，培育复合型心理工作者。其工作范畴既包含学业指引，也涵盖心理疏导、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指导。多学科协同开展跨专业培养，有助于凝聚工作合力。

四、结语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大学生面临的心理压力日渐凸显，心理危机的发生频率逐步上升。核心素养在提升学生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培养学生的情绪管理、压力调节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的心理素养，可以有效激发其内在动能，增强心理韧性，从而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本研究提出通过创新教育模式、构建智能预警机制和培育复合型育人力量等策略，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完善，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甫德，李凌江．快乐的健康密码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253.

[2] 汲慧丽．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高校心理危机预防机制建设 [J]. 财富时代，2021(03):234-235.

[3] 谢清．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的心理危机预防系机制构建 [J]. 中国新通信，2021,23(01):137-138.

[4] 骆语辰．育德育心品质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积极效应研究 [D]. 西安：西安石油大学，2020.

[5] 付珍，张国立．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预防心理危机的预测模型 [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05):358-36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思政专项“核心素养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有效性研究”（JJKH20251589SZ）。

（作者单位：长春建筑学院）

基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开发研究

陈锐敏

摘要：小学《道德与法治》是落实红色育人、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阵地。针对当前小学红色文化教学普遍存在的资源形式单一、课堂模式固化、知行转化脱节、本土资源融入不足等现实痛点，本文以人教版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依托，探索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的系统化开发路径。研究立足广州近代革命策源地的地域资源优势，系统整合本地红色遗址、革命文物、历史事件与英雄事迹，构建主题化、结构化、互动化的本土红色数字资源体系。依托VR、AR、AI等，搭建沉浸式、探究式、场景化的育人情境，有效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局限，破解红色教育浅层化、符号化、形式化难题，助力学生深化红色认知、厚植文化认同、实现价值内化，为小学思政课本土化、数字化、高质量育人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小学教育；《道德与法治》；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教学开发

一、引言

广州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积淀了底蕴深厚、类型丰富、辨识度高的红色文化资源，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碧血千秋到中国革命早期活动的光辉足迹，这些资源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教材[1]。在人教版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尤其是高年级设置“百年追梦复兴中华”等单元，其中包含了很多与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相关的内容，为红色文化教育提供课程支撑与教学指导[2]。

当前，小学思政课堂红色教育多依托通用教材与零散网络素材开展，本土红色资源挖掘不深、融合不足、利用低效，难以适配小学生认知规律与课堂教学需求。伴随教育数字化战略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成为小学思政课提质增效的必然趋势。基于教材课标、立足本土特色、依托数字技术开发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能够实现国家课程与地方资源的精准对接、传统课堂与数字场景的深度融合，对丰富思政育人载体、创新红色教学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基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开发意义

人教版小学《道德与法治》为红色教育提供纲领和主线，但其内容具有普适性[3]。广州本地的革命历史、英雄人物、遗址遗迹是教材内容的绝佳地方性注解和生动例证。然而，这些资源分散在各处，教师个人搜集、甄别、转化为适切教学材料的成本高昂。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的开发是对本地红色资源进行教育化、课程化、数字化的深度加工，将教材中的知识点与广州具体的红色故事（如黄花岗起义、中共三大）精准链接，形成结构化的教学模块，可以减轻教师的备课负担，为其提供“即取即用”且高质量的本地化教学方案，促使国家课程的落地更加丰满、更具地方特色和感染力[4]。同时，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融合多种媒体与技术，能够创设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环境[5]。

三、小学《道德与法治》红色文化教学现状分析

（一）资源形态静态单一，红色育人缺乏鲜活感染力

教材是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核心依据，但是纸质材料往往受媒介形式的影响，对关于红色文化的内容更多采用文字描述和部分静态图片进行展示。这种平面化、符号化的表达，无法重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情境与生动性，导致红色文化很容易成为只能记忆的知识点，难以发挥精神源泉的作用。例如，在“黄花岗起义”中，教材更多是概况性描述，而起义前革命志士的内心斗争、起义过程的惨烈悲壮、历史环境的紧迫压抑等，这些最能触发学生情感的要素没有得到呈现。虽然一些教师结合教材内容，补充一些视频材料，

但是这部分素材更多是零散的，并且质量差异大，很难与教材内容形成密切融合的资源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因资源形态单一与固定，整个课堂教学非常容易陷入照搬的过程，历史人物成为遥远的符号，革命精神成为抽象的口号，无法真正“活”起来、“走”进学生心里，最终教学情感温度与精神感召力得不到有效发挥。

（二）教学模式单向灌输，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探究性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因受传统教育观念与自身能力的限制，还存在以教师中心、讲授主导，直接影响教学成效。结合现有教学调研数据可知，超过70%的德育课依旧使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在红色文化教育中，教师是红色历史的讲述者与革命精神的诠释者，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无法参与课堂活动，难以产生有效的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缺乏对角色扮演、项目式学习、主题辩论等方式的使用，学生很难深度参与课堂互动。虽然教师也会使用多媒体，但是侧重于单向播放，导致人机、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不足。基于这种单向灌输的教学过程，往往没有发挥学生主体性的作用，很难引发其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价值思考，整个学习过程呈现被动性与浅表性，导致红色文化教育的作用被削弱，无法实现从知识记忆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转化的教育目标。

（三）育人场域局限于课堂，知行转化存在脱节断层

红色文化与当时的社会存在密切的关系，其精神内涵需要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连接，才能让学生得到更深的感悟。但是，以往教学过程中，更多局限于教室内。虽然一些教师会组织学生参观红色遗址、博物馆等，但是效果不佳，也会产生组织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课时难以协调等问题，无法成为常态教学手段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导致红色文化教育往往出现“知行脱节”现象。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对其认知只是观念上的理解，缺乏在近似情境或现实生活中进行有意义的实践。因此，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与生活实践、历史认知与自身体验形成无法逾越的鸿沟，直接降低教学成效。如何突破教室的限制，营造低成本的沉浸式体验环境，将红色历史现场融入课堂，成为提升红色文化育人效果必然解决的问题。

四、基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开发策略

（一）立体化整合资源，变“平面叙事”为“沉浸情境”

为解决资源形态平面化的问题，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开发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对其进行全景式、故事化、多模态的深度加工与整合，构建沉浸式数字学习情境，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以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百年追梦复兴中华”为例，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开发需要深度解析教材内容，从而实现本土化、立体化转译。结合第7课“不甘屈辱奋勇抗争”和第8课“推翻帝制民族觉醒”的内容，教师提炼“民主革命烽火”主题，将教材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概述，拓展为基于广州史实的沉浸式模块内容，构建“教材知识—本土资源—数字互动”的完整闭环，依托教材“广州黄花岗起义”一句话转化为包含“3D文物探究”（如起义者绝笔书数字化放大阅读）、“VR指挥部密室突围”（在1:1复原的“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VR场景中，寻找藏匿的武器与情报）、“AI林觉民对话”（通过AI数字人回应学生关于《与妻书》情感的提问）的复合资源包。

同时，依托第9课的内容，教师提炼“建党初期星火”主题，资源包需要将“中共一大”与“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开发“数字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VR漫游，每个学生都可以探索会场陈设，只需要点击每个代表座位，就会触发其生平简介与会议发言内容。另外，教师按照“跟着电影学党史”形式，为每个关键事件创作5—9分钟时长的高清剧目，如《风云儿女——广州起义前夜》，聚焦革命者的情感冲突与坚定抉择。这种资源包的供给，弥补了教材平面叙述的不足，为学生提供立体的精神世界，可以有效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

（二）游戏化设计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

为弥补单向灌输教学模式的不足，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开发进行了丰富的游戏化、任务型、协作式学习活动设计，让学生学习过程更加主动。以五年级下册第9课为例，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需要将教材中的结论性叙述转化为学生可以参与的学习过程，从而有效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

一是设计“策展人”任务链。在该部分中，主要包含三个任务。（1）“破译：会议召唤”。结合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内容，每个小组需要解译虚拟的“密电”，通过分析关键词与背景资料，推断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广州东山）与当前社会形势等，从而与教材“革命事业面临考验”一一对应。（2）“策划：风云展区”。学生进入“数字文物库”，为“国共合作”展区选择重要文化（如大会宣言仿真件、代表所用物品3D模型等），并撰写说明文，从而自主建构对红色历史事件的理解。（3）“创造：代表风采”。每个小组选择一位参会代表，依托资源包提供的人物传记、文章片段等，为其设计一张互动式介绍卡，需要包含参会发言内容等音频简述。

二是开展沉浸式“模拟三大”角色扮演。在学生完成知识准备后，需要进入核心模拟决策过程。在环节中，资源包提供每个角色背景资料卡和会议议题清单。基于此，每个小组组员选择自己想要扮演的代表，

围绕教材中等真实历史议题进行探讨，结合历史资料开展限时辩论与表决。基于这种活动的开展，可以将教材原本抽象的内容转化为具有思辨性的对话与艰难选择，促使学生理解早期革命道路的艰难与复杂性。

（三）一体化联通场域，变“知行鸿沟”为“浸润实践”

为弥合学生课堂认知与生活实践脱节，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开发需要具备开放性的架构，打通线上线下、连接课堂内外、融通学校家庭社会，从而构建红色文化育人的一体化浸润场域。以五年级第 9 课为例，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构建以“中共三大”学习为核心，无缝衔接课堂—场馆—家庭的一体化实践场域，将教材内容转化为学生可以参与的浸润式体验。

一是开发“广州红色足迹”数字研学地图，打通虚实场景。结合教材内容的实时更新，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内含专属的移动端研学地图。在实践中，学生需要实地参观“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其 App 按照定位自动推动 AR 场景复原、音频情境任务、数字打卡集章等。其中，学生使用手机镜头，看到 1923 年逵园等历史建筑原貌叠加于现实场馆; 在纪念馆特定位置，可以聆听各个代表争论的音频片段，并回答“你认为合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等问题；完成全部任务后，自动合成“三大代表电子纪念章”。基于这种实践活动的开展，教师将教材静态内容转化为学生可在历史发生地完成的探究任务，从而达到“现场即课堂”的效果。

二是构建“云端教研与实践共同体”，推动资源普惠与教学创新。教师利用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建立区域性的红色教育云平台。同时，围绕这一课程内容，每个区域的教师可以共同开展线上备课，共享利用 VR 三大会址开发的“模拟代表团”教案。在该平台中，设置“学生数字展厅”，集中展示每个学校学生完成的“数字展馆”策划案与“时空信箱”留言，从而形成跨校区的学习成果交流与激励机制。

三是设计“红色基因·家风传承”家庭微项目，促进精神内化。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学生学习需要延伸到家庭，为此教师依托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包发布“寻找身边合作故事”实践项目。在该项目中，学生通过对长辈进行访谈，了解家族或社区关于“团结协作”克服困难的故事，形成音频或文字报告；结合采访掌握与中共三大“建立革命统一”的智慧相联系，思考“合作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家长一同制定一项体现“团结”的家规或行动计划。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学习成果全部上传到班级社区，促使“统一战线”等概念下沉为可感知、可实践的生活品德，以此实现红色精神从历史认知到学生日常行为的转化。

（四）智能化评估反馈，变“结果模糊”为“过程可见”

建构“红色素养的数字画像”，实现多维评估。智能化评估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纸笔测验或者主观观察进行测评的模式，可以凭借学习平台为每一个学生构建一幅充满活力的“红色素养的数字画像”。这幅画像在评价维度上应该超越知识记忆而涉及认知理解，情感共鸣和行为意向 3 个维度。例如，在完成“模拟三大”角色扮演后，系统不仅记录学生选择的阵营和发言要点（认知），还可通过内置的简易情感识别技术（如说话音频语气分析）或学生自评量表，评估其投入程度与情感体验（情感）；同时结合自己参与家庭微项目时拟定的行动计划和完成计划（行为）产生综合学习报告。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清楚地认识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短处，从而由“对学习结果进行评估”向“推动学习发展”过渡。

其次，设计自适应反馈任务等，促进深度内化。利用评估数据，智能化资源包能够智能地推送个性化的巩固和深化任务，从而形成一个“评价—反馈—促进”的正向循环。例如，对于那些在“AI 林觉民谈话”中对《与妻书》缺乏深入情感理解的学生，该系统能够自动为他们推送一段由资深播音员朗读的《与妻书》音频片段和相关的背景解析视频；对“策展人”使命中显示对历史脉络掌握不清晰的团队可以提供自定义“时间轴梳理”交互博弈使命。这一基于数据的自适应反馈机制，使得红色文化教育不再是简单的“一刀切”教育方式，而是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精神支持，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红色基因的深入内化。

五、结语

依托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开发广州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包，是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探索。本研究立足广州本土红色资源优势，通过立体化资源整合、游戏化活动设计、一体化场域搭建、智能化评价赋能四大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红色教学资源单一、模式固化、知行脱节等突出问题，构建了教材对接本土、数字赋能育人、实践助力内化的新型红色教学体系。数字资源包能够有效激活本土红色文化育人活力，让红色历史走出文本、走进课堂、融入生活，帮助小学生在沉浸式体验、自主性探究、生活化实践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未来，需持续联动教育教研部门、红色场馆、技术团队深化资源迭代优化，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持续挖掘广州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不断提升本土红色数字资源的育人适配性与实效性，为小学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红色基因常态化传承提供长效支撑。

参考文献

[1] 程万春 . 红色文化资源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整合与应用研究 [N]. 科学导报 ,2025-06-04(B02).

[2] 李潇 .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运用策略研究 [J]. 新课程导学 ,2025(09):62-65. （下转 279 页）

五育融合理念下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构建

石佳禾　张小楠 *

摘要：劳动教育是贯通五育的关键纽带，其育人实效直接影响学生综合素养培育与健全人格塑造。当前高校劳动教育面临价值引领弱化、知行转化不畅、协同机制缺失、评价体系单一等现实困境，难以适配五育融合的系统性要求。本文立足五育融合理念，阐释相关核心内涵及二者契合性，剖析高校劳动教育现存问题，并从价值引领、知行合一、校社家协同、评价体系完善等维度，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塑造三维目标“三位一体”为内核，配套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场域协同育人体系，探索高校劳动教育分层落地路径，破解劳动教育实践难题，提升育人质量。

关键词：五育融合；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

劳动教育作为贯通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关键纽带，其育人实效直接关乎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与健全人格的塑造[1]。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包含两层逻辑架构，内核为育人目标三位一体：即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塑造；外在实施载体为校、社、家三方协同育人体系，内外双层架构耦合构成完整育人模式，该体系与五育融合理念的“各育渗透、多维协同”内核高度契合。基于此，本文立足五育融合理念，探索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的构建路径，为破解劳动教育实践难题、提升育人质量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五育融合理念内涵

五育融合理念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指引，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协同共进为核心指向，突破单一育人维度的局限，构建全域贯通、有机整合的育人体系。该理念摒弃各育割裂实施的传统范式，强调以德育为统领、智育为基础、体育为保障、美育为浸润、劳动教育为纽带，推动五大育人要素在目标设定、内容供给、路径实施、评价反馈等层面深度交融。其内在逻辑在于以整体性思维统筹育人全过程，依托各育间的互补支撑与相互赋能，消除育人环节的壁垒与断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育、品格塑造、身心涵养、审美提升的一体化推进。五育融合并非简单叠加各育内容，而是遵循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形成协同发力、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为高校培育兼具综合素养与健全人格的新时代人才提供理论遵循与实践框架，保障育人工作的系统性、持续性与实效性。

二、五育融合理念与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的契合性分析

（一）目标导向契合，锚定全面发展内核

五育融合以破除各育壁垒、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育人为根本目标，强调育人过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高校劳动教育目标维度的三位一体模式，始终围绕知识、能力、素养协同提升展开，与五育融合的育人目标高度同频。二者均摒弃单一化、片面化育人思路，以全人培育为核心指向，通过多维要素的整合发力，推动学生从知识掌握到价值塑造的全方位成长，为落

（上接 278 页）

[3] 郭义才 .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融入——以云南普洱域内为例 [J]. 云南教育 (小学教师),2024(11):26-28.

[4] 王玉萍 .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实践——以“闽南红色侨文化革命资源”为例 [J]. 福建基础教育研究 ,2023(09):88-90.

[5] 王文君 .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教学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运用研究——以陇南红色文化资源为例 [J].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3(01):91-97.

（作者单位：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一致的目标遵循。

（二）实施路径契合，强化协同渗透机制

五育融合注重各育要素的交叉渗透与联动实施，强调育人环节的有机衔接。目标三位一体育人框架依托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塑造的分层推进，可自然嵌入德育引领、智育支撑、体育保障、美育浸润内容；校社家三方协同作为落地载体，保障三维育人内容落地。这种路径设计与五育融合的实施要求相匹配，能够将抽象的融合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育人流程，通过环节联动与内容渗透，消除劳动教育与其他各育的实施断层，提升育人链条的完整性与连贯性[2]。

（三）价值旨归契合，夯实育人实效根基

五育融合的最终价值在于提升育人质量，塑造具备健全人格与综合素养的时代新人。三位一体育人模式依靠三维目标闭环 + 三方资源联动强化劳动育人实效，二者价值追求高度统一。该模式以劳动教育为联结纽带，借助三维度的协同发力、家校社资源联动，将五育融合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育人成果，既强化劳动教育的独立价值，又发挥其贯通各育的枢纽作用，推动育人实效从局部提升转向整体优化，为高校高质量育人提供坚实支撑。

三、五育融合理念下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构建路径

（一）聚焦价值引领，筑牢劳动教育思政育人根基

教师应以价值引领为核心锚点，将思政教育深度融入劳动教育全过程，依托五育融合理念对标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育人目标，搭建“认知—实践—素养”分层育人框架。这种育人范式打破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割裂壁垒，摒弃单一技能传授的局限，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锤炼品格、厚植情怀，实现劳动素养与思想境界的同步提升。例如，在文科类专业中，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献整理、非遗技艺传承等劳动项目，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手抄革命家书、复刻传统手工艺品，在重复性劳动中体悟先辈坚守与文化传承的重量，建立劳动与家国责任、文化自信的内在关联。

在实践设计层面，教师需遵循由浅入深的进阶逻辑，搭建分层劳动实践体系。基础阶段侧重劳动习惯养成，布置校园环境维护、公益服务等基础性劳动任务，引导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的朴素认知；提升阶段聚焦专业劳动融合，结合学科特点设计针对性任务，如理工科学生参与科研辅助实验、农科学生开展田间种植实践，教师同步渗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针对高校学生思维活跃的特点，可增设主题劳动探究环节[3]。例如，在乡村振兴劳动实践中，引导学生调研乡村产业现状，通过制定农产品推广方案、助力乡村环境整治，理解劳动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实现价值认同与实践能力的协同提升。

素养升华环节，教师需搭建“劳动—价值—成长”的关联纽带，推动劳动教育向素养培育延伸。通过开展劳动分享会、思政主题研讨，引导学生复盘劳动经历，理解其中蕴含的奋斗精神、协作意识。例如，在经管类专业劳动实践中，教师可组织学生参与企业实习实训，引导学生观察职场人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结合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理解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让劳动精神内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

（二）强化知行合一，搭建理论实践协同育人平台

五育融合理念为高校劳动教育注入全新内核，三位一体以知识、能力、素养三维目标为内核，立足知、行、悟三维发力，打破传统劳动教育重理论轻实践、重形式轻实效的局限，精准契合高校学生价值观塑造与能力提升的核心需求，以知行合一为纽带，实现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深度融合，筑牢协同育人根基。

首先，教师可锚定理论筑基，构建知行互嵌的课程体系。以课程内容重构为抓手，摒弃单一理论灌输模式，将劳动政策法规、劳动精神内涵与行业实操标准、岗位能力要求有机结合，打造分层递进的课程模块。例如，在文科类专业劳动教育课程中，教师可融入社区服务劳动理论，搭配老旧小区环境整治、非遗技艺传承辅助等实践内容。而在理工科专业课程中，将工程劳动原理与实验室实操、生产车间实训紧密衔接，引导学生带着理论走进实践场景，让知行合一贯穿课程全程，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

其次，教师可聚焦实践赋能，搭建多维联动的育人场景。主动联动校企、校地资源，打破校园围墙限制，依托校社家三方协同机制打造“校园 + 企业 + 社区”实践平台，推动知行合一落地见效。例如，组织经管类专业学生深入本地小微企业，协助开展账务梳理、市场调研等劳动实践，教师全程跟进指导，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劳动能力。在实践中深化劳动认知，增强责任意识，让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实现知行转化。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感受劳动的实用价值与社会意义，在攻坚克难中强化实干精神，让劳动素养在实践淬炼中稳步提升。

最后，教师可强化价值引领，完善知行闭环的评价机制。突破单一结果导向评价局限，构建过程与结果并重、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价体系，以评价倒逼知行合一落地。例如，在课程实践中，教师通过记录学生劳动参与度、任务完成质量、团队协作表现等过程性数据，结合实践报告、反思日志等成果，综合评定劳动成效。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自我反思，梳理实践中的得失，形成“理论学习—实践锤炼—反思提升”的知行闭环，让劳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培育学生正确劳动观。

（三）整合多方资源，构建校社家联动育人共同体

教师作为高校劳动教育的统筹者与实施者，可依托校社家三方资源搭建联动平台，将抽象的三位一体

三维育人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实践场景，引导学生从技能习得、价值认同到素养提升实现多维度成长。校社家协同是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的外在实施载体，既能打破高校劳动教育的封闭性，又能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为五育融合背景下的劳动教育提供可落地的实践方案。教师需以“劳动实践链”为核心整合资源，通过“校园基础层—社会拓展层—家庭浸润层”的递进式场景搭建，引导学生在多元实践中深化对劳动的认知。

在校园基础层，教师可立足校内资源搭建劳动实践阵地。例如，在“农耕文化劳动”模块中，联合后勤部门打造校园微农场，划分班级责任田。教师带领学生参与播种、灌溉、采收等全流程劳作，讲解作物生长规律与农耕技艺，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朴素道理，夯实劳动技能基础。而在社会拓展层，教师需联动社区与企业搭建实践平台，拓宽劳动教育边界。联合社区服务中心开设敬老助老、文明宣讲等志愿服务岗位，对接文创企业、科技公司打造专业实践工坊，让学生深度参与活动策划、项目执行、成果转化等全流程。通过真实场景中的劳动实践，将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精准对接，在提升实操能力的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与服务意识，实现劳动教育的多维价值赋能。

教师可与本地社区服务中心、非遗工坊构建协同育人机制，联合设计系列劳动教育实践项目，涵盖志愿服务与传统技艺传承两大模块。以非遗竹编技艺传承为例，教师可联动本地非遗工坊，邀请传承人进入校园开设专题工作坊，系统讲解竹编工艺的历史渊源与制作技法；随后组织学生深入工坊开展沉浸式实践，在经纬交织的编织实践中直观感受传统工艺的文化底蕴，体悟匠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严谨态度与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

在家庭劳动浸润维度，教师应强化家校协同机制，引导家长成为劳动教育的共同参与者。结合寒暑假等时段设计“家庭劳动素养培育计划”，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发起“家庭劳动积分打卡”活动，鼓励学生主动承担厨房安全烹饪、家居空间整理、绿植养护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教师则定期通过班级线上共享平台汇总学生实践影像与家长反馈日志，指导家长关注劳动习惯的日常养成，如劳动工具归位意识、任务规划能力等核心素养的培育。

（四）完善评价体系，健全过程结果并重育人机制

教师坚持五育融合导向，对标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育人实效，依托多元评价载体构建闭环优化机制，为高校劳动教育精准适配学生成长需求提供关键支撑。教师推进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优化完善，核心在于紧扣三位一体三维育人目标，结合学生成长差异实际，构建过程与结果并重、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价框架，实现评价与劳动教育实施的同频共振[4]。教师需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摸排不同年级、专业学生的劳动基础、兴趣方向及成长诉求，从理论认知、实践技能、价值塑造三个维度，划分文科、理科、工科三大学生群体，同步梳理各群体在劳动教育中的评价重点、反馈需求及提升路径。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联动教务部门、实践基地搭建多元评价平台，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评价方案与优化路径。针对文科学生，聚焦劳动精神感悟、社会服务实效，通过实践日志、服务对象反馈收集评价信息，强化评价对价值塑造的导向作用[5]。针对工科学生，侧重劳动技能熟练度、创新应用能力，依托实践操作考核、成果展示点评完善评价，动态调整实践教学与评价侧重。例如，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教师可结合专业特色设计志愿服务类劳动项目。教师可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中小学或老年大学，开展经典诵读指导、红色故事宣讲、古籍修复辅助、乡土文献整理等活动，在实践中深化文学素养。通过日常考勤、服务总结、公益单位评价构成综合评价体系，收集学生对评价合理性、针对性的反馈后，优化评价权重分配，补充对劳动精神体悟的专项评价指标，推动评价全面适配育人需求。

四、结语

五育融合理念下，高校劳动教育“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构建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该模式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养塑造三维目标为内核，以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协同为实施载体，能够摆脱当前劳动教育多重困境，实现各育协同渗透。构建需锚定价值引领、知行合一等核心路径，为提升劳动教育育人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1] 花文凤，王绍磊．地方本科高校劳动教育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4(06):169-182.

[2] 杨亚星．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协同机制：问题与对策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11):95-100.

[3] 李嘉楠，汤胜君，陈虹冰．高等职业教育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高校扩招”的证据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5):116-128.

[4] 史海霞，王超柱．高校劳动教育实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学生视角的实证分析 [J]. 教育科学，2025,41(04):90-96.

[5] 满园春，李源．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下高校劳动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创新 [J]. 中国稻米，2025,31(04):118-119.

（作者：石佳禾，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张小楠，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执行困境与纾解路径

姜晓慧

摘要：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与逻辑分析方法，系统梳理新世纪以来我国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剖析政策执行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纾解路径。研究发现，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课程改革融合、国家文件发力、人民健康锚定、素养融合支撑为核心的四个演进阶段。当前政策执行面临文本内容模糊、资源供给不足、健康教育落实缺位、监管机制缺失等困境。新征程下，需通过明晰政策内容、夯实资源基础、推动健康教育落地、完善监管机制等路径，提升政策执行效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演进历程；政策执行；执行困境；纾解路径

2021 年 9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将健康教育与德智体美劳融合，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2022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全国健康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将健康素养融入五育各方面”。体育健康教育作为体育与健康教育交叉融合的实践活动 [2]，融入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以促进青少年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掌握运动技能、提升健康素养为核心，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预防青少年肥胖、近视、不良体态的关键手段。然而，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学生近视率偏高、肥胖率上升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育健康教育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不匹配、监管不规范等多种因素。当前，有关体育健康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协同治理、体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发展 [3]、问题审视等方面，而关于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研究对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执行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纾解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推进提供学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关键性临界点和社会契机，人们只有在契机的推动下完成制度性变革，才能推动社会的长远发展。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意见等政策来推动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协调发展，但在新世纪以前体育健康教育总体上是处于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相互促进的阶段。21 世纪伊始，在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才得以融合为体育健康教育。基于此，研究以新世纪伊始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深入分析。

（一）以体育课程改革为融合点的政策阶段（2001 年—2006 年）

2001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构建素质教育导向的课程体系，强调“健康第一”的思想。同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并发布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将健康教育融入体育课程。2002 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出台，进一步强化健康导向。2003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进一步凸显了党和国家通过体育课程改革将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发展的决心。为解决“重智轻体”教育沉疴对学生体质健康所产生的不良问题，2006 年 12 月，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在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纳入，两评价”的措施。总体而言，在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素质教育和“健康第一”的决策部署下，这一阶段的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通过体育课程改革逐渐走向融合发展。

（二）以“7号文”为发力点的政策阶段（2007年—2015年）

为应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下滑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带来的阻滞影响，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强调增强青少年体质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明确设施建设、师资培养等要求，成为政策推进的核心抓手。2008年，《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出台，明确健康教育内容与实施路径。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赋予体育健康教育新内涵。此阶段政策以中央文件为引领，推动政策落地与责任压实。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体育健康教育政策主要是以《中央7号文》为发力点，并围绕国家发展、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体育健康教育发展。

（三）以人民健康为新锚点的政策阶段（2016年—2020年）

为突显青少年体质健康在人民健康中的基石作用，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确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战略主题，提出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的目标。2017年，《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进一步明确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目标。总体来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出台不仅为体育健康教育发展擘画了美好愿景，而且也为体育健康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以素养融合为新支点的政策阶段（2021年至今）

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部在《意见》中明确强调“提升学生健康素养，为学生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健康教育工作推进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2022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新增核心素养体系，推动健康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2023年7月，《健康中国行动2023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提出“持续开展健康学校建设”。此阶段，政策以核心素养培育为核心，推动体育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政策体系更贴合新时代教育现代化与健康中国建设需求。

二、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执行困境

（一）政策文本内容模糊

政策文本模糊主要表现为目标定性化、措施细化不足，易引发“选择性执行”问题。一方面，政策目标多采用“明显提升”“基本形成”等表述，缺乏量化标准。如《意见》提出“教学效果明显提升”，但未明确“明显”的具体指标[4]。另一方面，政策措施缺乏细化配套。如《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体育教学服务”，但未明确购买标准、质量监督等要求，影响政策落地。

（二）政策执行资源供给不足

人、财、物等核心资源供给不足制约政策执行可持续性[5]。一是师资力量缺口大。2020—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从43万增至70万，但按中等配置仍缺约15万[6]。健康教育专职教师配备不足问题普遍存在。二是财政投入不足。政策落实依赖地方财政，部分地区削减体育健康教育投入。三是场地设施建设滞后，校内外资源共享不足，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锻炼需求。

（三）健康教育落实不到位

健康教育是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7]，但当前相关政策在落地执行中仍存在健康教育落实不到位等问题[8]。一是体育教师认识片面，受中考“指挥棒”影响，重技能训练、轻健康知识传授。二是健康教育课程碎片化，多数学校未开足课时，学生知识达标率低。三是评价内容不完善，体育中考未纳入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等维度，形成“重体育、轻健康”偏差[9]。

（四）执行过程缺乏监管

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环节是保证上级政策落地落实和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有效举措。当前，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治理成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落地执行过程中监管缺失[10]。一是常态化监管缺失，监管主体单一。实际监管以教育行政部门单一监管为主，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形成；常态化监管缺位，部分学校出现“阴阳课表”。二是监管力度不足，依赖学校汇报，缺乏实地核查，督导检查“走过场”，难以发挥纠偏作用。

三、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纾解路径

（一）明晰体育健康教育政策内容，增强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

增强政策文本的清晰度是提高政策执行可操作性的有效途径[11]。为解决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文本内容模糊性较高的问题，需要提高政策文本内容的清晰度，从而为地方政府落实上级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提供更加具体的行动路径。第一，制定可量化、分阶段的政策目标。减少“明显提升”等定性表述，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时间+数字/百分比”的量化形式。第二，设计精细化、配套化的政策措施。针对政策中的原则性要求，制定专项配套政策，明确执行边界、标准和流程。

（二）夯实体育健康教育资源基础，提高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

加大体育健康教育政策资源的供给力度，是保证其平稳落地的关键所在。强化体育师资培育，盘活潜在师资资源。发挥涉体高校人才培养核心作用，将体育课程改革新要求融入高校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具备条件的高

校开设健康教育专业、设立健康教育学院，将体育健康教育知识、技能融入课程体系和毕业论文环节，实现师资培养与教学需求的有效衔接；优化“实习—考核—聘任—再考核”任职流程，建立政府、学校、家长、学生共同参与的评价体系，全面考核师风师德与教学能力。完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将社会力量利益与体育健康教育公共利益相结合，驱动社会资本投入，明确政府财政投入的最低比例，保障政策执行的基础资金需求，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加大场地设施建设与开放力度，融合数智技术弥补资源短板，推动校内外资源共享。对于受地域、气候限制的地区，利用数智技术创设虚拟体育锻炼情境，为师生提供多元化的体质健康促进空间。

（三）推动健康教育措施落实落地，凸显健康教育的不可替代性

健康教育是体育健康教育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推动健康教育落实落地是国家体育健康教育政策的应有之义。第一，提升体育教师专业素养，树立正确的体育健康教育理念。邀请体育健康教育领域专家，开展专题培训、讲座、教学竞赛等活动，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想认知和专业能力[12]。第二，创新教学模式，推动健康教育融入体育教学全过程。体育教师立足体育健康教育的基础性、实践性、综合性特征，将健康知识融入体能、运动技能教学中；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通过学、练、赛结合，推动学生将健康知识和技能内化并迁移至日常生活。第三，优化评价内容，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中考评价体系。教育部加强顶层设计，要求地方政府结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纳入体育中考评价；综合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改变“重体育、轻健康”的评价导向，以评价倒逼健康教育落地。

（四）完善监管机制和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政策执行的实效性

政策监管是切实推进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执行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体育健康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的切实对策。目前，我国体育健康教育政策落地执行还存在监管不足的问题，要有效治理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和加大监管力度。构建多元协同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以“家—校—社”协同育人为基础，以“家长进课堂”“社区亲子体育活动”为纽带，设立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联席会议，聚焦形式主义、敷衍执行等问题开展政策纠偏。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监管，开展实地核查，避免学校单一汇报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二，加大监管力度，强化法律法规约束。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年修订）、《学校体育工作条例》（2017年修订）等法规，对“选择性执行”“挤占课程时间”等问题严肃问责；厘清各执行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压实主体责任，夯实政策执行基础。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体育健康教育政策是促进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手段，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新征程上，需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推动政策深度融入教育现代化与健康中国建设全局，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建新 . 关于《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的专家解读：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三大抓手——体育、艺术和游戏活动 [J]. 现代预防医学 ,2022,49(06):961-962,974.

[2] 吕钶 . 新时代我国体育与健康教育的价值证成及问题审视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3,46(09):84-95.

[3] 张崇龙 , 王忠波 , 王忠瑞 , 等 . 新发展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协同治理研究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3,42(04):31-37.

[4] 毛振明 , 丁天翠 , 蔺晓雨 . 新时代加强与改进中国学校体育的目标与策略——对 2007 年以来 7 个关于学校体育工作重要文件的分析与比较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44(09):2-12.

[5] 宋歌 . 理想目标与现实问题：“双减”政策的工具选择与政策偏好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95-107.

[6] 姚芳 , 黄桥梁 , 孔凡龙 , 等 . 中国五地中小学校健康教育现状及其需求 [J]. 中国学校卫生 ,2022,43(04):510-513.

[7] 王健 . 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2(06):166-178.

[8] 吕书红 , 王夏玲 , 刘志业 . 学校健康教育对中小学生健康相关知识和行为影响分析 [J]. 中国健康教育 ,2020,36(05):397-401.

[9] 韩贝宁 , 鲁长芬 .“双减”政策助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学科逻辑、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J]. 体育学刊 ,2023,30(06):110-117.

[10] 罗潇 , 郑家鲲 , 杨宗友 .“双减”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学校体育的价值、困境与对策 [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2,42(06):75-84.

[11] 李乐虎 , 王姗姗 , 刘玉财 .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衔接的主要类型、共性问题与实现路径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4,43(06):59-65.

[12] 杨光 , 李哲 , 梁思雨 .“体医融合”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 [J]. 体育学刊 ,2021,28(06):23-30.

（作者单位：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世界环境日

2026.6.5

公益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12>
9 771674 975260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